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第七卷

经济管理出版社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 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组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总校订

经济管理出版社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七卷

江时学　凃光楠　朱云瑞　劳远回等　翻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校订

京权图 01—95—954 号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Vii
Edited by Leslie Bethell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 七 卷

江时学 涂光楠 朱云瑞 劳远回等 翻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校订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通县张家湾曙光印刷装订厂

850×1168 毫米 1/32 28.25 印张 748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118-299-5/F・290
定价：60.00 元

出版说明

由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尔教授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是70年代中期着手编撰的一部史学巨著。参加撰稿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1984年以来，该书已陆续出版，预计将在90年代出齐。

为推动我国的拉美学研究和繁荣学术文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院科研局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自1988年起组织所内外几十位学者着手将这一巨著译成中文出版。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新华通讯社、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中文版先出第四卷和第五卷，接着再出其他几卷，每年推出一至二卷，预计在90年代内出齐。全书约合中文1000万字。

我国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同志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已征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的同意，我们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索引附于书后，注明原文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1996年4月

本 卷 作 者

阿兰·奈特 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第 1 章）

彼得·史密斯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第 2 章）

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圣何瑟（第 3 章）

詹姆斯·邓克利 （伦敦）玛丽皇后学院政治学导读教授（第 4、5 章）

维克托·布梅尔—托马斯 （伦敦）玛丽皇后学院经济学导读教授（第 6、7 章）

鲁道夫·塞尔达斯·克鲁兹 美洲国家农业保护委员会，哥斯达黎加，圣何瑟（第 8 章）

路易斯·A·佩雷斯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第 9 章）

豪尔赫·多明格斯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第 10 章）

弗兰克·莫亚·庞斯 圣多明各（第 11 章）

戴维·尼科尔斯 牛津（第 12 章）

罗伯特·W·安德逊 波多黎各，哈托雷伊（第 13 章）

迈克尔·康尼夫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历史学教授（第 14 章）

约翰·梅杰 赫尔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第 15 章）

本卷中文版分工

译者：

徐建国（第1章）

袁东振（第2章）

江时学（第3、4、5、6、7章）

马小平（第8章）

劳远回（第9、10章）

涂光楠（第11、12、13章）

朱云瑞（第14、15章；地图、书目评论和索引；第七卷序言）

校订者：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责任编辑：

徐小玖

罗松山

孙士明

附：

《剑桥拉丁美洲史》各卷内容

第一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征服前夕的美洲，欧洲与美洲，美洲的教会。*

第二卷　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人口，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精神与文化生活。

第三卷　从独立至1870年左右——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的独立，加勒比地区，独立后的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

第四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拉丁美洲与美国和欧洲列强，人口，农村社会，城市，工业，劳工，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学，音乐和艺术，教会。**

第五卷　从1870年左右至1930年——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拉普拉塔河地区国家，安第斯山脉地区国家，巴西。**

第六卷　上册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人口、经济，经济与社会，经济思想，科学与社会。

下册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宗教。

第七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巴拿马。

第八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第九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巴西，国际关系。

第十卷　1930年以来的拉丁美洲——思想、文化和社会。

第十一卷　全书的书目评论（截至1992年）

注：本书原计划出8卷，后增至9卷，现决定出11卷。英文版除第九卷外，均已出齐。中文版第三、四、五卷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七卷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译者

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前言

李慎之

被誉为世界史学集大成之作的剑桥世界史系列之一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拉美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剑桥世界史系列开创于本世纪之初，在积累经验并且饮誉士林70年之后，又推出总共9大卷[①]约800万字（中文）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著作。用本书总序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作一高水平的综合，使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今后的工作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但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而且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益。”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也就是“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了，得不谓之为盛事乎！

中国必须了解拉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叫中国是这么一个大国，而拉丁美洲又甚至比一个大洲还大呢？事实是，拉丁美洲这个名词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拉美研究这门学问确立于本世纪30年代，而中国之正式搜罗人才、组织机构，专门从事拉美学的研究，到60年代也已开始了。中国对拉美的兴趣是浓厚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对拉美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很难使自己满意。就算不提过去那段以幻想代替现实的狂热岁月，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

---

① 按目前计划已增为11卷。——译者

于确切的体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做过研究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个中甘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用说对一个大洲了。认识需要长时期、多方面的积累。在一时还来不及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有意识地想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吸收新知“翻译为先”的话。30 年代，鲁迅又说过一时创作不出来，不如多些译作为好的话。这就是所以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还不惜动员所内外几十人的力量，花几年的光阴来翻译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原因。

从地理上说，拉美之于中国可说是距离最遥远的地方了。虽说是“小小环球”，但是东北西南，正好相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真可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从历史上说，除非将来真能证明慧深所到的扶桑确是今日的墨西哥，即使从 15 世纪算起，500 年来双方也极少交通。虽然如此，中国和拉美也并不是没有可比性。首先，两者都是由多种文明交融而成的庞大的文明体。中国由于历史悠久而早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拉美虽然还是多国林立，但是文化上的共同性远大于殊异性。这个由相异相敌到共存共荣的过程，看来是全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家都会感兴趣而且应该从其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对中国和拉美进行比较研究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双方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课题。虽然双方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任务是一样的。拉美人常说“不能戴着 19 世纪的镣铐进入 21 世纪”，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任务吗？

大概自古以来，分居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对异域外界同属圆颅方趾的血气之伦有观察、研究、记述的兴趣，但是直到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后，对外国问题或者国际问题的研究才渐渐成为一门学问。不过，从学科的划分上说，这种研究大抵还是隶属于传统

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此同时，却也渐渐地出现一种倾向，形成了以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汉学、埃及学、东方学，等等。这种趋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本世纪的下半期得到了特别强烈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可与传统的学科分庭抗礼的地位。拉美学的确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一经确立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然要凭借过去的基础）。这部《剑桥拉丁美洲史》就是其重大的成果之一。它当然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但是更应该说是一部拉美学的著作。地区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世界学术的一个重大趋势。理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了。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需要不断加深对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了解，而且要把对象国、对象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

我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趋势在我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学术界还不是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去顺应这个趋势，推进地区研究的发展。地区研究在其初始阶段往往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因为研究主体通常是由于外交、外贸的现实需要的推动，只求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去认识对象地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学者必然会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地区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不能不深入到它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这样，地区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越来越转向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文学。地区研究的综合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超出于传统学科的单一性之上。国际上的地区研究已经进展到这一地步了。对比起来，我们的地区研究还没有脱出初始阶段。我们必须认识世界学术的这种趋势而急起直追。《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出版至少可以帮助我国的拉美研究的深化。我希望它也能促进我国所有的地区研究的发展。

《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英文版第一卷是1984年出版的，全书

9 卷将在 90 年代出齐。中文版第四卷能在 1990 年就译好付印出版，效率是很高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个人既不研究拉丁美洲，又没有对此贡献任何力量，唯一所做的就是在当初决定进行这一大工程时起了一点促成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作用也使我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对中国有价值，对拉丁美洲也有价值，能被一个 12 亿人口的大国所了解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乐于向中国读者推荐这部书。它不但对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对一切有志于了解世界，有志于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人都是有用的。

谨序

1990 年 9 月

英文版总序言

由已有定评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计划和主编并由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分章撰写的多卷集剑桥历史，自本世纪初以来在英语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的最高范例。由阿克顿勋爵计划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共16卷，已在1902—1912年先后问世。随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等也相继出版。上述近代史现已由14卷集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最近已脱稿。剑桥伊斯兰史、剑桥伊朗史和剑桥非洲史或已出版或已将近完稿；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中国史和犹太史，而日本史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7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着手出版一部剑桥大学拉丁美洲史的时机已经成熟。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自1960年以来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在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这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但也有居住在美国的英国、欧洲和拉美的历史学家)，出现在欧洲（特别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也日益明显地出现在拉丁美洲本身（新的一代年轻专业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人曾在美国、英国或欧洲得到培养，已开始脱颖而出）。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拉丁美洲在世界中的作用——已经起了变化，看法也随之改变。来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和新的概念模式，正在被拉美历史学家们不断采纳。剑桥大学出版社已按步就班地出版了一系列拉美研究的专论并创办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而且也开始将这种历史思想和研究的新成果公之于

众。

1974年，伦敦大学学院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史主讲人莱斯利·贝瑟尔博士应邀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并在两年后为这个项目开始工作，他是第一位受权单独负责计划、协调、组织和编纂一整部历史的主编人。

《剑桥拉丁美洲史》是第一部研究拉丁美洲独特历史过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预计共分8卷，[1]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居民首次接触欧洲人之时(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初期）开始，直到今天的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剑桥出版社将另行出版一部剑桥美洲——北美、中美和南美——土著民族史，其中将对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达数千年之久的这个地区之民族、社会和文明演变作出应有的研究，正如本书将对欧洲殖民地统治时期和独立时期直到现在的拉美土著民族的历史进行较为详尽的阐述一样)。拉丁美洲主要由美国以南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大陆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与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通常还包括海地，共同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包括19世纪前半叶期间西班牙和墨西哥先后通过条约和战争割让给美国的大片位于北美洲的领土。也不包括英、法、荷属加勒比岛屿，或圭亚那在内，尽管，例如，牙买加和特立尼达曾有过西班牙渊源的先例，现在又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本书的目的在于将现有的知识加以高度的综合，以便为拉丁美洲历史学家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套坚实的基础，将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们有所帮助，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们也会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也希望，这部历史能为美国和欧洲通过拉丁美洲的历史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作出贡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也希望能为促进拉丁美洲本身更加重视自己的历史作

---

① 按目前计划已增为11卷。——译者

出贡献。

编写本书的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撰稿人。

本书将按历史年序出版，这在剑桥历史的出版上尚属首次：第一卷和第二卷（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内有介绍欧洲人入侵前夕美洲土著民族和文明的部分）于1984年出版；第三卷（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于1985年出版；第四卷和第五卷（约1870年到1930年）于1986年出版；第六卷至第八卷（1930年至今）将于1988年或此后尽快出版。每一卷或组成一套的几卷分别考察了拉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尽管承认拉美在当今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发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并承认拉美首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与英国和法国以至整个西欧，最后与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历史书将侧重阐述内部结构的发展方面。而且，明显地把重点放在自19世纪初除古巴外所有拉美国家取得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上。同殖民地时期和独立运动时期相比，拉美史史学家们相对忽视了这段时期。自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是8卷中两卷的主题。有6卷则集中阐述19世纪和20世纪，并与总体组合在一起，其中有围绕拉美史重大主题的章节，也有20个拉美独立国（外加波多黎各）的分国历史章节，特别是三个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巴西面积的大小、人口和独特的历史来看，在拉美通史中往往被忽略了，就大部分由西班牙语美洲人或西语美洲的专家们撰写的通史来说，对此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章将附有一篇书目评论。[①]这些书目评论将特别侧重于过去15—2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书籍和文

---

① 书目评论集中放在各卷的正文后面，每一节的标题与各章相同，按顺序排列便于查阅。——译者

章，也就是说侧重于自查尔斯·C·格里芬主编的《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此书是为1971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拉美史会议而出版的）出版以来的这段期间。格里芬主编的这本书目提要是在1966—1969年期间准备的，其中很少涉及196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著作。

英文版第七卷序言

1984年出版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论述自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人"发现"、征服和定居"新世界"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前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西）殖民统治这300年期间的经济、社会、政治、知识与文化史。1985年出版的第三卷，考察了19世纪最初的25年期间（除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外）整个拉丁美洲殖民统治的崩溃和被推翻，以及——该卷的主要中心——从独立到大约1870年这50年期间西班牙语（以下简称西语）美洲各独立共和国和独立巴西帝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其中，至少就西语美洲的大部分而言，是一个经济相对停滞和政治比较动乱和思想意识矛盾较大的时期。1986年出版的第四卷和第五卷，集中论述从1870年前后直到1930年期间的情况。对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以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为主的"黄金时代"，该地区变得更加全面地与正在扩张的国际经济结合在一起；物质繁荣（至少对统治阶级是如此）；政治稳定（像革命期间的墨西哥只是个突出的例外）尽管在农村和城市都有迅速的社会变革；思想趋同（至少本世纪20年代以前是如此）；而且，颇为重要的是，知识和文化生活也有显著的成就。

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情况是本史书第六卷至第九卷的主题。第六卷将汇集从本世纪30年代危机到80年代危机这段时期以拉丁美洲经济、社会和政治史为主要论题的综合性论文。第七卷论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历史。第八卷论述西语南美洲9个共和国（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的历史。第九卷有两个不同的

部分：1930年以来的巴西史，以及论述20世纪关于拉丁美洲知识与文化史的综合性论文。

第七卷是有关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情况的4卷中首先问世的一卷。其第一篇由论述墨西哥的两章组成；第一章考察本世纪30年代期间的革命过程，特别是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时期（1934—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墨西哥的影响，以及紧接着的战后非常时期的性质；第二章考察1946年以来的时期，侧重于经济增长（截至80年代）、社会变革和政治稳定。第二篇有一章对30年代至80年代中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了总的回顾，并有分别阐述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各章。第三篇有两章阐述古巴：第一章论述从马查多独裁统治到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这段期间；第二章论述革命；阐述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以及波多黎各的各有一章。第四篇专门阐述巴拿马，一章是1903年该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另一章是巴拿马运河史。

本卷的撰稿人：5位英国人（其中1位长住美国）、5位来自北美洲以及3位来自拉丁美洲的人中，有许多人对同仁的著述提出过批评意见。对此，我特别向维克托·布梅尔—托马斯、詹姆斯·邓克利、阿兰·奈特和约翰·梅杰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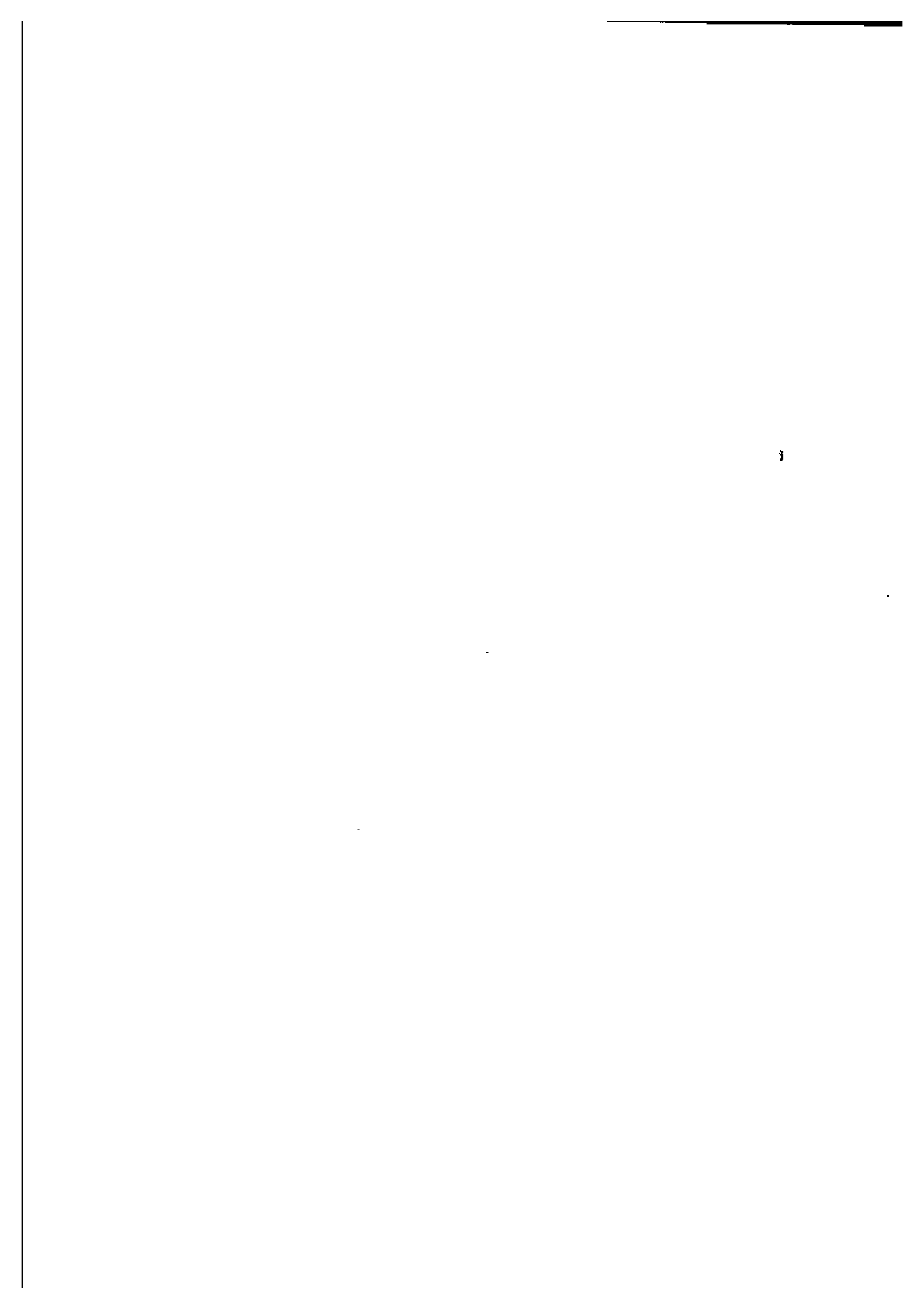
詹姆斯·邓克利还同意担任本书第七卷的副主编之一。他的建议和鼓励以及担任主编的技巧对于本卷出版前的改进及最后定稿是非常宝贵的。

剑桥大学出版社驻纽约办事处负责《剑桥拉丁美洲史》最后几卷的出版事宜。卡撒丽塔·拉莫萨担任第7卷的责任编辑，南西·兰道担任本卷原稿清样的编辑。索引由迈克尔·格纳特负责。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编辑部提供了秘书，给予协助。

目　录

第一编

墨西哥



第1章

1930—1946年的墨西哥

1910年爆发革命后，墨西哥经历了10年武装动乱，随后进行了10年政治经济重建工作。革命运动摧毁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旧政权，消灭了迪亚斯军队并使一个联盟上台执政。这个联盟成份复杂，但却受到北方（美国）力量的强大影响并广泛致力于政权建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划。如果说在这些广泛的目的方面革命的领导人都遵循着迪亚斯的先例，而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却是极为不同的，他们行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同样是极为不同的。确实，墨西哥经济并未因革命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原有的出口导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外向型发展——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体现于1917年宪法中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导致了与美国的争吵，但并未出现完全的破裂，美国1929年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高于1910年。此外，尽管1921年以后石油生产出现了下降，墨西哥经济仍然得到恢复并实现了增长，至少到1927年。相比之下，墨西哥的社会政治生活则因革命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其经常是以未加筹划和预见的方式出现的。1910—1920年时期的武装动员让位于新形式的体制性动员，例如农民协会、工会以及一大批左的或右的、规模大的或小的政党。结果出现的并非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在1910年所提倡的体面的自由主义政治生活，但也不是迪亚斯所维护到底的那种封闭的、个人至上的、独裁的体系。参政的国人也许是拉美国家中人数最多的；一种群众政治的形式正在孕育之中——不安定，有时是激进的，常常是暴

力的和腐败的。对这种政治生活无法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它包括地方的权贵和地区考迪罗（他们中的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新的、革命的背景）；激进的平均地权论（如在莫雷洛斯）和保守的地主所有制（如在恰帕斯）；革命的反教权主义和天主教社会行动（更不必说保守的天主教教权主义）；咄咄逼人的、雄心勃勃的长官执政论和正在涌现的文人专家治国论。

中央政府主要关心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执政时期（1924—1928年），是对这些相互争斗、不断分裂的派别实行控制和加以同化。为此目的，卡列斯在战场上、在教室里对教会宣战；他对得意忘形的军队实行裁减和加以职业化；他培养有组织的劳工，最显著的是由路易斯·N·莫洛内斯领导的官方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他容忍（有时是在策略上鼓励）农民动员。尽管国家对民众社会的控制这样加强了——考虑到1910—1920年期间的半无政府状态，也无法再恶化了——但由索诺拉州的领袖们所建立的国家（1920—1934年）并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20世纪20年代，这个喧闹的民众社会不会容忍这种统治。基督派与卡列斯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相持不下；地方权贵和考迪罗与国家权力扩张展开了争夺，而军队发动了两次叛乱。地区的权贵们，例如尤卡坦强大的种植园主阶级，抵制自称为卡列斯主义者的改革。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经常决定与国家站在一边，但是他们往往是有条件的，有策略的，而且很多时候也与国家持不一致意见。

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与迪亚斯统治时期个人至上的中央集权的控制，与其狭隘的集团政治和完全拒绝群众政治参与的局面截然不同。在迪亚斯统治时期，出现过民众的不同意见和抗议，但通常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它们无法达到有组织的形式，当然，亦无法打入迪亚斯的国家本身。更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群众运动的要求和语言，以及那些企图利用群众运动的政治人物的要求和语言，显示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和新的自信。革命已经破除了原

有的社会确实性以及相伴的遵从。主要的官方工人组织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不仅仅是卡列斯政府的一个傀儡：它迫使雇主们必须空前认真地对待工人。独立的工会会员们，例如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们，立场更左，他们抵制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控制而依赖自己产业的力量。同样，依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表现出与革命前不同的倾向。他们毕竟曾是革命的突击队。确实，官方的土地改革很晚才开展而且非常缓慢，到1930年墨西哥的土地按价值只有9%转给了村社。但是这种数字是使人产生误会的，而且可以争论说是低估了土地分配的规模；当然它们无法显示革命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所带来的变化。地主依然拥有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但情况完全不同了，代价更高了。总的说来，他们的长年雇农可能还依旧顺从；但是邻近村子的农民由于有权申请获得土地却构成了一种持续的、令地主削弱的威胁。地主们因而必须与越来越有组织的农民和国家进行竞争，而感到这时的国家从其在地区和全国的表现而言决不如迪亚斯统治时的国家可信赖。在1910—1920年动荡时期，一些地主已经破产；许多地主现在必须与更重的税收、动荡的市场和更高的劳动成本作斗争。地主阶级怀念迪亚斯统治时的美好年代，悲叹令人烦恼的地权平均论者的兴起以及那些教唆他们的煽动人心的暴发户、政客们。一些地主谨慎地把他们的资本转向城市工业和商业，加速了渴望土地的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大庄园的消亡。地主阶级（当然各个地区各有不同）没有被武装革命消灭，但却受到了严重削弱，在某些州如莫雷洛斯受到了极大削弱。因而，在30年代进行大手术之前很久，大庄园制就表现出不断衰弱的贫血症状，它未来的遗产继承人已经围在病床周围了。

同时，尽管1910—1920年时期的那种全国性极度暴力已经减退，但地方的和区域性的暴力仍然发生。由1926—1929年基督派暴动引发的广泛的农民动员使中西部墨西哥遭到破坏。在地方上，地主向农民开战，地权平均主义者向基督派分子开战。地方权贵

为争夺权力而开战，村社为争取土地或独立而开战。索诺拉帮掌握的国家航船在一个动荡社会的浪峰上颠簸。我们可以凭着事后的认识说，墨西哥在某些时刻面临着走哥伦比亚1949年以后道路的危险，也就是说朝着地方性的、自我维持的、宗派性的武力冲突的方向发展。但后来这种局面之所以没有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获胜的一派治国有方，韦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以及首先是卡列斯从未忘记必须要实现国家一体化和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墨西哥的地方性暴力是一场真正社会革命的产物，而不是这样一种革命的代用品。它并非只是地位牢固的派别无目的的愚蠢暴力行为，也不是迪亚斯旧政权一再挑起的暴力。伴随着这场暴力有一系列的现象，即革命的重要副产品：得到加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国内和国际性的移民；新的企业家集团和家族的兴起；扩大的教育计划；"土著主义"和"革命"艺术。

因此，20年代末革命已大大改变了墨西哥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但是革命的结局依然不清楚。事态仍然在发展，对于这个进程会向何处发展都有许多不同看法。各阶级、派别和地区互相竞争，国家对于民众社会的控制提高了，但是甚至在卡列斯于1929年主创新的执政党国民革命党（PNR）的情况下，这种控制也是不稳定的，往往是脆弱的。国家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广泛的革命目标正在实现，但进展缓慢，并受到不断的挑战。至于什么是最佳的办法，存在着重大分歧，甚至在统治者精英们中亦如此。

在1924—1926年出现有利财政经济局面的时期，卡列斯新政府曾一度似乎充满了某种信心。银行业改革和公共工程证明了国家不断发展的力量。为了实施宪法所赋予他对教会和石油工业的控制权，卡列斯大胆地向天主教会和美国佬发起了挑战。然而，他很快遇到了基督派起义，与美国发生了冲突，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卡列斯的计划开始出现动摇，他的立场向右转。前总统（1920—1924年）和当选总统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于1928年7月遭到暗

杀，更在经济衰退之上增加了政治危机，使墨西哥的这场经济衰退提前发生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前。卡列斯的对策反映了他的足智多谋和治国才能。他拒绝延长任期，宁愿在幕后掌权。因此，在随后的六年总统任期内，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帕斯夸尔·奥尔蒂斯·鲁维奥和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等三位总统先后执政，卡列斯作为最高领袖则在幕后操纵，因此人们习惯称这段过渡时期为最高领袖统治。

这--时期从两上意义上说是过渡性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个人主宰的统治到制度化统治的明确过渡。在宣告考迪罗政治结束之后，卡列斯在1929年初召开了一次新的执政党国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在1929年这多事之秋，奥夫雷贡分子发动的一场军事叛乱被粉碎；基督派叛乱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国民革命党平凡的候选人奥尔蒂斯·鲁维奥战胜了自由派反对进行重新选举的对手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因此，我们可以将官方党的不间断垄断追溯到1929年。

然而，在最高领袖统治时期进行的政治体制化伴随着不断上升的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其中出现了卡德纳斯主义，即与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相联系的政治运动。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卡德纳斯是他那个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被冠以他的名字，尽管他具有墨西哥总统这一至尊的地位，还是这个时期，更多地造就了他，而不是他造就了这个时期。然而，完全有理由把墨西哥30年代的历史看作是卡德纳斯主义兴起和统治的历史：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社会的规划，它代表了墨西哥革命最后的、实行重大改革的阶段。卡德纳斯主义于40年代出现了衰落：其政策削弱，政治骨干消失，致力于不同规划的新的领袖兴起。

历史学家都不怀疑卡德纳斯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其性质许多人却各持己见。革命正统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历来都认为卡德纳斯主义是社会革命的最高峰。另一些人认为卡德纳斯主义是

革命进程中一段戏剧性的激进插曲，某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半布尔什维克式的偏离。近来的学术研究再次强调其延续性，尽管认为其特性有所不同，是一种政权建设、各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延续。在这点上卡德纳斯主义完全符合革命的要求，然而这种革命不是实行民族赎买和民众激进主义的途径而是实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资本主义积累的途径。

对卡德纳斯主义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他的总统任职。其历史不是一个人甚至也不是一届六年总统任期的历史。它起源于同两个具体政治危机相交叉的两个广泛的社会经济趋势。就意识形态、人员和阶级阵线而言，卡德纳斯主义确实可以回溯到 1910 年革命。但它也是因大萧条的经历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思想再认识而产生的。如果说第一个趋势是一种本地的影响，那么，第二个趋势则是与更广泛的拉美经历相比较。卡德纳斯主义的出现也由于连续发生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与奥夫雷贡 1928 年被暗杀有关（这导致国民革命党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的是争夺对党和政府控制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最高领袖卡列斯和卡德纳斯总统之间于 1935—1936 年中达到 冲突高潮。

这场斗争必须从其直接的政治背景方面来认识：1929 年执政党国民革命党的建立；同年奥夫雷贡叛乱军队的失败，以及对无能的奥尔蒂斯·鲁维奥总统的操纵、羞辱和最终在 1932 年的罢免。这一系列事件显示了国家政权的逐渐巩固和卡列斯强大的个人权力。卡列斯对继任总统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1932—1934 年）的控制要低调一些，但同样是实在的。卡列斯做到了在幕后的操纵。尽管是他倡导了对政治生活进行形式上的制度化，但他所能做到的比许多人认识到的要更少。在政治上，他树敌众多，宿怨颇深，这意味着任何新上台的总统（特别是高傲顽强的卡德纳斯，他身临其境地目睹了奥尔蒂斯·鲁维奥的毁灭）都会明确意识到在与最高领袖的关系上自己所面临的两难境地：遵从还是违抗？

由于世界大萧条的影响，卡列斯的敌人和对卡列斯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它在墨西哥产生的影响是渐增的而非即时的，也不像在单一经济国家如智利和古巴那么严重和持久。墨西哥自 1926 年以来已遭受了出口产品价格下跌，紧缩通货和经济收缩。在 1929—1932 年间，外贸下降了约 2/3；进口能力下降了一半；失业增加，并由于 30 多万墨西哥移民从美国遣返而扩大了失业。然而，在大萧条的这场严重的"商品赌博"中，墨西哥是比较幸运的。占墨西哥出口 3/4 的金银和石油在需求和价格方面没有遭受像其他原材料那样严重的损失；此外，出口部门的就业人数很少（仅占非农业劳动力 3%的人口创造了墨西哥 2/3 的出口收入），因此，对工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不像巴西等劳动密集型农业出口经济那么严重。同时，墨西哥巨大的口粮农业部门已从 1929—1930 年的歉收中恢复过来（由于气候仁慈地一反周期），而制造业（以国内需求为主）受到的影响不如采掘业那么严重，而且还因墨西哥进口能力下降而受益。大萧条刺激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

因此，在 1929—1932 年期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 16%。这场衰退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很难估计。实际工资当然下降（同样，这个趋势早在 1927 年就出现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有一个"频繁而分散的动员"时期（特征是罢工、抢占土地和反饥饿示威游行），与经济衰退时期正好重合。非常清楚，随着经济的复苏，群众的战斗性（按照熟悉的模式）变得更加显著。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财政部长阿尔韦托·帕尼（1932—1933 年）所执行的凯恩斯主义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经济确实相当迅速地得到恢复。帕尼增加了货币供应量（1932 年增加了 31%，1933 年增加了 15%），并为了增长而牺牲比索。出口、就业和实际工资得到恢复。到 1934 年，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了 1929 年的水平，比索稳定了下来，经济前景令人鼓舞。当萧条的影响减退的时候，卡德纳斯上台执政，尽管萧条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对于许多人来说，最高领袖统治时期（1928—1934 年）意味着艰难时期。现在新总统

的上任提供了一个政治出气口，民众被抑制的不满可以藉此释放出来。

政治精英对萧条的反应是混乱的，在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党内造成了意见两极分化。对卡列斯和他的支持者（“老骨干”）来说，最近发生的事件绝非否定基于私人企业、出口、外国投资、严格控制劳工以及国家一般“不采取主动”的现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这个模式应该加以完善，首先应该限制诸如村社农业这些异常现象。1930 年，卡列斯宣布土改失败：村社鼓励懒惰；未来的出路在于搞私人资本主义农业。做出了努力以尽快结束改革。在 1929 年的高潮之后，对村社的授地越来越少。卡列斯对劳工的骚动也感到不安：为了使经济摆脱衰退，资本需要安全，罢工必须严厉阻止。卡列斯继续反复陈述过去的反教权主义主题、20 年代政治的主题，以及教育作为进行革命改造的手段的作用。思想，而非生产资料才是来自索诺拉帮所要进行的社会工程的合适对象。反教权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新教育部长纳西索·巴索尔斯竭力推动政权世俗化的政策（1931 年）。三年后，在其著名的《瓜达拉哈拉呼声》中，卡列斯号召进行一场“心理”革命，一次为革命争取青年们的感情和理智的“新的精神征服。”卡列斯和他的“老将们”墨守 20 年代的准则和灵丹妙药，在 30 年代的政治社会动荡中似乎越来越成为一支赞成保守主义的力量，受到右派的赞赏。在卡列斯的心目中法西斯确实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他把意大利和德国（以及苏联）看作是政治教育的成功事例。

卡列斯意识到新的一代正在从政治上成熟起来。对于他们来说，1910 年的英勇行为是神话和历史，而且他们对来自索诺拉帮发动的那种革命越来越失去幻想。他们反对 20 年代的反教权、经济上自由、社会方面保守的思想，主张实行激进的社会经济变革。他们参与从世界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向民族主义管制主义的全球性转变。如果他们像卡列斯一样仿效外国模式的话，那么，对他们影响大的就是美国的新政或苏联的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曲解了

的）。即使卡列斯和卡列斯主义者仍然大权在握，新人和新思想也不能忽视。1930 年以后，试验性地实行了改良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联邦劳工法》（1931 年）在工作时间、节假日和集体谈判行动方面做出了让步，以换取国家对工业劳资关系更严密的规定。右翼认为这项法规是危险的激进措施，左翼谴责它是法西斯式的，而较有洞见的人士则认为最低工资有助于促进国内需求，有利于工业。1934 年，成立了独立的农业部，一部新的《农业法典》首次允许大庄园雇工可以要求获得土地。《法典》还对私人农场提供保证。这种矛盾反映了国民革命党内部深刻的分歧。该党在 1933 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六年计划》，尽管在政策方面缺少具体措施。这项计划体现了一代新兴的专家治国论者、政治家们和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新哲学的成份。《计划》含蓄地批评了来自索诺拉帮实行的模式，它强调国家实行干预政策的作用以及由墨西哥人开发墨西哥资源的必要性；它向劳工承诺最低工资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它强调土地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大力解决，包括分割大地产。

因此，在卡德纳斯就任总统之前，意识形态气氛是迅速变化的。但是，新思想与老政治干部和平共存，这些老干部实际上禁止实行激进的措施，同时却容忍那些不触动他们权力实质的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卡德纳斯成为总统候选人似乎也不对他们的地位构成挑战。国民革命党选择拉萨罗·卡德纳斯作为 1934 年大选的正式候选人表明该党转向左倾；但老家伙们自我安慰称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控制左派。卡德纳斯在（1928—1932 年）担任米却肯州州长时表明是一位激进主义者（在正统的和制度的界限内），但是在大多数方面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政客，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革命军的各级职务（他起初是卡列斯的部下），20 年代担任军队中的重要职位，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党的主席和国防部部长。他尽管不是卡列斯的亲密朋友，却是他的一位忠实副手。他是政治、军事高层中的一位重要将领。他曾协助镇压了军队哗变和 1932 年解

除了韦拉克鲁斯主张平均地权的农民的武装。他即使不是卡列斯物色的第一人选，也是安全的，部分原因是他缺乏地方基础（他在米却肯州的继任者摧毁了卡德纳斯在该地建立的机器），部分原因在于他似乎是忠诚的，甚至是迟钝愚笨的（这一名声更因他简朴、诚实和清教徒式的个人生活而得到了加强）。尽管国民革命党组织内部的左派支持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他的经历都无法使工人和独立的左派支持他；共产党人推选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宣布"既不支持卡列斯，也不支持卡德纳斯，只支持卡德纳斯的群众"。

然而一经被提名为党的候选人，卡德纳斯就表现了一种倔强的非同一般的风格。1934 年他所搞的竞选，其规模和活动都超过了先前的选举活动（也许除了马德罗在 1909—1910 年的那次竞选）。卡德纳斯走访了许多城市、工厂和乡村，行程约 18000 英里，从而树立了四处巡视的工作作风。就职后，他保持了这一做法，经常访问各州（在六年期间，有一年多是在墨西哥城以外的地方度过的），有时还去偏僻的居民区，以及那些"几乎封闭、道路不通的地方"。令总统随行人员大为愕然的是，那些地方只能靠骑马，甚至据说只有从总统座船游上岸才能到达。① 竞选活动和后来的出访巡视都为总统了解时局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有人以此认为，这些使他变得激进了。这些巡视，加上他的改革言论，尤其是平均地权主义的言论，激起了大众的希望和要求；也使边远地区的民众感受到了总统权力的真实存在。无疑，卡列斯和保守分子会这样争辩说，这些雄壮的序曲将会自行消失，一旦卡德纳斯稳坐总统府，老调就将重弹："你面前的房子/是总统的住房/但真正的操纵者/却住在另一方"。②

振奋人心的总统选举活动结束后，选举本身是乏味的了。与

---

① 里斯，墨西哥城，1939 年 12 月 19 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359，伦敦，公共资料办公室。

② 原文是西班牙文，注解用英文译成——中文译者。路易斯·冈萨雷斯：《墨西哥革命史，1934—1940：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墨西哥城，1981），第 44 页。

1929年或1940年的竞争极不相同的是，新总统以绝对优势并"非常平静地"在1934年12月取得了政权。[①]新内阁的组成也是在稳定和延续的气氛中进行的。内阁成员包括占据重要位置的卡列斯分子，其实力超过卡德纳斯一派。卡列斯继续保持最高领袖的希望反映在不满的公众舆论中，他们认为卡德纳斯是另一个傀儡；也反映出卡德纳斯本人担心将重蹈奥尔蒂斯·鲁维奥的覆辙。当卡德纳斯渐渐地熟悉了政权机构后，顽固的卡列斯分子如塔瓦斯科州州长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他对教权泛滥的反对日益强烈——想竭力给新总统制造麻烦并削弱其实权。

然而，卡列斯分子的控制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有力，也许就从来没有过。在各州，很多地方权贵的卡列斯主义只是暂时的。只要对卡列斯主义的忠诚支撑着地方政权，他们就支持卡列斯。但是，全国性的危机可能引起一连串的背叛。这曾在1935至1936年间发生过。从全国来说，政局更是多变。卡列斯主义正是在走下坡路。虽然卡列斯分子仍然控制着主要的部门、军队指挥权和工会，但是新的一代已在敲门了，把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在过去的武装革命中夺得政权的"老一代"挤在一边（虽然应该指出的是，新生的年青一代在前进中也需与老一代组成战术上的联盟——如萨图尼诺·塞迪略、胡安·安德鲁·阿尔马桑、坎迪多·阿吉拉尔——这些人在圣路易斯、新莱昂和韦拉克鲁斯州仍是强有力的，并且准备抛弃卡列斯）。这新一代人意味着风格和政治重点的变化。他们更趋向都市化并受过更好的教育，而且比他们的前辈更少一些北方味；像任何正在兴起的一代一样，他们牢记前辈们的失误（他们的渎职：反教权主义，军事扩张，贪污受贿；他们的失职：农业改革和劳工改革），强调"六年计划"中阐述的新政策。这一切，他们都可以自由地实行，比中年人和有既定事业的人少受到过去使命的束缚。卡德纳斯后来宣布说，老一辈革命

① 法奈尔，墨西哥城，1934年12月6日，外交部文件，371/18705，A706。

者已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是新一代接替的时候了，“这样，群众能够从新人所带来的不同政治观点中受益。”[1]

上层内部的斗争更加突出，它们反映了国内总的要求和压力。这是即将执政的政府就要面临的问题。对立的上层操纵着群众，但是群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影响上层各个级别。因此，任何一位总统想摆脱“最高领袖”的控制并想在反对卡列斯保守主义的斗争中赢得群众支持，他只得向左转，依靠战斗性不断增强的工会和骚动不安的农民阶层。就目前情况来说，随着经济的复苏，罢工也在增多。官方数字表明这方面有惊人增长（1933年有罢工13次，1934年202次，1935年642次）。这些数字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会引起误解，因为这表明政府政策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罢工被承认为合法。虽然，实际罢工数字难以搞到，但是凭印象看，证据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停工影响了铁路（长期以来是劳工部门中最具有战斗性的）、矿山、冶炼、石油和纺织工厂。1934年，在其他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工业部门发生了空前的连续罢工。卡德纳斯12月上台时，仅墨西哥城就有60起罢工问题亟待解决。1935年初的几个月，在阿吉拉石油公司、电车系统和铁路部门及商业性庄园发生了大罢工，在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则有发生总罢工的迹象。人们认为，卡德纳斯继承了“工团主义大爆炸的局面”。[2]罢工者的不满主要是经济问题（有些罢工的目的是夺回在近几年由于工资削减而受到的损失），但是在发泄这些不满时表现了新的战斗情绪。大部分罢工是同情性罢工：坦皮科的电工罢工就是支持工人反对瓦斯特卡石油公司，并得到远至圣路易斯波托西、瓜纳华托、尤卡坦、米却肯和哈利斯科工人的支持。

这些事件的发生同时表明，一方面全国政治斗争激化，另一

---

[1]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57页。

[2] 阿莉西亚·埃尔南德斯：《1934—1940时期墨西哥革命史：卡德纳斯的方法》（墨西哥城，1979），第140页。

方面工人阶级组织正日益成熟。自从在2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起，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就失去了大量的支持。1929年，菲德尔·贝拉斯克斯和5个分会分裂出去，带走了37个工会，包括首都有组织劳工的大部分力量。电工和铁路工人相继仿效——这些工人传统上组织完善并富有战斗性——组成了劳动协会（Camara de Trabajo)。1933年，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的激进派与莫罗内斯领导发生分裂时，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再次分崩离析。奥夫雷贡被暗杀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政治上被削弱了——其人员大为减少，它在国民革命党内对劳工代表权的垄断以及对劳工仲裁委员会的垄断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同时，异见力量——贝拉斯克斯的联邦区工会联合会（FSTDF)、隆巴尔多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和其他反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包括电力工会——于1933年10月组成了墨西哥工人与农民总联合会（CGOCM)。这个新组织拥护更具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的工团主义形式。于1929年后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的共产党人也组成了新的劳工阵线：墨西哥统一工会联合会（CSUM)，在首都和保守分子堡垒新莱昂州的教师和农村工人中成功地招收了不少人（尤其是在拉古纳州和米却肯州)。卡列斯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反共谩骂不全是偏执狂。到1935年，党的路线迫使墨西哥统一工会联合会和墨西哥共产党（PCM）与进步力量组成共同阵线，这个阵线包括隆巴尔多的墨西哥工人与农民总联合会以至卡德纳斯政权。

与此同时，平均地权论的幽灵又复活了。1910—1915年的重大骚乱后，农民的反抗被平息下去了，或者被引向了官方的、经常受人摆布的改革。这种改革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由于农民的加入，其登记人册的成员大大增加。很多平均地权论者被吸收进来以反对基督派。原来的农村动乱点，如萨帕塔的莫雷络斯，塞迪略的巴耶—德尔马伊斯，已经历了平静的、有控制的改革。其他地方——拉古纳，米却肯——则遭到州

长、将军、地主以及不少牧师共同进行的物质和精神迫害。然而，1930 年底，被挡在坝内的平均地权洪流又开始高涨，使堤岸面临着被冲破的威胁。一些州长已经带了头：韦拉克鲁斯州的阿达尔韦托·特赫达，塔毛利帕斯州的波特斯·希尔，以及米却肯州的卡德纳斯本人。虽然这样做经常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但也需要搞动员。这反过来也提供了经验和机会。但是，地方动员进行得并不稳定，在韦拉克鲁斯州和米却肯州都很快失败了。然而大选和新的总统增强了对平均地权论的期望，使地主又一次感到惧怕。在农村不少地方进行的隐蔽的斗争现在变得听得见，看得着了，并直接与争夺国家权力有关。30 年代初出现了零零星星的夺地事件，一再发生的农业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出现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鼓动。罗德里格斯政权不情愿地被推向改革，卡德纳斯则热情地对此表示拥护。

当局的激进化与主宰 1934—1936 年的权力之争紧密相联。在这方面，卡列斯行为的影响并不亚于卡德纳斯。卡列斯憎恶教权主义，反对平均地权论和劳工动员。事实证明他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当喜欢巴结的政客来库埃纳瓦卡献殷勤时，卡列斯阐述了工人动乱对经济的危害。他虽然说了卡德纳斯的好话，但却狠狠地抨击了隆巴尔多和激进的工会领导，严斥这种“混蛋的利益集团”，并暗示，1930 年推翻总统事件有可能重演。被卡列斯派报刊称之为“爱国宣言”的这些内容立即被广泛发表。当对峙进一步发展时，卡列斯开始触及卡德纳斯的弱点，指责他所察觉到的“共产主义倾向”，指出欧洲法西斯国家所做出的有益榜样。[1]就他的性格和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而言，卡德纳斯只有作出反应，没有其他办法；他不是奥尔蒂斯·鲁维奥。反卡列斯的领导人——如特赫达等激进派，阿尔马桑等机会主义分子——执意主张由最

① 约翰 W·E·杜勒斯：《墨西哥的昨天：革命纪事，1919—1936》（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1），第 636—639 页；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78 页。

高领袖来处置他。公共舆论和有组织的劳工也持同样的看法。对左翼来说，重新兴起的最高领袖统治和镇压，甚至摆向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使得团结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正如同来自莫斯科的官方路线相吻合。1934—1935年的墨西哥是人民阵线的肥沃土壤。

当卡德纳斯和他的同伙开始着手进攻时，他们碰到了更加厉害的对手。卡列斯也许可以和善地宣布他将退出政坛（正如他1935年6月在库埃纳瓦卡接受采访发怒后所做的那样）。他也可以幽默地承认他喜爱打高尔夫超过喜爱政治，就像他12月从美国返回时所宣称的那样。然而他持续不断的野心和对新政府政策的反感却是掩盖不住的，并且强大的集团力量也把他推向对抗。商界担心劳工的战斗性，于是向卡列斯寻求保障。城市的中产阶级也憎恨连续的罢工影响了正常的城市生活。许多卡列斯派的政治家在国会、党内、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以及州政府里都幸存下来。他们的政治未来都押在最高领袖身上。军队内也有不安定分子，而美国方面对政策转变也有担心，并希望——也许做出了努力——以使两派和好，而不是对抗。有经验的政客，如卡列斯分子，现任内务部长胡安·德·迪奥斯·博霍克斯同样建议妥协，称冲突将导致内战，将动摇索诺拉帮取得的宝贵的政治稳定。这意见表明，在政治考虑中也掺进了恫吓的因素。卡列斯可能动摇新政府的稳定，但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会使他一生的努力付之东流。而如果卡德纳斯拒绝妥协，他也只有呼吁左翼给予支持。这将意味着作出新的和激进的承诺。

事实正是如此，卡德纳斯申斥了卡列斯的恫吓。他调查了主要政客和将军们的忠实程度。在库埃纳瓦卡接受采访后，他开除了几名卡列斯派的内阁部长，提升了自己的人，包括一些反卡列斯的老将（在危机中，塞迪略、阿尔马桑和波特斯·希尔等人的支持是极为关键的）。当这些重要的选举人转变方向时，在国会的卡列斯集团垮台了。国民革命党经历了一场温和的清洗；像臭名昭著的塔瓦斯科州州长加里多·卡纳瓦尔一类的难以驾驭的州长

被解职。地方权贵们马上改变了态度。军队是更难对付的一伙人。但是，卡德纳斯得益于他曾长期服役以及他对军队的关心，另外作战部副部长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的忠诚对促进卡德纳斯的事业也有帮助。军队领导重新改组，可靠的人被派往全国各地。警察部门也进行了改组。到1935年中期，政治清洗大力进行，卡德纳斯赢得了僵持的时间；第二年，总统可以继续采取攻势，有信心取得胜利。与此同时，这场战斗的一个结果是对军队将领和政客进行迅速调整。到1938年底，在卡德纳斯接管的350名将军中有91名被解职，其中包括老盟友圣路易斯州州长萨图尼诺·塞迪略和革命后职业军队的主要创始人华金·阿马罗。这场革命即使进入了激进和制度化阶段，也仍然保持了达尔文式的特点。

权贵内部的斗争以不寻常的程度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特征。例如，卡德纳斯决心压制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这种卡列斯主义的标志，也许是其最受憎恨的特点。自1929年教会与国家短暂的和解以后，官方反教权主义又于1931年复活。卡德纳斯就任时，加里多的反教权程度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而约7000名基督派分子在北部和西部还在继续进行着毫无希望的事业。卡德纳斯表现得很谨慎。虽然他对待基督派比任何军队领导都要宽容，但他也是属于反教权一类的。他仍然演奏镇压教士的老调；他有关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教育政策是为了激怒天主教派。但是，政治智慧与个人节制的结合创造了某种缓和。反教权问题恰当地把新政府与旧政府分隔开来。卡列斯继续设置反教权的芒刺，而卡德纳斯表现得更加小心谨慎；加里多从塔瓦斯科招进了他的红衫党徒到墨西哥城（他曾在那里短暂地担任过农业部长），招致天主教徒的抗议和总统的不满并最后导致他的失败。据说，天主教徒在首都的大街上叫喊“卡德纳斯万岁”。此后，严格的反教权制度（限制牧师和教堂的数量及宗教刊物的传播）得以逐步放宽，使忠实的信徒感到高兴，使虔诚的美国大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感到宽慰。总统竭力指出，社会主义教育反对狂热，而不是反对宗教本身；他

甚至在公开场合拥抱一名牧师。而一些为此而愤怒的人继续撰写反教权的小册子，破坏教堂，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等到小册写完，格雷厄姆·格林[1]出名的悲哀故事已经过期了。

同教会与国家休战相对应的是阶级冲突的加剧。总统笼络群众支持和好斗言辞似乎鼓励了这种冲突，但是卡德纳斯政府对各种要求都尽力作出答复。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分裂预示了更加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对立的工会和政客都竞相吸收成员。工会都团结在卡德纳斯周围，反对卡列斯的反工会宣言，并同卡列斯分子和保守派对手（如法西斯金衫分子）进行巷战。如果城市工人阶级站到这种半官方运动的前列，那么农民也不会无动于衷。而且，自发的运动与上层内部斗争的交叉缠结促进了新激进联盟的形成。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地权论组织，例如墨西哥农民联合会，曾支持卡德纳斯担任总统。从地方各州来看，参战的平均地权论者在恰帕斯州而对着敌对的州长，而现在则发现能依靠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中心"。这一中心反过来可以发动平均地权论者反对卡列斯主义。当土地改革的速度加快时，革命"老战士"马上被看成是牺牲者：如卡列斯和他的家人；墨西哥州的头头里瓦·帕拉西奥兄弟而临着财产被没收和被开除出执政党的境地；塔毛利帕斯州州长比利亚雷亚尔和克雷塔罗州州长奥索尼奥遭到平均地权论反对派的诋毁；科阿韦拉州的权贵和卡德纳斯在1934年竞选总统时的右翼对手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和其他人一起在1936年伟大的拉古纳土地分配中受损。官方的平均地权论一旦被采纳就证明是一种武器，也许最明显的就是1938年塞迪略的被推翻。

这个时候，国家分裂问题早已解决。卡德纳斯灵活地将战术方面的同盟与群众动员结合起来，推翻了最高领袖统治，结束了

---

[1] Graham Greene，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所作小说内容多以精神冲突为主。——译者

索诺拉帮的统治。卡列斯去美国 6 个月后于 1935 年底在一致谴责声中返回。当论战和街头暴力恢复时，政府对利用恐怖分子袭击韦拉克鲁斯火车事件进行了镇压。警察突袭了主要的卡列斯分子领导人：莫罗内斯，路易斯·莱昂和卡列斯本人。当时，卡列斯感冒刚好，正在首都附近的他的农场卧床休息，阅读《我的奋斗》。据说，正沉浸在希特勒的咆哮怒吼之中的卡列斯被塞进了飞往美国的班机。1936 年春，卡德纳斯已摆脱了卡列斯的保护，加强了自己的总统权力，显示出了意想不到的刚柔相济的结合。这一切的取得没有用多少暴力。制度方面的冲突将作为最后手段的暴力推向幕后，至少在“六年计划”期间政治上层“把卑鄙的戳杀作为推行官方意志的做法几乎已经消失”。[1] 在这期间，群众的要求和动员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加强，政府“正朝着一个未知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只是在 1936—1938 年激进的改革开展时才明朗化。[2]

土地改革是 1936—1937 年政府当局的主要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被用作削弱反对派的政治武器，一方面被用作加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手段。但是，最近学者们强调说，土改作为手段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改革也是对民众要求的呼应，经常在各州官方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在那些州，平均地权论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如在索诺拉州、恰帕斯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这些都并不新鲜，但土地改革推行得既快又广，以求达到更高的国家目标。当卡列斯宣布改革结束时，卡德纳斯——在平均地权论者游说的支持下——认为这是改造农业社会和改造国家的手段。由于来自米却肯州的背景，卡德纳斯对农民抱着真正的同情，并喜欢乡村生活，对城市抱着某种清教徒式的反感（因此而被世界主义者嘲笑）。不像

---

(1) 弗兰克·L·克拉克洪：《墨西哥挑战》（纽约，1939），第 3 页。政治暴力在地方一级范围的削弱程度更缓慢，更困难。

(2) 诺拉·汉密尔顿：《国家自治的局限性：革命后的墨西哥》（普林斯顿，1982），第 144—145 页。

其来自索诺拉州的前任，他认为村社不是走向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临时停靠站，也不是简单的政治缓解剂，而是振兴农村、把农民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重要的机构，如果给以适宜的支持，还可促进全国的发展。就此而论，集体村社这一新手段非常重要，因为它第一次使大规模没收资本主义大农场变得可能。最终，村社将成为受过教育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农民的政治训练场所。在平均地权运动高潮时期，对村社的潜能没有给予限制。卡德纳斯宣布："如果村社办成了，就像目前计划的这样，村民就有可能吸收今天不属于他们管辖之内的所有土地。"[①]

这种计划也许可称为天真而又民众主义的乌托邦，但它肯定不能被视为主张资本积累的工业发展的战略。当然，那时候人们对此还没有这种认识；相反的是它引起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共同敌对情绪。

平均地权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这在革命史上是短暂而不寻常的——应该从现代角度来加以观察。原来以出口导向的发展项目（农业作为外汇的重要来源）显然是失败了，使得曾经是欣欣向荣的商业地区，如尤卡坦和拉古纳变得萧条衰落。起先革命导致的社会紧张，后来又因经济衰弱以及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之间的冲突加剧而急需解决。新的一代受到由国家指导经济活动的外国例子的影响，他们希望同政治上破产的前辈保持距离，现在要设法掌权了。就出身来讲，这一代人比老革命者更城市化，更少平民味，但却来自墨西哥中部而不是北部——因而对农民的利益更为同情——并且坚信需要采取激进措施。因此，当其他拉美政府对 30 年代压力的反应是搞政治改革，对无产阶级进行动员以及实行经济国有化时，墨西哥政府的独到做法却是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是属于群众革命中心问题的、现在又注入了官方思想的平均地权论传统。以前曾被很多

①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114 页。

人视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平均地权论，现在在政治上是高尚、体面的，甚至是必要的。平均地权论这一术语在政治言论中到处可见。它鼓舞了艺术、文学和戏剧界（当然不一定都具有美学效果）。它吸引了一批崇拜者和赶潮流的人——不仅仅在新涌现的土地官僚和地方权贵中。当然，这种一时兴起的表面的变化对平均地权论的长期性和纯洁性来讲并非好事。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绩还是巨大的。到 1940 年，卡德纳斯已向 80 万人分配了 1800 万公顷的土地。与 1930 年的 15%相比较，村社现已拥有 47%的可耕地。村社的人口也增加了一倍多（从原来的 66.8 万增加到 160 万）。无地人口从 250 万减少到 190 万。随着政府因农业恢复而收入增加，资金投入转向农业。和其他政府相比，墨西哥政府在提供农业贷款中"创造了奇迹"。农业贷款在 1936 年政府全部支出中占 9.5%。新成立的全国村社信贷银行得到了最大的份额。① 其他资金流向了灌溉、道路和农村电力部门，虽然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也许使私营农业得到的好处多于改革的农业部门。与此同时，和城市工人一样，农民也被要求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数目众多，各不相同，但规模和战斗力却都在增长

与国家机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1933 年，墨西哥农民联合会支持卡德纳斯的提名候选，两年后，波特斯·希尔在国民革命党的赞助下承担了组织农民联合会的任务。因此，建立了未来全国农民联合会（CNC）的核心小组（1938）。

然而，卡德纳斯的土改不像以前通常的改革那样渐进地、官僚式地进行的。实际上，它是在"强烈的激情中"开始的，并且是与总统的热烈倡议相呼相应的。② 在一些有长期土地纠纷的地区，气氛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受到困扰的平均地权论者突然

---

① 詹姆斯·W·威尔基：《墨西哥革命：1910 年以来的联邦开支和社会变化》（伯克利，1970），第 136－140 页。

② R·H·K·马雷特：《墨西哥的见证人》（伦敦，1939），第 142 页。

发现他们有了作为依靠的“中心”力量。拉古纳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在革命时代，这个地区是土地纠纷和动乱的主要地区。20年代期间，除了敌对的政治气氛外，这里还有“不断的农民骚动”。[①] 虽然拉古纳的劳动力大多是无产者，在棉花种植园里就业或半就业，但对土改的吸引力也绝不是无动于衷，特别是在季节性失业率高的时候。因此，正统的“无产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与持续不断的对土地的要求并存。1931—1932年，棉花减产使糟糕的条件（“凡是有自尊心的 Urang-outang 都不能容忍”）[②] 更加恶劣。当共产党人迪奥尼西奥·恩西纳率先组织雇农时，地主们以他们惯常的暴力行动作出了反应，破坏工会的罢工。但他们也想搞个谨慎的装门面的改革。1934 年他们交出了少量土地，但在第二年，劳工的动乱更加厉害。到 1936 年 5 月，发生了大罢工。正像以后对铁路和石油的没收一样，政府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了干预，以解决纠纷。这样，劳工纠纷导致了财产关系的大调整。1936 年 10 月，卡德纳斯亲自进行了干涉，颁布了大规模改革措施，将 3/4 的水浇地和 1/4 的旱地分给了约 300 个村社的 3 万农民。因此而受损的有几家外国公司和至少 5 名参加过革命的将军。“革命给了我土地”，一位将军带有哲理地说，“但革命又把它拿走了。”[③]

拉古纳的没收在规模上和性质上都是史无前例的。1936 年的没收法律第一次得以实行。大批的商业产业主要都交给了它们的受雇者——劳工，而不是村民。这种异常的没收需要异常的做法。政府反对将大的生产单位分解。受益者也遵守了政府的要求，以 4∶1 的投票率支持集体村社，而不是个人式的小块土地制。每

① 克莱伦斯·西尼尔：《土地改革和民主》（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58），第 52 页。

② 佩格雷姆语，引自穆莱著作（墨西哥城，1936 年 4 月 21 日，外交部文件，371/19792，A3895）。

③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103 页。

个集体将分享土地、机器和贷款，并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收获的成果将根据每人投入的劳动比例来分配（“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充其量也就是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批评者所谓的共产主义方式）。村社银行提供贷款、技术咨询和总监督；村社本身提供一系列教育、医疗和娱乐服务。拉古纳集体村社的运行——卡德纳斯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值得分析。从逻辑上讲，它超过了1940年的时限。起初，地主和商人自信地预言它将失败：“给他们两年时间，他们就将跪着乞求再重新为原来的雇主劳动。”[1] 这预言并未实现。棉花产量（1940年村社生产70%，而1930年是1%）在土地没收后很快就增长了，30年代后期一直稳产，战争发生时下降，1941年后又增产了。其他庄稼，如小麦增长更快。集体耕作因此证实，从物质上而言，它能够提供物品。集体耕种比个人耕种生产力确实低一些，但是后者拥有地主保留的更好的水浇地并享有更多的投资。这里如同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土地改革的一个主要效果就是在私有生产部门激发更高效率的生产。同时，在村社银行的积极支持下，拉古纳农民的生活水平从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上讲都提高了，至少在1939年前是这样。农村最低工资与1934—1935年全国平均工资相同，1939年提高了1/3。消费方面以及识字率（报纸发行量因而有“巨大增加”）和医疗方面也有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持同情和持批评意见的观察家都一致承认，而且这种大量的改善还不是成绩的全部。随着文化和自我管理的掌握，农民将显示出新技能、责任感和自尊。“以前，我们生活得像牲口，现在我们至少成了人，我们提高了生产，而且挣得多了”。一名旅游者听到农民这么说。[2] 物质提高伴随着人身安全：政治骚乱得到平息。在拉古纳，习惯上可以不用

① 西尼尔：《土改和民主》，第97页。

② Dutton，Torreón，1939年1月4日，外交部文件，371/22780，A1015；费尔南多·贝尼特斯：《拉萨罗·卡德纳斯和墨西哥革命》，第3卷：《卡德纳斯主义》（墨西哥城，1978），第66页。

再带枪了。

然而，实验的成功取决于有利的环境和对棉花的需求（棉花需求量在 1939—1941 年期间下跌，在 1945—1947 年期间又一次下跌）；取决于足够的供水（甚至连 1946 年修成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大坝也不能保证）；但最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支持。虽然卡德纳斯已注意到拉古纳的问题，村社银行也是慷慨的，但 1941 年那里更换了新政府，工作优先项目马上有了变化。村社银行推行了更为严厉的“节约”政策，“非经济”项目被严格地缩减，贷款更为苛刻。银行和信贷者只得寻求私人来源，如安得森·克莱顿公司。划分开的村社开始取代集体，而集体内部则开始实行与物质刺激相联的支付制度。中央联盟——斗志旺盛的村社协会，发现其已对经济来源失去控制（例如机械中心，1942 年被移交给村社银行）。由于政府削减资金，指责所谓共产党影响（40 年代初确实有发展）并推动对立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村社中央联盟面临了直接的政治竞争。卡德纳斯所竭力倡导和积极培植的农民团结受到动摇。30 年代老一代领导人失去了基础。拉古纳成了派别纷争的场所。因此产生于 30 年代的反对官僚僵化和腐败的最好防线失掉了。这些官僚腐败现象出现于 30 年代，在以后 10 年里发展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实验的不利因素被无情地暴露。诸如卡德纳斯的不少改革，都是匆忙地临时决定的。最初的土地分配方式，如同那时的许多事物一样，在 6 周内就完成了，并还保持了原来的那种“疯狂拼凑”的耕种方法。这使地主仍控制了较好的土地，而更重要的是，它使现有土地分配给了太多的人——包括许多非长住的移民。这些不足之处当然也有其长处——较快的速度，生产的延续和慷慨的分配——如果有意志和时间的话，这些不利之处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是，1940 年以后，则缺乏意志。随着人口的增长，拉古纳的村社已再不能支持拥挤在那里的家庭了。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集体农庄经历了村社农民与实际上的无产者

之间明显的分层过程。这得到市场的鼓励和政府的允许。其他的平均主义选择——包括人口流动和官方大力干预——被提出讨论。有些人争辩说，政府当局不要根据正统的分配原则“把土地分配给人”，而是要“把人分配给土地”，这就是说：“将生产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劳力安置在各个生产单位，而不致破坏（企业的）统一”。[①] 这样做尽管很合理，却很不得人心。确实，倡导者的口号“没有庄园主的庄园”似乎被证实了。卡德纳斯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如果改革要进行得迅速、全面和得人心，那么缺点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只能由以后的政府去改正，但是它们都不准备这样做。

就起源、范围、速度和结果来说，拉古纳的改革为其他地方树立了仿效的先例：在墨西卡利山谷，科罗拉多土地公司被没收，使村社个人和集体、小自耕农和移民受益；在索诺拉，雅基族和马雅族印第安人争取到了其部分土地得以归还；在米却肯州，库西家族（进步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意大利企业家）的财产全部被交给了组成9个村社的约2000名农民。长期实行种植园制的南部也经历了不可阻挡的集体主义改革。最富有戏剧性的而又最不成功的是步拉古纳后尘的尤卡坦州的大规模改革。由于龙舌兰工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繁荣期后一直在走下坡路，改革的机会成本低，要求社会正义的呼声尤为咄咄逼人。更有甚者，改革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介入东南部地区传统内向政治的杠杆。因此，1937年8月，卡德纳斯总统与一些将军、工程师、官僚、记者和好奇的外国人同船抵达半岛。80%的龙舌兰种植园即刻分给了组成200多个村社的3、4万名马雅人契约工。这是“墨西哥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发生的最大事件”。尤卡坦州将与拉古纳州一起成为集体村社的

① 伊万·雷斯特雷波和萨络蒙·埃克斯廷：《墨西哥的农业集体化：拉古纳的经验》（墨西哥城，1975），第35页。

"橱窗"。[1]但是，这种急促改革潜在的问题很快就显露出来。原来的生产关系被打破，一些村社不能得到重要的锉磨机，许多龙舌兰加工厂不是太陈旧就是太年轻。据说受益者中包括许多非农民，并且不久人们所共知的贪污和官僚欺压等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但是，主要问题——在尤卡坦州比在拉古纳或者邻近的恰帕斯州显得更为严重——是外部市场的情况。1915年，尤卡坦州垄断了世界西沙尔麻贸易的88%，而1933年只为39%，1949年下降到17%。对这个依赖性强、居于下坡趋势的工业进行社会化改革一开始就表明这是搞集体化的失败例子。

即使当需求保持上涨时——如咖啡——妨碍集体化顺利进行的内部障碍也是可怕的。卡德纳斯时期最后的重大改革是针对恰帕斯种植园主的。自从革命以来，这些庄园主也曾经击败过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挑战，并面对30年代时期兴起的平均地权运动，重新布置了他们的老武器：先发制人的财产分配，装装门面的改革，收买或除掉对手。甚至在1939年改革已在进行时，种植园主还寻求利用他们的加工和市场设施来搞垮新成立的村社。虽然改革的范围扩大，包含了加工工厂，致使这一威胁得以避免，但1940年政府的更换马上造成了不利影响。改革中止；大型集体垮台；村社银行和与其联盟的权贵们开始对改革的部门滥用其控制权："银行成了官僚式的庄园主，村社的成员则成了银行的契约工"。[2]在1940年选举中，村社农民被认为是官方候选人唯一的当地支持者。因此，在真正农民动员阶段中发展起来的机构（大约1930—1940）不久便变成控制——甚至"遣散"——这些农民的工具。当战后繁荣期开始时（恰帕斯咖啡生产在1945—1950年间增长了2/3），现在享有新的良好气候的私人农业获益了。

---

① 见G·M·约瑟夫：《来自外部的革命：尤卡坦、墨西哥和美国，1880—1924》（剑桥，1982），第288—289页。

② 托马斯·路易斯·本杰明：《走向极权主义：恰帕斯和墨西哥州，1891—1947》，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密执安州大学，1981，第247—250页。

这些气势壮观、而又存在不少问题的改革与许多逊色的事例并存。有些仿效新的集体形式（阿滕辛戈、萨卡特佩克、埃尔曼特），有些则坚持个人收益的老原则。长期以来，前者经常让位于后者。到40年代，个人拆分集体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有些地方成了激烈冲突的根源。另外，甚至在集体形式保存下来的地方（如在拉古纳、恰帕斯、阿滕辛戈），在完全受益者与完全或半无产阶级者之间，出现了内部分化趋势。短暂和强行的发展结果是卡德纳斯的集体组织在40年代不相宜的气候下很快凋谢了。通常的村社倒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它们经常是长期土地斗争的成果。卡德纳斯派提供的资金是积多年的请愿、政治游说和武装抗议而形成的结果。有时，例如最近学术界强调，改革是为机会主义的地方贵族利益服务的，或是由上面强加的、格格不入的、遭到憎恨的。但是甚至那些起初对改革不太热心的村民都表示不愿再回到过去的奴役状况。不管当初动机如何，其结果却是大规模的资源财产的转移，使墨西哥的社会政治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短期来看，它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农民的自尊心，而且也改变了政治力量对比，使农民组织在一段短暂时间内获得了有条件的权力。有条件是指政府使农民动员工作与官方紧密地联系起来，而短暂则是指到40年代，这种联系远没有加强农民组织和战斗力，而是把农民捆绑到一个性质正在迅速变化的政治结构上。这样，卡德拉斯计划的消亡造成了“阶级团结的涣散和单独的斗争，而不是原有组织的解散”①卡德纳斯组织继续存在下去，但目标改变了。

土地改革和农民动员是与卡德纳斯执政年代的教育政策和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承诺分不开的。现在，墨西哥政府仍在继续这方面的努力。索诺拉帮曾将教育预算从占政府支出的4%提高到

① 托马斯·路易斯·本杰明：《走向极权主义：恰帕斯和墨西哥州，1891—1947》，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密执安州大学，1981，第251页。

了 14%（1921—1931 年），修建了 6000 所农村学校，使教师作为民族、世俗价值的载体，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比土改更大的热情。因此在教育方面，“积极形势”已经出现。但是，随着 30 年代的到来，一些新的想法在卡德纳斯就任总统之前露头了。这些想法出现的征兆是纳西索·巴索尔斯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1 年）。他年轻，有权势，性急，是第一位担任部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使教育部摆脱了放任自流的局面（1928—1931 年），开始进入激进的改革阶段。这一做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国家对批评者的回答。在“社会主义”教育的借口下，巴索尔斯通过实施宪法中的第三章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进程：拒不执行世俗化规定的天主教会学校被罚了款或有时被关闭。巴索尔斯大胆地提倡墨西哥第一个有系统的性教育计划更加剧了天主教会的敌意。

这些都不是个人的狂想。巴索尔斯身后有一批进步集团作后盾。这证明 30 年代早期正在变化中的意识形态气氛。教师协会提出了“坦率的集体主义的”教学大纲。① 最大的（不是最激进的）教育工会提出了使中小学教育社会化的口号。同样的思潮也在墨西哥国立大学里传播。更广泛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文化上的时髦风尚。“六年计划”包括了以“墨西哥革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故意含混不清、但却是有意义的教育承诺。更有实际意义的是，计划提出要将教育预算每年增加 1%。这就是说在 1934—1940 年期间将教育预算占整个支出的 15%提高到 20%。最后国会屈服了国民革命党的建议，批准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反对偏见和狂热（读作“教权主义”），灌输一种“合理的、确切的宇宙观和社会生活观”。② 因而卡德纳斯政府继承了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承诺。

---

① 戴维·L·拉比：《墨西哥的教育和社会革命，1921—1940》（墨西哥城，1974），第 39 页。

② 戴维·L·拉比：《墨西哥的教育和社会革命，1921—1940》（墨西哥城，1974），第 40--41 页。

当然，“社会主义”意味着所有东西归所有人。它抬高了像萨尔瓦多·阿尔瓦拉多等索诺拉帮国家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加里多的激烈反教权主义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伪激进主义。30年代关于教育的辩论揭示了（一个细心的学生统计过）33种不同的解释。[①] 教育比土改更加容易在修词上加以掩饰。1930年背弃土改的卡列斯分子仍可以在教育领域表演一番，这一领域是中年激进分子理想的表现场所。他们以法西斯为榜样，希望能抓住年轻人的心，或者将注意力从大萧条的灾难中转移开。因此在他的《瓜达拉哈拉呼声》中，卡列斯可以显得既像个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同时又像个老耶稣会会士。

对很多人来讲，“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索诺拉帮政策的老主题“反教权主义”的一块新招牌。“社会主义”和“理性主义”经常交替使用。其他人则认真地看待这种语义变化。巴索尔斯强调教育的实践作用，它可以鼓舞集体主义道德；教师不光教课，而且还可以“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制度”，为了穷人的利益促进经济活动。[②] 其他人走得更远，将教育作为激进改革广泛纲领中的中心要素。教育部长称，教育可以打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特别在青年中灌输“革命精神以促进他们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③] 现代文学和修辞认为“许多教师相信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推翻资本主义”；这种方法不用诉诸暴力，具有和平与劝告的优点。[④] 艺术和诗歌——具有类似相适的内容——也可以实现相同的目标。

19世纪自由派和20世纪革命者所共同拥有的古老的墨西哥之梦就是通过教育改变整个社会。30年代，当教育界中激进分子

---

① 维多利亚·勒纳：《1934—1940年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史：社会主义教育》（墨西哥城，1979），第83页。

② 约翰·A·布里顿：《墨西哥的教育和激进主义，I：巴索尔斯年代（1931—1934）》（墨西哥城，1976），第52页。

③ Farquhar，墨西哥城，1935年1月24日，外交部文件，371/18705，A1338。

④ 拉比：《教育和社会革命》，第60页。

无休无止地弹奏天主教愚昧主义的老调以及主张为识字、卫生、节欲和提高生产力应自由联合时，陈旧的实证主义论调又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激进分子也确实夸耀其思想来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主义”因此吸收了不少老一代有关发展的执意想法（一位教育官员在1932年说，最急需的是“教育人民更多地生产”，巴索尔斯的“社会主义”被看作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替代物）。[①] 它也体现了对文化凝聚力和民族团结的传统渴求。这样的延续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连右翼官方人士都轻易地转到了“社会主义教育”一方。但是，有些真正的激进分子把教育看作是推翻而不是保持旧方式的手段。苏联模式再次产生了影响。对像路易斯·G·蒙松这样的老革命者来讲，这提供了替代破产的资本主义的唯一选择。苏联的方法被引进——非系统的而且大部分是不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课本到处流传，甚至在军事学院也可见到。虽然表面看来，这种模仿与政府当局强调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相一致，但从逻辑上讲，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提倡者更加推崇苏联的榜样。苏联人被更多地看作是大规模现代工业化的成功倡导者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传递者：比福特更加福特。这种吸引力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他们所鼓励的激进化程度。两者都对教育具有直接影响。再次复兴的左翼鼓吹其教育建议；要求一个更激进的教师职业队伍（许多——绝对不是全部——是左派，其中相当一小部分是共产党活动分子）来争取其政治、教育和集团利益。由于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削减，教师受到严重打击。尽管巴索尔斯竭力推行激进主义，但他是个吝啬的出纳员。虽然整个30年代教师的数目增加了，而失业仍然持续；教师队伍经常在地方政治中崭露头角（他们对在圣路易斯采邑的塞迪略是唯一严峻的挑战）；出于物质利益和思想团结的目的，教师工会和其他工会结成了联盟。

---

① 拉比：《教育和社会革命》，第38页；布里顿：《巴索尔斯年代》，第17页

这些因素帮助了官方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承诺而并非是群众的要求。5万人在墨西哥城走上街头欢庆发表新纲要（1934年10月）。但是，这次游行只是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组织最后的尝试之一。总的来说（但是，特别在农村，那是改革的目标），群众的反应不冷不热，或者干脆是敌对。正如人们所议论的，如果社会主义教育是“恢复失去的群众同情和支持”[①]的主要手段，那么它是失败的。其实，与其说它是机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还不如说它是巨大的、有些天真幼稚的社会工程。与土地改革相比，社会主义教育更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而经常是并非人们所需要的、不受欢迎的强制。

教育项目越来越多：为农村学校实行的重要计划随着种种辅助项目而扩大——文化使用，农村师范学校，专门军事学校（总统十分关注的项目）以及“第123条款”，军营（连队）学校。另外，作出特别努力——再次仿效索诺拉帮的先例——接近印第安人。根据会说印第安语的人数来计算，印第安人约占墨西哥总人口的1/7。在这方面，总统发挥了他个人的力量和影响。他作为塔拉斯坎族印第安人的孙子，在1934年竞选中大谈印第安人问题。但是现在重点已转移。土著主义被更多地看作是卡德纳斯对贫困和不平等进行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全国统一相关联的一项自治政策。虽然印第安人事务局制定了专门教育和研究规划（在恰帕斯，这些规划占很大比例），但是事务局的预算太少而不能负担土著主义政策的全部需要。相反，政府试图将印第安人归属于工农大众，强调阶级高于种族划分：“解放印第安人的纲领实质上就是解放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纲领”，尽管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和文化。[②]乐观的目标（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空想）是在不

① 阿图罗·安吉亚诺：《卡德纳斯主义的国家和工人政治》（墨西哥城，1975），第45页。

②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120页。

摧毁印第安文化基础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解放。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对作为农民的印第安人采取的普遍措施，而不是通过特别制定的对土著的计划来对印第安人施加其主要影响：农村教育计划，尤其是在尤卡坦、恰帕斯和雅基地区的土改（在那里，卡德纳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受到人们怀念）。土著主义本身只取得有限的、经常是短暂的影响。然而，一个长期后果则是，随着印第安人问题成为中央政府的长期问题，联邦权力得以增长，并且可能会被利用来触发地方酋长的敌意。甚至在卡德纳斯执政时，情况就很清楚，即：将印第安人问题联邦化常常意味着用新的官僚主子、土著主义或土地计划代理人，有的是用印第安人本身来代替地方主义——地位，酋长，神父，包工头。1940年以后，这种趋势加快了。卡德纳斯分子企图将平等和文化遗产结合起来的希望注定是要失败的。印第安人是被结合了，但是，是作为无产者、农民、官方人士和（有时）官方酋长。

在这方面的另一端，高等教育则面临着"社会主义"的挑战。大学（特别是传统的、保守的、高贵人物的大学，自1929年后，正式的自治国立大学）被揭露是中产阶级特权的堡垒。像教育界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一冲突也是发生在卡德纳斯就任总统之前。1933年，在大学各派之间发生了论战。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其对手是安东尼奥·卡索——认为大学应该与新的唯物主义思想相联合。尽管学生中发生了争斗和罢课，自由派还是勉强控制着局面。但作为答复，政府将给大学的资金减少了一半。省级大学也由于惧怕意识形态方面的恫吓，而要求同样的自治地位。在瓜达拉哈拉，省长用武力将不服从的学校领导从校园内赶了出去。很多左派人士对这种挫败学术界大人物锐气的行动给予赞扬（据说卡德纳斯本人也对知识界人士怨言不少，而后者反过来也是一样）。

同时，1935年的政治恐慌在校园中回荡。1935年9月，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左派发动了一场内部政变，将国立大学与官方的"社会主义"政策联系了起来。政府现在可以把其与学校的关系正

常化了。它重申学校的自治性，并恢复了对它的津贴，而学校也采取了一些新的、看上去是激进的倡议（对工人的法律服务，“有关的”社会研究），这也许是表面上的一致，而不是真正的转变。此处，政府建立了符合自己意图的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有些机构，如国立技术学院，日益兴旺起来；而另一些机构，如工人大学，则是短命的。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发生的冲突。在这方面有卡德纳斯执政期间的主要革新。这种革新不是在一般的教育内容和组织结构方面（这方面已有足够先例），而是在农村教育得以开展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政府的目标是明确无误的。虽然雄心勃勃的“六年计划”的目标无法实现，但在1935—1940年间，教育支出从占政府支出的12%上升到14%。这一水平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也未出现过。按实际数来算，这一开支比卡列斯的支出翻了一番。因此，巴索尔斯时期，农村学校的明显增长得以继续。这些学校要起的作用远远不仅是传授基本的读写计算。卡德纳斯称，这些学校的教师要发挥社会和革命的作用，“农村教师是农民和孩子的导师，必须关心村庄的改善。教师必须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帮助农民，在争取法定工资的斗争中帮助工人。”① 这不是空话。正如教师只能在需要知识的地方传授知识一样，教师也只能在适当的地方进行社会活动，就像他们在30年代在墨西哥所做的那样。农村教师能够完成他的崇高作用不是因为农民是迟钝、顺从的愚氓，而是因为他对实际要求——或者有时潜在地认识到——做出了反应，特别是在土改方面。在拉古纳集体村社的典型例子中，农村教师在一套整体改革中——教育、农业、技术和医疗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其他方面，教师积极地投入了当时的地方冲突，他们的工作必然地已经高度政治化，具有争议性和危险性。教师们因为在恰帕斯、米却肯、哈利斯科、科利马、

① 勒纳：《社会主义教育》，第114—115页。

锡那罗亚以及其他地方搞农业鼓励而受到称赞（或者谴责）。他们帮助组织瓦哈卡的米斯特克人，要求“土地和自由”以及每村建一所学校；在墨西哥州，他们鼓动侵占土地；在米却肯，他们讲解农业立法，书写请愿书并通过有关机构加以实施。批评者称一向平静的阿卡迪亚斯被煽动暴民的社会主义教师打乱了；激进分子虽然从另一个角度谈问题，但是想法常是一致的。确实，教师们有时候煽动潜在的平均地权论，偶尔也悄悄地在犹豫的居民中推行平均地权主张，但是，有时候也有教师被农民争取过来加入土地改革的。那些“深入人民”的人就像天真的民粹派受到冷遇。相反，那些搞成功的人不是靠蛊惑人心的煽动，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实际的帮助，身临其境，是政府承诺的活生生的证明。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引进新的庄稼品种和种植方法；他们为居民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超居住区组织的发展。这往往证明是农民运动成功的关键。

为此他们付出了代价。关于农村教师的真正影响没有比整个30年代发生的暴力记录更可靠的证明了。这必须从社会主义教育计划所引起的极端两极分化的角度来看。如果最初一些左派人士持批评态度，指出试图通过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手段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幻想，那么后来大部分人都改变了这一看法。共产党在这方面尤其是这样。他们很快就抛弃了这种与共产国际“第三阶段”基本一致的立场，而像拥护人民阵线那样急切地拥护现在的计划。墨西哥教师中至多有1/6是共产党人，但是，这些少数的活动分子足以引起怀疑和帮助批评者宣传。这些怀疑和批评数量大，势头猛，而且经常采取暴力手段。不断扩大的左翼组织及其战斗力与右派天主教和保守派——其中有天主教学生运动和非宗教的协会，如全国双亲协会——势均力敌。社会主义和性教育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天主教学生进行了抗议、罢课和暴动。父母用孩子的脚投票。城市和农村中缺课人数不断上升；受塞迪略保护的圣路易斯私人学校（天主教）不断扩大。从“社会主义”意

味着“反教权主义”的程度上来说，反教权的过火活动继续在“社会主义”的保护下进行。这种天主教反应是防御性的，甚至是合法的。但是，总的来讲，反教权主义的攻击正在削弱，天主教反对派现把重点放在更大的问题上，如医疗、混合教育与性教育。这些问题被攻击为共产党阴谋，把色情带入课堂。天主教报刊对于让农村孩子观看花卉雌蕊、雄蕊的图片而感到惊愕，其实他们对猪的发情已很熟悉。

从理论上讲，天主教徒也反对平均地权论，也要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特别是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平均地权主义者。据说，教士们猛烈攻击改革以及煽动暴力活动（米却肯州孔特佩克）；他们为谋杀了一名教师的暴徒们作弥撒（萨卡特卡斯州韦斯科洛）。在哈利斯科州的科洛特兰地区，教士的影响被指责为应对那里的攻击负责。据说，一年中有40所学校被烧毁。这些推断当然有时是夸张了。此外，教士们同教师一样不是自由人。他们在地方冲突中的引人注目的所为也不是完全自愿的。许多农村发生的暴力并没有教士的介入。这是“自发的”，或者是由地主权贵们，甚至州长们所煽动起来的。受害者——教师们，如圣安德烈斯—图斯特拉的洛佩斯·维特罗于1939年遭暗杀，以及到1943年为止共有25名教师在米却肯州遇害——的事例都在提醒人们，虽然中央政府的权力在扩大，但依然是有限的，容易受挫；它们不能保证其支持者在敌对环境中的安全，更不用说成功了。

因此，教师们往往面临孤独和危险的任务。许多人没有做好准备，可以肯定，对“社会主义”（有时甚至对学费），他们决心作出贡献；一名批评者嘲笑他们原先是“跟车的，街头卖面包的，以及咖啡园的工头”。[①] 他们得的工钱很少，除了像在拉古纳州实行的综合改革，他们通常缺少当地的和体制方面的同盟者。他们往往面临群众的冷漠和敌视。他们的行会组织中充满了冲突。随

① Murray，墨西哥城，1935年10月31日，外交部文件，371/18707，A9693。

着 30 年代初教育的扩大，大规模的工会化已成为可能；那些年的工资削减使教师们牢骚满腹。他们一再要求提高工资（他们得到了部分满足）和教育“联邦化”（归联邦管辖）。这将摆脱不可靠的州政府，而把决策权集中在同情教育的中央政府手里。尽管在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联邦化在 10 来年时间里加快了，但没有完全实现。同时，教育部在面临内部分歧的情况下，极力要求成立一个单一的教师工会（有 60%的教师据说是天主教徒，而且尽管进行了清洗和招收新人的努力，但整个教师队伍从未完全激进化）。由于左派在共产党人与隆巴尔多分子间也发生了分裂，团结证明是梦想，而内部冲突则到处蔓延，这使得士气受挫。

在人口增长和教育发展的比赛中也常有收获：识字率有了提高，学校在发挥民族主义凝聚力作用方面得到了加强。但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工程的一种制度，这一计划却失败了。不管平均地权运动和阶级冲突地区的气氛多么一致与适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不能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像卡德纳斯的许多改革一样，它证明只是在适宜的条件下才会有的现象，取决于一时的官方温和气候。甚至在卡德纳斯去职之前，气候就开始变化了。到 1938 年，在财政紧张和重新崛起的反对势力（现在是起来反对第三款中提出的“管制”）的逼迫下而不得不退却。这一制度最终以妥协告终。较激进的课本被撤消，文化委员会解散了，私人教育再次出现，如拉古纳州那样的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被放弃了。卡德纳斯最后一次（1940 年 1 月）的新年贺词中的安抚调子十分明显，官方总统候选人阿维拉·卡马乔的讲话同样如此。后者上台后，这些变化的步子更加快了。“社会主义”一度是官方路线，但后来——考虑到这个词的广泛灵活性——它成了社会和睦和阶级均衡的同义词。索诺拉帮的说教又出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卡德纳斯的其他许多计划一样，证明只是一个插曲，而非百年大计。

1935 年反对卡列斯的斗争涉及到一系列的罢工和相当规模的劳工运动。最高领袖下台后，这两种运动仍在继续：从 1935 年

到1936年，墨西哥的罢工行动不寻常地超过了美国；1937年（高通货膨胀发展年）的罢工（至少正式罢工）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期间，罢工影响到墨西哥所有的基础工业——矿山、石油公司、铁路、纺织厂——以及政府机构和商业性农业。在拉古纳，劳工抗议外国公司的活动可以预示到政府干预和没收，这是根据1936年2月总统对受到罢工和停工影响的自由企业的堡垒蒙特雷州进行的著名旅行中大胆宣布的主张：如果企业主们不能避免工业中的瘫痪状况，国家就将进行干预。因此，劳工纠纷提供了一个反对外国飞地的杠杆。同时，工会组织也在发展，最终成立了新的中心——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劳工的战斗性有助于使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如果没有官方支持，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在1935年的政治危机中，这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延续到以后，虽然这也不是始终如一或不受任何批评的。政府对劳资关系毫无疑问地采取了干预的态度（卡德纳斯在蒙特雷州宣称政府是社会问题的仲裁者和调节者）；仲裁变成了有系统的（虽然不是自动的）仲裁，而且一般是对工人有利。然而，也有主要罢工遭到反对的情况（如1936年5月的铁路员工罢工），特别是1938年以后，政府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采取了事先措施以避免发生罢工。然而，如果用这些例子来断言生产与阶级和解为至高无上，因而要继续实行如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之间所采取的对群众的操纵政策，那就错了。干预、仲裁和群众政策在不同时间有不同含义。在卡德纳斯时期，特别是在1938年前，它们涉及到积极支持工会反对企业，支持或者缓和工业纠纷并在工人管理方面采取激进的新政策。因此，这再次表明，卡德纳斯的"民众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该理论中一些设想的政治含义。

政府从未忽视经济现实。它对它所认为的不负责任的工团主义进行了斗争（如对石油工人）。它赞同这样的看法，即提高工资会使国内市场有利于某些工业部门。但这种凯恩斯理论的主张不能被看作是卡德纳斯劳工政策存在的理由。一些开明的企业界人

士和银行家同意这种看法，但私人企业——特别是以蒙特雷州为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核心——对卡德纳斯主义抱有绝对的敌意并不断进行批评。1938年以后这种情况仍无变化。1940年，商业代言人仍然谴责“政府向无产者许诺的单方面提高其生活待遇的不可思议的政策。”新的附加利润税是“希特勒极权主义的一个事例。”① 如果说卡德纳斯挽救了墨西哥资产阶级并使之不受革命的伤害或免于垮台（看来令人怀疑），资产阶级却没有表现出多少谢意。

确实，卡德纳斯的劳工政策，如同卡德纳斯的平均地权论一样，涉及到教育或保护的方面；父亲身份的一个方面。总统关注着工人阶级的逐渐成熟，使之成长为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和负责任的实体。有组织，工人阶级的数量就有份量了；统一，工人阶级的力量就不会消耗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负责任，工人阶级就不会对刚从衰退中出来的不发达的经济提出过分的要求（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工人本身将是主要受害者）。因此，从1934年大选至1940年告别演讲，卡德纳斯反复阐述的主题就是如列宁提出的“组织”。组织需要国家的积极支持，如果把这看成是玩世不恭的操纵，看成是证明从卡列斯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到米格尔·阿莱曼以及40年代诡辩术的不断继续，那就错了。现在，被称为热情政治家的卡德纳斯实际上把有组织的经济集团和阶级看成是政治的基础。因此，继续其激进计划的最可靠保证是一个强有力的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组成，工人管理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实验，以及不断的规劝都服务于一个遥远的、乐观的目标：一种体现了卡德纳斯勤劳、平等、自尊、负责任和爱国主义美德的工人民主。这大体来说都是卡德纳斯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

---

① Rees，墨西哥城，1940年1月3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547；汉密尔顿：《国家自主的局限》，第192页。

某种程度的国家保护是必要的，因为创建统一的劳工联合会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大可能自发地产生。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衰落使得劳工具有战斗性，但却分散了。然而，反对卡列斯的运动和经济迅速复苏同时发生，为重新组合提供了机会。由隆巴尔多领导的旨在反对卡列斯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保卫无产者全国委员会成为正在形成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核心。1936年2月，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联合了最近罢工中突出的一些重要工会（铁路工人、矿工、金属工人、电工、印刷工人和电车工人工会）以及老的反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联盟，隆巴尔多的墨西哥工人与农民总联合会（CGOCM）和共产党的墨西哥统一工会联合会（CSUM）。号称有3594个分会和94.6万名成员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使残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总工会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相形见绌，虽然后者继续存在（其一些下属机构成了公司工会），仍可以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争霸，有时在某些地区和工业部门（如纺织部门）使用暴力。国家又树立了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两个障碍：文职人员工会"国家职工工会联合会"（FSTSE）不许组织分会（文职人员工会权利的整个问题是激烈争论的主题，最终要进行专门立法）；更重要的是，农民被保留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之外，尽管它已在经济作物耕种区大规模地吸收农民成为其成员。农民组织仍是国民革命党的特权。虽然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农村仍有残留影响，但其领导无法向官方统治挑战。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反对卡列斯的斗争中，它的分支机构强调它们独立于政党和宗派。这一承诺——激进、民族主义和自治——被带进了新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该组织在充满革命工团主义气味的叫喊声中开始了新的生命。但是，就像卡列斯制服了墨西哥同样吵吵闹闹地诞生的区域工人联合会一样，卡德纳斯也同样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争取了过来。在这方面，卡德纳斯得到了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中的一些前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人士的支持，诸如菲德尔·贝拉斯克斯和5个分会。他

们在墨西哥城受过20年代劳工政治的教育。正当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得到官方津贴、房屋和仲裁委员会中的位置时，其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合作的优越性。这样做有三条理由：击败卡列斯主义残余的需要，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很快指明是英美石油公司）的联合阵线，以及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包括反对国际法西斯以及有人说国内法西斯（用隆巴尔多的话是“克里奥尔法西斯”）。

确实，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已作为当时政治的重要人物而出现，仅次于卡德纳斯本人。出身于曾经富有但现已破产的商人家庭，隆巴尔多从信仰青年协会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从未加入墨西哥共产党）。30年代初，作为墨西哥城知识分子中的一名佼佼者——“墨西哥马克思主义分子”[①]积极从事劳工和大学政治；随着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断绝关系，建立起墨西哥工人与农民总联合会，他为后来成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打下了基础。隆巴尔多口齿伶俐，专横，自我崇拜，缺乏一个地区性或集团性的体制基础。他的权力依靠的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官僚机构和政府的支持（因此在40年代，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扭曲保留了这两者）。他在1935年从战术上支持过卡德纳斯，现在他又设法将联盟加以巩固，首先强调一个旧主题——国家对工人阶级的责任，其次强调一个新主题——法西斯的威胁。在这方面，共产党人的政策是十分关键的。1929年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的土地斗争中以及一些主要工会如铁路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和教师工会中仍在积极活动。虽然他们曾反对卡德纳斯作为总统候选人，但以后又参加了反卡列斯的联盟，并支持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幸运的是，1935年，共产国际变了卦，批准（要求）与进步的反法西斯力量进行全面合作。参加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墨西哥代表团保证建立人民阵线，因而支持了国民革命党、“六年计划”和现在认为是民族主义——改革派的

① 恩里克·克鲁斯：《墨西哥革命中的文化领袖》（墨西哥城，1976），第328页。

与前任卡列斯政府相当不同的卡德纳斯政府。所以，墨西哥统一工会联合会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合并，工人们被告知要参加选举。1937 年墨西哥共产党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参加了共同的选举阵线。第二年，共产党人支持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一个新成立的、官方法人政党——墨西哥革命党中承担主要作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合作发展到该会人员在中央和地方部门占据了政治职位，包括在议会中的 30 个席位。

在这庞大的联合体中，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隆巴尔多及其同伙不喜欢共产党人。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与集团间的对抗交织在一起。隆巴尔多分子依靠的是无数的小工会和小联合会，特别是在首都，但缺少工业力量的支持，这使他们对与政府合作感兴趣。而共产党人的力量主要在大产业工会——铁路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和电力工人工会——中，他们倾向非政治的工团主义。各方都在争夺对独立工会如教师工会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本身的控制权。在这些组织里，隆巴尔多分子依靠其在人数上的优势——尽管是纸上的数字，且分散在一批下属机构中——以抵消共产党人在工业中的势力影响。1937 年 4 月，发生了一次大分裂，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人被 挤出了关键岗位，随决定退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使这一组织减了一半或 1/4 的成员，其中包括一些主要工会如铁路员工工会、电力工人工会等。卡德纳斯分子因试图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希望破灭而垂头丧气。只是在共产国际伸出救援之手后，他们才得以恢复元气。厄尔·白劳德急急忙忙从美国赶来，莫斯科也施加了压力，两个月后，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才又回到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但有些人不愿去卡诺萨：有独立传统的矿工和铁路员工没有回去。但大部分共产党人还是服从了，回到了更追随隆巴尔多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他们还同意在党内选举中支持国民革命党的候选人，并降低已经很温和的对政府的批评调子。对衷心于人民阵线和受到莫斯科激励的墨西哥共产党来讲，这是在 1935 年到 1946 年间作出的一些“必要的牺牲”中的

第一桩。这有助于巩固和维持卡德纳斯联盟。

卡德纳斯鼓励受国家庇护的工人阶级组织。这有两个主要事例——铁路和石油部门，那里对于发生劳资纠纷的外国独资或部分外资的企业进行没收和根本改组。所以，类似拉古纳集体化的方式，劳资纠纷导致了政府干预和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的试验（如在石油业中也引起国际上的争论）。对这些做法的解释也不同：这些大胆、慷慨和激进的手段是不是官方头脑里工团主义残余的反映？或者是打着激进主义招牌的现实政治活动的又一种例子——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政府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将陈旧的工业推给那些已经受制于严厉市场纪律的工人呢？

这两种工业不能直接相比较。30 年代石油生产略有上升，而铁路则处于困境：资金不足，人浮于事，受到公路的竞争（政府大力搞公路建设计划使铁路状况更加恶化），欠外国股东大量债务。确实，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激进的调整措施，也许包括国有化。具有战斗传统的铁路工人于 1933 年成立了新的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STFRM），坚决反对他们记忆犹新的失业（1930—1931 年就失去了 1 万个工作岗位）。1935 年发生了罢工。1936 年 5 月罢工再度发生。当时，政府拒不承认支持新的集体合同的一场全国性罢工，使工人十分愤怒。最后，铁路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根本的经济问题依旧存在。一年以后，政府决心以拉古纳的方式，用惹人注目的机构改革来解决问题。1937 年 6 月，铁路国有化，其发行的债券同国债统一。经过一年的政府直接管理以及与工会旷日持久的谈判，于 1938 年 5 月 1 日企业被置于工人控制之下。这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其他企业——铁矿、铸铁厂和制造厂——当劳资纠纷无法解决时，就被移交给工人，正如卡德纳斯所承诺的那样。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承担运输墨西哥 95%货物的铁路是至今最重要的事例。

初期的没收行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政治气概，甚至受到更习惯于对卡德纳斯政策进行挑剔的右翼中产阶级集团的欢迎。毕竟

科学派的老前辈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过国有化的进程；建立了国有铁路系统。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所做的事，墨西哥几乎都做了。这样做比通过土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或者没收私有财产更好。甚至外国股东们对于解除了无用的产业而感到高兴。怀有疑虑的一批人则是铁路工人本身。虽然抽象地说，他们同情国有化（有些人，例如铁路工人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胡安·古铁雷斯，认为这是朝着社会化经济迈进了一步），但他们害怕，突然转向联邦就业会破坏他们的工会权利和最近赢得的合同。因此，工会关于接管铁路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要保留艰苦奋斗得来的好处的愿望之影响，尽管在1937—1938年工会与政府的长期谈判中已讲得很清楚，工人控制将在严格的财政条件下进行（包括政府可以否决货运加价），工人管理机构不能软弱无力。

工会在这些条件下执掌管理，勇敢地抓住许多问题。它调整了行政机构，对旧铁轨车辆进行了维修，减少开支，承担了初始的财政义务，甚至美国商务专员对此印象都很好。然而，缺少基建投资以及在工会不能发挥影响的需求和价格水平上运行，使铁路不久就陷入赤字。另外，作为既是工会又是雇主的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面临着工资差异和劳动纪律的一些重大问题。管理机构坦率地承认一系列的冲突表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也为保守的报刊（它们虽然同情国有化，但不喜欢工人控制）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来指责这种做法为不负责任和“不爱国”的行动。卡德纳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非常关注铁路问题。根据那时流行的“温和”趋势，工资和工会的自治权都被减少了，这使铁路机构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简单附件。”[①] 这些措施预示了工人控制的全面结束以及在阿维拉·卡马乔统治下实行全面国家管理的开始。现在“彻底失望了”的铁路工人在1940年阿尔曼反对派活动中表

①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289页。

现很突出。①

与铁路相比较，石油工业几乎全部（98%）属外国人所有，规模小（雇用了1.4万名工人，而铁路工人则有4.7万名）但利润高。自从1921年达到最高产量（1.93亿桶）后，生产降低至1932年的3300万桶，部分原因是波萨里卡发生了大罢工。1937年恢复到4700万桶。直至那时，石油业经历了自出口旺盛的好日子以来的大输液。现在，石油业在国内经济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将近一半的产品在国内消费）。这在逻辑上符合政府发展战略。"六年计划"期间建立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和开发新油田，石油公司对委内瑞拉的富矿更感兴趣，而对于开发这些油田态度犹豫。这种温和的（国家）管制主义意图与革命后的政策完全一致，它在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妥协。最近一次冲突导致达成了1928年的卡列斯——莫罗协议，有效地维护了公司的地位；但是到1934年，由于"六年计划"和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挑战，这一协议已有破裂的迹象。卡德纳斯本人采取了特别强硬的路线。作为瓦斯特卡的军事指挥（1925—1928年），他对石油工业及其飞地式特征，严重的行贿与强盗行径具有第一手的体验。他拒绝接受一家公司为证明其对他的崇高敬意而赠送的一辆"漂亮的派卡德轿车"；10年后，他对贿赂又表示了同样的抵制。这使那些对卡列斯时代那种来者不拒的政治已成习惯的石油公司和他们的朋友们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抱怨说，新总统"对这类事表现得极为天真，不欣赏这一墨西哥认为是商业惯例的做法"。②

因此，卡德纳斯不喜欢石油公司。他说明他旨在使石油公司符合国家的需要，如在"六年计划"里所规定的。后来，他又致

---

① Davidson，墨西哥城，1940年8月15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3818。

② 威廉·卜梅伦·汤森：《拉萨罗·卡德纳斯，墨西哥民主主义者》（密执安州，安阿伯，1952），第43—51页；Murray，墨西哥城，1935年7月15日，外交部文件，371/18707，A6865。

力于提高石油产地使用费。但这没有一点预示将会对石油公司进行没收。外国投资——在石油和其他方面——仍在政府计划之中，对它没有进行没收的企图。外国拥有的煤矿（从集体而言比石油工业更重要）从未被视为已具备国有化的条件，尽管矿工工会施加某些压力；外国在电力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受到了积极的鼓励。因此，卡德纳斯关于外国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讲是实际的，但石油则是比较特殊的，石油是民族性的和独立的"神圣象征"；相反，石油公司则代表了邪恶的和寄生的帝国主义。因此，最终对石油公司的没收不是一贯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典型例子，而是特殊的例外事件，是由于石油公司的不妥协而造成的（有些公司仍把墨西哥看成是个殖民地政府，可以对它随意发布命令）。[①]而且经过几年不断增长的劳资冲突（劳资间的斗争形成了重要的自治因素），这种没收行动传播开来了，造成了不能预见的结果。

像铁路工人一样，石油工人素以独立性和战斗性著称，而且这一声誉因1935年8月建立统一的墨西哥共和国石油工人工会（STPRM）而更出名了。在1934—1935年屡屡发生的罢工中，石油公司面临它们认为是"十分荒谬"的要求；1936年11月，石油公司受到威胁，如果新的全国集体合同不得到承认的话，就会发生罢工。工人的要求——共有240条——包括劳工队伍的迅速墨西哥化，除少数岗位外由工会会员取代"保密"（非工会）雇员的工作，大大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40小时工作周。石油公司认为这些要求威胁着管理权和经济活力；这些要求将要花费现在工资数的500%（工会认为是130%，工会坚持说根据利润水平，这是合理的，在整个纠纷中数字就如拳击锦标赛一样来回反复）。公司的反建议只是表露了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公司的大肆宣传（谴

---

①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亨利·德特丁的态度；这是该公司在墨西哥子公司天鹰公司经理部主任的描述，根据Murray的材料，墨西哥城，1935年9月17日，外交部文件，371/18708，8586。

责石油工人——墨西哥工业"被宠坏的宝贝"的贪婪)，对于缩短鸿沟无济于事。马拉松式的谈判失败以后，工人举行了罢工(1937年5月)，向联邦仲裁委员会声称有"经济冲突"。[1] 非常清楚，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及政府都赞同仲裁。政府施加了压力以寻求解决问题，避免进一步影响经济(认为是政府挑起争端，以此证明有计划的没收是合理的，这不能令人信服)。到8月份，一个庞大的联邦委员会提出报告，建议在公司的工资提议上再略增加一点，并同样修正"社会"要求；但是它也严厉批评公司的垄断和飞地地位、它们从事政治干预的劣迹、它们的黑帐、赋税特权和过高的利润。初期的劳资纠纷就这样导致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

石油公司坚持不让步，对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拒绝增加工资。当仲裁委员会"几乎全体"接受联邦委员会的建议时，石油公司将此事提交到了最高法院，而当后者的裁决不利于它们时，它们再次对裁决不予理睬。同时它们在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了大量游说。然而它们却使自己走入了困境。由于对自己在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十分自信——因而坚信工会和政府最终会妥协，就像1923年和1928年发生的那样——石油公司坚持到最后，拒绝了一个财政上可行的解决办法(现金差额不是很大)。它们担心如果让步就会在其他产油国产生影响。最初的劳资纠纷现在变成了围绕声望和原则的一场斗争。因为到1938年初，政府也面临有限的抉择：要么耻辱地投降，暂时接管石油公司财产，或者干脆没收。虽然第三种选择是最终的结果，但并不像石油公司在官方否认的情况下所宣称的那样是政府长期的目的。有些人认为，对这一基本资源的国有化是一个长期目标，但没有证据表明，1938年是事先选定好的时间。相反，在1937年提供新的石油租赁许可时以及在没收后所进行的有关争取外国在石油业投资的讨论中，官方的

---

① 见琼·C·阿什比的《有组织的劳工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6)，第197—212页。

实用主义表现是明显的。更重要的是在1938年最初的几个关键星期中，内阁是有分歧的。没有人对没收可能带来的风险——经济的、财政的和政治的风险持怀疑态度。但是，即使这些风险也不能成为可耻的屈服的理由。正如卡德纳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宁愿把油田烧了也不会牺牲我们的荣誉。”[1] 当最后事态清楚地表明恫吓无济于事时，这些公司只得寻求妥协，但已为时太晚了。政府决心已下，公众情绪已经高涨。1938年3月18日，卡德纳斯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列举了这些公司的罪行，并宣布将它们全部没收。工人也早已准备好具体接管工厂。正如有人在阻止英国雇员进入米纳蒂特兰炼油厂时讲的那样，“外国人的野心完蛋了”。[2]

就政治表现和总统的个人威信而言，对石油工业的没收是卡德纳斯执政年代的高峰。石油公司受到“震惊”。[3] 从主教到国立大学的学生，全墨西哥人都捍卫民族大业，赞同总统的爱国之举，并且也许是第一次对他个人的英雄气慨表示敬佩。群众举行了大示威；也许有25万人走上首都街头，抬着棺材模型，上面写着被没收的大公司的名称：标准石油公司、瓦斯特卡石油公司、阿吉拉石油公司。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政府为今后的赔偿而发行的债券被抢购一空。各阶层的妇女排队捐献钱、珠宝、缝纫机、甚至结婚戒指。整个国家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表现出如此团结一致的精神。简而言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人民阵线主义看来包括了全体人民。在这种志同道合的气氛中，国民革命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将自己重建成一个新的、结构完整的墨西哥革命党（PRM）。

人民的热情不能代替石油生产，但却是有帮助的：石油工人、

---

① 见琼·C·阿什比的《有组织的劳工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6），第180页。

② 马雷特：《一位墨西哥的目睹者》，第227页，作者强调了评论的自发性。

③ 阿什比：《有组织的劳工》，第237页。

科室人员与有经验的钻井工进行合作，在接管这一资金不足的工业进程中发挥了干劲和智慧。一个年仅28岁的青年负起了管理阿吉拉石油公司的最重要的波萨里卡油田的重任。远在1914年的例子就已表明，墨西哥人完全有能力管理石油工业。石油公司和拉占纳地主们所预言的所谓外国人走后石油公司就会发生混乱的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石油公司比地主们有更多的权力来实现它们的预言。美国和英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美国人慎重些，英国人则粗暴）。石油公司立刻开始了反击，将资金调出墨西哥，抵制买墨西哥石油产品，并要求第三国也抵制墨西哥产品，不要向墨出售设备。由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政府赤字增加，贸易顺差下降），这一行动给墨西哥造成了严重后果。商业信心发生动摇，贷款枯竭——美国暂时中断购买墨西哥白银，墨西哥比索比价下降。一时间，据说连迟钝的总统也睡不着觉了。石油业本身则出口萎缩，生产减少了1/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剧了石油业的问题。到1939年底，石油工业赤字严重。因此，再一次在极为严峻的条件下进行了卡德纳斯的经济改革。铁路的类似情况也很明显。石油工人——传统上是工团主义的，并且对石油业的活力抱有信心——赞同工人管理，虽然他们也对搞“联合”制抱有戒心。然而政府并不愿意放弃控制这一有重要价值的财产，因此在政府与工会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墨西哥石油公司。这使工会的地方组织得到了相当的权力和自治，而政府则控制着决策和财政的最终大权。工会领导——三明治中的肉——面对着一个经常性的困境：如果他们阻碍管理这个新的国家财富，那么他们就成为国家的叛徒。如果他们完全按政府旨意行事，那么，他们就成了他们本阶级的叛徒。那时冲突的可能性处处存在：关于职工规模，工会的组织问题，晋升政策，管理权限。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收政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一些问题恶化了。整个石油业从潜力上讲是完好的，但是抵制和战争使得原先的乐观预测成了泡影。此外，随着劳工队伍的扩大（从1.5万人增加到

2 万人）和工资的增加，整个部门的工资支出猛增（到 1939 年后期增加了 89%）。由于墨西哥石油公司出现赤字，政府面临一个难题。卡德纳斯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提出重新调整和裁减的主张。据说，工作纪律受到损害；工人索取了过多的权利，对企业的管理造成了影响；领薪人员太多，工资太高，津贴太宽。确实，由于实行没收，石油业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使得 1937 年的决定失效了。像铁路职工一样，石油工人也被要求为了国家以及——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强调——为了他们自身阶级的利益而勒紧腰带。但工人们则把这些归咎于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管理不善。他们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人自治。到 1940 年，罢工不断，工会领导与更富战斗性的工人派别之间出现了分歧。卡德纳斯在他任职的最后一年里用了不少时间整顿新近国有化的这一部门（人们常见他在老的阿吉拉公司办公室里工作）。他支持公司管理当局的裁减计划，要求减少工资和职工，加强工作效率和纪律性——在这些方面他得到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支持。到 1940 年，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贸易状况略有改善。但基本问题仍然存在。这在一些人中增加了财产归还原主的希望。下一届政府在 1943 年遇到了严重的罢工威胁，对上述希望搪塞了过去；政府与工会之间的摊牌拖延到了战争结束之后。

随着石油业的没收，它所触发的外交上的愤怒和经济上的震动，以及战争的爆发，使得对外关系第一次成为墨西哥政府所关心的中心重大议题。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外交政策——如果以不寻常的激情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遵循着人们熟知的“革命”传统：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和自决权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国际联盟中以及历次泛美会议上都得到支持。在这些场合，墨西哥发言人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谴责侵略，不管是美国支持索摩查的政变，还是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和纳粹对波兰的进攻，以及——使墨西哥共产党懊恼的——苏联对芬兰的战

争。这些都具有地缘政治的相似性，激起了实实在在的谴责。但使老百姓和官方最为关注的则是西班牙内战。开始时，卡德纳斯答应了西班牙共和派对武器的要求，随着战争的发展，少量的供应不断。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支持对民族派进行官方谴责。随着共和派的失败，墨西哥成了西班牙难民的避难处（最终达到 3 万人)。难民中包括一些知识界精华以及巴斯克足球队员。这些人都在墨西哥留下了他们的烙印。[①] 正如列昂·托路茨基巧合地来到墨西哥(卡德纳斯搞平衡手法的又一例子)，战争直接冲击了墨西哥的国内政治。由于这种明显的类似，墨西哥舆论发生分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右翼势力、天主教和法西斯组织支持佛朗哥。有的甚至渴望出现一位墨西哥大统帅，他们责备墨西哥政府支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并对其战败的成员来到墨西哥感到遗憾。1938 年，喜洋洋的传单宣告卡德纳斯在特鲁埃尔获胜。因此，西班牙内战在 1940 年墨西哥大选前夕帮助确定了墨西哥国内的政治阵容。

同时，随着石油业的没收，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外交范围内的关键之点——恶化了。在此以前这一关系看来很好。由于卡德纳斯主义与美国新政之间据说的一致性（虽然很容易被夸大)，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以及约瑟夫斯·丹尼尔斯被高兴地选任美驻墨大使，卡列斯——莫罗协议的缓和气氛得到了加强。如果在卡列斯与卡德纳斯的斗争中，美国方面私人和官方的同情出现分歧的话，如果美国的影响总的是趋向妥协的话，美国显然不会和叛方有来往的，美国的决策当然总是赞同合法的掌权者的。丹尼尔斯不顾国务院和美国天主教会的意见，坚持支持墨西哥政府。他的清教徒式的进步主义和孩子般的热情受到卡德纳斯的喜爱，并使欧洲的职业外交官感到惊恐。睦邻政策的提出使得参加历次

---

① 由难民中知识分子组成的西班牙学院，以后演变成了著名的墨西哥大学；巴斯克足球运动员帮助将墨西哥从由英国人传授的“粗野作风”改变成更接近“墨西哥性格”的作风。见冈萨雷斯著：《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229 -235、276 页。

泛美会议的墨西哥和美国代表们感到他们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和谐。

墨西哥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就给这一热乎的关系泼了冷水。对美国地产的没收招致了严厉的抗议。如果铁路国有化缓解的麻烦多于它引起的麻烦，那么石油业的国有化则遇到了毫不犹豫的挑战。美国政府支持石油公司的抵制，要求赔偿（如果不是归还财产的话），中断了关于商业条约的谈判和对墨西哥白银的采购。英国的反应——虽不怎么有效，但更具有进攻性——造成了外交破裂。美国官方舆论有不同看法，对立的经济利益集团（银矿主，在墨西哥投资最近有增长的制造商，企图将德国人挤出墨西哥市场的出口商）赞同和解而不是对抗。罗斯福在丹尼尔斯的鼓舞下，准备不理睬石油公司、国务院和金融舆论的鹰派建议。他承认墨西哥有权没收，排除了使用武力，并试图减轻对美——墨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对白银的采购又恢复了，对石油公司赔偿（墨西哥政府没有对赔偿的原则进行争辩）的谈判也开始了。然而石油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坚持要求完全归还它们的财产。石油公司感到，由于抵制的影响和墨西哥石油业和经济收入的下降，它们对上述要求能得到满足充满了信心。

美国政策形成中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是对轴心国威胁增大的担心。这些——早已在培植泛美主义的进程中表现得很明显——已经在政策中起主导作用，这正是卡德纳斯政府所预料的。此外，抵制迫使墨西哥与轴心国签署了销售协议（虽然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讲对墨西哥无多大好处，甚至对轴心国来讲也无重大战略意义），这加剧了美国对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墨西哥渗透的担忧。随着纳粹第五纵队的鬼影不断逼近，美国政府决定：与墨西哥的缓和关系同25年前一样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连鹰派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对石油公司的不妥协感到不耐烦，他急于想了结这一问题，即使使石油公司受损失也在所不惜。随着辛克莱公司打退堂鼓，单独达成协议（1940年5月）以及美墨之间其他一些突出分歧在战争的压力

下得以解决，不妥协态度就显得更不协调了。1941 年 11 月达成了关于解决因革命而造成的美国财产损失的总协议；作为回报，美方同意增加对白银的采购，提供信贷以支持比索并开始就达成一项商业条约进行谈判。最后，在 1942 年 4 月石油公司同意了 2380 万美元的赔偿——等于其原要求的 4%。

美墨间的缓和包括了很多内容并对墨西哥国内政治有重大影响。随着战争的临近，美国进一步密切了与拉美的关系。一系列泛美会议上（1939 年在巴拿马；1940 年在哈瓦那）达成了一些协议，保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警告好战国家不得染指新世界。在这西半球的联盟中，巴西和墨西哥成了主要的角色。在 1940—1941 年间，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恐惧日增并且最后得以证实，墨西哥就成了美国在这一大陆的政治和战略要地。卡德纳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为墨美接近打下了基础。他的后任也继续发展了这一做法。同时这反过来也有利于在 1938 年后放慢“卡德纳斯计划”。总统对纳粹侵略罪行的谴责和对民主的支持是直接了当的；他保证对于反击轴心国对美洲大陆的进攻给予全力合作。为体现这一承诺，他批准了墨美军事谈判。德国在墨西哥的宣传受到阻止。此外，对军队的调整也开始了，军事开支从 1939 年降到了革命后的最低点：占总开支的 15.8%，上升到了 1940 年的占 19.7%。一项新的军事服役法规定所有年满 18 岁的青年必须服役一年。这样做是希望不仅使墨西哥人准备为“共同保卫我们的大陆”（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语），而且还可灌输“对我们各行各业青年都有好处的纪律教育”（阿维拉·卡马乔语）[①] 反映时代的特征，反映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的优先考虑，农村学校（现正受到威胁）被国家统一的其他传统工具——军营取代了。

---

① 由难民中知识分子组成的西班牙学院，以后演变成了著名的墨西哥大学；巴斯克足球运动员帮助将墨西哥从由英国人传授的“粗野作风”改变成更接近“墨西哥性格”的作风。见冈萨雷斯著：《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308 页；《今日报》，1940 年 9 月 20 日。

然而在这方面，官方行动超过了公共舆论，作为官方左翼的声音，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表达了对征伐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的支持，期望墨西哥最终能参与这场战斗，使意识形态上的正确立场能与经济上的好处结合起来。但是隆巴尔多分子的好战性在这场虚假战斗一开始就冷却下来，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路线则与墨西哥共产党的路线相呼应：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战争”，而墨西哥应严格持中立立场。然而到了1940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又回到了主战的、反法西斯的路线，这一做法与其国内立场更相一致。到1941年初，隆巴尔多发誓要提供“所有……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帮助”，以反对法西斯，并希望美国参战。[①] 由于纳粹对苏联的进攻，墨西哥共产党加入了爱国民主阵线。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使得这一阵线的成员齐全了。如果左派、官方以及共产党人先倾向同盟国，然后加入到同盟国这一边，那么右派自然是不满的。保守派和法西斯组织如国家行动党（PAN）和辛纳基全国联盟（UNS）则倒向轴心国一边，批评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在这方面，他们支持民众的想法。对大多数墨西哥人来讲，这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战争，很少人对其进程真正感兴趣。没有战斗的动力，而新的服役使他们想起了令人憎恨的征兵（波菲里奥时期的抓壮丁和革命年代的强行征兵），1941年后实行的新服役法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就当时战争中群众的同情心而论，他们倾向德国；有些人认为德国是1918年国际上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感到德国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或是反犹太思想的源泉，当时排犹运动在墨西哥日益增长。[②] 如果墨西哥要支持同盟国的事业，那么政府就得做大量的鼓动工作。

---

① 布兰卡·托雷斯·拉米雷斯：《1940—1952年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墨西哥》（墨西哥城，1979），第66—67页。

②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256页；Davidson，墨西哥城，1940年1月4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813。

由于外交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国内政治经历了重要的改组。在庆贺对石油工业没收的气氛中，卡德纳斯的一个主要目标达到了：根据各阶级共同路线重新建构执政党（现在是墨西革命党）。卡德纳斯希望这将保证改革的继续和克服至今仍是国民革命党要害问题的宗派主义，特别是与“中间派”不和的左派（弗朗西斯科·穆希卡，贡萨洛·巴斯克斯·贝拉，埃内斯托·索托·雷耶斯）已非正式地被置于那位伟大调停者和幸存者波特斯·希尔的统帅之下。后者由于在驱逐卡列斯（1935 年 7 月）方面出了力，因而担任了党的主席。他开始着手“清洗”国民革命党（这就是讲要清除卡列斯分子的残余），并且通过广泛利用电影、电台、报刊和会议扩大其吸引力。国家各委员会被要求吸收工人阶级成员；国民革命党（不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承担了组织全国农民的工作。然而，像中世纪的检察官一样，彼特斯·希尔在其自己搞的“清洗”运动中争吵不休，后来被激进的卡德纳斯分子巴尔瓦·冈萨雷斯于 1936 年 8 月替代了。同时，建党进程和各派间的联合在继续：根据一项竞选协议（1937 年 2 月），国民革命党、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墨西哥农民联合会和墨西哥共产党实现了联合；一年后墨西哥革命党成立，它包括了军人，工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农民（起初是由墨西哥农民联合会为代表，后被广泛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所代替）以及由合作社、官员和无党派人士（主要是中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团体。这个团体直到 1943 年才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这个新成立的群众组织再次将监护人的作用与进行激进改革的长期承诺结合起来：党将“使人民为建立一个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权而做好准备”。[1]

具有讽刺味的是，当为了实现这些伟大目标而建立墨西哥革命党的时候，墨西哥政权却开始动摇了，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总统设法巩固政权，避免进一步的激进行动，并为和平、民主以及

---

①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 183 页。

政治上志同融洽的接班做准备。在爱国激情中到来的1938年却在激进分子退却的气氛中结束了：如果说有那么一个卡德纳斯热月的话——当革命前进的步伐受阻并逆转——那就是在1938年，而不是在1940年。当然，左翼批评家把整个卡德纳斯主义看成是个长期的热月；而对忠诚的党人来讲，这不是退却，而只是战术上的撤退。但是这些党人们用以证明1938年后激进主义仍在继续的例子（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特高的利润税，关于电力工业的立法）是无法与早年席卷全国的改革相比的。如果没有全面退却的话，那么必然出现"明显的转向"，[①]然而这是环境所决定的，而不是自上的决定。在1938—1940年间，总统权限大为减少，这是由于新的政治压力、"六年计划"的结束和卡德纳斯史无前例地拒绝培养一名接班人的结果。墨西哥革命党内部的争吵以及最后1940年的选举崩溃，暴露了这种权力的损蚀，这反过来又破坏了整个卡德纳斯联盟，使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受到最大影响。正如在30年代早期那样，意识形态气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到1940年，保守分子自信地宣称："大部分有头脑的人……已对社会主义厌倦了"；"今后几年里风向将向右转"。[②]

战争和内部压力这两个因素促使人们采取更为谨慎和巩固成果的做法。这些压力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状况。卡德纳斯继承了一个正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经济。在这方面，制造业和某些出口品（如白银）呈增长趋势。甚至在没有对税务结构进行激进改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都有增长（在1932—1936年间几乎增长两倍）。但是同时，政府开支也增长了。1934—1935年增长幅度较小，因那时与卡列斯的斗争居首要位置。1936年后，随着主要改革的进行，开支则大幅度增加。这样，开支的实际数从2.65亿比索（1934

---

①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272页；茨维·梅丁：《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思想和实践政策》（墨西哥城，1972），第204—206页。

② Davidson，墨西哥城，1940年1月4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813。

年）增加到4.06亿（1936年）、5.04亿（1938年）和6.04亿（1940年），其中“社会和经济”开支名列前茅。然而，1937年出口达到了高峰，政府的预算赤字也由1936年占收入的5.5%上升到1938年的15.1%。到那时，赤字财政已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政府——拥有相似的空前的政治意志和货币干预的权力——以此来对付从1937—1938年由美国传来的新萧条的影响。和10年前比，墨西哥对付这种外来影响的地位增强了。

但是由于进口价格和国内食品价格的上升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则更加大了。村社的低效率常常被错误地归咎于食品价格。实际上尽管农业生产受到土改风暴的影响，地主不愿再进行投资，但是玉米在1935—1939年的总产量仍和10年前差不多；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和可耕地的状况，这些（官方）数字表明人均消费量下降了17%和每公顷产量减少了6%。然而很可能的是，这些数字（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低估了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情况。这一情况当然比以前大农庄的情况要分散和不可捉摸。[①]同样，如果村社农民生活好一些，对城市的食品供应就会紧一些，价格就会上去。和德国一样，墨西哥最近也经历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舆论对这一征兆不祥的——虽然不算利害的——价格上涨是敏感的。早在1936年，就有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甚至连隆巴尔多也承认有问题。在1934—1940年间，零售价格指数上升38%，但是在1936—1938年间——那是剧烈的社会改革年代——则上升26%，其中食品受影响最大。然而对于整个萧条时期实际工资持续下降的灾难性分析，即30年代后期经历通货膨胀而40年代经历更厉害的通货膨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卡德纳斯年代，最低工资高于通货膨胀幅度，工资的总体购买力增加了，这使国内市场受益。主要的受益者是村社农民、有组织劳工和工人——就像通用

① E·阿拉尼斯·帕蒂尼奥和E·巴尔加斯·托雷斯：《对某些农业统计的意见》，《经济季刊》12期（1945—1946），第578—615页。

汽车公司雇佣的体面人，他们利用了因农业职业转向工业的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业无产者（特别是面临被没收的大庄园所雇佣的工人）情况却不怎么好。而城市中产阶级——卡德纳斯的严厉批评者——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也相对较大。

但不管怎么说，通货膨胀有损于工人阶级近期得到的好处和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影响到私人投资并鼓励了资金外流。政府的反应是矛盾的，也许进一步证明了卡德纳斯主义运行的结构收缩。为调整食品价格而进行了认真的努力：正如私人企业的敌视反应所表明的那样，这不是小打小闹。在193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总的价格指数略有下降（4%），面食品的指数则大幅度下降（8%）。为了找到更根本的解决办法，政府提高了关税（1937年12月）。1938年货币贬值后，又实行了新的出口税并且减少了基本建设项目（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公共事业上的人均支出下降了38%；道路建设“实际上停止了”）。公共部门的工人——如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不得不勒紧腰带。由于政府农业贷款也在减少，村社农民也资金不足，或者与拉古纳人一样，只好去私营部门寻找资金。1936—1937年间令人振奋的日子过去后，农业改革的速度也放慢了——有人说是考虑到了美国的利益。政府肯定希望从美国得到贷款，虽然美国政府赞同一项更广泛的“经济援助计划”，但也不是完全拒绝其他考虑。然而，对石油业的没收却使任何交易成为泡影。①

随着经济问题的增多，政府失去了干劲，而政治反对派则有发展。一方面，由于卡德纳斯联盟发生了分裂，昔日的支持者（主要是工人阶级团体）也弃之面去；另一方面，自卡列斯下台以来（如果不算克里斯蒂亚达失败以来）就处于退势的保守派和天主教反对派又东山再起。虽然1937年后，官方统计的罢工次数有下降（表明官方不愿将罢工合法化的态度），但实际的工业纠纷则

① 汉密尔顿：《国家自主的局限性》，第224页。

有上升，主要是由面包房工人、教师、电工、矿工、糖业工人、纺织工人和电车工人举行的罢工以及铁路和石油部门中发生的冲突。到1940年，工人阶级支持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迹象已很明显；甚至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五一”节集会都受到了反政府活动的骚扰。由于政府新搞的缓和措施，工商界也对政府有意见。价格管理措施和增税政策受到指责；对激进工会的攻击也更猖獗。随着资本外流，经济发展减缓，政治反对派重新抬头，并得到了新的资助。以政府为榜样，企业界出现了更大的组合型组织，正如保守派和法西斯反对派的情况一样。一个名为辛纳基全国联盟（UNS）的组织于1937年成立。它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天主教一体化运动（它不赞成“政党”的概念），坚决反对革命、自由化、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外国佬的唯物主义，而提倡宗教价值观、家庭、私有财产、等级制度和社会团结。也许是因为得到企业界的资助，但主要是靠真正的农民的支持，特别是墨西哥中西部老的基督派地区农民的支持，辛纳基发展很快（1913年自称有50万成员），在巴希奥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信仰复兴集会。另一个叫国家行动的组织在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领导下于1939年成立，它与前者在意识形态上相似，但主要吸收更遵循常规的城市中产阶级。它得到不担任神职的普通天主教徒的支持和蒙特雷资产阶级的财政资助。

而“世俗”的右翼虽人数不多，但也同样有声势。[①]随着1940年的临近，一些小党小派冒了出来。有的追随一些老革命者。随着年纪增大和日益富裕，他们不再关心革命的衰落，而趋向保守主义或干脆法西斯主义（马塞洛·卡拉维奥，拉蒙·F·伊图尔韦，塞迪略，华金·阿马罗）。有的如豪尔赫·普列多·劳伦斯的社会民主党（PSD）则求助于反对卡德纳斯的中产阶级，选择了

① 休·G·坎贝尔：《墨西哥的激进右翼，1929—1949》（墨西哥城，1976），第47页。

1929 年出现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大多数党派谴责共产主义，指责西班牙颠覆分子的到来和犹太人的长期影响。这表明，30 年代的政治两极化是怎样把中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推向极右方面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则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他从 1929 年时的一个抵制连选连任的反对派杰出人物成为在《舵》杂志上撰文讨好法西斯主义的人，宣称轴心国会赢得战争，说希特勒是黑格尔式的世界历史人物（物以类聚），而墨西哥则必须适应历史循环的需要而服从专制统治。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一时成了时髦。贝尔纳迪诺·梅纳·布里托向老同事们揭露了"世界犹太人"的作用。对此，辛纳基分子也表赞同。国民革命党的原领导人、地主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于 1938 年建立了反共革命党（PRAC），称该党的名称就是其存在的理由。在 1938—1940 年间，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组织。它们力量弱小，时隐时现，往往依赖一名年迈的考迪罗的智慧和野心。但它们却表明意识形态气候中的真正转向：右翼的复兴（一个缩小的自由主义的右翼和日益增大的、咄咄逼人的、仿效外国的专制的右翼）；新的对波菲里奥时代的怀旧情绪（影院里上演的关于牧工生活的戏剧引起人们愉快的回忆，可充分表明这一点）和左翼政治主动性的相对丧失。

右派不断仿效左派的做法。他们建立群众组织，甚至偷偷拉拢其对手的下属组织（就像阿尔马桑在 1940 年对持不同政见工会所干的那样），因而介入了 30 年代式的政治逐渐体制化和"群众化"的进程。甚至在辛纳基活动的地区，与基督派的严重暴力相比，30 年代后期的政治是相对和平的；自天主教势力竭力阻止激进的狂热浪潮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这方面，国家行动党（PAN）领导人——精明、细心的知识分子戈麦斯·莫林，右翼对付隆巴尔多的对手比老一代人如阿马罗更典型、更有效。阿马罗的血腥记录和自我修行式的心绪使他不适于担任他所觊觎的总统职务。阿马罗也许极想用哗变来夺取政权，但时间已不再合适了；阿尔马桑在 1940 年谈到造反，但未采取任何行动。然而有位老战

上坚持旧做法，不能领会新方法。多年来，萨图尼诺·塞迪略掌管着圣路易斯波托西省就像一位尊贵的“村庄首领”，而不是一位能很快成为示范的政治家。①他依靠他的土地殖民者（他们在革命和基督派战争中为他而战斗过）的支持和他保护过的天主教徒的同情，以及小城镇的地方权贵网。塞迪略作为广泛的个人和群众性的土地改革的倡导者，现在也对逃避卡德纳斯激进主义的地主和商人采取容忍态度了。他与劳工运动的关系总的来讲是敌对的，而且作为农业部长（这是因塞迪略在反对卡列斯的斗争中支持了卡德纳斯而得到的报答），他给予恩赐，促进殖民化而不是集体化，从而招致了激进人物如穆希卡的仇恨。在他掌权的圣路易斯，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下，独立工会聚集了力量。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则利用在阿特拉斯和阿萨科工厂的罢工来削弱塞迪略对地方的控制，称他是国际法西斯的朋友（令人怀疑）以及有组织劳工的敌人（确实）。1937 年，国民革命党加入了这一竞赛，与塞迪略争夺对议会选举的控制权。据塞迪略分子称，他被撤消农业部长职务是穆希尔、隆巴尔多和左派策划的。到 1937 年底，塞迪略在圣路易斯忿忿不满。在一些具有野心的随从和明显的保守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鼓舞下，他思考着反叛的计划。

要将一般的不满转变成有效的反抗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塞迪略的想法不成熟，以及他的潜在合作者各不相同。虽然他计划搞一个政治运动、也许是竞选总统运动，但他也在考虑或者说乐于搞武装叛乱。有关将来合作者的建议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蒙特雷的事需要一些钱；他们曾找过石油公司，但没有做成交易（有种普遍看法认为塞迪略的反叛不仅得到石油公司的资助，而且是与石油公司共谋的，这并不确实）；一些有名的保守派分子如统率东北部的阿尔马桑将军或索诺拉州的州长罗曼·约库皮西奥更

① 达德利·安克森：《农业军阀：萨图尼诺·塞迪略和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墨西哥革命》（伊利诺斯州迪卡布，1984 年），第 6 页。

赞成搞政治干扰，而不是赤裸裸的叛乱。塞迪略不得不依靠其地方势力，主要就是1500名农村老战士。但即使这样，他也居于守势。当得知塞迪略的动机后，政府调整了军队指挥人员，鼓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圣路易斯吸收成员。更主要的是政府发动了一场主要的土地改革，将100万公顷的良田分配出去，这样在塞迪略的后院制造了一批对立的平均地权论的追随者。很清楚，塞迪略的地方权势也走上了塔瓦斯科的加里多或克雷塔罗的萨图尼诺·奥索尼奥同样的道路。但卡德纳斯向他的旧盟友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后路，任命他为米却肯的军事指挥官。整个1938年春季，塞迪略一直在辩论、策划和谈判。最后，他拒绝离开圣路易斯。卡德纳斯怕这一拒绝会引起连锁反应，决定解决塞迪略的问题。在另一次戏剧性的总统行动中，卡德纳斯到了圣路易斯（1938年5月），向那里的群众发表了讲话，要求塞迪略退休。塞迪略则造了反，或者像一个支持者所说的那样"他没有造反，是别人逼他这样干的"。这是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出气，而不是真的暴动。确实，塞迪略充满人情味地要求准备上山的大部分追随者呆在家里，期望在1940年能有个有利的开端（就像他在1915年所干的那样）。但是到1938年，时代已变了。在哈利斯科、普埃布拉和瓦哈卡等地的同情叛乱响应很少；甚至在圣路易斯本地，塞迪略分子也有不同看法，不少人投到了卡德纳斯手下。卡德纳斯则仍在省里旅行、演讲，揭露塞迪略托词的虚伪性。不少参加反叛的人得到大赦；少数人包括塞迪略本人则被逮捕和处决了。据说，卡德纳斯本人对此真的感到悲伤。

这样，长长的革命周期中最后一次旧式的军事叛乱结束了。甚至当塞迪略在圣路易斯的山区中遭到追捕时，保守的反对派则在聚集力量准备以和平方式在1940年的大选中进行角逐。因塞迪略的叛乱和恶化的经济形势而感到惊恐的政府则准备搞和解。改革步子受到抑制，改革调子也变软了。在其1939年对北部阿尔马桑的地盘进行的广泛视察中，卡德纳斯竭力否认"共产主义"色彩。

在萨尔蒂约，他赞扬了东北地区的商业，认为这是“这个国家中受人尊重的、活跃的力量中的一个要素”(这些话与3年前在蒙特雷发表的谴责调子截然不同)。现在，对“共产主义”的否认和对宪法的赞同已是家常便饭了。[①] 国会忙于冲淡社会主义教育计划；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对民族团结和社会平等表示关切，向工会施压不要搞罢工(不少罢工在酝酿中)，同时否认它主张取消财产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守派搞恫吓的情况下，上述否认看来是必要的。但卡德纳斯的和解有其合理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右派是接受的。右派没有搞妥协，也没有在广大官方政治的领域安置其雄厚力量，而是置身于官方政治之外，将力量聚集在保守和法西斯式的政党内，期望继续实行的激进主义会导致卡德纳斯主义的完全崩溃。由此，右派可以从中得到巨大的和永久的好处。因此，右派“愿意看到激进主义计划步伐加快，理由是在新政府时期会出现某种反应的可能性更大”。[②] 确实，如果卡德纳斯让一位激进分子接班，采纳激进主义的计划，就不能排除保守派与军队和辛纳基分子合伙搞政变的可能性。在这种气候下——书斋评论家忽视了这一点——和解就十分符合逻辑的了。

就是在这一气氛下，接班问题在1938年被提了出来。墨西哥革命党内部及外部的对立的集团开始聚集力量。它们知道1940年的选举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有了阻止卡德纳斯主义(已经在减速)前进的机会了。要么组建一个温和的或干脆是保守的政府；要么就继续改革进程。对卡德纳斯个人的作用常有争论。他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他的个人权力正在削弱，已不能中止对接班问题的猜测。即使他想这样干，他自己也不能决

---

① 阿列尔·何塞·孔特雷拉斯：《1940年的墨西哥：工业化和政治危机——在总统大选中的国家和民营公司》，(墨西哥城，1977)，第154—155页；路易斯·梅迪纳：《1940—1952年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史：卡德纳斯主义与阿维拉·卡马乔主义》，(墨西哥城，1978年)，第93页。

② Davidson，墨西哥城，1940年1月9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1301。

定最终结果，墨西哥革命党也是如此。即使它是一头巨兽，也只是一头缺乏与其身躯相配的智慧、庞大而不协调的野兽。由于内部分裂，党已不能保证平稳接班。事实是，出现的显著继承人阿维拉·卡马乔在党外的平行组织里培植对他的提名运动。当这一旦成为既成事实后，墨西哥革命党就同意他为候选人。卡德纳斯在政治上的自我放弃则加剧了冲突。他排除了自己再当选的可能性，主张在墨西哥革命党内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接班将由在30年代建立的新的群众组织来决定。然而不管多么大胆和开明，这个不让离任总统来挑选——或至少有力影响——接班人的新决定招致了宗派主义，对总统权力的肢解和对官方左派的死刑判决。后者支持卡德纳斯的亲密朋友和顾问弗朗西斯科·穆希卡。他们对得不到总统的支持而感到失望。他们处于中偏右的对手，支持国防部长阿维拉·卡马乔，抢先表示不同意总统的愿望，并于1938年开始了竞选活动。以后，左派则居于守势。此外，阿维拉·卡马乔做了充分准备。他来自普埃布拉的一个强盛的政治家庭，在30年代是卡德纳斯的精明同盟者，他——尽管有些小毛病——更是一个职业政客而不是一个考迪罗。而作为国防部长（国防部仍是总统的接待室，后来则是内政部），他得到了军队的充分（即使不是全力）支持。在担心发生军事哗变的情况下，这是个关键性的因素。上一次哗变曾严重地影响到接班问题。他也得到了大多数州长的支持。他的娴熟的竞选经理人韦拉克鲁斯州长米格尔·阿莱曼把这些州长都吸引过来了。吸引了这些州长以后就带来了许多地方权势者，他们为了在联邦权力日渐上升而前保持自身的领地，就从机会主义地支持卡德纳斯主义转而机会主义地支持卡马乔主义。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成了阿维拉·卡马乔分子的巢穴。

党的有组织的部分，察觉到这一事态发展的含意，在其领导人的指示下，对此给予了默许。卡德纳斯让全国农民联合会自己做出决定。它受到操纵者的控制，绝大多数成员都投了阿维拉·

卡马乔的票，而穆希卡分子立即指责它歪曲了农民的意见，证明全国农民联合会已很快地变成了一个受到无代表性的官僚们所控制的“鬼魂”。[①]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宣称支持阿维拉·卡马乔。它的领导人为现已人所熟知的情况进行辩解：团结是首要的，在面临内外法西斯威胁的情况下，1940年应成为巩固而不是前进的年份（墨西哥共产党在驳斥穆希卡分子的论调时，也采取了相同的路线）。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提出了庞大的第二个六年计划以使其激进主义更加升华。这一计划包含了进一步的经济管制，工人参与决策，以及功能性民主的形式。右翼指责该计划既是共产主义又是法西斯主义。这一计划对纸上的建议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贯彻这些建议的能力表现出了天真的信心。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希望以此来约束候选人，而阿维拉·卡马乔表示同意这些建议。结果，墨西哥革命党的计划最后是个预想中的温和的文件。

得益于环境的有利，阿维拉·卡马乔既能得到中间派也能得到左派的支持。他还对右派有吸引力：作为候选人和当选总统，他提出了当时的“温和”调子，与卡德纳斯拒绝共产主义的调子相呼应，并竭力使自己——尽管墨西哥共产党支持他竞选——与日益增长的反共情绪相一致。工人被警告不许闹事，要他们保护已有的成果；小业主得到安抚；蒙特雷的商人被赞誉为“替墨西哥的强盛操心和打算的人们”。[②] 关于教育（仍是一个热门话题），阿维拉·卡马乔还是主张温和与和睦政策，反对教条的理论，主张尊重家庭、宗教和民族文化；人们注意到他在古老的洛斯、阿尔托斯的基督派中心地带得到“亲切的欢迎”。[③] 1940年9月，他当选后响亮地宣布了他的信仰，“我是信教的”。自始至终，他的竞选言论——强调自由、民主（现在经常与共产主义相对立）以及

① 孔特雷拉斯：《1940年的墨西哥》，第55—56页。

② 孔特雷拉斯：《1940年的墨西哥》，第155—156页。

③ 里斯，墨西哥城，1940年2月9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1654。

最重要的团结——与6年前卡德纳斯主张的好斗的激进主义适成对照。不久，事情清楚地表明，阿维拉·卡马乔正在“渐渐地排斥卡德纳斯主义在六年规划中提出的连续性”。[①] 然而，这一计划的初生儿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却继续支持这位候选人，甚至与其催眠式的诡辩论调相呼应。

阿维拉·卡马乔因此向所有的人提供了一切，扶植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分子和基督派分子以及工人和资本家——不同于6年前的卡德纳斯。这纯粹是迎合大众的口味，把不同的信念和不同的阶级混合在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中。1940年的情况顺利，这一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行之有效的。蒙特雷资产阶级以大企业的传统方式押赌注：对阿维拉·卡马乔的表示作出积极的反应，在执政党内部做成了几宗买卖；但是他们也赞助了其主要的天主教对手，国家行动党（也许还有全国联盟）。国家行动党为难地不知要支持反对派还是像他们的蒙特雷资助人可能赞成的那样采取更为谨慎的迴避路线。最后，该党决心以“有条件的形式”支持反对派，这代表了事情最糟的一面。辛纳基领导人同样调整了风帆，踢开阿尔马桑，并且在阿莱曼的诱骗下主张弃权：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与激进的基层群众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这促使了1941年驱逐民粹派领袖萨尔瓦多、阿瓦斯卡尔的进程。

国家行动党和全国联盟的犹豫不决进一步加深了早已分裂的反对派之间的裂痕。众多的保守党派、团体和可能的候选人反映了广泛的反政府情绪，但也使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进行的合作发生困难。国家行动党和全国联盟——天主教右派的智囊和民众力量——受到操纵和控制。其他组织为年迈领袖的个人至上主义利益服务：墨西哥民主立宪阵线（FCDM）支持始终是机会主义的和乐观的将军拉斐尔、桑切斯、塔皮亚；反共革命党由年迈的卡列斯派头头诸如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之流掌权，支持阿

① 梅迪纳，《卡德纳斯主义与阿维拉·卡马乔主义》，第92—93页。

马罗。但是，当阿马罗的候选人提名遭到挫折时（他以暴力阻止前执政官时代的形象没有给他多大帮助，而他开始竞选时的好战宣言又加强了他的暴力形象），反共革命党气愤地拒绝转而支持其主要对手阿尔马桑。① 因为阿尔马桑得到一个多党派联盟的支持，现已成为阿维拉·卡马乔的主要挑战者。阿尔马桑政治上经验丰富，生活上富有（据说财产价值500万美元），比阿马罗聪明（在其变化多端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玩弄骗术和诡计的才能”，并且在1938年“非常狡猾地”没有支持塞迪略）。他对新莱昂具有极大的兴趣。在那里有他的军事指挥部，并同蒙特雷的组织有密切的联系。② 他拒绝在墨西哥革命党里施展他的人所共知的雄心的机会——卡德纳斯希望他那样做——阿尔马桑从其反对派伙伴的错误和失败中受益；在得不到有组织的右翼团体(反共革命党、国家行动党和全国联盟的支持的情况下，他更依赖于大的、广阔的选区——天主教徒、中产阶级和小业主——这些人只是松散地结合进阿尔马桑的党全国统一革命党（PRUN）。如果该党组织上微弱，那么阿尔马桑主义的潜力则是强大的，特别是因为其候选人比阿马罗那样的被人鞭策着的考迪罗表现出更广泛的吸引力。他调动了中产阶级自由分子，他们重温了1929年宪法抗议活动；使农民醒悟到全国农民联合会的诡计和土地改革的缓慢速度或彻底腐败；调动了低级军官（他们，几乎都加人了墨西哥革命党）；调动了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主要是大产业工会、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他们反对隆巴尔多的互相吹捧和卡德纳斯的高压政治）以及电工和电车工人，一部分矿工，以及有分裂倾向的教师工会，瓜达拉哈拉的工会，洛斯莫奇斯的糖业工人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策划的一次内部政变的受害者。阿尔马桑派的广

---

① 梅迪纳，《卡德纳斯主义与阿维拉·卡马乔主义》，第100—105页；弗吉尼亚·普鲁韦特：《墨西哥报道》（纽约，1941），第184—188页。

② 约翰·沃马克：《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纽约，1969），第80页；戴维森，墨西哥城，1940年1月9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1301。

阔胸怀吸收了托派的农工革命党（PROC）。在迭戈·里韦拉领导下，该党与右翼的不正当关系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与中间派保持并不比较正当的联系的逻辑结果。

阿尔马桑派因此成了叛逆分子（亚杜兰）[1]的洞穴，集中了所有反对官方操纵和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组织。用其候选人的话来说，这个政府"远远没有实现革命诺言，搞乱了经济……给人民带来了饥荒和贫困"。[2] 阿尔马桑把他的呼吁集中在这一方面：宽厚、折衷、批评政权，但是，提出的其他选择既不要太具体，又不要太激进。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经济失败，官员腐败，有害的外国影响、纳粹或共产主义；他严厉申斥左翼（主要是隆巴尔多）并且求助于另一种民粹主义。演讲结束时总是高呼"瓜达卢佩圣母万岁"和"处死西班牙移民"（这些西班牙移民再也不是奋进中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而是令人憎恨的共和国难民）。从阿维拉·卡马乔强调民族价值和指责共产主义来看，这些候选人的言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路易斯·冈萨雷斯在谈到"阿尔马桑可作为墨西哥革命党的候选人，阿维拉·卡马乔可作为国家统一革命党的候选人"[3]时，仅仅略有夸大。

卡德纳斯希望进行公开辩论和自由选举。他将不为党或国家强加一名继承人。他告诉一位同事，"如果人民想要阿尔马桑，他们可以得到他。"[4]这种态度如果有特点的话，就是新颖和冒险。随着阿尔马桑的竞选——在马德罗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集会支持下——开始展开，总统本人也许能保持平静，在选举之夜，他也许已承认反对派已经取胜和阿尔马桑应该就职。但是其他人看

---

① 亚杜兰（Adullam）为以色列中部古城，据《圣经》载，犹大曾居留该地。——译者

②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227页。

③ 亚杜兰（Adullam）为以色列中部古城，据《圣经》载，犹大曾居留该地。——译者

④ 根据路易斯·蒙特斯·德奥卡语，见E·D·路易斯的备忘录，1940年8月5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3818。

到他们的地位和政策受到威胁，表现了不十分民主的平静："革命在危急中"使得强硬措施有了理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采取了行动，力七符合宪法的工会，加强示威游行，进攻反对派指挥部，在不从命的组织里（诸如在墨西哥总工会和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里）策划内部造反。阿尔马桑分子抱怨抢劫和殴打；火车和集会遭到袭击，有时造成致命后果。政府拖延了对妇女选举权的立法，有理由担心妇女将会投反对派的票。肮脏的选举运动造成了1940年7月的一场肮脏的选举，那是在招致欺诈和暴力的规章下进行的。在全国，墨西哥革命党和国家统一革命党的派别为控制投票站而相争，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用武力占据了许多投票站。选举箱被偷走，出现许多受伤事件（仅在首都就有30人死亡），以及对官方违法乱纪的普遍不满。在阿尔马桑领地的首都蒙特雷，邮局职工，甚至囚犯，据说也被拖来投官方的票。官方以5.3万张对1.3万张获胜（国家统一革命党宣布获得6.3万张）。报界评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新的证据，表明墨西哥人民"缺乏民主能力"。卡德纳斯可能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如果说武力和欺骗是明显的话，那么广泛的群众参与也同样是明显的。类似坦皮科这样的城镇，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最多。①

最后结果是阿维拉·卡马乔获226万张选票，阿尔马桑获12.9万张。国家统一革命党宣布获250万张，这并无道理。阿尔马桑当然占据了官方控制比较困难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动员受冷遇的主要城市；但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一样，决定性的选票符合了政府的意愿，因此证实了内政部长在选举之夜向总统做的安慰性报告："农民的选票使选举结果有利于阿维拉·卡马乔。"②如马德罗在1910年那样，阿尔马桑退到了美国，他咒骂，他气愤。同

① 冈萨雷斯：《卡德纳斯总统的日子》，第302—303页；《世界报》，1940年7月8日；Rees，墨西哥城，1940年7月12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2619和附件。

② 梅丁：《思想与政治实践》，第222页。

样的情况是，阿尔马桑派的烈士萨尔索萨将军（他在警察试图逮捕他时被杀）被刻划成 1940 年的阿基莱斯·撒旦。但是这种相似情况并不长久。时代变了，阿尔马桑太精明——也太“肥胖、病态和富有”——以致不会去冒叛乱的风险。[①] 美国（正如阿莱曼在一次闪电访问时所说的）不会向阿尔马桑提供援助。阿尔马桑的联盟虽然广泛，但内部差异太大，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挑战（隆巴尔多害怕军队，但是阿维拉·卡马乔及其支持者已作好准备，卡德纳斯采取防范措施，调换了主要指挥，并亲自访问了阿尔马桑的北部地区；现在，隆巴尔多对军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担心取得了某种戏剧性计谋的效果）。在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里，搞叛乱必须是精心策化，而不是 1910 年唐吉诃德式的重演；墨西哥革命党政权不是波菲里奥政权。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不满并不意味着革命承诺。许多右翼分子（最主要的是蒙特雷集团）对挫伤政府感到满意。这在将来会引起注意。同样，产业工会讨好阿尔马桑，对革命的态度并不比对保守的民粹主义更具献身精神，虽然它们认为自己是即将上任的政府的目标。而新政府也并未忘记它们的反叛行为。因此，1940 年对卡德纳斯主义来讲，与其说是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悲哀的年份。这表明民主接班的希望是种幻想；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过程必须加以制造；卡德纳斯的改革固然产生了某些忠实的追随者（一些人出自坚信，一些人由于被收买），但也产生了可畏的对手，他们等待着采取攻势。

阿维拉·卡马乔竞选总统时强调妥协和国家团结，反对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②] 1940 年后，他继续强调这些主张。由于那年选举造成创伤和墨西哥进一步卷入大战以及战争造成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依赖美国，这些主张得到了加强。这位总统先生有计划地

---

① Rees，墨西哥城，1940 年 2 月 9 日，外文部文件，371/24217，A1654。

② Davidson，墨西哥城，1940 年 1 月 9 日，外交部文件，371/24217，A1301；普鲁吉特：《墨西哥报道》，第 191，221 页。

呼吁统一，以便促进生产、出口和工业化，抵制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1940年的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右翼都融进了官方政治(如果它们没有打入墨西哥革命党的话，它们遵循了政治比赛的规则，国家行动党、甚至全国联盟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同时，左派则发现自己成了工具——或牺牲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它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制止被一致的言词所掩盖了的向右转的趋势：土地改革衰退，对工人管理受到遏制，重新强调私人企业和商品农业，私人投资和外国投资大幅度增加（以减少工资为代价的利润增长），同教会和解以及取消社会主义教育。

当阿维拉·卡马乔执政时，与美国的缓和已经开始。使美国和墨西哥参战的1941—1942年的事件则加快了这一趋势。珍珠港事件后，墨西哥同轴心国断绝了关系，向美国海军提供了特权，从1942年1月起同美国在共同防御委员会进行合作。墨西哥的主要贡献仍然是经济方面的：总统在1942年发表的新年献辞中宣布要"为生产而战斗"。同年5月，"极权分子"（德国人）的潜艇在海湾击沉了墨西哥舰艇，引起了抗议。当这些抗议不被理睬后，墨西哥发表声明，宣布与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通过这一新颖的外交概念（没有正式宣战），墨西哥政府说明这是防御性的斗争，是突然降临在不愿作战的人民头上的。1942—1943年，大陆上的防卫，特别是西海岸，主导着墨西哥和美国的战略思想。军事合作很快就开始了，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即两国间历史上敌对和不平等关系的记录。对墨西哥来讲，武装力量的重新组织和现代化是优先考虑的问题。1942年，国家兵役制和民防制组建了起来。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了，卡德纳斯——已经负责重要的太平洋地区的指挥——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一措施平息了民族主义者的担心，即与美国的合作会走得太远和太快，这一措施还进一步加强了左派对战争的使命感和对将来的信心）。在长期棘手的关于美国在墨西哥的军事权利（雷达监视、降落、海军巡逻和指挥

网）的谈判中，前总统被证明是一位执拗的谈判者。同时，美国提供了墨西哥军队现代化所需的贷款。1940—1943年，军事开支缓慢减少的状况已有所扭转。新的装备在1942年9月16日一年一次的军事检阅中展示，以冀提高平民百姓和得到装备的将军们的热情。随着新装备的增加和战争局面的转变，这些将军参战的愿望增大了。因为在1943年初，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更重要的是）和中途岛之战的胜利，墨西哥防卫姿态失去了合理性。关于日本人突然袭击下加利福尼亚以及向南挺进的传统担心最后放下了。由于要求作战的将军、想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寻求一席之地的政客以及看到墨西哥参战有利于拉美其他国家和未来美墨关系的美国的鼓动，积极参战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一个空军中队——闻名的201号——被挑选去进行训练并被派到太平洋前线，在那里参加了1945年春季战斗。

这是一个重要的——从政府观点看是个成功的——象征性行动，虽然只有48名职业飞行人员参战。更为微妙的是全国征兵的问题，这暴露了官方对战争的承诺与民众对此抱漠视或敌视态度之间的鸿沟。应征的 '·兵未被送到前线，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厌恶服兵役的成见，并且这一问题由于在边界北部征召墨西哥公民参加美国军队一事而显得复杂了（根据政府协定的规定，有1.5万名墨西哥人被招入伍，后来其中10%的人伤亡）。这在墨西哥军队内部引起普遍的、往往是激烈的抗议。在这方面，原来的反革命天主教活动同新的、实际的不满混合起来（卡德纳斯在国防部的存在加剧了这种混合物）。电报线路被切断，军队卡车和军营遭到袭击，“消灭卡德纳斯和征兵”，“辛纳基主义万岁”，“瓜达卢佩圣母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空。在最大的事件中，300名叛乱分子与驻扎在普埃布拉州的军队开战。但是，随着官方保证征兵将不涉及去墨西哥之外的地方服务，抗议浪潮才消退；全国联盟　　早已被内部分裂和温和派领袖希望同政府和解所削弱——失去了其最后和最好的基础，趋向衰退。1944年，政府发布命令将其解散。

激烈的抗议是区分官方及民间对战争态度的唯一最极端的例子。墨西哥参战得到左翼（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墨西哥共产党）的赞成。出人意料和有意义的是，还得到天主教统治集团、大多数右翼报纸和国家行动党以及其他保守派组织的支持。类似1938年发生的那种两党民族主义因此重新恢复。然而，民意测验表明，连党员和官员也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普通老百姓没有赞同政府的主战态度，除非他恰好是忠实的左派。正如《时代》周刊简练地总结形势时所称，正是无组织的民众最不主战，最持怀疑态度。[1]如同以前的官方活动——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一样，主战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强加给持有怀疑的民众的。面对如此冷漠的反应和对第五纵队活动的担心（活动从未发生过），政府就采取控制和告诫手段。宪法保证被解除，内部监视加强，执政者被授予特别的权力。总的来说，这些手段有节制地用以消解批评。政府还开展了持续的宣传活动以赢得民众支持，因此战争为建立全国共识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政府为此作出了许诺。美国也为此作出了努力——不像在1938年作为外来敌人，而是作为民主伙伴和军事盟国。政界要人们参加了爱国团结的大合唱，从庄严地安葬一位被鱼雷击中的油轮《平原牧场号》的受难者开始，到1943年9月16日的军事检阅达到最高潮为止，共有6位前总统观看了军事检阅。卡德纳斯同卡列斯，当然还有阿维拉·卡马乔，并肩站立。新闻界虽受到法律限制，但因得到美国新闻纸慷慨供应的积极鼓励而立即采取了合作态度；街道标语和电影院（后者也受惠于美国的慷慨）一再宣传爱国主义、西半球团结和努力生产。墨西哥和美国的宣传渗透到了全国人民中，“冲淡了反美主义，首先鼓励团结一致，其次是坚持同盟国的事业。”[2] 因此，美国习俗的

① 托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墨西哥》，第85—86页。

② 托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墨西哥》，第104页。

渗透——被巴斯孔塞洛斯谴责多年的波丘语,[1] 30 年代随着公路、旅游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而加强了——在战争时期的墨西哥和欧洲进一步加快。可口可乐、嘉宝(美国著名影星——译者)、棕榄香皂和基督教新教似乎无处不在;新教徒(绝不是波丘语最有效的传播者)开始遇到天主教徒的强烈的对抗性反应。

战时宣传留下的具体印象难以估计,容易夸张。经济合作在改变墨西哥方式和联结两个邻国的命运方面更有效。这趋势也许能用统计数字来概括:1937—1938 年同欧洲的贸易占墨西哥外贸的 1/3;到 1946 年则下降至 5%(进口)和 2%(出口);1940 年美国进口 90%的墨西哥出口货物,1944 年向墨西哥提供 90%的进口货物。此外,墨西哥外贸增长相当快:出口额从 690 万比索(1939—1941 年平均数,以 1960 比索值计算)增长到 910 万(1943—1945 年),其中 110 万来自移民的汇款;进口额从 610 万增长到 910 万。在这一过程中,墨西哥从 1942—1943 年的有形贸易顺差下降到 1944 年的少量逆差(160 万比索),以后则增加为 1945 年的 280 万和 1948 年的 540 万。当美国控制放松,进口货物就大量涌入。随着贸易的增长,美国投资也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从一个依靠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向满足国内需求的相当规模的制造业经济的转化在战争期间加快了,虽然其结果是美国参与的加强以及空前的对外依附(有一段时间这种提法完全合适)。

在经济方面,如在军事方面一样,墨西哥和美国并没有轻易地建立起它们新的密切关系。工业化已是政府政策的关键项目,阿维拉、卡马乔、隆巴尔多以及其他人都予以强调,要以此作为扩大社会产品的手段,避免农业落后和减轻——如果不是逃避——贸易周期性盛衰的影响。与美国的合作为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捷径,但如果是为换取预想的经济自主,那只能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

① 掺杂着英语的西班牙语。——译者

合作。石油公司用战时合作的机会和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资金短缺来收回它们的财产的企图受到了抵制，即使外国贷款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同样，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墨西哥的长期目标）是艰难的，虽然最终是成功了。墨西哥自始至终寻求保护国内工业，同时还就降低美国关税、取得美国信贷、更容易地进口基本商品和某些原材料（因紧缺而受到美国战时控制）进行了谈判。而美国则寻求短期地和有保证地得到墨西哥主要资源（矿产、石油和人力），也许还要使墨西哥长期依附于美国经济。一项总的商业协定在 1942 年 12 月签订后，又补充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专门产品的具体协定。1943—1945 年间，墨西哥——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将美国贷款引进多种项目：钢铁，纸张，水坝，水力发电，水泥和化工。因此，卡德纳斯和罗斯福所赞赏的、但在 1938 年被搁置的合作，现在终于有了成果。然而，贷款的提供只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和数量：到 1946 年，美国将重点转向欧洲，主张私人机构有责任来满足墨西哥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使不断起伏的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浪潮产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战争也不那么明显地将危地马拉移民吸收到墨西哥南部，对当地劳工造成恶果）。成群的移民向南走，约 10 年后他们又回到北部——到 1942 年夏每月大约有 6000 移民到北方。他们来自墨西哥各地、不同行业和不同背景，大部分是年轻人和未婚者，而许多人有职业，有技术，甚至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双方政府都寻求控制这一自发的潮流：美国人为了向发展迅速的战争经济提供足够的劳力；墨西哥人则为了防止国内劳工短缺和半心半意的美国当局所不能阻止的对移民工人的虐待。1942 年，雇工的数量和条件由政府协议规定。但是，当正式开始招工时，求职的人如此之多，以致办公室被求职者包围；1944 年 3 月，3000 人聚集在墨西哥城的国家体育场，要求得到宝贵的外出打工许可证。一年后，政府计划准许 12 万多工人外出打工。这些人的汇款占了国家外汇收入总数的 13%。然而

非法移民的流动率却相同（1944年后随着美国需要的下降，移民被一再驱逐，但移民人数仍达每月7000人）。1945—1946年，官方定额不断减少；打工者和被驱逐者都被赶向南方，他们挤在边境或者拥挤在圣迭戈和因皮里尔河谷的贫民窟里。许多人回到南方只是短期的，因为繁荣复苏不久又把合法与非法移民拉回到北方的田野和工厂。

同美国的经济合作因此有利于阿维拉·卡马乔的工业化、社会和解和全国共识的计划。反过来这些都要求总统在分配权力和制定政策时采取明显的平衡手段。他必须表现出“两面讨好”，而不是“党派色采浓厚”。[①] 新内阁较好地平衡了左派和右派；在国会，左倾的众议院与保守的参议院旗鼓相当。但是，就像以前卡德纳斯被推向左翼一样，他的继承人被形势和趋势所迫而走向了右翼。在教育方面，“社会主义”在退却，首先在精神上，然后在名称上。在新部长贝哈尔·巴斯克斯的领导下（1941—1943年），所谓的爱情学校（同巴索尔斯的性教育毫不相干）正式地代替了社会主义学校；现在，教育是为拥护政府的止痛口号服务。共产主义者教师被除掉了。保守派和天主教组织对此发展感到高兴，并且对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官方右翼在总统兄弟马克西米诺的庇护下，也控制了交通部。该部的负责人培植了其当选总统的野心，使之与隆巴尔多及其他激进派为敌，并且（据说）制定了阉割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庞大计划。在各州也是如此。州长选举也向右转（到1945年，31名州长中只有8名被认为是卡德纳斯派的）。在国会，辩论、选举和任命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保守派的信心和攻击性，那是最高领袖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官方右翼——随着马克西米诺·阿维拉·卡马乔和阿韦拉多·罗德里格斯影响的增大，提出了一种新的与政府路线相一致的论点。这一路线对团结、民主和打败法西斯主义表示关注，但又极力反对

---

① Bateman，墨西哥城，1944年2月14日，外交部，371/38312，AN798。

共产主义，批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企图用同样醒目的红色来描绘卡德纳斯主义。的确，当时有些不正当的作法企图使卡德纳斯难堪，以及存在反对隆巴尔多的肮脏的新闻宣传。左翼发现在这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行政当局的手正在伸向他们。[1]面对这样的挑衅，左翼并不是毫无力量：总统只得向左翼做些让步（比如，1944年将经济部长交给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处置）；并且左翼也有其一套肮脏的手段（诸如巧妙设计的对前锡那罗亚州州长马西亚斯·巴伦苏埃拉的军事审判）。国立大学同样是谨慎的、搞政治平衡的场所。大多数政客都服从于国家共识，紧紧抓住国家共识，就使得公开的思想交战较为困难，其结果是肮脏的内部争斗。在这方面，执政当局由于控制着法庭、选举机器以及其附属机构，因面比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政治气候和手段都在发生变化。

尽管总统采取了审慎的平衡手法，但1943年国会竞选中所表现出的肯定是在向右转。就部分来说，这同总统希望在立法机构建立一个牢靠的、中右的追随派别相吻合。他这样做有一个十分方便的工具：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CNOP）。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松散的混合体，现在成了特定政治阶级的体制性代表，一般来说指的是中产阶级（一个被官方舆论不断吹捧的阶级）。它也被证明是行政当局的忠实工具，是对付官方左翼（主要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曾在1940年扰乱墨西哥革命党计谋的中产阶级反对派的抗衡力量。这在1943年的国会选举中已很清楚。此次选举是在匆忙之中以通常的安排进行的。在144名墨西哥革命党候选人中，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有56名（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获得21席），官方之外的极端分子均落选。共产党人和巴索尔斯的政治行动联盟未获席位；墨西哥共产党无可奈何地以战时要保持一致的名义再

---

① 梅迪纳：《卡德纳斯主义与阿维拉·卡马乔主义》，第163—172页，222—224页。

次接受这一逆转的结果，而没有像巴索尔斯那样激烈地表示抗议。国家行动党——提出了一批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中产阶层候选人（左翼关于法西斯的断言现已过时）——也同样感到失望。的确，当政府本身“变温和”和卡德纳斯主义挑衅已成为过去时，激进的右翼发现其得人心的呼吁也正在很快地消失。

官方左翼也在改变。1943年，坚定的卡德纳斯分子格拉西亚诺·桑切斯退出全国农民联合会领导机构，转而支持加夫列尔·莱瓦·贝拉斯克斯，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又是忠诚的阿维拉·卡马乔分子，共产党的死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竭力抑制罢工，保护经济生产（有人认为，它是非做不可。因为如果合作不成的话，政府有权进行压服）。1942年6月它加入了对立的联盟，签署了《劳工法》。该法公开放弃罢工，要求对纠纷进行迅速的裁决。作为回报，政府于1943年制定了一部社会保险法，并已开始执行——虽然有争议。现在，隆巴尔多以典型的花言巧语退出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职位，忙于使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CTAC）参加同盟国的事业。自从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在1938年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主席。他的影响仍在，虽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持久；他利用其影响来支持他的接班人贝拉斯克斯，以反对共产党分子和持不同政见的隆巴尔多分子。官方左翼因此容忍了政府内部不断增长的保守派影响和复活的右派中伤言论。团结仍然是口号。

随着左翼沉默下来和阿维拉·卡马乔权威的提高，卡马乔能够通过与美国合作来执行其选择的工业化政策。当然，工业化在独立后已得到卢卡斯·阿拉曼的支持，以及波菲里奥·迪亚斯、卡列斯和卡德纳斯的拥护。尽管卡德纳斯推行了改革，工业化在30年代仍有发展，但是战争的独特环境看起来使事情不寻常地顺利。社会休战和《劳工法》给工业部门创造了平和的气氛。而美国（对墨西哥的需要给予了新的满足）提供了市场和在一定条件下提供了资本货和投资。1940年向私人企业提出的诺言在不断的口头

保证和众多的实际措施中得到兑现：撤消超额利润税、发展国家金融业作为工业财政的主要来源，保持递减的财政制度，慷慨的税收优惠和关税保护，以及建立一个反对劳工的最高法院。1940—1946年，以比索不变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了43%（如果包括建筑业，为59%：特别是墨西哥城的建筑业兴旺发达），食品、纺织、化工和金属尤其突出。制造业的投资增加了5倍。制造商获得了高额利润，在1941—1942年之间达到占投入资金的18%。这样，收益对劳力与资本之比从1939年的52∶48变为1946年的39∶61。1942年，蒙特雷集团相信总统"不会继续其前任的劳工政策"；这种信心（正如仲裁所表明的）不是没有道理的。[①] 国家行动党承担了忠诚的基督教民主党反对派的作用，这并不是完全因为对同盟国事业的热情。

然而随着6年时期接近尾声，经济形势却恶化了。通货膨胀加剧，利润增加（1945—1946年是工业兴旺的时期），但也招致了新的劳工不满。劳工的不满是不能靠爱国的呼吁轻易地平息的。从美国进口的增加帮助了资本货的供应，但却危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和墨西哥新建的工业。工业资产阶级——现以空前的程度组织起来——作出了两种反应。以全国加工工业联合会为主的新生制造业的代表赞成与劳工达成共同协议，对劳工纠纷共同裁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关系、关税保护以及对外国投资制定周密管理。在这基础上，全国加工工业联合会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达成了协议（1945年3月），用模糊的词语重申了过去战争时代为生产而结成的联盟。但资深的商业组织——特别是蒙特雷集团控制的墨西哥共和国企业主联合会——不同意与劳工联系在一起（他们从未支持过劳工法），主张用更严厉的法律来阻止罢工，坚持传统的放任自流的政府作用。在战争中诞生的商业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强大，但又是分裂的，其中大部分主张充满活力的、自

① 梅迪纳：《卡德纳斯主义与阿维拉·卡马乔主义》，第300页。

由企业的保守主义政策。

在通货膨胀加剧时，劳工们对政府和工会加在他们身上的约束感到愤怒。到 1942 年，由于和美国的关系，加上国内因素（人口增长、政府赤字和 1943—1945 年歉收），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并远远超过了引起关注的 30 年代后期的水平。生活费用指数（1939 年为 100）从 1942 年的 121 上升到 1944 年的 198 和 1946 年的 265，粮食和基本消费品首当其冲（同时零售价格在 1940 年到 1946 年间上升了 2⅔倍，玉米价格上涨了 3 倍，豆类和肉类价格则达到 4 倍）。而官方的反措施却远远不如 1938—1939 年期间那样有效。从 1941 年开始，政府就采取措施限制货币发行量，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阻止物价上涨。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黑市都证明上述措施都失败了。墨西哥参战后所采取的进一步的控制措施和处罚也都无济于事。私人企业发了财，对紧缩措施吹毛求疵，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则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增加工资。工资问题十分尖锐，在 1940—1946 年期间，物价涨了将近 3 倍，而最低工资增加不到一倍；1946—1947 年实际工资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工业部门工资下降了几乎 1/4，其他部门则更严重。老百姓的艰苦与战争暴发户——特权阶级的唯一想法就是在战争结束前尽快发财——的大肆挥霍形成了鲜明对照①。总统及其继承人无法回避这个现象。1942—1943 年，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合理的不满得到辛纳基分子、街头示威者以及日益增多的罢工（往往是无组织的罢工）的支持。在蒙特雷，人们焚烧公共汽车以抗议车费上涨；到 1944 年，排队购买食品和反饥饿游行已司空见惯。甚至新确立的、旨在安抚劳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也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从微薄工资中再扣除一部分作为保险金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的骚乱。最严重的一次是于 1944 年 7 月发生于墨西哥城。1943—1944 年正式和非正式的罢工增加了，旨在

① Cheetham，墨西哥城，1944 年 1 月 10 日，外交部文件，371/38312，AN293。

收买工业大工会而先下手增加工资的做法也增加了。大工会的成员在对付通货膨胀中得到比大部分农业职工和白领工人较好的保护。后者由于战时物品（如石油、橡胶）紧缺和城市服务（交通、电力供应）减少而处境更为困难。有的人——在损害公共道德的情况下——在贿赂中寻求补偿。[1]

劳工也开始对"社会休战"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这种"社会休战"就是一种在牺牲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利润的手段。面对重新燃起的战斗情绪，政府发现隆巴尔多可作为其盟友。他对共识的承诺已从战术发展成了信仰。因为曾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威胁正在消失。隆巴尔多现在主张工人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1945 年 3 月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与全国加工工业联合会达成的协议好像预示了这一点。但全国加工工业联合会并不能代表整个墨西哥的商界。蒙特雷集团则无时间去签订条约，并且对劳工的战斗性毫无兴趣。1946 年夏在蒙特雷玻璃器皿厂发生的一次重大纠纷中，蒙特雷集团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发生了冲突。整个城市几乎瘫痪，险些造成总罢工。总统的干预才使局势平静下来，但问题到阿维拉·卡马乔离任时也未解决。他给其继承者留下了一个高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下降和重新燃起工业冲突的局面。

农业也和工业一样，政府声称持中立立场，对村社财产和私人财产一视同仁。但实际上，作为卡德纳斯计划中心的村社只起了次要作用，而且其内部运行也改变了。新的做法在某些方面是抵制卡德纳斯主义的，在某些方面是对辛纳基主义和阿尔马桑主义的响应，而在另一些方面是对提高农业生产以满足消费和出口需要的承认（由于战争引起的物品缺乏和通货膨胀，这一需要就更为突出）。更多的私人土地得到保护，甚至 1942 年的《土地

---

[1] Cheetham，墨西哥城，1944 年 1 月 10 日，外交部文件，371/38312，AN293；莱斯利·伯德·辛普森：《很多墨西哥》，第 4 版（伯克利，1971），第 342—344 页。

法》中所规定的给私营农户的新让步也被认为是政府沿海殖民化计划的刺激措施："向海洋进军"。卡德纳斯向小业主提出的不搞没收的保证得到扩大，私人地主不同程度地从政府对灌溉的主要投资、从现有的公共信贷以及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尽管对土地的分配没有停止，但其速度却比卡德纳斯年代减慢了 2/3。所分配的土地质量也差（一些受益者拒绝接受），政府拖延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伟大的总统倡议和对古老大庄园进行肢解的时期已经结束。地主们欣慰的是他们可指望中央政府持中立态度，即便不是积极支持——从历史上讲，中央政府是决定改革进程的关键因素。随着最高领袖的老一套做法——高利贷、变相分割财产、白卫团和暴力——得以恢复，诉讼再次变得冗长、昂贵和腐败。考虑恢复农业保护（地主合法保护的一个关键武器），并且在新政府上台后得到执行。随着全国农民联合会朝着领袖统治和收买的方向转变，村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忠于总统或总督的追随者，而私人地主们则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组织了起来。

村民们现在面临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这加剧了他们作为追随者的依赖性：缺少信贷，政治上的歧视（集体村社是经常性目标），甚至村社土地的直接丧失，特别是在因旅游业或城市化而土地价格上涨的地方（如格雷罗州）。尽管不是绝对的，但相对地讲，村社的规模开始逐渐缩小。由于政府鼓励将合作社拆散（这是普遍的要求并得到从辛纳基全国联盟到墨西哥共产党的广泛政治支持），这些村社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合算的地方（如有利可图：一些合作村社生产效率高，为出口作出贡献），合作社形式得以保留；但是现在它们却受制于全球市场，受到极力促进出口的政府和日益严重的官方腐败风气的支配。糖业合作社不得不遵守那些有利于私人蔗糖厂的规章；在尤卡坦，战争时期对生产的要求使得庄园主们名正言顺地收回了那些刺耳的机器（正如一名地主所称的那样，抢夺村民们的钱不是犯罪，因为村民自己就是强盗）。随着农村权贵实施控制，内部分化加快了。村民

们一部分成了相对富裕的阶层，大部分则成了半无产阶级，其数量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庞大起来。

农民们对这些变化的反抗因战争年代社会停滞，地主在政治上的重新活动和全国农民联合会的软弱无能而受挫。另外，劳动的季节性和内部迁移也使这些反抗减弱了势头。因此，曾在1941—1942年很突出的夺地运动从那时以后减少了。但在一些传统斗争区域里，如在拉古纳和莫雷洛斯，抗议在继续。在那里，鲁文·哈拉米略的游击队自1943年后开始活跃起来，要求继续改革并向现存的村社提供保障。但这些斗争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相适应。总统本人以及40年代的新专家治国论者所强调的是生产力和利润，认为私营农业优越于村社——进而工业优越于农业——这表明自3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深刻的思想转变。他们的目标看来是达到了。在6年中，农业产量以实际价格计算每年增长3.5%（工业也是如此）。收益来自提高生产力而不是扩大耕种面积；出口增长更快。私营农业和村社农业都做出了贡献：前者包括"新的大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那些受惠于可靠的土地使用权、增长的需求和较好的公路网的牧主们。社会和经济计划从其本身来讲再也不是卡德纳斯政策的关键了。村社快速地成为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工业经济的生产附属物，村民们则成了执政党温顺的追随者。

阿维拉·卡马乔的总统任期在通货膨胀、村社衰落、工业发展和对美国的空前依赖中结束。左派（不仅是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希望能东山再起。而右翼（包括正在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对日益增长的劳工的战斗性表示出厌恶，企图遏制工会和左派，以保证工业继续发展并使阿维拉·卡马乔派不会成为激进主义较量中的间隙，而成为把以前危险的卡德纳斯主义与今后稳定的保守主义相连接的桥梁。看来双方都有许多东西可利用，而他们在1946—1949年间冲突的结果将决定墨西哥今后一代人的前途。

总统继承问题——早在1942年就加快刺激了个人的抱负——集中在两名追求者身上：米格尔·阿莱曼，原韦拉克鲁斯州

州长，阿维拉·卡马乔在1940年竞选时的总管，当时的内务部长(那时该部开始被视为总统的摇篮)；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一位老卡列斯分子，墨西哥驻美国大使，是墨美重新开始缓和的主要倡导者。两人都是文官；战争年代军队的职业化给了专制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左翼候选人——哈维尔·罗霍·戈麦斯和米格尔·恩里克斯·古斯曼——在阿维拉·卡马乔表现出倾向阿莱曼之前扮演了短暂的、不光彩的角色，而卡德纳斯和大部分州长赞同了总统的选择。左派最好接受这一不可扭转的决定，他们实际上是这样做了，隆巴尔多为此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诡辩。到1945年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全国农民联合会、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甚至墨西哥共产党都赞同阿莱曼，而帕迪利亚只好扮演一名独立候选人的角色，得到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政党的支持。

回顾一下，左翼的赞同看起来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也许抵抗是无用的，因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不得人心，他们靠比赛规则而不是靠抵制规则来保持权力。但是当代人对阿莱曼的评价与后来人对其评价是不同的。他是中间派候选人，而帕迪利亚是右翼候选人。和阿维拉·卡马乔一样，他主张温和的民粹主义，他也许诺将政党民主化。对私营企业，他再次给予安抚，提出结束战时管制，但他也强调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对解决供应不足和通货膨胀问题的责任。虽然他的保证中提到外国投资，但阿莱曼被认为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候选人，他抵制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甚至美国人也这么看)。虽然这是一个误解，但对隆巴尔多却是好听的。即将离任的总统劝他把成立一个新的隆巴尔多式左翼政党的打算推迟到大选结束以后。阿莱曼表面上的民族主义使得左翼最终与其建立痛苦的联系有了初步的意识形态色彩。

虽然阿莱曼的胜利已无问题，但仍有必要使选举进程增加点民主合法性，以避免1940年的事件重演。因而需要制定一项新的选举法，使各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更严密地组织起来，并加强联邦对选举的监督。这将阻止1940年出现的权力分散所造成的混乱

和冲突，加强官方对反对派的控制以及总统作为大选举人的作用。执政党遵守了新的条例，将墨西哥革命党最终改成了革命制度党(PRI)。这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其中关于内部民主的许诺主要就是把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权力削弱。根据这一新法规，1946年的选举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平时常有的胡闹和反对派的埋怨。不管是帕迪利亚，还是分裂的独立左派，或者是右派——国家行动党和辛纳基派的新政党人民军——都不能提出像阿尔马桑6年前所发动的挑战。阿莱曼以78%的得票率，这一巨大优势获胜。

这样当选的新总统就不需要像其前任那样去两面讨好。他的内阁是由年轻人组成的，其中大部分人像总统本人一样，都十分年轻，因而不能被称为是革命先辈。班子里有4位实业家，被认为证明新的资产阶级权力在党内的存在。只有两位部长是军人。随着卡德纳斯派州长们继续（有时以法制手段）被排挤，事情日益清楚，权力已转移到新的、专家治国论的一代人手中。对这些人来讲，革命与其说是个人经历，还不如说是适宜的神话。他们的高升是和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的崛起同步的。随着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衰落，他们掌握了党的政治方向，决定日常的政策（就像军队过去做的那样），并且成了总统权力的坚强基础。大规模的腐败也同时伴随而生。现在，不是20年代或30年代，政府才具备其特有的当代特征：总统的杰出才能，对执政党的政治垄断，对群众组织的巧妙操纵，在民族主义的溶剂中淡化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卡德纳斯主义的思想和机制现在则有了新的目的。阿莱曼上任之日，正是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无所不在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时。首先是因为在国内所进行的新的采购。以前，革命的墨西哥不得不与那些模糊地表示同情、有时则企图进行干预的白宫自由派人士（威尔逊、罗斯福）或者与那些厌恶情绪因商人式的谨慎而有所缓和的保守主义务实派人士（塔夫脱、柯立

乏）作斗争。现在，墨西哥面对着的是杜鲁门的美国，是杜鲁门主义，是"遏制"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48号决议；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成了有计划干涉、施加压力和收买政策的基础。罗斯福执政时，美国已经表示出急于将战时建立的军事合作持续到和平年代；在1945年召开的查普特佩克会议上，它迫使会议接受其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以此继续保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被看作是一位带刺的民族主义者阿莱曼不厌其烦地向美国保证，许诺继续进行经济合作，并迎合冷战的新偏见。就此他定了6年的调子。在这期间，反共与传统的民族主义论调搀和在一起，并且以新的民主与共产主义两极分化的论调提出来，这成了墨西哥政治的主题，并"上升为官方理论"。[①] 革命的传统排除了较粗野的麦卡锡主义的形式，但它也成了反共的意识形态上的最佳防卫，就像以前年代那样把法西斯主义描述成危险的外来货。这样，在墨西哥就像在欧洲一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讨伐察觉不到地演变成了对共产主义的民主讨伐。正如30年代初那样，政治气候快速地变化，使左派力量削弱，处于守势，而右翼则体面地主导了新的、称之为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阿莱曼的反共态度很快得到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如费尔南多·阿米尔帕、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元老和菲德尔·贝拉斯克斯的密友的响应。另外，还得到那些指责共产党小组在大产业工会中搞颠覆的企业代言人如墨西哥共和国企业主联合会（COPARMEX）的响应。当隆巴尔多对其新的左翼党进行修补、主要工会表现出新的战斗性以及当然在国际政治气候正很快地变冷的时期，反共运动显得尤其有成效。阿莱曼政府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成就却是消极的：它孤立并阉割了左翼，掀起了反对有组织劳工的浪潮。

隆巴尔多谦虚地推迟了新党的成立，成立一个由进步组织组

① 路易斯·梅迪纳：《1940—1952年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史：文官政府和独裁的现代化》（墨西哥城，1979），第110页。

成的民族主义的广泛反帝联盟，设法继续其原来的隆巴尔多主义计划，在执政党以外，但也不在反对党内。然而，革命制度党并不欣赏这种同志式的较量，共产党人也不表同情。最后，人民党于 1948 年 6 月成立了。它包括了官方左翼成员（隆巴尔多、巴索尔斯、里韦拉）及一些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的纲领。但是就像 1949 年选举所表明的那样，革命制度党与人民党不相往来，隆巴尔多（1952 年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也受到动摇）被广泛地视为斯大林的追随者，或干脆是他的工具，被“莫斯科金钱所收买”。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最初勉强地支持隆巴尔多，期望他能合作反对独立工会，现在则也开始反对他，指责他。这与它当时不断的完全反共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1933 年，隆巴尔多成功地建立了分裂出来的墨西哥工人与农民总联合会。但自那以后，时代已变了。迅速成熟的执政党已完全有能力迎接这种挑战。政府与有组织劳工的对抗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战争年代长期的合作和通货膨胀留下来的是分裂、不满和越积越多的要求。隆巴尔多期望对此加以利用。特别是主要工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继续唯唯诺诺的态度感到不满。到 1947 年，这些工会准备向其领导人摊牌，而这些领导人反过来则依靠一些小的工会和联盟的支持。1937 年的分裂现在又出现了，而且由于战争年代的发展趋势而更趋严重，并被称为是反对无限期连任制的“清洗”（就是变革和斗争）。政府决定要实行工业化，不能与工会的战斗性妥协；而隆巴尔多影响的削弱已不能使他发挥以往的仲裁作用。这将使与有组织劳工的对抗更为尖锐。因而，1938—1946 年发生的非决定性的小磨擦演变成了 1947—1949 年的公开冲突。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受到的挑战被惯用的操纵选举的办法避开了。这样，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转而倾向于无限期连任制和领袖至上，并对右翼政府总的表示了不加批评的支持，这种做法以民族主义和不走极端（即反对左派也反对帝国主义）来自圆其

说。那些仍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一起的斗士（包括一些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者）失去了所有的权力。而那些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残余分子也都被清除一空。搞总罢工的战术被否定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老口号——“争取无阶级社会”——被民族主义的空调子“争取墨西哥的解放”所取代。① 作为回答，铁路职工首先退出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然后还有电力工人、电车工人和一些小工会（1947 年 3 月）。他们的新工会——工人统一联合会——很快就得到其他主要的不同政见者、石油工人和矿工的支持。他们之间签订了一项团结协议，形成了一个墨西哥三方同盟，公开抵制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它的“反共破旗”。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解体进一步发展。由于内部分歧和排挤，一个对立的中间派组织于 1948 年出现了，名为墨西哥农村工人联盟（AOCM）。其中农民成份，特别是拉古纳的村民占多数。在遭到这些对立者的反对以及人数处在劣势的情况下，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面临着自 1937 年以来最大的考验。现在无论是隆巴尔多，还是莫斯科，甚至政府（想获得胜利而不是妥协），都不愿促成和解。

冲突的关键是主要的独立工会——石油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前者在 6 年间的第一个月举行了罢工（这是战争年代里工业中零星冲突发展的最高峰）。政府宣布罢工为非法，并出动军队，用强制仲裁解决问题。由于反应不一，工会接受了新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墨西哥石油公司得以稳定工资额，从管理上加强控制（政府因急于提高生产和获得美国贷款，完全同意这两条）。在以后的工会内部争权斗争中，政府力求使各方合作和领袖至上保持领先地位。政府也想对铁路实行类似的合理化措施。这在 1948 年曾是政府主要关注的问题。工会再次发生了分裂，政府代表极力反共的赫苏斯·迪亚斯·德莱昂派（江湖帮）对此进行干预。其

① 路易斯·梅迪纳：《1940—1952 年时期的墨西哥革命史：文官政府和独裁的现代化》（墨西哥城，1979），第 132 页。

主要对手因腐败受到有力的指控而入狱。独立工会的分会被接管，共产党人逐一被赶走。随着工会的独立性被破坏以及江湖帮掌权，政府可以用大规模裁减和降低工资相威胁，放手重新整顿铁路了。但新工会的领导却面对一个传统的难题：官方劳工官僚（这几乎伴随着非德尔·贝拉斯克斯一个多世代的时间）。虽然迪亚斯·德·莱昂的“道德化”运动为其争得了一些真正的支持，但他毕竟是政府抬出来的，因此，他和政府都不得不保持一种工人代表和合作的伪装。仅靠强制手段是不能管好铁路的。所以继高压之后是谈判和新的集体合同（1949）。合同将减少成本与提供就业的法律保护相结合。所以领导才干被认为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的。对很多人来讲，这似乎要比冒险的、堂吉诃德式的斗争性更可取些。1947年，一位劳工领袖曾说：“情愿要一个坏的、但至少得到执行的集体合同（坏是约束了我们的权利），也不要一个只是纸上谈兵的好合同”。[①] 这道破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以后几十年里成功的秘密所在。用另外的说法，阿莱曼的反革命行径——击败了那些反对阿莱曼计划的激进分子、工团主义分子和卡德纳斯分子——毕竟是一个比以后在拉美其他地方实行的较有理论但却用直接军事高压手段的做法更为精巧和温和得多的。

由于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的独立性受损，其他产业工会——矿工、石油工人、电力工人等工会——的事业也萎缩了下去。它们对高压表示抗议，但没有举行罢工。只有矿工和分裂出来的石油工人后来又归属到新的隆巴尔多派的中央联合会——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后者与其政治同伴人民党一样，很快就成了易于受政府敌意攻击的目标。它没有得到承认，它赞同的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其所属机构遇到了内部麻烦和哗变，其农民成员受

① 石油工人工会的埃尔南德斯·阿夫雷格，摘自罗萨莉亚·佩雷斯·利纳雷斯的《七十年中十年的工会领导才干》，石油工会，摘自《墨西哥工人阶级发展史》（墨西哥城，1981），第172页。

到全国农民联合会和村社官僚的拉拢。石油工人工会曾被江湖帮牢牢掌握着，但后来也回归墨西哥工人联合会（1951 年），为其他所属工会的仿效作了先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就这样在付出一定代价后又掌握了控制权。随着独立左翼被阉割，而激进的右翼不是消失就是很快地变为基督教民主主义反对派，革命制度党的和平得以维持下来。政府可以按照其选择的工业发展和资金积累的形式行事，而不用担心大的社会动员。从全国来讲，1949 年显示了“自 1946 年起……完全不同的全景”；各地也是如此。40 年代后期“一个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模式逐步定型并保持到今日”。[①]如果说革命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热月，那是当时的事。1938 年后，卡德纳斯式的试验越来越受到控制，而现在已被那些聪明地发现旧试验设备有新用途的人们彻底终止了。或换个比喻说，在阿莱曼执政的 6 年内，那些头脑里充满着现代化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尽快致富的道德观的公民和专家们，在卡德纳斯主义的废墟中发掘并利用其材料——社团政党、群众组织、强大的行政机构、听话的军队和服从的农民——来建设一个新的墨西哥。材料是卡德纳斯的，但蓝图是他们自己绘制的。它已建成并将长久存在下去。

① 石油工人工会的埃尔南德斯·阿夫雷格，摘自罗萨莉亚·佩雷斯·利纳雷斯的《七十年中十年的工会领导才干》，石油工会，摘自《墨西哥工人阶级发展史》（墨西哥城，1981），第 94 页；本杰明：《通向极权主义国家》，第 268 页。

第2章

1946年以来的墨西哥

墨西哥是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稳定的突出样板。自19世纪末以来没有成功的军事政变，自1910—1920年的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政变企图。总统职位的继承已变成半官方政党革命制度党内部斯文的谈判。该党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控制着选举舞台。文人已经获得对统治机关的控制。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共识看来占据了优势，在武装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制订的1917年宪法继续赋予现政权以合法性的色彩。在宣称继承革命传统和建立起对政权机构实际垄断的同时，墨西哥政府看来一直平静、稳定并（按其自己的方式）有效地运行着。随之获得的政治稳定被誉为战后的“墨西哥奇迹”。

的确，墨西哥政治稳定的概念以一种不言而喻的连续性推断、以一种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的观念浸透于许多论述当代墨西哥的学术著作之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没有表达出来的假定，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墨西哥政治很少发生变化，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权力机制的运转，而不是集中于历史事件或孤立的偶发事件；现有的大多数著作显示出一般和抽象的特点。这或许说明了所谓的政治学“制度分析”所固有的偏向性之一：注重政治制度的保持而不注意变革的方式。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战后的墨西哥看起来通常是平淡和单维的。

为弥补这一不平衡，本章将顾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墨西哥政治变革的经验和社会经济背景。这些年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

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后期，是当代制度的界定和巩固时期；第二阶段，从50年代后期（或许）到70年代初，是统治与霸权时期；第三阶段，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是制度紧张和权力下降时期。因为确切的日期是难于确定的，所以这样一种分期仅为分析政治变革提供一个总的指导。应该强调，政治变革本身就是一个无定形的概念。在这个系列的一端，它可以指政权的改变，如从民主到独裁；在另一端，它可以指自我调整的方式，这种调整通常有助于使一个政权长久存在。然而，这里将把注意力置于居中的水平上，置于墨西哥整个当代一直保有的专制政权及其内部质和量的转变上。为此，对现制度满足稳定的先决条件的能力进行评估是必要的，这些先决条件就是政治平衡、经济增长以及与美国修好。这些先决条件依次取决于若干重大的因素：（1）统治联盟的构成；（2）统治联盟的凝聚力；（3）统治联盟的合法性和权力；（4）政策取向；（5）该制度各选民集团的行动、呼应和反应。

战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总的看法

考虑到墨西哥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政治稳定的实现更加令人瞩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墨西哥经济经历了两次根本转变，一次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另一次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特征。第一阶段是随着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1876—1911）政权的稳固出现的。作为经济事务上的自由主义者，迪亚斯把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加强墨西哥与外部世界的商业联系。受铁路系统建设的推动，1877—1910年间，对外贸易额增长了9倍。除了银和金外，墨西哥开始出口铜和锌这些工业用矿石（主要产自北方），畜牧产品（也出自北方），糖（产于中南部地区）和纤维制品，特别是出自尤卡坦的龙舌兰纤维。石油生产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是世界石油的主要来源之一。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墨西哥实行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出口原材料，进

口制成品。美国成为该国投资和贸易的主要来源，到1910年庆祝其独立100周年时，许多观察家认为墨西哥正向长期的繁荣迈进。然而，这一年爆发了革命，这场革命在人力和经济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随后，在20年代，其经济恢复开始加快之时，世界大萧条降临了。投资停止，贸易大幅度下降。与1925年相比，1930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2.5%。墨西哥经济受美国经济的影响，30年代也被证明是艰巨的10年。

墨西哥领导人于是采取了一个新方针。他们不再依赖国际贸易，因为这种贸易使该国易受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经济动向的损害，他们开始支持工业化。墨西哥不再从国外进口制成品，而是着手自己生产国内消费品。另外，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于1938年没收了由外国资本所拥有的石油公司，并将其置于国营的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控制之下，该公司最终成为该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从美国的进口减少，从而为墨西哥工业的初步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政府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进口限额和关税把外来的竞争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1948—1949年（及后来1954年）的比索贬值阻止了墨西哥的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汇率由4.85比索兑换1美元上升到12.50比索）。其结果是推动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并出现了新生的杰出实业家的骨干。

按某些标准，墨西哥的进口替代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1940—196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217亿比索增加到743亿比索（按195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这样考虑到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年均增长6.4%。60年代，墨西哥设法保持了这一增长水平——尽管它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取得了年人均3.3%的稳定增长率。到70年代下半期，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4，如表2—1所示，从总体上看，工业部门占全国产出量的38.5%。正是这一成就开始被认为是“墨西哥奇迹”，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里

具有样板性的经济进步与政治稳定的结合。

墨西哥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也受到了限制。保护主义政策有助于本地工业把外来的竞争排挤出消费市场。到1950年，非耐用消费品最终价值只有7%从国外进口。墨西哥在诸如燃料和纺织品这类中间产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资本货部门(技术和重型机器）所取得的进步相当小，其进口只由1950年占总额的74%降到了1969年的51%，此后大体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墨西哥的工业发展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其费用只能由出口来负担。尽管墨西哥力争自给自足，但它仍依赖于国际贸易。

表2—1　　1960年和1979年的生产结构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60年	1979年
农业	16.2	9.0
工业		
制造业	19.3	24.9
矿业	4.2	5.2
建筑业	4.8	6.6
公用事业	0.8	1.8
（工业小计）	(29.1)	(38.5)
服务业及其他		
交通运输与通讯	2.7	3.6
商业	28.6	26.7
住房建筑及其他	24.1	22.3
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1970年，10亿美元）	16.2	51.2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统计辑要》第21期（洛杉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美中心，1983年）。

第二个弱点源自长时期的资本短缺。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一些当地的企业家，如蒙特雷市的企业家，设法筹集了工业发展的相当份额的资金。墨西哥政府同样起着一种指导作用，它通过国家金融公司（NAFINSA）这类信贷机构扩大贷款，建立了一大批由政府管理的公司。外国资本依然构成资金的另一个来源。到

1970年，外国直接投资总计近30亿美元，其中80%来自美国。与以前的几十年不同的是（那时矿业、通讯和运输业是外国投资者的主要活动场所），这些投资有近3/4（73.8%）是在制造业部门，大部分集中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化学制品、石油化学制品、橡胶、机械和工业设备。再一个途径是从国际信贷市场获得资金。60年代期间，墨西哥开始谨慎地从国外举借资本，到1970年，该国累积外债（既包括公共债务又包括私人债务）约32亿美元。随后的各届政府更加放开，到70年代中期，外债接近170亿美元。这一负担的影响取决于墨西哥的清偿能力。随着债务的继续增加——1982年逾800亿美元，到1987年超过1000亿美元——其代价变得异常沉重。

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第三个后果，也是自相矛盾的后果是普遍失业。该国的工业部门是资本密集型部门，而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生产的增长往往出自机器和技术上的投资，而不是来自雇佣更多的工人（相比之下，农业部门一直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约40%的劳动力创造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这一趋势的结果，墨西哥出现了惊人的失业率：到70年代中期，公开失业率约10%，但未充分就业率或许高达40%，实际失业率为20%左右。此外，到80年代中期，每年有90—100万年轻人加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大军。

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逐渐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如表2—2所示，墨西哥20%的最贫困家庭所得收入的份额由1958年的5%降至1977年的2.9%；最高阶层收入的比例也有所下降，10%的顶层家庭收入比例由近50%降为40%多一点；最大的相对获益者是所谓的第四层20%的家庭（它们的收入份额由1958年的14.9%上升到1977年的20.4%）以及占11—20%之间的那部分家庭。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墨西哥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成就，也证明了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进口替代工业化往往会加深而不是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表2 2　　收入分配的格局：1958年和1977年

（各类家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

	1958年	1977年
最低层（20%）	5.0	2.9
第二层（20%）	7.2	7.0
第三层（20%）	10.0	12.0
第四层（20%）	14.9	20.4
最高层（20%）	62.9	57.7
其中：顶层（10%）	49.3	40.6

资料来源：伊菲吉尼亚·M·德纳瓦雷特：《墨西哥的收入分配：趋势与前景》，见《1980年墨西哥侧影》第1卷（墨西哥城，1970年），第37页；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1987年），第253页。

墨西哥进口替代战略的最后一个结果是：这个国家的工业部门开始失去效率，而且按照国际标准，变得没有竞争力。由于国内市场有保障以及缺少国外的挑战，制造商们在设备更新和现代化方面只是进行最低限度的投资，以保持低成本和高利润。几乎没有任何国营公司在研究和发展方面拨付很多预算。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往往提高成本并保护厂内在的低效率。结果，墨西哥私营部门变得高度依赖于其近乎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和高度依赖于国家的保护。进口替代工业化中所固有的社会经济代价于70年代初开始偿付。生产下降，冲突加剧。国家领导人试图在"分享发展"（与"稳定发展"相对）的看法上，建立起新的共识，但他们的乞求是徒劳的。看来墨西哥正迈向多事之秋。

那时这个国家钻探到了石油。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墨西哥发现了巨大的石油新贮量，而且很快地重新获得了其作为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地位。这不仅提高了该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使政府得以着手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开支计划，以缓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弊病。这样，石油财富暂时延缓了任何在经济上实行结构变革的打算。然而，当80年代初石油繁荣消失时，政府采用旨在使国家经济"自由化"和增

加制成品出口的政策，以求应付深重的危机。这就需要抛弃传统的设想，重新调整国家与私营部门的关系，更新国家的工厂。挑战是巨大的。

40年代以来，墨西哥经济的变革极大地影响着农业部门的变化，同时也受农业部门变化的影响。官方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地保持农产品的低价，因此，以不高的价格向城市消费者提供食品，等于使资源大规模地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补贴对保持那里的社会安定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出口时时构成外汇的重要部分，这种利润有助于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

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墨西哥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均衡增长的样板。当以进口替代为手段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农业生产以年均4.4%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到60年代初，墨西哥既出口一般的粮食（包括小麦），也出口“奢侈的”农作物（如鳄梨和西红柿）。一些分析家指出，如果说有“墨西哥经济奇迹”的话，它或许已发生在农业部门。10年内这一形势发生剧烈逆转。到1975年，墨西哥进口其消费粮食的10%；到1979年，其36%的粮食需要进口；1983年，粮食进口约占其粮食需要量的一半。有些人没饭吃，可能有400万墨西哥人遭受营养不良之苦。这不仅标志着全国性的农业危机，而且也意味着墨西哥不得不挪用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诸如用于提供就业的投资）。

墨西哥农业丧失了内部的平衡。商业化的部门，特别是高价值的作物（如水果和蔬菜）以及牲畜饲料（喂养家禽和猪的高粱和青饲料；在墨西哥，菜牛用牧草来饲养）部门，增长在继续。政府的政策把用于出口（主要是用于向美国出口）和用于城市消费（主要是用于中产阶级消费）的生产相对地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一重点因大规模农业综合企业（即在农业领域特别是在动物饲养业中获得主要利益的跨国公司）的介入而得到增强。然而，小农场主和农民没有分享到这些好处。自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准许主要商品（特别是玉米）的实际价格长期下跌。从短期看，这项政

策有利于工人阶级消费者，但最终会阻碍农业生产。信贷流向从事大规模经营的业主，综合农业企业控制了大量土地。到 80 年代中期，大约有 400 万墨西哥农民没有土地。他们的失望情绪不时地迸发出来，许多农民夺占土地供自己使用。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墨西哥农业改革、特别是集体村社问题上引发了重大争论。村社的生产增长不如私营大农场那样迅速(1950 到 1970 年间，私营大农场每英亩的产量增长了 147%，而村社只增长了 113%)。这促使一些观察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改革和集体所有制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加剧了经济困难。但是其他因素也在一直起作用：村社所拥有的一般是劣质土地，而且很少获得贷款和技术；它们还往往较少集中于生产供出口的奢侈农产品，而是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生产供国内市场的主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的对比是，村社的生产率比小农场主的生产率增长得快(1950—1970 年分别增长 113%和 73%)。问题可能不在于村社本身，而在于其资源和刺激。

战后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对墨西哥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变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长期的城市化趋势(它既是该国经济变革的原因，又是这一变革的结果)。由于农村缺少土地和工作机会，农民们离开村庄到城市去寻找生计或工作。他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全家迁移；有时全村一起大迁徙。他们往往在贫民窟找到归宿，或更通常地是，在该国主要城市的郊区建立完整的社区。这类窝棚城镇中有些依据其自身情况成为微型城市。1900 年，只有 9.2%的墨西哥人口在城市生活（城市被定义为拥有 2 万或 2 万以上人口的社会)。到 1940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18%，1970 年约达 35%。在这期间，墨西哥城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都市之一，80 年代后半期，它的人口估计为 1400—1600 万。与流传甚广的假想相反，墨西哥城再也不是一个农民的农业社会，经济自立人口中从事农业的由本世纪初的 70%降为 40%。与此同时，工业工人的比例稳步增长，由 1900 年的约 10%上升到 1980

年的 30%。

尽管统计资料令人怀疑，尽管在"阶级"的确切含义上存在学术性争论，但显而易见，经济变革对墨西哥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1960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墨西哥的"上层"阶级已变得很小，约占总人口的 0.5%，其社会场所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就像传统的大庄园主让位于银行家和实业家一样。中产阶级已上升到约占总人口的 17%，其在城市和农村中的部分在数量上变得大体相当（到 80 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 25%或 30%）。实际上，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职业阶层之间的差别是极其微乎其微的，因为许多从事中产阶级工作的人拥有上层阶级的收人(反之亦然)，将这两者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或许更好一些：不从事双手工作的人们组成的非体力阶级。不管怎样，一个基本点是存在的：相对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特权阶级，这些拥有中产阶级收入的人属于在国家收入分配中的上层 1/3。① "下层"阶级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一阶层似乎已由 1900 年的 90%降为 1960 年的 80%，1980 年可能降到了 65—75%。但这并不掩饰随着人口的膨胀，其绝对数在不断增长。下层阶级也已经日益工业化和（一定范围的）无产阶级化。

从 40 年代起，人口增长急剧加快。从殖民地时期后期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墨西哥人口以相对适中的速度增长，其部分原因是周期性的破坏——一次是在独立战争期间（1810—1821），再一次是在墨西哥革命期间（1910—1920）。此后，人口数量开始稳步上升，由 1940 年的 2000 万上升到 1960 年的 3600 万，1980 年达到 7000 万。到 60 年代后半期，墨西哥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

---

① 见阿图罗·冈萨雷斯·科西奥：《阶级与社会阶层》，载胡利奥·杜兰·奥乔亚等编：《墨西哥：革命 50 年》第二卷：《社会生活》（墨西哥城，1961 年），第 55 页。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和其他一些评估，见詹姆斯·W·威尔基和保尔·D·威尔肯斯：《确定墨西哥的阶级结构：1895—1970 年》，载《拉美统计辑要》，第 21 卷（洛杉矶，1983 年）。

家之一，年增长率约为3.6%。自那时以后，增长率开始下降，80年代中期徘徊在2.5%左右，其部分原因是由政府的政策所致。然而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全国人口中接近一半在16岁以下。这一人口统计增长的政治后果之一是与过去联系的削弱。1980年健在的7000万人口中，1950年时只有13.3%在15岁或15岁以上，他们对那个时期能够有直接的记忆。1980年人口的近一半（45%）那时还不到15岁——因此他们的成年时代是在将来。人口统计学不利于保持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

社会和人口统计的这些发展显示出地区间巨大的不一致性。尽管墨西哥城行使着政治上的控制权，但与其他主要拉美国家的首都城市相比，它的控制权要略逊一筹。绝大多数墨西哥人（至少有3/4）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其他某些地区，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状况赋予每个地区以截然不同的特点。该国中部地带本身差异也很大。尽管这一地带的某些城市（托卢卡、普埃布拉、克雷塔罗）在文化和政治上落人墨西哥城的势力范围，但中部的一些地方仍保持着强大的地方主义传统。到80年代已有360万居民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具有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情调；矛盾的是，作为流浪乐队音乐和龙舌兰酒的故乡，它还是民族主义的一个象征。韦拉克鲁斯是加勒比沿岸一个不活跃的港口，由于它是从埃尔南·科尔特斯抵达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等多次外部入侵的登陆点，它享有含糊的历史名声。无论是瓜达拉哈拉，还是韦拉克鲁斯，都没有可以向墨西哥城实业巨头发起挑战的工业精英，两个城市都与首都的社会力量合作。

南部地区更加处于无权地位，且更不发达。瓦哈卡州和恰帕斯州保留着相对大量的土著人口，他们通常生活在本国社会边远地区的传统自给自足社区中。南部地区在奔向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它依然处于落后和贫困状态。旅游业通过阿卡普尔科、伊斯塔帕和科苏梅尔这些国际性胜地，促进了格雷罗和金塔纳罗奥的发展。尤卡坦从国际市场龙舌兰纤维价格暴跌

的影响中恢复了过来。墨西哥南部的一些地区及墨西哥湾，成了石油繁荣的中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南部各州从中央政府只获得相对有限的关心（和资金）——大概正因为如此——它们培育了反对派政党、激进政治和分离主义运动。

北方处于经济领域的另一端。作为私营企业者摇篮的蒙特雷市已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工业中心和第三大城市（居民超过 220 万人）。这一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由两个家族提供，即加尔萨和萨达集团，它们从大约本世纪初建立一家啤酒厂开始，最终建立了一个包括钢铁、玻璃、化学和金融部门在内的巨大企业集团。北部的索诺拉州和奇瓦瓦州见证了富裕的农场主和庄园主的辉煌，而拥有华雷斯城和焕然一新的蒂华纳等繁荣城市的边境地区，则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中获益。一般说来，北方繁荣、保守、亲美，并远离墨西哥城。然而，墨西哥社会的所有部分（不仅仅是北部地区）逐渐感受到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通过电影、电视、语言和市场，墨西哥经历了一个稳步和不断加快的“美国化”进程，这一趋势增加了保护民族特性的紧迫感。

长期以来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使明确的阶级划分变得不可能。一些分析家以 50 年代的乐观主义精神把该制度描绘成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党结构。随着 70 年代的觉醒，大多数观察家强调该制度的“独裁主义”性质，但甚至这个特征也有待于限定。墨西哥所拥有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和温和的专制主义政权，而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间南锥体国家所出现的那种极富镇压性的类型；它主张吸收和结合，而不是排斥和消灭，因而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制度；它不是一个人至上主义的工具，而是一个体制性制度；它是由文人领导的政权，不是一个军政府。另外可以说明的是，墨西哥的社会制度勇敢地正视而且显然已解决了非民主制度最难以解决的难题之一，即精英人物的更新和政府的交接问题。它是一个专制主义制度，但它是具有许多差异性的专制主义制度。

政治权力归于上层。墨西哥总统任期 6 年，不得连任。在任期内，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所有重大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控制着广泛的官职任命权，鉴于政府的重要性，总统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发挥着持久的影响。但是，一旦任期届满他就下台。宪法对再次当选的限制（这是墨西哥革命的一个遗产）已成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原则——有人猜想，这部分的原因是它意味着担任公职机会的定期更新。因此，墨西哥政治中最重要事件一直是总统职务的继承交接。挑选总统是国家生活中首要的决定，这一进程确定和支配着为期 6 年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节奏。公众的视野虽看不到隐藏在继承交接背后的明确机制，但它似乎经历了某些有意义的变化。有两点看来是勿庸置疑的：第一，即将卸任的总统在挑选自己的继任者方面起着主要的（通常是支配性的）作用；第二，未来总统的揭晓促使政治当局的成员表示立即、几乎是一致的支持。随着（未来总统候选人的）揭晓，竞争即告结束。

选举通常一直被革命制度党所控制。反对党分散、弱小，尽管其潜力与时俱增。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少数政党——主要是国家行动党（PAN）、社会主义人民党（PPS）、墨西哥真正革命党（PARM）——一直是政府在议会中的反对者。虽然在选举中得到的支持很少，但它们的领导人还是在议会中得到了席位，对某些决定提出批评（从来不批评制度本身），经常与革命制度党达成交易，它们的存在巩固了政府所宣称的民众支持和合法权力。70 年代，出现了不那么合作的政党——即有左的，也有右的——但在 80 年代中期，它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构成对现政权在选举上的严重威胁。在政党结构之外，城市和农村都有恐怖主义运动，政府对其毫不留情。军队和警察部队的镇压和反游击战无情地摧毁了武装叛乱。政府逮捕政治犯（这是当局经常否认的一个事实），镇压有时是非常残酷的。活动分子和鼓动家们经常神秘地失踪。

公众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就是冷漠。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人在43%和76%之间，尽管投票权是强制性的，但墨西哥人民往往把他们的政府视为疏远的、优越的和利己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或许多达1/3）营养不良，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衣物不足，他们处于政治进程的边缘，他们代表着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所谓的“国内殖民地”。尽管显示出潜在的不和谐，但冷漠和贫困的迹象不一定构成对政府的威胁，因为它们通常默许了政府的行动自由。如果说墨西哥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了独裁特征的话，那么它也具有灵活性。尽管它头重脚轻，但革命制度党是围绕着三个不同的集团组织起来的：一个是农民集团，一个是工人集团，另一个指几乎其他所有的人，幻想地称之为“民众集团”。这种结构至少为墨西哥的广大社会阶层提供了象征性的代表，有助于解释政府为什么被大部分人被动地接受（如果不是狂热拥护的话）。政坛人物稳定地轮换意味着新人即某些具有新思想的人能获得高级职位。当出现不满情绪的征兆时，墨西哥的统治者通常是以授予公职的方法拉拢群众领导人，进一步扩大支持现存制度的基础。该制度每10年左右经历一个自我检查时期，这经常导致某种类型的改革。结果一般不太令人注目，但这种结果却证明了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一位不公开姓名的观察家把这一规则简明地归结为：两根胡萝卜，甚至是三根或者四根胡萝卜，但如有必要，再拿出一根大棒。

把墨西哥这一时期的权力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联盟或契约也许更为合适。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个国家的统治联盟包括三个独立的部分：国家、本国私营部门和外国部门（跨国银行和企业以及它们的政府）。这些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是紧张不安的，其中两者合作反对第三者的情况也不少见。然而，在这些斗争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一致性和一系列的相互理解，这种一致性和相互理解保持了权力结构的完整无损：（1）墨西哥要追求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道路，这一前提要求（2）把民众置

于控制之下，这意味着（3）在这种安排中，国家必须起支配作用，而（4）国家和企业家仍会争夺相对优势。在这样一种"混合经济"中，国家担负着多重任务：它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确定发展的准则，并扮演最大企业家的角色。

国家由政治精英领导，这依次包含可视为同一的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由专家组成，这是一批受过高级训练的官僚，其主要资源是技术的专门知识，他们在政策制订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第二个集团是政客，这些老练的政客通过革命制度党统治阶层而发迹，他们的体制基础来自选举的职位（市镇委员会、州议会、州长职位及全国议会）。政客和专家之间的竞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治中一个经常的主题，它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精英内部的权力平衡[1]。第三个集团（经常被观察家们所忽视）由职业军人组成。墨西哥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保持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地位，但它一贯履行着许多关键性的职责——追捕游击队员，监督紧张的选举，镇压喧嚷的反对者及一般地维护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军队在政治中充当着"沉默的伙伴"，它的合作是重要的。

墨西哥的政权依赖三个主要社会阶级集团的民众支持。特别重要的是具有相对特权、大部分已城市化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了经济增长的许多好处。农村群众，特别是农民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尽管其所获得的物质报酬少得不成比例。同样，政权的维持也依靠城市工人。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集中领导下，各工会采取了协作的态度。每一个集团都是革命制度党内的一个单独团体，而革命制度党在体制上同时为各团体利益的表达提供机会，并将其置于控制之下。为达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使工人和

---

① 见皮特 H·史密斯：《领导与变革：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与专家治国论者》，载罗德里克·A·坎普（编）：《墨西哥的政治稳定：下一个5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6年），第101—117页，特别是102—104页。

农民处于相互分离状态，从而阻止下层阶级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能从总体上威胁现存制度。正如前总统米格尔·阿莱曼曾经回忆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与40年代初，"出现了将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合并的企图，……如果那样"，阿莱曼认为，"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就会消失。有谁会满足这个集团呢？……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能够保持稳定吗？"[1] 为了避免这个后果，墨西哥建立了一个组合国家，构成其基本支柱的是革命制度党及其各团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明显地看到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决定于三个主要条件。第一，保持各选民集团之间的平衡。尽管可能存在不平等，但保持人人机会均等、无人至高无上的思想，证明是必要的。合法性以各团体领导人的认可和参与为基础，而这就树立起了这样一种信念（或神话），即缓和个别的不满情绪和推进总体利益通常是可能的：这个制度的口号就是"平衡"。第二个条件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模式可以使物质报酬得到不断的分配。这些利益通常在国家主持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补贴、物价控制、工资协议），这就保证现政权获得异端的、相互对立的社会各阶级选民的支持。这种民众主义的联盟需要一系列源源不断的报偿，而国家的支付能力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墨西哥的政权需要经济增长：战后的"经济奇迹"和政治稳定彼此有一种共生和辩证的关系。稳定的第三个条件是与美国培养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关系，一种双边的缓和。在坚持神圣的国家主权和自决原则的同时，墨西哥政府坚定地设法避免同北方邻国的直接对抗。与美国的关系是决策者们一种经常关注的问题，他们的记忆中不仅包含19世纪的屈辱性战争，而且包含20世纪初的军事干涉以及对1938年石油国有化的恶毒敌视。在政治上与其拉开距离，同时培

---

① 米格尔·阿莱曼，《米格尔·阿莱曼谈话录》（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5年），第32—33页。

养积极的经济联系证明是一种不稳定的作法，它往往采取在法规上回避和事实上含糊的形式。

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时期，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表现出三个持久的特点。首先是不对称：美国比墨西哥辽阔、强大、富裕，19世纪初以来一直如此。这里不可能存在对等的交易，因为美国对墨西哥的影响总是大于墨西哥对美国的影响。其次是冲突：尽管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和目标，但在具体问题上会有不一致。有益于墨西哥的事情并不总是有益于美国，反之也是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墨西哥的某些利益有益的东西不一定对美国的某些利益也有益）。墨西哥当局的任务是在不招致美国极度消极反响的情况下表达国家的利益。第三是外交上的局限：政府对政府的谈判缺乏最终解决所有关键性双边问题的能力。这部分地是由这些重要危急问题的性质所致，诸如劳工迁移，它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刺激的反应，断然违背了官方的规定。它也反映出决策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在美国，有众多的机构参与决策过程；而在墨西哥，总统的意志往往居主导地位。①

在通常情况下，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墨西哥领导人努力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他们在选民集团间培养平衡意识；他们支持为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他们与美国保持了一种适当模糊（但实际上是支持）的关系。这些努力的结果证明是罕有的出色：文人领导下的稳定政权。

1946—1958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好。1941年，当冲突临近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敦促石油

① 关于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参见皮特·H·史密斯：《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80年代及以后》，载《美州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27，第1期（1985年2月）：91—101，以及在约瑟菲娜·佐拉伊达·巴斯克斯和洛伦索·梅耶尔著：《美国与墨西哥》（芝加哥，1986年）中到处可见。

公司接受通过谈判解决1938年的国有化问题。在德国用鱼雷袭击了两艘驶往美国的油轮之后，墨西哥于1942年向轴心国宣战。同年，政府与华盛顿签署了贸易协定（美国市场向墨西哥商品开放）和移民劳工协议（允许墨西哥雇工在美国的铁路和农场工作，后又扩大到其他部门）。这些协议的基调是强调一致与合作。的确，一些有影响的墨西哥人士认为，这预示着两国间“特殊关系”的开始。战时的条件还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在国家的培育和保护下，在一个现代中产阶级轮廓（当时或许从总体上占总人口的15%）产生的同时，涌现出了一个新生的企业阶级。但是墨西哥社会的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其传统的农业和不变的特点，拥有200万居民的墨西哥城还远不是它后来成为的特大城市。

在这种背景中，1946年米格尔·阿莱曼的就职标志着墨西哥政治的决定性变革。他年仅46岁，是一位文人，是革命后第一位未曾在1910—1920年的武装斗争中起重大作用的总统；他学的是法律，代表着一代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他讲西班牙语（英语也很流利），实现了技术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全新结合。他曾努力通过现存制度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于1934年进人参议院，1936年成为韦拉克鲁斯州长，1939—1940年指导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的总统竞选。由于他所做的贡献，他获得了内务部长的酬劳，在这个职位上，他既显示出了强硬，又显示出了技能。

到1944年下半年，有许多可信的竞争者争夺继承权。有5位文人：联邦区长官（被任命的首脑）哈维尔·罗霍·戈麦斯；农业部长马尔特·R·戈麦斯；卫生部长古斯塔沃·巴斯博士；对外关系部长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以及阿莱曼本人。有4位来自军界：米格尔·恩里克斯·古斯曼，恩里克·卡尔德隆，赫苏斯·阿古斯丁·卡斯特罗和弗朗西斯科·卡斯蒂略·纳赫拉。起初的推测往往赞同戈麦斯和帕迪利亚，他们俩都是有经验的著名政治家，但阿莱曼利用其部长职位扩大了自己个人的追随者——特别是在州长以及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当中。当1945年5月阿

莱曼辞去内阁职务时，基础已牢牢地奠定了。韦拉克鲁斯工人联合会公开支持自己的宠儿。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全国领导人召开特别会议，并支持阿莱曼。其他集团（从中产阶级到共产主义者）随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同时，阿维拉·卡马乔在对高级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颂扬了军事专业化的品德（他的意图对集会的军官不是不起作用：为一位文人总统做好准备）。罗霍·戈麦斯和恩里克斯·古斯曼退出了竞选。1946年初，执政党（该党由墨西哥革命党改名为革命制度党）的一次顺从的代表大会一致提名阿莱曼。然而一场竞选接踵而至。两位不满的将军加西亚·卡斯特罗和卡尔德隆，列在寿命不长的政党的候选人名单之首，而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导对外政策，很受美国赏识）创建了保守的墨西哥民主党（PDM），开展了独立的提名。精力充沛但充满幻想的帕迪利亚可能受害于其亲美的名声。无论怎样，选举结果是明了的：阿莱曼获78%的选票，帕迪利亚获19.3%，加西亚·卡斯特罗和卡尔德隆仅获得象征性的回报。既没有抗议，也没有暴力，1946年12月，阿莱曼在平静中就职。

国家的新领导人有一个明确的全国性方案。阿莱曼决心继续扩展始于战争期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就要建立国家与私人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的联盟。正如他在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一次讲话中所解释的那样："只要是为了总体利益而行事，私人企业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能够指望国家的支持。财产所有权应尽可能地掌握在墨西哥公民手中，与我们的立法已经确立的路线保持一致；而开始将自己的命运与墨西哥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外国资本将能够自由地分享其合理的利润。"他继续说："国家的作用是保证工人通过公正和合法的手段，而不是通过法律以外的程序，享有结社的权利、达成集体协议的权利和必要的自我保护的权利。同时国家应保障企业主开办生产机构和发展我国工业的权利，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投资将不会受

到不公正的异想天开行为的损害。”①

他的看法是提倡阶级调和而不鼓励斗争，国家则是最终的仲裁者。

为实施这一战略，阿莱曼政府把大量的国家投资投入公共工程。科罗拉多河、格兰德河下游及帕帕洛阿潘河的大型水坝控制住了洪水泛滥，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提供了急需的电力。墨西哥城的道路、公路和一个国际机场加强了通讯和交通网。新建的国立大学新校园不仅显示了建筑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也表明政府重视公务人员和私营企业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的构成。在向外国企业敞开大门的同时，阿莱曼通过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力图加强墨西哥自己的企业阶级。进口份额和关税使竞争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 1948 年的货币贬值（由 4.85 比索兑换 1 美元降为 8.65 比索兑换 1 美元）阻碍了墨西哥的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并提高了生活费用）。这样就开始了“墨西哥奇迹”。

这一战略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一个现代化计划，这个计划很快就开始被称为“绿色革命”。该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把重点放在作物产量和生产率的提高上。新作物品种的开发与应用，其中许多是源于特殊研究办公室的努力，该机构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于 1943 年在农业部内建立的；政府对投入成本（诸如能源、种籽和肥料）的限制；国家为信贷和商品化提供的补贴。但最显著的贡献（特别是在阿莱曼时期）还是灌溉面积的扩大，1946 年建立的水力资源部在基础设施的开发方面起了核心作用。绿色革命强调生产率和利润，而不是土地分配。政府的大量投资，特别是灌溉方面的投资，投向了北部地区的大庄园和大农场，而不是投向中部和南部的各农业州。好象是无视土地改革本身，阿莱曼集团支持把“小地产”可允许的规模提高到 100 公顷的宪法修正

① 引自路易斯·梅迪纳：《墨西哥革命史》第 20 卷：《1940—1952 年：独裁的文人政府与现代化》（墨西哥城，1979 年），第 37—38 页。

案。结果，效率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玉米产量由每公顷 300 公斤提高到 1300 公斤，小麦由每公顷 750 公斤提高到 3200 公斤[①]。然而，这些政策也加深了墨西哥农村地区的裂隙。阿莱曼及其继任者显然支持大规模经营的、机械化的、商品化的北部地区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或在墨西哥或在美国出售其商品；而中部和南部地区小规模经营的和传统的农民大部分被遗忘了。绿色革命不仅加剧了这些差异，而且往往分裂农业部门的利益群体。结果，主要的农民组织全国农民联合会（CNC）开始代表众多的、经常相互斗争的集团：小农、无地的工资劳动者和小私有者。因此，绿色革命的社会后果——加上农业老板们的顽固——隐藏在战后农民运动和全国农民联合会不断衰落的背后。

阿莱曼的政绩是混杂的。二次大战期间对同盟国的忠诚曾激起了民主化的希望。1945 年，阿维拉·卡马乔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对长期有利于地方寡头和权贵的选举制度加以集中化和改革。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可以预想到是不赞成的，然而立法机关在来自普埃布拉一位名叫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的年轻议员的及时调停之后批准了该计划。在墨西哥革命党/革命制度党内，党的领袖们同意在内部选举的基础上进行提名，同时尊重“每部分多数人权利的原则”，[②]以试图避免内部自相冲突。除了中央政府在民主化的名义下从地方权贵手中接管权力之外，这将意味着什么并非不言而喻。确实，阿莱曼政府赋予了墨西哥政治制度以一贯性和定型化，这一制度将持续多年。随着发展，整个制度显示出若干相互联系的特点：加强了一个单一的统治集团，将左派清除出官方联盟，由国家控制劳工运动，培养与拉拢各团体领导人。

① “小麦，而不是玉米，是绿色革命的最重要的主角，特别是在最初的年代”，古斯塔沃·埃斯泰瓦在《墨西哥农民的战斗》（墨西哥城，1980 年）第 21 页中如是说。

② 梅迪纳：《历史》，第 79 页。

要求划一在阿莱曼的内阁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新部长们都几乎一致地与总统本人相似：他们年轻（平均年龄 44 岁），表达能力强，受过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与总统私人关系密切（阿莱曼在法律学校的同班同学有约 20%在国家政治中获得了高级职位)。这不是阿维拉·卡马乔在任时那样的联合政府，不是那种由各竞争派别巧妙达成的共识，而是阿莱曼个人的工具。与此相一致，阿莱曼撤换了代表其他集团的州长——最主要的有卡德纳斯派（后来成为恩里克斯派）的哈利斯科州州长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塔毛利帕斯州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的支持者J·赫苏斯·冈萨雷斯·加略。

孤立与排斥左派是与冷战时代相合拍的。这一进程以 1946 年宣布严格的政党注册条件为开端（这些条件使共产主义者不能保持其合法地位)。当 1947 年革命制度党总书记特奥菲洛·博伦达宣布该党将沿着“既非极左亦非极右”的中间路线前进时，这一进程加快了。该党主席鲁道夫·桑切斯·塔沃阿达强烈谴责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我们坚定而且明确地宣布，我们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者，将来也不做共产主义者；另外，我们酷爱自由，我们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我们坚信民主且献身于民主，在包括反对那些用华丽的词藻、力图为与墨西哥实际格格不入的思想作辩护的那些人的斗争中，我们愿同人民战斗在一起。”①

于是反共变得与反帝相等同，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墨西哥民族主义。

在遏制左派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或许是墨西哥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前总书记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做出的建立新政党的决定。它的政纲是双重的：推动工业化，为社会进步创造物质基础；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保护国

① 《至上报》，1947 年 9 月 1 日。

家主权不受战后美国霸权的侵害。应阿维拉·卡马乔的请求，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同意把建立新党的计划推迟到1946年总统继承之后。当时注意力转向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在争夺1947年总书记职位的斗争中，一个激进的派别试图向占统治地位的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派发起挑战。隆巴尔多试图调解这场争执，而贝拉斯克斯派为换取隆巴尔多的支持，精明地同意支持组建新党。面对这种花招，激进的工会会员在铁路工会领袖路易斯·戈麦斯·Z的领导下，建立了持不同政见的、反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工人统一联合会(CUT)。因面贝拉斯克斯派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中大获全胜，任命费尔南多·阿米尔帕为总书记，同时正式同意为一个新的群众政党的建立而出力。

这不是阿米尔帕的本意所在。作为阿莱曼的狂热支持者，他渴望加强劳工在革命制度党内的地位，并渴望清除出其中的共产主义分子。他曾一度企图把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开除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他还曾使他所属的工会退出1938年由隆巴尔多创建的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CTAL)。到1948年隆巴尔多最终建立新的人民党时，他几乎完全脱离了他自己曾经领导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左派赢得了自己的党，但它却失去了在统治力量群体中的地位。从现在开始，它将不得不从外部开展工作。

除了排斥左派之外，阿莱曼的政府还企图直接控制劳工运动的主流。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紧张局势导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内部发生深刻分裂，亲政府的力量声称有大约50万人，反对者有大约33万人。许多基层成员接受了阿莱曼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领袖们的指令，认为激进的观点是异己的和没有爱国心的，而这受到公共部门工会特别是国有化工业部门工会的反对，这些部门的工人倾向于认为国家主权与具有反帝性质的反对外国投资是一致的。1946年在石油工人中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暴动，在士兵接管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设施之后，暴动很快被镇压。

当1948年铁路工人抗议因比索贬值而引起实际工资下跌时，

规模巨大的危机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劳工领袖路易斯·戈麦斯·Z刚刚把工会总书记的职务移交给赫苏斯·迪亚斯·德莱昂（一个机会主义钻营者，因他喜爱墨西哥牛仔竞技节目而获得“骑士”绰号），政府立即开始支持迪亚斯·德莱昂反对受人爱戴的戈麦斯的斗争，戈麦斯既坚持把贬值的影响问题编制一份报告，又坚持把报告提交给他那新建立的工人统一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提交给铁路工人工会。愤怒的迪亚斯·德莱昂的回答是指责戈麦斯搞欺诈，而政府出人意料地——且不适当地——同意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为换取总统的支持，迪亚斯·德莱昂接受了一项新的契约，契约使资方有权解雇从前工作有保障的多达2000名工人。从那时起就建立了一种统称为臭名昭著的骑士主义（Charrismo）模式：驯服的劳工领导总是出卖其成员的利益而换取国家和/或资方的政治支持（和财政利益）。这样通过收买劳工领导而控制了劳工，随后的安排将通过工业化来开放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增长。

独立的工会会员继续寻求一个新的机构，1949年，持不同政见的矿业和石油业工会领袖们与隆巴尔多·托莱达诺联合成立了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UGOCM）。政府报之以敌意——拒不认可针对福特汽车公司的一次罢工，以技术性细节为由取消了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的注册，并支持该工会内部的一个分离集团。一些矿工退出了工农总联合会，1951年石油工人决定重返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仍然存在，但不再成为重大的挑战。政治教训是清楚的：随着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力量的减弱，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和人民党将不会有任何体制基础。与此同时，政府对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加以限制，支持于1951年在革命制度党内建立作为平衡力量的全国性劳工组织工农区域联合会（CROC）。通过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墨西哥政府再次显示了它坚持牢固控制有组织劳工的决心。

阿莱曼及其协作者们还试图训导革命制度党。在尝试性的内部初选实验之后，总统在1948年议会中期选举结束后转而反对这

一设想，并向议会提交了一项禁止各政党举行各自的公共选举的法律。1950年桑切斯·塔沃阿达顶住了老牌政治家的某些反对，再次当选为革命制度党主席，但他放弃了对初选的赞同（候选人从此之后将由党的会议挑选），并同意领导机构实行变革。党的巨头们回到了党员行列，少壮派失去了他们的优势，革命制度党的协商返回幕后。

因此，关于1952年继承问题的推测被压制了。当1951年6月阿莱曼被问及将就过渡做些什么时，他作了一个典型的回答："等着瞧吧"。[①] 或许是由于内阁中没有显而易见的领先者，一些观察家开始闲聊一项关于准许阿莱曼连任或是延长其任期的宪法修正案（这是拉萨罗·卡德纳斯强烈反对的计划）。另一些人则看好有才干的财政部长拉蒙·贝特塔，但他因为有一位美国妻子而在政治上运气不佳。还有人议论联邦区长官费尔南多·卡萨斯·阿莱曼，他是总统的亲戚，虽然有腐败的名声，但据说他是总统的心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米格尔·恩里克斯·古斯曼决定开展他自己的竞选运动。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曾是1946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早先获得了三个主要集团的支持：反对40年代保守政策的卡德纳斯主义者（包括卡德纳斯的家族成员）；上层中的异己派别，他们对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感到不满；持不同政见的民众运动领袖。恩里克斯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包括这样一些著名人物，如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安东尼奥·埃斯皮诺萨·德洛斯·蒙特罗斯，前公共工程部长佩德罗·马丁内斯·托内尔，参议院前领袖埃内斯托·索托·雷耶斯，墨西哥州前州长文塞斯劳·拉夫拉；在其他军官中有神通广大的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起初，这不是一个反对派运动。恩里克斯主义战略家们力求在现存社会体制内开展工作，而不是去反对它。他们想停止卡萨斯·阿莱曼的候选人资格，

① 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总统的继承》（墨西哥城，1975年），第112页。

想使革命制度党对恩里克斯·古斯曼加以认真考虑，想把民主的作法并入到提名过程中，并结束阿莱曼任期内出现的过度腐败。该运动思想上的标准空泛而简短："丝毫不偏离墨西哥革命的理想"，当然，要拥护1917年的宪法。① 更换领导人而不去改变国家的意志，足以矫正公共生活的道路。这位反对崇拜偶像的前将军最终默默地采取了某些激进的态度，如支持小农业生产者和独立工会，但他谨慎地不去发展它们的影响。

足以预见，温顺的革命制度党表示强烈反对崛起的恩里克斯派，并试图将其驱除出党。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看到别无选择，遂于1951年3月，即正好在革命制度党提名大会召开之前，创建了一个新的机构——人民政党联盟（FPP)。恩里克斯·古斯曼开始开展认真的竞选活动，并获得了理想主义者的学生、中产阶级中赞成民主的人士、独立的农民团体和觉悟起来的工人等不同选民的支持。据说阿莱曼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挑战，他派一位使者拜见卡德纳斯，以便解释这一挑战对现存社会制度构成的危险——包括军事政变的可能性。②

10月初，有消息说当局选中的人可能是来自韦拉克鲁斯州54岁的内务部长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他没有什么倾向性，但正直，显然是一位折中的候选人，是该国政治中可以弥合裂隙的人选。机构立即开始运转。菲德尔·贝拉斯克斯已经宣布劳工将支持革命制度党，而不支持共产主义者，或更直接了当地说，不支持隆巴尔多·托莱达诺的人民党。"墨西哥无产阶级今天已做出其一生中最卓越的决定"，他在"五一"节对群众发表讲话说："明确地使自己与革命一致，与祖国一致，自己与所有异己的学说和思想意识格格不入。"③ 或者解释为：不应实施马克思主义。同

① 《至上报》，1951年7月30日。

② 科西奥·比列加斯：《继承》，第131页。

③ 科西奥·比列加斯：《继承》，第115页。

时，桑切斯·塔沃阿达在革命制度党内给了天主教徒以一席之地，以削弱保守主义者对国家行动党的埃弗拉因·冈萨雷斯·卢纳的支持。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地制造公众认可鲁伊斯·科蒂内斯的声势。

他们最后可以宣称胜利了：1952年选举的官方统计结果显示，鲁伊斯·科蒂内斯获得74.3%的选票，恩里克斯·古斯曼获15.9%，冈萨雷斯·卢纳获7.8%，隆巴尔多·托莱达诺获1.9%。然而，这是1929年以来公认的反对者所获最多的选票，它证明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竞选运动。一些恩里克斯主义者对这一结果提出抗议，少数人被监禁，一些人寻求军事政变的梦想，一些人设法返回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拉拢实例是加西亚·巴拉甘，他最终成为1964—1970年的国防部长）。1954年，人民政党联盟解散，恩里克斯主义消失。在此之后，正如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所说的，"真正'一党遮天'的时代开始了"。①

尽管鲁伊斯·科蒂内斯的政治背景朴实，但他仍努力保持了使革命制度党对总统的从属。在1953年初党的会议开幕词中，他确定了党的指导思想："人民是其向导，宪法是其口号，而阿道弗·鲁伊斯·科蒂内斯是其旗手。"与口头上的责任相协调，党的领袖们致力于历史传统和个人至上主义的团结："革命制度党将遵循鲁伊斯·科蒂内斯总统所展示的革命道路"，而科蒂内斯或许对于这样描述其政绩的特性感到惊奇。②尽管得到这样的支持，新总统仍面临着几个挑战。或许最普遍的问题是统治集团不得人心，对阿莱曼及其合作者的贪婪普遍不抱幻想。必须作出的回答是简明却是艰巨的：巩固与恢复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但对政策不进行任何重大变革。鲁伊斯·科蒂内斯从几个方面开始这一工作。一是突出他本人朴素的样板，树立认真工作和稳健公务员的形象。二

① 科西奥·比列加斯：《继承》，第139页。

② 《国民报》，1953年2月7日。

是使自己和自己的班子与阿莱曼集团保持距离，平静地有选择地惩处了上届政府中的某些成员（包括前交通运输部长阿古斯丁·加西亚·洛佩斯，此人在投机性生意中损失无数）。[①] 第三个措施是给妇女以政治权力，这样实现了作为道德卫士的女性这个由来已久的想法，同时也扩大了政府的群众基础。最后，总统宣布要对涉及腐败和公共责任的法律条款进行重大改革；尽管在他的6年任期内从没有严格实施过，但这些改革有暂时疏导之效。

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遇到的第二个重大挑战是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连续数年下降，这部分地是由于阿莱曼的经济战略所致，而近期原因是由朝鲜战争而导致的国际性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及突出本届政府反腐败的决心——鲁伊斯·科蒂内斯采取了一项对垄断者及囤积商品的行为给予重罚的措施。如新总统就任后不久所宣布的那样："寻找适当的合法措施，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将是我的政府最基本的目标之一。"[②] 他的首批经济措施之一是降低玉米和豆类的零售价格，同时政府宣布它与工人和无产者休戚相关。这一姿态看来危害了阿莱曼所建立的国家与私人资本间紧密联盟。起初，实业界领袖们小心谨慎，尽量不与亲消费者的措施对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对基本经济模式的任何变动都表示严重担忧。全国商会联合会（CONCANACO）发言人坚决认为，政府的介入会把市场搞得不正常，会产生低效率的垄断。换句话说，国家应该维持和保护市场，但不是直接参与市场。[③] 1953年，企业部门采用了最终的武器：减少投资和资本外逃。结果经济增长减慢，随之对整个进口替代战略的生存构成威胁。这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挑战：实际上

① 彼得·H·史密斯：《权力的迷宫：20世纪墨西哥的政治扩编》（普林斯顿，1979年），第273--274页。

② 《至上报》，1953年12月24日。

③ 奥尔加·佩利塞尔德布罗迪和何塞·路易斯·雷纳：《墨西哥革命史》第22卷：《1952—1960：政治稳定性的增强》（墨西哥城，1978年），第25页。

就是资本家举行罢工。

不久，政府屈服了。到1954年初，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开始支持企业部门，为其增加生产提供动力和资源，其中包括减轻税收负担和放松信贷。4月中旬，政府采取一项断然措施，把8.65比索兑换1美元贬为12.50比索兑换1美元（这样保持了许多年）。像1948年一样，这一计划将为当地实业家提供全面保护，鼓励他们在墨西哥进行再投资。到这年年底，生产已经加快，增长重新开始。美国经济从朝鲜战争的高通货膨胀之年恢复过来，进一步改善了总的形势。墨西哥又回到了其通向奇迹之路。

企业—政府联盟的进一步确定，使国家维护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更加有必要。或许是感觉到了政策的变化，著名劳工领袖们表示支持1954年4月的贬值，并保证工人阶级将会做出必要的牺牲。当鲁伊斯·科蒂内斯给公共雇员以10%的适度补偿性加薪、并建议私人部门也这样做时，菲德尔·贝拉斯克斯表示了工人阶级"最强烈的支持"。然而，对手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和基层群众的代言人指责这一增加额不够，那位总是很机灵的贝拉斯克斯很快就说服墨西哥工人联合会要求增加24%——否则就威胁于6月中旬进行总罢工。年轻勇敢的劳工部长阿道弗·洛佩斯·马特奥斯介入了这场争执，他着手通过说服与谈判阻止潜在的危机。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最显著的是在纺织部门和电影界，但洛佩斯·马特奥斯设法避免了大规模的对抗。结果是平均增加了约20%：稍微低于劳工所想要得到的，远远低于劳工购买力的损失，但足以使批评沉寂和保持贝拉斯克斯的领导。温柔的表面之下再一次隐藏着强硬的手段。为了使这一结果制度化，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支持1955年工人统一联盟（BUO）的建立，这是一个在贝拉斯克斯及其密友的领导下、旨在把劳工运动集中起来的机构庞大的组织。联盟的动力主要来自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尽管也得到其他许多工会（包括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主要对手工农区域联合会）的支持。尽管有政府的恩典，然而工人统一联盟本身从来

没有成为一支主要力量；正如路易斯·阿赖萨所指出的，它是“没有任何向导的大瞎子”。[1] 50年代中期劳资关系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电力和纺织工业中的工人仅获得较小的胜利。1956—1958年，混乱困扰着教师工会，当时奥顿·萨拉萨尔·拉米雷斯的独立领导激发起墨西哥城民众的反抗情绪，1958年8月的一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的镇压，但政府后来准许萨拉萨尔·拉米雷斯的一个伙伴获得一次工会选举的胜利。强制与合作似乎行之有效。

劳工舞台上的相对平静被1958—1959年的铁路罢工打破了。铁路工人的联合会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STFRM）具有长期激进民族主义的传统，他们在国家运输网中的战略位置赋予其巨大的力量。在路易斯·戈麦斯·Z及瓦伦廷·坎帕（不同政见的工人统一联合会的创始人）的坚强领导下，他们声明强烈反对1948年的货币贬值；自从把迪亚斯·德莱昂强加在“骑士队伍”中后，工人们不断失去阵地。1952年到1957年，他们的实际工资每年下降0.3%——而例如电工的命运却不断改善。[2] 1958年2月，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中反“骑士”的力量通过要求提高工资而寻求公开的对抗。工会领袖们最终同意成立一个研究实际工资问题的委员会。5月份提出的报告估计自1948年以来购买力下降了40%，提出月工资立即增加350比索（约合28美元）。迪亚斯·德莱昂则要求提高200比索，而资方则自夸地应允在60天内研究这个建议——在1958年7月总统选举之后适时地做出决定。

联合起来的抵抗成为德梅特里奥·巴列霍的后盾。巴列霍是一位普通的持不同政见者，曾在工资和价格委员会供职。作为新成立的全面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宣布了一系列“逐步升级的罢工”，首先是两小时罢工，逐步上升为8小时罢工，然后是总罢

---

[1] 路易斯·阿赖萨：《墨西哥工人运动史》（墨西哥城，1965年），第281页。

[2] 凯文·杰伊·米德尔布鲁克：《墨西哥有组织劳工的政治经济》，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82年。

工。鲁伊斯·科蒂内斯政府的答复是抛弃一位"骑士"领导人，另安插一位，并宣布于7月份把工资提高215比索。但收买没有奏效：8月，工会成员通过选举难以驾驭的巴列霍作为墨西哥铁路工人工会的首脑道出了他们的异议。在几个月内，巴列霍开始以罢工相威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其中包括以每周6个（而不是7个）工作日为基础计算所增加的215比索。在从最重要的线路全国铁路公司获得满足之后，他于1959年3月，即复活节假期之前，把同样这些事情提到其他三家公司而前。亲当局的工人统一联盟谴责巴列霍鲁莽，而劳工中持不同政见者——某些教师、话务员、石油工人——则支持墨西哥共和国铁路工人工会。惊恐的政府宣布罢工为非法，军队接管了铁路，警察囚禁了巴列霍及其数千名追随者。几周之内罢工被制止，领导被更换，巴列霍最终于1963年接受审讯，依照"分解社会问题"的法律被判犯有阴谋和破坏罪，被囚禁16年。

铁路罢工证明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正如何塞·路易斯·雷纳和奥尔加·佩利塞尔所指出的，"这是将现存政治制度一度推入危机的首次重要的无产阶级社会运动……无疑，它是1935年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运动"。[①] 但是，如果说它构成了对现存制度的一个挑战，那么它也提供了严肃的教训：对独立工会主义的容忍总是有限的。正如巴列霍事件所显示的，墨西哥政府要求有组织劳工的领袖们死心塌地的服从。

对于农民也是如此，尽管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令人恼火的事。在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农业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当时不断提高的国际价格推动了出口产品的生产，而基本建设支出（特别是在水利方面）导致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商品化农场的产量不断增加。尽管大多数农民没有分享这些好处，但全国农民联合会的领导人仍对现存制度显示出不动摇的忠诚。当农业部长希尔韦托·弗洛

① 佩利塞尔和雷纳：《历史》22：157。

雷斯·穆尼奥斯提出一项以牺牲中小农场主为代价而有利于大地主的粮食增产计划时，全国农民联合会总书记以让人消除敌意的语调表达了他对这一计划的支持："由于这是无可非议的和积极活动的样板，隶属于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农民只能再一次履行其爱国主义的责任"。①

在纳亚里特及其他地区，农民们发动了一些成功的地方性运动，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在北部地区做了一些发动农民的零星尝试。最严峻的挑战发生在1958年，当时锡那罗亚的夺地行动扩展到了索诺拉、科利马和下加利福尼亚。弗洛雷斯·穆尼奥斯用温和的土地分配计划来平息民众的某些骚动。其最富创造力的回答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把索诺拉州出租给美国"迦南家畜公司"的大片土地予以征用：作为一项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措施，决定中包括以硬通货把土地的商业价值偿付给所有者的规定。业主们满意了，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的领导人则被监禁，农民们回去干活，现存制度未受损害。这是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法。

在他们各自的6年任期内，阿莱曼和鲁伊斯·科蒂内斯都谋求与美国的紧密联系，以便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这就造成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和对美国的全面支持。对这一惯例的主要例外发生在1954年，当时华盛顿准备发动一场推翻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改革派政府的运动——部分原因是存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幽灵，部分原因是土地改革措施威胁到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在加拉加斯召开的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寻求谴责阿本斯政权。根据不干涉原则，墨西哥仅仅与两个国家——遭到围攻的危地马拉和庇隆主义的阿根廷——一道反对美国的建议。当1954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起的行动推翻了阿本斯政权时，墨西哥左派及民族主义团体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墨西哥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它坚持不干涉原则，据此

① 《国民报》，1953年1月26日。

而保持沉默。因此，这个事件既揭示了墨西哥独立行动的能力，也显示了其独立行动的局限。

1958—1970 年

1958—1959 年铁路罢工的被镇压开始了墨西哥政治的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奇迹”的延续为共识和拉拢提供了物质基础，统治集团既显示出高压统治又显示出劝服的明确能力。国家通过与(国内和国外)私人资本的脆弱联盟指导经济增长，上层的政治家、专家、军官之间的合作卓有成效。同一工业内跨行业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为现政权提供了群众基础，而蒸蒸日上的城市中产阶级——初期的、机会主义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给予为他们服务良好的制度以巨大支持。抗议和骚动总会存在，但在整个这一时期，政府广泛地行使着高度的霸权。

1958 年总统职务的继承既标志着、也加强了权力的集中化。所有主要的候选人均出自内阁：内务部长安赫尔·卡瓦哈尔，联邦区长官埃内斯托·P·乌鲁丘尔图，财政部长老练的官僚安东尼奥·卡里略·弗洛雷斯，卫生部长久负盛名的政治家伊格纳西奥·莫罗内斯·普列托，农业部长农业州纳亚里特州的政治首领希尔韦托·弗洛雷斯·穆尼奥斯，有才华的劳工部长阿道弗·洛佩斯·马特奥斯。实际上现存社会体制中的每个主要派别都有一位候选人：卡里略·弗洛雷斯被看作是阿莱曼主义者，弗洛雷斯·穆尼奥斯被视为卡德纳斯主义者，工人和农民、政治家和专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由于洛佩斯·马特奥斯在遏制劳工运动方面的成绩，由于他与鲁伊斯·科蒂内斯的关系（科蒂内斯的竞选运动是马特奥斯于 1952 年负责安排的），还由于他既可被卡德纳斯主义者、又能为阿莱曼主义者所接受，所以看来他会获胜。挑选过程由鲁伊斯·科蒂内斯谨慎地控制着。正如阿方索·科罗纳·德尔罗萨尔后来所说的那样，即将离任的总统“挑选自己的继

任者，支持他，将他纳入自己的轨道"。[①] 到这种时候，不会有明显的内部对抗。精力充沛而招人喜爱的洛佩斯·马特奥斯参加了一场旋风式的竞选运动，既获得了革命制度党的支持，也获得了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墨西哥真正革命党的赞同；甚至反对党也加入了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象征性的抵抗只来自国家行动党候选人路易斯·H·阿尔瓦雷斯。由于妇女首次投票参加总统选举，1958年8月有750万人去投票处投票，90%以上的人投了洛佩斯·马特奥斯的票。革命制度党及其机器似乎是战无不胜的。

洛佩斯·马特奥斯一就职就宣布自己是"宪法范围内的极左派"，这引起一些观察家特别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震惊。这一声明是精明的，非偶然的。它抢先预防了革命制度党内激进派的继续发展，孤立了反对当局的左派，特别是社会主义人民党及其他被推测处于宪法"之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它标志着与萨帕塔、比利亚及革命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的一致，它坚持墨西哥独立于美国（仍陷于冷战之中）的主权。此外，它重申了总统的权力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

与这一态度相一致，洛佩斯·马特奥斯提高了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买下了美国和外国电力公司的全部资产，从而控制了电力部门；政府还从长住居民、美国巨富威廉·詹金斯手中购买了电影工业的控制股份。政府开支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由鲁伊斯·科蒂内斯时的10.4%上升到11.4%。洛佩斯·马特奥斯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采取了坦率的立场。为了加强农民的忠诚，他命令把114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30多万农户，这一积极记录使他处于仅次于卡德纳斯的地位。[②] 1963年他提高了主要商品的基价，随后他把这一措施比拟为"农村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③]尽

① 《至上报》，1975年9月14日。

② 然而在实际实行中，仅分配了320万公顷，埃斯泰瓦：《战斗》，第230—231页。

③ 埃斯泰瓦：《战斗》，第85页。

管较难提供信贷和基础服务，但政治信息是明确的：政府至少是象征性地站在了群众一边。

总统对劳工采取了一种类似民众主义的态度。他于 1961 年提出一项建立工人和企业主利润分享的措施。作为为时稍晚地完成 1917 年宪法中一个关键条款（洛佩斯·马特奥斯表示与此紧密一致），该法律看起来象征着劳工的巨大胜利。然而，被分享的利润很小，只能限制在雇主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最终的法律（于 1963 年执行）从未严格实施过。劳工仅获得了字面上的胜利，企业成功地维护了其自己的利益。然而，不与企业领导人协商就提出这样的立法，政治家们表现出了他们采取自主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国家还获得了将来可以用来威胁或对抗私人资本的另一件武器。

尽管有这些民众主义的姿态（而且或许是有意图地搞这一套），洛佩斯·马特奥斯继续进行有选择的镇压和压制。1959 年，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被投入监狱（直到 1964 年才被释放）。我们已经讲过，1963 年德梅特里奥·巴列霍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而被监禁 16 年。农民领袖们的遭遇不佳，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为鲁文·哈拉米略一案。鲁文·哈拉米略是莫雷洛斯的一位老萨帕塔主义者，他带领他的游击小组步出深山，以接受洛佩斯·马特奥斯本人提出的大赦和休战。鉴于总统的奉承没能给他的下属带来土地，哈拉米略命令占领归著名政治家所有的田地。接下来是没有结果的谈判，随着僵局的出现，1962 年春天发现哈拉米略及其家属已经死亡。谋杀的命令发自墨西哥城，对此没有人怀疑。

洛佩斯·马特奥斯政府继续支持企业部门和吸引外国资本。投资规模巨大，墨西哥开始在国外、特别是在纽约的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政府如此严厉地设法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使得洛佩斯·马特奥斯能够保持 12.50 比索兑换 1 美元的固定汇率；在这 6 年任期内货币没有贬值。对利润汇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限制，允许

外国投资者将其所得利润按照预定的（和有利的）汇率汇回国内，这极大地促进了外国投资。经济沿着高速增长的道路继续前进。

当华盛顿与古巴的关系恶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墨西哥施加压力要求予以支持时，洛佩斯．马特奥斯试图建立对美国的外交独立。洛佩斯·马特奥斯试图走钢丝：墨西哥希望坚持不干涉和自决原则，但它也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因此，在整个1960年，墨西哥的代表们试图通过坚持不干涉原则、不为共产主义或苏联做辩护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墨西哥也不出来支持美国，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接受美洲国家组织的领导，该组织（在华盛顿的坚持下）已经抛弃了古巴，并敦促墨西哥也这样做：这本身就会危及墨西哥的主权。在这些棘手的谈判中，洛佩斯·马特奥斯邀请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于1960年6月对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这些礼仪使得1959年古巴革命和1910年墨西哥革命在仪式上等同。一位墨西哥议员谴责美国反对古巴的行为，特别是关闭食糖市场的行为。美国官员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形势紧张却模棱两可。

猪湾入侵事件之后，特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誓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墨西哥政府开始把这一问题视为东西方关系问题，但仍然反对进行干涉的打算。猪湾惨败激起了反美示威，墨西哥发言人认为美国的行动是对自决原则的违反，主张该问题应在联合国（在联合国古巴会得到巨大支持）范围内、而不是在美洲国家组织（在该组织中美国会占上风）内进行讨论。1962年这一立场发生了变化。这年年初，墨西哥外交部长曼努埃尔·特略宣称："隶属于美洲国家组织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两者是不相容的"，但他同时反对开除古巴的想法，因为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中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没有作出规定。① 接着10月导弹危机出现了。屈从于连续不断的强大压力，洛佩斯·马特奥斯最后公开支持美国

① 巴斯克斯和梅耶尔：《美国》，第178页。

对古巴的封锁，并指示他在美洲国家组织的代表投票赞成一项要求撤走导弹的决议。墨西哥还附加了一个保全面子的条件：此次表决不得被用来作为对古巴发动再次入侵的理由。但甚至这一立场也有其局限性；墨西哥当局有计划地把去往古巴的乘客列入黑名单，没收政治性材料，保持一种沉默伪装的封锁。主权的局限性再一次变得显而易见。

外交政策总的重点放在温和与实用主义上。洛佩斯·马特奥斯与依次的三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进行了私人会谈，1964年，他使墨西哥重新获得对查米萨尔的主权，这一有争议的地区自格兰德河改道之后就变成美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和墨西哥领导人继续促进一种和谐的气氛，华盛顿甚至开始接受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某种程度的独立。尽管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59年的9.22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近13亿美元，但政府援助并不多，甚至在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墨西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没有设置障碍。甚至在一个自称是左派人士的统治之下，墨西哥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也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的表象。

1963年，洛佩斯·马特奥斯宣布进行选举改革，任何获得总选票2.5%以上的政党，保证可在众议院最少可获5个席位（所获选票每增加0.5%，再增加1个席位，最高限额是20席）。这样反对党实际上无需赢得任何竞选，就能在全国立法机构中获得席位。其目的是把挑战者——社会主义人民党、墨西哥真正革命党、最主要的是国家行动党——吸收进来，并创造忠诚的反对派。在进一步孤立反对当局的左派、把墨西哥现政权标榜为代表民族共识的同时，这会巩固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在1958—1959年的镇压之后和考虑到古巴革命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样，洛佩斯·马特奥斯以特有的繁荣完成了他的任期。

1964年总统职位的继承进展平稳。主要的竞争者照例均出自内阁：公共工程部的哈维尔·巴罗斯·谢拉，总统府的多纳托·

米兰达·丰塞卡，财政部的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梅纳和内务部的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有谣传说洛佩斯·马特奥斯中意于他1929年巴斯孔塞洛斯运动时的同伴、来自格雷罗的有经验的政治家米兰达·丰塞卡，但他最后选定了迪亚斯·奥尔达斯——来自布埃布拉州、有能力但无魅力的前议员。选择他似乎是进一步确定了这样一个传统，即其他一切均等，内务部长将成为下一任总统（就像阿莱曼和鲁伊斯·科蒂内斯那样）。由于迪亚斯·奥尔达斯出身于梅斯蒂索人家庭，与其几位前任相比，他皮肤较黑，不那么仪表堂堂，他立即成了粗野玩笑的目标。这玩笑中包括也许是最富挖苦性的一则："人人都能当总统。"

迪亚斯·奥尔达斯一上任就用铁腕手段实行统治。他毫不犹豫地撤了一些官员的职。这些被撤职的官员或权力太大（这些官员使他受到威胁）或权力太小（因此他们使他难堪）。1965年8月，在对立的农民组织间爆发了武装冲突之后，他把全国农民联合会首脑阿马多尔·埃尔南德斯解职。1966年末，用推土机铲平擅自占地者的一个居住点事件遭到众多批评之后，迪亚斯·奥尔达斯解除了长期担任墨西哥城市长的埃内斯托·乌鲁丘尔图（此人还是以前的总统候选人）的职务。他以没能制服群众对外国矿业公司的抗议为由，撤消了恩里克·塞尼塞罗斯的杜兰戈州州长的职务，以没有制止大学生的一次罢课为由，撤消了伊格纳西奥·查韦斯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的职务。与洛佩斯·马特奥斯（他总是设法把强制与耍手腕兼容并蓄合为一体）不同，迪亚斯·奥尔达斯倾向于单纯依赖暴力和惩罚。

或许最能说明这方面问题的例子涉及革命制度党的内部组织结构。1964年，49岁的前塔瓦斯科州州长卡洛斯·马德拉索获得该党主席的职务，他是近20年中领导革命制度党的第一位文人（在公众眼里这也标志着军方的又一次退却）。马德拉索本人是一位喜爱争论的人，他企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来重振党的雄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地方一级进行初选的计划。守旧的政治家们予以

抵制，就像他们在40年代末所做的那样。迪亚斯·奥尔达斯最终决定站在反民主的力量一边。马德拉索于1966年丢了官，1969年在许多人认为是一次可疑的飞机坠毁事件中丧生。这样，进行改革的冲动结束了。传统的机构在得到加强（即便不是再生）之后，维护着它的统治。1965年，国家行动党被容许控制新莱昂州蒙特雷附近的一个市政府，但在1969年，革命制度党强行安插了自己的市长。1967年，国家行动党在索诺拉州埃莫西略获胜，但墨西哥城坚持认为官方的州长候选人获胜。一年后，由于存在“不正当行为”，下加利福尼亚州有争议的竞选被宣布为无效，革命制度党宣称取得完全胜利。1969年，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拒绝接受在尤卡坦州州长竞选中许多人认为是国家行动党获胜的事实，派军队去保障法律和秩序（以及革命制度党的胜利）。

迪亚斯·奥尔达斯继续执行培植与美国紧密关系的政策，尽管1965年时关系有点紧张，当时墨西哥——与其他4个拉美国家一起——拒绝支持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领。1969年下半年，当尼克松政府的“拦截行动计划”（这是反毒品的一个直接手段）导致边界地区社会和商业往来中断时，迪亚斯·奥尔达斯也表示了抗议。但双方都将这些完全视为小事一桩，墨美关系总起来说是平稳的。

与阿莱曼以来的历届政府相比，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与该国的私人部门建立了或许更为紧密的工作关系。这种联盟清楚地体现在税制改革问题上。政府提出要弥补墨西哥所得税法规中两个最明显的漏洞：一个漏洞是允许把总收入分割成独立的类目（这样每个类目只适用于较低的税率）；另一个漏洞是允许股票和证券的匿名所有。总统起初似乎支持这一措施，但不久取消了一些关键性条款。正如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梅纳所解释的，税制改革应出自协商、而不是通过命令来进行：

“在已经开始但还未结束的税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对全体居民中各不同团体的默然认可给予最优先考虑，因为就措施的必

要性以及这些措施实施的正义和适时性而言，没有各团体的全面信服，在任何制度下都不会有所作为。所得税法……的制订要倾听受到影响的各团体的观点。"①

换句话说，政府不应招惹私人部门的反对。最后通过的法律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

为了帮助国内工业，政府于1965年征收外加6%的附加关税，通过每年设立约1000个新的进口种类，扩大限额的作用，于是到这6年任期结束时，进口种类总数已达1.3万个。用克拉克·雷诺兹那令人难忘的语句来说，国家和本国的企业家们愉快地结成了一个"争取利润联盟"。②

对企业界表示出如此的主动，就需要迪亚斯·奥尔达斯一再坚持政府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劳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从1958—1959年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而工人统一联盟——鲁伊斯·科蒂内斯集中和巩固这些联系的努力——几乎变得有名无实。因此，1966年初，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监督了作为新机构的劳工大会（CT）的建立，这个新机构将认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至高无上的权力，重申政府与劳工之间的紧密联系。劳工大会承认贝拉斯克斯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会国家职工工会联合会（FSTSE）的领导作用，借此既发展与工人的联系，又发展与革命制度党内民众团体的牢固联系。传统的结构仍然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对包括劳工在内的城市集团的培植，是在牺牲农村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一次也没有把基本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从洛佩斯·马特奥斯1963年所确定的水平上提高，而

① 莱奥波尔多·索利斯：《墨西哥的经济政策改革：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实例研究》（纽约，1981年），第24—25页。

② 参见雷诺兹：《墨西哥经济：20世纪的结构与增长》（纽黑文，1970年），特别是第185—190页。

且把农业信贷占信贷总额的相对份额由1960年的15%减少为1970年的仅9%。1966年政府实施了一个粮仓方案，即所谓的“人民粮仓计划”，这显然是旨在向最贫穷的农民和小农提供对基本农产品（特别是玉米、豆类和小麦）适时和实际的支持价格的保障。但是贮藏设备体系因建设仓促、位置不佳和管理无能而遭受损害；到1971年，使用中的粮仓只有15%。农民中爆发了反对不公平待遇的零星斗争——抢占土地、饥饿游行、偶尔有暴力发生——但是农民的呼声却只是对牛弹琴。

恰恰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发动了大多数明星的骚乱。1964年行将结束之时，墨西哥城的实习医生举行了罢工，起初是为抗议取消他们的传统圣诞津贴，后来是为抗议其工作条件。1965年初，刚接任总统职位仅数月的迪亚斯·奥尔达斯会晤了罢工者及其温和的支持者，并发布了一项涉及某些要求（但不是全部要求）的法令。当1965年4月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年轻医生发动另一次罢工时，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实习医生们返回了工作岗位。当8月份他们宣布再次罢工时，政府报之以残酷的镇压。防暴警察占领了墨西哥城的“十一月二十日”医院，重要的支持者被投入监狱，迪亚斯·奥尔达斯在9月1日的国情演说中发出了严厉警告之后，200多罢工者被解雇，其他人返回了工作岗位。

相比之下，1968年的学生运动从根本上震憾了现存制度。墨西哥的学生运动具有悠久的传统。一般说来，制止骚乱，或通过有限度的暴力（如在格雷罗、莫雷利亚和索诺拉），或通过把校长撤职（如1966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和学生都承认并接受竞赛规则，即一套任何一方都不得违背的界限和准则。这次情况却不同了。

事件发端于1968年7月，当时警察驱散了由亲卡斯特罗的学生组织发动的一系列示威。7月26日（古巴革命纪念日），由工艺学院、查平戈农业学校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组织组成的松散联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为在骚乱中受伤和死亡的学生家庭

提供赔偿，释放被捕者，取消“分解社会”的反颠覆法，解散特别突出警察小队。否则，学生们将宣布总罢课。当局的回答是封闭校园，关闭联邦区所有与大学有关的机构。警察部队炮击圣伊尔德丰索预科学校（这次事件后来人称“火箭炮事件”），冲进学校大楼。另一支部队侵入国立美术学院，逮捕73名示威学生。迪亚斯·奥尔达斯在8月1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主动“张开双手”，但此时学生们已不愿和解了。

民众动员拉开了对抗阶段的序幕。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哈维尔·巴罗斯·谢拉以非凡的胆略领导了一次有8万人参加的公众游行，对警察违反大学自治的长期传统、侵占校园表示悲哀。8月13日的一次示威有约15万人参加。8月27日，在规模空前的活动中，约30万抗议者参加了由查普特佩克公园沿改革路到中央广场的游行。在这期间，学生们组织了全国罢工委员会，以协调行动，并进一步提出于7月份首次提出的那些要求，紧张加剧。由于墨西哥将于10月份主办奥运会，迪亚斯·奥尔达斯利用他9月1日的讲话指责抗议者搞反爱国主义的阴谋。全国罢工委员会提出一个对话建议，但没有实现。9月10日，通常是柔顺的参议院授权总统动员武装力量“保卫墨西哥内部和外部的安全”。[1]

事态于10月2日达到白热化，当时学生和支持者们聚集在一起，在墨西哥城商业区特拉特洛尔科公寓大楼前的宽阔广场上发表又一轮的演说和声明。事先没有警告，戴着白手套的保安人员指挥保安部队向无助的人群开火。至少有2000名示威者被逮捕。官方的一份报告承认，有49人死亡；《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了解到死亡人数可能有200人，另有数百人受伤。这是一场残忍的大屠杀，因而被铭记为墨西哥当代的“悲哀之夜”，即现存制度莫名其妙地毁灭自己的青年的蛮荒时刻。学校重新开学，全国罢工委员会被解散，但特拉特洛尔科给墨西哥社会和政治投下了深深

---

① 伊夫林·P·史蒂文斯：《墨西哥的抗议与回响》（剑桥，1974年），第228页。

的阴影。一些高级官员厌恶地辞职。谨慎的公众推测究竟谁负主要责任——是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联邦区长官阿方索·科罗纳·德尔罗萨尔，还是国防部长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或是总统本人？在深深的痛苦中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疑问：难道这是墨西哥奇迹的产物？难道它是政治稳定的代价？墨西哥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当许多人忙于痛苦的反思时，另一些人转向了暴力。恐怖主义团体开始在城市出现，最著名的是 9 月 23 日联盟，起来造反的农民遁入山区。这一时期最知名的农民革命家是卢西奥·卡瓦尼亚斯。他于 1968 年在格雷罗山区开始组建游击运动；随后他和他的小队赢得了巨大声望，曾一度绑架了州长，但他于 1974 年死于军队手里。暴力只能招致更大规模的暴力。

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对于导致知识界逐渐疏远政府有更长远的影响。在墨西哥革命后的几十年内，该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倾向于与国家当局合作。兴办教育是墨西哥革命领导人的一个首要目标，各大学发展成为培养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场所。艺术家和作家们献身于阐述和表达构成国家共识基础的那种政治思想，这一系列设想把墨西哥革命的遗产赋予国家。墨西哥政府默认这种服务，不断培养与知识界人士的联系，赞赏他们的尽心尽力，时常鼓励他们加入半荣誉性的公共机构。国家与知识界彼此既互相需要，又互相支持。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损害了这个传统的盟约。像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这些最主要的作家都强烈谴责镇压——这方面的记忆激起了一个特拉特洛尔科文学流派——作家们开始对于对青年发动如此残酷镇压的政权的基本合法性提出质疑。① 日益激进化的各大学成了反对派的温床。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对双方来说都很充实），退化成彼此怨恨和公开敌

① 参见多利·J·扬：《墨西哥文学对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反应》，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 20 卷第 2 期（1985 年）：71—85 页。

视。特科特洛尔科事件虽然一点也不意味着现存制度的完结，但它在国家大厦之上打开了一个难以弥合的裂隙。

迪亚斯·奥尔达斯6年任期的届满也带来了战后墨西哥经济奇迹时期的结束，即以持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稳定为标志的稳定增长时期的结束。在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梅纳（在洛佩斯·马特奥斯和迪亚斯·奥尔达斯两届政府中任财政部长）和长期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罗德里戈·戈麦斯的灵巧安排下，在经济政策中采用了一系列的财政和金融手段：有利于再投资、有利于公共部门支出和国外借贷以及有利于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税收刺激。利率固定在有吸引力的水平上（高于当时美国的利率），以鼓励国内储蓄和外国投资。照常规标准，墨西哥战后的工业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功：在60年代的10年里，墨西哥保持每年约7%左右的高增长水平，并且——尽管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获得人均3.3%的稳定增长率。通货膨胀不高，每年约3.5%，比索与美元的比率保持在12.50比索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

然而，“稳定发展”战略开始显现出它的弱点。如果说硬通货政策已成为政治制度稳定和力量的象征，那么它也带来了经济负担，它丝毫不阻碍出口，因为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一般高于美国（实际上，1964年高增长通货膨胀出现后，到60年代中期比索变得定值过高，但这主要被越南战争所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所掩盖住了）。定值过高的影响逐渐在贸易赤字中显示出来，贸易赤字由1965年的3.67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9.46亿美元。于是在这个时期墨西哥开始在国外举借资本，到1970年，该国债务（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累计约42亿美元。失业（和就业不足）保持在高水平上。[1] 到60年代中期，由于农业衰竭，已开始需要大规模

---

[1] 见克拉克·W·雷诺兹：《为什么墨西哥的“稳定发展”实际上不稳定（以及对将来的某些影响）》，《世界发展》第6卷，第7—8期（1978年7—8月）：1005—1018。

进口粮食。[1] 就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成就达到顶点时，困难的征兆出现了。这个党远没有完结，但光泽开始暗淡。

1970—1988 年

墨西哥的政治制度在解决整个 60 年代困扰该国的危机与挑战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效力。由国家指导的一系列方案——补贴、物价控制、工资协议——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充分、有形的好处，从而从总体上防止对现存制度构成的任何严重的激烈挑战。这样的政策或许不符合传统的经济学说，但它实现了关键的政治目标：工人和农民二者依旧是现存制度的基本支柱。不满情绪主要出现在中产阶级之中，出现在医生和学生中。尽管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给后代留下了令人痛苦的遗产，然而政府已表现出克服这种事件的恢复力。

70 年代，墨西哥继续经历急剧的社会变革。尽管增长率下降，人口却从 1970 年的不足 5000 万增加到 1980 年的 7000 万，1985 年近 8000 万。每年差不多有 100 万新人加入劳动大军，对创造就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墨西哥人处于运动之中：移居者不断动身去寻找工作，他们或流入城市，或越过边界进入美国（雇工协定已于 1964 年到期，他们在那里被宣布为"非法外国人"）。美国的危言耸听者和政治家们强烈谴责他们所认为的"无声的入侵"，宣称在美国的"非法者"有 800—1200 万人。尽管详细的调查表明大多数"无证工人"已返回墨西哥，而且累计人数可能一直在 150 万至 350 万之间，但这没有阻止住针对墨西哥的排外主义巨浪。[2]

人口的增长及社会流动性也推动了墨西哥城的膨胀，到 80 年

---

① 埃斯泰瓦明确地把 1965 年看作是转折点：《战斗》，第 17、71 页。

② 肯尼思·希尔：《非法侨民：一种评估》，见丹尼尔·B·莱文、肯尼斯·希尔和罗伯特·沃伦（合编）：《外来移民统计：一个被忽略的故事》（华盛顿，1985 年），第 225—270 页。

代中期它已膨胀为拥有1400—1600万居民的特大城市。这种增长有约一半来自国内的迁移（该国迁移者中确实有约一半奔向首都）。按照官方统计，在墨西哥城及其周围地区，如内察瓦尔科约特至少有500万穷人。内察瓦尔科约特是在联邦区之外的一个发展中的社区，60年代开始成为擅自占地者的居住地，到80年代据说已有200多万居民。尽管贫困如此扩展，但中产阶级在数量和声望上有所增长，到80年代初期或许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对“稳定发展”所带来利润的不均衡分配也使一个上层社会致富，这个富裕、出身名门的阶层可能占总人口的1%或2%。中上层社会的扩展在消费方式上变得尤为显而易见：到洛杉矶和休斯敦周末旅行购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注册的汽车数量由1970年的120万辆增至1980年的430万辆（有时仿佛所有汽车都挤到了墨西哥城闹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时期还见证了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日益与该国的中心疏远。到1980年，居住在蒂华纳、华雷斯城和马塔莫罗斯这些边境城镇的居民超过340万。奇瓦瓦、托雷翁、坦皮科和蒙特雷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和规模继续增长。有25万人在特殊的“客户”工厂工作，这些工厂生产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其数量随美国的需要而波动）。许多北方人通常是坚定的独立派，开始认为自己与墨西哥城的“奇兰戈”(Chilangos)。①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观念有时会推动对现政权和革命制度党的反抗。实际上，这可能反映了一个甚至更加重要的进程——墨西哥“公民社会”的出现（不管其形式多么粗略）。独立的公民组织在各领域涌现，无需寻求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专业人员、商人、大学师生和其他人士对现政权开始采取一种更加独立、较少顺从的态度，从表面的印象看，似乎政治文化正变得更加主动和具有分享的性质，

① 外地人对首都墨西哥城人的称呼，一般用于贬意。——译者

而较少被动和顺从。[1]它也采取了新的形式，主要是通过对选举进程的真实性表示日益关心。对某些人不详的是，更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天主教会作为一支公共社会力量部分地再现于社会。几十年来，教会与政府间存在一项关于双方互不干扰的默契——只要教士不介入政治。这种情况开始变化。例如，1983年教会努力阻止了一个使人工流产合法化的步骤。1986年，一位大主教公开谴责选举舞弊。消息灵通圈内人士的谈话通常推动了对天主事工会[2]神秘力的认真思索。

随着政府与知识分子间裂痕的加深，一个独立的新闻界开始出现。被撤职的著名报纸《至上报》编辑胡利奥·谢雷尔·加西亚，带领他的许多一流的作者，创办了新闻杂志《进程》周刊。一份新的日报《一加一》，向《至上报》——墨西哥城最重要报纸——的地位发起了挑战。1984年，由该国最知名的年轻知识分子领导的《每日报》仿而效之。像《联系》这样模仿《纽约图书评论》的评论性刊物还提供了更多的发泄通道。实际上，激进的政府批评者们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他们仍然取决于官方的忍耐，他们会因违犯法律而付出高 的代价（新闻工作者成为受攻击的共同目标，一些人——像众所周知的曼努埃尔·布恩迪亚——甚至被谋杀）。持不同政见者主要局限于墨西哥城的出版媒体，电视仍被亲当局的势力牢牢控制，而无线电广播则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但可准许的范围已被拉大——可能性的领域也增加了。

1970年，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成为战后墨西哥第5位总统。他似乎是墨西哥政治精英的化身。他1922年生于墨西哥城，就读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并曾在那里教书。他婚

① 关于这一点的有力证据简直不存在，关于最近作品的观点，参见安·L·克雷格和韦恩·A·科尼利厄斯：《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连续性和修正主义的解释》，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悉尼·韦尔巴（编）：《再论公民文化》（波士顿，1980），第325—393页。

② Opus Dei——天主事工会，天主教在俗人员和司铎的组织。——译者

后成为哈利斯科州一个著名政治家族的成员，迅速加入了革命制度党，更为重要的是，加入了该党主席鲁道夫·桑切斯·塔沃阿达的集团。塔沃阿达死后，埃切维里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官方的市长”，通过自己在洛佩斯·马特奥斯竞选期间所做的工作，赢及了声望；1958 年在迪亚斯·奥尔达斯手下他捞到了关键的内务部副部长一职。1964 年迪亚斯·奥尔达斯担任总统职务后，埃切维里亚获得了部长的职务。6 年之后，他重复了阿莱曼、鲁伊斯·科蒂内斯和迪亚斯·奥尔达斯以前所走的道路，由内务部入主总统府。

埃切维里亚在自己的整个生涯中，一直在幕后认真辛勤地工作。他是自墨西哥革命以来第一位未曾担任过任何由选举产生的职务的宪法总统。在那些年中，他已成为官僚政治活动的行家里手。只一件事——即 1968 年对学生的大屠杀——就使他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尽管许多人认为他对赤裸裸暴力的那种野蛮展示负有责任，但对他所起的作用一点也不清楚。尽管（或可能是由于）有那一事件，但他仍设法排挤了几位争夺总统职务的强有力的对手，其中包括联邦区首脑阿方索·科罗纳·德尔罗萨尔、农业部长胡安·希尔·普雷西亚多、总统府部长埃米利奥·马丁内斯·马瑙托以及被广泛认为是墨西哥经济奇迹设计师的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梅纳。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是一个稳重和雄心勃勃的男子汉，秃顶，戴眼镜，不嗜烟酒，整洁，是墨西哥新教养的尽善尽美的表达：由官僚而成为总统。

埃切维里亚展示了在内务部任职时的经验，他迅速开始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从一开始就力求孤立和清除一些竞争的集团，直截了当地不给他的主要总统职位竞争者之一的阿方索·科罗纳·德尔罗萨尔在内阁中安排职位。1971 年 6 月，准军事性的暴徒对学生进行血腥攻击的事件，为他消除当时任联邦区首脑的阿方索·马丁内斯·多明格斯提供了机会。埃切维里亚把多达 5 个州（格雷罗、新莱昂、布埃布拉、伊达尔戈、索诺拉）的

州长撤职，并频繁更换其内阁成员，到1976年11月，17位部长中只有6人仍担任其原来的职务。埃切维里亚从青年骨干（通常是30岁刚出头）中培植他自己的政治基础，把最高级和敏感的职务授予这些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莱霍，胡安·何塞·布雷默，伊格纳西奥·奥瓦利，福斯托·萨帕塔，这些人都成了最终被嘲笑为"少壮统治"的傀儡人物。观点和年龄两者都表明这是一代新人，他们由总统培植并由总统引入政权，这个集团在此后的许多年内可能仍然受他的恩惠。这也表现出（也许是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之后）他想与该国知识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

埃切维里亚一上台，便显示出了他个性的力量。他急切，精神饱满，以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恶果中重建正式合法性的激情开始他的工作，试图创造出一种对话方式。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开端"的对话中，他自己将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强加一场体制改革）。他激励他的同胞以"创造性的痛苦"辛勤工作，而且显然希望成为现代的卡德纳斯，为此他周游各地，接见各类人士，发表演说和声明，演讲再演讲；丹尼尔·科西奥·比利加斯夸张地说，演讲看来是新总统的一个"生理需要"。埃切维里亚的统治方式既非制度化的，也非官僚主义化的。它具有极端、强烈的个人特征，他的作风和言论呈现出一种高度民众主义的色彩。①

当美国承认它在越南的失败而忙于与苏联缓和关系时，埃切维里亚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把墨西哥确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而把他自己塑造为主要的代言人。他时常对美国提出批评，他遍访各地，于1973年抵达中国。他与萨尔瓦多·阿连德互访，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接待了数百名智利流亡者（包括阿连德的遗孀），最后撤消了对智利军政权的承认。在联合国，他于1975年发起了一个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他指示墨西哥大使赞同一项反

① 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执政的个人风格》（墨西哥城，1975年），第1页。

以色列的、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决议（这引起了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发起旅游抵制，在下一轮投票上，墨西哥就默默地弃权了）。由于大大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声望，在其总统任期接近结束时，埃切维里亚还提出他自己做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

在国内，经济的下降趋势构成了对政府的直接挑战。埃切维里亚最初的反应是调整和修改传统政策，而不是进行任何较大范围的革新。为了压缩赤字，他的财政部长试图缩小政府开支，但由此而导致的公共投资下降造成1971—1972年的经济急剧衰退（增长率不足4%）。1971年8月改变外汇政策的机会出现了，当时尼克松总统采取了引人注目的对进口产品征税10%的措施（包括对墨西哥的产品，这样就导致两国间“特殊关系”这一观念的完结），并使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在国际市场上浮动。埃切维里亚的一些顾问认为，这也是使比索浮动或贬值的时机，而不是让它钉住美元。但财政部长乌戈·马加因很快表示不同意。他说，货币贬值“这个词在我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①]

对长期存在的税收政策问题，埃切维里亚也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到1972年下半年，他的经济顾问们以迪亚斯·奥尔达斯于1964—1965年已完全放弃的税收议案为基础，拼凑出了一个税收议案，这个建议将面临分割收入和匿名持有的问题。深深有感于这一建议的威力，总统指示他的财政部长向私人部门代表解释这个议案。马加因在他的私人寓所主持召开了与来自工业协会联合会和全国加工工业协会的主要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两次会议。企业家们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据一位高级顾问说，财政部长（他是前驻美国大使）显示出了他全部的外交技能，对他的客人们“强词夺理的语气不予置理”，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都予

① 索利斯：《经济政策》，第61页。

以反击。可是，未作任何解释，政府突然放弃了整个计划。[1] 显然奥尔蒂斯·梅纳60年代的断言依然有效：税制改革不能在违背私人部门意愿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同时，埃切维里亚正准备放弃过时的“稳定发展”方案，而支持一项他开始称之为“分享发展”的计划。1973年这一年标志着50年代末和60年代金融繁荣的最终完结。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埃切维里亚任命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为新的财政部长。这位新部长立即开始采取断然措施。先是能源提价（煤气和电），紧接着于1973年9月提高工资，以及对基本消费品价格实行控制。当企业家们谴责这些措施时——私下以资本外逃相威胁——埃切维里亚以激昂和愤怒的语气作出了回答。在1973年的国情演说中，总统批评了闲置的工业生产力，把对政府的非难抨击为“只对反动集团利益有好处的谎言”。一年之后，他即席发挥，对投机者进行了强烈谴责：这些“有钱的小人”“被人民、被他们自己的儿女所蔑视，因为他们没有为他们的儿女而加强祖国的实力”。[2] 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契约处于紧张状态。

随着埃切维里亚“分享发展”战略的成形，它开始既强调分配的重要性，也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据认为，基于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民众应有必要有效地分享增长的好处。为实现这一目标和实施必要的政策，国家应该是一支强大和自主的力量；私人资本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利润应远不如社会公平重要。鉴于“稳定发展”依赖于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一种紧密的联盟，“分享发展”模式的政治逻辑提倡强大国家保护之下的工人和农民结成一种民众主义联盟。

“分享发展”特别强调农业部门和长期受苦难的农民。这一方针确定的体制基础是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CONASUPO），

---

① 索利斯：《经济政策》，第75—76页。

② 索利斯：《经济政策》，第81—82页。

这是一个肩负三项重大任务的常设组织：调节基本商品市场，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保证低收入消费者可得到基本商品。当然，这些目标可能是矛盾的，而且从阿莱曼到迪亚斯·奥尔达斯，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及其前身都倾向于以牺牲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来保护城市消费者的利益。正如埃切维里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坦率地所说的那样："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的传统作用……一直是保护消费者。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保持物价稳定，特别是城市地区的物价稳定，以保持低工资和刺激工业。这就是为什么零售商店联营，在城市地区增长如此显著以及为什么在最高产地区收购粮食却很少考虑保护生产者的原因。"①

在埃切维里亚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将有所变化。1970 年，墨西哥不得不进口 76 万吨粮食，这一象征性的和经济上的后退显然使总统大吃一惊。他把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置于有能力、富有经验的行政官员豪尔赫·德拉韦加·多明格斯的管理之下，其手下的工作人员费时近两年调查该国的农业问题。调查组于 1972 年年中提出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认为以前的农业政策过分地强调现代的、机械化的商品部门(主要是在北部地区)。自给和收入再分配的关键在于传统的粮食生产部门(主要在中部和南部地区)。主要的障碍不仅仅是市场的力量，而且是中间人的作用，这些通常很有势力的权贵们在上级当局的赞同和支持下，控制着村庄或地区。在调查组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一项"整体的"发展计划。这一计划将超越当地权贵的权力，而直接扩展到农民之中。因此，国家应该介入以帮助贫困者，由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提供一整套服务(公正的投入价格，对收获物予以适当的价格支持，充足的信贷和贮藏设备，对再投资提供销售和咨询援助)。

农村发展的整体计划不久便成为国家的政策，成为埃切维里

---

① 梅里利·塞里尔·格林德尔：《墨西哥的官僚、政治家和农民：公共政策实例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77 年)，第 75 页。

亚本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在他的6年任期结束时，农业占联邦预算的20%，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高数字（当时米格尔·阿莱曼把资金投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由于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自身的预算增加了5倍，它已发展成拥有1.5万名雇员的庞大机构（包括附属公司）。它的代购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低收入的农民；零售商店既在城市又在农村迅速增长，其总数由1970年的约1500家增加到1976年的2700家。但是农业计划仅仅取得有限的成功。挑战当然是巨大的。诸如农业部等对手组织中不热心的官僚的阻力是很大的。权贵们的固执是十分突出的。最后，得到大量赞许的整体发展计划成为官僚主义惰性和总统职位继承问题上的政治活动（这在1974年下半年已经开始）的牺牲品。

对"分享发展"的支持还恢复了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最初几年，埃切维里亚和劳工部长波菲里奥·穆尼奥斯·莱多努力削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领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的权力，甚至萌发了将其赶下台的念头。政府的一个策略是给起来造反的"独立"工人运动以默默的鼓励，这一运动在汽车工人、铁路工人和电力工人中变得特别强大——在这些最现代化和机械化的部门，传统的主从关系比较脆弱。抱着这种想法，埃切维里亚对明确蔑视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独立工人联盟（UOI）给予法律上的承认。然而，当1973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埃切维里亚认识到有必要由贝拉斯克斯控制基层民众关于增加补偿性工资的要求。因此总统改变了主意。由于贝拉斯克斯的领导权得到政府的支持，他得以继续保留其延长了的最高地位。独立运动减弱（到1978年它仅占劳工大会成员的7%）。① 劳工又被牢牢控制。

然而，埃切维里亚继续奉行一种积极的、以增长为方向的经济政策。与他的民族主义的和第三世界的观点相一致，墨西哥于1973年通过了新法律来整顿——但决不是取消——外国企业特

① 见米德尔布鲁克：《政治经济》，第316页。

别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很巨大的国家作用大大扩展，政府总收入由 197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8%上升到 1975 年的约 12.5%。公共开支倾注于住房、学校教育和其他发展计划。农业信贷增加，国家生产原油、电力和钢铁的能力翻了一番。埃切维里亚因此而骄傲地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平均 5.6%的增长率增长。然而，国家活动的扩张使埃切维里亚经常与陷入跨国公司和墨西哥政府夹缝中的国内私人部门发生冲突，只有最强大的地方公司才能生存下去，政府买下了许多较弱小公司的全部产权（国营公司的数量显著增长，在埃切维里亚政权期间由 86 家增长到 740 家）。1970 年到 1976 年间，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约 18%（上一个 6 年约为 12%），联邦赤字增长了 6 倍。这助长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每年上涨约 22%——这依次又造成墨西哥商品要价过高，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失去销路。因此，1973 年到 1975 年间，国际收支逆差增加了 2 倍——这就对比索的价值造成了巨大，最终是压倒性的压力。

随着 6 年任期结束的到来，有迹象表明：依旧年轻的埃切维里亚企图扩大和永远保留自己的影响。他的内阁部长中有 5 位离职，以便担任州长职务，在总统任期刚刚结束后，第 6 位部长就参加了另一州长职位的竞选。几位副部长也已成为州长。许多观察家注意到，所有这些埃切维里亚派政治家，在总统离职之后，将会被稳固地安置在各州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埃切维里亚打破了所有先例，他公开号召对即将到来的总统职务继承给予注意。他在 1974 年下半年指出："对于舆论来说，对与总统职务继承有关的人物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有用的，这样对它也有益处……我认为，舆论将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明确表示出所钟爱的人物，但在此期间，每一个人都是研究、观察和评判的对象。这就是在民主之路上的健康发展。"① 他后来还讲过这个问题。1975 年 4 月，水利资源部

---

① 安德列斯·蒙特马约尔·H：《命中注定》（蒙特雷，1975），第 8 页。

长莱安德罗·罗维罗萨·瓦德宣布了可能的竞争者名单，这使新闻界大吃一惊。这一步骤如此新颖，它只能是由埃切维里亚提示出来的，这也许是为了表明他自己对选举进程的控制。

这样展现在“舆论”面前的所谓“同类人物”有7位：42岁的马里奥·莫亚·帕伦西亚，是内务部埃切维里亚的继任者，正因为如此，他被广泛认为是竞争中的领先者；49岁的总统府秘书乌戈·塞万提斯·德尔里奥；54岁的财政部长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他是总统儿时的朋友；41岁的劳工部长波菲利奥·穆尼奥斯·莱多，他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54岁的社会保险协会主席卡洛斯·加尔韦斯·贝当古；44岁的农业改革部长奥古斯托·戈麦斯·比利亚努埃瓦；以及51岁的公共工程部长路易斯·恩里克·布拉卡蒙特斯。罗维罗萨·瓦德断言说：“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出类拔萃，每个人都一直令人敬佩地设法去完成埃切维里亚总统交给的任务。”①

在作这一宣布的时候，革命制度党主席赫苏斯·雷耶斯·埃罗莱斯宣布，该党打算为1976—1982年的政府起草一项“政府基本计划”。这个打算就是要制订一项政纲，即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承诺。在得到埃切维里亚的明确同意之后，雷耶斯·埃罗莱斯透露，计划将在9月下旬完成，并提交党的领导批准。候选人将于10月份选出，据认为他应是最有能力实现上述计划的人。提出的口号是：“首先是计划，然后才是人！”对一些人来说，埃切维里亚似乎找到了束缚其继任者手脚的一个新方法。9月22日上午，按照预定的时间表，雷耶斯·埃罗莱斯正主持召开一个关于“基本计划”的会议，这时他接到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当他返回会场时，显得不安和诧异，并于正午赶紧奔往“松林别墅”进行短暂探访。3位有希望当选总统的人——莫亚·帕伦西亚，塞万提斯·德尔里奥和加尔韦斯·贝当古——正在一次礼节性的午餐会上与埃切

① 《西班牙美洲》，1975年4月21日。

维里亚共进午餐。当一位助手插嘴时，据传莫亚·帕伦西亚变得面色苍白，并离开了餐桌。被选中的是洛佩斯·波蒂略。当时，菲德尔·贝拉斯克斯公开表明劳工支持财政部长，其他人也迅速加入这个行列。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一个意外，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震惊。全国农民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被问及农民团体是否会予以支持时，他问道："支持谁?"在给他看过一份以洛佩斯·波蒂略的名字为大字标题的当天下午的报纸之后，他只是点点头说："当然。"贝拉斯克斯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来到财政部大楼表示祝贺，这天傍晚垂头丧气的莫亚·帕伦西亚开始表示他自己的屈从："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是墨西哥革命所拥有的最好人选，让我们相信他。"①

恰恰在他们赶浪头的时候，政界人士对选择洛佩斯、波蒂略予以沉思。尽管他是总统终身的朋友，但在他相对短暂的公共生涯中，从来没有能够讨劳工或农民团体的喜欢。11 月中旬，埃切维里亚自己提供了一个线索，当时他做了如下这个惊人的宣布(再次打破了所有先例)，即洛佩斯·波蒂略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政治上牵挂最少，未曾达成过任何秘密或用心深远的协议，他把自己投身于为国家的服务之中，而不是沉溺于廉价的政治。"②对廉价政治的谴责被广泛地解释为是对莫亚·帕伦西亚的一种指责，(莫亚)一般被认为是拥有广泛支持的同类人物。但洛佩斯·波蒂略最伟大的财富也是他最大的不利条件：他没有自己的一帮人。在埃切维里亚看来，这可能是最容易从幕后加以控制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埃切维里亚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而洛佩斯·波蒂略则一如往常，仍处于掩蔽状态。1976 年 7 月的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杂乱的事件，这部分地由于国家行动党的一场内部分裂妨碍了其任何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使得竞选成为洛佩斯·

① 《至上报》，1975 年 9 月 23 日。

② 《至上报》，1975 年 11 月 13 日。

波蒂略与弃权之间的一场较量。在有选举资格的人口中有69%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4%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结果应是洛佩斯·波蒂略的胜利，他已把自己表现为随和和友好的——可亲的。

但一种不愉快感开始扩展。7月初，在当时墨西哥城最主要的报纸《至上报》（这是一家集体所有的合作企业）的员工中爆发了一场反叛。造反者采用了许多非法的手段，但政府当局——从埃切维里亚开始——拒不采取任何行动。造反成功了，社长职位易手而素来自豪的、批判性的声音即刻嘎然而止（离去的员工将去创建《进程》杂志）。既然据报道埃切维里亚已成为一个控制着37家日报的新报业集团的主要股东，其含义显得不祥。8月11日，一个身份不明的恐怖主义组织（可能是左派的“9.23联盟”）袭击了当选总统的妹妹玛加丽塔·洛佩斯·波蒂略乘坐的汽车。她本人虽安然无恙，但她的一名保镖被打死，另三名受伤，袭击者的头目被击毙。孤立地看，这一事件已足以使人感到不安，但下列未回答的问题深深令人困扰：谁是这次袭击的指使者？如果洛佩斯·波蒂略是真正的目标，那会怎么样呢？这种事情怎么能光天化日之下在墨西哥城发生呢？

接下来是毁灭性的打击。在官方予以否认数月之后，政府于8月31日将比索贬值，这是自1954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已达到不能容忍的限度，自上年4月以来，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逃，出口商品依然定价过高。因而，政府最终决定让比索“浮动”，让它寻找其新的定位——墨西哥银行于9月12日限定在19.90（兑换1美元），比长期12.50的汇率下降了37%。好象这还不够，政府于10月26日使比索再次浮动，汇率很快上升到26.50比索兑换1美元。在两个月之内，比索的国际价值被削减了一半。对那些视货币的地位为强大和稳定的一种征兆、是墨西哥经济奇迹的一种表现、是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标志的人来说，这的确是苦药一杯。

谣言开始增多。埃切维里亚在他最后一个国情演说中有所隐晦地谴责了对墨西哥的“阴险攻击”,[1] 于是流言蜚语在整个首都蔓延：将会发生对埃切维里亚夫人的袭击；将出现针对洛佩斯·波蒂略夫人的行动企图；有人将企图谋杀埃切维里亚的国防部长埃梅内西尔多·昆卡·迪亚斯；哈利斯科的一位地方首领已就著名的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的生命征求杀手。但最主要（最能赢得公众想象力）的谣言是所有谣言中最难以置信的：将会发生军事政变。起初，谣传政变将在 9 月 16 日即墨西哥独立纪念日发生，在此之后，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日期：11 月 20 日，即墨西哥革命纪念日，也就是说距埃切维里亚任期届满还有 10 天。11 月 29 日，首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没有激起对现制度的明显挑战。

特别是在 11 月间，北方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加深了公众的轻信。大约在该月月中，农民团体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杜兰戈抢占土地。这种行为反映出了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农民的怨恨情绪已郁积多年；这些对抗的新颖之处在于时机的选择，即在一届政府任期结束几天之前发生。11 月 20 日，不到最后时机不肯放弃权力的埃切维里亚突然征用索诺拉州私人所拥有的 10 万公顷肥沃土地，供集体村社使用。对这一行为感到义愤的土地所有者们举行抗议。在锡那罗亚州，约 2.8 万人宣布在田间停工。在一次支援示威活动中，普埃布拉、奇瓦瓦和新莱昂的实业家和商人参加了短暂的停工斗争。受到索诺拉州所取得的成果的鼓舞，农民们在杜兰戈和哈利斯科州侵占了更多的土地。

在就职典礼上，洛佩斯·波蒂略发出了要合作不要对抗这一意味深长的号召，接着任命了他的新班子。内阁领导人的来源之一出自总统自已的政治背景，即在他进行自己事业的过程中一直与之共事的人——负责经济政策的专家，像鲁道夫·莫克特苏马

---

① 《至上报》，1976 年 9 月 2 日。

·锡德、卡洛斯·特略和年轻的安德烈斯·奥泰萨。洛佩斯·波蒂略还吸收了一些私人朋友（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的安东尼奥·法雷尔·库维利亚斯、工会的佩德罗·奥赫达·保利亚达、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豪尔赫·迪亚斯·塞拉诺）和家族亲属（例如，其妹妹玛加丽塔成为内务部内一个部门的领导人）。政府最终受到了任人唯亲这一毁灭性的批评。洛佩斯·波蒂略正是以这些手段努力建造起了一个以对他本人的忠诚为共同特征的帮派。

为了扩大和加强民众对现政权的支持，洛佩斯·波蒂略采取了一项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战略：选举改革。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这一遗产投下的昏暗气氛依旧笼罩着该国政治，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埃切维里亚年代的混乱已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感。选举中的不投票现象引起了极大关注。显而易见，为了给反对派提供有秩序的渠道，尤其是由于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墨西哥真正革命党长期丧失其效力和追随者，现制度将不得不加以开放。另外，新的政党正开始出现，至少有一个属于右翼（1971 年建立的墨西哥民主党），但多数属于左翼：社会主义劳工党（PST，1973 年）；左派共产主义联盟（UIC，1973 年）；社会主义行动和团结运动（MAUS，1973 年）；墨西哥劳工党（PMT，1974 年）；墨西哥人民党（PPM，1975 年）；革命社会党（PSR，1976 年）；以及革命劳工党（PRT，1976 年）。

为了对这些新事物作出反应，1977 年 12 月的改革措施包含三项基本要素：首先，放宽对政党登记程序的限制（只要在任何全国性选举中获得总选票的 1.5%，或拥有 6.5 万名成员，即可获准登记）；其次，把众议院席位增加到 400 席，其中 300 席由简单多数票产生，每选区一席，100 席由比例代表制加以分配（换句话说，这些席位是留给各反对党的）；最后，扩大反对党和反对派候选人使用大众媒介的机会。最初，看来左派获益最大。按照新的登记法令，1979 年墨西哥共产党得以参加自 1946 年以来它第一次参加的选举，1981 年墨西哥共产党和其他几个左翼政党联合组

成了墨西哥统一社会党（PSUM）。并非所有的激进党派都加入了这个因内部分歧不久就陷于分裂的联盟，但仅组成一个统一的选举左派这一点就意味着国家政治进程和气氛的深刻变化。

然而，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反对派成为最严峻的挑战。到70年代中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许多推动力已经丧失，失业现象蔓延，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埃切维里亚那富有煽动性的讲话、他对农村抢占土地行为的容忍态度以及他与企业家集团的持续冲突，似乎更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当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于1976年12月就任总统职务时，许多墨西哥人正预期艰难时刻的来临。接着，该国发现了石油。

这看来是解决墨西哥问题的方法。在1938年没收外国所拥有的公司以后的几十年间，墨西哥在国际石油界的形象一直不太为人所注意。墨西哥石油公司充分有效地运转着，以非常低的价格为该国不断增长但相对节制的需求提供可靠的石油供应。出口微不足道，但进口偶尔是可观的。到1976年，连续的石油发现把墨西哥被证实的石油储量提高到约63亿桶；这暗示着墨西哥石油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对大鸿运的谈论开始了。对石油新发现的宣布，使官方对墨西哥石油储量的估量翻番、再翻番。到1979年9月，洛佩斯·波蒂略可以证实，该国石油和天然气矿藏包含的能量相当于458亿桶"已证实的"储量、450亿桶"很可能"的储量及1100亿桶"潜在的"储量——总共为2000亿桶（按照这种估计，墨西哥拥有世界已证实的原油储量的大约5%和世界已证实的天然气储量的3%）。

石油的发现在墨西哥政界激起了激烈争论。用这些贮藏物做些什么呢？由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左派要求限制石油的生产，以维护国家的传统，避免过度依赖购买者，防止发生像在伊朗这类国家所见到的那种社会混乱——通货膨胀、灰心和不平等。右派，主要是实业家，叫喊要实行一种快速发展政策，以偿清国家的债务，获取外汇储备，防止由替代能源引起的潜在商业威胁。一番

踌躇之后，洛佩斯·波蒂略政府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试图满足国内的需求并且每天出口125万桶。其目的是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支付进口品费用，而不出现通货膨胀或过分依赖石油销售。墨西哥政府官员发誓，墨西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这种恩泽感激涕零。[1] 然而，为了满足对外汇的需求，既为了促进增长，又为了应付债务，洛佩斯·波蒂略政府推进石油出口，把最高日出口量增加到每天150万桶。由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升（这主要归功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努力），墨西哥的收入也不断增加，石油收入1976年为3.11亿美元，1981年猛增至近140亿美元，此时占墨西哥出口的近3/4。在这期间，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作用相对下降，特别是农产品。墨西哥经济几乎不由自主地在经历一个“石油化”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战略似乎行得通。按实际价格（这就是说考虑到了通货膨胀），在最近的记忆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近些年来最快的：1978年为8.2%，1979年为9.2%，1980年为8.3%，1981年为8.1%。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考虑到这一时期美国和工业世界正在滞胀和衰退中挣扎，就尤为如此，它似乎证明了政府寻求石油引导增长的合理性，这一发展导致最重要的新就业机会的出现——在引人注目的1979年一年，就有近100万个新就业机会——它也增加了国家经济作用的重要性。

洛佩斯·波蒂略政府试图利用这一扩大的影响为长期遭受困扰的农业部门制订一项新的、连贯的政策。由于墨西哥继续进口基本粮食，且该国农业危机的征兆变得显而易见，洛佩斯·波蒂略及其顾问们制定并于1980年实施“墨西哥粮食体系”计划。目的是实现粮食生产自给，从而根除营养不良，以便一举坚持国家自主权。该战略是把石油出口的收入引入农村，用于基本粮食的

[1] 见加夫列尔·塞凯利：《墨西哥的石油政治经济学：1976—1982》（墨西哥城，1983）。

生产和消费—— 动人的口号是“播种石油”。“墨西哥粮食体系”是一项雄心勃勃、耗资巨大的计划，仅 1980 年一年就花费近 40 亿美元。天公作美使 1981 年粮食大丰收，粮食产量比干旱的 1979 年提高了近 30%。官员们宣称“墨西哥粮食体系”立竿见影。其他人则密切注视着天气，以一种深切的预感迎接 1982 年和 1983 年的干旱。

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掀起的 1979 年价格冲击显示出石油生产国显而易见的力量，石油收入也提高了墨西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尽管墨西哥从未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喜好模棱两可的官方观察员地位），但国家领导人坚定地认为，这种经济的力量可为对外事务中新的自信奠定基础。正如洛佩斯·波蒂略本人所喜欢说的那样：“世界上的国家可分为两类，即有油国和无油国。我们拥有石油。”① 在外交上保持不太为人所注目的形象几十年之后，墨西哥现在准备置身于国际舞台。好象是这种看法的反映，墨西哥充当了 1981 年 10 月在美丽的胜地——坎昆城举行的大规模南北对话的东道主。

在墨西哥对待不断发展的中美洲危机的立场上，这种感情的奔放变得尤为明显。当美国正在谴责苏联和古巴在该地峡的影响时，墨西哥官员却倾向于把该地区内的政治冲突视为对压迫和不平等历史状况的合乎逻辑的反应。怀着促进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对革命事业表示了公开的同情。墨西哥政府在 1979 年年中尼加拉瓜起义胜利前很久就断绝了与索摩查政权的关系，随后继续给桑地诺主义政权以明确的支持。1980 年，墨西哥（与委内瑞拉一道）开始以宽厚的条件向尼加拉瓜提供石油。次年，墨西哥与法国联合发出一项承认萨尔瓦多革命民主阵线（FDR，即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为“合法政治力量”的

---

① 引自乔治·W·格雷森：《墨西哥的机会：石油繁荣》，《外交政策》第 29 卷（1977—1978 年冬季号），第 65—89 页，特别是第 65 页。

呼吁。本大陆之外的力量对本半球事务的这种卷入违反了区域性外交的传统原则(这是自 1823 年门罗宣言出笼以来美国一直企图坚持的原则)，里根政府以不赞成的态度冷眼旁观。

1982 年 2 月，洛佩斯·波蒂略在马那瓜的一次讲话中公开表示，墨西哥愿为解决他所谓的阻碍在该地区“寻求和平的三个症结”提供帮助，这三个“症结”即萨尔瓦多内部冲突、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不信任及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敌意。他反复呼吁在萨尔瓦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提议美国和尼加拉瓜签订一项不侵犯条约，敦促美国政府与卡斯特罗政权之间进一步对话。因此，墨西哥正几乎自然而然地打算在地区性事务中发挥主要的领导作用。足以预料，美国对该倡议的反应充其量也只能是冷漠，进行了少数几次讨论，随后便不了了之。

洛佩斯·波蒂略的高增长经济战略承受了重大代价，一个基本的缺陷是贸易逆差。尽管出口值的增长引入注目，但进口量的增加更为迅速。结果是数额惊人的贸易赤字：1978 年为 21 亿美元，1979 年为 36 亿美元，1980 年为 32 亿美元，1981 年再度为 32 亿美元。经济的扩张需要进口，尤其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的进口，墨西哥依旧购多于销。这种赤字通常由与美国的两个特殊联系——旅游业和边境业务(包括客户工业的出口)所抵销。但是，到 1981 年，旅游业几乎全然没有出现盈余，因为具有高收入的墨西哥人在国外花费了大量金钱(定值过高的比索使在国外旅行变得便宜)，边境地区的工业因美国的衰退而遭受损失。1981 年，墨西哥总的国际收支赤字达到 117 亿美元，按照任何标准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甚至对一个有大量石油的国家也是如此。

同时，政府自身也负了债。为了实施高增长策略，洛佩斯·波蒂略政府着手费用高昂的计划，这些计划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参与。按相对价格来说，政府赤字由 70 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7%(这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保持这一水平)，增加到 1981 年的 14%和 1982 年的 18%。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仅有一种选择：

从国外借贷资金。墨西哥的私人企业和国家机构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寻求资本。外国银行家显然被石油的发现搞得眼花缭乱，即刻提供了大量贷款。国家的债务继续保持不可抗拒的上升势头，1977—1978年约为300亿美元，1980年为480亿美元，到1982年达到800多亿美元。这些债务的约3/4属于公共部门。通货膨胀加剧。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只有墨西哥在整个60年代成功地遏制住了通货膨胀，把年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左右或更低。在70年代中期，物价涨幅在20%左右，按国际标准这还算是适度的，但随后在洛佩斯·波蒂略政府的高增长战略条件下猛增到30—40%。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近100%。高通货膨胀降低了工人的购买力，特别是因为它来得如此迅猛，以致它有导致社会局势紧张的危险。墨西哥一家最大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最糟糕的事情肯定会出现，但没人预料到它会出现得如此之快。”①

洛佩斯·波蒂略政府的经济政策似乎有两个重大失误。一是过分依赖石油出口。墨西哥石油资源的提炼和销售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于是很大一部分石油美元收入被投回石油工业。虽然能源部门得到扩展，但其他经济部门却因此而萧条。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迫切的需要诱使洛佩斯·波蒂略竭力争取高增长率。另外，“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可能诱使他热衷于短期战略，这种短期战略可以在他不可连任的总统任期内获得实在的成就。总而言之，在石油收入还没有确实到手之前，墨西哥就开始将其用尽。因此墨西哥变得严重依赖于能源出口，而这就使该国容易遭受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损害。1981年中期，世界范围的（石油）供过于求导致价格猛跌。墨西哥试图遏制这一趋势，内部的政策争论导致豪尔赫·迪亚斯·塞拉诺突然被免去墨西哥石油公司主任的职务。洛佩斯·波蒂略最终不得不同意降低价格，然而这就造成出口收入锐减。

---

① 《波士顿环球报》，1982年10月3日。

第二个失误是比索依然定值过高。1980年和1981年，美元储备的持续枯竭（原因是贸易赤字和资本外逃）迫切要求比索贬值。这样的措施将会减少进口，增加出口，遏制资本外逃——因为与从前相比，美元可以值更多的比索。然而洛佩斯·波蒂略及其顾问们不赞同这么做，部分原因是经济无论如何正处于繁荣之中，部分原因是外债利率正处于上升状态（这需要用硬通货来偿付）。结果恰恰是更增强了贬值的迫切性，推动了更多的资本外逃。

更深层次的一个失误涉及公共生活的道德标准。由于各种原因，墨西哥社会长期以来容忍从政至富的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腐败。该传统的一个实际后果（如果不是动机的话）是允许具有一般背景的人把从政作为专门的职业；另一个后果是促使他们及早退出仕途，以便于人员周转（和扩大官场恩泽），这有助于实现现制度的稳定。但是即使在墨西哥，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根据一则流传甚广的传闻，洛佩斯·波蒂略及其朋友们超越了那些历史悠久的界限，他们自己大量侵吞公共财富，而且是以明目张胆的方式。总统在墨西哥城郊区为自己和家庭建造了一座外观华丽的宫殿式住宅，据可靠报道，政府官员们在赌台上"连眼都不眨一下"就输掉数十万美元。其直接的结果是使洛佩斯·波蒂略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责骂，其间接结果就是全部政治精英的品行和合法性成了问题。

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政治局面于1981年9月开始显露。当时洛佩斯·波蒂略透露了他所中意的总统职务继任人选。主要的候选人包括强硬和老练的劳工部长佩德罗·奥赫达·保利亚达，负责商务部工作的多才多艺的政治家（也是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前领导人）豪尔赫·德拉韦加·多明格斯，有技能的专家治国论者、预算和计划部长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前国防部长马塞利诺·加西亚·巴拉甘之子、革命制度党主席哈维尔·加西亚·帕尼亚瓜；主要是由于在内务部任职的缘故，老资格的政治家恩里克·奥利瓦雷斯·桑塔纳也成为侯选人。尽管据预

测（总统选举）将在 10 月、即坎昆北南会议之后揭晓，但总统还是在传统时间 9 月下旬就产生了。

被选中的人是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他是洛佩斯·波蒂略亲密的私人朋友（和过去的学生），在经济政策制订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尽管计划和预算部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总统，但德拉马德里表现出了总统这一职务所要求的智力和官僚政治能力等所有特性（包括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他仅有一个缺陷：作为具有一般优秀品质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从没担任过由选举产生的职务，且与革命制度党联系不密切。当党的主席加西亚·帕尼亚瓜公开表示对这一选择不悦而丧失职位时，这种情况就更加值得注意。

墨西哥经济困难的程度在 1982 年 2 月变得显而易见，当时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决定让比索在国际市场上"浮动"——就像埃切维里亚在 1976 年所做的那样——它迅速由 26 比索兑换 1 美元下跌到约 45 比索兑换 1 美元。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3 月，财政部长辞职。8 月，政府宣布再次比索贬值，进一步下跌到 75—80 比索兑换 1 美元。结果，墨西哥宣布，由于外汇短缺，它也许不能够履行其债务责任。"墨西哥危机"突然获得国际金融界的极度重视，因而要求它的主要代表——最著名的是美国联邦储备的保罗·沃尔克——迅速提出一项紧急缓解计划，以避免因一个主要债务国彻底无力偿债而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①]与此同时，洛佩斯·波蒂略斥责资本外流，谴责不利于比索的投机行为，抨击寻求不义之财的"贪婪之徒"。

1982 年 9 月 1 日，在每年一度的咨文中，洛佩斯·波蒂略宣布国家没收私有银行（外国人拥有的银行例外），这使他的听众大吃一惊。同时，政府对外汇汇率实行管制，用于商业目的的汇率立即确定为 70 比索兑换 1 美元，用于特惠业务的 50 比索兑换 1 美元。左派赞成国有化，因此可以预言，洛佩斯·波蒂略理应获

---

① 约瑟夫·克拉夫特：《救援墨西哥》（纽约 1984 年）。

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该措施尽管受到广泛批评，但对墨西哥政府来说，却代表着一系列似乎有道理的（即使是不可行的）选择。通过银行国有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外汇管制——洛佩斯·波蒂略使久负盛名的国家、私人部门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破裂。[①] 由于控制了70%以上的投资，国家现在能够努力单独干了，这样它可以巩固它与工人和农民的脆弱联盟。因此，洛佩斯·波蒂略企图复兴和加强墨西哥"民众主义的"政治选择，这是一种旨在通过有力和强大的国家调节和指导，使大量追随者紧跟杰出人物领导的模式。在这种努力中，总统不仅可以依靠传统政治家而且可以依靠民族主义专家的合作。洛佩斯·波蒂略以一种使人联想到卡德纳斯的风格，在他在职6年的最后签名上增添了令人注目的光彩。[②]

德拉马德里以近75%的选票赢得了7月4日的大选。但按照惯例的要求，他在12月1日自己就职之前一直保持沉默。当他的机会最终来到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财政民族主义"，号召进行社会和政府的"道德革新"。他承认，没收银行本身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他的政府奉行真正的复兴之路。"政府的头几个月将是艰巨和困难的"，他警告说："形势需要它。紧缩是强制性的。"[③]

德拉马德里任命了一个和他本人一样的熟练专家治国论者组成的清一色内阁，保留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的财政部长职务，让米格尔·曼塞拉（此人曾经反对外汇管制）重新担任中央银行行长。新总统以惊人的速度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重

① 应该指出，以后国有化是指国家既承担了债务又承担了银行所属公司的损失，但是这一客观现实与私人投资者和外国贷款人的主观观念很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继续谴责这一措施。

② 关于内幕人物对这些事件的描述，见卡洛斯·特略：《银行的国有化》（墨西哥城，1984）。

③ 德拉马德里就职演说的全文刊登在1982年12月2日的《一加一报》上。

新谈判债务的条件，其中的一个条款是把预算赤字由198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8%逐渐降为1985年的3.5%。他解除了对2500种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对另外2000种实行价格机动，他再次使比索浮动，于是自由市场汇价下降到约150比索兑换1美元。德拉马德里试图用这些措施恢复国际社会对墨西哥的信任，并以此来修复国家与外资部门的关系。

总统还采取了恢复和安抚当地企业界的措施。与洛佩斯·波蒂略对寻求利润的“贪婪之徒”进行强烈谴责形成鲜明对照，德拉马德里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赞扬了“有责任心和爱国的企业家——他们是大多数”。尽管银行的国有化不能逆转，但他明确表示，私人部门仍可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德拉马德里坚持认为，“国有化不是国家化”，“我们将不把社会国家化”。总统言行一致，于1983年1月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将允许把新国有化的银行34%的所有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2月，他宣布了一项扩大对“生产性”企业财政贷款的计划。是年下半年，政府开始向银行以前的所有者支付补偿金（以为期10年的债券支付）。

德拉马德里明确地努力恢复墨西哥传统的统治联盟：即国家、私人部门和外资部门的三方联盟。这一联盟起初是由阿莱曼建立的，一直指导着该国在战后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发展。这一战略将在社会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巩固权力，换句话说，把这一力量用作制订和实施政策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出于需要，或者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德拉马德里政府从一开始就沿着保守的方向前进。这一取向造成了该国政治阶级的混乱。德拉马德里的几乎所有内阁成员都来自专家阶层，这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的官僚政治和技术能力看来为完成紧缩计划提供了理想的凭证。政治家，即老资格的政客和党的领袖们，非常突出地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在革命制度党内有一些抱怨和牢骚，但没有明显的反抗。来自军方的迹象也不明朗，但德拉马德里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对军队的服务给予大肆吹捧，据广泛地认为，总统会竭尽全力使文人统治者与军队领

导人之间无声的合作关系保留原封不动。

德拉马德里的经济战略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而支付的负担落在了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头上：工人阶级。在整个1983年，通货膨胀上升了70—90%，但工人不得不满足于增加约25%左右的工资。最高限价和政府补助被取消，增加了基本必需品的费用。例如1983年7月，政府宣布玉米饼提价40%，面包提价100%。经济学家们估计，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每年以15—20%的速度下降。

因此，城市工人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83年中期的一轮工资谈判出现了僵局和对抗。约1000家公司的工人以罢工相威胁，这一情景一般只有通过讨论的延期（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才能避免。斗争曾一度公开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以劳工的名义要求冻结工资与物价，而德拉马德里则愤怒地谴责这一想法是“煽动”。虽然接着实现了和解，但劳工与政府的关系显然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提高粮食价格代表着一个深思熟虑的促进农业发展的尝试，但这并不预示任何大规模农业规划的出笼。德拉马德里放弃了墨西哥粮食体系及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其他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成分，并于1983年下半年用一个适度的粮食生产计划取而代之。1985年中期，他追加了一个所谓的全国农业总体发展规划，该计划几乎仅仅考虑到对基本农产品（玉米、豆类、小麦）最低保证价格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进行调整以及在雨水灌溉地区的某些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放在通过市场力量和价格刺激来提高生产，而不是加强分配。政府降低了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的作用，而是依赖于供给与需求的交互作用。曾经是革命核心的土地改革，似乎已经丧失了在国家议事日程上的地位。

总之，德拉马德里重新建立和稳固统治联盟的企图面临与支持现制度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城市工人阶级）疏远的危险。农民保持沉默，而且可能会依旧处于被控制之下，但是中产阶级的反

应仍令人怀疑，中产阶级已成为现政权的所有选民中最畅言无忌的，可能是最易发作的。或许是因为承认这一点，而且为了全面巩固他的支持，在被广泛认为是对洛佩斯·波蒂略及其合作者攻击的斗争中，德拉马德里继续坚持“道德革新”。1983年下半年，在社会上传言数月之后，德拉马德里政府追查前总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同事，以所谓的参与数百万美元的诈骗行为为由，对墨西哥石油公司前负责人、来自索诺拉州的参议员豪尔赫·迪亚斯·塞拉诺提出控告。后来得悉，前总统的妹妹阿莉西亚·洛佩斯·波蒂略成了一次类似调查的对象，但此次调查不久便停止了。一项单独的起诉导致墨西哥城前警察首脑、前总统的亲密朋友、绰号为“黑人”的阿图罗·杜拉索·莫雷诺最终被从美国引渡回来。这类控告在最近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它突出了德拉马德里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政府与洛佩斯·波蒂略政府划清界限的决心。

腐败因而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开问题，并使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复杂化，特别是就日益增多的毒品交易而言。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在1985年2月之前一直相当平稳，当时美国缉毒人员恩里克·卡马雷纳失踪，后来发现被谋杀——仅仅在美国国务院对墨西哥的反毒斗争给予特别赞扬一年之后。卡马雷纳事件发生后，华盛顿的官员开始指责说，流入美国的大麻和海洛因有大约1/3来自墨西哥，所流入的可卡因可能有30%是通过该国的。但墨西哥显然无力侦破卡马雷纳案件，加之后来的谋杀引发了关于腐败和掩盖真相的说法，——最显著地但不是全部地表现在1986年5月以主要保守分子、共和党人杰西·赫尔姆斯为主席的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听证会上。

德拉马德里政府愤怒地否认了与贩毒分子有联系的指控。确实，事态发展似乎证明了它的论点。数千名墨西哥警察和大约2.5万名军人被委派参加反毒斗争；数百人受伤或被杀。某些个别官员毫无疑问与拉斐尔·卡罗·金塔纳这类有影响的毒品大王协作，但是政治当局有充分理由反对毒品交易。毒品帝国的巩固，有

出现国中之国的危险，而且培养了一种腐败。这种腐败证明对政治权威不利。对毒品贸易的庇护不受政府控制（例如与70年代的石油繁荣形成对比），而且在政府财力不断下降的时刻，它构成一个令人讨厌的挑战。

随着所谓的辛普森-罗迪诺议案的通过（该议案1986年11月由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而成为法律），向美国移民的问题到了严重关头。这个法律被认为是对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大修改，它有两个重要规定：对故意雇佣非法外侨的雇主给予经济制裁，赦免那些能够证明自1982年1月起一直居住在美国的无证工人。美国国会还设想把边境巡逻队的规模增加50%（这需要一项单独的预算拨款）。这一法律的实施没有导致墨西哥危言耸听者不断预言的那种美国大规模驱逐非法入境者的情况，也没有造成美国官员们忧心忡忡地预测的那种大规模申请赦免的情况。看来似乎可能的是，该法律会鼓励雇主歧视具有墨西哥血统或种族外貌的工人，但甚至这也并非不言而喻。辛普森-罗迪诺法极有可能行不通。犹如以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所尝试的那样，对雇主予以制裁收效甚微。实际实施简直漏洞百出。假若如此，非法移民可望恢复到80年代中期的速度，一年可能达100万人次，但（因为大多数返回墨西哥）每年净外来移民在30万至50万之间。这样，在美国的无证墨西哥人总数将由300万人左右增加到90年代初的400万人或500万人。

部分是由于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部分是出自他自己的政治理智，德拉马德里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1983年初，墨西哥放弃了出头露面多的外交，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联合（即所谓的孔塔多拉集团），以探索在地区范围内调节中美洲冲突的可能性。秘鲁、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宣布支持孔塔多拉倡议，拥护这个总体战略。另一方面，里根政府继续显示缺乏热情。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清楚，没有强大美国的支持，孔塔多拉事业是不能成功的。不论最终结果怎样，墨西哥在孔塔多拉集团

中的作用标志着一个本质性的转变，既有别于洛佩斯·波蒂略时期的奔放、也（甚至是更显著地）不同于50年代外交的谨慎。

德拉马德里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总结果在6年任期过半时似乎还没有最终确定，1985年证明是特别困难的年头。很明显，首先是政府经济“调整”计划的成效不显著。生产率正在提高，但速度不快。由于年通货膨胀率仍在60%左右，劳工和中产阶级丧失了额外的真正购买力。外债总额高达960亿美元（1982年为820亿美元）；该年还本付息额总共为130亿美元，但国际收支逆差仅高于这一数额的一半，为70亿至80亿美元左右。投资规模小，资本外逃仍在50亿美元左右。1985年的公共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不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所规定的4%，这濒于借新债还旧债的边缘。

当时发生了两个外部冲击。一个是自然灾害。1985年9月19日上午7时19分，墨西哥城发生里氏8.1级强烈地震，当天晚上，该市再次遭受7.3级地震的袭击。老城区损失最为严重，那里倒塌的楼房至少使7000人丧生，或许达到2万人，正如世界在恐惧和惊愕中所旁观到的那样，可能有10万人受伤或无家可归。墨西哥城的市民以慷慨和勇气作出了回答，他们以一种自然的感情流露，为受害者提供了即刻的救护和避难所，这使得某些观察家注意到了“公民社会”的出现。据估计，直接经济损失在40亿美元左右，为债务困扰着的墨西哥几乎负担不起这一数目；根据一项估算，这对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4%更产生消极影响。也有政治方面的后果。瓦砾中透出腐败的迹象，因为一些倒塌的建筑不符合建筑标准。许多墨西哥人感到，政府对此所做的反应太小而且太迟，以致于德拉马德里不能起来应付这一紧张局面。出现了对墨西哥城过度集中化的忧虑，出现了要求联邦区长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总统任命的广泛呼声。基层群众的动员连续不断，并促成了一位内阁部长倒台。

第二个外部冲击是国际油价的突然下跌。在1985年12月到

1986年7月间，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平均价格由每桶23.70美元降到8.90美元，由此造成的石油销售收入损失约为82亿美元，这等于198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4%。依赖国际市场力量的代价再次变得显而易见。在这种经济病态的总形势下，德拉马德里及其顾问们决定进行政策的重大改变，以墨西哥经济在国内外的"自由化"为特征，进行长期的结构改革。

这一方案有两个主要支柱。一个是减少和重新确定国家的经济作用。从1983年到1985年，政府一直努力减少公共开支（多达1/3），但现在德拉马德里政府则主要是通过"私有化"计划力图重新确定国家的经济作用。政府在1982年下半年继承下来1115家公共所有的公司。到1986年下半年，德拉马德里设法卖掉了其中96家（包括旅馆业和汽车工业的一些主要产业），合并46家，转让给州政府39家。政府还关闭了约279家效率不高的工厂，其中包括蒙特雷附近的一家大型钢铁厂。在那些确定由政府控制的战略部门（石油、铁路、电力、电信），政府实行了一项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工业恢复"规划。国家机关辅助部门依旧庞大，但政府正采取削弱其作用的明确步骤。

新政策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商业自由化及经济的"开放"。其最明确的证明是墨西哥于1986年9月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意味着长期承诺打破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壁垒。这等于几乎完全放弃战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自由化有两个主要的必然结果。一个是逐步取消关税。1982年，墨西哥的进口全部由颁发许可证来控制；到1987年，仅有9%仍为这一限制性的方式所控制。一般说来，这意味着长期为本国工业生产者提供保护的墨西哥国内市场将向其他国家（自然特别是美国）的生产厂商开放。第二个必然的结果是促进出口，特别是非石油产品的出口。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控制的（高于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比索贬值，以提高墨西哥工业的竞争能力（1987年初，汇率达到1美元：1000比索以上，到该年中期美元与比索之比差不多为1：1400）。作为各种

措施的结果，非石油产品出口开始增加。制造业的出口每年达到10亿美元。政府官员还报告说，80年代初外逃的资本正在返回，1986—1987年可能多达30亿至50亿美元。

这些自由化政策等于墨西哥经济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变化。某些观察家预言，准备进行长期战斗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将作为墨西哥历史的分水岭而被载入史册。但80年代下半期墨西哥经济至少有两个巨大的障碍：通货膨胀和外债。通货膨胀（1986年为105%，1987年中期为140%）对墨西哥社会产生了腐蚀性影响，包括从阻碍投资（和出口）到对收入分配的灾难性影响。除了继续执行商业自由化计划和推进结构改革之外，政府官员没有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他显而易见的方法。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通货膨胀是对80年代后期政策的主要挑战。

在其任职的前半期，德拉马德里似乎把外债视为一个“流动资金”问题，而不是把它看成是结构上的一个缺陷。对现金管理的这种强调影响了与国际债权人的一系列谈判。1983—1985年，政府获准延期支付短期款项和降低费用（把高于国际利率的“利差”由2.3%左右降为不足1%）。但从1986年起，政府开始坚持主张恢复经济增长。在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导致具有超凡领导才能的财政部长赫苏斯·席尔瓦·埃尔佐戈索格于1986年6月突然被解职，许多人认为他是德拉马德里合乎逻辑的继承者。（针对什么问题发生争论不十分清楚：有传闻说席尔瓦·埃尔索格提出或单方面暂停还本付息和（或）实行像阿根廷奥斯特拉尔计划那样的“非正统休克疗法”）。在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初这一期间，墨西哥设法与其债权人谈判达成了一项新的一揽子交易，要求提供120亿美元新贷款帮助促成3—4%的经济增长。此款将在20年内偿还，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到每桶9美元以下，还可以得到追加资金。即使有这些条件，总的问题依旧存在：墨西哥怎样才能按照其债务义务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增长战略？到1987年下半年，债务总额可能已超过1000亿美元。

墨西哥能否继续支付每年80亿至120亿美元的还本付息额，同时满足其人民的需求呢？

除了这些经济上的问题之外，德拉马德里政府在政治战线上也面临严重挑战。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宣布的“道德革新”曾激起了下面这些希望：他会扩大1977年的改革，他会赞成为反对派获胜提供真正可能的公开选举。1982—1983年，国家行动党被默许赢得了北方（华雷斯城、埃莫西略、杜兰戈、奇瓦瓦和圣路易斯波托西）重要市政选举的重大胜利，对自由化的希望看来是有理由的。但另一方面，德拉马德里开始含糊其词。在南方，瓦哈卡州立法机关于1983年8月投票免去了胡奇坦市温和的左派市长、地峡工人、农民和学生联盟（COCEI）的莱奥波尔多·德吉维斯的职务。在经过激烈对抗之后，军队把联盟驱逐出了市政厅，并任命了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该候选人声称取得了11月选举的胜利。大约在此时，墨西哥城好像采用了折衷的解决办法：它将允许右派、但不允许左派赢得地方选举。

然而甚至这种推测在1985年也被打破了，当时议会补缺选举和北方几个关键州长的竞争开始引起极大注意。在索诺拉和新莱昂，国家行动党投入了特别强劲的候选人，国际新闻媒介云集以目睹反对派的斗争。无论实际结果如何，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声明获得几乎所有的胜利，在7个州长职务竞选中大获全胜，几乎获得了除少数几席外的众议院所有席位。所有选票中，革命制度党获得65%，国家行动党获15.5%，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得到3.2%，其余为各小党所得。作为选举程序的结果，国家行动党和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损失了在立法机关中的席位，而无足轻重的小党则获得了好处。由于革命制度党断言其拥有控制选举过程的能力，并使反对派屈从于分而胜之的手法，对欺骗行为的普遍谴责接踵而至。

1986年类似的情况更是有增无减。选举包括了4个州长职务的竞选，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北方的奇瓦瓦州。当革命制度党候

选人费尔南多·巴埃萨·梅伦德斯与国家行动党的弗郎西斯科·巴里奥斯·特拉萨斯之间的角逐接近结束时，反对派领导人——来自国家行动党、企业界和基督教会——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奇瓦瓦市国家行动党市长路易斯·H·阿尔瓦雷斯开始绝食抗议。当局急忙地作出回答，从奇瓦瓦和华雷斯城的注册登记中取消了左翼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的监票人，而反对派则通过封锁国家公路（包括与美国相连的桥梁）来回击。选举之日是平和的，不过革命制度党再次宣布取得完全胜利。按照官方的统计，巴埃萨以64.3%的选票击败巴里奥斯；革命制度党还赢得了所有其他三位州长的竞选，在109个市长职位中获得106个以及赢得几乎所有地方议员的选举。政治机器返回了“全套马车”，但德拉马德里总统声望大大下降。或者他准许革命制度党统治集团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放弃他的改革运动），或者他不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不顺从的各州首脑和地方权贵。此外，显然缺乏一项清晰的政治战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1987—1988年总统继承的推测开始增多。随着决策时间的临近，这次的继承似乎至少在三个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总统一职在体制上的权力看来不如以前那样居压倒的优势地位：它仍是该国最高的职务，但70年代和80年代的阵痛使其无上权威感黯然失色。因而如果说德拉马德里在选择他的继任者方面有最终决定权的话，那么似乎可能的是，他将不得不更密切地聆听其他人的意见——包括80高龄的工会首脑菲德尔·贝拉斯克斯的意见，他在工资率急剧下降的时期努力控制住了工会。第二，革命制度党领导人中的一个持不同政见集团——包括拉萨罗·卡德纳斯之子·米却肯州前州长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前内阁部长、曾是总统职务追求者及革命制度党前领导人的波菲利奥·穆尼奥斯·莱多——联合起来组成了民主派，并要求总统继承过程公开化。该派领导人在革命制度党和新闻界获得激烈的批判，因为这一发展几十年以来前所未见。第三，国

际媒介将对继承过程给予前所未有的注意。决定可能在幕后做出，但整个世界都会知道。

十分有特点的是，谣传在政治和知识圈中快速传播。席尔瓦·埃尔索格被赶出内阁（和竞争）的做法，在整个现存政治当局内产生了冲击波。随后任命老练的政治家和总统先前的竞争者豪尔赫·德拉韦加·多明格斯为革命制度党主席也是这样。某些观察家说主要有4位觊觎总统宝座的人，有人说有6位。企业组织墨西哥共和国企业主联合会COPARMEX发布了一项值得注意的报告，宣布有6位似乎可能争夺总统职位的候选人。[1]但通过一种无言的共识，多数注意力集中在3位身上：

51岁的内政部长曼努埃尔·巴特莱特·迪亚斯。他是塔瓦斯科州前州长的儿子，自1963年以来一直活跃在革命制度党内。许多人认为他已使德拉马德里认识了恢复"全套马车"选举战略的必要性。

44岁的能源和矿业部长阿尔弗雷多·德马索·冈萨雷斯。作为对国外有广博研究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德马索和他的父亲一样，担任着墨西哥州州长（1981—1986）。他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的门徒，与德拉马德里私人关系密切。

39岁的计划与预算部长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才智惊人。在获得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高级学位后，萨利纳斯在二十五六岁时便开始了公共行政生涯。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内阁部长和大使，1982—1988年是参议员。萨利纳斯被广泛地认为是德拉马德里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是强大国家的倡导者。

所有这些候选人同在现制度内共事，相对来说都很年轻，都是内阁部长，且与即将卸任的总统关系密切。但是，他们还具有

---

[1] 《至上报》，1987年5月15日。

另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表现为关于现政权演变与地位的一个生动信息：他们都是著名政治家的儿子。看来现制度确确实实地在进行自身的繁衍。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脱离如此持续存在下去，但是政治生涯会不会使墨西哥社会得到地位升迁的有意义的途径，这一点已经不清楚了。

激动情绪于1987年8月中旬加剧。当时，革命制度党首脑豪尔赫·德拉韦加·多明格斯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宣布，确实有6位候选人参加总统提名。他宣布说，他们将被邀在党的领导集团面前公开亮相，除巴特莱特、德马索和萨利纳斯外，名单中还包括联邦区长官拉蒙·阿吉雷·贝拉斯克斯，总检察长塞尔西奥·加西亚·拉米雷斯，教育部长米格尔·冈萨雷斯·阿韦拉尔。在那最庄严的政治早餐会上，这些先期候选人按照字母顺序依次出现在革命制度党要人面前，郑重其事地介绍各自关于国家前途的观点。为了寻找最终结果的线索，新闻界和政治团体密切关注每个人的举止和言词。以前几乎没有任何这类情况发生：它预示着总统挑选一个新的“民主化”进程吗？或者它仅仅是一种装点门面式的变化？

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挑选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意味着德拉马德里还保持着对继承过程的控制（这也突出了有组织劳工的政治软弱性）。的确，许多人认为，德拉马德里很可能在候选人公开亮相之前就已选定了萨利纳斯。1988年的总统职务继承至此遵循了以前的模式。接下来是选举运动，它通常只是鼓掌通过官方政党被提名者的一个好机会，但在1988年它变得远不止如此。

第一个重大发展是伴随1988年春天左派政党和民主运动组成联盟——全国民主阵线（FDN）而出现的。此外，阵线决定推举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卡德纳斯被提名为候选人，立即以选举上的真正反对派出现在统治当局面前。卡德纳斯不断求助于他父亲的名字，企图把工人和农民团结在共同

的旗帜之下。他求助于民族主义、主权、正义和改革的主题——总之，求助于久负盛名的墨西哥革命的事业。卡德纳斯宣称政府内的专家和革命制度党内的政治家们舍弃了人民的需要，提出立即找到解决国家经济危机的明确办法——包括中止石油出口和单方面延期偿付债务本息。卡德纳斯的候选人资格在全国各地吸引了可观的民众，这似乎对革命制度党的霸权构成了可能的威胁。与此同时，保守的国家行动党提名著名农业企业家、前革命制度党人和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家曼努埃尔·克劳西尔为候选人。克劳西尔把自由作为他竞选的主要主题——宗教信仰自由，私人企业自由和政治反对自由。他在私营部门、在中产阶级和——明显地——在新崛起的基督教会中寻求支持。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全国民主阵线和国家行动党的发言人在要求1988年选举自由和选举公开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这样，反对派使进行选举本身成为墨西哥政治的首要问题之一。

至于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他发挥了“现代化”的主题。他反复强调，墨西哥无需放弃其继承民族遗产的权利，它必须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培育和巩固其传统。经济的现代化需要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提高生产率和持续的结构改革。他在一篇题为“民主的挑战”的广泛而详尽的声明中宣布，政治现代化必须从选举法规的改革开始。立法机构应更为强大、更为独立，法院系统应更加完善，新闻界应发挥积极作用。他想象一个强大（但忠诚）的反对派：萨利纳斯在他的一个重要公开声明中宣布，“我们需要一批强大而负责的政党，它们尊重法律和体制，以民主方式扩大其社会基础。”他要求革命制度党进行内部改革，包括与地方选民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和完善挑选候选人的程序，为年轻候选人提供更多机会。这个讲话虽包含的是一般的原则，然而它却标志着对以前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凯旋式演说的明显偏离。“这是一个历史

性时刻”，萨利纳斯承认，“每个人都吵嚷着要求更多的民主”。①

随着选举的临近，紧张气氛加剧。卡德纳斯的两名竞选助手被谋杀。许多观察家担心爆发更广泛的暴力。然而，7月6日选举这一天是在相对平静中度过的。接着，仍担任内务部长的曼努埃尔·巴特莱特宣布，政府的计算机因“环境原因”发生故障。反对派发言人和众多观察家谴责革命制度党用欺骗手段操纵选举结果。在宣称获胜之后，萨利纳斯·德戈塔里不同寻常地评论说：“我们正在结束事实上的一党统治时期，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多数党和竞争中的激烈反对派的新的政治时期”。② 当选举委员会最终宣布萨利纳斯以基本多数票成为获胜者时——萨利纳斯获50.4%的选票，卡德纳斯得票为31.1%，克劳西尔获17.1%的选票——卡德纳斯派立即声称有欺诈行为，并发动了一些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国家行动党人则要求开展一次短暂的“公民抵制”运动。

这样，卡德纳斯以一种相对虚弱的地位开始了其6年任期。他不能够自称拥有以前的总统所具有的传统的压倒多数的民众授权(的确，48.4%的投票弃权率意味着萨利纳斯仅赢得约1/4成年人口的积极支持)。考虑到有争议的选举结果报告，他甚至不能宣称在完全清白的选举中获胜。此外，甚至按照官方数字，卡德纳斯运动也已确立为国内一支强大的选举力量。它能否将自己转变成一个持久的反对派政党尚有待观察。在众议院中，革命制度党拥有260席，而反对派共拥有240席。此外，反对派在参议院中赢得4个席位——包括联邦区的两个席位，在那里，全国民主阵线的伊菲亨尼亚·马丁内斯和波菲利奥·穆尼奥斯·莱多获得决定性胜利。正如统治当局不久所发现的那样，这预示着立法机关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在此之前，它一直是革命制度党和总统的被动和从属的工具。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继续和扩大其前任的

① 在革命制度党全国执委会上的讲话（普埃布拉，1988年7月）。
② 《至上报》，1988年7月8日。

经济“自由化”政策，以期获得经济增长的恢复，而且还面临着政治改革的挑战；墨西哥人民正以各种方式要求实现战后专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第 二 编

中 美 洲

第3章

1930年以来的中美洲概览

19世纪下半叶，中美洲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得到稳定的确立，通过农业出口——尤其是咖啡出口——与世界市场保持的永久性经济联系开始形成。这一进程首先最为成功地出现在哥斯达黎加；然后在不少流血代价以后出现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一进程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则是姗姗来迟和不完全的。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的落后性、国际咖啡市场的周期性危机以及寡头集团为控制政府而展开的政治斗争，都延缓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体制性稳定的发展。然而，在20世纪初，随着咖啡资产阶级和小小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社会阶层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政治生活虽不民主，然而是稳定的。

1914年，中美洲的总人口不足400万，其中约60%居住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社会基础——土地结构——具有3个特征：大规模的咖啡庄园由本国农场主控制，为出口而生产；香蕉种植园由外国人拥有，其垂直型一体化的生产与销售结构直接和北美市场相连；小土地所有制属于农民，他们种植基本的粮食等产品，供自己消费或满足国内需求（咖啡和香蕉占中美洲出口的80%）。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是：因终身债务而束缚于咖啡大庄园的雇农（年轻佃农）；美国人拥有的香蕉种植园中的农业工人；以及为数最多的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分益农①和那些收割季节的流动性

① 即用实物交租的佃农。——译者

日工。在哥斯达黎加，上述最后一类劳动力在数量上并不多；在洪都拉斯，自给自足的农民占主导地位，其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处于山区。

1930年以前，出口农业模式的好处从不受人怀疑。相反，在某些特定地区和在少数小团体中，高度的经济专业化和在外国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被看作是获得物质进步的良机。诚然，在出口生产的刺激下，确实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今天在中美洲的80%以上的铁路线，早在1910年左右就已筑成。在大西洋海岸，科尔特斯港、巴里奥斯港和利蒙（分别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被翻修，以减少与欧洲和北美洲市场直接通航的成本。金融和银行体系逐渐形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该地区已有23家银行，其中大部分以本国资本为基础。虽然电力网是有限的，1917年前仅仅为首都城市（危地马拉城、圣萨尔瓦多和圣何塞）服务，但是电报则将主要城市与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相连。

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始于19世纪后期；在英国于1901年根据《海—庞斯福特条约》同意缩小在那里的存在以后，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美国开始在巴拿马开凿一条连接两大洋的运河；巴拿马在美国的援助下于1903年从哥伦比亚获得独立；运河于1914年启用。1912年美国干预尼加拉瓜，并在那里驻扎军队，直到1933年，其中只有一段短时间的中断。与此同时，在各个政治动乱时期，华盛顿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向其他中美洲共和国强加其意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美洲的经济活动不仅仅是在农业、铁路和港口进行投资。在5个中美洲国家中，3个国家的电力服务落入北美人之手。75%的外贸是流向或来自美国（与战前相比增长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挤掉了德国）。这些发展产生出一段时间的相对繁荣，尤其在20年代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出口模式变得愈益巩固。在1929—1930年世界危机前的几年中，咖啡和香蕉的收入占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

尔瓦多出口收入的90%，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占70%（这两个国家的金、银矿开采仍然十分重要）。20年代的特点还包括政治稳定——至少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在哥斯达黎加，领导人是由胡安·里卡多·希门尼斯·奥雷亚穆诺和克莱托·冈萨雷斯·比克斯为代表的自由党“奥林匹亚派”；在危地马拉，何塞·马里亚·奥雷利亚纳和拉萨罗·查孔这两位自由党人在选举中相继取胜；萨尔瓦多则是在自由党人梅伦德斯——基尼奥内斯家族的领导下——在这种政治稳定中，寡头控制和统治结构的运转，可以同某种形式的选举和代议制民主（尽管有所局限）相适应。

当1929年的国际经济危机波及到中美洲时，这一危机就立即改变了外贸的动力，因为国际上对中美洲地区传统农产品的需求以及来自经济上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制成品的传统销售都有下降。世界萧条对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事实上，外贸达到最高水平的时间在尼加拉瓜是1926年，在危地马拉是1927年，在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是1928年，而在洪都拉斯，外汇收入的下降直到1931年才出现。同样，萧条周期的最低点也是以不同方式出现的。

但是，一般性地描述经济危机对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可行的，尽管各个国家有不同的特征。当地对萧条的感觉不是一种使经济生活陷人瘫痪的金融灾难，而是一个持续时间超过10年的停滞阶段，很少被过渡性的复苏所中断。因为中美洲国家一般都以农业作为其经济基础，以外部市场作为其动力的要素，还因为无法获得更完整的指数，所以只能用咖啡和香蕉的生产和出口的统计数字或者较好的是使用一般性外贸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危机的外部根源，其形式是国际需求下降，直到1945年以后才恢复上升；与国际需求下降相对应的就是进口的相应减少。这一切都是30年代国际危机以及萧条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综合影响。

表 3—1　　中美洲：1930—1945 年的对外贸易值

（单位：百万美元，时价）

年份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中美洲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930	51.6	33.0	22.0	20.0	54.9	26.0	13.4	16.0	27.5	11.0	169.4	106.0
1931	33.2	26.0	19.0	12.0	55.8	17.0	10.4	12.0	24.1	9.0	142.5	76.0
1932	23.3	15.0	9.0	9.0	55.6	12.0	7.0	7.0	14.4	5.0	109.3	48.0
1933	16.5	12.0	9.0	8.0	60.0	10.0	6.1	6.0	14.0	6.0	105.6	42.0
1934	19.2	12.0	9.0	5.0	52.6	12.0	4.6	5.0	8.2	9.0	93.6	46.0
1935	16.1	15.0	10.0	9.0	17.1	6.0	4.6	5.0	7.3	7.0	55.1	42.0
1936	22.0	18.0	10.0	8.0	11.2	5.0	3.5	6.0	7.8	8.0	54.5	45.0
1937	23.0	26.0	15.0	10.0	12.2	6.0	6.2	6.0	10.8	12.0	67.2	60.0
1938	23.5	26.0	10.0	9.0	15.9	10.0	4.3	6.0	9.3	13.0	63.0	64.0
1939	24.3	24.0	12.0	9.0	22.5	11.0	4.8	7.0	8.6	17.0	72.2	68.0
1940	15.6	20.0	10.0	8.0	22.3	11.0	3.7	8.0	7.0	17.0	58.6	64.0
1941	18.8	19.0	10.0	8.0	21.3	11.0	4.6	12.0	9.8	18.0	64.5	68.0
1942	26.7	14.0	17.0	9.0	20.3	12.0	5.6	8.0	10.2	12.0	79.8	55.0
1943	26.3	18.0	21.0	12.0	9.0	10.0	7.7	16.0	12.2	20.0	76.2	76.0
1944	31.1	21.0	22.0	12.0	19.8	14.0	7.8	12.0	10.4	22.0	91.1	81.0
1945	39.7	23.0	21.0	13.0	27.6	15.0	6.9	14.0	11.5	27.0	106.7	92.0

资料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交换价格的关系》（圣地亚哥，1976 年），第 35、43、45、49、53 页。

从表 3—1 中可以看出，地区性的生产或出口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崩溃，而是呈现出一种之字形模式。这一模式表明：在最初几年内，下降的平均幅度与前 10 年的最高点相比相当于出口值的 50%，这严重限制了进口能力。1931 年金本位的国际性崩溃对汇率产生了问题；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拒不贬值，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则在将其货币浮动后于 1931 年和 1933 年之间进行贬值（尼加拉瓜于 1937 年仿效之）。受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而且它们的复苏都较慢，复苏的水平也低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除此以外，尼加拉瓜的贸易收支逆差持续了 15 年。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 1936—1939 年期间的停滞稍

有减轻，尤其在1937年；但是欧洲战争导致的国际商业的瘫痪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对外部门发生问题（见表3—1)。外贸、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总的说来直到1945年才回升，在有些国家，如洪都拉斯，甚至更晚。

国内市场经济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农产品和小规模的手工业——制造业产品是在国内消费的。精确地统计面向外国市场和用于国内消费的产值是困难的，后者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的自我消费。这种自我消费不仅以农民经济为主，而且还包括以大规模作物分成制为生的传统庄园主。对40年代所作的计算表明：平均不足一半的农业产值面向出口贸易。[①]

农业部门的性质是由三个分支部门的运转及其关系所决定的。香蕉业是现代化的，由北美资本控制，其活动属于国际性一体化。因此，危机对香蕉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贸易量和香蕉价格的下降，而且还反映在母公司投资战略的变化。在30年代，联合果品公司因无法有效地对付“巴拿马病”而决定将其种植园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危地马拉的蒂基萨特和哥斯达黎加的克波斯。

第二个分支部门是咖啡业，具有不同的资本化水平。即使收入下降，咖啡企业也仍然能够继续生存，这是由于咖啡种植业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也是由于过去经历过萧条周期后出现繁荣时期。咖啡部门收入的下降只是以一种相对的方式影响这个体系，即阻碍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需求的下降影响了咖啡收益，但这种影响能在不妨碍庄园的基本生产资源的前提下被土地所有制结构所抵消。

第三个分支部门是小农经济，其产品主要是通过家庭自我消费的方式面不是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剩余来进行分配的。事实上，只有这个部门的经济提高了其生产水平。危机刺激了那些强化简单

---

① E·托雷斯—里瓦斯：《战后时期中美洲社会的一些特征》，凯洛格研究所论文未定稿，第25号（华盛顿，1984年)，表1，第49页。

商品经济以弥补商品化出口部门的相对软弱性的条件。基本粮食(尤其是玉米和大豆)产量的提高证明商品经济可能重新出现或得到发展，只要独立生产者保留其生产资料，而使食品供应能刺激国内需求。这一阶段的数据表明：有些时期谷物和豆类是相当丰富的，尤其在1937年。利用以生产结构知识为基础的逻辑演绎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产量来自小土地所有者。无疑，正是这种信息才使得巴尔默 托马斯能够分析减缓危机的不同机制，其中之一是30年代后半期的农产品进口替代。① 在一定时期内，国内农业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其原因是国内由于条件所限减少了进口，而非政府的决策。

小农经济在成为大量农村失业人员的避难所时，它的吸收能力受到了考验。单一出口经济的充满生气的动力来自国外的需求；如同单一出口经济那样，这种动力的丧失会转变为国内市场中货币部门的局部衰落，但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咖啡生产只是部分依靠工资关系，这一点可从单身佃农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或尼加拉瓜的地位中或从分益农在哥斯达黎加的地位中看出来。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咖啡生产者避免了支付工资的问题，使维持和替代劳动力的事情在生产成本中处于边缘地位。

在这一阶段内，来自并受制于国际价格的咖啡收益也是相对独立于国内生产成本的，这种成本仅表明一种较低的限度；增长或萧条的周期并不反映在工资水平或劳动力的其他生活条件中。农民人口的生活标准同生产本身足以维持自给自足经济的水平相关。但是，全国城市中存在失业，而在80%的人口生活的农村较少见。

在所有5个国家中，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可以描述为一种以传统的或正统的方式来面对经济周期的政策。传统成分由咖啡

① V·布尔默--托马斯：《1920年以来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学》(剑桥，1987年)，第4章。

生产者的文化所决定，他们的受到经济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思想促使他们坚持无效能的国家行动。政策的正统性在于它使用的原则，即主张国家的开支所刺激的需求只能以达到超过赋税收入为度；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财政赤字。中美洲政府削减预算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下降；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进出口贸易的税收。这方面最为惊奇的发展出现在30年代中期，当时公共开支的削减达到了稍有盈余的水平，如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种盈余是由于储蓄未被使用而积聚的。

在5个政府中，危地马拉政府最为正统，1932年后设法使预算实现平衡，因而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盈余；这个盈余在毫无收益的情况下不断积聚，直到战争结束。政府不仅压缩公共就业，而且还削减工资，并且还利用义务劳动实施了一种铺筑道路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刺激国内需求。其他政府则处于不同的状况；同样缩小公共开支，其目的是避免年度赤字差额；受此影响，它们遂诉诸内债。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预算是设法把纯粹的行政开支费用压缩在最低水平上。这一水平如此之低，以致于下一步可能就是彻底的瘫痪了。1937年的外贸仅出现了一次短暂的改善，但这是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后的国家开支开始缓慢增长。

保护地主的利益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正统做法；这种做法促使这一危机时期的国家开支不仅不能处置萧条周期的后果，而且还间接地加剧了这些后果。为实现预算平衡而举借的债务增长总是毫无收益，而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总是很小，在那些年份甚至下降。公共工程项目、购买农产品或扩大信贷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一般说来，没有一种财政政策能够"治疗"起源于外国的萧条或限制由出口繁荣（这种繁荣完全是由于价格变动，而非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的错位。

总之，除一些不重要的差异以外，中美洲国家对经济危机所作的反应是采取一整套正统的自由派经济政策措施。它们的政策

(或缺乏这些政策)降低了国内消费，从而大幅度地削减公共开支、压低工资或限制金融资源的筹措。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看到，通过强化该地区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的独裁机制来保护传统政治秩序，这反映了对社会动乱的深刻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美洲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欧洲是中美洲地区的重要出口市场。就短期而言，最重要的后果是咖啡首先失去了德国、尔后失去了英国的市场，中美洲贸易重新转向美国，从而巩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发展的趋势。这一转向尤为重要，因为该地区与美国的贸易收支是逆差，而与英国和德国的贸易收支则是顺差。中美洲不仅被变换成一个好邻居，而且还是一个好伙伴。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泛美咖啡协定（1940年11月）。该协定第一次为正在扩大的美国市场确立了配额。在另一方面，香蕉出口却下降了。东南亚市场的缩小或丧失产生出一定程度的农业多样化，即出现了一些“军用农作物”，如橡胶、基本油料和植物纤维；这些农作物是美国政府指派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进行的战略性生产。但是，这些农作物的重要性是暂时的，战争结束后，只有马尼拉麻和非洲棕榈继续是从属于香蕉飞地的产品。

当时，没有一个中美洲国家能鼓励通过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增长。虽然战争极大地妨碍了进口，但是没有花力气去确立制成品的国内供应。1944—1945年，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已不得不积聚数量可观的外汇和黄金储备，主要用于偿付外债(主要是欠英国的旧债)而没有使用在生产性活动中。与此同时，外部收入的流入助长了通货膨胀，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尤为严重。[①] 1930年以来出现的财政问题依然存在，直至1942年，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只是在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执政时期

① V·布尔默—托马斯：《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学》，第100页。

的哥斯达黎加，这些财政问题才变得非常严重。

3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尼加拉瓜北部农民战争的再次爆发。众所周知，尼加拉瓜于1912年10月3日遭到了美国的入侵；当时一队战舰进入了太平洋港口科林托，有15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试图结束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北美人最后离开了(1925年8月)，但是尼加拉瓜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又使他们于1926年重新返回，而且人数更多。美国人的再一次干预使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和一批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军人感到，这是外国军队与传统的尼加拉瓜政客之间的可耻勾结，于是桑地诺等人于1927年7月揭竿而起，引发了一场间歇性的长期内战。

1930年初，驻扎在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主要集中在城市，主要的战争行动则交给它们新近创立的国民卫队。战争的进程是不规则的，但是桑地诺及其部下发起的进攻在1931—1932年冬天获得了动力，可能是由于经济危机及其对拉斯塞戈维亚斯地区贫穷农民的影响；该地区是尼加拉瓜最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宣布他准备在1932年11月尼加拉瓜总统选举之后撤出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华盛顿想让尼加拉瓜政府直接与桑地诺分子达成协议，或在没有美国军事援助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战争。因此，1933年1月2日，即胡安·包蒂斯塔·萨卡萨博士就任总统和他任命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为国民卫队司令的这一天，最后一批外国军队驶离科林托。1933年2月初，桑地诺与新的自由派政府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但是，一年以后的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被国民卫队暗杀。与此同时，在尼加拉瓜展开的游击战争对整个拉丁美洲、尤其是对中美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美洲，游击战争激起了因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失业、低工资和物资短缺的社会不满。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促使1932年1月萨尔瓦多伊萨尔科地区

发生了流血的农民暴动。但是，起义以及此后的屠杀还应与民众领袖阿图罗·阿劳霍在1931年1月的选举中获胜这件事联系起来看。这位领袖以“劳工第一主义”的主张获得了50%的选票，击败了有势力的咖啡寡头候选人阿尔韦托·戈麦斯·萨拉特。这次大选被看成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一次自由选举，象征着一次民众的胜利，但很快就遭到了1931年12月由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的反击。宪法秩序的中断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根据1923年5个中美洲国家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和平与友谊条约》的条款，华盛顿拒绝承认新政权。但是，1932年的暴乱一旦被平息，马丁内斯将军就非常容易地保住了其职位，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他的政府。这一行动实际上终止了原来在1923年订立的和平条约以及华盛顿抵制非选举产生的政权的政策。

1932年1月民众起义的领导和纲领从未得到充分的澄清，但是它肯定是一次农民起义，而且在某些地区，如纳伊萨尔科和华尤阿，这次起义受到了土著人民众的大力支持。在3天时间内，拥有精良武装的政府军队打击了以大砍刀和棍棒为武器的暴动组织。这些暴动组织遍布萨尔瓦多西部地区。和平的实现是以2500人或3000人的死亡为代价的。这次镇压的残酷性产生了超出这个小国边境、并持续多年的一种恐怖气氛。

萨尔瓦多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一次准备充分的革命行动，而是一种民众深刻不满的无组织表现。这种不满在该地区并非孤立事件。中美洲制造业的手工业基础和大规模的农民阶层的存在，有效地使有组织的抗议局限在与香蕉种植园相联系的农业无产者部门。缺少组织和斗争传统的人们所表露出来的社会性不满是普遍的，但却是无结构的。然而在哥斯达黎加，这种不满呈现出一种相对来说较有系统和活跃的特性。1934年8月，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利蒙地区香蕉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45天，赢得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广泛团结，最后成为哥斯达黎加历史上的一个决

定性事件，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独立工会运动的诞生。

洪都拉斯北部的种植园地区也有社会动乱和抗议。1932年2月，在特拉铁路公司中因解雇800名工人和普遍削减工资而爆发了一次基础广泛、但为时短暂的罢工运动。文森特·梅希亚·科林德雷斯政府最初支持洪都拉斯工人的要求，因为他担心公司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集体动乱普遍蔓延。另一方面，危地马拉伊萨瓦尔地区香蕉工人中的不满未能产生一场罢工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集体抗议。这个国家中关于社会斗争的所有历史纪录只是乌维科总统受邻国消息所惊扰而下令进行先发制人的镇压。政府命令处决14名有战斗性的学生和劳工组织者并关押了20多个人(这些人不经法律程序而一直被关押到1944年)，从而使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手工业者发起的新兴工会运动被摧毁。

有必要强调指出：在这一时期，体制性稳定是通过各种进程取得的；这些进程与民主机制毫不相干。事实上，这些进程既起因于萧条及其社会后果，又来自独裁传统和政治考迪罗主义。这一时期的分析家中有一个流传最广的看法，即寡头统治体制普遍受到民众不满的直接威胁，而对此的一致反应几乎都是确立军政府；军政府拥有巨大的镇压能力，其合法性正在于它在面对蔓延的社会动乱危险时有能力控制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总是处于防守地位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最为消极的方面会进一步加强，中心问题是这种政权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派。

在前10年内似乎已经得到巩固的选举制度在除了萨尔瓦多以外的所有国家中能正式地得以遵守。在萨尔瓦多，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发动的政变于1932年被国民议会定为合法，政变使他当了总统。但是，马丁内斯也靠连选连任来继续掌握政权，直到1944年下台。在危地马拉，自由党将军豪尔赫·乌维科于1931年2月在大选中获胜，虽然是在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当选的。他的考迪罗地位立即得到加强，因为他废除了市政自治，严重干扰

司法独立性，并全面地将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在多次修改宪法后，乌维科于 1937 年和 1943 年再次当选。在洪都拉斯，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将军在经过两次努力后于 1933 年 2 月当选。如同乌维科那样，他赋予行政当局以全部权力，除属于外国种植园主管辖地区内的活动以外，他将全国的政治生活集中在自己手里。立宪会议于 1936 年颁布一个文件，修改了总统任期的时间，并允许任期在 1934 年终止后再延长 6 年。议会授权的又一次延期使卡里亚斯执政到 1948 年。在尼加拉瓜，在美国监督下于 1932 年当选的自由党人胡安·包蒂斯塔·萨卡萨政府被迫不及待的索摩查将军发动的政变所推翻。索摩查是萨卡萨的侄子，也是自由党人。在一个短时间的过渡后，索摩查于 1936 年当选，于 1937 年 1 月 1 日成为尼加拉瓜总统。这个家族的长时期独裁统治就此开始，直到 1979 年。

哥斯达黎加值得单独谈谈，因为它的民主制采取了靠名望当选的自由派考迪罗的形式，通过显要人物（地主、律师等等）的小团体来发挥作用，并且具有有能力容忍反对派存在的特点。这种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大萧条的社会影响的考验。事实上，最后一位自由派考迪罗里卡多·希门尼斯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国会于 1932 年 5 月任命的。国会最初推举他为候选人，尔后宣布他为总统。在贝亚维斯塔的一次政变企图虽然未能成功，但能说明旧寡头模式中已存在着很明显的局限性。然而，1936 年 2 月，莱昂·科尔特斯在没有遇到大危机的情况下当选；1940 年，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同样顺利地就任总统。卡尔德隆政府的出色之处并不是他在大选中的压倒性优势（占投票数的 84%），而是在于他作为总统的领导特点。他的不寻常的社会政策是不是他的欧洲社会基督教背景的产物？是不是他与天主教教会——当时的领导人是萨纳夫里亚大主教——紧密结盟的产物？是不是他与共产党联合的产物？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不管答案是什么，在他任职期间，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基金于 1941 年

设立了；1943年，一个全面的劳工法被通过了，宪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确立了在当时具有显著先进性的一整套民权。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政府的社会改革被他的继承者特奥多罗·皮卡多（1944—1948年在任）加以巩固。但是，卡尔德隆·瓜尔迪罗试图通过选举作弊的方式和利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少有的暴力形势来达到1948年连任总统的目的。这导致了1948年的内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

30年代期间出现在该地区4个国家中的军人独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遇到了两方面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诱发了所谓的“寡头危机”。一方面，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所引起的国际气候鼓励人们尊重本国的民主经验；另一方面，被停滞和独裁压制多年的国内社会力量现在想力求通过选举、政党竞争和民众组织来确立民主进程。反寡头纲领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激进——它仅仅试图重新确立法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夕反对独裁的斗争开始时采取了城市暴动的形式。

1944年4月的总罢工迫使萨尔瓦多的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辞职。这是一个多阶级运动，由中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年轻的军官领导。这个运动未能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也未能产生出深远的变革，因为运动的领导人被查获并被处决。因此，这一危机是在军队内部解决的；那个衰老的独裁者被他的警察长取代，后来又被另一位在匆忙中选举出来的将军萨尔瓦多·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1945—1948年在任）所取代。在1944年6月至10月期间的危地马拉，由年轻军官、学术界人士、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阶级商人领导的同一类型的运动设法推翻了豪尔赫·乌维科的独裁统治。这一反寡头运动更为激进和更为成功，因为独裁者旧军队中的将军们被驱逐出境，自由党销声匿迹，政治领域向自由的民众组织开放。随着1945年12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当选，由广大民众参与的改革进程开始了。

反对寡头和军人专制主义的民主斗争并没有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取得胜利，因为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不强大，尽管纲领与其他国家类似。在洪都拉斯，由自由党人领导的“反寡头”运动，其范围比较局限，基本上是一次反对独裁者卡里亚斯的战斗；卡里亚斯受到外国种植园利益的支持，因而具备一个能使政府保持稳定的足够基础。然而，社会上的不满限制了卡里亚斯的勃勃野心。他除了同意于1948年进行总统选举、并允许自由党参加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虽然大选的胜利者是他的国际部长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在尼加拉瓜，一代知识分子和工人曾为社会革新中真正的民主利益进行了斗争，但这种利益因传统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抗争而受损。保守党通过其青年团体积极参加反对索摩查独裁的斗争，但是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没有设法使其党纲具有民众性的反寡头内容。同样，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不得不放弃使自己于1947年再次公开当选的计划。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这个独裁者让莱昂纳多·阿圭略于1947年2月19日当选，可是在5月24日又将其赶下台。本哈明·拉卡约·萨卡萨立即被推举为总统。在临时政府执政22天后进行了大选，另一个听话的自由党人维克托·罗曼——雷耶斯成为胜利者。这两个人都是索摩查的亲戚。索摩查本人则从未放弃国民卫队司令的职务，并于1950年1月再次成为总统。

在哥斯达黎加，自由民主的经历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是其政治形式的特点似乎在40年代已趋于消失。这一消失不仅是自由派考迪罗的结束，而且也是政府形式的结束。大选前的1947—1948年的特点是：政府的不妥协性愈益强烈，从而损害了这个国家的调和性传统。以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和政治暴力，现在却反映在政府以及反对派这二者身上。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由于卡尔德隆·瓜尔迪亚计划连任，政府将全国选举法庭的控制权交给反对派中的一派。大选于1948年2月8日举行，但选举结果直到2月28日才揭晓。这一天宣布：卡尔德隆的民族共和党失败，奥

蒂略·乌拉特获胜。3月1日，骚乱已无法拖延，“1948年革命”终于在3月10日爆发。

与伴随着哥斯达黎加内战始末的社会和政治现象相比，两个月内战中军事事件的重要性是较小的。实际上，40年代初期卡尔德隆的社会政策已导致传统寡头秩序的初步崩溃。他确立的所谓社会保证具有两个决定性的、但又是自相矛盾的方面：一方面，通过一个左派党（共产党），民众开始被结合进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卡尔德隆与教士保持着关系，这是他在欧洲学到的社会基督教观点的结果，这种观点放弃了自由启示的长期反教士传统。反卡尔德隆阵线本身因更深的矛盾而出现了裂缝。一边是以咖啡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土地—商业寡头，他们为保卫其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发起了最为激烈的对抗。另一边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客，他们进入政治领域的时间较晚，其动机是对现代化和变革感兴趣。他们的领导人是何塞·菲格雷斯、罗德里戈·法西奥和最后于1951年组成民族解放党的各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危机首先是一个资产阶级各阶层内部的危机，但它是由劳工的新作用诱发的。当时劳工的组织水平和影响达到了此后从未达到过的程度。

何塞·菲格雷斯成功地领导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寡头中一部分人的联盟，自封为第二共和国的创始政务会议的首领，并统治这个国家18个月（1948年4月至1949年11月）。这个时期实施的一整套措施自相矛盾地延续了由卡尔德隆和共产党人倡导的改革动力。例如，菲格雷斯取消了小麦税，以降低面包价格，为农业工人提高工资创造条件，并成立了全国生产委员会和哥斯达黎加电力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电力生产实行国有化，并降低电费。1948年6月21日，他对资本课税10%，并将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在今天看来，这一切被看作是在改革主义鼓舞下最具冒险性的措施。保守派占大多数的制宪会议于1949年起草的新宪法取消了军队，以农村国民卫队和城市警察部队取而代之。菲格雷斯的过渡性政府后来被奥蒂略·乌拉特接任（1949年11月至1953年11月）。

奥蒂略·乌拉特是一位保守派领导人，但他又是战胜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斗争参与者之一。民族解放党（PLN）于1951年10月12日成立，因为各派社会力量在社会民主思想的鼓舞下实现了联合，该党建党思潮的某个方面已经包含了这种意识形态。在1953年的大选中，作为民族解放党的候选人，菲格雷斯终于按照宪法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1953—1958年）。在其任职期间，他更有力地推行了一种改革主义政策，从而促进了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完善了严格的选举程序，为国家新作用的定义作出了贡献。

始于1948年的政治变革不仅有利于政治民主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以多样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中心的轻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阶段。银行国有化减弱了商业—金融资本与咖啡出口商之间的联系，但是社会—经济政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寡头目标；银行国有化促进了实现咖啡种植业现代化的庞大计划；该计划同时有益于所有咖啡种植者，因为它创建了销售咖啡的合作体制，以限制商业性垄断。从本质上说，这为国家进行活跃的经济干预确定了新的作用，从而达到既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生产基础的现代化，又可以限制其垄断性特征的目的。

民族解放党积极实施的社会政策使它能在这个国家的农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拥护基础。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1948年后，在共产主义政党人民先锋党（PVP）的影响下，城市劳工运动遭到惨败并解体。就中美洲而言，民族解放党的社会—民主意识形态和政策构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先进形式，这种思想与当时危地马拉政府的激进改革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危地马拉的经历与众不同，因为它的民主生活的新阶段仅持续了不到10年。由于出现了基础广泛的全国性运动，乌维科将军、的独裁于1944年6月被推翻，他的直接继承者庞塞将军又于1944年10月20日被推翻。他们的下台立即因制宪会议的选举面得到巩固。制宪会议颁布了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当代宪法，以

取代 1877 年生效的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旧宪法。由文人和军人组成的政务会举行了大选，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以压倒性优势获胜。阿雷瓦洛政府（1945—1951 年）鼓励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制订了农业发展和多样化的计划，实行了社会保险和劳工法。但是，最重要的是，阿雷瓦洛创造了把不同社会利益的团体组织起来的条件，扩大了免费的义务公共教育。他由哈科沃·阿本斯（1951—1954 年在任）接替；阿本斯也是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的，他的政府继续实施阿雷瓦洛的计划，但实施的方式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激进。

1951—1954 年期间，试图通过实施土地改革来革新旧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对整个中美洲地区传统社会秩序最为深远的挑战。土改试图惩罚非生产性的大地主，禁止任何形式的人身奴役，并把土地作为生产和劳动方式来使用。这一不言自明的目标是瓦解旧的农村阶级结构，创造一个能在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控制下支持工业增长的国内市场。就此而言，阿本斯的计划不仅是反寡头的，而且还包含了显而易见的反帝目的。阿雷瓦洛开创的、由阿本斯推向高潮的这一阶段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动员和组织工会和农民的重要性。

在危地马拉，50 年代初期没收 10 万公顷土地并与此同时大力动员农民，是反寡头攻势达到顶峰的时刻。这一攻势在战后时期席卷了整个中美洲。这里有必要提及两个导致阿本斯的民族主义计划失败的不同因素。第一，联合果品公司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主；根据法令，公司的 1.5 万多公顷土地将被没收。第二，冷战以及美苏对抗加快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共倾向，保守派组织的反共构成了国内对阿本斯的革命改良主义以及对民主阵线中各党派的反对。

美国大使约翰·普里福伊培植的危地马拉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炮制了一个阴谋，这是具有重要宗教内容的长期反共运动的顶峰。这个反共运动削弱了民主阵线对阿本斯总统的政治支持。在接到

他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参谋长的最后通牒后，阿本斯被迫于1954年6月27日辞职。在民众动员和组织达到高潮的时候，阿本斯的辞职形式在国内引起了严重混乱，并肯定在短期内各政党和民众组织将被宣布为非法和受到残酷镇压。对农民的攻势尤为激烈，农民曾得益于土地的再分配。在一周内，军队内的变化使权力落入阴谋领导人手中。1954年8月5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被任命为国家元首，从而开始了危地马拉政治生活的一个新阶段。

这些事件之后并没有出现权力的稳定巩固。1956年6月26日，卡斯蒂略被他自己党派中的一个成员所暗杀，这在军队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危机。连续几次政变和1957年的欺骗性选举最终使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于1958年当选。他领导了一种向政治民主的保守性过渡。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重新恢复，因为伊迪戈拉斯试图采取矛盾的民族和解措施。这种民族和解疏远了曾使他上台的联盟的同情者。1963年3月，他在军事政变中下台。

在这一时期的洪都拉斯，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的当选就是试图延长卡里亚斯政权，尽管另有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第一次是1954年5月发生的大规模的香蕉罢工。这次罢工始于简单地抗议联合果品公司所属的特拉铁路公司解雇25个工人，后来发展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运动。对改良的积极态度和对民主试验的追求(这两点在整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说明，为什么这一冲突迅速波及到标准果品公司的种植园、埃尔莫奇托矿和圣佩德罗苏拉地区的整个外资农工区。受到4万多名工人积极支持的这一冲突在经过69天的罢工后，于7月结束。这次罢工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取得胜利，而且还因为它对整个政治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组织的真正的可能性。这是劳工和社会保障法的起点，也是设立劳工部并认识到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的开始。将劳

工、此后又将农民结合为一股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中的决定性功绩。但是，还需指出：罢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消极影响，使香蕉种植园的就业机会从1953年的3.5万人减少到1959年的1.6万人，它对生产的影响因1954年12月的一次飓风而更为严重。这些事件并不充分说明全面增长缓慢的原因，但无疑是重要的，因为水果种植业在洪都拉斯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中心现象是军人开始进人政治舞台。在1954年的大选中，传统的自由党与民族党无法消除其分歧，因为没有一个党能宣称获得了绝对大多数的选票。尽管自由党获得了总数的48%，但第二次投票是一次舞弊，从而促使军人于1956年首次作为一个机构来进行干预。1957年9月，在军人的监督下，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博士（1957—1963年在任）在新的全国性大选中取胜。这一获胜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它使自由党人在保守政府执政25年后重新取得了政权。

与此相比，萨尔瓦多政治生活的特征则是军人存在的长期性，其原因既是军队自1932年以来一直是权力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又是高级政府官员总是来自军队。在本文所分析的这一时期，寡头危机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体制和民主现代化是通过所谓的1948年革命表现出来的。这次革命是1948年12月14日发动政变的一些年轻军官发起的运动。

此后为改善经济和国家体制而采取了多种措施。所有这些措施可被描述为导向萨尔瓦多社会的相对现代化，尽管不会导致出现民主的危险，但也未能触动咖啡寡头的经济基础。虽然存在着上述局限性，但革命政务会议和奥斯卡·奥索里奥少校政权（1950--1960年）的行动仍然具有愿意进行变革的特点。1950年颁布的新宪法对于整个变革进程从法律上给予支持。这一新时期的总的气候说明，为什么在宪法中、在具体的法律中、在关于国家经济作用的更具功能性的概念形式上以及在经济应采取何种变

革的概念形式上，工人的社会权利得到承认。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亦非例外。

这些年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可能是采用多种手段来努力促进工业增长。就此而言，建设中的美洲最大的水电厂伦帕河水电厂和用来扩大外贸的阿卡胡特拉现代化港口是重要的，私人部门参与了这两个独立的国营企业的建设。事实上，这些少壮派的改革思想持续到奥索里奥政权之后，延长到何塞·马里亚·莱穆斯上将政府（1957—1960年）的最初几年。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仍然具有政府镇压和显著的专制民主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尼加拉瓜也经历了一个以棉花出口为基础的重要经济增长阶段，从而为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政权的延续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在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过程中，他于1956年9月21日在莱昂市被暗杀。索摩查家族通过国民卫队（由小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控制）和国会（由路易斯·索摩查任议长）的途径对国家的控制确保了继承机制在这个家族内部得到解决，这受到与独立的自由派和保守党中强硬的反对派团体进行斗争的自由党的支持。索摩查之死诱发了对反对派的暴力镇压，尽管行刺是一位年轻诗人里戈韦托·洛佩斯·佩雷斯的个人行为。路易斯·索摩查升任总统，他的当选于1957年2月被国会认可。他所主管的影子政府得益于棉花繁荣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促成的第一批投资。路易斯·索摩查死于1963年2月的选举投票前几天。在这次选举投票中，索摩查家族的独裁暂时中断，允许索摩查家族的朋友雷内·希克当选。希克帮助平息了对索摩查家族的不断增长的抵抗，并为小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最终于1967年上台创造了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中美洲国家的经济生活开始了一个缓慢的、充满矛盾的新阶段。国际环境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因为欧洲经济复苏，以及中美洲国家与美国重新建立了贸易和投资

联系。事实上，尽管1949年和1954年出现了小规模的衰退，但是世界经济中从未出现的最长阶段的繁荣使中美洲得益匪浅。与此同时，战后经济增长还伴随着中美洲社会在量和质方面的变革。最为重要的是，在1945—1980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超过3.2%。1945年该地区的人口仅为700多万，而到1980年，已达到2000万。其他一些社会—人口变化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尤其是城市化水平从1945年的14%上升到了1980年的43%，首都的人口增长更快，已占总人口的25%以上。

战后时期的另一个现象值得提及：通过国家体制（如中央银行）的现代化和建立其他一些机构（如开发银行和公共电力公司），国家开始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战后时期经济变革的重要性应在国际贸易的复兴这一背景下加以分析。国际贸易的复兴是由于取消了因战争状态面实施的限制。中美洲的传统生产立即受到外部的刺激。在此以前，传统生产仍对国内需求作出反应，但因国际市场的衰退而出现了萧条。

在最初几年，经济周期完全以国际价格的上升和传统外部市场的重新开放为基础。中美洲出口商没有进行重要的生产性投资，他们通过扩大可耕地的方式作出了缓慢的反应，因而增加了用于生产的土地面积。这一行动是通过利用农民的土地和用出口作物替代国内市场所需农作物的方式来进行的，新土地的耕作和改善技术的资本投资的风险直到这个时期末才出现。

尽管如此，中美洲外贸值的增加是使该地区经济受到有利影响的第一个因素。1954年前贸易条件的增长（见表3—2）说明了该地区的交换能力曾一度得到提高，也说明这一增长是如何迅速影响到进口的超比例扩大（进口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在战争期间，受到压缩）。最重要的例子是洪都拉斯，它的经济生活仍然以香蕉生产为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所谓的“巴拿马病”影响了大部分种植园，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因此种植园被迫从特鲁希略地带转移到圣佩德罗苏拉与拉塞瓦之间的新地区。

外国公司的投资似乎是作为资本输入记录下来的，在生产和出口增长方面都没有得到反映。根据布尔默—托马斯的计算，洪都拉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人均257美元（1970年价格）下降到1939年的191美元，只在1949年才恢复到225美元，这些数字与邻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表3—2 1946—1958年中美洲的外贸值（单位：百万美元）、贸易条件和出口购买力（1970年＝100）

年份	出口	进口	贸易条件	出口购买力
1946	128.4	127.0	93.5	21.2
1947	192.4	197.0	87.7	24.4
1948	238.9	221.0	95.9	29.5
1949	242.1	215.6	108.4	31.8
1950	299.6	233.3	135.0	40.2
1951	343.4	279.7	149.9	43.0
1952	367.9	322.1	144.4	44.5
1953	390.1	338.0	152.7	48.4
1954	410.8	380.8	176.6	48.5
1955	420.0	414.5	159.3	50.7
1956	438.8	469.2	162.1	51.5
1957	469.5	524.9	151.9	54.4
1958	453.6	509.9	132.6	52.8

资料来源：詹姆斯·W·威尔基和P·赖克（主编）：《拉美统计辑要》（洛杉矶，1979年），第20卷，表2730，第412页。

三个咖啡种植国所作出的反应在时间上各不相同。该地区最大的咖啡生产国首先利用战后的新机会，1949年产量已达7.3万

① V·布尔默—托马斯：《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学》，第100页。

公吨。这一产量直到 1957 年才被超过（1957 年为 8.32 万吨）。危地马拉自 1951 年（该年产量为 6.3 万吨）起开始增加产量，并在整个时期保持稳定的增长。哥斯达黎加直到 1954 年生产水平才提高，此后发展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得益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升，1940 年至高峰时期的 1954—1957 年期间增长了 60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0—1944 年平均数），纽约的咖啡价格每磅约为 11.7 美分；1949 年已提高到 28.7 美分，1955—1957 年达 57.4 美分。①

这一时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咖啡等传统产品的产量上升，而且还因为决定性的农产品多样化（如木材、可可、麻以及更为重要的糖和棉花）开始出现。棉花播种面积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后又在危地马拉扩大到非常高的水平；这一点需要具体讨论，既是因为它具有经济上的重大意义，又是因为它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棉花种植业改变了中美洲地区潮湿的太平洋沿岸重要区域的农业地貌。改种棉花的土地之所以增长很快，是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用于粗放型牧牛的租地和用作“租赁农业”的庄园地（这些庄园地归农民所有），当然还有不毛之地。1945 年出现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以及 1950 年出现在危地马拉的“棉花热”，不仅分散了一直由农民占有、用于自给自足农业和供给市场的基本农作物种植业的大片土地，而且还改变了生产力低下和采用作物分成制的庄园的状况，从而破坏了数千农民的社会平衡。生态平衡同样被改变，其程度直至今日尚未被意识到。在危地马拉的埃斯昆特拉和雷塔卢莱乌地带，在萨尔瓦多的拉巴斯和乌苏卢坦地带以及在尼加拉瓜的奇南德加和莱昂地带，旧有的林区和草原均被破坏了。

中美洲的农业现代化始于棉花。这一种植业立即成为现代农

---

① 詹姆斯·威尔基（主编）：《拉美统计概要》（洛杉矶，1980 年），表 2526，第 340 页。

业企业的一个显著例子。在所有3个国家中，这种企业的结构具有共同的特点。典型的棉花企业主是从前的文官或军官、政治领导人或商人，很少是从前的农业工人。这一点与国家的作用有关。国家如此鼓励和保护棉花种植业，以致它被称为“政治种植业”。实际上，这一种植业的兴起是由于建立了能够提供银行信贷和国外“技术”的大规模国家设施。尤为重要的是，棉花是种植在租地上的。最后一个因素具有一点新意，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通过租金这种最为现代的方式将棉花种植者演变为与土地相连的企业家，这种租金构成了投资资本的一部分。

在最初几年内，全地区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平均增长为10%；到50年代末，中美洲占世界棉花出口总量的6.6%，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三大生产者。萨尔瓦多的单产为每公顷843公斤，危地马拉为700公斤，尼加拉瓜为580公斤。在这一时期，另一个旱地棉花的生产者埃及的产量是520公斤。[①] 萨尔瓦多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棉花繁荣。这一繁荣值得一提，因为1945年以前的全国产量十分低，可种棉花的土地也相对少。种植面积从1945年的1.3万公顷上升到1956年的4万公顷；在10年时间内，土地面积、产量和产值不断增长，遍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太平洋沿岸地区。生产率不断提高，1945年后，据官方统计，萨尔瓦多的产量在世界上很高，仅次于尼加拉瓜。

在尼加拉瓜，棉花种植业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深远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出口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良机。实际上，到1950年，尼加拉瓜早已成为中美洲的主要棉花生产国，产量为1.8万公吨；1954年，出口量超过4.7万吨。50年代，棉花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居首位，占35%。这一农作物的生产和出口巩固了业已重要的企业主团体，它们领导了尼加拉瓜从未经历过的这个最有生

---

① 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规划：萨尔瓦多的经济发展》（墨西哥城，1959年），第21页。

气的时期。与以前人们对棉花种植业的错误看法相反，资本的参与并不仅仅由“索摩查集团”提供，而且还来自这个国家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企业团体。

在3个棉花生产国中，棉花种植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生产增长率高，从1947年的1.1万吨上升到1958年的11万吨（不包括棉籽及其副产品），而且还在于农工轧棉机的安装以及作为商业和大量农业劳动力社会变革的根源。

大规模的蔗糖生产和畜牧业出口也是在战后时期开始的。这两个生产领域构成了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来源，促成了中美洲地区大多数社会中盛行的单一出口传统的结束。古巴的配额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中重新分配以前，向蔗糖过渡的刺激就已出现。自1947年起，种植甘蔗的土地、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开始缓慢增长，从1949年的9.6万吨上升到1958年的23.6万吨。60年代，数量增长更快，蔗糖成了地区性的第三大出口商品。如同棉花那样，拥有农工基础设施和熟炼工人的现代化甘蔗种植园在尼加拉瓜得到最快的发展，尽管危地马拉的产量和出口量最大。所有5个国家都实现了自给自足，1953—1954年后开始向美国出口。但是，本地区的蔗糖工业从未降低生产成本。由于70年代世界市场上蔗糖价格下跌，蔗糖业陷入了一种复苏无望的危机之中。但牛肉生产较为成功，1955年后开始出口，并随北美洲需求的扩大而从50年代末的320万公斤上升到1972年的860万公斤。

直接由美国提供给出口农业的刺激加剧了农业内部的失衡，一方面将最好的土地用作牧牛和棉花种植业，另一方而将基本粮食作物种植业置于贫瘠的土地上，减少了国内市场所需农产品的种植而积。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不平等土地占有形式的农业结构类型被进一步强化；卷入无产阶级化进程的农民数量上升，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也得到提高。不应忘记的是：商业性出口农业的历史形成产生了功能的分配。根据这种分配，经济中的小农部门成为喂饱全国人口的农产品的生产者。作物分成制经济仍然在技术非常落

后的状态中运转，没有资本资源，无法进入市场。

就此而言，应该注意到新近出现的食品短缺趋势，如玉米、大米和豆类等等。1945—1960年这一时期，考验了中美洲国家维持其粮食自给的能力。事实上，尽管国与国之间有差异，但是至1948年，国内市场生产已经停滞，或在明显的衰退之中。人口增长和用于民众消费的基本食品供应的缩小使人口中一部分入的营养水平出现了下降，且日趋恶化。1949年，玉米产量为95万吨，大米为6.3万吨，豆类为10.6万吨；1958年，全地区的玉米产量刚刚达到102.3万吨，大米为7.7万吨，豆类为10.3万吨。这就意味着人均拥有量首先出现停滞，尔后在每一种产品类别中都有下降，尤其是玉米。1949—1959年累计增长的年平均数为2.58%，但是出口农产品增长7.14%，国内消费增长为1.6%。[①]

这幅图画为我们描述了充满矛盾的结论：中美洲农业的增长率高于几乎所有其他拉美国家，但并没有为农村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没有提高所有低收入人口的食品消费水平。与此同时，出口部门的发展和变革是以农业产值为基础的。而农业产值的增长不仅是由于价格上升，还由于战后尤其是50年代期间，农业部门中某些分支部门的生产率和现代化均有提高。

1945年以后的资本形成率很低，给人以这样一种肯定的印象：生产能力的增大没有发挥出任何相关的作用，就此而言，中美洲经济是没有资本积累的。1950年后，资本投资有增长，这与进口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尽管进口不断扩大，但是资本投资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增长率。城市和半农村手工业被缓慢破坏的进程及其被中、小工业企业取代的进程，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毫无疑问，这种现象与内部需求的改善有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较好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收入增长、人口的扩大以及城市化，进一步强

① 这一节的统计数字来自拉美经委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洲统计汇编》（纽约，1957年，1962年）。

化了那种新的政治、文化气候，这种气候产生了内部需求的扩大。另一个因素是获得资本货、初级物资和燃料等商品的供给设施得到改善，这种改善在整个时期伴随着进口的扩大。

1950年前后进行的统计记录了无数家雇员在5人以下、具有手工业特点、通常被叫作“车间”的制造业企业，几乎满足了对食品、饮料、鞋类、纺织品、木制品和皮革制品等产品的所有需求。在这么多的小企业中，有两三家大工厂拥有足够的资本，劳动集中程度高，具有一种垄断的性质。这方面的例子是1890年后出现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啤酒厂、哥斯达黎加的一家纺织厂和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的水泥厂。此外还有一些被看作是工业的农业企业，如咖啡加工厂、轧棉厂、锯木厂和水稻脱粒厂等。

显而易见，国内对直接消费的产品的供应是非常有限的，1945年以后的进口商品构成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只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资本货的重要性才开始增长；在50年代末以前，还没有出现进口替代的官方政策，与收入相对增长和进口能力同步上升的外部消费倾向不利于中美洲制造业的生存，并诱发了手工业的衰落；这一点在拉美共同市场（疑为中美洲共同市场——译者）时期尤为明显。

整个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发展较快，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较慢。1946年，食品、纺织品和饮料的产值，危地马拉为2900万美元，尼加拉瓜为3170万美元，哥斯达黎加为2120万美元，萨尔瓦多为760万美元，洪都拉斯为630万美元。11年以后，即1957年，供直接消费的上述产品的产值均有提高，危地马拉为5000万美元，尼加拉瓜为7310万美元，哥斯达黎加为5006万美元，萨尔瓦多为3540万美元，洪都拉斯为1720万美元。[①] 还能补充的是：这一增长并不大，在有

① 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产值以1950年美元价格计算；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分别以1948年和1958年价格计算。拉美经委会：《第一次和第二次统计汇编》。

些情况下低于人口的增长，难以满足国内需求的扩大，因此越来越依赖于进口。中美洲的外贸发展很快，进口比率从1950年的16.3%提高到1960年的21.1%。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中美洲经济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几乎长达25年的时间内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5.3%。但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10年中——所谓中美洲经济的"黄金时代"——经济业绩更好。60年代振奋该地区经济的因素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周期的性质中产生出重要的差异性。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是一个主要因素，尽管这件事情本身是两个同时发生的事态的结果：各国政权的相对共同性，以及国际经济的增长和外部需求的复苏。历史因素——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和独立后不久出现的联盟，以及那时以来曾为组建一个中美洲联盟进行了十多次的努力——同样是重要的。

经济一体化并不是由于对外部门的枯竭。正是这一部门的动力，才使这一进程受益。这一进程于1951年6月16日宣布开始，早于拉美其他地区的同样倡议。在1951年至1958年6月10日签订《自由贸易与经济一体化多边条约》期间，经济关系是在局限于特定商品的短期双边协定基础上进行的。扩大市场的思想本身受到了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纲领性和技术性支持。拉美经委会的先驱性工作强调地区计划和国家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商业利益和各中美洲共和国内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都赞成经济合作的目标，尽管它们缺少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不知道应如何朝这一方向发展。毫无疑问，战后时期控制国家权力的新集团在对待这一事业方面比土地寡头更为开放；这些土地寡头主要着眼于海外市场，并不完全理解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都赞同1958年条约的签订；这一条约后来发展成《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于1960年12月13日签订。1960年的条件确立了一个为期5年的自由贸易区，

为关税联盟奠定了基础，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内贸易的财政、信贷和服务刺激措施。

表 3—3 1950—1987 年中美洲区域内出口：贸易额（百万美元）和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年份	区域内出口额	占总出口的%	年份	区域内出口额	占总出口的%
1950	8.5	2.9	1970	286.3	26.1
1951	10.7	3.2	1971	272.7	24.6
1952	10.4	2.9	1972	304.7	22.9
1953	11.0	2.9	1973	383.3	23.0
1954	13.4	3.3	1974	532.5	25.2
1955	13.0	3.1	1975	536.4	23.3
1956	14.9	3.5	1976	649.2	21.6
1957	17.6	3.8	1977	785.4	19.1
1958	20.9	4.7	1978	862.7	22.4
1959	28.7	6.7	1979	891.7	19.9
1960	30.3	6.9	1980	1129.2	25.4
1961	36.2	8.0	1981	936.8	25.5
1962	44.7	8.7	1982	765.5	22.4
1963	68.7	11.7	1983	766.6	21.6
1964	105.3	15.6	1984	719.2	18.9
1965	132.1	17.4	1985	488.4	13.9
1966	170.3	20.4	1986	447.9	11.1
1967	205.6	24.0	1987	525.9	13.8
1968	246.9	26.1			
1969	250.1	25.7			

资料来源：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常设秘书处：《中美洲统计摘要系列》（危地马拉城）。

如果比较拉美经委会最早提出的思想与 1960 年条约的最终草案，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主要特征已被放弃，尤其是渐进主义

和互惠的概念。这些概念是5个签字国根据地区性计划建立本国工业的手段。这一转变所反映的美国的利益和影响不亚于中美洲企业主的利益和影响。美国和中美洲企业主都愿意使贸易不受任何限制，把国家的作用减少到仅仅是自由贸易的行政管理者这个程度。①地区性合作尚不如全面的经济一体化。地区合作规划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改变农产品出口模式的历史性缺陷，这些措施包括：向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全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人口的生活标准，减少从一开始就受到对世界市场依附关系性质所限定的对外软弱性。在60年代，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实际上达到8.5%，几乎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两倍。②

有人正确地说过：为一体化所作的规划首先是为企业主所作的规划。他们充分利用了一体化，并在每天发生的事件进程中改造这种规划，使之满足自身需要。在这些投资者中还应肯定地包括北美洲资本。在提及企业主时，我们既指的是商人，也指的是新兴的工业精英，在社会方面与农业寡头也没有差别。“共同市场”计划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基础，但不必在农村进行改革；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中，这一计划包括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不干预巨大的农村利益。有些人认为，在5个小市场中建立一种经济空间的机制推迟了改革旧的农村结构的政治任务。

总之，共同市场规划在一开始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是因为各国政府没有重大困难地同意确立共同关税，减少对本国产品课税以及颁布工业发展法令。这一切最终为外国投资创造了一些

---

① 1959年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放弃了美国最初提出的目标，阐明了美国对拉美地区贸易的要求——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实现最大可能的自由流动——并迅速实施”。A·格拉·博尔赫斯：《中美洲一体化的发展：从历史到未来》（墨西哥城，1980年），第20页。关于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成立和发展，可主要参见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常设秘书处：《本十年中美洲一体化的发展》第13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年）。

② 拉美经委会：《1960—1980年中美洲的工业化》，载《拉美经委会研究与报告》，第30期（圣地亚哥，1983年）。

具有竞争性的财政小“天堂”。如前所述，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活跃的自由贸易区，涌现了许多对大部分直接消费的基本产品的替代进口工业以及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许多与新工业区相连系的交通、保险和其他服务。

经济一体化计划始终是褒贬的目标。考虑到一体化作为增长和发展机制的重要意义，这种褒贬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矛盾。今天可借助事后的认识来作出评价。60 年代，在显然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局限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体化计划来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体化高潮期间，区域间贸易额中的 85％是工业产品，其范围包括供直接消费的产品（饮料、食品、鞋类、手工作坊的产品和纺织品）。顾名思义，进口替代是在装备水平上的替代，这意味着进口系数与工业增长相应扩大，在 60 年代的后 5 年中平均增长 25％。使用那些在出口国早已被淘汰的进口资本货并不过时，而且还能节省劳动力，因此，制造业部门没有利用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最后，在北美政策的影响下，竞争性工业主要是在外国资本的手中建立起来的，从而导致非民族化和出现金融依附的新领域。

60 年代，农业部门在地区生产中的参与程度继续下降，从而认可了战后出现的历史性趋势。因此，70 年代中期，农业的比重仅占 30％多一点，但吸收了经济活动人口的 60％左右，占区域外出口收入（外汇）的 80％。中美洲的发展说明了一个严重的矛盾：经济增长始终依赖于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但是农村中的社会发展则非常有限和充满矛盾。与拉美的平均水平相比，中美洲的农业发展更快，但是这并没有为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增加工作机会或提高生活水平。

在考察愈益贫穷的小土地所有者营运的国内市场经济现代化时，二元化分析是不适用的。出口产品的增加主要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棉花和肉类以及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蔗糖。但是，大部分农业人口收入仍然低下这一事实说明：充满活力的总趋势只为其他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或收入。

中美洲在农业和工业（以及总的经济增长）方面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存在严重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财富增长会产生出更大的贫富悬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滴流”理论始终是一种神话。它仅仅是一种愿望或学术伪善。真正出现的是一种永久的“竞争性排斥”，其中失败者永远是农民。农业生机无疑改变了农村面貌，它使一些重要的农业部门实现了现代化，产生出一种与遥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传统形象大不相同的企业家精神。在另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消灭了债役雇农（永远被束缚于土地的农民），替代了临时农工。后者的地位并不决定于他们是否拥有一小块土地。这种半无产阶级化首先意味着相对的、但又是不断恶化的贫困。这种现象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尤为显著。在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至内地的区域内，基本粮食生产被棉花种植业取代后出现了一个由临时雇佣工组成的劳动力市场，60年代已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化”。

在政治方面，60年代目睹了不同种类和民主化愿望表达方式不同的改良主义运动被多次击败。这种民主化愿望鼓励民众参与政党、工会和选举。渐进主义纲领的失败反映了后来彻底崩溃的寡头—自由派秩序的危机。

表3-4　1950—1954年、1975—1976年中美洲农业产量增长幅度　（%）

	总产量	食品	出口农产品
中美洲	106	124	117
哥斯达黎加	143	130	142
萨尔瓦多	136	116	188
危地马拉	250	254	309
洪都拉斯	85	68	102
尼加拉瓜	199	148	337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战后中美洲经济的增长》（图19），转引自：《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前景》，载ICADIS第4期，第93页。

50 年代的最后几年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拉丁美洲经历了疲软的增长。1961 年美洲开发银行的成立表明了通过合作来开发新的发展渠道的必要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 1961 年 3 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表达出来的。此前不久，肯尼迪政府宣布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目的是为了在古巴革命提出挑战后，通过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来促进美国与拉美的合作。虽然争取进步联盟增加了给中美洲的贷款，并为土地改革和结构性变革思想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但是它同样导致军援的上升，尤其是给予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援助，并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思想，即“内部敌人”的概念。旨在阻止中美洲革命的上述一切措施的结果是强化反动乱的政治一军事结构以及完全缺乏实质性的改革。

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内外条件的最具体结果是出现了镇压性极强的政府。但也有某种类型的选举意见的结果。它们尊重行政权力的更替，但只能限制在军人选择的狭窄圈子中。这一“表面民主化”周期曾出现在萨尔瓦多，军队根据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形象建立了国民和解党（PCN）。虽然墨西哥的这个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定期选举解决了合法性问题，通过任命解决了继承人问题，通过秘密机制决定了哪个候选人能获胜，但是，墨西哥的历史条件非常不同于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国民和解党是 1961 年成立的。此前，军事政变终止了 1960 年建立的文人一军人政务会的改良主义倾向和奥索里奥上校和莱穆斯上校（1956—1960 年在任）尝试的谨慎现代化计划。这一政变标志着军人政治垄断的新时期的确立。军人在其全盘控制的选举中确保了胡利奥·里韦拉（1962—1967 年在任）、菲德尔·桑切斯（1967—1972 年在任）和卡洛斯·温贝托·罗梅罗（1977—1979 年在任）的当选。危地马拉出现了同样的先后次序：政变（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上校，1963 年）、制宪会议、新宪法和总统选举。在这一体系中首先当选的是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1966—1970 年在任）；他本人是一个文人，但又是一个基本上是军人政府的领导人。这个军人政府后来是由

下列军人直接控制的：卡洛斯·阿拉纳上校（1970—1974 年在任）、谢尔·劳赫鲁德将军（1974—1978 年在任）和豪尔赫·卢卡斯·加西亚将军（1978—1982 年在任）。在长达 16 年多的时间内，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一直由军人控制，这种控制具有遵守法律形式的特点。这些政权容忍了有限的反对派力量，但只能限制在严格的竞赛规则范围内；国会受到与军队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力量的控制，在定期举行的选举中，政党能选举代表，而非总统；总统选举总是掌握在高层军人手中。这种情况还伴随着民众组织的永久性涣散和政治生活的普遍非政治化，并且还出现了对改良主义者和激进政治力量进行的残酷镇压。因此，工会运动、大学（教师和学生）、教会中的一些部分甚至与军队暂时结盟的改良主义政党本身，都被以流血的方式永久性地镇压了下去。

这些政权的基础是与企业界保持的稳定的联盟，官方政策殷勤地促进企业界的利益。此外还应加上美国的多方面支持。美国的支持不能仅仅描述为军事和经济援助，因为它还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成分，体现在明确的目标（即反对动乱、保障安全）的框架之中。

其结果之一是军人体制得到复活，实现了现代化，并在特别行动、秘密活动和全国范围内的情报行动等方面进行了训练，似乎要对国内的敌人发动一场战争，尽管这个敌人并不存在。另一个结果是企业团体得到了总体的巩固；它们使自己的联合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因此它们不仅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联合的压力集团，而且还成为一股在经济利益方面具有更高进攻水平的政治力量。

这一时期还具有社会斗争激烈和试图进行改革的特点。在危地马拉，继 1960 年 11 月 13 日的军人暴动失败后，一批军队的前别动队员于 1964—1968 年间展开了游击战。激进的学生和城市工人团体以及共产主义性质的危地马拉劳动党本身后来也加入了这一游击战。从严格意义上说，十一月十三日运动和起义军的出现并没有造成军事上的挑战，但是它无疑表达了广泛的民众不满；这

种不满是由阿本斯下台后政府的反农民政策和1963年3月军事政变对改良主义团体的欺骗所造成的。如前所述，1963年的政变中断了选举进程，损害了体制正常化的民主化计划。

中产阶级介入该地区的政治生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寡头垄断在行使权力时以排他为基础，就此而言，中产阶级介入政治生活的现象是与寡头垄断的危机相连的。中产阶级团体并非单枪匹马。在中美洲，他们总是赞同民众组织和工会组织、党派之间的竞争和普选。与中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相关的还有主要的学术与文化复兴以及比较现代的“公众舆论”的形成。

中美洲历史开始在这些社会和政治影响之中发生变化，纵然舞弊（出现在选票的统计中，而不是在选举本身）、先发制人的政变和镇压性暴力也多次暴露了这种民主基础的弱点。该地区的选举史并没有反映出持续向上的进步，或民主稳定不可逆转的现象。

在洪都拉斯，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统治，重建了两党制，并实施了一些变革；尽管有争取进步联盟的支持，但这些变革仍然是不完全的和落后的。1963年10月3日，即在计划中的选举前几个星期，奥斯瓦尔多·洛佩斯·阿雷利亚诺上校领导的一伙军官以不合理的借口破坏了法律，将文人总统赶下了台。这一政变开创了军人全面介入政治的新时期，使洪都拉斯加入其邻国的行列。洛佩斯·阿雷利亚诺使制宪会议选举他为总统，并被提升为将军。但是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中美洲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农民动员；农民占领的大片土地不但是未开垦的，而且其租佃形式也是有问题的。国有土地和公用土地的占领常常表明这些土地是被大地主非法拥有的。伴随着农民“进攻”的还有几个农民协会的组织，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开始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了缓和农村中压力和冲突的升级，洛佩斯·阿雷利亚诺政府于1967年颁布了一个土地分配计划。该计划涉及数百家在洪都拉斯南部长期占有土地、但无土地所有权的萨尔瓦多农户。

无人能够找出1969年7月在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爆发

的被贴切地称作“无用的战争”的准确和直接的起因。[1]洪都拉斯当局无疑虐待了萨尔瓦多农民，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内驱逐了10万人。由于共同市场，洪都拉斯在与萨尔瓦多的贸易中长期蒙受高额商业性赤字。犹如一场足球赛上爆发了一次骚乱，其严重性不在于骚乱本身，甚至也不在于骚乱中据说发生的死亡人数。武装较为精良的萨尔瓦多军队侵入洪都拉斯，但因美洲国家组织的调停和美国的压力而在72小时后撤出。两国间关系的破裂削弱了经济一体化计划，并产生了不和的集中点；由于边境线未确定，还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持续上升，这一不和的集中点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萨尔瓦多的出口结构（其20%的出口面向洪都拉斯市场），并在人满为患的萨尔瓦多最穷的农村地区产生了严重的人口—经济问题。

这一事件暴露了洪都拉斯严重的社会缺陷，尤其是农村中的不公正和内部冲突的无效性。洛佩斯·阿雷利亚诺最初试图连任总统，其借口是新的战争危险需要他的存在，但是后来他接受了由军队、洪都拉斯私营企业理事会和工会运动提出的全国团结计划。根据哥伦比亚的方式，一个两党制方案被采纳，即总统由选举产生，但政府职位则根据各占50%的比例在自由党和民族党中平分。据此，民族党的年迈的拉蒙·埃内斯托·克鲁斯律师于1971年6月当选。但是，全国和解方案未能奏效，更多的原因是传统的考迪罗的政治落后性，而不是总统的年迈无能。1972年12月4日，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再次粉碎了业已实现的软弱的合法秩序，抛弃了军队的诺言，公开蔑视两党争取稳定的计划。

60年代的改良主义计划对于尼加拉瓜来说并不陌生，其中有些带有或多或少的形式化内容，如那些受到肯尼迪政府鼓励的计划，有些则真正出于要求变革愿望。1966年希克总统之死产生了

[1] 见托马斯·P·安德森：《被剥夺者的战争：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1969年（内布拉斯加，林肯；1981年）；D·斯卢茨基等：《无用的战争》（圣何塞，1971年）。

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索摩查家族控制政府的短暂间断或许会发展成较长期的民主竞争。但是这一历史性机会因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以强制手段当选而丧失；他还保留其国民卫队头目的职务。1967 年初，在他当选以前，这个国家出现了一次最为重要的民众动员，反对事先安排的选举舞弊。美国的地缘政治重点是既不赞成文人政府，也不赞成民主观点。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尼加拉瓜来说尤为适用。

尼加拉瓜历史上的一个特征就是经常在两个“历史性”政党（即索摩查的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达成协议。1972 年达成了一个此类协议，保守党领袖费尔南多·阿圭罗博士同意参加 1974 年举行新大选以前的政党政治。1972 年 12 月的地震中断了这一安排。这次地震必须提及，因为这次严格意义上的地球灾害的后果对尼加拉瓜政治形势同样是灾难性的。首先，这一事件表明了国民卫队的内在软弱性；当人身镇压并不需要时，国民卫队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它使两党政治的形式化为乌有，因为索摩查立即自封为全国紧急委员会协调员，该委员会垄断了国际援助，并自行转变为一个专横的行政权力机构。这次地震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表现了广大民众的苦难，并将他们动员起来，尤其是在从未出现过外部团结的马那瓜城。这些条件未能阻止索摩查于 1974 年再次当选。

这一时期的哥斯达黎加所走的是一条较为文明的道路。1948 年“战争”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是依靠政治文化和体制及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来清算老咖啡寡头的哥斯达黎加方式。这一计划是在 50 年代出现的新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新条件来自民族解放党的兴起和重要的一代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更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这一社会--民主潮流中富有战斗精神的参与者。政治传统力量使选举机制的完善成为可能，并扩展到国家的建设，使之有能力刺激增长和发展。菲格雷斯政府（1953--1958 年）、马里奥·埃昌迪政府（1958—1962 年）、弗朗西斯科·奥尔利奇政府（1962—1966 年）、何塞·华金·特雷霍斯政府（1966—1970 年）、

何塞·菲格雷斯的第二任（1970—1974年）和丹尼尔·奥杜维尔政府（1974—1978年）显示了选举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钟摆式的交替，其中包括反对派的两次获胜（1958年和1966年）。

哥斯达黎加社会的复兴包括国家的重建。国家通过促进市场影响力不太混乱的社会经济来确定它与经济的关系；国家强化了中、小企业，尤其是农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并且通过银行国有化和成立管理银行的地方政务会议来实现信贷的民主化。通过一整套独立和半独立的机构，国家加强了对基础服务设施的控制，如电力、交通运输、保险、电话和港口等。教育部门也得到扩大。经济团体坚持的闭关锁国延缓了哥斯达黎加加入共同市场的时间。加入共同市场后，轻工业获得了逐步发展，到70年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由于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穷国，人们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个国家之所以能繁荣，是因为管理得当。

70年代中期，在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治危机呈现出一种对体制秩序进行武力的、大规模挑战的形式。至此，政治危机结束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周期。危机的根源是根深蒂固和多方面的，而且各国之间均有差异。其共同点是地主阶级均居于统治地位。这一阶级使得权力的操纵落在军人手里，并且一直处于暴力状态中，而不是体现在寻求共识和尊重合法性的过程中。镇压能力的相对成功弥补了谈判中感情上和政治上的困难。争夺经济剩余的斗争几乎总是在政治领域（而不是在市场方面）得到解决，尽管地主阶级的经济文化有着自由派的根源。

如果危机确实是社会变革意愿的最终表达，那么各国所采取的方式则可被描述为软弱的合法参与。在政治上毫无出路的社会中，服从（无论真假）作为动员力量总是优于经济剥削。阶级矛盾则不如一般称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交替。这就说明通过游击队组织所表现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具有多阶级的特性。真正的多阶级联盟离开60年代的焦点最远；这些多阶级联盟是激进变革愿望的载体，它更多地通过动员的实践来实现，而不是通过

纲领中的含糊目标。社会异质性激发了意识形态的多重性趋同，表现为解放神学、激进雅各宾主义和各种派系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混合。

刚才描述的特征反映了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由4个政治—军事组织组成）和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URNG，由3个不同规模的组织组成）[①] 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性质。这些游击队组织的活动在开始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危地马拉的几个组织的前身曾在1964—1968年活动过，但只是在1975—1978年期间才成为中部和东北部高原地区的一支基础雄厚的武装力量。在萨尔瓦多，这些组织相继成立于1971—1976年，当时它们以极大的冒险性开始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较早（1961年），但是由于受到镇压而蒙受巨大损失，并转入地下，直到1974年12月才真正出现。

政治危机既不具有反映武装暴力的独特特点，也并不仅仅严格地限于游击战行动。在暴乱活动达到高潮前后，曾出现过几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如伊斯塔瓦坎矿工的长途游行（1977年11月）、1978年公共部门雇员的总罢工以及危地马拉南海岸地区农业工人的罢工（1980年2月）。萨尔瓦多的占领劳工部和占领教堂以及1977—1978年的总罢工、1978年至1979年4月期间尼加拉瓜的城市大起义以及佩德罗·华金·查莫罗被刺后出现的总罢工，都反映了同样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群众性现象与军事抵抗有联系，虽然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群众动员的高潮并不与游击战攻势的时间相吻合；如果相吻合，那么必然会导致一场具有广泛和决定性规模的危机。这种政治危机于1979年7月在尼加拉瓜爆发，几乎与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

① 以上指的是这些单一组织在1979年以后所采用的名称，而不是指1977—1978年。

发生：这一经济危机以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崩溃惩罚了中美洲各国社会。

70 年代末的中美洲社会和经济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情况。1950 年至 198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0 亿美元上升到 75.20 亿美元（均为 1970 年价格），人口从 800 万增长到 2100 万。社会阶层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有人认为它更加分裂，有人则认为更加多元化。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15%提高到 45%；由于 15 岁到 24 岁的年龄组在比例上增长，中美洲国家的人口出现了"年轻化"，尤其在城市。制造业活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14.6%扩大到 24.1%，总的说来，生产部门实现了现代化。通过道路、电力和电话服务网络，全国一体化终于形成。由于在基础设施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1980 年该地区通讯的实际水平大大优于甚至 10 年前的条件。区域内贸易 1980 年达到了 11 亿美元。

教育、劳工、卫生和住房等方面提供的服务却没有出现同样的进步；即使确实出现的重要变化也因市场规律的过度摇摆而具有特定的社会局限性。与市场规律相比，国家法律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尤为软弱。现代化的动力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全面的；社会和文化上的落后有时被统计上的浮夸或一小部分现代化建设的城市形象所掩盖。传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是被现代结构所覆盖，从而产生了充满矛盾的后果，延缓了总的社会变革。

1973 年石油价格的上升、1974 年国际金融市场混乱的出现、中美洲出口产品价格的起伏和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以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的几次旱灾和其他 3 次自然灾害，导致 70 年代的经济问题开始恶化。年均实际增长率仍然为 5.6%，但是外部脆弱性继续恶化（进口系数从 16.2%上升到 27.3%）。自 1981 年起，整个地区都出现了负增长。

进口替代工业化经历了一个日益依附于进口初级原料、中间

部件和资本货的过程。在经济危机呈现出贷款减少、投资缩小和农产品出口价格下降的形式时，工业部门受到了直接影响，从而使地区内贸易危机进一步恶化（见表3--3）。但是，经济一体化计划在一个方面是积极的，即该计划刺激了工业生产，改善了经济结构，促进了就业，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模式。尤为重要的是，使中美洲各国之间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出现。该地区的总统在80年代末所发表的几次宣言反映了上述积极因素中的一部分（1987年8月的埃斯基普拉斯第二次会议和1989年2月的太阳海岸会议）。这些宣言为解决政治冲突提出了重要的倡议。

甚至早在1979年以后的经济危机的整个规模显露以前，大部分中美洲人的境况已异乎寻常地恶化。70年代末以前，最高收入组中的20%获得财富的50%以上，各国之间又有显著的差别（见表3—5）。社会分化扩大，处于赤贫境况的中美洲人在数量上不断增大。[1]

人均收入在经过30年的稳定而有时不规则的增长之后，出现了一次在社会方面极为严重的衰退。1985年底，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人均收入只及1972年的水平；洪都拉斯降到1970年的水平；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则分别跌落到1960年和1965年的水平。外部因素导致了这次危机，但现存社会结构中的落后性、尤其是产生出深刻政治不稳的因素，使危机的后果更为严重。

7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问题，尤其是1973年的第一次大幅度石油涨价，以及该地区咖啡等其他出口商品的价格起伏。因此，为了避免财政赤字，并使政府不仅能够弥补本国投资不足，而且还能对周期性的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作出反应（1972年尼加拉瓜的地震，1974年袭击洪都拉斯北部地区的菲菲号飓风，以及1976年的危地马拉地震），利用以贷款为主要形式的外国资本受

---

① M·E·加利亚多和R·洛佩斯：《数字中的中美洲》（圣何塞，1980年），表1.8，第158页。

表 3-5　　1980 年中美洲收入分配和收入水平(1970 年美元价格)

阶　层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占总收入%	平均收入	占总收入%	平均收入	占总收入%	平均收入	占总收入%	平均收入	占总收入%	平均收入
最穷的 20%	4.0	176.7	2.0	46.5	5.3	111.0	4.3	80.7	3.0	61.9
低于平均数的 30%	17.0	500.8	10.0	155.1	14.5	202.7	12.7	140.0	13.0	178.2
高于平均数的 30%	30.0	883.0	22.0	341.2	26.1	364.3	23.7	254.6	26.0	350.2
最富的 20%	49.0	1165.2	66.0	1535.5	54.1	1133.6	59.3	796.3	58.0	1199.8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根据各国官方数字计算。

到极大的重视。1979 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冲击时，国际性衰退对中美洲的影响已反映在增长率的下降中；此前的增长率约为每年5%。购买石油在进口中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2.7%上升到 1982 年的 21.1%，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并使经常性贸易项目出现了真正的灾难。债务从 1970 年的 8.95 亿美元扩大到 1980 年的 84.56 亿美元和 1987 年的 184.81 亿美元。支付债务的能力急剧下降，因为出口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利率上升和贸易收支恶化。发展的前景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80 年代的地区性经济衰退在尼加拉瓜最为深刻，在哥斯达黎加最轻。哥斯达黎加是 1985—1986 年期间经济获得增长的唯一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和有效贯彻的结构性调整和稳定措施于 1981 年在危地马拉实施，并立即应用于所有其他国家，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蒙受了停滞的损失，使进口下降了 50%以上。政府采取了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但是降低通货膨胀、控制财政赤字和改善国际收支的目标仍然未能实现。美国对这一严峻形势十分关注，因此建立了两党联合的基辛格委员会和 1984 年里根总统提出“加勒比地区倡议”。但是，“加勒比地区倡议”中的关税优惠对该地区整个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79 年 7 月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的垮台是中美洲危机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首先，这一垮台不仅仅是长期的家族、军人和世袭独裁的末日，而且是一种建筑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软弱国家的崩溃。这一社会、经济基础利用了非本国的、传统的和暴力的政治资源。第二，这是一个广泛的多阶级联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这一联盟具有民族特征，其纲领是使一个落后的社会获得文化、道德和政治上的新生。第三，这是通过援助和军事保护来体现美国外交政策的赤裸裸表现形式的失败。索摩查独裁的力量源泉基本上来自北美。最后，它构成了一种解决那些影响萨尔瓦多和危地马

拉的危机的革命形式。在这两个国家，大规模的造反运动正在为夺取政权作准备。

1980年初，危地马拉的所有游击队团体总共达8000多人。他们得到了不参与战斗的老百姓的支持，这包括居住在中部和东北部高原人口过多的土著人区域中的25万人。动员土著人是危机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因为这种动员提出了再次捍卫少数民族权益的问题，而且实际上还成为征服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土著人起义。在萨尔瓦多，最早加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组织有4000名武装人员；其组织水平和纪律都优于危地马拉的游击队，而且在民众中的根基也有质的不同，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与一个无能的、腐败的军队作战。萨尔瓦多军队如果不是立即获得美国的大规模援助，那么就无法抵抗民众的暴动。

内战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内战都是"以寡头方式从事政治"的历史结果以及社会内部深刻的阶级分化的历史结果。反暴动的军事行动是以反异教徒的"十字军精神"来进行的。危地马拉军队的攻势（1981—1982年）未能消灭游击队，但它迫使游击队退缩到原来的区域，同时摧毁了440个土著人村庄，杀死了7.5万个农民，影响10万至50万人口迁移。"1982年胜利"行动是一次种族灭绝行动，摧毁了土著文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在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于1981年1月发动了一次最后攻势。这次攻势虽然失败，但并不影响它在该国重要地区得到巩固。

在这些充满矛盾的军事结局中，以定期选举和巩固反暴动的国家结构为基础的"表面民主"必然出现危机。这一危机首先出现在萨尔瓦多，尔后在危地马拉。在这两个国家中，危机都始于军队内部，反映了维护以军队为权力轴心的联盟的困难。针对萨尔瓦多罗梅罗将军的政变（1979年10月）和针对危地马拉卢卡斯·加西亚将军的政变（1982年3月）开创了一个出现接连不断的非法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的趋向是将权力转交给政党。在这一

"较量"中，他们受到美国政策的压力而被迫将权力结构"文职化"，显示出一种以巩固政治中心为基础的民主形象。这一政治中心已被反暴乱本身所软化或摧毁。

在萨尔瓦多的第一个文人—军人政务会议至最后一个政务会议期间（1979年10月至1980年12月），基督教民主党已得到壮大。1982年，银行家阿尔瓦罗·马加尼亚被树为总统。在这一时期，北美洲的存在进一步加强，成为政治权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美国参议院敦促实现权力的"合法化"，为成立制宪会议而举行了一次选举（1982年3月）。令人惊奇的是，选举的获胜者是包括极右派在内的、由罗伯托·达比松领导的多党联盟，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成为这个国家中唯一的最为重要的政党。危地马拉的接连两次政变（1982年3月和1983年8月），在梅希亚·维克托雷斯将军的平庸领导下，还导致了根据宪法进行的大选（1984年6月）。其结果是相同的：右派党获得了强有力的代表，但基督教民主党拥有相对的最大多数。军人有秩序地退回军营，这看起来就是军人的失败。1984年5月和1986年12月，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萨尔瓦多）和比尼西奥·塞雷索（危地马拉）当选为总统。选举中没有舞弊，几乎没有人弃权。文人反对派候选人得胜，这在萨尔瓦多是55年来的第一次，在危地马拉是20年来的第一次。

危机、战争和美国公开干预中的民主化潮流也来到了洪都拉斯。自1971年起控制这个国家的军人政府（洛佩斯·阿雷利亚诺，1971—1975年；胡安·阿尔韦托·梅尔加·卡斯特罗，1975—1978年；波利卡波·帕斯·加西亚，1978—1980年）遇到了严重的侵蚀。洪都拉斯军官们在政治上的厌烦并非来自战争的职责。洛佩斯·阿雷利亚诺政府有史以来首次对香蕉的生产和出口征税以后，他和两位部长被指控明目张胆的受贿。他的继承者实施了小心翼翼的改革政策，但是他们同样发现自己卷入了毒品和绿宝石走私的丑闻，因为洪都拉斯已成为国际性的哥伦比亚腐败的附庸。

但是，桑地诺革命不自觉地使洪都拉斯实现了军事化，并使政府实现了自由化，所以，中美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程序，以制定新宪法，从而根据一种明确的法律意识来移交政权。

1980 年 4 月的大选为文人政府和自由党的归来以及美国势力的增强铺平了道路。卡特政府大力支持罗伯托·苏阿索·科尔多瓦。美国的影响扩及到新的地区，直接联系到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

新当选的里根总统妄想进一步强化洪都拉斯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使洪都拉斯成为美国政府组织的尼加拉瓜雇佣军团的"庇护所"，而且还成为一个进攻的根据地，其中包括几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始于 1982 年、显示侵略性的无休止的联合军事演习场。洪都拉斯已成为各种非洪都拉斯军队的根据地，并已转变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侵略性的军事轴心。洪都拉斯社会的许多方面因此而受到困扰。文人政权能在这些条件之下得以生存，仅仅是那些便于维持的基本形式中的一种，而且与洪都拉斯军队内部，尤其是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CONSUFFAA)内部的危机不相干。该委员会迫使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马丁内斯将军和瓦尔特·洛佩斯将军交权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在苏阿索执政期间，政府部门、国会和司法部门之间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冲突，后经军队、工会和美国大使馆的调停而得到解决。另一次冲突来自传统党派的内部，同样经上述实体的干预而得到平息。但这次冲突实际上中止了洪都拉斯的两党制。在 1985 年 11 月 24 日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共有 3 个候选人，国民党有两个。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拉斐尔·莱昂纳多·卡列哈斯)失败了，比他少 20 万张选票的阿斯科纳·德奥约却获胜，这是由于他的得票数加上所有其他自由党候选人的选票而增多。如果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历史时期，类似这样的危机早就很快地促使军队干预了。

在哥斯达黎加，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罗德里戈·卡拉索的保守政府（1978—1982 年）试图采用自由经济政策，但体制稳定并未受到干扰。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卡拉索拒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并允许尼加拉瓜索摩查的反对派使用本国领土。此后的选举使路易斯·阿尔韦托·蒙赫的民族解放党重新执政（1982—1986 年），但是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而且北美的政策试图将哥斯达黎加变成其反桑地诺攻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上的无能为力、美国的压力和中美洲政治的普遍向右转，蒙赫政府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运转。1984 年 1 月，蒙赫声称哥斯达黎加将保持永久性的、非武装的和积极的中立；但是在 8 月，他撤掉了属于他的政党中进步派的重要官员的职务，以便于反桑地诺分子在这个国家里的活动。

1986 年，民族解放党尽管遇到了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困难，但在奥斯卡·阿里亚斯的领导下仍然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这是该党第一次与具有明显意识形态特性的党派中保守的反对力量进行竞选的经历。随着这一行动不断得到巩固，这个国家采取了美国式的政治模式，即两党制结构模式。在这一结构中，两党之间没有什么纲领上的差异。哥斯达黎加的左派力量进入了一个危机，并丧失了他们已经很微弱的选举人的支持。

阿里亚斯政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努力使他的国家采取有效的中立立场，并倡议在 1987 年 2 月召开一个旨在实现和平的总统会议；尼加拉瓜丹尼尔·奥尔特加总统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接连不断的努力终于使中美洲五国总统于 1987 年 8 月在危地马拉的埃斯基普拉斯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并签署了要求实现地区和平的文件。这一倡议获得了自 1983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和平的孔塔多拉集团成员（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属于支持集团的国家（巴西、阿根廷、秘鲁和乌拉圭）、欧洲议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 4 个成员的支持。但是这一倡议受到了里根政府的顽固反对。里根政府继续支持被称作“反政府

武装”的雇佣军团伙，并许诺向其增加援助。就此而言，美国的行为似乎是中美洲实现永久和平的最大障碍。

这一时期的尼加拉瓜形势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这些特征体现在社会的全面改组之中，获得了已被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改组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指挥，但仍然局限在尊重不包括索摩查家族在内的私人财产的框架之内。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将混合经济、政治多元化和不结盟作为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创造了一个国营经济部门和一个联盟（革命爱国阵线，FPR）；该联盟包括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右翼和左翼党派。

虽然有着上述意愿，但是尼加拉瓜的变革动力仍然是有限的，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则由于里根政府竭力作对。随着美国无限期终止双边援助（1981年2月）和国际组织停止提供贷款（1981年11月开始），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难以补充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资本货以及原料而慢慢地陷于瘫痪。这种状况反映了被一千根绳子索缚在美国经济上的社会所具有的经济落后性。由外部因素导致的上述匮乏使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市场失去了所有决策权，替代的是不断增长的国家干预，又因为工人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甚至因为如一位文官所指出的：没有军队的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体制的基本行为从一种与积累原则相符的类型转化为一种旨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体制以及商人进行投机倒把、从公司中抽回资本、把资金流向国外的体制。

在政治方面，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仍将自己作为一个政党；群众组织通过桑地诺保卫委员会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反对力量也立即形成，在此基础上，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和教会统治集团中的上层阶层发挥了互补的主导作用。1981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动地组织了反政府武装，并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

经济发展并没有伴随着政治、社会领域中的胜利，因而戏剧性地显示了这些新的安排的局限性。在努力进行国家建设与保卫领土之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事件：种族问题（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米斯基托人）呈现为冲突性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初的错误后来获得了创新的、大胆的解决，即重新获得了自主权。政治多元化在落后的政治文化中加以试验。在1984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67%的选票获胜，制宪议会也由选举产生，丹尼尔·奥尔特加当选为总统。甚至在大选以前就能看出反对派在有关革命的计划方面缺乏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性政策。里根政府向反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来自官方和私人途径的援助；这股武装力量组织得更好，获得的经费也更多，但没有能力掌权。可是，"低烈度战争"的结果却是成功的。桑地诺分子在与反政府武装的斗争中确保了有效的军事胜利，尤其在1983—1987年期间。但是由于搜刮资源以及合作社、桥梁和学校的不断被毁和无数平民的丧生等等所导致的经济衰竭为桑地诺政府造成了非常困难的形势。

这一切政治和经济现象再次成为说明，一个小国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克服欠发达，将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尼加拉瓜蒙受的战争使这一任务更为艰巨，并使民众付出社会牺牲。农村中的土改和其他一些措施有助于改变社会结构和部分地减轻生产困难，但是影响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对尼加拉瓜社会的打击则更严重，从而促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寻求和平作为任何一种内部安排的条件。

目前，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已开始显露出一些衰落的迹象，中美洲危机具有了重要的国际性，包罗了新的参与者。有意义的是，孔塔多拉条约成了唯一能确立的外交倡议。该条约是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于1983年1月签订的，旨在确保一个能为结束各种明显的冲突而进行谈判的框架。虽然整个地区的和平从未处在严重危险之中，但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

冲突确实对稳定和民主构成了重大威胁。1987 年 8 月，中美洲各国总统签订了被称作埃斯基普拉斯第二次会议协定的《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这一协定促使了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以考虑和解决该地区的社会—政治危机和改善政府间关系。因此，1988 年 2 月在萨波阿举行了尼加拉瓜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分子的对话；一年以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为终止萨尔瓦多的内战提出了内容广泛的建议。在孔塔多拉集团成立时，上述两个倡议的可行性都并不渺茫。1989 年 1 月华盛顿新总统的就职扩大了美国进一步调整对该地区的政策的希望。但是，危机的解决首先依赖于中美洲人本身的政治主动性。

第4章

1930年以来的危地马拉

虽然危地马拉的10.8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要比尼加拉瓜（14.8万平方公里）和洪都拉斯（11.2万平方公里）都小，可是，1930年危地马拉的人口（170万）却居中美洲之首。但首都危地马拉城的人口只有13万，第二大城市克萨尔特南戈（2万人口）也只像是一个地方小镇。危地马拉拥有一个薄弱的制造业基础和几乎完全由咖啡（占出口收入的77%）和香蕉（占出口收入的13%）组成的出口部门。因此，危地马拉具有落后的种植园经济的特征，大型商业农场与小农土地的组合共存；小农土地以自给自足农业和为有限的国内市场提供食品为主。在大萧条前夕，国内生产总值为4.5亿美元，使危地马拉经济大大超过海峡地区其他国家的规模（第二大国家是萨尔瓦多，国内生产总值为2.27亿美元；尼加拉瓜最小，国内生产总值为1.29亿美元）。此外，危地马拉还保留着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它所享有的地区性政治影响；那时危地马拉是市政和基督教管理的所在地，也是整个中美洲地区的商业中心。因此，尽管危地马拉与大部分拉美地区相比是狭小和贫穷的国家，与北方的墨西哥相比也是相形见绌，但危地马拉仍然是中美洲地区的强国，而且与今日一样，1930年这个国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场所。

豪尔赫·乌维科将军于1931年2月就任总统。在此前的大选中，他获得30多万张选票，毫无竞争对手。他的上台开始了长达13年的个人独裁政权，成为危地马拉长期独裁政府传统中的一部分。他的个人独裁既反映了他在本地区同等地位人的共同点（如

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和洪都拉斯的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和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又继承了危地马拉的长期独裁传统。这种独裁传统早在共和国时期的拉斐尔·卡雷拉（1838—1865 年任总统）就开始了。卡雷拉出身低下。轻率的自由主义努力要求杜绝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自由市场的限制；对此，卡雷拉有力地维持了一种落后的保守秩序。政治、经济的混乱伴随着独立和独立后组建中美洲联盟；这种混乱在危地马拉城强大的商业阶级中以及在大部分农民中都产生了有力的反响，因为商业阶级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它们会失去那种受到西班牙王室支持的地区性垄断；而农民则很快发现，殖民地当局的那种家长主义式统治赞赏无神论以及与自由"现代化"相连的高税收。因此，卡雷拉能使他的统治具有一种如今被称作民粹主义的特点，即教权主义纲领、保卫印第安人村社以及与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帝国秩序的社会准则保持一致。与此相应的是，中美洲联盟垮台后（作为一种自由的人为的产物，该联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这个独裁者试图重新取得危地马拉对海峡地区弱小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应通过偶然的干预，而不是通过任何正式的渠道来实现。但卡雷拉十分成功。19 世纪中叶，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扩展到了哥伦比亚边境。

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咖啡和第二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和开发土地市场——主要是教会和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的政策来鼓励咖啡种植业。咖啡和第二代自由主义没有减少危地马拉想做地区性强国的野心。伟大的自由派考迪罗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1873—1885 年在任）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1898—1920 年在任）不仅在国内保持了专制主义政权，而且还不断地介入邻国的事务，尽管这种介入的范围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在该地区权力的巩固而大大缩小。华盛顿长期支持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以报答他对 20 世纪初以来一直种植香蕉的联合果品公司作出的慷慨让步。埃斯特拉达·

卡夫雷拉下台后，曾出现了一次短暂的、组织松散的旨在复兴中美洲联盟的努力。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常被派往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邻国，以强制维持秩序。在这一时期，复兴中美洲联盟的努力终于化为乌有。如果危地马拉仍然是中美洲的最强国家，那么其政治精英就不能再创造出在殖民地时期或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保持的地区性权力和特权。这批过去目光向外的阶层现在则日益内向，首先表现出地方庄园主阶级的社会傲慢。

美国霸权的兴起并不是导致危地马拉内向性的唯一因素。虽然寡头有能力保持其窥视南方的野心，但是它对庞大的北邻墨西哥则怀有恐惧。独立后不久，墨西哥将军奥古斯廷·德伊图尔维德曾徒劳地试图控制海峡地区；尽管19世纪70年代中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受到了许多精英的欢迎，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好感从未消除残留的对扩张主义、甚至对吞并的戒心；吞并的可能性在19世纪20年代恰帕斯的分裂中得到反映。白人阶级和上层拉丁人阶级中的那种高度戒备的政治特性因墨西哥革命而进一步加强。墨西哥革命使危地马拉地主的精神大受损伤，并极大地压制了削弱军队权势或放松十分僵硬的社会制度的尝试。这种社会制度是既由种族主义、又由种植园经济的需求所决定。因此，虽然20年代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寡头内部争端以及对联合果品公司作出让步的协议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短命的何塞·马里亚·奥雷利亚纳政权（1921—1925年）和拉萨罗·查孔政权（1926—1930年）迁就反对派的程度不及中美洲的其他国家。乌维科上台的坚实基础是支持联合果品公司这个在危地马拉的唯一水果公司、美国利益的最重要代表和雇佣工人的最大雇主，以及平息由1929年他任国防部长时出现的镇压所引起的全民性不满。[①]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危

① 阿方索·鲍尔·派斯的《美国佬资本在中美洲是怎样活动的：危地马拉的情况》（墨西哥城，1956年）一书提供了联合果品公司与危地马拉政府签订协议的细节。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反映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该公司的活动所激起的深刻感情。

机在中美洲已经触发了群众性动员，尤其是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萨尔瓦多地区，从而产生了可能会出现类似墨西哥暴乱的担忧。因此，虽然危地马拉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不太严重，但是乌维科顺利地获得了寡头对他的政策的支持；他的政策是采取严厉的镇压和控制较低层次的秩序；这种严厉的镇压限制了上层阶级的政治生活。

危地马拉地主阶级之所以缺乏一种公开的和竞争性的政治体制，如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在其他地区勉强建立起来的那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有着大量印第安人口——1930年占总人口的70%——以及常常采用债务劳役偿债制——这种偿债制是高原地区向咖啡种植园提供季节性劳动力的主要机制——以强化中央国家的强制性特点。将10万名工人投入收割季节并保证使他们到达庄园，这一任务是由独立的货币放贷人来承担的；这些放贷人还为当地的节日和在玉米剩余不足时预支现金。但是，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国家都承担了支持这种体制的义务；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和农村中一般的社会控制都依赖于这种体制。[1] 大部分移民工人来自西部高原地区的8个人口稠密的"印第安人"行政区域。这一事实使那些地区的行政官员的控制尤为重要。但即使在那些地区，如上韦拉帕斯省，庄园主依赖于国家的支持的程度较之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庄园主要高。在上韦拉帕斯省等地，种植园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农民居住区，种植园所需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当地。此外，在乌维科执政时，集中在上韦拉帕斯省的德国种植者生产的咖啡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但是他

① 关于这种关系的最新描述，参见切斯特·劳埃德·琼斯的《危地马拉的过去与今日》一书（明尼阿波利斯，1940年）。在过去的20年中，论述农村劳资关系的理论性和历史性著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最好的历史性概述可参见戴维·麦克里里的文章：《咖啡与阶级：自由时期危地马拉的发展结构》，载《西属美洲史评论》第56卷，第3期（1976年）和《1876—1936年危地马拉农村的奴役》，载《西属美洲史评论》第63卷，第4期（1983年）。

们将这一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权势的程度不及另外两个国家的种植者。乌维科曾在上韦拉帕斯省担任过地区行政官员，与当地地主的关系常常不太和谐。他根本不是一个咖啡资产阶级的傀儡，尽管他在执政期间始终试图在衰退中为他们创造最佳条件。与此同时，他继续贯彻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的与联合果品公司全力合作的政策，在土地和豁免税收方面作出慷慨的让步；对于这种让步，咖啡种植者和那些弱小的、但正在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表达了一些不满。咖啡种植者因联合果品公司在铁路运输和运价的制定方面拥有有效的垄断权而蒙受损失。

虽然乌维科保持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形式，甚至为了确保宪法修改能使他继续掌权而诉诸大选和公民表决，但是他不允许反对派提出候选人，很少召集内阁会议，并利用可怕的秘密警察来监视一般的民众和军队；军队最终成为他的靠山。萨尔瓦多西部边境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不费吹灰之力地炮制出来的“红色恐慌”，于1932年加快了对激进活动分子的监禁及其领导人的处决。1934年政权对更传统的反对派的镇压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当时采用了侦破“暗杀阴谋”的方法，以清除最后一批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残余，从而使数百人丧生。在这一基础上，乌维科宣布所有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组织（包括商会）为非法，掌握了大量选票，控制了未经选举产生的和屈从的国会，并亲自承担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一任务得益于他对收音机和摩托车的喜爱，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更加无处不在的独裁者，比此后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该独裁者的文字描写更为严重。[1]在其他方面，乌维科任其个人怪癖自由发挥的能力——如喜欢通过无线电波和小报向大众提供烹饪、音乐和机械修理等方面的建议——更为直接地符合危地马拉人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创造的小说风格所体现的无边无际的奇特想

[1] 见肯尼思·J·格里布：《危地马拉的考迪罗：豪尔赫·乌维科政权》（俄亥俄州阿森斯，1979年）。

象力；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1946年)事实上是以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为模特的。这些活动也是真正的政治手法，用来最大限度地扩充其潜在的个人权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弱点和把集体主义要求置于个人要求之上的无情的政治逻辑都会损害这种体制。但是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乌维科能够在没有遇到强有力挑战的情况下统治中美洲最大的民族国家，尽管他没有像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将军那样取得过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也没有像尼加拉瓜的索摩查那样获得过美国的全力支持。乌维科的个人权力并不是来自与现存政府模式的深刻决裂，就此而言，他的政权不如中美洲地区的其他政权那样出众。

在应付经济危机方面，乌维科政府完全不是消极的，而是试图保护农业体系和社会——种族结构。这种体系和结构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创新和维持现状来赖以生存的基础。1927—1932年期间，咖啡出口值从3400万美元下降到930万美元；香蕉出口值的下降幅度几乎同样大。由于世界价格下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20—1924年的5.4%下降到1930—1934年的－0.6%，这为咖啡种植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向季节性劳工预支的现金是这些咖啡种植者的主要开支项目。由于种植园工资下降和基本粮食价格疲软，在经济发展要求扩大出口量和增加收割季节的劳动力时，小农却对以负债为基础的季节性劳工机制反应冷淡。可以预料，乌维科拖欠了外债，脱离了金本位，但仍然保留格查尔与美元等价，直至1984年；此外还将国家开支削减30%，以解决不断发展的财政危机。他对农业中不断严重的困难的反应是改革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机制。改革方法是取消劳役偿债制——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对其"进步的"、"民主的"含义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并于1934年以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强制性制度取代劳役偿债制。这一强制性制度要求耕种不足约3公顷土地的农民在庄园里工作100—150天。被新法令确定为游民的农民数量不仅能足够地弥补债役劳工的缺乏，而且还为劳役制提供现成的劳动

力供给。国家利用这一劳役制实施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道路建设计划。与此同时，乌维科还强化了对地主的法律保护，豁免在保护财产时所犯的罪行。他用中央任命地方行政长官这种制度来取代由当地人任市长的传统制度。那些土著人市长在此之前与拉迪诺人[①]组成的地方当局共同存在，并受到国家的承认。由中央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无疑削弱了土著人的自主性，进一步损害了村社文化的地位。自从1871年的自由派革命和咖啡庄园出现起，村社文化一直处在压力之中。另一方面，这不是对印第安社会的一次肯定的攻击，因为新政权较之印第安人领导人对于地主的要求有时更具对抗性；保护自给自足经济的显而易见的必要性使庄园的要求获得了平衡；庄园的劳动力和粮食作物依赖于自给自足经济，同时两者又在土地和对资源的控制权方面展开竞争。

乌维科对土著人的庇护是十足的家长式统治。他以这种统治方式指导那些政策，劝说一些研究其政权的人信服他在农民大众中享有明显的声望。这一声望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尽管农产品出口种植园的地盘确实慢慢地稳步扩大，但自给自足农业在50年代遭到萧条的初步冲击以后仍然相对兴旺。50年代期间，首先是棉花、尔后是牧牛业再次为小农土地施加了压力而没有对雇佣劳动力提供补偿机会。就此而言，由萧条导致的经济停滞为印第安社会和小农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如同19世纪中叶卡雷拉独裁时期那样，这与保守统治同时出现）。与此同时，否定独立组织以及通过流浪罪法来提高劳动力需求，则超出了社会和种族传统分权情况下经协商确定的、不断增加的勒索。1944年乌维科下台时，这些措施首先以民主的名义被抛弃，甚至在1954年反革命事件以后，仍然没有被重新采纳。

如同在其他中美洲地区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独裁统治。就经济而言，危地马拉因下述因素而或多或少地不受大战的

① Ladino，原指殖民地初期会讲西班牙语的土著人。——译者

影响：乌维科在一段时期内已减少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因为纳粹政权坚持要求以旧马克来支付咖啡进口（旧马克只能根据帐面值来交换德国货），而危地马拉与英国的贸易则确实非常有限。1940年的泛美咖啡协定以适中的、能被接受的价格为危地马拉的主要出口商品提供了得到保障的美国市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马尼拉麻种植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香蕉出口的下降。与此同时，危地马拉国从在战争初期被乌维科驱逐出境的德国公民拥有的大片咖啡种植园和其他财产（1944年被收归国有）那里获取了大量经营收入。但是，由冲突导致的进口急剧下降很快就扭转了30年代后期出现的消费品价格逐渐下降的趋势。战时通货膨胀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尤为严重。因此，中产阶级在10多年中第一次接触到与协约国的运动密不可分的民主理想。独裁者手中的谄媚的媒介不能彻底压制这一重要的外部影响，但考迪罗无法、而且也不愿意接受"地域宿命论"的政治后果。"地域宿命论"是乌维科对轴心国宣战的基础；而轴心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权是他非常赞赏的。1944年6月，当圣卡洛斯大学的学生为了要求自由选举院长和校长而举行街头抗议时，乌维科好战地声称："只要我是总统，我不会允许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因为危地马拉人民尚未作好接受民主的准备，因此需要一只坚定的手"。[①] 但在那时，他的政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学生，而且还来自首都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尤为重要的是还来自低级军官；这些军官对军队上层人物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更大规模的社会停滞表示不满。6月初的学生游行遭到了预料中的警察镇压。但在此后的几周内，在萨尔瓦多学生成功地将马丁内斯将军赶下台这一事件和广大民众支持的鼓舞下，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马丁内斯的下台清楚地说明乌维科政权已不再受到美国的支持，而广大民众不断增强的要求则首

① 引自卡洛斯·萨马约亚·钦奇利亚：《独裁者与我》（危地马拉城，1950年），第176页。

先从彻底的大学自治扩展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6 月 24 日，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读了联合国宪章，311 名杰出的公众人物签发了一份致总统的请愿书。事实证明这一切能足够地劝说日落西山的独裁者懂得：他下台的时候到了。

乌维科的下台是突然发生的，但并不是决定性革命时刻的结果。他在其毫无生气的追随者中挑选了费德里科·庞塞将军来接替他，并确保国会认可这一继承。农民没有干预这些手法；被当局操纵的少数驯服的和糊涂的团体同意庞塞的接班。工人阶级仍然非常弱小，没有工会组织，已停止进行独立活动。即使是领导了反乌维科运动的中产阶级也对自己的快速成功感到吃惊。因此，它没有采取明显的第二步或缺乏政治领导人。长期的专制政府产生了一种政治真空。但是，独裁统治所具有的那种彻底的个人至上主义性质也剥夺了新政权的巨大权力、政治技能和明显的授权，只能继续维系"没有乌维科的乌维科主义"。当局对学生的主要要求作出了让步；人们对独裁者的下台感到欣慰。尽管这一让步和欣慰带来了一些短暂的好处，但是，使这一政策得以持续数月的潜力是有限的；这一潜力的终结快速来临，因为庞塞无能力在 10 月举行大选，尔后就自封为总统，他所宣称的得票数比选民的实际投票数还要多。在这一情况下，庞塞的行为与乌维科在 6 月拒绝向学生作出任何让步的行为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庞塞的做法促使下级军官揭竿而起；他们反对的这个政权没有任何民众支持，高级军官的无组织的野心使该政权进一步衰弱。

10 月 20 日军事暴动的口令是"宪法与民主"，这一暴动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阿拉纳和哈科沃·阿本斯少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向市民分发武器，因而避免了军官们担心的爆发全面反军人运动的可能性。这一行动将一般性的军事政变演变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运动，虽然在此后的 10 年内军人在管理国家方面从未放弃过领导作用。这一政变的最终胜利是在向首都的弹药库进行一次猛烈的炮击后取得的。实际上，10 月暴动是 6 月抗议的延续。这一

暴动遵守了当时的逻辑，即产生了一个执政委员会——阿拉纳、阿本斯和一个名叫吉列尔莫·托列略的律师，这个委员会声称它完全是过渡性的，并要求举行总统和制宪会议的自由和公正的大选。

1944年10月的暴动在危地马拉政治史上开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十年。在描述这10年的特征时，用"十年之春"这一短语比用"革命"这一术语更贴切。"革命"这个词常被用于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1945—1950年）和哈科沃·阿本斯政府（1951—1954年）。尽管这两届政府在风格上有差异，而且在1948年冷战出现后它们与华盛顿的关系都严重恶化，但是这两届政府都把小心谨慎的经济改革与前所未有的民众和政治自由结成一体。就此而言，它们在合法性方面与此后几届政府有着不同之处。此后几届政府诉诸专制主义，仅进行一些最不重要的经济调整。因此，左派和右派都从摩尼教角度来看待被少数、但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所牢记的这个"革命"。左派将这一"革命"视为自由和进步性再分配的唯一经历；右派则将其看作是一次天真的改革的严肃例子，这一改革起到了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作用。

态度温和的学校教师阿雷瓦洛曾在阿根廷的一些省份流放了10年。他回到危地马拉后即赢得了民众对他作为候选人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似乎能体现与民主政府相连的公民美德，而且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被看作是建立广泛进步联盟的一个独特优势。阿雷瓦洛在1944年12月大选中从29.5万张选票中获得了25.5万张。他的胜利是个人声望和精明筹划竞选运动的"宣传效果"的产物，而不是选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倾向。虽然他和阿本斯都力图建设一个类似墨西哥模式的政府，但是改革阶段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支持改革的政治组织表现出了相对的广泛性和软弱性。人民解放阵线（FPL）、民族革新（RN）和革命行动党（PAR）等政治力量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它们颁布的纲领都接受当时广义上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动机，但在战术上而非战略

上有分歧。它们的显著特征是个人至上主义以及未能吸收大量有组织的成员，因而强化了总统的作用，他不得不处理和调停它们之间的争端。虽然在整个阶段始终有着一股试图弥补没有全国性共产党这一缺陷的较为激进的思潮，但是被选入新制宪会议的大多数年轻议员都支持阿雷瓦洛的理想化“精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公认的世俗神秘主义动机与不太熟悉的发展主义想象力的声调混合成一体：

> “因为我们生活在20世纪，所以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是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人并不是首先为了吃饭。我们坚信人主要是尊严的意志……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以巧妙地分配物质商品为目的，也不是以愚蠢地把在经济上各不相同的人实现公平化为目标。我们的社会主义旨在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解放人……唯物主义概念已成为专制力量手中的一个工具。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都曾经是社会主义。但是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的左手分发食品，而右手则破坏人的道德和公民美德”。①

这一陈述预示着主要是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的改革计划将到来。但是，在一个种族和阶级决定深刻分化的国度内，承认各种范围的民众自由能促使社会和生产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1945年的宪章废除了1934年的流浪罪法，因而结束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农村劳动力主要是由市场外的劳动力组织的。与此同时，选举权扩展到被迫在这一体制中工作的大多数人，但是制宪会议的民主动力尚不能将投票权给予在人口中占显著比重的文盲妇女。为了与当时的司法模式相吻合，财产被宣布为不可侵犯，但仍然要受制于“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允许国家进行干预；对于这种干预的前景，地主们多少有点心有余悸；他们早已因乌维科政府没收德国人拥有的庄园而受到困扰。在依据宪法的

① 胡安·何塞·何雷瓦洛：《政治文稿》（危地马拉城，1945年），第199页。

基础上，新政府定于1946年举行地方选举——这一措施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农村人口不能享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因此他们一般说来关心地方政府的程度超过关心全国性政府的程度。翌年，阿雷瓦洛通过制订一个全面的劳工法来巩固宪法上的结社自由——这个劳工法在危地马拉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该法令为工会和集体谈判作出了保障，并为工作条件确立了法律准则。占优势的政治气氛避免了对这一独一无二的措施的公开反对。重要的是，为了民主的名义，联合果品公司对该劳工法的抵触被允许存在，因为这个法令规定：在至少有500个雇员的庄园中，如果50个人以上想成立工会、而且其中60%的成员是有文化者，那么这些庄园的农业工人的组织才能被允许存在。政府采取如此严格的措施是为了试图在农村中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工会——1948年注册的农村组织只有11个——但这样一种显然是保守的政策却不是毫无道理地被联合果品公司看作是对大规模商业康采恩利益的歧视。在该公司和美国国务院的压力下，阿雷瓦洛于1948年修改了这个劳工法，从而为此后几年由出现更为广泛的农村组织奠定了基础，尽管在香蕉种植园以外的地方，这一更为广泛的农村组织很少采用一种善始善终的、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的群众运动形式。

同样由于惧怕城市劳动力会超越法令的界线这种可能性，阿雷瓦洛立即关闭了一所由马克思主义者开办的工人夜校“光明学校”。这些人无法成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因为宪法禁止有国际联系的政党存在。小心谨慎的总统所采取的这一措施——1950年重演——以及他孜孜不倦地主张劳工法和宪法所确定的限制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都得到了阿拉纳上校的全力支持。作为军队的统帅，阿拉纳试图限制民众运动取得的进展，而且在工人们开始使用他们不熟悉的罢工战术时，阿拉纳不得不避免采取直接的镇压行为。但在阿雷瓦洛领导下，罢工很少发生；城乡工资的普遍上涨主要是由于政府的主动行为；一个总的说来充满了生气的经济

现在已摆脱了战争的束缚，并从战后咖啡价格的上升中获益匪浅。①

这些条件几乎达到使生产出现繁荣的程度，但它们确实有助于废除强制性劳动，并在财政非常拮据的条件下使新政权的改革获得了一点余地。这样，尽管阿雷瓦洛创建了一个国营信贷机构（这是以发展的名义采取的极少数措施中的一个，这些措施既没有触痛本国企业家，也没有触痛美国政府），但是他的个人热情却更为始终如一地针对那些明确的"精神上"的进步；取得这些进步是由于对上层建筑实行了变革，而并不是危地马拉社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作为"教师革命"的领导人，总统能很容易地找到发展教育的支持者，使学校和教师数量在1940年的水平上翻了一番。出版的书籍和城市的文化活动水平都获得了显著的增长，同时在农村进行了开展识字运动的尝试。到1954年，危地马拉的教育水准仍然居中美洲之末；学会读写的人为数只是几万，而非几十万。但是，即使这一有限的进步也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尤其在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质量方面，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包括经济管理，因为国家干预机构——中央银行的建立是具体的体现——正在缓慢地扩大。

阿雷瓦洛对中美洲联盟的事业的眷恋并非不具有危地马拉文人政治的特征。建立中美洲联盟这一理想在危地马拉的文人政治中比在海峡地区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加勒比军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不主张建立政治联盟；但它集合了那些反对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尼加拉瓜的独裁政权的非共产党人。阿雷瓦洛对"加勒比军团"的支持对于军团公开庇护暴动活动方面完全是一种更大的冒险。危地马拉总统在1948年的哥斯达黎加内战中对何塞·菲格雷斯的支持有助于推翻一个不太反动但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民众

① 从利奥·A·萨斯洛的《1944—1949年危地马拉的社会改革方面》（纽约，1950年）一书中可看出阿雷瓦洛计划的目标和局限性。

主义政权。然而，阿雷瓦洛的支持具有一种暂时堵住华盛顿不断增长的意见的作用。华盛顿的意见认为，阿雷瓦洛政府过分地溺爱国内的激进分子；这些人正在利用民主、自由来开展反对美国利益的运动。但是，阿雷瓦洛在“加勒比军团”事务中的参与引起了阿拉纳上校的极大反感。阿拉纳想继承阿雷瓦洛总统的雄心受到了主要党派的打击。由于经常不断地开展镇压那些组织松散的反政府暴乱的活动，阿拉纳已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对这个政府的同情心持续减少，因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开始与政治调整的动力不相上下。1949 年 7 月，阿拉纳在视察一个军火仓库的归途中遇刺身亡；这个仓库里的军火是从阿雷瓦洛在“加勒比军团”中的同事那里没收来的。当时人们普遍怀疑阿拉纳在策划一次政变。为改良主义政权除掉阿拉纳这个主要保守派挑战者的有罪行为常被归咎于阿拉纳的同事阿本斯。尽管阿本斯是国防部长，但他却十分同情左派和赞同进行更加实实在在的经济改革。虽然暗杀行为的责任从未得到证明，但大部分军人仍然以大规模暴动的方式来对阿拉纳之死作出反应。这次暴动终于失败，并为此而付出了许多生命，危地马拉工人联合会（CTG）主要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

起义的失败使政治活动的中心向左转移。此时，恰好冷战已经成形，而且，最初在中美洲地区显而易见的那种反独裁动力已趋于停滞。1950 年以前，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投资不断增长；虽然国务院对于阿雷瓦洛控制那些支持他的党派内部激进力量的能力有保留，但是华盛顿在施加压力时仍然留有一点自我控制。因为国内保守力量已基本解体，工会内部左派力量不断增强，军队被一个首先忠于民族主义、但又信服民族主义激进意义的军官所控制，所以美国的政策开始从缺少同情——这一点在 1948 年的军火禁运中显而易见——转向攻击；这种攻击在 1953 年采用了协力造

成不稳定局面的形式。① 美国政策的这一演变当然是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取代杜鲁门政府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政府目睹了约翰·福斯特和艾伦·杜勒斯兄弟俩被提拔为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两人曾在危地马拉最大的美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中工作过，并拥有其股权。但是，迪安·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对危地马拉的关注不小于福斯特·杜勒斯领导下的国务院对危地马拉的关注。这是因为，虽然1951年3月阿雷瓦洛的总统职位让位于阿本斯后实行的政策目标在30年后看来似乎并不出色，这些政策的目标是限制外国资本控制基础设施和进行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但这些政策无疑伴随着更大规模的民众活动和左派力量显而易见的增强，而赞同1944年10月革命的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却开始失去活力并四分五裂。

针对土地占有制不公正现象而采取有力措施的第一个信号是1949年12月阿雷瓦洛颁布的《强制租地法》。该法令提供了在未耕种土地上的临时用益权，②但是实际上它影响了东南部人烟较稀少的拉迪诺人地区，而非高原地带的印第安人县。与阿雷瓦洛相比，阿本斯是一个"政治性"较弱、但在行政管理上较坚决的领导人。正是在阿本斯的领导下，危地马拉政府的政策及其一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目标才成为美国和当地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大问题。危地马拉工人联合会自从1944年成立以来一直由左派全面控制或领导；左派的化身就是该联合会的秘书长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这一领导地位在工会运动中造成了分裂，城市劳动力中较为谨慎的一派由铁路工人领导。铁路工人保留着他们的互助性历史，避免公开地发挥政治作用。但在1951年10月，不是

① 罗纳德·M·施奈德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纽约，1958年)一书有许多关于1944—1954年期间的左派的细节，尽管该书是从顽固的反共立场出发的。

② 用益权是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译者

空谈理论、而是具有技巧的古铁雷斯消除了分歧，因此，危地马拉总工会（CGTG）的成立象征着在激进分子领导下很小规模的劳工运动实现了统一——1954年的会员还不足10万人。1950年，各不相同的农民组织联合成立了危地马拉全国农民联合会（CNCG）；在反革命爆发前夕，该联合会声称拥有345个会员组织，会员总人数达25.6万。虽然这些数字是有水份的，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被夸大。尽管农村工会具有分散和非正规的特点，但它们将那些以村社为基础的协会联合成前所未有的农民组织，以对抗地主；在此之前，这些农民一直受到压制，只是庇护和高压统治的灵巧结合才能无规律地中断这种压制。全国农民联合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对领导城市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疑心重重，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描述成大地主们经常认为的那种“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但在危地马拉总工会成立后不久，古铁雷斯就成功地与农村领导人达成了一个战术上的协议。这一成功主要是因为弱小的共产主义先锋队解决了常常是严重的内部分歧，并认识到开展一个不具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土改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和其他问题上，古铁雷斯与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长期不和；福图尼是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1947年后革命行动党内“进入主义”（entryism）战术的设计者。因此，在许多年内，马克思主义者微不足道的事业不断衰弱；公开注册方面的宪法性困难最终以1952年12月成立危地马拉劳动党（PGT）而得到解决，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长期得不到彻底消除。在华盛顿眼中，阿本斯政府对劳动党的承认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官方认可，但该组织有战斗性的成员在数量上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无一人在内阁任职，在行政机构任高级官员的人数不足6人，在国会拥有席位的人数也不过6人。劳动党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该党成员在工会的领导地位；但即使在工会，一些主要领导地位常因战术上的需要而被放弃，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政府支持者们更为广泛的共识，即革命“第二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土改和缩

小联合果品公司对经济的控制权，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垄断通向加勒比港口巴里奥斯港的铁路运输线来实现的。虽然危地马拉劳动党实质上从一开始就成为华盛顿的眼中钉，但更为深远的威胁被认为是在于以下事实：该党形成了一部分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不利于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公司利益，因而构成了对西半球安全的挑战。由于即将退任和直言不讳的阿本斯也形成了这种共识的一部分，他注定要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走狗”。

在世界银行1950年派往危地马拉的工作组的建议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信条的影响下，阿本斯政府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其中包括铺设一条能与联合果品公司的铁路展开竞争的国有公路，通向巴里奥斯港；还建设了一家国营发电厂，该厂同样是不利于美国公司利益的。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提及土改，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土改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的主要行动。1950年公布的关于异常落后的土地占有制模式的统计资料能说明，为什么政府觉得有必要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求变革的选民不仅仅局限在激进左派行列：总人口的2%控制了全部可耕地的74%，而76%的农业单位仅能获得9%的土地；农场总数中84%的农场平均拥有土地不足17英亩；如将9英亩视为一般家庭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数量，那么农场总数中21%的农场平均拥有不足2英亩。这一极端不平衡状态起因于咖啡种植园和香蕉种植园的巩固。对于这一不平衡，政府的对策是实施一项显然是温和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小农”部门来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同时保护大多数商业企业。阿本斯本人严格认真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目的不是毁坏这个国家的所有能被定为大规模的和闲置的农村财产，并将土地分配给在土地上耕作的那些人。我们会对大地产采取这些措施，但不会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农业经济实体这样做。”因此，1952年6月27日的900号法令未触动不足900英亩的农场，并向900英亩以上的和进行大量耕种的农业单位提供广泛的免税优惠。此外，在分配的土地中，约1/3早已

为国家所有，因此，虽然在两年时间内共有91.8万英亩土地被没收并分配给8.8万户农民，但在除了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土地以外的所有私人土地中，仅4%的土地受到这一措施的影响。在高原地区的县，1.9万个农场中只有15%受到该法令的影响，而且很少有证据说明这一影响减少了收割季节的劳动力供给量。

虽然土改获得的鼓舞主要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模式，很少来自苏联集团，土改的目的是发展生产，而非控制地主的权力，并且土改几乎没有触动大商业农场的整个生产基地，但是，寡头们仍然坚决地抵制改革。这次土改是19世纪70年代自由党革命以来在中美洲调整地主社会条件的第一次努力。这一努力被看作是对建筑在传统大庄园之上的政治文化的一次主要攻击；传统大庄园业已受到独立农民组织的威胁。但是，当地地主的反对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无益的，并且未能联合成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尽管他们获得了教会的支持，而联合果品公司（该公司因拥有大量未耕种土地而受到最大影响）的反对则最终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该公司拥有的65万英亩土地中的15%被确定应予没收，其补偿费的支付将与该公司于1950年申报的税收相连。据政府统计，该公司以每公顷2.99美元的价格可获得627527美元；而公司立即获得了华盛顿的支持，以每公顷75美元的价格反诉1580万美元。阿本斯拒绝支付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这一拒绝加剧了美国政府反对阿本斯政权的运动。现在，阿本斯政权只要有一次确凿的违背法律的行为，而不必以有问题的意识形态行为为基础，即可受到攻击。这样的政策极大地得益于联合果品公司利用许多美国新闻报导来为其目标服务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本身并非没有官方的支持，而且因麦卡锡时代的紧张政治气氛而进一步增强。在麦卡锡时代，反共逻辑是无所不在的。

到1953年年底，美国国务院组织一次针对阿本斯政府的外交攻势的努力已被直接进行颠覆的计划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干预所取代，尽管这种直接颠覆和干预自始至终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

联合国中仅次于狡猾的战术而获得了外交上的后盾。此外，“胜利行动”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偏离其目标，即把危地马拉人民和中美洲人民分别视为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拥护者和发起者；阿本斯政府虽然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显然控制了民族主权和体制，但它仍然被毫无保留地指责为莫斯科的马前卒和对西半球安全的威胁。阿本斯政府在中美洲没有盟友，甚至无法指望墨西哥、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会采取同情的中立。这一事实严酷地削弱了阿本斯政府的外交自卫，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进行实实在在的直接对抗被普遍认为是难以认真考虑的。就此而言，华盛顿铲除阿本斯的决定可以同 30 年后美国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运动相对比。①

尽管国际上出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但最后的干预仍然以几乎失败而告终。1954 年 6 月，一群暴乱分子在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的领导下和在中央情报局飞行员对首都进行空中轰炸的配合下，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危地马拉军队在此以前对阿本斯的政策虽有保留但仍然采取中立态度。一旦危地马拉军队停止抵抗，迫使总统下台并与美国特使约翰·普里福伊就继任的条件进行谈判，那么暴乱分子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就稳操胜券了。由于根本没有向民众发放武器，工会组织没有为抵抗进行有效的准备以及中产阶级中存在着广泛的幻灭感，一旦最高统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对干预的抵抗就注定要失败。此外，华盛顿在这一行动中的政治投资巨大，因此它不准备对结局进行长期谈判。仅在几周以后，被美国确定为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卡斯蒂略·阿马斯就上任了，并开始监督对此前 10 年中的改革进行全面摧毁。

---

① 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的《苦涩的水果：美国在危地马拉策划的政变内幕》(纽约，1982 年）和里查德·伊默曼的《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干预的外交政策》(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2 年）两书详细地阐述了 1954 年的干预及其背景。

在 1954 年反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尤其在农村，“秋后算帐”的证据俯拾即是；但与实际流血相比，监禁、流放、因政治原因而失业以及剥夺“革命”支持者的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权的事例却更多。这种暴力的严重性也许不能与 70 年代在危地马拉和其他拉美国家盛行的暴力相比。但是 1954 年的干预则开创了一个政治新时代。在这一时代，几乎每一次改革的努力都被统治阶级扼杀。这个统治阶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卫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地主和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政治本能就是经历长达 10 年的不断增强的激进主义以及最终依赖美国的干预来消灭这种激进主义；反共文化的种子早在古巴的例子影响到其他拉美地区以前就已播下。不仅文人精英坚决反对向社会下层作出让步，而且军队也明显地和看来不可避免地背离了它对社会变革的默认，并变得更加热衷于采取强制性控制这一手段。军队首先受到极大的创伤，尔后又被彻底清洗。不出 15 年时间，军队不仅重新获得了 1944 年以前时代的许多特征，而且还表明：它是中美洲地区较为有效和最为残酷的镇压工具之一。与此同时，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遭受了致命的失败，而且显然难以从这一失败中得到简单和迅速的复苏。1954 年的地区性和国际性力量对比使得上述事件的发展似乎既不使人非常惊奇，也确实不如后来所表明的那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两代危地马拉人将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成长，这种气氛无疑体现了独一无二的、有时是重要的特征变化，但永远受到“解放”与“反革命”的创伤的制约；这种创伤在长期的、主要是专制的政权统治下进一步加剧。

卡斯蒂略·阿马斯取缔了危地马拉总工会和全国农民联合会，取消了 1947 年劳工法中的大部分条款，撤消了对 553 个工会组织的承认，同时将所有被充公的土地退回给原来的主人，并将国营发电厂的控制权交与美国公司；当时建立这家国营发电厂的目的就是要与这家美国公司竞争。1954 年 10 月至 1957 年年底，华盛顿向危地马拉拨付了 1 亿美元的援助，而它向其他拉美国家

的赠款却不足 6000 万美元。在这一慷慨资助下，新总统争辩说举行大选将是一笔过于庞大的开支。然而，因为他是一个标榜为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同意对是否接受其任命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并获得了 95%的选票。他的实现社会和谐的“新生活”计划是极其含糊不清的，它掩盖了他的支持者们内部不断增加的分歧；他们是因为反对阿本斯、而不是同意一种革命后的积极纲领而统一联手的。但是，甚至他的首席顾问马里奥·桑多瓦尔·阿拉尔孔（他在此后 20 年内任极端主义者组织民族解放运动（MLN）的领导人）的类似法西斯主义的信念，也未能说服卡斯蒂略·阿马斯不要冒恢复强制劳动或正式取消扩大选举权的危险。一旦土改和劳工组织被镇压，那么上述措施在消除改革遗产方面就被合理地视为不必要了。但是，就这个政权而言，除了上述那些目标以外，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计划，从而激发了“解放主义者”阵营中愈益增强的不满；1957 年 10 月，卡斯蒂略·阿马斯在一次内讧中被杀。被美国标榜为模范政府的这一突然消亡，因已故总统的政党以舞弊手段来设法挫败传统保守派曼努埃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在大选中的挑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富恩特斯的救世党巧妙地提出了实现社会和政治和解的必要性，对美国影响的程度提出了质疑，并且在争取中产阶级的同时让乌维科时期的老人马重新上台。1957 年的选举舞弊预示着此后几年中这一手段的重演，但这一次却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对于解放主义者的野心仍然存有疑虑，因而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了干预，以确保次年举行一次新的、相对公平的大选；在这次选举中，伊迪戈拉斯成了一个清白的得胜者。

伊迪戈拉斯政府（1958—1963 年）遏制了民族解放运动中野心勃勃的强硬派的腾达，但它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一种组织混乱和落后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越来越被人指责为腐败，因此人们很快就发现伊迪戈拉斯政府不愿意、也无能力恢复政治生活的真正开放。伊迪戈拉斯曾是乌维科的公共工程部长；与卡斯蒂略

·阿马斯相比，他无疑具有更多的考迪罗色彩，并在最初获得了其前任对左派和工会的镇压所带来的好处。但在咖啡价格趋于下降以及古巴革命正在提供一个如5年前在危地马拉被扼杀的激进改良的例子时，无论是国有地产的拍卖还是对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再次提出强硬的领土要求，都不足以巩固政治秩序。由于缺乏任何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上的感染力，以及严重依赖于分配从大选获胜中得到的官职，以维系其支持者，这个政权在第二任期内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和不断增强的反对力量。1960年11月，一批年轻军官发动的一次军事暴动轻而易举地就被平息了下去。这些军官对官方的受贿程度感到沮丧，而且他们仍然受到阿本斯时期的影响。但是这次暴动的两个头目——马科·安东尼奥·容·索萨上尉和路易斯·图西奥斯·利马中尉——没有投降；到1962年，他们已开展了一场游击战运动，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军事技能被调整到了卡斯特罗的暴乱战略上。在东部省份萨卡帕和伊萨瓦尔的三个前线阵地上建立的起义军开展了一场游击战。这场战争后来在强度、战略和民众支持方面经历了重要的变化，但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始终是危地马拉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在伊迪戈拉斯时期，这一事态发展的政治和战略重要性仍然很小，但它使军队统治集团的态度变得强硬，因为当局尝试了它自己的选举舞弊——1961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除两个席位以外的所有席位——从而丧失了许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迫使总统依赖于军人内阁，以吓唬议会中的反对派和防止不断增多的政变威胁。

如果没有因建立中美洲共同市场而出现的增长，如果肯尼迪的争取进步联盟没有给现任当选政府以支持，那么这个混合政府或许在其任期届满之前就会垮台。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内，危地马拉经济最为强大。但是，随着1963年大选的临近，伊迪戈拉斯因搁置一项所得税提案而使政治紧张趋势严重，从而疏远了以善于抵制极小财政要求著称的资产阶级（危地马拉是采用这一税收的最后一个拉美国家，并在此后20年内保持西半球最低的税收水

平，尽管文人和军人政权都曾为了扩大国家的能力而多次试图提高直接税和间接税）。此外，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司法冲突后，总统似乎默认了仍在流放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的候选人资格。由于执政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似乎都没有决心获得大多数选票，由于一些新出现的中间派组织很快地团结在阿雷瓦洛的事业周围，这一行动在最高军事指挥部看来几乎就是类似于回复到改革的年代，这种可能性因起义军在农村扩大活动而变得更为危险。伊迪戈拉斯因此被国防部长恩里克·佩拉尔塔·阿苏迪亚上校所推翻，对此华盛顿没有表示出显而易见的反对；这一点表明：即使在肯尼迪领导下，美国政府的意见也是一成不变的。

佩拉尔塔·阿苏迪亚政权（1963—1966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伊迪戈拉斯组建军人内阁的必然结果。它象征着一个现已获得足够资金以及自信心不断增强的体制所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就是要在党派性太强和无能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和伊迪戈拉斯之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虽然佩拉尔塔及其同僚都认为只有军队才能调停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竞争以及维持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纪律。但是，佩拉尔塔等人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完全的军政府。相反，这些危地马拉官员在建立其模式时既参照了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又参照了萨尔瓦多官员成功的事业。萨尔瓦多的国民和解党（PCN）通过一种体制自1950年起实际上一直垄断着总统职位，这种体制容忍有限的反对派和非激进力量在国会中的参与，但严格控制的选举继续使执政党掌权。国民和解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萨尔瓦多军队在40年代后期善于把改革运动的一些色彩结合进自身的言词之中来先发制人地防止危地马拉式的真正改革运动。因此，这一战略的潜力仅局限于危地马拉本身，但是在创建民主制度党（PID）的过程中，佩拉尔塔不仅获得了桑多瓦尔在山那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默认，而且还取得了中间派革命党（PR）的默认。革命党成立于1958年，其缔造者马里奥·门德斯

·蒙特内格罗是人民解放阵线的前领导人和阿雷瓦洛的支持者。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DCG）和弗朗西斯科·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的民主革命团结党（URD），这些相对温和的力量未参与这一不稳定的协议，因而缺乏对它施加压力的影响。所以，他们与旨在保护 1965 年宪法中确立的新制度而设计的主要方法发生了冲突——这一根据规定：在大选前如不提交一份使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满意的至少 5 万名党员的名单，该党就不能参与大选。虽然操纵投票箱内容的传统方式从未被抛弃，但是这一预防措施使民主制度党以及最高指挥部获得了组织一批可接受的竞争者的法律程序。因此，在 1966 年的选举中，只有革命党被允许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以反对民主制度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有力的反共运动。革命党的获准参赛并非由于这个制度具有真正的宽容大度——危地马拉劳动党和几乎所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仍然被定为非法——而是较多地出于这样一种期望，即革命党将继续保持其与民主制度党的非正式联盟。但是，大选之前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神秘之死使他的兄弟胡利奥·塞萨尔上升到革命党的领导地位，并使中左派的各方力量在更为坚决的改革信念下紧密团结。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极端谨慎政策曾产生了几次内讧。确实，他的竞选运动的信念就是如此，以致起义军领导人也赞同其候选人资格，以期实现民主开放，尽管此前不久军队已逮捕并处决了 20 名工会活动分子以及与游击队结盟的劳动党中的斗士（包括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民主制度党对于反对派候选人背后迅速形成的这种共识感到意外，因此被迫承认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胜利。对于这一胜利，民主制度党似乎难以拒绝，否则将损害正在进行第一次尝试的有控制立宪政体的整个计划，但是革命党未能确保总的多数票，因此未来的总统必须得到由右派控制的即将卸任的立法机构的确认。经过一周的私下讨价还价和 10 多年时间内从未见过的公开相互威胁，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最终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军队对他的胜利的认可。但他

为此而同意付出高昂代价——完全不干预军队的事务和活动，从而实际上使他的计划仅仅成为善良的愿望，也使他的政府变成一个懦弱的机构。这个机构无法控制军队异常凶猛的反暴乱运动。

在革命党于1966年取得总统职位时，危地马拉东部的游击队运动已进行4年时间了，而且已达到了高潮。[①]虽然起义力量不大——从来没有超过300名战士，并且未能创造出其领导人所信奉的"中心"理论[②]所要求的那种拥有广泛基础的农民支持，但他们对军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威胁要发起地主阶级通常所惧怕的那种农村暴动。不过游击队没有集中在印第安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而且在政治战略上有着严重分歧；容·索萨的活动中心在伊萨瓦尔省，他倾向于听从托洛茨基分子的忠告，于1965年3月另立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MR—13），而图西奥斯则选择了一条与危地马拉劳动党结盟的更为正统的道路，维持起义军的本来面目。虽然起义军同意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候选人资格，但一旦新政府显然难以扼制卡洛斯·阿拉纳·奥索里奥上校从其设在萨卡帕的司令部向游击队发起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就拒绝了总统的大赦请求。阿拉纳的运动将进行大规模镇压的焦土政策与美国主持的"公民行动"计划结合起来，而有些社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军方的偏爱。通过这一结合，阿拉纳的运动在5年时间内导致约1万人丧生，而它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富有战斗性成员的密切合作以及村庄中"军事专员"制的建立，则为70年代的敢死队和80年代的公民巡逻兵奠定了基础。这种行动与在越南采用的许多方式有相似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战略一时把危地马拉视为具有同样严重性的一个例子。但是到1968年，游击队

① 关于60年代游击队运动的有价值的考察，见里查德·戈特：《拉丁美洲的农村游击队》（伦敦，1971年）。

② "中心"（foco）理论就是"游击中心理论"。——译者

的两翼被迫进行收缩，它们业已减少的武装力量试图寻求保护以及在首都开辟一个新的战略地盘，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心”理论的农村主义。“中心”理论早已在一次更具有失败性的努力中失去了它的主要倡导者切·格瓦拉。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农村试图利用城市先进分子来唤起农民的革命意识。图西奥斯早已死于1966年的一次车祸；容·索萨于1970年在边境地区被墨西哥军队击毙。刺杀和绑架这种新战略很快就被证明：它激发了更严重的镇压，而不是来自民众的政治上的支持。对于游击队本身和它的天然支持者来说，这一失败确实太惨重了。但它的教训没有被忽视。下一代暴乱者，尤其是穷人游击队，是依靠起义军中的几个主要幸存者以及这样一个信念组织起来的，这个信念就是：在开展战斗之前，使西部高原的印第安人社会参与长时期的政治教育运动，这是在危地马拉开展一场民众革命的唯一有效战略。

具有这一性质的事情在若干年内继续成为镇压及神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60年代后期的反暴乱运动使政治活动处于两极分化，而即便是谈判温和的改革也被立宪政体热情支持者以外的人们视为必然失败的冒险。甚至在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的任期届满以前，军队显然已不能再忍受除了最为正规地和有限地追求民主政治以外的任何行为。阿拉纳的镇压狂热和他的极富进攻性的政治观点，最终使他在尼加拉瓜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外交流放——在那里他受到了索摩查的热情庇护，但军队仍然加紧其控制，自由自在地宣布戒备状态；与此同时，其绥靖计划巩固了右翼的信心，并使总统调整1954年社会和经济遗产的努力化为乌有。政府提出的征收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建议被不费吹灰之力地摒弃，从而使经济的下降和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停滞更难出现复苏，而名为“以眼还眼帮”和“白手帮”的敢死队的出现则使中间派和左派加紧转入半地下状况。到1970年大选时，革命党已名誉扫地，而右派则迅速发展，以致于阿拉纳能从马那瓜回到危地马拉，并根据一个直言不讳的镇压性纲领来参与竞选：“如果说有必要使这个国

家变成一块墓地，以便使这个国家得到安宁，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①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66年大选中那种优柔寡断和灵活自如的程度荡然无存。新的保安组织的恐吓取代了不以成员花名册作为威胁那些已涣散的反对派力量的有效手段。阿拉纳在总人口中大约5%的选民支持下获得了胜利，在这次大选中，只有不足50%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他的胜利是此后一系列大选的第一次，在这些大选中，民众的不满伴随着得到当局认可和军队支持的候选人所取得的胜利。这种制度的功效不出10年就显而易见地开始减退了，但是在1970年，对于那些上校来说，缺少威望显然不如追求他们的目标重要。他们的目标就是不仅要消灭早已支离破碎的激进左派，而且还要杜绝对政权的任何反抗。这个政权已不再简单地捍卫1954年确立的社会秩序，而是要维护新一代商业农场主和企业家的利益。这一代人的出现是由于建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以及除咖啡和香蕉等主要出口产品以外的经济获得了发展。为了追求这一目标，阿拉纳在其任职的第一年就实施了戒备状态，在此期间共发生了700多起具有政治动机的刺杀事件，官方确定的和自愿的流放层出不穷；大学受到干扰，军队占据着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它所乐意培植的准军事组织在这一活动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军队中的许多人却不满该组织对暴力的自作主张的容忍，而且还蔑视桑多瓦尔的轻率政治信条。这个组织太爱寻根究底，它不能成为政府的有用工具。因此，在军官团利用民主制度党来巩固一个体制性政权时，民族解放运动被不断地降为一个小伙伴。1974年大选时，阿拉纳攻势的成功彻底表明：桑多瓦尔能获得前总参谋长谢尔·劳赫鲁德将军（挪威血统）的副总统职务。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危地马拉基督教民

---

① 《纽约时报》1971年5月8日，引自吉姆·汉迪：《魔鬼的礼物：危地马拉史》多伦多，1984年。

主党，其领导人试图推举一位保守军官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作为他们的候选人，以此来绕过官方对他们的竞选活动设置的障碍。革命党现在已精疲力尽，剩下的另一个具有一些影响力的改良主义组织即曼努埃尔·科洛姆·阿圭塔领导的革命统一阵线(FUR)，因当局拒绝承认其9万名支持者名单的有效性而被排除在外。如同1966年那样，反对派的逻辑落后于最有力的挑战者；里奥斯·蒙特在选举中的表现尤为出色。但是，尽管统治集团内部有着明显的分歧，尽管其主要对手在60年代的反暴乱行动中名声卓著，但这个体制在运转时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基督教民主党声称：为使劳赫鲁德取胜，18万张选票被涂改。该党对其获得的支持充满信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但是里奥斯·蒙特顺从了他的友情的压力，接受了在西班牙任外交职务的任命。作为回报，他承认了劳赫鲁德的胜利。

与劳赫鲁德升为总统一事同时发生的事件或许会促使这位新的现任总统相信建立一个变化更大的政权的必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阿拉纳表现出来的固执程度显然已没有必要。此外，劳赫鲁德很快就与其前任发生了冲突。他的前任的个人至上论有破坏体制性团结的危险，当时军队在经济中的参与不断升级，并对新总统指出的那种专家治国的方向作出了反应。因此，劳赫鲁德所允许的对政治气候的放松非常有限，同意一些工会组织公开露面，并把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政策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改良的有效建议。两年内，似乎军队可能会同意对极端的经济保守主义政策和政治独裁进行适度的限制；基督教民主党人对此的反应是进一步向政府靠拢，而普通组织则暂时开始了重组的进程。但在1976年2月，危地马拉遇到了一次大地震，破坏严重，数千人丧生。虽然行政上的混乱不如4年前尼加拉瓜遇到的那样巨大，但对全国重建委员会的控制权却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竞争，而且这次灾难的后果还使人们目睹了政治冲突的升级，因为军队及其右翼联盟试图控制救灾运动中独立政治活动和团体活

动的影响。敢死队的死灰复燃扼杀了政治制度中潜在的自由，并使每况愈下的经济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它助长了自1968年以来一直暂停活动的激进反对派的发展。[1]

就整个生产而言，1950—1980年期间危地马拉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增长。虽然人口增长率每年约为3.2%（从300万增加到730万），但国内生产总值也获得了同样快的增长（从7.671亿美元上升到30.67亿美元），甚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亦非例外（从293美元增长到575美元）。在农业部门，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出口业务得到发展；就耕种面积和产量而言，出口农产品的发展均快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粮食作物农业。如表4—1所示，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采取了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单产的形式，而在这一发展中首当其冲的常常是用于自给自足和在本地市场销售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粮食作物部门，因为在这30年时间内，整个农业领域获得的进展微乎其微。因此，虽然经济规模以及基础设施得到持续发展，但仍然非常有限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却显然以更慢的速度发展。其结果是，根据1970年的统计，总人口中最穷的50%只获得收入的13%（人均为73中美洲比索），而总人口中最富的5%却占收入的35%（人均为2023比索）。在农村，这一悬殊更大，它反映了土地占有制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土地分配导致的贫穷密切相关，因此不能不把它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在商业性农场的效率方面有着复杂和似乎有理的争论。根据1979年所作的农业统计，占地面积在7公顷以下的单位占所有农场数的87%，但在可耕地面积中的比重仅为16%。在这一范围的另一端，占地面积超过900公顷的482个庄园占农场数量的不足1%，在可耕地面积中的比重为22%。尤为重要的可能是，16.7万块土地（占农场总数的31%）的单位面积不足0.7公顷。

① 参见罗杰·普兰特：《危地马拉的非自然灾害》（伦敦，1978年）。

表 4--1　　危地马拉的农业部门，1950—1975 年

	年　份	面积（千公顷）	产量（千公吨）
咖啡	1950	162	57.6
	1977	270	147.0
香蕉	1950	17	185
	1974	59	450
棉花	1948—1952 平均数	5	2
	1979	120	146
蔗糖	1961—1965 平均数	32	1960
	1977	85	6800
牧牛	1947—1952 平均数		977（每千人）
	1974		1916（每千人）
玉米	1948—1952 平均数	538	437
	1978	522	760
豆类	1948—1952 平均数	63	30
	1978	135	80

资料来源：艾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中美洲工业化的开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工作报告第 141 号（华盛顿，1984 年）。

人口的增长和新兴农产品出口部门中临时工机会的大幅度减少——棉花和甘蔗在收割季节所需的劳动力都不如咖啡收割季节所需的劳动力那样多，此外，牧牛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很小——意味着尽管生产获得发展，但是整体上的土地与劳动力之比却下降，收入分配仍然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无地的程度也在上升。到 70 年代中期，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面临的历史性贫困显然没有减缓；对于数千农民来说，这种贫困愈益受到低地种植园的季节性劳动与仅足糊口的土地上的耕种这两极之间的传统交换的压力所

制约；那些自给自足的土地常受到牧场主和其他商业性农场主的侵占，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牧场主和商业性农场主合法或非法地扩大其地产。到70年代中期，除大米以外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比60年代少1/5，虽然70年代卡路里的平均摄人量保持不变（中美洲其他地区上升了4%），但蛋白质摄人量则减少了。

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中的农村人口在新兴城市工业部门中寻求解脱之路的前景是异常有限的，因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也是明显不平衡的。虽然1950—1978年期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1.1%上升到15.1%，总增加值从9800万美元提高到5.317亿美元，而且1970年的外国投资中有一半进入该部门，但工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以传统工业为主，并严重依赖于来自外国的投入物和投资。1960—1978年，不易保存的产品在产值中的比重从86%下降到70%，而资本货则从4.7%增长到不足9%。1975年，只有食品、烟草、纺织和木材工业所需的原料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本国的。生产的性质与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时相比仅有微乎其微的变化，工业劳动力总数为21.9万人，占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11.5%（1962年为12.85万人，占10%），他们仍然主要集中在作坊生产（工人数量为5人或不足5人的企业雇佣了68.4%的工人，1962年的这一数字为75.6%）。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扩大促使首都发展为全国城市的唯一城市中心——1980年，危地马拉城的人口为120万，第二大城市克萨尔特南戈为9.2万人——但它在80年代出现世界性衰退时却未能产生出任何重要的社会变革。这一世界性衰退打击了初级产品价格，终止了增长率并使其逆转，而且还促使负债额上升；在一个传统上始终奉行极为保守路线的经济中，负债额上升是少见的。在70年代末的经济下降出现之初，由增长不公平所导致的民众不满早已显露，并因衰退而严重激化。这一衰退对城市经济的打击尤甚，而且，如同在拉美的其他地区那样，这一衰退促使为数不少的劳动力在非

正规经济[1] 中寻求不牢靠的生存战略。虽然如危地马拉这样的落后国家早已培植了一个由小商小贩及独立的小规模劳务销售组成的部门，但这一非正规经济现在却获得了快速增长，使大多数人的条件更为恶化：44%的人口为文盲；43%的人口不足15岁而学龄儿童中只有18%能入学；平均寿命为56岁；官方估计的婴儿死亡率为79‰，但人们普遍认为应高得多，尤其在农村。由于政府预算对军事开支的拨款（1985年为22.4%）高于卫生（7.5%）和教育（13.3%）拨款的总数，上述指数就被普遍认为不仅源自危地马拉经济的落后性以及危地马拉经济在不断缩小的世界市场中的无力地位，而且还源自国家的社会政策，即这个国家反对财富的再分配，并本能地倾向于用武力来维系现状，这种看法是不足为怪的。

1977—1983年的特点是公开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政府和军队愈加被迫在农村广大地区、有时在首都维持其控制权。据估计，自1954年以来，因政治原因而被杀的约有1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在1977—1983年期间丧生的。在城市，尤其在危地马拉城，大部分暴力行为应归咎于匿名敢死队的所作所为，其行动是针对个人或由反对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小团体，但是这一影响的受害者首推西部高原上的土著人。这一运动——它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是无与伦比的——体现了拉迪诺人对待印第安人的那种传统的偏见；这些印第安人独特的服饰、语言和土生土长的传统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普遍地看成是原始的，而且阻碍了物质进步和不利于共和国及西班牙文化的巩固。虽然1944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拉迪诺化，但是这个国家的

---

① “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或“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是相对于“正规经济”（formal economy）或“正规部门”（formal sector）而言的，主要包括由城市失业工人和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所从事的第三产业。

40%的人口仍然将5种主要印第安语言(这些语言共有20多种独特的方言)中的一种作为其母语，他们与由16个主要民族集团组成的社会的关系比其与危地马拉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① 自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印第安农民在季节性劳工中占有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高原地区8个省份的人口中所占的多数比重，都要求国家领导人商谈和实施一种种族隔离形式，这种形式对印第安人来说有一些有限的好处，因为它容忍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尽管这种自主性长期受到压力。但是，自50年代起，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不仅对种植本地农作物的村社土地、而且对与小块土地密不可分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70年代，这一经济增长的模式明显地加剧了这种压力，对土著人世界提出了挑战，也使小农和印第安人作出了本质上的反应。这一运动在正式的和"全国性"的政治水平上是见不到的，或许在一定意义上可与早期的独立时期相比，因为它力图捍卫一种独特的经济范围和文化；然而同时它又是一个现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吸收了工团主义的组织形式，并采纳一些生疏的政治论述，如激进的基督教教义和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概念。

土著人面临的最容易感觉到的威胁是劳赫鲁德政权于1976年建立的"横贯北部地带"(FTN)。这一项目等于宣布在邻近与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印第安人居住点最多的区域以及在加勒比海岸的伊萨瓦尔省建立一个"开发区"。确立"横贯北部地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农业企业以及人们怀有很大期望的石油业和镍矿开采业的需要。这一地带为参与联合开发一个新的边远地区的资

---

① 关于危地马拉民族性的社会特征和政治动力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在双方引用的参考资料方面有时又是含糊不清的。塞韦罗·马丁内斯·佩莱斯的《克里奥尔人的国度》(危地马拉，1973年)一书的内容仍然是争论最大的。对于其他观点，可参见卡洛斯·古斯曼和琼—洛普·赫伯特的《对危地马拉历史—社会的阐述》(墨西哥城，1970年)一书和卡罗尔·史密斯的《革命前危地马拉的印第安阶级和阶级意识》，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计划的工作报告第162号(华盛顿，1984年)。伊丽莎白·布尔戈斯·德布雷编著的《我……里戈韦托·门丘》(伦敦，1983年)。

本提供了慷慨的刺激，而这一边远地区由来已久的农民经济利益却获得最少的保护。这一项目在吸引本国和外国企业方面的成功使土地价格不断上升，还使那些合法的和先下手为强的现有土地占有制模式出现了混乱，从而加剧了地震造成的创伤。“横贯北部地带”代表了在自给自足农业的内地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凡努力。但它不是中断农业经济中的既成发展趋势，而是加快这种趋势。

地震后，反对派获得的初步进展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但是1976年全国工会团结委员会（CNUS）的成立和全国工人联合会（CNT）的发展——这两个组织使参加工会的工人数量在工人总数中的比重从1975年的1.6%提高到1978年的10%——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此外，信心和战斗性的恢复常常发生在有组织的——更不必说得到官方承认的——组织范围之外；1977年11月伊斯塔瓦坎矿工向首都进行抗议进军，这一抗议与甘蔗工人的抗议一起，激发民众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发同情心。这些例子还鼓励8.5万公共部门的工人于1978年2月举行了一次为期9天的罢工，其中许多人来自中产阶级。这次罢工是1954年以来唯一最大的一次劳工行动。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中，工会力量都得到加强，虽然它们仍然非常容易受到民众情绪变化的影响，而且还仍然依赖于普通战斗人员的决心。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危地马拉城的可口可乐厂工人为获得官方承认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运动在5年多时间内有12人丧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当时卡特政府正在坚持要求其盟友尊重人权。美国政策的变化影响危地马拉军队的方式大体上类似于影响其他中美洲军队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军队的方式。但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政权被迫对其镇压性倾向作出或多或少的调整，而危地马拉政权却拒绝进行调整，因而受到了武器禁运。由于实施了较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依靠南美洲南端国家和以色列提供后勤援助，军队能在没有遇到重大困难的条件下稳操1978年大选的控制权。罗米

欧·卢卡斯·加西亚将军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在这次大选中，69%的注册选民弃权，20%的选票被毁坏。科洛姆·阿圭塔的革命统一阵线及其由阿尔韦托·富恩特斯·莫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盟友被禁止参加竞选，基督教民主党只能在放弃其纲领中的部分主张以后才获得许可，这些主张是里奥斯·蒙特于1974年竞选时运用的。卢卡斯已放弃名声不佳的民族解放运动，并选中受人尊敬的比利亚格兰·克拉梅尔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从而使这张正式候选人名单增添了一点光彩。但是这一行动既不能说明美国政府改变其强硬立场，也确实未产生出除了孤立和愚弄比利亚格兰以外的任何结果。比利亚格兰最终被迫放弃他为实现社会共识而进行的单枪匹马的竞选，并寻求在华盛顿避难。

1978年5月，来自上韦拉帕斯省潘索斯镇的约100名凯克奇族印第安农民在该镇的广场上讨论如何保卫其受到牧场主威胁的土地时被军队枪杀。根据“横贯北部地带”计划，牧场主获得或声称拥有属于那些农民所有土地的租让权。这一枪杀事件再次有力地证明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人们普遍地和合理地将潘索斯屠杀看成是开创了农村对抗的新阶段。这一对抗产生了农民联合委员会（CUC），也使农村的许多居民滋长了支持左派武装组织的倾向。但是，公共秩序的大规模崩溃则出现在危地马拉城。1978年10月爆发了广泛的骚乱，反对公共汽车票涨价。在此之前，即在1978年年初，人们为抗议潘索斯屠杀和刺杀全国工会团结委员会领导人马里奥·洛佩斯·拉腊韦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车票涨价这一问题上对公众情绪深感诧异的当局严重地错估了涨价对业已很糟的交通体系的影响，生活在城郊的工人严重依赖于这一交通体系。保安力量在控制愤怒的街头人群时远不如消灭单个反对派那样得心应手。虽然它能重新恢复秩序，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一点表明：沉闷已久的城市或许能再次成为爆发难以预料的不满的场所。

2月的公共部门罢工和10月的骚乱都具有工会组织缺乏控

制能力和决策能力这一特点，因为工会本身对引导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感到束手无策。但1978年的事件促进了组织上的巩固，并强调了在反对派之间达成一个广泛纲领的必要性。1979年和曾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一些措施，中间派政党和一些主要工会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镇压民主阵线（FDCR）。该组织尽管将其要求限制在尊重基本民权方面，但它仍然构成了足够的威胁，从而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富恩特斯·莫尔被匿名的枪击手所杀害，不到8周，革命统一阵线的科洛姆·阿圭塔又被害。军人集团把这两个人看成是1982年大选的潜在胜利者。在由国家组织暗杀行动方面，危地马拉闻名遐迩。上述两次暗杀仅仅是这种暗杀行为中的组成部分而已，但同时也表明：当局能随时随地杀害公众喜欢的著名人物、温和性改革的倡导者和传统的左派目标。根据基督教民主党的年轻领导人比尼西奥·塞雷索说，在1980—1981年的10个月时间内，他的党内有120个党员被杀害，当时基督教民主党为争得民众的支持而与激进派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危地马拉这样的政治文化中，为了认清政府政策的变化，有必要确定死者的党派隶属关系这一可怕的任务。

虽然镇压的升级进一步疏远了卢卡斯、加西亚政府与华盛顿的关系，但这一升级是有原由的。1979年7月，尼加拉瓜的索摩查被推翻；10月，萨尔瓦多军队中的一些改良主义分子发动政变，推翻了国民和解党政权，他们中一些人费尽心机想与战斗性不断强化的民众运动寻求缓和；人们极为严肃地看到了整个中美洲既成秩序行将崩溃的前景。这种危险的真实性不亚于人们所想象的；危地马拉军人统治集团对这种危险的反应并非绝对的僵硬，这一点可在军队决定满足1980年春棉花及甘蔗收割工人在一次史无前例的罢工中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这一事实中看出。这次罢工受到城市工会组织和农民联合委员会的支持。这次罢工的规模和它对大部分现代农业企业部门构成的有组织的威胁，迫使当局对农场工人实施一个工资协定，但与政府在车票涨价问题上的让步相比，

这一工资协定后来却因违约而不了了之，而且并不表明在高原地区进行的反暴乱运动有所松弛。这一战术被证明是非常灵验的；它通过阴谋诡计获得了好处，并使这个政权不佳的国际形象避免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但这一切因1980年1月发生的广为报道的警察攻击西班牙使馆事件而荡然无存。20个印第安人用和平方式占据了西班牙使馆，试图请求富有同情心的马德里使者为军队占领他们的村庄一事进行调停。所有示威者都被枪杀，包括个别安全撤出使馆的示威者，后来也从医院的病床上拉出来予以枪决，大使本人也九死一生。这一切再次在国际上引发了人们对这种镇压方式的忧虑，这种镇压方式早已令人生厌地为国际舆论所熟知。因此，尽管当局乐观地期待着里根政府会重新发展与其全面的和友好的关系，但最后证明：新上台的里根政府难以超越国会对危地马拉军队的极度蔑视，从而使美国对打击左派运动的支持依赖于深刻的政治性整顿，这一整顿的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上校们和里根本人的想象。

这样一种战略虽在1981年年底已显而易见，但它的实施仍被推迟了几年，这是因为军队有能力抵制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游击队提出的挑战显然是严重的。70年代初期成立的组织，如人民游击队（EGP）和武装人民组织（ORPA），利用由经济压力以及军队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同情心，成功地在高原地带扩大活动。到1980年，人民游击队已控制了基切和韦韦特南戈的大片地区，而武装人民组织的战士则在圣马科斯省、索洛拉省和奇马尔特南戈省泰然自若地活动。与此同时，小得多的重新活跃起来的起义军（FAR）也出没在偏远的和人烟稀少的佩腾地区，对国家和经济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虽然很小，但牵制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武装斗争的战略还使更为弱小的劳动党中的一派获得追随者，虽然这一派未能开展有力的城市活动。这样一种支持的模式反映正统的左派在运动中的影响力是相对次要的，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村中天主教司铎对教义及布道的

态度发生了变化。许多司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将天主教行动会的传统主义结构变为更加广泛和在政治上独立的世俗组织体制。虽然危地马拉的教会集团显然比萨尔瓦多（1979 年以前）和尼加拉瓜的教会集团更加反动，但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态发展。在危地马拉，阻遏合作社的产生、控制教义问答手册的传播和制止人们对福音作出新奇的阐述被证明是困难的。危地马拉以民众的虔诚而闻名，但是天主教在许多年间一直面临着来自福音派新教的竞争，而且在当地出生的司铎很少。然而，军方在传统上对固有教会中的习俗与等级制度的依属却未能阻止它打击那些被认为是在传道运动中起破坏作用（往往确有根据）的教士及其已改宗叛教的助手。对教士的迫害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基切的大主教命令所有宗教人员撤离他的教区，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并抗议这种反教士运动。由于激进的司铎以及许多曾追随他们从传统尊重的立场转变为政治承诺的立场的人们都被当作国家的敌人，与游击队合作遂成为一种更能迫使人们接受的选择，因为游击队通常来自当地社会，并信奉公认的理想追求。越南战争后，军队有力地将一些区域称为“自由交火区”。在这些区域内，教士与游击队的这种合作几乎就是一种生存战略。到 1981 年，这一模式得到了足够的普及，从而使人们对军队在西部高原的控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在西部高原，造反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其规模之大否定了把他们指责为脱离当地群众的孤立无援的共产党鼓动分子。危地马拉武装力量的处境如同 1979 年初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以及同一时期的萨尔瓦多军队一样恶劣。

军队面临的严重不利境况在军队内部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阶级内部都产生了不安。1981 年，卫戍部队的军官对缺少一种前后一致的战略及条件的艰苦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被迫开展一个紧急运动，而高级军官则似乎正在从管理国家、尤其从“横贯北部地带”中捞取私利。任命总统的

兄弟、在法国受过训练和具有一定能力的贝内迪克托·卢卡斯·加西亚将军来主管军事行动，或多或少地平息了军队的不满。但当局未能表现出足够的醒悟，从而使它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1982年的大选，并在不考虑年轻军官要求的情况下推举国防部长阿尼瓦尔·格瓦拉将军为正式接班人。那些年轻军官试图在政治决策中获得更多的体制性参与。这又鼓励了被遗弃的民族解放运动，它在生命的晚期开始大声疾呼地反对舞弊，而游击队则要求抵制这次大选，并威胁要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进行破坏。结果，袭击平民聚居的地方遇到一些战术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意味着游击队的破坏不会大大超过大众弃权的传统行动，但是格瓦拉可预料的胜利激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他一些右派小党的上层阶级追随者进行抗议示威；非常不同往常的是，这次抗议示威在警察手中遇到了不太仁慈的对待。这个军政权因业务上的低效率、政治上的不诚实和经济上的腐败而失去了右翼和绝大多数军官的支持。军政权的这一异常境况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大选后数日，中级军官发动的一次不流血政变推翻了卢卡斯·加西亚和格瓦拉。他们由一个执政委员会取代，这个委员会中的知名人士和最终的领导人就是里奥斯·蒙特将军。他在退休后复出，成为这个运动的挂名首脑；他是一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但不是阴谋小集团的成员。

执政委员会的政治特征在最初是模糊不清的。但在此后的内部争斗中，民族解放运动及其盟友丧失了影响力，早已成为“再生基督徒”，而要探究太平盛世的里奥斯·蒙特则献身于一种自行其是的政府形式，这个政府极为重视反暴乱运动，但也以新的税收方案和实现波拿巴政权的前景来折磨上层阶级；这种波拿巴政权将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恢复国家更高程度的自主权。这一计划的民众主义潜力从未成为现实，其部分原因是里奥斯·蒙特不愿意公开放弃他作为一个严守纪律的军官所具有的职业癖性或使命，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被迫以打败游击队作为其主要目标。虽然彻底消灭高原上的武装组织这一目标未能实现——现在这些组

织已在书面上而非实际上联合成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URNG），但是全面的焦土运动确实成功地给予造反军以沉重的打击，因为造反军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这一焦土运动使人想起在阿尔及利亚和马来西亚甚至在越南所采取的那种战术。这一运动的政策是以少量经济援助重新安置友善的村庄，对于那些寻求造反军保护的村庄则被一概当作敌人对待，因此这一运动被叫作"步枪和豆子"。它表明游击队无法提供这种保护或难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对大面积的控制。到1983年年中，由于许多村庄被毁并建起了一些配有防御工事的村庄，还由于强制性地将数万名身强力壮的男人组织成拙劣的或手无寸铁的"村民巡逻队"，政府显而易见成功地利用了游击队不是失去民众同情就是丧失民众信心这一点，削弱了游击队的造反力量。此后，这一农村控制系统被进一步扩大，并被军队当作农村发展的一个完整战略，虽然这一战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为了阻止许多村社获取其传统的土地和不让它们保留与其有关的传统。[1] 到1985年，造反力量开始重新改组，并在较为温和的程度上恢复活动；但是，它们遭受的突发性挫折与它们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同志在进行成功的暴动和持久地抵抗政府武装力量方面的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在中美洲地区出现一次激进的地区性暴动的前景，数年前，这一地区性暴动似乎近在眼前，但现在却因华盛顿随时随地会对中美洲进行军事干预而面临严酷的威胁。

平息国内暴乱的必要条件不仅促使里奥斯·蒙特、而且还促使其后几任总统实施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这种对外政策对友善的里根的顺从程度不比对卡特的顺从程度高。危地马拉军人对与华盛顿保持距离早已习惯，因而始终不热情支持美国的这一计划，美国的计划是想重新建立中美洲防务委员会（CONDECA），从而使

---

① 克里斯廷·克鲁格：《危地马拉高原上的安全和发展条件》，华盛顿拉美研究处（华盛顿，1985年）。

反共斗争具有真正的区域性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军官一样，反动的危地马拉军官不准备牺牲自身并不稳定的好处来换取他们往往认为成问题的后勤及政治方面的成就。虽然他们对桑地诺分子表现出粗俗的蔑视，但是一旦知道尼加拉瓜新政府和古巴都没有向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以后，就准备对尼加拉瓜新政府采取一种实用的对策。然而，统治阶级的政治传统和军队的经历都愿意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因此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认识中美洲地区的战略地位方面不能允许分歧存在，否则会损害意识形态上的共鸣以及不利于解决愈加严重的经济困难。里奥斯·蒙特上台不到一年就表明：他没有能力通过谈判来实现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是因为他的不可捉摸的行为已削弱了来自包括资产阶级以及最高指挥部的支持。他最终于1983年8月被温贝托·梅希亚·维克托雷斯将军赶下台，这是在普遍预料之中的，并与统治集团内信心的恢复密切相关。这个统治集团曾因与1982年大选有关的事件而陷于混乱。梅希亚在恢复军政府既成模式时与企业部门进行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并且不发表华丽的声明。但他上台后小心谨慎地避免了出现在卢卡斯·加西亚时期的过度的党派偏见，而且还作出了严格的保证，即应该以一种有纪律的方式来顺应华盛顿的还政于民的愿望，使军队保留行动的独立性，同时阻止左派力量参与开放。最高指挥部虽然对不良的政党政治活动进一步扩大化感到有点困惑，尤其对突然发生在首都的一次街头抗议深表关注（这次抗议是由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引起的，其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格查尔与美元之间长达60年的等价终于崩溃），但是他仍然严守誓约，监督了1984年立宪会议的选举以及1986年的另一次总统选举和新一届国会的选举。在1986年的这一次更为重要的选举中，比尼西奥·塞雷索和基督教民主党在第二轮中获得了漂亮的胜利；基督教民主党终于在30年后获取了总统职位。该党在第一轮中利用了极右派推举许多候选人一事，在第二轮中代表了不满于现状的人们的明显选择。在保

留自身政治传统并对占优势的力量对比作出完全注重实效的评估时，这个党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对军队违反人权的问题进行司法调查——尽管对一部分警察采取过一些有限的行动——并试图利用那些对国际条件有先见之明的军官的支持来获得持强烈怀疑态度的大多数军官在工作中保持中立。与此同时，塞雷索还故意避免提起土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比任何一个其他问题更具有损害脆弱协议的危险，这个协议已允许他就任总统。[①]新政府得益于民众在选举上给予的明显支持，民众显然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解政策和终止暴力才投赞成票的；新政府还得到急于在中美洲地区维持文人政权的华盛顿保守政府的支持，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谨慎。由于上述原因，新政府提供了结束长期反革命控制的前景。但这一形势与1966年门德斯·蒙特内格罗获胜时的形势无多大差别，因此许多评论家对新政府获得成功的机遇持保留态度。新政府既没有控制军队的活动，又没有为农民和城市穷人提出一个实质性的经济改善计划。这就表明：民众组织和激进要求会重新出现，这是不能被忽视的，这从1985年秋天在危地马拉城爆发的抗议中以及在塞雷索就职数周后的农村中都能看到。如果说1954年以来的政治模式确实有了重要调整，那么能否仅仅通过采纳正规的民主程序就能长期控制危地马拉社会中潜在的紧张将永远是一个疑问。

① 詹姆斯·佩因特的《危地马拉：虚假的希望和虚假的自由》（伦敦，1987年）对1985年大选的背景和塞雷索总统任期的第一阶段进行了简练和评论性的分析。

第5章

1930年以来的萨尔瓦多

20世纪的最初30年中，萨尔瓦多经济在中美洲增长最快。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萨尔瓦多没有香蕉飞地，但是它的咖啡经济非常发达，致使这个国家获得了“中美洲的鲁尔区”这一名声。咖啡部门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一代地主的能力。1871年自由派革命之后，他们在萨尔瓦多中部地区利用了村社土地的大规模转移。这些土地的海拔高度和肥沃程度尤其适合于咖啡这种作物的生长；而且萨尔瓦多又是中美洲最小的国家（约2.104万平方公里），但人口众多——即使在1930年，就已接近150万——人口密度非常大，农民迁徙的机会相应地较少。因此，大量农村居民的人身迁移远不如他们的地位降格；他们的地位从自由的小地产主或村社成员沦为农忙季节的雇工或者在新咖啡庄园边缘土地上支付劳役的佃农。因此，萨尔瓦多的农产品出口部门在中美洲地峡是独具一格的：它能非常容易地获得当地劳动力。而且，公共土地的快速和全面地转移——19世纪自由主义攻击的另一个传统目标教会所拥有的农村产业很少——促进了商业性庄园的早期集中，并加快了土地寡头的形成，这是世界上最坚实和自信的土地寡头之一。[①] 萨尔瓦多的土地寡头常被称作“14个家

---

① 为了讨论这一进程，可参见戴维·布朗宁：《萨尔瓦多：地形与社会》（牛津，1971年）和拉斐尔·门希瓦尔：《萨尔瓦多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圣何塞，1980年）。

族”，虽然1930年共有65家大型商业性企业和约350个拥有100多公顷土地的庄园，这一规模以萨尔瓦多的标准来衡量是巨大的。40年以后，当时土改在其他地区早已不是“颠覆性的”，而且被包罗进最温和的政治纲领之中；而萨尔瓦多的土地分配在拉丁美洲仍然是最不公平的，寡头的经济权力仍然达到高度集中的程度：25家公司占咖啡出口的84%，49个家族至少各拥有一个面积超过1000多公顷土地的农场。①

萨尔瓦多演变为一个寡头国家以及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农产品出口经济，其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它既取决于阶级和民族冲突，又取决于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闻名遐迩的企业家的热情和政治自信心。确实，正是在萨尔瓦多，中美洲独立后自由主义第一次受到印第安人抵抗的挑战；1833年，阿纳斯塔西奥·阿基诺领导的民众起义迫使外省的军队前来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直到秩序被恢复和拉迪诺人国家得到稳定。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公共土地的剥夺诱发了一系列地方性暴动，其暴力余波比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同类暴动还要严重。这一冲突加快了一支强有力军队的形成；这支军队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长期与萨尔瓦多关系紧张的危地马拉，并支持地区性的自由主义计划，因为萨尔瓦多一直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大本营。对军队的内外依赖性曾一度维系了以政变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但是，如果说萨尔瓦多的地主在制服暴发的军官以及靠显贵文人来组建政府方面落后于哥斯达黎加的地主的话，那么，落后得还不算很远。在自由后国家通过强制方式确定后的10年，它获得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机器；到19世纪

① 寡头的特征和发展有待加以彻底分析。但是，许多有用的信息可在下述著作中找到——罗伯特·奥贝：《萨尔瓦多企业家的形成》，载《企业史探索》，第6卷第2辑（1968—1969年）；埃弗里特·威尔逊：《1919—1935年萨尔瓦多国家一体化的危机》，未出版的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70年；爱德华多·科林德雷斯：《萨尔瓦多的土地占有制》，载《中美洲研究》第31期（1976年）；曼努埃尔·塞维利亚：《萨尔瓦多的经济集中与权力集团》，《劳工杂志》第3期，调查与社会行动中心（墨西哥城，1984年）。

末、20世纪初，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军事干预和由军事干预引起的不稳定性。梅伦德斯和基尼奥内斯家族对官职的垄断充分反映了地主资本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自信；这两个家族通过正式的选举和类似哥斯达黎加“奥林匹亚人”的方式，悄悄地轮流占据着总统职位。

这个政权是如此稳固，以致于在墨西哥革命以后它对于墨西哥革命表现出一种明显地泰然自若的态度，寡头势力准备至少在城镇中批准一定数量的民众组织，尽管其带有严密控制的性质。在20世纪20年代，手工业行会被允许进行活动，并颁布了管理城市工人境遇的法令，自由派制度改良主义的反对派被允许竞争政府职务。但是，当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突然结束时，萨尔瓦多的寡头政权显得并不是能转化为“传统力量”的一种稳定而有机的社会控制工具，而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经济罕见发展基础上的非常脆弱的结构，它无法承受农业经济的停滞。

萨尔瓦多农业体制的独特性，例如与哥斯达黎加相比，是缺少一个充满活力的中等规模的农场主阶级和为数众多的缺少土地的季节工阶层。农场主的统治不是以他们对国内咖啡市场的间接控制为基础的，而是以他们对土地和生产的直接控制为基础的。萨尔瓦多的劳工控制很少依靠将大量印第安人临时工从分散的农民居住地和自给自足农业中转移到种植园，而是更多地依靠监督生活在庄园内或庄园附近的季节工或长年工。在这一方面，萨尔瓦多的制度也不同于危地马拉。一方面，可称作“中农”的这些人的弱点使地主的统治主要不是由于通过谈判取得的霸权，而更多地来自直接的、有力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印第安人问题”相对来说不太重要——到1930年，萨尔瓦多的土著人文化仅限于伊萨尔科和圣地亚哥--诺努阿尔科区域——而且为确保劳动力供应而采取广泛强制性机制的必要性不大。这一切都减弱了国家向集权化和专制主义发展的趋势。在第一阶段政权转移的冲突被平息以后，军队在维持秩序方面的作用愈来愈被准军事力量——尤其是

1912年建立的国民警卫队——所取代。这种准军事力量常常驻扎在大农场附近，而且与正规军队相比更能直接地对某一个地主的要求作出响应。

农村权力结构的特点是既不灵活，又不慈善，除了某个有谨慎先见的大地主才会略施小惠的可能外。萨尔瓦多庄园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中美洲地区最差，这促进了出口经济的较高效率。但是，维系国家一级一贯的政治控制体制，不仅依赖于非常弱小的资本家阶级内部稳定的竞争条件，而且还依赖于把社会矛盾限制在庄园所在地。到1930年，第二个条件显而易见已不复存在，因为即使以中美洲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农民的处境也特别艰苦，他们已开始流露出广泛的不满。已经失去势头的自由党秩序陷入了危机之中，因此在1931年后期，地主阶级退出了政府，接受了由军队直接控制国家的要求。与此同时，咖啡经济结构确保了寡头势力继续作为令人生畏的统治阶级行使其社会权力，包括否决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政权在1932—1982年期间除了一个短时期以外始终由军队控制。在中美洲地峡，没有一个国家像萨尔瓦多那样出现了如此显而易见和有计划的权力分割，或者如此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政治模式。其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明显）是：当土地资产阶级在政权方面对军队的让步已不能保证军队继续支持其经济利益而发生社会危机时，统治集团内部就出现明显的冲突。

这次权力的单一分割可能起源于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的动乱岁月。当时，主张改革的自由党政府无法压制由世界性危机中的经济崩溃所导致的民众不满，从而爆发了军事政变，并于1932年1月引起圣萨尔瓦多和该国西部地区的骚乱。对这些反叛的镇压极其残酷，这一后来被称作“大屠杀”的事件被描述为1979年7月尼加拉瓜的索摩查被推翻以前中美洲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次镇压使农民和寡头势力都受到严重创伤，从而为统治时间长达50年的政权奠定了基础。尽管在此期间有过几次

长时间的安定，但这个政权的基本势力只在于人们对1932年暴力事件的记忆犹新，闻之丧胆以及担心此类事件重演。当20世纪80年代的内战使这种担心成为现实时，1932年的痕迹仍然清楚地反映在当初爆发过暴动的那些地区的基层武装冲突中，也反映在地主们对于接受一个立志进行改革并受到华盛顿有力支持的文人政权而不是接受一个主张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和露骨的保守主义的势力上，态度极其犹豫。

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1930年萨尔瓦多经济更为单一地依赖于咖啡。20年代期间，高价格已经使农业领域扩展到极限——1960年咖啡用地的90%在1930年也是种植咖啡——并集中于这种单一作物，而且人们认为集中于这种单一作物比种植甘蔗、黑纳金和棉花的风险更大。因此，世界大萧条导致的咖啡价格下跌（从1925年的每磅25美分跌到1935年的9美分）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带来了比中美洲其他地区更广泛和更直接的政治性社会冲突。1932年的出口收入不足1926年的一半，1930—1934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7%；到1939年，在几年缓慢复苏以后，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1929年。虽然有证据说明商业性咖啡农场主不愿意收摘1930年的咖啡，但是对这一危机最合理的反应是尽力扩大出口量，同时削减因生产扩大而需要更多收割工的工资支出。这样，尽管解雇了许多长期工，扩大了种植园土地，收回了债务和提高了租赁条件，而农村中民众动乱的主要经济根源似乎仍然是工资的急剧下降，在两年时间内从每天75分下降到15分。这一大幅度的下降于1931年诱发了一系列农民罢工，明显地加剧了政治紧张，并使农民更加支持萨尔瓦多工人区域联合会(ERTS)。该联合会成立于1924年，但是自1930年起，在新成立的萨尔瓦多共产党(PCS)的领导下，活动日益活跃。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鼓动者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可是共产党本身的得人心程度远不如最近成立的工党(PL)。工党创始人阿图罗·阿劳霍是统治阶级中一个我行我素的人物。他采取了一种虽含糊笼统、却

坚定有力的改良主义政策，因而使他在 1931 年赢得总统职位，尽管寡头势力对这次公开投票的结果表现出极大的疑虑。20 年代期间萨尔瓦多的工会组织比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这就迫使自由党政府开展一些先发制人的平民主义活动；但是阿劳霍在经济领域将这一趋势推到极限，从而排除了满足民众期望和保卫地主利益的可能性。因此，虽然总统拥有一大批追随者，但他的政府在面对罢工和示威时很快失去了方向和权威，同时军队开始表现出少见的不安定迹象，寡头势力则因未能取得货币贬值而发怒。当 1931 年 12 月军队主要是由于数月未获工资而终于倒戈时，无人感到意外。只是阿劳霍的忠臣们才感到彻底灰心，因为即使是始终反对政府的共产党也不认为这次政变预示整个政治体制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观点很快被证明是严重错误的，因为新的国家元首、阿劳霍的国防部长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投票名单已经公布和竞选活动早已开始后，收回了他关于 1932 年 1 月举行大选的诺言。关于马丁内斯这一计谋的时间安排，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这样做能使军队发现谁是工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对他们实施镇压之前将其亮相。无论如何，取消投票促使共产党内部主张暴动的人占上风，他们匆忙进行曾经多次被推迟的造反准备。取消投票还促使阿瓦查潘和伊萨尔科地区周围的农民领袖决心发动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与共产党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根本上是一次独立的运动，以争取眼前的经济改善和更长远的保卫严阵以待的村社文化。[1]

1932 年 1 月 22 日的城市暴动在几小时内即被镇压，因为这次暴动的准备消息早就传到了高层领导那里；激进的士兵进行的几次分散的兵变早已被平息，而且包括法拉本多·马蒂在内的几

---

① 下述著作比较详细地讨论了 1931－1932 年的事件：托马斯·P·安德森：《大屠杀：1932 年萨尔瓦多共产党的暴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1971 年）；拉斐尔·吉多斯·贝哈尔：《萨尔瓦多军国主义的兴起》（圣何塞，1982 年）；罗克·多尔顿：《米格尔·马莫尔》（纽约，1987 年）。

个重要的共产党人也在几天前已被拘留。在圣萨尔瓦多，平暴之后的迫害运动扩及阿劳霍的支持者和常常与暴动毫无关系的手工业行会的成员。由于采取了对知名反对派人士即刻处决的政策以及大量监禁嫌疑犯，激进运动被有效地平息——法拉本多·马蒂经军事法庭的短暂审讯后被处决。这一切还有力地为此后的10多年清除了独立民众组织的残余，并又在此后的20年内抑制了这些组织的发展。在这个国家的西部（东部没有战事），由印第安人酋长领导的农民起义设法获得了稍长时间的生存，即控制了一些小规模的居民区达48小时之久。但是，这种农民起义缺乏战略抱负的指导，而且是传统的农民暴动的方式，也没有农民起义常有的“布尔什维克”特点，明显地不愿损害宗教财产，而且主要关心的一般是在一窝蜂无组织地、狂欢节般地谴责咖啡种植园主声中把政府和地主阶级的个人代表绳之以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起义力量缺少武器，他们的暴力程度并不严重，死在他们手中的人数不足50人。

对经济崩溃和取消选举的后果感到担忧，促使美国和英国政府向萨尔瓦多水域派遣战舰。一些加拿大海军陆战队也一度登陆。但马丁内斯坚决表示军队和民兵治安队在两天内就控制了暴动，因此上述的外部武力很快就被要求撤退。就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造反是一次软弱无力的表现，因为造反者在起义的第二天就败阵了，而且当军队和地主组织的非正规“兄弟部队”进行疯狂报复时，造反者的撤退就很快演变为溃逃。报复是为了反对以咖啡庄园和好斗的拉迪诺人共和国作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所受到的挑战。由于这一镇压行动进行得迅速而广泛，难怪对其人员伤亡代价的估计始终是可怕的辩论主题；如果说80年代的反对派运动所提出的4万人死亡这一数字太大，那么在整个1932年2月期间由于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斩光杀绝，死亡人数肯定是数以万计的。这一摩擦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不亚于政治影响；它使农民的社会——宗教兄弟关系陷于混乱，并使得人们不敢穿着印

第安人服饰，因为这种服饰已被农民看作是文化抵抗的挑衅行为。确实如此，因为暴动虽被当局斥责为共党行动，但是许多当地的拉迪诺人则认为这是原始土著人的暴动对他们实行种族灭绝是合理的。

虽然1932年春的暴力行动大部分是民兵治安队所为——民兵治安队是70年代敢死队的前身——但是其政治结果却使军方控制政权；因为军队仍然是一股落后的、以卫戍部队为基础的武装力量，缺少一种政治决策体制，所以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军队的统帅马丁内斯手中；他巩固了具有明显个人色彩的政权。这位将军行动方向的果断性使他对寡头势力采取了一些有限的约束。他乐意接受寡头势力提出的货币贬值的要求，在上台后几周内就克服了停止支付外债所引起的困难，但是后来他降低了利率，成立了中央银行，从私人银行机构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实施外汇管制，并使国家参与一家信贷银行。上述措施中没有一项严重地损害企业家的利益，但是有些措施则限制了短期赢利，并为国家进行温和的经济干预奠定了基础，尽管国家干预常与强大的资产阶级法人机构如咖啡协会保持密切合作；咖啡协会于1942年改成萨尔瓦多咖啡公司，后来一直通过控制咖啡市场而几乎成为一个与政府平起平坐的经济内阁。到40年代末，慢慢纳入彻底自由市场模式的进程已被证明对地主及其商业伙伴非常有利，因此他们能容忍马丁内斯为手工业者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手工业者缺乏法人代表，他们仍然需要在关税方面得到帮助，以便从大萧条的影响中复苏过来。这些行为并无特殊的冒险性，30年代异乎寻常的经济条件曾使该地区同样保守的政权采取过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从未达到使地主对经济政策的控制受到严重挑战的地步。地主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是通过有关的内阁职务或者它采取不合作的能力以及通过其代理人机构来实现的（确实如此，在1976年提出土改议案之前，地主对经济政策的控制从未受到挑战）在汇率问题上也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不满，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内，汇率

一直保持在1935年的水平上，即2.5科朗=1美元。

在12年多的时间内（1932—1944年），马丁内斯统治萨尔瓦多的方式基本上类似他在邻国的同伴们的统治方式，即畅通无阻地一次次连选连任，并保持虚有其表的民主程序。但是，应当指出，经过相当时间以后，这却成为相当重要的一种形式，因为萨尔瓦多军队从来没有像许多南美洲国家的军队那样彻底抛弃自由派宪法体制的协议。在马丁内斯当政期间，由于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明显的古怪性格使这种政治形式得以存在，但却剥夺了它的实质；马丁内斯的古怪性格后来因虚饰的神秘主义而受到嘲讽——他沉迷于通神学，深信自己有能力获得超自然力——但是这种神秘主义也使这个考迪罗产生一种难以捉摸和独特的气氛，而不能被看作是寡头势力中的无足轻重之辈。对其大选胜利的预知有时促使那些牢骚满腹的高级军官们发动不成功的起义，但即使在华盛顿于1936年不再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上的政权以前，马丁内斯的地位也已非常稳固，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他的政权似乎已接近牢不可破的地步。这时与美国的贸易已得到扩大，从而弥补了美国直接投资的严重不足，并使华盛顿对萨尔瓦多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这一程度低于除哥斯达黎加以外的其他中美洲国家。这种影响力还被用来恢复政治进程中的少量民众参与，但同时又不损害地主或威胁军队。40年代中期（如同50年代那样），罗斯福通过直接干预以外的一切手段来追求的这种目标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可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个目标仍然极大地软化了这个曾对轴心国宣战的独裁政权，它的宣战是出于地理上的必要性，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上的否定为基础，而且与同盟国宣称的"四大自由"中的民主成分越来越不相称。

当马丁内斯的权威似乎于1943年开始衰退时——在这一年，一方面，咖啡出口税激怒了庄园主；另一方面，铁路工人设法重新建立了工会——30年代末他与法西斯国家的调情已成为对他

长期的狭隘独裁日益不满的次要特点了，这种不满特别强烈地来自中产阶级，因为战争导致的消费品价格急剧上升使中产阶级受害最深。以中美洲标准来衡量，圣萨尔瓦多的城市中等阶层较大，而且尽管在10多年时间内被迫退出公共活动，但它并不缺乏政治传统。此外，马丁内斯个人至上的政权中固有的任人唯亲产生了腐败和官僚主义低效率，人们对此忧虑不满，并在各级军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许多军官感到总统对准军事部队的庇护日增而对他们构成威胁；这些准军事部队由一般的军官指挥，但不听命于国防部长。1944年初，当这位固执的考迪罗命令惟命是从的国会修改宪法以使他再次连任时，他使人们对他的政府的不满达到顶点。4月，一批军官发动了一次暴乱，被国民卫队艰难地加以平息，暴乱头目被处决，其中没有一个可称为激进分子的。这一行动在当代萨尔瓦多军队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使各个治安武装部队之间的不和进一步加剧，不仅激怒了受害者的同事们，而且使广大城市居民感到愤慨。首都的学生和医生举行了一次市民罢工，持续时间虽不长，但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使总统感到不能再继续依靠军队、华盛顿或群众的沉默了。但是，美国使馆谨慎地拒绝支持任何一方，加上大部分军官希望政权更迭以保守的、体制性的方式进行，从而限制了反独裁运动。当时的直接成果仅仅局限于马丁内斯由他的亲信同僚、安德烈斯·伊格纳西奥、梅嫩德斯将军所取代。

1944年4月的罢工旨在支持军队内部的不满分子和反对马丁内斯，而非针对整个统治阶级；农村中没有出现重要的运动，工人阶级仅发挥配角的作用。虽然这次罢工是1944年出现在中美洲的一系列民众反独裁行动的第一次，并开创了一个短暂的、活跃的政治竞争时期，然而，马丁内斯的下台以及梅嫩德斯宣布在秋季举行新的大选，激进活动并没有立即升温。最初出现的小心谨慎的气氛似乎肯定反映出人们所期望的是恢复1931年前的体制。但是，候选人阿图罗·罗梅罗在一次民意测验中几乎取胜后，他

所获得的不断增长的势力使军队和寡头势力担心运动无法控制。罗梅罗受到共产党所支持的、发展迅速的全国工人联合会(UNT)的赞同，尽管他所主张的纲领不如阿图罗·阿劳霍的工党纲领那样激进。危地马拉的乌维科将军于6月被革职以及10月发生受到民众支持的军事政变以后，这种担心进一步加深。因此，1944年10月21日，当一大群人完全为了庆祝危地马拉革命而聚集到圣萨尔瓦多中心广场时，梅嫩德斯最终屈从了他的同事施加的压力，允许奥斯明·阿吉雷上校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政变。阿吉雷是1932年镇压的领导者之一。由此而来的发生在市中心的大屠杀仅在马丁内斯下台以后6个月，这次屠杀不仅标志着前总统的伎俩重演，而且强调了如果没有军方的明确认可，要维持文人政治制度的任何努力都是极其脆弱的。发动第二次总罢工，然后从危地马拉侵入萨尔瓦多的企图被无情地镇压了下去，甚至对组织松散的学生发起的进攻亦不例外，尽管反对派是中产阶级而远非极端分子。阿吉雷的政变使军事机器获得了团结，并确保1945年1月的大选没有文人候选人参加；"绝大多数"选票的投票方式相当不同于联合国的设想，选举了马丁内斯的老盟友、名副其实的兴农党（PA）领导人萨尔瓦多·卡斯塔涅达·卡斯特罗将军。

卡斯塔涅达在位4年。在此期间，冷战开始，而且在一片反共的压力下，恢复民主的国际条件不断恶化。这一时期由于咖啡价格不再受战时协定的约束，经济开始持续复苏，从而开创了实现农业多样化的可能性和鼓励一些工业发展的思想。这一切促使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资产阶级虽然是水泼不进的，但并没有彻底地结为一体，总是在地主与商人之间孕育着某种紧张关系。竞争很少超出各部门之间为争夺市场地位而展开争斗的范围。但是，在如此紧密的人群内，这种争斗引起的反响足以干扰一致支持干脆退回去采取马丁内斯时期的限制措施。可是，为了跟上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在政治上也是令人放心的。而且，支持1944年4月政变的许多低级军官，由于10月政变的个人至

上主义以及反对分配官职制度和调整政策，而认为自己受了骗。因此，当卡斯塔涅达于 1948 年试图延长其平庸的政权时，他在一次被称为“少校政变”中被赶下了台。这次政变标志着军队以 1944 年起义的目标为中心而得到巩固，以及军队明显地转向控制方式的现代化。一个在政治上实行全面禁锢、在经济上信奉保守主义的政权要变成一个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水平、容忍一些受严密管制的城市工会和民众组织、接受某些中产阶级和寡头势力内部的政治竞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那些设法向农业新部门（尤其是棉花）和制造业进行投资的政权。这一转变中的主要人物是奥斯卡·奥索里奥上校。他孜孜不倦地、强有力地进行活动，并在 1949 年成立了民主统一革命党（PRUD），这个由军队支持的官方政府党在 1961 年除了名称以外几乎毫无变化地改为国民和解党（PCN）。它一直执政到 1979 年。

1950 年执政的政务会议成员是一批年轻的、来自中产阶级的技术官员，他们最初吸引了人们对军队的广泛同情，把这看作是 1944 年 4 月形势的再现。但许多人期望的开放并未实现。反共仍然坚定地居于制度的中心，这种制度以更具活力的统治方式取代马丁内斯的狭隘独裁。这一统治方式，正如何塞·马里亚·莱穆斯上校所表达的，预示这样一种信念：“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均衡以及避免危险学说的祸害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式是在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的合作范围内促进改革性质的学说。”[①] 改革主义在当时的中美洲是一个常用的术语，然而，尽管 1950 年的宪法包括了赞成土改和一切财产的“社会功能”的条款，但萨尔瓦多军官不坚持在农村进行土改，只是非常谨慎地在城镇实施财产的“社会功能”。新政权肯定了马丁内斯将文人排斥于政治权力以外的做法，并调整了这种做法的条件，以吸收一些主张在中央集权下进

① 引自罗伯特·E·伊拉姆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诉诸武力：1931—1964 年萨尔瓦多的军队与政治》，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1968 年，第 146 页。

行经济统制的思潮和发展主义思潮；只有从这方面看，新政权才能被说成是反寡头势力的政权。新政权的做法彻底平息了华盛顿的不安；与此同时，由于对农村民众组织实行绝对禁止，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城市工会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对民众来说，新制度与其前身的差别微乎其微。

在咖啡价格总的说来坚挺上扬、农业出现多样化和制造业得到适度增长的时期，奥斯卡·奥索里奥政府（1950—1956年）和何塞·马里亚·莱穆斯政府（1956—1960年）进一步巩固了军人政权。像通常一样，1956年的大选遇到了右翼文人党派的竞争，但一旦军内职位的调整确保官方候选人获得体制上的支持后，民主统一革命党赢得了93%的选票。这一令人放心的结果使莱穆斯得以满怀信心地开始其任期，并适当放松了由奥索里奥实施的控制。但是，60年代末，咖啡价格开始下跌，古巴革命的榜样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学生们使政府遇到愈加高涨的反对，这些反对来自学生组织和根据1944年运动命名的改良主义政党四月和五月革命党（PRAM）。莱穆斯最初试图较有灵活性地应付这些挑战，因为以四月和五月革命党为中心的联盟在1960年春季的选举中获得了首都以及其他5个城镇的市长职位。但是，由于政府不允许反对派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反对派开展的运动进一步发展，以致莱穆斯于1960年8月实施戒严令，并向大学派遣军队。这些措施以及由此而来的严厉镇压标志着一个真正独立和活跃的反对派是难以被接受的。虽然共产党的影响和经济衰退确实在军官内部引起了恐慌，但他们对于如此严格地限制政治参与是否明智的问题未能获得共识。因此，在一部分军人于1960年10月推翻已经不得人心的总统并组成一个包括文人技术官员和民主改革的同情者在内的政务会议时，尽管人们对此怀有忧虑，但更为保守的分子并没有立即作出抵抗。而在政务会议显然会允许左派参与选举时，那种谨慎立即发生变化，由胡利奥·里韦拉上校于1961年1月领导的反政变在重新建立体制政府时获得了大部分军人的支持。如同

1944 年那样——当时公开选举和文人政府以一种具体的可能性出现时军人作出的政治让步即刻被控制。但是，此后新创建的国民和解党调整了莱穆斯禁止来自右翼以外的所有真正的反对力量这种仓促的做法，以允许反对派作为一种安全阀一定程度地参与国会和地方政府，并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来改善政权的形象。1964 年，创建于 1960 年的基督教民主党获准赢得了 14 个国会席位，国民和解党获得 32 席。1966 年，基督教民主党的年轻领导人之一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获准就任圣萨尔瓦多市市长；他很快就将圣萨尔瓦多市变为实施该党社会和睦和有分寸的改革政策的场所。[1] 另一方面，革新行动党（PAR）在更为广泛的改革计划的基础上获得 29%的选票后，于 1967 年遭到了禁止。该党自 40 年代末成立起始终软弱无力。60 年代初更换领导人以后才得到发展。后来它改组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民族革命运动，领导人是吉列尔莫·曼努埃尔·温戈。该党获准参加 1968 年的选举，其社会民主主义纲领包括主张开展土改——土改不是基督教民主党议程中的主要内容，——但未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因而在 1970 年的选举中未能获得任何席位。如能获得一些席位，那么它的生存或许能得到保障。

存在反对派是国民和解党政权的组成部分，该政权继续利用它对选举的控制，以维系“持续不断”的政府体制，在此体制中就任总统的有胡利奥·里韦拉上校（1961—1967 年在任）、菲德尔·桑切斯·埃尔南德斯（1967—1972 年在任）、阿图罗·莫利纳（1972—1977 年在任）和卡洛斯·温贝托·罗梅罗将军（1977—1979 年在任）。虽然基督教民主党主张的天主教社会政策中包含的更为虔诚和慈善方面或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再分配要求有时使

[1] 研究中美洲政党的著作极少，其中之一是斯蒂芬·韦伯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与萨尔瓦多政治中的基督教民主党，1960—1978 年》（巴吞鲁日，1979 年）。该书分析了基督教民主党的起源和发展。

人感到不安，并有吸引广泛支持的危险，但它们的存在，就能起到保留民主外表并不使这个体制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独裁的作用。尽管这种体制在选举中受到正规军的保障，平时则受到准军事部队的支持，自 60 年代末起，这种准军事部队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半官方组织民族主义民主组织（ORDEN）的支持，它主要在农村充当保安团。与过去的这一类组织不同的是，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原计划吸收群众参加；许多参加者不是被该组织的反动意识形态所吸引的，而只是为了获得官方的小恩小惠的可能性、或往往只是出于使自己免遭国民卫队的迫害。国民卫队严厉镇压不同政见的活动，并保证禁止农村的独立组织。

60 年代，农村组织通常起源于合作社和教会主持的村社协会，它们对秩序并不构成明显的威胁。后来不断增加的暴力以及不断支持牧师工作和许多农村牧师神学信念中“优先为穷人”的思想形成了强有力的潮流，70 年代获得了组织独立。① 萨尔瓦多的激进天主教主义可能较之其他中美洲国家更为有力；在推动农工和学生（即使不包括城市工人）关心政治方面，激进天主教主义可与世俗左派势力的影响不相上下。到 70 年代中期，激进天主教主义显然损害了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基层支持，但没有使该党在大选中失去大量策略性的选票；在大选中，左派势力既不可能、也不会站住脚。70 年代末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大主教采取的立场最能反映出这一运动的力量。在此之前，罗梅罗是一个持保守观点的牧师；由于他强烈地谴责暴力，军队和右派将他视作主要的绊脚石，而且多少有点不合理地把他看成是左派的积极支持者。罗梅罗的 180 度大转弯引起的震荡可与农村组织的规模所引起的震荡相比。因为从来不介入全国正式的政治格局的农村组织很快扩散，而且确实吸取了许多当地的策略，所以为时不久就

---

① 卡洛斯·卡瓦鲁斯：《革命的起源》（墨西哥城，1983 年）；詹妮·皮尔斯：《充满希望的土地：萨尔瓦多查拉特南戈的农民起义》（伦敦，1985 年）。

被军人们视为比产生它们的那些驯顺的、被收买的组织要危险得多。因此，被地主反对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艰难，中间派反对力量主张农村问题应有一个战略性解决的要求被贬斥为蛊惑民心的宣传。但是，人们认识到农村存在着真正的挑战，军方的政治本能在镇压运动中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镇压运动常常助长了反对，而不是压制了反对。

在城镇，尤其是在圣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推动下出现的制造业和地区贸易的显著增长为工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此外，虽然参加组织的工人在数量上仍然很少，而且其中许多人加入了由政府支持者所控制的联合会，但是独立的行动，如1967年的总罢工，反映了一种趋向战斗性和脱离手工业者互助传统的不稳定趋势。[1]工人的行动仍然容易受到收买和压服，这一点可从工人广泛支持政府在1969年“足球战争”中入侵洪都拉斯的事件中看出来。当时，民族主义狂热席卷已明显获得工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并使工会内主要左派力量共产党的反对降到最低程度。

这一冲突与世界杯足球赛第一轮的各场比赛中出现的摩擦不相干；它的激化不是由边境争端所致，而是较多地起因于萨尔瓦多在商业上拥有压倒洪都拉斯的优势以及在洪都拉斯有着大量萨尔瓦多移民工人。贸易不平衡的出现是因为萨尔瓦多在中美洲共同市场较为有利的商业气候中充分利用其既有的优势；但是，在人口密度大、实行集约耕种的萨尔瓦多，多年来向外移民一直为寡头势力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安全阀。1930年以来已有50多万人离开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流往洪都拉斯。这些人为困境中的奥斯瓦尔多·洛佩斯·阿雷利亚诺上校的政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攻击目标；阿雷利亚诺设法既抵御萨尔瓦多的经济霸权，又通过没收萨尔瓦多人的土地予以重新分配的办法来减少民众的反对。至

① 参见拉斐尔·门希瓦尔：《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斗争》（圣何塞，1982年）。

少10万移民被赶回老家，由此产生了一个长期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暂时刺激萨尔瓦多民族主义这一个短期的政治好处。许多难民在洪都拉斯香蕉种植园工作时获得了一些工会经验，大多数人必然会力争在首都重新开始生活，因为现在的农村生活前景较之当年他们离开家乡时更为暗淡。返回的人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许多难民对他们获得的解脱并不感到欣慰，反而对缺乏满足自身的机会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也是一个造成后果的因素。城市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的能力早已枯竭；战争有效地停止了中美洲共同市场。而且萨尔瓦多的垦殖计划难以立即产生缓解作用。

这样，与洪都拉斯的战争突然终止了萨尔瓦多穷苦工人的战略性外流；不仅如此，许多逃离原居住地、一无所有的人群使首都周围的贫民窟居民更加扩大，进一步加快了已经显而易见的“贫困化”进程。1950年至1980年期间，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从占总人口的18%上升到44%——以中美洲地区的标准来衡量处于平均水平；圣萨尔瓦多市的人口从11.6万增加到70万，这一增长率在中美洲也并非异常。但是，到70年代中期，萨尔瓦多省拥有全国人口的1/5多，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43人，而全国平均数为170人；人口密度的全国平均数已是中美洲平均数的5倍。这样，虽然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冲突的原因似乎不能仅仅说成是持续了数世纪的高人口密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一现象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并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产生了居住条件问题。它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激化了职业以外的动荡和组织模式。随着学生数量的迅速增长——到1974年，仅人文学科专业就招收了3万人——学生成为一批重要的新的政治选民，使城镇与乡村之间熟悉的社会——政治平衡发生动摇。

与洪都拉斯进行的战争在萨尔瓦多共产党内产生了一个危机；许多激进的年轻人认为该党难以对政权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挑战。继续通过选举和工会中的细致工作来追求“和平实现社

会主义”，这是与莫斯科的意见和党的组织本能相吻合的——莫斯科的意见与来自哈瓦那的意见越来越一致（萨尔瓦多共产党在创建后的两年内因采取了暴乱战略而几乎毁灭）。党的总书记萨尔瓦多·卡耶塔诺·卡皮奥反对上述观点，也反对在反寡头企业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支持下得到民主的“理想主义”信念。他于1971年与一些重要的工会和学生领导人一起退党，另建一个“政治—军事组织”法拉本多·马蒂人民解放力量（FPL）。这一游击队组织没有立即开始行动，因为它反对从古巴榜样和快速暴动的主张中得出的“游击中心”理论，而赞成效仿越南模式的“人民持久战”战略。1972年，一批更富中产阶级色彩和更具冒险性的基督教民主党失去幻想的支持者抛弃了合法政治活动而在更加尚武的游击中心主义基础上组成了人民革命军（ERP）。该组织内部对于由一批精英分子作为先锋通过榜样而不是通过组织上的团结合作来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这种模式是否可行存在着分歧，这一分歧由于人民革命军领导人于1975年处决著名作家罗克·达尔顿而达到流血高潮。支持达尔顿批评人民革命军的人后来根据更为谨慎的政治、军事路线，组建了第三支主要的游击力量全国抵抗武装力量（FARN）。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相比，这些团体在萨尔瓦多的出现较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事实的缘故：虽然60年代期间似乎出现了一些民主进步的前景，但70年代这一前景不断暗淡，因为国民和解党阻止改良主义反对派当政，或者更可能是由于改良主义反对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

由于这一主要的遏制机制仍然是政府操纵选举（1972年和1977年的总统选举尤为显著），大选以后往往出现两极分化的格局，民众对反对派难以令人置信的失败感到不满，使公共秩序严重崩溃，并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失望也更为普遍。虽然主张改良的党派可能被批评为错误地坚信自己能够执政或者能诱使当局实施进步性的改革，但它们很善于利用得到的机会。基督教民主党、民族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民主联盟（实际上它是非法的萨尔瓦多共

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通过建立全国反对派联盟（UNO），不仅消除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仅仅是一些战术上和口头上的分歧，而且共同推举能干的杜阿尔特为候选人，向政府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杜阿尔特获得了不大引人注目、但更有学识的温戈的支持。确实，人们对全国反对派联盟取得1972年胜利的期望如此之高，以致在突然可疑地停止向公众公布计票情况以后当最终宣布莫里纳上校以不足1万票的优势取胜时，一批军官立即发动了一场政变。虽然这些反叛者拒绝向公民发放武器，但只有在来自邻国的、由中美洲防务委员会组织的军队空运进萨尔瓦多并支持组织涣散的亲政府军队和始终忠于政府的准军事警察后，反叛军人才被打败。杜阿尔特对支持暴动曾犹豫不决，并阻止全国反对派联盟的支持者上街抗议。但是，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难以使他作出进一步的保证，因此他被逮捕，惨遭毒打，流放到委内瑞拉。对这个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最有才能的领导人的这种对待方法加强了他在国外的形象，也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国内的知名度。

莫里纳政权虽因1972年的事件而受震撼，但此后没有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明显的高压控制手段。他甚至对正式的反对派放松了压力，以保持其参与这一体制。这一短暂的松弛最明显地表现在政府准备默认反对派控制一些国会委员会。虽然反对派对一些国会委员会的控制是通过战术技巧、而非官方让步取得的，但这种默认使1976年的一个关于进行有限土改的提案得以提出；政府没有立即阻止该提案。然而，寡头势力通过其主要的压力集团（全国私营企业协会（ANEP）和东部地区农业主阵线（FARO）），表达了坚决的抵抗，从而挫败了已提出的法案，并向最高指挥部表明：让步已超出限度。右翼保安团（敢死队）不断增加的活动残酷地强化了寡头势力的这一立场。那些右翼保安团，如长枪党（FALANGE）和白色战斗联盟（VGB），进行了一些有选择的暗杀，建立了一种镇压模式。这种模式自那时以来一直是萨尔瓦多人生活中的一个悲惨特征。

对反对派作出的让步和莫里纳政权本身支持农业部门中开展一些改革的意向，都促使军人更向右摆。国民和解党在1977年大选中的候选人罗梅罗将军是一个极端保守派。全国反对派联盟为了使自己的候选人不再遇到1972年事件的重演，推出了一个退休军官埃内斯托·克拉拉蒙特上校。他是军队内占少数地位的自由派代表，这使统治集团对军队领导部门进行大规模调整，以便保证军队能支持一个信念坚定而并不精心袒护军方的官方候选人。但是，为使罗梅罗在选举前和选举中再度露面而采用诡计的规模和拙劣手法，导致他的对手支持者占领首都市中心、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和一次短促的总罢工。虽然游击队应对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活动负责，但大部分活动都是由民众组织和工会进行的。这些组织的成员已投全国反对派联盟的票，但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以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1977年发生的选举后的镇压促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因为罗梅罗总统不同于他的前任，实施了不断强化的高压控制，并导致与卡特政府的不和，因为官方的政府军、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敢死队开展了一个针对正统左派和天主教激进分子的暴力运动。这些左派和激进分子早已开始建立拥有广泛基础的民众组织、外围团体或围绕较小的游击队组织的“集团”，如支持人民解放阵线的人民革命联盟（BPR）（1975年）、支持人民革命军的二·二八人民联盟（LP—28）（1977年）以及支持全国抵抗武装力量的统一人民行动阵线（FAPU）（1974年）。[①] 这些机构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只能开展小规模的行动，通常是针对与寡头势力或军队有关系的个人。但是，随着全国反对派联盟显然难以通过立宪主义确保改革，左派影响的扩展和武装斗争的进一步被认可，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这一切加上不断的宗派分歧，促使一大批组织问世；它们竞相争取民众支持，直到1980年初萨尔瓦多已临近内战边缘时，各派力量才被

① 拉丁美洲局：《罗梅罗将军统治下的萨尔瓦多》（伦敦，1979年）。

迫联合起来。

毫无疑问，国民和解党政权因1979年10月15日政变而最终垮台是受到了中美洲地区事态发展的影响，尤其是7月的尼加拉瓜革命，但还包括罗梅罗政权与华盛顿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恶化是由于罗梅罗停止作出宪法保证，不愿意终止由军队及其非正式盟友导致的暴力升级。军队及其盟友不怕作出承诺，要消灭这个国家的整个耶稣会教派，除非其教徒离开。但是，国内冲突的势头在1979年年中已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似乎已不可避免。美国对政权更迭采取的默认仅仅促使一些主张改良的低级军官发动一次相对来说不流血的而实际上是先发制人的政变；但罗梅罗的一些野心较小和保守的对手利用了这次政变。他们急于借助更为机智的战略和十分必需的美国的经济与后勤支持，以面对不断增多的激进挑战。1979年初，罗梅罗已被迫解除全国戒严状态，但这一措施不足以平息罢工、示威和游击队行动的浪潮；终止宪法以及在不变的条件下恢复宪法都证明国民和解党的镇压与自由两手并用的战略业已告吹。镇压手段或自由手段本身都无济于事；而且分别采用两手时实际上就是排除了另一手。一个基本的战术安排结果成了混乱；而民众则对缺乏公开宣称的自由感到愤怒，暴力不足以使他们俯首贴耳。十月政变幕后的、通常与马哈诺上校有关系的年轻军官们试图提供谈判的余地（虽然他们没有像发动1944年和1966年政变的军人那样作出立即举行大选的许诺），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华盛顿的心照不宣的支持。当时华盛顿仍然为索摩查的倒台感到震惊，因此对避免公开的军人统治表示关切。但是，改良派在军队内部只是少数，从强有力的准军事力量那里得到的支持甚至更少；由于激进左派拒绝停止动员群众或在军队统治集团进行变革的基础上放弃武装活动（仅达成一个停战协定），保守派军官能够利用维护公共秩序的逻辑，为其迅速组织的运动服务，以破坏经济上的让步。由于内、外因素，在统治集团内部不论以什么样的速度都无

法解决这些紧张关系。因此，虽然改良派不断失去权力，但在萨尔瓦多长期陷入一个低水平、却又是持久和非常激烈的内战以后，军队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冲突仍然存在。在这一内战中，军队和寡头势力共同反对一个由原合法反对派和激进左派组织组成的民众集团。

在经济方面，1979 年萨尔瓦多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爆发可能比尼加拉瓜革命的爆发更容易被预测到。战后时期生产和农产品出口获得了持续的增长；与此同时，同样令人感受深刻的趋势则是用于生计的土地日益难以获得，从而加剧了失业和就业不足以及农村中收入分配的倒退比中美洲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而且肯定难以指望通过城市经济的增长来得到改善。1950—198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3.796 亿美元上升到 15.2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5.2%，人口增长率为 3.3%。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85 美元提高到 289 美元，似乎表明所有人口的财富有了改善；与此相一致的是：汽车数量增加了 3 倍，铺筑道路和电话增加了 4 倍，其他基础设施也获得了相同幅度的发展。但是，如果财富总量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而且生产力也获得了迅速发展，那么全面现代化印象与收入分配和土地占有制的指数却不相吻合。1977 年，占总人口 6%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当于占总人口 66%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1975 年，41%的农村家庭完全没有土地，34%的家庭拥有不足 1 公顷耕地（不足以维持生计），15%的家庭拥有不足两公顷耕地。[1] 此外，虽然自从 19 世纪末起萨尔瓦多农民较之邻国的农民更难获得土地，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土地稀缺明显加速，这是由于咖啡种植业和棉花、甘蔗等新兴农作物

[1] 规划部：《十个等级的家庭的收支分配》（圣萨尔瓦多，1981 年）；《农业统计》，1975 年，引自丁·马克·鲁尔：《洪都拉斯的农业结构和政治稳定》，载《泛美研究杂志》，1984 年，第 1 期，第 47 页。

以及牧牛业等商业性庄园在几乎静止不变的农业疆域里占据了更多土地。促使战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单产提高——咖啡产量从1950年的每公顷655公斤提高到1977年的1224公斤，并具有至少可维持对收割工需求的作用。但是，咖啡用地的增长幅度虽然较为适中——从1950年的11.2万公顷上升到1977年的14.7万公顷，而棉花用地的面积却扩大了3倍多（达到6万多公顷），甘蔗种植面积的增长幅度类似棉花（达到3.8万公顷），牧牛草地面积（牧牛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最少而土地用量最多）增长了50%。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增长是通过直接牺牲现有咖啡种植区边界上以及传统大庄园区外面的小农地产来实现的。虽然棉花种植业早已存在，它能在现有的所有制模式上得到发展，但牧牛业的兴起则深深地侵入了那些不大肥沃的边缘土地；这些土地在此以前为小农的生计提供了少量空间。牧场的扩大并没有使国内粮食作物面积出现绝对的停滞——粮食作物主要、但不是仅仅与小农农业相联系，但它确实影响了面向国内市场的耕作面积的扩大。1948—1978年期间，玉米种植面积扩大了30%，豆类扩大了23%，水稻仅扩大12%。单产稍有提高，从而使玉米、豆类和水稻的总产量分别增加了75%、43%和67%。这一时期，萨尔瓦多的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① 因此，尽管农忙时的劳动力需求得到保证，农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都获得增长，但是，相对于商业性庄园和人口而言，农民自给经济出现了下降。为了维持消费水平，必须不断增加基本粮食的进口量。由于缺少定居的处女地，或甚至缺少一种类似于危地马拉印第安农民保留的社会—经济“避难所”的文化，萨尔瓦多小农的增加陷入了一种两头受难的境况：一方面失去了直接耕种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成为临时雇佣工人的机会。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导致农村秩序

① 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中美洲工业化的开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拉美研究计划文稿，第141号（华盛顿，1984年），第17页。

的崩溃，更不会导致公开的暴动，但它确实加深了对地主政权的不满，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庄园的经济和社会控制，从而使农民在传统上一直小心谨慎的政治意识受到反对现有秩序的本地教士、学校教师和世俗积极分子的不稳定的影响。萨尔瓦多的地主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地主一样，拥有巨大和显赫的财富。萨尔瓦多人境况的鲜明对比自然既会激发雅各宾平均主义情绪，也会促使人们屈从于这个历史性的、难以改变的秩序。

如前所述，随着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长期或短期迁向城镇。1950—1977 年，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6.3%。制造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2.9%上升到 18.7%，这一比重按中美洲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是高的。大部分增长是在 60 年代的中美洲共同市场时期出现的。当时，以美国为主的外国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 1959 年的 0.7%增长到 1969 年的 38.1%。[①] 这种进展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计划者所想象的那种进展，因为重工业微乎其微—— 1978 年资本货占生产的 8.6%，大部分（64.7%）是常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易消耗产品。但是，本国生产的投入在数量上低于这一结构所表明的生产能力，如纺织工业原料的 45%依靠进口，造纸工业原料的进口几乎达到 90%。这一点以及许多新企业的“装配和收尾”特点限制了部门增长的滴流效应导向其他经济部门。而且，由于许多新的工业厂家是外国人拥有的或是资本密集型的，劳动力的总增长幅度（从 1962 年的 8.73 万人增加到 1975 年的 11.8 万人）大大低于生产的增长幅度，并掩盖了工人阶级数量占经济自立人口总数比重的下降（从 10.2%下降到 9.3%），也掩盖了这一事实：制造业劳动力的将近一半仍然受雇于 5 名职工或 5 名职工以下的手工业车间。[②]这样，工业增长

① 格特·罗森塔尔：《一体化进程中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载《今日中美洲》（墨西哥城，1976 年），第 125 页。

② 拉蒙·马约尔加：《中美洲的不平等增长》（墨西哥城，1983 年），第 60—66 页。

不仅没有为离开农村的大部分人提供其他就业机会，而且还使城市劳动力严格的“无产阶级”特点从60年代初期起不断减少，这对于社会学的革命理论来说并非无关重要。70年代末的城市暴乱决不能排除装配线和工厂工联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数量和政治动力方面常常从属于激进白领工人和熟练工人（尤其是教师和电力工人）、非正式部门中贫困潦倒的“个体户”以及当地社团组织的作用。这些社团组织在1980年8月的总罢工以前通常控制着群众运动中走在前列的平民组织；那次总罢工以后，公开活动因受到镇压而停止。但重要的是：1984年大选后，一旦少数公开组织和活动再次成为可能，工会、尤其是那些在白领部门和公共部门中的工会，很快得到恢复。这表明城市不满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贫困化的游民无产者的造反。

显面易见，70年代后期的社会冲突根源既不是经济停滞，也不仅仅是贫困。因为经济停滞直到内战开始以后才出现——当时国际经济进入衰退，而贫困本身并非萨尔瓦多社会中少见的新鲜事，程度上也不比洪都拉斯严重；而洪都拉斯却能相对而言避免暴力，尽管毫无疑问洪都拉斯人的贫困日益加速。一个世纪前建立的社会秩序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出口部门主宰的整体增长进程使成千上万的农业劳动力丧失了土地和农忙季节工资收入的保障，但又未能以一种在社会上保持稳定、在经济上能有所弥补的城市化进程来取代农民的离散。这一失衡不仅加剧了贫困，而且还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纯粹”阶级特性的人口；这些人常常在地理上和社会上处于流动状态，处于既成控制范围之外，并受制于越来越无效的生存战略。他们不能完全被说成是城市人或农村人，因为萨尔瓦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共生现象太明显了；这一点在后来农村与城市在军事活动方面的比较活跃的交流中表现得很明显。就此面言，这一危机至少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将20世纪末期的特点（游击队利用录像进行宣传和教育）与延续了数世纪的特点（为土地而斗争，文化的不相容性，村社之间

的暴力）融成一体。

1979年10月至1980年1月，萨尔瓦多政治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因为一个包罗改革派和保守派军官、合法反对派代表（包括萨尔瓦多共产党）、寡头势力代表和一部分激进集团代表的政务会议试图就政策达成一致意见，而军队则继续袭击群众的示威。到1979年底，进步分子设法进行的改革显然正在被右派推入困境；而且军队拒绝接受政府对其活动的控制，导致了除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以外的所有改革派人士集体辞职。1980年1月，平民阵线在首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纪念1932年暴动和群众革命协调委员会（CRM）的成立，这个委员会联合了许多民众组织，两个月后，大多数改革派党派和许多工会都加入进来并成立了革命民主阵线（EDR）。此后，革命民主阵线成为主要的政治反对派组织。罗梅罗大主教3月被暗杀一事加速了民众团体的巩固。这一暗杀罪行被普遍认为是军队豢养的准军事外围势力所为，而且极右派政客如罗伯托·达比松，则公开赞美这一罪行。达比松甚至认为那些尚留在政府中的、无能而胆怯的改革派代表人物也是颠覆分子。罗梅罗之死表明：这种势力在反对改革的运动中，准备走得多远；罗梅罗之死还使基督教民主党出现了分裂，少数人离开了政府和该党，其理由是：该党在政治上已不再可能、在道义上已不受欢迎同右派合作以加强中间派来反对左派。但该党的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其领袖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运动，把他过去在全国反对派联盟中的盟友，指责为受共产主义欺骗，因而受到华盛顿的支持。反对派以同样的预言反击杜阿尔特，指责他与那些不仅压迫人民、而且在他争取民主权利时拷打和流放他的人同流合污。

虽然杜阿尔特从此以后被左派和中间派贬低为傀儡，但他保持了独立于极右派和大部分军人的立场；他的立场是坚持把土地改革作为一种减少农村两极分化的手段。因为卡特政府支持这一战略，而且军队的最高指挥部把接受这一战略作为获得急需的美

国后勤援助的代价，所以组织仍然松散的寡头势力未能阻止土改于 1980 年 5 月正式实施。这次改革后来有过一段起伏的经历：咖啡大庄园土地的重新分配或超出了界限，或被无限期地推迟，而把那些低效和“太大”的庄园改变为合作社则通常仅仅是改变财产所有者而已，因为破坏和暴力影响了劳动者真正掌握控制权。在分配小片土地的所有权方面有些进展，但进展远比规划缓慢，而且肯定没有产生出负责这一计划的美国决策者所预想的资本主义小农场主阶层。由于受到尤其是右派力量、有时也受到左派力量的干扰，对土地期待已久的人们在获得土地后仍然无法明显地改变其境况，同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则被排斥于土改之外。但即使这些有限的措施对地主来说也是十分讨厌的。地主开始在军人的帮助下行使其事实上的否决权；军人接受土改是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但他们的政治本能却是阻碍传统秩序的任何变革。这一规律的例外是极少的，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进步观点不为人知的一些较有才能的指挥官开始纯粹以取得后勤支持为理由，接受土改计划。

甚至在这一姿态确定以前，寡头势力因受到政务会议政策的影响而已被迫超出破坏土改行动的范围，而为夺取正式官职而开展政治挑战。国民和解党的倒台以及华盛顿的战略迫使寡头势力提出这一挑战。华盛顿的战略是把至少实施一些社会改革作为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这一交换因基督教民主党参与政务会议而大为便利，但极右派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交换必然会被调整，如果基督教民主党掌了权而左翼力量的挑战继续困扰美国政府的话。因此，由反动的民众主义者罗伯托·达比松领导的民族主义共和联盟（ARENA）的成立，可被看作是 1932 年以来地主阶级第一次真正独立介人公开的政治竞争。这一事态的发展因采用了类似美国政党的现代竞选方式而有所模糊。采用这种竞选方式是为了对该党主要支持者掌握或影响的选民补充庇护和酬报的力量。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对经济改革的彻底反对并主张用纯军事办法来解

决矛盾的态度，即使不是简单而一贯，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它的选举号召往往被其对手所轻视——这有效地使得华盛顿不得不放弃对土地资产阶级进行任何重大的挑战。但是，如果达比松与敢死队为广为人知的关系以及令人心寒的声明产生了外交上的窘况，那么他的反政府行为却使人有点相信萨尔瓦多存在正规的政治竞争，从而显得该政府及其合法反对派构成一个值得保护其不受共产主义颠覆的民主制度。

群众革命协调委员会于 1980 年 1 月制订的，数周后由革命民主阵线采纳的纲领不是一部共产主义的宪章，但它确实包含了全面的土地改革、对战略性经济基础设施以及银行和外贸实行国有化（事实上，银行和外贸国有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务会议以资本主义的理性论据而实施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了寡头势力的反对，但在 1982—1984 年右派控制立宪会议和总统职位时仍然能够立足)。虽然革命民主阵线包括一些设法通过革命变革来寻求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公开马克思主义团体；但没有一个成员能够实施一个向社会主义改革过渡的计划，甚至就中期而言也没有把这种计划看作是可行的；这一联盟的形成只是以同意一个“大众民主”纲领为基础，这一纲领主张的社会政策类似于 70 年代初期全国反对派联盟的政策。但在 1980 年初以后出现的极端暴力条件下，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方法必然会呈现出更为激进的调子；反抗战略愈加受到游击队组织的影响。这一变化是在 1980 年 6 月和 8 月的总罢工失败后出现的，当时改革派被迫承认除武装斗争以外别无选择。

1980 年秋季，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中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标志着模棱两可的反抗战术阶段的结束和内战的开始。内战开始后的 6 年内，约 7 万人丧失了生命。该阵线试图于 1981 年 1 月发动一次仓促的“最后攻势”。这一攻势不仅促使美国进行更深的干预，而且使游击队不得不改变其战术，放弃主要在城市进行暴动的办法，改为更多地在农村开展基层斗争并不时发动一

些大规模袭击，尤其在北部和东部。最强的起义军分布在查拉特南戈（革命民主阵线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莫拉桑（人民革命军占主导地位）以及圣萨尔瓦多以北的瓜萨帕火山区周围（各集团都在那里拥有武装力量），尽管总数为 7000 人的战斗部队有能力在这些区域以外，尤其是在圣米格尔和圣维森特附近的农业发达地区骚扰 3 万多人的军队。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提供给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大量增加，但其效益受到了限制，因为军队的战斗经验不足，军官的素质低下以及准军事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嗜杀成性，这种传统的控制方式使这个政权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从而促使法国和墨西哥政府承认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主义阵线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但是，尽管萨尔瓦多军队以低效益和残酷著称，然而发动一场消耗战确实最终使战斗区域中的居民只能采取不支持游击队，以求得生存的战略。因此，到 1982 年末，虽然起义部队已获得了不小的抵抗能力，但显而易见，它缺乏在可预见的将来击败政府军的能力。

1982 年春季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使获得新生的国民和解党和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得到了超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实际多数；基督教民主党在杜阿尔特任临时总统时曾控制了执政委员会。游击队无法阻止大选，现在就只得面对一个比上一届更为保守而也能声称获得民众授权的政府。虽然这一声称受到选举中不正当行为证据的驳斥，这些证据似乎使造反分子以外的许多人相信，而且虽然政府的更迭几乎不影响军事行动，但这次选举确实标志着政治状况的变化，选举开创了竞争的第二阶段。这一竞争受到了革命民主阵线的抵制，其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既然它的许多领导人和支持者被杀害，因而难以在不导致大屠杀的条件下获准参与竞选。在内战条件下右派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进程，这个看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尤其是萨尔瓦多的选举传统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不管公众舆论的反映是多么不充分，民主政府形式的恢复显然是一大进步。这使

反对派内部在战术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紧张关系，左派内部的分歧直到人民解放军的两位老兵去世后才得到消除（这两位老兵是卡耶塔诺·卡皮奥和梅利达·安纳亚·蒙特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1984年初，革命民主阵线发表了一个新纲领，它明显不如1980年的纲领那样激进，它不提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是强调旨在停火和建立一个包括现政权和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在内的临时政府的机制。反对派仍然将正规的政治体制贬斥为没有掩饰的伪装，但是，由于里根政府决心开展一个打击中美洲左派的协力运动，以及严阵以待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放弃了对起义军的最初的那种后勤援助，在短期内用军事手段取得胜利的期望意味着一种空想。1984年5月的大选进一步鼓励了向谈判过渡；在这次大选中，杜阿尔特以微弱多数击败达比松（54%对46%）。虽然双方都有值得怀疑的行为，也不能反映出大部分人的同情心，但这次大选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的普遍期望。杜阿尔特以和睦相处为号召参加竞选，因而能敌得过达比松所开展的资金充裕的、敏捷的反共讨伐；虽然华盛顿毫不掩饰地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但是，屠杀、经济危机和被迫移民无疑使许多人为终止敌对状态的最快、最不恐惧的途径投上一票。然而，如果说人民群众筋疲力尽地阻止了激进右派的进展，但战争即将停止的期望却立刻化为乌有，因为杜阿尔特受到了强有力的、多疑的最高指挥部的威胁，并且缺少美国对谈判的支持，所以他拒绝了造反者于1984年11月在拉帕尔马镇提出的停火和建立新政府的建议。在此后两年内，和平谈判陷入了困境，因为总统坚持要求起义军无条件地放下武装，面起义军则拒绝接受与投降并无任何不同的这些条件。由于经济继续直线下降，杜阿尔特失去了名望和权威，而军队则未能使遏制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府获胜的前景似乎与有利于起义军的结局一样遥远。面临华盛顿绝对敌意的起义军难以超出持久的人民游击战。这一战争没有使其支持者摆脱暴力和经济困难。

在这种条件下，约 7 万人在 1980 年至 1988 年期间丧失了生命，双方均有理由考虑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 1987 年 2 月提出的、由中美洲地区国家元首同年 8 月修改后批准的地区和平计划的长处；这一计划将作为埃斯基普拉斯第二次会议的协定。虽然武装部队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仍然非常不愿意鼓励其政治盟友作出让步，但杜阿尔特总统无法逃脱他在此以前提出的谈判倡议的逻辑，而左派则因受到来自马那瓜和哈瓦那要求其采取灵活性战略的压力而认识到在国内和外交上扩大其运动的必要性。

谈判解决所面临的障碍远远大于在尼加拉瓜面临的障碍——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叛乱军已在军事行动中失败，但仍然几乎完全依靠华盛顿——或者确实大于在危地马拉面临的障碍——危地马拉的全国革命联盟（URNG）十分软弱，因而难以从显然已被军人吓倒的文人政府那里获得合理的条件。但萨尔瓦多反对派的政治领导人从未彻底放弃选举道路或完全信奉通过暴动取得国家权力。同样，内战也极大地危害了经济界；经济界从右翼向杜阿尔特发起挑战，也看到了开展一个反对政府依附美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好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对游击队采取独立姿态的可能性。虽然暴力的水平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程度没有降低，但是，美国介入萨尔瓦多事务，显然已产生出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

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向基督教民主党提出的保守的挑战的力量没有立即显示出来，因为基督教民主党人于 1985 年控制了国会，而且其反对派在国际上的形象因达比松与敢死队的关系而受到损害。但是，杜阿尔特政府的无能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极端地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到 1988 年，美国援助已达国家预算的一半。虽然军队因美国的援助而变得强大，但是，政府由于未能以此取得打击游击队的胜利而受难。与此同时，北美的慷慨也为官员的贪污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这种贪污尤其不利于一个大肆宣扬其崇高道德

目标的公开声明的党。此外，自从杜阿尔特任临时总统起，他的党就把失败归咎于极右派控制了司法权以及1982年以后控制了立法权。1985年以后，这一解释对于那些曾投基督教民主党票的人来说似乎确实已成为陈词滥调。该党未能在这些选民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尔后又开始出现其精英的内部分裂。与此相对，民族主义共和联盟则因政府不履行1981—1984年期间作出的诺言而获得了重要的复苏。因此，在1988年的立法选举中，极右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民族主义共和联盟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胜利为在1989年3月的大选中从基督教民主党手中夺取总统职位铺平了道路。因而开始注意改善其国际形象并为谈判解决冲突作出了一些姿态，以消除本地区的忧虑和许多选民的担心。这些措施与该党经常提出的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内战的号召完全相反，表明该党已认识到美国影响的重要性，但不愿意改变其根本的观点。当然，这一点在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取代该党领袖达比松时已成为许多人的看法。克里斯蒂亚尼是一个举止温和的咖啡庄园主，在美国受过教育，很快就被证明是向华盛顿鼓吹"现代"民族主义共和联盟的极为机敏的人物。

面对1987—1988年期间国内和整个中美洲地区出现的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左派的反应是提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倡议，1988年秋季，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吉列尔莫·曼努埃尔·温戈和鲁文·萨莫拉公开回到圣萨尔瓦多，获得了人身安全的保证，并宣布将以民主同盟（CD）的名义参加1989年3月的大选。他们声称，民主同盟将取得自由、公正选举的胜利。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领导人有效地切断了与这一行动的关系，但没有直接对其发起攻击。因此，当竞选活动开始后，阵线本身率先提出了把选举推迟半年作为主要基础，以便有可能实现停火，把左派结合进合法的政治生活之中，大幅度裁减军队，削减美国军事援助和举行一次真正的大选试验。在一段时间内，新上台的布什政府似乎准备考虑对这一提议进行讨论；与基督教民主党相比，民

族主义共和联盟表示更愿意与它的敌人进行谈判。但阵线提出的条件被证明是太苛刻了，因此这一倡议立即就陷入困境。游击队重新采用游击战运动来破坏投票，但未能阻止克里斯蒂亚尼轻而易举地击败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菲德尔·查韦斯·梅纳，而民主同盟仅获得了预料中的很少的选票。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事态发展使萨尔瓦多政治生活更加复杂化，似乎带来了 1980—1981 年内战爆发以来从未见过的可能性。但即使在这些事态处于高潮的时候，仍然难以想象可用本国的条件来平稳地解决冲突。确实，民族主义共和联盟的胜利似乎预示着寡头势力的恢复，使极为反动的统治集团在北美洲地区虽感犹豫但却是决定性的认可下结成一体。10 年的流血冲突未能减少政治活动，而政治手段同样证明是无法终止战争的。

第6章

1930年以来的洪都拉斯

在从西班牙那里取得独立后的头100年中，洪都拉斯在克服因地理因素导致的全国一体化障碍方面打了一个败仗。[1] 这个国家的高山和狭窄陡峭的山谷影响了国内的交往，阻碍了农业发展，并在全国政治中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地方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它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陆地边境线都存在争议，不时导致军事冲突，而全国一体化的不足则促使邻国政府干预洪都拉斯事务。甚至离岸领土也受到同一种离心力趋势的影响；1860年从英国手中收复的海湾群岛[2]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自治地位；天鹅群岛的主权同美国存在争议；半塞卡湾中的几个岛屿的所有权也与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存在争端。人口数量使这个国家的困难更为严重。1930年的人口统计估计为85.4184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不足20人。绝大多数人散居在整个农村地区，使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人口仅为4万人。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无人居住。

地理因素使19世纪70年代横扫中美洲的自由派改革在洪都拉斯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意想不到的转折。在邻近的共和国，自

---

①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洪都拉斯议员在表明他的国家的地理性质时，将一张信纸揉皱，将其掷在桌子上，并说"这就是洪都拉斯地图的概要"。见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在委内瑞拉和中美洲的三个外国佬》(纽约，1896年)，第73页。

② 海湾群岛（Bay Islands），即今巴伊亚群岛。——译者

由考迪罗制定并亲自参加促进咖啡和其他农产品出口的计划，而在洪都拉斯，马科·奥雷里奥·索托总统（1876—1883 年）和路易斯·博格兰总统（1883—1890 年）则强调矿业，他们本人都成为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殖民地经济赖以生存的矿业为消灭由落后的国内交通导致的商业上的劣势提供了机会，因为主要矿产（白银和黄金）价值/重量之比的高比值减少了国内交通开支的相对重要性（就咖啡而言，交通费用几乎具有抑制性作用）。此外人们还存希望：矿业繁荣或许能为改善长期得不到改善的交通体制提供刺激和财政资源。

一些洪都拉斯人参与了自由派改革后出现的矿业复兴，但最为成功的企业——受惠于慷慨的法令——是外资企业：19 世纪末，纽约与洪都拉斯罗萨里奥矿业公司已居于垄断地位。积极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决非偶然，因为洪都拉斯自 19 世纪 70 年代初起一直被排斥在国际证券市场之外，其原因是一个金融丑闻，这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并为整整一代政治精英留下了伤痕。19 世纪 60 年代末，洪都拉斯政府筹措了 3 笔帐面值大约为 600 万英镑的贷款，用于建设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这一勇敢或天真的努力是为了改善交通和促进全国一体化。洪都拉斯政府受骗之事败露后，该计划于 1872 年终止，已铺筑的铁路仅 50 英里长。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未支付的利息的资本化使洪都拉斯的公共外债达到将近 3000 万英镑——以人均计算属世界上最高的外债之列。

铁路事业的失败使此后的历届洪都拉斯政府过高地期望矿业对全国一体化的作用。这一产业确实获得了发展，但是，慷慨地出让矿产开采权限制了财政上的影响，政府的道路建设计划仍然令人遗憾地得不到发展。只有一家银行（洪都拉斯银行）在矿业繁荣中问世，矿业以外的主要受益者是由阿拉伯、法国和德国商人主宰的小规模商业飞地。落后的交通仍然阻碍着农业部门市场盈余的增长；特古西加尔巴是中美洲地区唯一没有铁路的首都。

在这一灰暗的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

初的历届政府都热情地欢迎外国香蕉公司的到来。自19世纪60年代起，香蕉业在缓慢地发展，外国船只来到海湾群岛和大西洋海岸港口，向当地生产者购买香蕉。但是，运输问题限制了增长，因此，新型外国企业家表示愿意开发铁路、改善港口设施和使出口实现多样化，以此来换取土地及税收方面的让步。由于当时土地似乎无其他用途，以及外国人想要得到的财政优惠类似于提供给外国矿业公司的优惠，因此这些外国企业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1898年第一批进入洪都拉斯的外国人是瓦卡罗兄弟，他们的公司后来成为标准果品及轮船公司。4年后，即1902年，威廉·施特赖希获得了同样的特许权，但由于缺少资金，几年后他被迫将其企业出卖给萨姆·塞穆赖。于1911年建立了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翌年，联合果品公司进入洪都拉斯，该公司的两家分公司——特拉铁路公司和特鲁克西约铁路公司获得了特许权。这三家公司（库亚梅尔果品公司、标准果品公司和联合果品公司）很快就垄断了香蕉生产和出口，并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繁荣，使洪都拉斯到1928年成为世界主要香蕉出口国。那时，铁路线长度已超过1000英里；甚至属于全国铁路公司的60英里（19世纪80年代后在原来的50英里上又加长了10英里）铁路线也由塞穆赖的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管理。

为这一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香蕉公司为获得政府的偏爱而展开的竞争加剧了洪都拉斯政治中的个人至上论和地方主义。20世纪的最初20年中，竞选极少，候选人是受不到相互为敌的公司支持的。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资金来源，这些公司成了作为别无他法的放贷人；而成功的候选人则往往不顾在实施既成协议中出现的反常行为或甚至提供更为慷慨的让步。税收优惠很快达到，这样的程度：被豁免的数额远远超过来自各种途径的政府财政收入总额，而公司商店中出售的免税进口商品则损害了幼小的制造业。确实，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极少数工业发展例子主要代表了果品公司本身的多样化。

香蕉业的迅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交通不畅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末，一条未铺筑路面的道路连接了特古西加尔巴与太平洋港口城市圣洛伦索，但经济重力的中心已牢固地出现在北部（大西洋）海岸；它与首都仍然没有道路或铁路相连。沿海地区的香蕉区域纯粹是一种飞地形式，其港口、铁路、电报等等均由外国人控制，劳动力常常依赖于进口（来自西印度群岛和萨尔瓦多）；瓦卡罗兄弟公司成立的一家银行（大西洋银行）提供了简单的金融服务，美元自由流通（由黄金担保），而洪都拉斯的其他地区则仍然采用少见的复本位制中的银本位。与其他经济部门有少量联系的是来自果品公司的律师；他们都是洪都拉斯人，在边远的特古西加尔巴，他们常常兼有政客的角色。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曾多次以偏见的眼光注视着洪都拉斯的内部事务。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干预是1907年在华盛顿举行中美洲各国会议的决定因素之一。此次会议产生了命运不佳的中美洲法院和和平友好条约。华盛顿还对于欠铁路证券欧洲持有者的公共外债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深表关切；1910年，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进行了美元外交以使债务从欧洲人手里转到美国人手里。但是，美国政府受到了塞穆赖的阻挠；他为推翻支持美国财政干预的洪都拉斯总统的革命提供了资金。

因此，这不是第一次国务院与洪都拉斯一家果品公司发生不和，但更为有力的干预直到1924年才开始。1923年的总统选举产生了三方分裂，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获得绝对的多数。国会拒绝认可任何一个候选人，即将下台的洛佩斯·古铁雷斯总统则自封为独裁者，内战由此开始。如果美国政府当时没有劝说所有中美洲国家签订一个新的和平友好条约，那么这次内战会如同以往的内战一样自然地向前发展。因此，美国的威望处于危险状态，其结果是海军陆战队于1924年3月进人特古西加尔巴，萨姆纳·韦尔斯受委托前去召开一个由冲突各方参加的会议。最后于5月签订了阿马帕拉条约；该条约确定米盖尔·帕斯·巴拉奥纳当选为

总统。他是1923年大选的少数参加者之一，没有参与内战。

海军陆战队离开的速度与抵达的速度同样快；洪都拉斯进入了一个独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稳定时期。但是，这一稳定并非由于美国的干预，而是由于洪都拉斯的政治体制不断成熟。自由党逐渐从19世纪的极端宗派主义中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全国性主张的政治机器。自由党的各个反对派最终于1923年联合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国民党）。这两个党的区别不在于19世纪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于是否将武装起义视为合法的条件；国民党对于以武力来解决政治冲突表现出最大的犹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在1923年大选后诉诸武力，但他这样做只是在洛佩斯·古铁雷斯自封为独裁者之后。卡里亚斯和国民党后来在接受阿马帕拉条约的规定时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该条约的规定是：帕斯·巴拉奥纳（卡里亚斯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应当选为总统。国民党遇到了一次更为严厉的考验，因为自由党候选人比森特·梅希亚·科林德雷斯博士在1928年大选中击败卡里亚斯，成为洪都拉斯历史上第一位在任官员在和平的选举中击败官方候选人而成为总统。这一少见的经历1932年再次出现，卡里亚斯在10月总统选举中战胜了自由党候选人。在1928年和1932年的大选中，两党都推举了一位候选人，因此使得胜者不仅获得了多数票，而且还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这就使国会的干预成为多余，并避免了过去多次导致内战的复杂局面。

始于1924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使过去一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1926年，国会批准一个解决拖欠外债的协定；所有未支付的利息被勾销，本金（539837英镑）将在30年内付清，由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管理的领事收入作担保。这些条件不负有法律义务；洪都拉斯是30年代不对外债违约拖欠的少数几个拉美国家之一。此外，该协定允许洪都拉斯政府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1928年2月，一家美国银行安排了一笔贷款，以清理主要欠那些果品公司

的公共债务。

重新获得外部资金或许能增加政府与果品公司打交道的回旋余地，但1929年12月塞穆赖的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出售给联合果品公司后，梅希亚·科林德雷斯政府就面对着两个巨大的跨国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力量对比在这一届政府期间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国会首先发现了公司行为中有数不清的不正当动作，但总统不加重视；尔后，国会又未能推翻梅希亚对一些协定的批准，这些协定使那些果品公司可在不支付报酬的条件下有权使用一些国有水域。但是，库亚梅尔果品公司的出售确实有一个理想的副作用；结束了塞穆赖与联合果品公司在这个国家的西北部租让地上的争端；1928年这片租让地曾使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几乎发生战争。1930年，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边境线于1933年由仲裁划定。

香蕉繁荣使专业化达到这样的程度：20年代末，香蕉出口占洪都拉斯出口总额的90%。此外，香蕉生产在农业产值中占有极大的比重，香蕉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对一种农作物的这种依附使经济不仅极易受到世界香蕉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还极易受到两个果品公司的全球性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因此，世界性萧条对洪都拉斯的影响非常严重，尽管这种影响被推迟到1931—1932年，因为果品公司最初决定将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洪都拉斯产区。

国际香蕉价格的下降（下降幅度不及咖啡那样大）最初没有影响洪都拉斯。由于“价格”是一个垂直一体化公司中不同子公司的帐目，香蕉出口的回收利润不受影响。但是，到1932年，这些公司试图通过减少名义工资和降低支付给独立生产者的价格来向洪都拉斯产区转嫁负担。面对着无组织的劳工们发起的一系列罢工（50年代中期以前，工会是非法的），公司在工资以外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但仍然能强制降低工资。

出口价格的人为本质使出口值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统计数

字，但进口值则因多方面的原因而在1929—1930年财政年度后开始下降。[①] 首先，由于投资计划收缩，果品公司的进口减少；第二，其他经济部门并没有免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第三，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本身在下降。由于上述因素，关税减少，政府在1932年大选前夕遇到了一个严重的财政危机。通过联合果品公司，政府同新奥尔良运河银行与信托公司安排了两笔外国贷款，但公共部门工资被"推迟支付"，这在洪都拉斯历史上不是第一次；浮动债务（未支付工资的委婉语）从1929年的零猛增到1933年的810万伦皮拉。[②]

卡里亚斯政权（1933—1948年）

在蒂武西奥·卡里亚斯最终于1933年2月1日就任总统时，他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形势。他的自由党反对派于1932年11月发动的起义尚未平息，内战的代价使梅希亚·科林德雷斯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危机更为严重。香蕉出口的下降（反过来又减少了进口）、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及所有经济活动水平的下跌，都有可能持续下去；果品公司（尤其是联合果品公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获得优惠，以弥补世界性萧条对其全球性利润急剧下降的影响。

20年代，卡里亚斯已尽力确立了洪都拉斯的代议制民主，并终止了内战周期。1932年11月发动的自由党起义表明：旧习惯尚未消失，尽管梅希亚·科林德雷斯和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安赫尔·苏尼加·韦特都没有直接卷入这次起义。面对这一挑战，卡里亚斯露出了独裁者面目，并因内战而实施了戒备状态，以对付其政

① 财政年度于7月31日结束。30年代末改为以日历年为基础。

② 根据国会的法令，伦皮拉于1926年被确定为洪都拉斯的记帐单位，尽管这个法令直到1931年才生效。伦皮拉的汇率定为1美元=2伦皮拉，以前的记帐单位（比索）自1918年起一直在同样的价值上波动。在写作本文时，伦皮拉仍然定为1美元=2伦皮拉，使洪都拉斯成为除巴拿马以外汇率稳定时间最长的拉美国家。

治对手。苏尼加·韦特被流放到墨西哥（直到1948年才回来）；首都的一些公共工程部门雇佣了一群群囚犯（他们的脚上绑着铁球），国会拥有的批评行政官员的权力不断减少，市长和市政官员的地方自主权被更大程度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所取代。

新的总统选举应在1936年10月举行，但在这一日期前不久，国会将自己改变为立宪会议，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并确定卡里亚期的任职期限延长到1942年底。这种连任制①的运用于1939年进入了新的阶段（洪都拉斯的连任制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采取的连任制相同）；当时国会把卡里亚斯的任职期限延长到1948年年底。卡里亚斯总统在位的16年终于打破了洪都拉斯的软弱政府、内战和总统快速接班的传统，尽管这是以牺牲1924—1932年期间开始形成的新生民主为代价的。

在此以前的洪都拉斯总统曾试图采用连任制，但均未获得卡里亚斯那样的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自由党的领导软弱无力，这些自由党人仍然忠于流亡在外的苏尼加·韦特，无法利用专制性质的卡里亚斯统治和萧条时期的困难所创造的机会。由贝南西奥·卡列哈斯领导的一派国民党党员因在新宪法提案上有分歧而于1936年脱离卡里亚斯，但1938年达成的卡里亚斯—苏尼加协议从未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1944年爆发的前所未有的反独裁公开示威（激发这次示威的事件类似于出现在邻国的事件）也未能促使自由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苏尼加·韦特未能获得危地马拉总统、反独裁的加勒比军团战士阿雷瓦洛的支持；反对卡里亚斯的声势最大的运动来自洪都拉斯革命民主党。该党是为了与独裁展开斗争而于1947年成立的。自由党在1948年大选中提出了曾在1932年大选中提出的那个候选人；

① 连任制（continuismo）是指一些拉美国家的行政长官在任职期满后用似乎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取得连任。由于宪法一般都规定在职总统不得连任，他会设法修改宪法，使连任合法化。——译者

该候选人因受到镇压和害怕失败而在投票前数天退出竞选。

自由党显然可以指望成为反对卡里亚斯连任制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可有把握地确定为武装力量。暴动偶尔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43年，但卡里亚斯在处理他与军队的关系方面显露出他的全部政治手腕，并开始了使军队实现专业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由他的国防部长、总统继承人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博士完成。早在1933年，卡里亚斯就为下士和中士创办了一所训练学校，并于1935年实施了义务兵役制；军官于1942年开始接受美国的训练，此前，美国和洪都拉斯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卡里亚斯于1934年购买了3架战斗机，因为他懂得空中力量在1932—1933年内战中的重要性。在这次内战中，新成立的中美洲航空公司（TACA）被用来支持政府；罗斯福政府在战争期间提供了其他重型军事装备。卡里亚斯还获得了邻国考迪罗的支持；在内战中，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为打破其政权的外交孤立而支持卡里亚斯；而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将军则为谋杀自由党革命者（胡斯托·乌马尼亚将军）和洪都拉斯主要共产党人（胡安·巴勃罗·温赖特）作出了安排。

卡里亚斯政权使洪都拉斯得到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稳定，但这是一种没有进步的秩序。不仅迈向民主的最初几个试验性步骤丧失了，而且这个国家的经济下降也证明是难以扭转的。在梅希亚·科林德雷斯政府末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中美洲仅仅次于哥斯达黎加；1934年，这一数字被危地马拉超过，1937年又被萨尔瓦多超过；当1942年被尼加拉瓜超过时，洪都拉斯成为该地区最穷的国家（也是拉美大陆上最穷的国家）。[1] 1925—1926年后，洪都拉斯每年都享受着有利的贸易顺差，这一顺差使政府得以保

① 见V·布尔默——托马斯：《1920年以来的中美洲政治经济》（剑桥，1987年），表A·3。

持伦皮拉与美元的比价。1936—1937 年，这一顺差终于消失；国内通货的缺乏迫使当局在 1942 年以后开始从美国进口纸币和硬币，以维持货币流通。[1]

这些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香蕉业从 30 年代初期的惊人顶峰向下跌落。最初，这一下降是由于果品公司为对付世界性衰退而进行调整（1934 年的涝灾加剧了这一下降），但到 1936 年，来自加勒比的香蕉叶斑病进入洪都拉斯，给香蕉种植园带来了一场浩劫。公司刚发明一种对付病虫害扩散的喷洒药，洪都拉斯就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果品公司的运输船队被美国海军征用，其结果是：洪都拉斯 1942—1943 年的香蕉出口只相当于 1929—1930 年高峰时期的 10%。如同香蕉那样，出口、进口和整个经济活动都下降。到 1943 年（最低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30 年的最高点低 36%。

尽管政府对果品公司采取了慷慨的政策，但香蕉出口的崩溃仍然发生了。卡里亚斯总统、他的国防部长（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和 1939 年后议院的议长（普卢塔科·穆尼奥斯·P）都与联合果品公司保持密切关系（加尔韦斯和穆尼奥斯是公司的律师），但标准果品公司同样能成功地摆脱协议中的义务。30 年代，两个公司紧密合作，标准果品公司泰然地接受了小伙伴的角色；土地所有权进行了交换，以实现公司财产的合理化。1941 年，联合果品公司创建了著名的泛美农学院；翌年，该公司又获得了允许特鲁克西约铁路公司将铁轨和其他装备运往邻国的特许权。这是对原始协议的公然违背。

香蕉业的衰退确实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农业多样化；30 年代，谷物、蔬菜和其他水果的产量都有增长，但

---

[1] 洪都拉斯的贸易收支对于以香蕉出口作价的价格非常敏感。自 1947 年起，常用的方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出口作价。这一市场价格如果适用于战前年份，那么每年都有贸易顺差。但 1947 年以前，洪都拉斯当局使用的价格大致与果品公司的当地货币成本相符；根据这一基础，贸易逆差首次出现在 1936—1937 年财政年度。

这一增长并不能弥补香蕉产量的下降；而且果品公司仍然对土地和北部各省的联系工具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在卡里亚斯政府的邀请下，美国于 1943 派出了一个由 E·M·伯恩斯坦率领的代表团，调查货币和信贷条件。该团的报告生动地描述了整个经济、尤其是农业的落后性。用恰如其分的缓和语气写成的这个报告要求当局重视银行体系的缺陷、重视对农业的关心不够以及重视贷款成本过高和由于没有中央银行而在货币发行中出现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①

卡里亚斯政权或许忽视了经济发展，但卡里亚斯不可能无视他从其前任手中继承的财政危机。由于自 1932 年起一直停止支付国内债务，以及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常常不能支付，卡里亚斯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通过联合果品公司，政府与新奥尔良的运河银行达成了一笔贷款协议；公共部门的薪水被减少 20%（另外还要扣除 5%，以支付给国民党）；外汇控制于 1934 年开始实施。最后一个措施是为了给国库创造外汇利润而不是弥补外汇不足（外汇仍然很充足），但这一措施同样限制了获得进口物资的途径。1934 年实施的关税同样达到了限制进口的目的，尽管次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由科德尔·赫尔强加给洪都拉斯）降低了新的贸易限制的影响。这一关税于 1983 年参照萨尔瓦多的例子予以修改，它的三个税率是为了歧视与洪都拉斯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到 1937 年，卡里亚斯感到信心十足，强行地大幅度削减内债，债权人仅获得其债券帐面值 7%的现金。这一变化以及如前所述的创收措施，使财政收支在 1937 年以后大致出现了平衡；而关税的增长则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了刺激；少数现代化的工厂也在这一时期开工。战时通货膨胀（这是进口商品稀缺和货币增长的产物）也刺激了财政收入，使政府不仅能减少外债（根据 1926 年的

① 见 E·M·伯恩斯坦等：《关于洪都拉斯货币和信贷的技术与财政代表团报告》（特古西加尔巴，1943 年）。

协定)，而且还能降低内债。

尽管卡里亚斯忽视经济发展，但他仍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卡里亚斯当政时期，交通问题开始得到解决。中美洲航空公司因在内战中发挥了作用而获得慷慨的让步；数年后，国内航空服务的发达程度居中美洲各国之首。此后，欧洲战事的爆发增加了美国在中美洲建设公路的兴趣。洪都拉斯获得了罗斯福政府提供的赠款的2/3，用于它建设泛美公路的份额；美国工程师完成了约华湖周围的公路连接点，终于使特古西加尔巴与全国铁路及北部海岸连结了起来。

西半球为取代因亚洲发生战争而中断的美国战略性进口物资作出了努力；洪都拉斯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作用。联合果品公司把一些香蕉种植园改为种植橡胶、马尼拉麻和非洲棕榈；这些计划于1945年投入生产。这个国家还为一个由美国主持的向巴拿马运河区出口水果和蔬菜的计划提供了协助。进口商品的匮乏导致林业的发展、棉花生产的开发和榨糖业的复兴（榨糖厂曾在萧条时期关闭）；所有这些产品的出口在1945年以后达到了适度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为洪都拉斯的咖啡生产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即1941年达成的泛美咖啡协定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个慷慨的配额；这个配额在战争结束时翻了一番。交通的改进、战后国际上价格的回升以及由人口压力产生的收割季节劳动力的充足，都有助于洪都拉斯成为一个重要的咖啡生产国；在卡里亚斯政权的末期，咖啡生产比最初的水平提高了一倍。随着1945年以后正常商业条件的恢复，香蕉出口也得到回升，在卡里亚斯时期，几乎达到了顶峰期的一半水平。因此，在独裁统治的最后5年，洪都拉斯经济出现了一个适度的繁荣，尽管194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战前的最高水平。

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常被划入30年代和40年代中美洲其他一些在位时间长的独裁者之列，但洪都拉斯与其他地区的考迪罗统治之间存在着差异。

卡里亚斯政权不如邻国的考迪罗统治那样专制。一些主要的自由党人仍然担任重要职务，自由党的新闻媒介一般说来被允许发挥作用，党的领袖苏尼加·韦特的流放是自愿行为。卡里亚斯的一些省长（尤其是科隆省的卡洛斯·萨纳夫里亚）是小暴君，但卡里亚斯本人从来没有像他的同辈考迪罗那样抱有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热情；洪都拉斯于 1941 年 12 月对轴心国的宣战不像有些国家那样玩世不恭。同样，卡里亚斯于 1948 年退去总统职务后并没有企图控制政治生活。虽然他残酷地平息了 1944 年出现的反对他统治的抗议浪潮，但他早在 1945 年就决定不再连选；美国的压力在这一决定中是次要的。由他挑选的接班人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在 1948 年 10 月的总统选举中无竞争对手，但他在此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于前独裁者的自主性。而且卡里亚斯还承认他在 1954 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当时国民党内出现了分裂，但没有诉诸内战。这些差异当然不能被夸大。卡里亚斯在他认为有必要时会异常残忍；在长期的独裁统治中，劳工运动得不到重视，经济下降使统治更为不利。可以说，卡里亚斯政权最好的一点是它使洪都拉斯经历了一段自独立以来最长的不发生内战的时期。

考迪罗统治使一些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与果品公司、尤其是与联合果品公司的关系仍然不尽人意；由于数不清的租让权，这些跨国公司实际上没有对财政收入作出任何贡献，但他们却以世界经济形势不利为借口，成功地逃避了协议中的大部分责任。疲软的财政状况和政府的从属作用影响了经济多样化的范围，并使经济依赖于一个似乎早已陷入结构性衰退的产业。在卡里亚斯当政的大部分时期，这些果品公司是最后可求助的放贷人，因此外国贷款常常依赖于联合果品公司的帮助。

在卡里亚斯政权末期，洪都拉斯经济的“支柱”（香蕉、矿业、外贸、铁路、空运和现代制造业）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城市

商业部门被“土耳其人”[1] 控制，而一个有希望的部门（咖啡）则由无政治影响力的中、小种植业者开发。当地的政治精英，包括卡里亚斯，把他们的经济活动限制在不受外国人竞争的牧牛业、不动产或国内贸易领域。但是，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相比，缺少土地寡头并非没有好处；洪都拉斯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工资相对高的香蕉无产者是例外）仍然可以获得土地，村社土地所有制十分普遍。卡里亚斯政权没有提供可以替代以果品公司为象征的飞地发展的选择，但至少它没有堵死所有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改革
（1949—1963 年）

1949—1954 年期间担任总统的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似乎不是担当使洪都拉斯实现现代化任务的候选人。作为联合果品公司的前任律师和卡里亚斯的国防部长，他应维持卡里亚斯政权取得的政治稳定，不应进行变革。但加尔韦斯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改革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三届政府又继续了他的工作。到1963 年，即军人夺取政权的这一年，洪都拉斯已在国民党和自由党的统治下经历了 15 年不间断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这些变革——即使以拉美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显眼的——在洪都拉斯的条件下几乎是革命性的，并使政府避免与任何利益集团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这种政治制度远非民主的，而且仍然由个人至上主义主宰，但它超脱了邻国的那种镇压性模式，不断接近哥斯达黎加的模式（在哥斯达黎加，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为得到官方的青睐而展开竞争）。

加尔韦斯在开始其为期 6 年的统治时实施了一个所得税法（为洪都拉斯历史上的第一次），该法令要求那些果品公司向政府

---

[1] “土耳其人”是来自勒旺的阿拉伯移民的称呼；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抵达时都持土耳其护照。

支付其利润的15%。虽然联合果品公司只同意接受这个姗姗来迟的改革来交换非香蕉生产活动（如马尼拉麻）的财政优惠，但这一变化是巨大的；在实施这一法令的第一年（1950—1951年），新税法提供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几乎20%，其中大部分来自那些果品公司。税收于1955年提高到30%（仿效哥斯达黎加）；果品公司不再是最后一个可依赖的放贷者。尽管公司与国家的关系仍然是非常不平等的，但所得税是增加香蕉出口回收价值的唯一最为有效的方法。

加尔韦斯还把注意力集中在1943年伯恩斯坦代表团清楚地指出的银行和金融体系中的缺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中央银行于1950年成立，垄断了货币发行和外汇交易以及确保伦皮拉的发行所必需的资金。洪都拉斯货币首次以足够的数量满足贸易的需求，而国际储备则足够保证汇率钉住美元。国营开发银行（全国开发银行）也于1950年成立，以支持在此以前一直被私人银行忽视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多样化。① 该开发银行获得的资金用于提供储存和销售设施、物质投入和技术咨询，因此放款不必仅仅限于大农场。

由于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和美国的赠款，加尔韦斯政府开始注意受到忽视的公共工程领域。为庆祝加尔韦斯就任总统一周年而发行的一本华丽的书的第一章全部用来介绍市政排水系统，这是洪都拉斯政府一般重点的明显转变。② 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公路建设领域，公路支线通过南部、西部和东部的农业边疆；铁路也得到显著的改善——铁路连接点通过特古西加尔巴将大西洋海岸与太平洋海岸联成一线。电力生产和电信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① 1948年建立了一家萨尔瓦多资本的私人银行（资本化银行）。这就终止了由大西洋银行和洪都拉斯银行垄断洪都拉斯银行业的局面，但它最初没有对经济多样化作出贡献。

② 见《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博士执政期间的工程，1949—1954年》（特古西加尔巴，无日期）。

从而为洪都拉斯提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基础设施。

洪都拉斯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传统上一直主要依赖于外国的积极性，但在加尔韦斯政府时期，一个与农业多样化和城市增长相连的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出现。银行业的改革和交通的改善提高了咖啡、基本粮食、木材和肉类的产量。南部海岸棉花生产的增长（受到了泛美公路建设的刺激）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萨尔瓦多企业家带来的，原料被送到萨尔瓦多进行轧制加工；但在全国开发银行建立一家轧棉厂后，洪都拉斯的参与增加了。农业多样化降低了香蕉的相对重要性，香蕉对出口的贡献最终于 1954 年减少到不足 50%。加尔韦斯的改革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刺激了基础十分薄弱的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尤其是圣佩德罗苏拉和特古西加尔巴的人口，远远超过全国的人口增长。1950 年，137 万洪都拉斯人中的 20%可被列为城市人口。

加尔韦斯时期的改革运动主要是发展主义性质的，完全缺乏真正的政治多元主义。卡里亚斯时期的镇压气氛得到了缓和，政治犯被释放，自由党可正常地自由活动，但加尔韦斯政府干扰了小规模的马克思主义运动，1952 年取缔了洪都拉斯革命民主党，并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努力中坚决地与美国站在一起，1952 年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法令，但工会和罢工仍然是非法的，因此洪都拉斯仍然处在国际劳工组织之外，在卡里亚斯时期，洪都拉斯于 1938 年放弃了在该组织中的会员资格。

因此，联合果品公司一家子公司的工人于 1954 年 4 月发动罢工的消息遇到了加尔韦斯政府的不加掩饰的敌视。这一起因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罢工发生在中美洲历史上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当时，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反革命军队在洪都拉斯集结，准备侵入危地马拉。此外，被取缔的洪都拉斯革命民主党中的一派成立了一个非法的共产党，因此，共产党人被指责挑起了罢工。加尔韦斯逮捕并监禁了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政府的强劲压力

下，工人们选举了新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但是这次罢工扩散到北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经济活动范围，甚至在特古西加尔巴引起了共鸣。新的工会反共领导人获得了美国劳联的支持，因此加尔韦斯政府开始敦促联合果品公司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最终于7月9日通过；数天前，阿本斯被推翻，得到美国支持的危地马拉反革命力量获得了胜利。

就狭义的经济角度而言，这次罢工是一次工人们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大规模的解雇抵销了有限的工资增长（10—15%），因为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在此后的5年内裁减了一半劳动力，以便对付生产困难和厄瓜多尔成为一个主要的香蕉出口国。但是，这次罢工使工人们的组织权利获得了合法的承认，并改变了联合果品公司反对工会存在的态度，工会常被历届洪都拉斯政府用来抵制进步性的劳工法。洪都拉斯在短期内重新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承认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而工会——在美国劳联监督下——则在北部沿海地区获得迅速发展，并很快向内地的城市中心扩散。

1954年的罢工恰巧与10月总统选举的准备工作重合。在教育学家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博士的领导下，自由党获得了新生，但国民党则因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决定再次竞选总统而陷入分裂。卡里亚斯政府时期的副总统阿夫拉姆·威廉斯另立一派，成立了全国改良主义运动（MNR），从而出现了一个由三方参加的竞争。在这一竞争中，自由党获得了体面的多数票，但不是大多数。根据由来已久的传统，失败者拒绝接受国会中的席位，法定人数难以达到；胡利奥·洛萨诺·迪亚斯自封为代理总统。他于11月16日继承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而退休的加尔韦斯的总统职位。

洛萨诺的介人最初受到了三个政党的欢迎。这一介入避免了流血，可用来为进行新的选举作准备。投票扩大到妇女；1955年颁布了劳工保障基本宪章，几乎包括了劳资关系中从最低工资到集体谈判的各个方面。同年还成立了后来发展为经济计划最高委

员会(CONSUPLANE)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奠定了经济计划的基础。这比以经济计划为提供援助之条件的争取进步联盟早得多。但是，洛萨诺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在自由选举中交权的意愿。他组织了自己的党派(民族联盟党PUN)，流放了比列达·莫拉莱斯，并于1956年10月举行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民族联盟党声称以几乎90%的"选票"获得了胜利。

另外三个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洛萨诺独裁，但它们无力阻止这一独裁。另一方面，军队有手段和动机来干预。始于卡里亚斯时期的军队职业化在加尔韦斯政府时期进一步加快；训练和装备所需资金源源不断地来自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关注危地马拉革命的安全意义。1954年，洪都拉斯与美国签订了军事援助条约，确定了两国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条约一直延续到今天。洛萨诺政权的违宪特征是对抱有宪法观念的洪都拉斯军官的冒犯。在立宪会议选举后两周，包括前总统加尔韦斯的儿子在内的由军人组成的三人执政委员会将洛萨诺赶下了台。

这次军人干预并不像内战时期的军人暴动政治。军人是作为一种体制进行干预的，是为了保卫宪法，许诺在一年内举行新的选举。此外，军人因遵守其诺言而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但是，对军人干预也付出了代价：军队要求从大选的胜利者那里获得军队的更高程度的自主性和将来在宪法危机时进行干预的权力。1957年宪法中确定的这一特权地位说明了过去30年中洪都拉斯政治制度的独特性。

1957年9月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使自由党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比列达·莫拉莱斯在这年年底通过间接选举就任总统——三年前他在直接选举中几乎获胜。在就职以前，他被由军人组成的三人执政委员会派往华盛顿任职；他还打消了美国对他的恐惧，因为他曾被指控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新总统不厌其烦地迎合军人，大部分军官的职位是卡里亚斯和加尔韦斯领导下的国民党赐予的。军队中的一部分人对比列达·莫拉莱斯的疑心是总统同意根

据1957年宪法与军人分享权力(出现争端时由国会解决)的原因。

比列达·莫拉莱斯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1957—1963年)目睹了其前任实施的改革计划获得重要的发展。他的十分热情的支持者声称:比列达·莫拉莱斯将社会民主引入洪都拉斯,并为真正的政治民主奠定了基础。但是,比列达主义从来没有彻底超脱自独立以来一直困扰洪都拉斯政治的个人至上主义;总统更关心卡斯特罗的古巴对西半球安全的威胁,而不太关注邻国的反革命专制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威胁。自由党仍然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各派组成的混合体,其特征主要是由掌权的个人作决定。这样,比列达主义不能挽救比列达·莫拉莱斯;该党不得不等待几乎20年后才遇到的一位新的自由党领袖,他有权将其个人性格铭刻在党的机器上。

比列达政府用多种方法扩展了始于1954年香蕉罢工的社会改革。1957年的劳工法包括和延伸了1955年的劳工宪章;在两次未成功的尝试之后,社会保险法于1962年实施。它所涉及的范围最初限于中心区的工人,但社会保障的原则已被确立,在此后的20年中,受惠的劳动力持续增长。几乎所有劳资纠纷都通过劳工法确立的协商程序得到解决。1958年通过的工业发展法促进了工业发展;该法令向新企业提供了财政优惠。洪都拉斯还于1958年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签订了三方协议;该协议为地区内贸易降低了关税,并为1960年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开创了先例。

在比列达·莫拉莱斯时期,制造业迅速增长,保持了前10年的增长率。1948年(即卡里亚斯政权的最后一年)至1963年(即比列达·莫拉莱斯执政的最后一年)期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4%,外国的参与并没有居主导地位。但在比列达就任总统的这几年中,洪都拉斯经济则是困难的;50年代后半期,技术问题困扰着棉花生产;朝鲜战争后咖啡价格的下降影响了咖啡种植业的扩大,在增加向美国出口肉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1960年后洪都拉斯获得了一部分原来美国给予古巴

的食糖配额，从而促进了糖的出口，但香蕉业的持续困难犹如一块磨石，悬在洪都拉斯经济的脖子上，从而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大大低于邻国的增长率。洪都拉斯成了中美洲和拉美大陆最穷的国家。

1960年以后，两家果品公司都试验了抗病虫害的香蕉品种，因此这一种植业的财富开始复兴。但是，1954年罢工后采取的大规模解雇没有停止，香蕉工人的失业遂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在果品公司交还的闲置土地上进行了农民垦殖计划的试验，但香蕉区域的社会动乱没有停止；这一区域以外的许多家庭获得土地的途径受到了农产品出口多样化发展（尤其是牧牛业和肉类出口）的制约。在被解雇的香蕉工人的支持下，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农民联盟——洪都拉斯全国农民联合会（FENACH）问世，它迫切要求对土地占有制进行激进的改革。1962年，政府作出反应，由全国土地委员会（INA）实施土地改革法，而美国劳联和反共的地区性劳工协会（美洲区域工人组织，ORIT）则迅速行动，通过建立一个对立的农民联盟（洪都拉斯全国农民协会，ANACH）来反击洪都拉斯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影响。土改法没有受到果品公司的热烈欢迎；它们强迫通过了一些更加有利于其利益的修正条款，但土改措施仍然停留在法律全书这一步上，从而提供了一个安全阀；这个阀门可在往后几年中视社会条件而决定开启或关闭。洪都拉斯的土改从来不是激进的，但它总是超出了对争取进步联盟所作的象征性让步，因此最终仍然涉及重要的一小部分农民。

比列达·莫拉莱斯害怕古巴革命的后果，但他的政权面临的真正威胁则来自传统右派。一系列小规模的暴动最终于1959年7月发展为一次造反，后被艰难地平息了下去。为了报复，总统创建了独立的公民卫队，由总统控制（它不像国家警察那样由军队控制）。2500多人的公民卫队常与军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军队与自由党政府的关系严重恶化。在自由党将莫德斯托·罗达斯·阿

尔瓦拉多作为该党参加1963年大选的候选人时，军队与政府的不和进一步加剧。罗达斯是苏尼加·韦特40年代期间的门徒，也是一位出名的反军国主义同情者。由罗达斯派统治6年的前景难以被许多军官所接受，因此，军人在空军上校奥斯瓦尔多·洛佩斯·阿雷利亚诺的领导下，在总统同意解除公民卫队的武装后不久，推翻了比列达·莫拉莱斯。这距既定的大选日期仅10天。

军人统治（1963—1982年）

洛佩斯·阿雷利亚诺领导的军人政权没有得到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承认（在政变发生时，比列达·莫拉莱斯曾求助于肯尼迪）。但是，这一新政府的反共立场在肯尼迪遭暗杀后使林登·约翰逊政府变了心。这一第二次军人干预完成了军队的体制变化，并进一步肯定了军队在洪都拉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角色。

这次政变的真正原因是军队担心罗达斯在大选中获胜。罗达斯已使自由党作出保证：修改1957年宪法和重新确立文人对军人的控制。罗达斯和比列达·莫拉莱斯都被流放，前者通过其组织良好的罗达斯派而保持着对自由党的忠诚；后者的公民卫队被取消，由军人控制的警察组织（特种保安部队）取代。军人政府的反共并不完全是为了赢得美国支持而设计的花言巧语。共产党人帮助建立了洪都拉斯全国农民联合会，并已渗入标准果品公司工人统一工会（SUTRASFCO）。新政府迅速宣布洪都拉斯全国农民联合会为非法，并清洗了标准果品公司工人统一工会，对其他劳工运动则强制实行限制。在中美洲地区范围内，洛佩斯·阿雷利亚诺与邻国的军人政府联合起来，成立了中美洲防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联防条约，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1965年，洪都拉斯为支持美国侵人多米尼加共和国而派出了军队。

这些行动以及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资金不足和对土改的重视不够，进一步肯定了新政权的保守性质，并因此而获得了传统的土

地所有者的大力支持。这种联合如出现在邻国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或许足以维持对事态的严密控制，但在洪都拉斯，这种联合象征着一种相对软弱的结合。确实，直到1966年，随着洪都拉斯全国农业联合会（FENAGH）的建立，土地所有者才确立了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体制代理人。但是，洛佩斯·阿雷利亚诺有能力通过与国民党进行一种战术上的结合来巩固其权力控制。这时，国民党已被里卡多·苏尼加·A联成一派。他看到了一个向其对手自由党报宿怨的机会。两党之间的这种联合所具有的战术上的和机会主义的性质因以下事实而显得尤为重要：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已组成了一部分执政委员会，它为1957年的自由党政府铺平了道路；在这一政府中，他担任了国防部长。[①] 但是，与国民党建立的新的联合在表面上是有效的，发挥了使洛佩斯的统治合法化的作用，尽管1965年的立宪会议选举受到了舞弊和强暴战术的破坏；这种强暴战术是曼查布拉瓦一手指挥的，它是一个与国民党和军队保持联系的、时隐时现的准军事组织。在议会占据着大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颁布了新宪法，确立了军队的自主权，并立即选举洛佩斯·阿雷利亚诺（现已晋升为准将）为任期6年的总统。

洛佩斯最初与传统的地主和洪都拉斯社会中最保守的成分站在一起，不仅使他遇到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新出现的工业团体的反对。几年后，这两个团体具有了共同的事业，并结成了有力的联盟。机会主义者洛佩斯准备与这一联盟进行谈判。这就改变了洪都拉斯政治忠诚的性质：70年代的军人统治获得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几乎又是民众主义的特点；这一特点与60年代的保守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即使在60年代，军人政府也仍然避免了在邻国非常明显的反动专制主义。前届政府在财政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被允许保留，有时甚至被深

① 最初他并不是执政委员会成员，但于1957年加入。

化。[1]

将共产党人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清洗出去这一行动壮大了与美洲区域工人组织保持联系并受到美国支持的“自由和民主的”工会。1963 年政变发生后不到一年，全国性的洪都拉斯工人联合会（CTH）成立，将北部海岸的香蕉工人、中心区的工会和洪都拉斯全国农民协会中的农民联合了起来。受到清洗的标准果品公司工人统一工会也加入了洪都拉斯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隶属于美洲区域工人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新的联合会受到了南部沿海地区组织起来的、得到天主教教会支持的社会基督教农民协会的一些竞争。但这种竞争不足以构成对其全国范围内霸权地位的挑战。

1963 年 10 月的政变与洪都拉斯出口农业的复兴同时出现。由于采用了新品种，香蕉生产直线上升，而棉花、咖啡、牛肉和食糖则都得益于世界价格的上升和宽松的信贷。为了维持这一增长，对新土地的需求开始增长，从而使地租增加，并在获得村社土地和国有土地方面导致了冲突。农民组织要求政府重新实施土改计划（自政变以来几乎陷于停滞），并开始实行侵占土地，以支持其主张。

鼓动农民的中枢是土改机构全国土地委员会。5 年内（1962—1966 年），该机构仅向 281 户家庭分配了土地。为了降低其政权不得人心的程度而作出姿态，洛佩斯于 1967 年任命里戈韦托·桑多瓦尔·科雷亚为全国土地委员会负责人。桑多瓦尔还被指派为负责全国计划工作。这被证明是一个高明的行动，因为桑多瓦尔在推动土改时成立了常常能生产出口农作物的合作社，因而没有引起全国农业联合会或果品公司的过度反对。[2]这样，得到改革的部

---

① 例如，洛佩斯政府于 1963 年 12 月实施了 3%的零售销售税。这在中美洲各国政府中是首例。

② 这些合作社于 1970 年由洪都拉斯土改合作联合会（FECORAH）组织；它们常常能从国家银行体系获得财政援助，有时还将其产品出售给果品公司，供市场销售。

门没有损害受到政府赞赏的出口导向模式；获得的土地大部分来自村社或国有土地的“回收”，而非来自私人庄园的没收。

全国土地委员会和土改计划的恢复减缓了农村地区的紧张，但城市中对政权的不满则不断增长。洪都拉斯加入中美洲共同市场，影响了政府从进口关税中所得的收益，进口关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加入还迫使洛佩斯政权采用新的税收。这些新税收主要压在城市地区，因而于1968年诱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当时，政府对消费品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税收，并对来自地区外的进口提高课税（以配合其他中美洲国家）。发动一次总罢工的号召却遇到了戒严；这一戒严立即迫使总罢工被取消；但这一罢工密切了洪都拉斯工人联合会与洪都拉斯私营企业理事会（CO-HEP）实业家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这些实业家也反对政府经济政策中的许多特色。工人和城市资本家都是60年代洛佩斯赞赏的经济政策的受害者。他们之间不可能出现的联盟使洪都拉斯的财产所有者阶级中出现了分裂，并阻碍了政治精英中一个统一的反劳工政策的巩固。

实业家的主要基地在圣佩德罗苏拉。他们对中美洲共同市场似乎歧视洪都拉斯的方式表示不满。虽然自从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后洪都拉斯向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的出口获得了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其他成员国向洪都拉斯出口的增长要小得多。因此，洪都拉斯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的贸易60年代初出现了逆差，并在此后年年扩大。此外，洪都拉斯对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出口许多都是农产品，其价格与世界市场上通行的价格并非不相符，然而来自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进口却由工业品构成，其价格反映了中美洲共同市场所有成员国实施的高昂的共同对外关税。实业家们争辩说，洪都拉斯为获得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会员资格付出了高昂代价；竞争规则必须加以修改，以服务于弱小成员国的利益。

由于洛佩斯政权与传统农业利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初它没有注意实业家们的抱怨。这些实业家早在1965年就已崭露头

角。与中美洲共同市场贸易的逆差须用美元支付，60年代前半期农产品出口的繁荣提供了足够的外汇。但这种状况即刻发生了变化，因为1965年后棉花出口因价格下跌而开始下降，香蕉出口则于1962年达到最高点。这时，外汇更为稀缺，因此政府加入了要求洪都拉斯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内获得特殊照顾的大合唱。

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国并非对洪都拉斯的那些要求置若罔闻，因此，到1969年3月，达成了一个为该地区制订财政刺激体系的协定；该协定允许洪都拉斯提供特殊的优惠，以便在制造业部门吸引外国和本国投资。但是，这一让步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与萨尔瓦多发生战争后，洪都拉斯于1970年12月退出了共同市场，并开始分别与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谈判签订非互惠的双边贸易条约。①

1969年7月与萨尔瓦多的战争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对中美洲共同市场运转的不满只是其中之一。几十年间，萨尔瓦多人一直在移居洪都拉斯，以寻找土地和工作，但19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洪都拉斯的估计为30万移民中，2/3是1950年以后到达的。萨尔瓦多人向外移居的最主要原因是渴望获得土地，但洪都拉斯的土地压力仍迅速上升，从而使小农场（占地不足1公顷的农场）和无地工人不断增多。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未解决的边境争端加剧了在获得土地方面的紧张（大部分边界当时尚未确定）；但洪都拉斯全国土地委员会于1969年3月宣布土改计划的好处只限于那些在洪都拉斯出生的人，还宣布没有合法产权的萨尔瓦多人将被驱逐，这就等于火上加油。围绕着两国之间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的极端民族主义热情就成了触发因素。萨尔瓦多军队对其同胞被驱逐作出了反应，于7月14日侵入洪都拉斯。

这次战争都没有使谁增添光彩。由于美洲国家组织的及早干

---

① 这些条约允许洪都拉斯免税进入其他国家，同时准许洪都拉斯向来自这些国家的进口课以关税。但在整个70年代，与萨尔瓦多的贸易始终未进行。

预，从而使洪都拉斯军队免于遭受一次难堪的丢脸。双方同意停火，但外交关系被破坏，边界仍然对正常贸易关闭，影响了萨尔瓦多向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出口。虽然洛佩斯·阿雷利亚诺的空军进行了一些出色的表演，直接打击了阿卡胡特拉的萨尔瓦多石油冶炼设施，但总统的权力却因战争而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次战争为酝酿已久的洪都拉斯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催化剂。

这次战争在洪都拉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团结感情，政治、商业和劳工等组织（除共产党以外）都对爱国主义号召作出响应。战争后数月，私营企业理事会召开了一次“有生力量”的会议，吸引了商业和劳工领袖以及官方要员。这次会议导致了与总统的非正式接触；他仍然抱着其连任总统的希望。整个1970年讨论持续进行；年底达成了一个政治协议。根据该协议，传统党派应团结在1971年大选的唯一非政党候选人周围，使这次大选带来一个民族团结的政府。

这一协议使洛佩斯感到满意；他将主管军队，但这一协议未能满足传统党派的要求。因此这一协议被修改，以允许党派之间为总统职务进行竞选，胜者应保证根据功绩而不是根据党派关系来任命政府官员。但即使这样，对于自由党和国民党来说也是过分的；因此，1971年3月的大选前一天，这一协议再次被修改，以允许政府的高级职务在两个主要党派之间平分。但是，“全国团结政治计划”（或称作广为人知的“协议”）仍然使新政府保证实施“有生力量”会议制订的改革计划。

这次大选的得胜者是国民党候选人拉蒙·埃内斯托·克鲁斯，他获得了49.3%的全民选票。年老的克鲁斯博士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律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气质上，他都不适合于领导一个保证进行广泛改革的民族团结政府。一位保守派人士取代桑多瓦尔·科雷亚成为全国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人；农民暴动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国民党集中精力确保该党对国家官僚的控制，里卡多·苏尼加占据了政府和司法部长的关键职位。很快就表明：新政

府难以摆脱传统党派之间对抗的局限性。对文人传统的尊重受到严重削弱。出于对“协议”的最初目标的支持，工人运动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相威胁。因此，1972 年 12 月 4 日，军队进行了干预，洛佩斯·阿雷利亚诺再次成为国家元首。

民族团结政府的跨台削弱了两个传统党派的声望，从而使军队自由地发展它与私营企业理事会和劳工运动的非正式联盟；在军人统治的第一阶段（民众主义阶段），私营企业理事会和劳工运动的利益都受到了鼓励。1972 年年底以前实施的第 8 号法令规定了闲置土地的转让或强制性出租；地主组织（全国农业联合会）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并成功地强行修改了土改法，但土改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最初 2 年内（1973—1974 年），11739 户家庭获得好处。1975 年 1 月 1 日颁布的新土改法使这一进程向前跨出了一大步，确定了私人拥有土地量的最高限额，并对确定闲置的土地或使用率不足的土地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标准。然而，延误实施这一法令还是为一些大地主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分散土地、提高效率和逃避对他们实施这一土改法。

第二届洛佩斯政府虽然受到了秘鲁军队的改良主义试验，因此还重视在中美洲共同市场结束后的环境中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1974 年 1 月发表的 15 年发展计划要求政府参与第一产业部门以及与私营企业理事会共同经营新的工业企业。多种类型的准国营企业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企业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并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由于来自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竞争大大减少，以及受到了国家的支持，制造业部门迅速发展，并于 70 年代增大了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在洪都拉斯森林开发公司（COHDEFOR）的严密监督下，这个国家丰富的森林资源得到不断开发。

军队在与萨尔瓦多的战争中表现不佳。洛佩斯将军的民众主义暴露了他从这一不佳表现中继承的地位虚弱。支持改革计划的低级军官为创建一个新的指挥结构而进行鼓励；这个指挥结构是

为了与国家元首分享权力而创建的。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CON-SUFFAA）于1975年3月重新改组，并利用洛佩斯将军暂时不在国内的机会，任命胡安·阿尔韦托·梅尔加·卡斯特罗为军队负责人。洛佩斯仍然是国家元首，但一个月以后，他也被迫辞去这个职务，因为《华尔街时报》报道说：他获得了联合果品公司（当时已改名为联合商标公司）的一笔贿赂，以保证政府降低香蕉出口国联盟（UPEB）规定的新的香蕉出口税（洪都拉斯是香蕉出口国联盟的成员国）。

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的权力现已牢固确立，它任命梅尔加·卡斯特罗为国家元首——他的军队负责人职务由波利卡波·帕斯·加西亚上校取代。军人统治的集体性质现在已十分清楚，国家元首被降低为同等职务中的第一位。这一变化是重要的，因为与国民党站在一起的梅尔加·卡斯特罗具有保守的本能，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赞同改革计划的动力仍然很强大。因此，梅尔加·卡斯特罗任命桑多瓦尔·科雷亚为全国土地委员会负责人；土改计划一直持续到1977年桑多瓦尔辞职。此后，土改的进展速度非常缓慢。

关于联合商标公司的贿赂丑闻为洪都拉斯政府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与联合果品公司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民族主义感情不断高涨；政府控制了北部海岸的码头，建立了自己的香蕉销售机构洪都拉斯香蕉公司，从果品公司那里获得了铁路，根据土改法将果品公司的土地没收，并对这些跨国公司课以新的出口税。这些果品公司，尤其是联合果品公司，不能争辩，这主要是因为30年的出口多样化已降低了这些公司的重要性；70年代末，出口的比重下降到25%。但是，果品公司并没有垮台；它们设法击退了来自洪都拉斯香蕉公司的挑战，在国际香蕉价格疲软时就降低出口税进行了谈判。

在梅尔加·卡斯特罗时期，军队开始重视苦恼的还政于民问题。1976年初成立的总统咨询委员会负责起草适用于立宪会议大选的选

举法。把权力交还给信誉不佳的文人这一做法使军队出现了分裂；在土改和其他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上，军队也有分歧。关于对高级官员参与毒品走私和其他不正当行为的指控为再次更迭政府提供了合法理由；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于1978年年中进行了干预，由帕斯·加西亚领导的三人执政委员会取代梅尔加·卡斯特罗。

新政府对农业、财政和社会等各项政策中出现的成绩毫无同情心，也没有实施新改良主义计划的愿望。它的首要任务是在军队可接受的条件下实现和平的还政于民政策。这一任务因邻国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出现社会动荡而显得更为迫切。由于卡特政府也对还政于民施加压力，立宪会议选举遂定于1980年4月举行。

1980年立宪会议选举标志着向文人统治过渡的开始和近20年直接军人政府的终止。60年代的特点是非常严重的行政管理的无能（例如，许多外国赠款并没有拨付），70年代则以腐败和官方丑闻而著称。但是，长时期的军人统治证明了洪都拉斯的社会和经济指数从60年代初期深不可测的低水平中获得了持续的进步。[①] 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军人在放弃直接统治时，其名望未受损害，而且放弃统治的条件能为最高指挥部所接受。

人们指望立宪会议选举会产生一个保守的多数，因为军人与国民党合作的时间几乎长达20年。但是，莫德斯托·罗达斯·阿尔瓦拉多于1979年年底去世后，军人与自由党合作的一个巨大障碍被消除了。虽然罗达斯派在罗伯托·苏阿索·科尔多瓦统治时期生存了下来，但它失去了反对军人的特点；自由党的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劝说高级官员不要担心文人会重新控制军队。三人执政委员会不再偏爱两个传统党派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苏阿索·科尔多瓦领导的自由党取得了选举的惊人胜利。立宪会议规定：总

---

① 1961年至80年代初期，成年人口中的文盲率从53%下降到40%；城市化从23%上升到37%；平均寿命从44岁增加到62岁。

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为期4年。在1981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的苏阿索·科尔多瓦以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战胜了国民党的里卡多·苏尼加。[1] 因此，1982年1月，苏阿索·科尔多瓦成为命运不佳的克鲁斯博士以来第一位文人总统。

1982年以来的文人统治

向文人统治的转变是在军人可接受的方式和条件下进行的；军人获得了大量自主权，继续在80年代以崇高的形象出现。苏阿索·科尔多瓦当选后，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马丁内斯将军被任命为军队首脑。这一任命使一个具有明显专制倾向和强烈反共信念的人获得了权力。阿尔瓦雷斯帮助建立了洪都拉斯争取进步协会(APROH)，这是一个具有阶级合作主义（几乎是法西斯）特点的组织。在苏阿索·科尔多瓦执政后的最初两年内，阿尔瓦雷斯不断地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文人政府无力抵抗，但阿尔瓦雷斯的勃勃野心以及他显而易见地想把洪都拉斯拉入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的战争中去的愿望，引起了他在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中的同事们的不安。在一次迅速和周密安排的行动中，阿尔瓦雷斯于1984年3月被流放；空军司令瓦尔特·洛佩斯将军取代他而成为军队首脑。此后不久，洪都拉斯争取进步协会解散，另一阶段的直接军人统治的危险化为乌有。但重要的是，如同1956年那样，军队保存了宪法统治，文人政府仅仅是旁观者而已。

治安形势的恶化自然会更加促使军人不愿意在1980年选举后退回军营。萨尔瓦多内战将数以千计的萨尔瓦多人重新赶过边界，进入洪都拉斯成为难民；而萨尔瓦多游击队则利用一片洼地（边界地区有争议的非军事化地区）重新部署其兵力。美国担心萨

---

① 弱小的基督教民主党（1970年成立）和洪都拉斯爱国阵线（左翼团体的广泛联盟）没有被允许参加1980年11月的大选。只有弱小的革新党（PINU）被允许与国民党和自由党开展竞争，该党是在民族团结对话中于1970年成立的（它仅获得3.5%的选票）。但基督教民主党和爱国阵线都获准参加1981年11月的总统选举。

尔瓦多游击队取得成功。这一担心使寻求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和平条约努力重新受到重视。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毫无成效地寻求这一和平条约。该条约以异常快的速度于1980年12月签订，使边界线留在以后确定，从而为两国军队在击败游击队的合作中铺平了道路。[1] 萨尔瓦多游击队运动在洪都拉斯产生了一个不大的回声，因为3支小规模的游击队在一系列绑架、劫持和银行抢劫中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它们不是治安力量的对手，并且缺少民众的支持；虽然洪都拉斯的民主呼声远非完美无缺，但它为改良和和平变革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进行改良和变革是为了使人们（除最坚决者以外）不参加游击队运动的行列。到1984年，游击队的威胁实际上已烟消云散，仅在边远的东部莫斯基蒂亚地区的若干省份中有时出现。

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反对者构成了对安全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具有两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与尼加拉瓜的边界线是根据国际法庭的裁决于1960年确定的，但崎岖的地形和道路的缺乏不可能进行边境巡逻。1979年7月索摩查倒台后，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的残余人员穿过边界，进入洪都拉斯境内，最初对仅仅出于报复而越界袭击感到满足。但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的巩固和桑地诺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海岸省份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使"反政府武装"的人数在1980年和1981年期间日益增加，并因他们在洪都拉斯领土上的存在而在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之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紧张关系。

"反政府武装"人数的增加恰好与尼加拉瓜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相吻合。里根政府于1981年11月决定授权中央情报局采取反对桑地诺的隐蔽行动，并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其表面上的目的是要阻止尼加拉瓜通过洪都拉斯向萨尔瓦多暴乱分

---

① 该条约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定所有长度的边境线。如果该委员会的成员5年后未能达成协议（果真如此），这一边界争端将提交国际法庭仲裁。

子提供军火，但真正的目的是要破坏桑地诺政权。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开始与洪都拉斯军队联合进行一系列演习；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为在复杂的洪都拉斯地形中打仗而进行了训练，因此建立了一大批军事基地。

美国地缘政治重点的逻辑没有为巩固洪都拉斯的文人统治提供机会，尤其是因为华盛顿在洪都拉斯的主要盟友是阿尔瓦雷斯将军。他与里根政府一样，对桑地诺政权的巩固深表关切。1984年阿尔瓦雷斯的下台没有终止洪都拉斯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但是重点有所改变。设在卡斯蒂利亚港用来训练萨尔瓦多军队的美国军事基地被关闭；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被迫采取一种低姿态。洪都拉斯军队的新领导人或许与阿尔瓦雷斯一样不喜欢桑地诺分子，但他们不准备与更为强大的尼加拉瓜军队进行战争。在苏阿索·科尔多瓦总统任职期间，他软弱无力地声称洪都拉斯土地上没有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基地。这一与证据完全相矛盾的否认没有为洪都拉斯在国际上赢得多少尊重，尽管国际社会也无能为力。

由于里根政府即将届满，以及中美洲政策处于混乱之中，洪都拉斯政府感到有能力更为显眼地表明其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立场。作为自由党候选人赢得1985年年底总统大选的何塞·阿斯科纳·奥约，[①] 最初仅把其要求限于请求派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在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的边界线上巡逻；但1989年初，洪都拉斯政府感到有能力与其他中美洲国家一起，根据阿里亚斯和平计划，要求解除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武装和结束美国对“非

① 1985年4月，苏阿索·科尔多瓦因首先试图连任总统、尔后又试图指定其继承人而触发了一次宪法危机。这次危机只是在军队施加强大的压力以后才得到解决。在1985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自由党提出4名候选人，国民党提出3名。自由党获得了一个可疑的胜利，因为自由党的主要候选人（何塞·阿斯科纳·奥约）获得的选票少于国民党的主要候选人（拉斐尔·莱昂纳多·卡列哈斯）。阿斯科纳被宣布为胜者，因为4个自由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超过3个国民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阿斯科纳于1986年1月接替苏阿索·科尔多瓦任总统。这是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总统继任另一位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总统。

正规军”的军事支持。

美国对桑地诺分子的压力以及在洪都拉斯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使软弱的洪都拉斯文人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质上无自由可言。因此，只有在国内政策方面，文人政府才能确立其个性；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陷于停滞的改革计划获得了一些重视。根据土改法进行的土地分配重新开始，尽管这一计划（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重点是向产权不稳固的农民提供所有权。但是，政府进行重要改革的机会受到了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经济衰退与文人执政同时开始。外部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一赤字的弥补方法是以高额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向国外借款。70年代大部分时期内控制在可以忍受的水平上的公共外债，现在已成为经济的沉重负担；资本外逃（主要是对不断恶化的地区性危机的反应）加剧了国际收支问题。即将离任的军政府曾于1980年2月和1981年8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备用协议，① 但由于当局未能达到压缩公共部门赤字的资金目标，②这两个协议都被终止。

在实施调整和稳定政策方面，苏阿索·科尔多瓦政府证明比其前届更为成功，虽然实施这些政策要求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针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确定的重点。但当局坚持要求维持伦皮拉与美元的比价，尽管美国的赠款机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就使得非传统出口产品相对而言缺乏竞争力，并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利用“加勒比地区倡议”③ 提供的机会，但它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率。在邻国，通货膨胀加剧了社会紧张。

---

① 如欲了解更多的细节，参阅V·布尔默—托马斯：《中美洲的国际收支危机和调整计划》，载R·索普和L·怀特黑德编著的《拉美债务危机》（伦敦，1987年）。

② 备用协议又叫备用（信贷）安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会员国备用信贷的安排。——译者

③ “加勒比地区倡议”由里根总统于1982年宣布，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该倡议，大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一系列非传统出口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可享受为期12年的免税优惠。

在衰退最严重的年份（1982—1983年），洪都拉斯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远不如其他中美洲国家那样严重。确实，1983年以后（在美国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帮助下），增长率的适度回升使这个国家缩小了它与其他中美洲国家之间的一些差距。到1988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可与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相比（在这两个国家，内战招致的损失惨重），但仍然大大低于拉美平均水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激励下，苏阿索·科尔多瓦政府以及此后的阿斯科纳·奥约政府勇敢地处理了财政形势恶化的问题，将政府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到1987年的16.3%，这一税收努力可与一些主要拉美国家相比。[1] 但洪都拉斯无法既创造足够资源来偿付外债又不损害支持改革的种种努力，因此，1989年初宣布暂停支付外债。

因此，在困难的80年代，洪都拉斯仍然保留了贯穿于加尔韦斯政府以来整个历史的改革主义思路。或许除了洛佩斯·阿雷利亚诺时期的民众主义阶段（1972—1975年）以外，改革的步伐总是不快，而且不时出现停滞，但改革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在劳工政策、社会法令、土改和财政努力等问题上，70年代末的洪都拉斯与其中美洲邻国之间有着一种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为洪都拉斯避免此后发生的地区性危机提供了一些免疫力，尽管这个国家难以逃脱来自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这两个震中点的所有震波。

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国家在实施一揽子改革计划时都失败了。落后的洪都拉斯在实施这一计划方面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农业—工业结构。由于缺乏本国强有力的地主寡头，外国资本（尤其是那些果品公司）遂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洪都拉斯各社会阶级能在击败果品公司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团结一致（这一点很能说明为什么1949年的所得税和1954年的劳工法

① 见美洲开发银行：《经济和社会进步报告：拉丁美洲》（华盛顿，1988年），表C—1。

能成功地实施）。当无法得到替代性资金来源以及香蕉在经济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时，软弱无力的洪都拉斯政府根本不是果品公司的对手。但是，战后时期出现了新的外国借款来源（如世界银行）以及可以通过发展咖啡、棉花来实现经济多样化。

如果华盛顿与那些果品公司站在一边（阿本斯时期的危地马拉就是如此），那么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将更加困难。但是，自从1910年出现灾难性插曲（当时的美元外交被萨姆·塞穆赖挫败）以来，国务院始终对设在洪都拉斯的那些果品公司持有偏见。在加尔韦斯时期，冷战不能成为优待那些果品公司的理由；1954年，美国司法部对联合果品公司提出了反托拉斯的民事起诉。1954年后，由共产党人参与的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对华盛顿的冷战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但是，历届洪都拉斯政府表明，它们与任何一届华盛顿政府一样，都热切希望将马克思主义者从有影响力的职位中清除出去：洪都拉斯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认识到这一点，即“自由和民主的”劳工运动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洪都拉斯全国农业联合会的建立象征着战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出口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对60年代中期的改革计划构成了威胁，但在那时，劳工运动已在反共主义者的领导下牢固地确立；这个新出现的工业阶级与全国农业联合会为获取政府的青睐而展开了竞争。这就使得政府不能与农产品出口者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这在邻国是一个大问题）。

洪都拉斯改良试验的失败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民主领域。政治制度具有许多弱点，尤其是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而且这个制度还缺少作为一种充分发挥作用的民主体制的可信性。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相比，洪都拉斯的问题不能被看作是民主进程吸纳了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因为民主进程在洪都拉斯的重要性是微乎其微的。洪都拉斯政治由两个政党及各个敌对宗派组成的松弛的联合阵线所垄断；这些宗派信奉个人至上主义，只是由于权力的诱惑和为了获取官职而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被证明是无

法与时代同步前进的，因此仍然是总统有效领导权的障碍。80年代还政于民以后，洪都拉斯的民主事业并没有得益于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地缘政治重点使洪都拉斯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一个抵御桑地诺分子的战略堡垒。自1983年起，美国的军事存在成为半永久性。这一存在使美军在反暴乱战略方面与洪都拉斯军队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政府中的文官。对安全的强调加强了军队在内部事务上的重要性，而在这个时候，民主的巩固要求军队回到军营中去。虽然军队在1984年以后也尊重宪法，并让文人政府主管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许多方面，但洪都拉斯的政治进步仍然是脆弱的。

第7章

1930年以来的尼加拉瓜

1930年，即从西班牙手里取得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尼加拉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令人怀疑的。自1912年以来，尼加拉瓜几乎一直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占领，因此实际上已丧失了其政治独立性；确实，少数言论赞同被美国吞并。由于美国官员负责大部分财政金融政策，尼加拉瓜也丧失了它的财经自主权。经济相对疲软。出口部门（以咖啡、香蕉、木材和黄金为基础）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但缺少邻国所具有的活力：出口收入每年仅为1000万美元。因此，只有68万人口的尼加拉瓜人均收入在中美洲是最低的。政府资金的匮乏阻碍了公共教育的发展，因此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而且，民族一体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濒临加勒比海的东部省份与首都马那瓜之间仍然没有公路或铁路相连；大西洋海岸地区说英语的居民（他们同英国的正式联系一直到1894年才告结束）继续将尼加拉瓜西部的“西班牙人”视为一个外国的代表。

美国的军事占领

由于位置和非同一般的地理特征，自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最初时期以来，尼加拉瓜一直引起外部力量的兴趣。在独立后的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感兴趣的各方认为，未来连接两大洋的运河理所当然地会穿过尼加拉瓜，因为圣胡安河和尼加拉瓜湖很容易通航，主要建筑工程只需凿通尼加拉瓜湖与太平洋隔开的狭窄陆

地。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使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单方面对运河的控制。在此以前，这两个大国为控制这一运河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但是，根据1901年的海—庞斯福特条约，英国承认它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已经削弱，并将控制和保护开凿运河的特权完全让与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3年承认巴拿马独立以及在该地建筑一条运河（1914年完工）都没有减少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地缘政治兴趣。相反，邻近巴拿马诸国的稳定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因此，阻止竞争对手获得穿过尼加拉瓜任何运河路线的控制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放弃修筑一条由美国控制的尼加拉瓜运河的想法。确实，30年代初以前，勘探工作不时进行。

因此，与尼加拉瓜自由派总统何塞·桑托斯·塞拉亚（1893—1909年在任）的关系对美国国务院来说有着特殊的兴趣。塞拉亚对活跃于尼加拉瓜矿业、木材业和香蕉种植业中的美国企业家提供了慷慨的让步，但他与美国国务院的关系则十分紧张，其原因是他干涉邻国（尤其是洪都拉斯）的事务，并在可能开凿一条尼加拉瓜运河问题上拉拢德国和日本。因此，当1909年尼加拉瓜东部沿海地区的保守派发动起义时，美国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政府很快就利用这次起义，迫使塞拉亚下台。但接班人问题并非一帆风顺，内战爆发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12年进驻尼加拉瓜。

海军陆战队的到达标志着美国以军事手段干涉的进程；这一进程始于1910年10月，当时美国驻巴拿马公使托马斯·C·道森被派往马那瓜。1911年签订的道林协定认为尼加拉瓜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是财政稳定，并且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美国的监督这种稳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开始了美国对尼加拉瓜财政事务的长期干涉；这种干涉没有因30年代的睦邻政策而停止，直到40年代才最后结束。国务院通过许诺一笔1500万美元的美国银行贷款，获得了它在尼加拉瓜的政治盟友们对财政干预的支持。这笔贷款的期限和条件已由1911年的诺克斯—卡斯特里略条约确定。

但美国参议院在三个场合否决了这个条约，因此尼加拉瓜政府只能获得为数不大的150万美元临时贷款，而财政干预则照常进行，尽管没有条约可循。1910—1920年末，财政和货币监督的框架已牢固确立。一名美国的海关总管负责海关税收，第一笔税收是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欧洲的债券持有者有把握获得及时的偿付，从而避免了欧洲人可能不顾门罗主义而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一家国民银行建立了，大部分股权由美国银行家持有，以便维持新货币(科多瓦)与美元的比价，并使尼加拉瓜以存放在纽约的储备金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美国银行家还购买了全国铁路公司的多数股权；虽然尼加拉瓜政府于1924年购回了这些股权，但国民银行和全国铁路公司的多数董事仍然是美国人，这两个机构的总部都设在美国。①

不光彩的布赖恩—查莫罗条约②于1916年生效后，国务院于1917年和1920年制订了新的财政计划。这两个计划规定美国应更加严格地控制尼加拉瓜的财政事务。成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美国人)，负责控制尼加拉瓜政府的一部分预算(包括公共工程)以及监督关税变化的权力——在外贸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至少50%的国家，调整关税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功能。国务院并致力于建立三个委员会，美国在其中有不少成员；建立这些委员会是为了裁决20世纪前30年间国内动乱产生的纠纷。

使国务院感到放心的是，财政监督花钱不多。银行家和美国政府都没有成为尼加拉瓜政府的主要债权人；尼加拉瓜政府的公

① 1929年，布朗兄弟合伙公司和J·和V·塞利格曼合伙公司的银行家辞去董事职务。他们在国民银行和太平洋铁路公司中的财政代理人职务由纽约国际承兑银行接替。

② 布赖恩—查莫罗条约(1914年签订，但直到1916年才被美国参议院批准)使美国对连接两大洋的运河的开凿、运营和管理拥有永久性的独家所有权。它还使美国获得大西洋海岸附近的科恩群岛和丰塞卡湾中一个海军基地的为期99年的租赁权。作为回报，美国向尼加拉瓜支付了3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须用来支付拖欠的债务。见I·J·考克斯：《尼加拉瓜与美国：1909—1927年》(波士顿，1927年)，第845页。

共外债仍然是欠欧洲人的债券。与除了巴拉圭以外的其他拉美国家相比，美国在尼加拉瓜的直接和间接投资都不太重要。[1]菲兰德·诺克斯（塔夫脱政府的国务卿）与美国在尼加拉瓜拥有的一家矿业公司的关系使人感到有点吃惊，[2] 但美国政府可以有理由声称它干预尼加拉瓜的动机决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财政监督也是有效的。科多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困难时期基本上与美元保持等价，甚至渡过了1929年以后最困难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公共外债不仅及时得到还本付息，而且其帐面数额在20年代下降了，因为偿债额超过了新债。在海关总管、最高委员会和银行家们实行的限制之下，政府避免了塞拉亚时期出现的最严重的过度财政赤字，而国民银行和全国铁路公司则获得了丰利。

但是，道森协定中提出的假设，即财政稳定将带来政治稳定，被证明是虚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25年撤离后的数月内，内战再次爆发。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复杂问题，即墨西哥政府支持前副总统胡安·包蒂斯塔·萨卡萨领导的自由党反对派企图重新取得政权；除了赞同干预的其他理由以外，美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考虑可能会由于"墨西哥的"胜利而有失面子。为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26年重返尼加拉瓜；1927年5月，在美国前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监督下，自由党与保守党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这一次，作为取得政治稳定的更进一步的先决条件，国务院要求取消尼加拉瓜的全部军队（包括警察），由无党派的国民警卫队取而代之。这个最初由美国军官组建的国民警卫队按美国占领下的海地的国民警卫队形式建立，并很快被多米尼加共和国仿效，它旨在消除尼加拉瓜社会中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严重分歧，使反对

---

① 参见E·坎曼：《寻求稳定：1925—1933年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外交》（印第安纳州，圣母市，1968年），第220—224页。

② 菲兰德·诺克斯多次担任弗莱彻家族拥有的尼加拉瓜矿业康采恩拉卢斯一洛杉矶公司的代表。该公司的一名职员阿道弗·迪亚斯在美国占领期间曾三次担任尼加拉瓜总统。

党情得它能通过选举手段、而不用诉诸武力来取得政权。和平条约并没有被所有自由党领袖签署。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拒绝服从于任何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呆在尼加拉瓜的条约。他于1926年从墨西哥回到尼加拉瓜，参加了自由党的起义，并在何塞·马里亚·蒙卡达领导的军队中晋升到将军的地位。他带领了一个30人的队伍，来到尼加拉瓜北部的新塞哥维亚山岭。

新秩序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1928年的总统选举。如同塞拉亚倒台以来的历次总统竞选那样，这一次也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监督的，但结果却出乎意料。自由党推举其战斗英雄蒙卡达将军为候选人；他在选民参与程度较高的激烈竞选中险胜保守党对手。事实证明，自由党人蒙卡达与他的那些保守党前任一样急于与美国官场进行合作；1930年的国会选举同样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监督。这次选举使自由党人获得了大多数席位。1931年1月，亨利·史汀生——胡佛政府的国务卿——宣布：1932年11月的总统选举以后，美国军队将最终撤离尼加拉瓜。

史汀生已确信尼加拉瓜终于取得了政治稳定。美国政府多少有点惊奇地发现，大部分自由党领导人都关切美国对中美洲地区的看法，并愿意迎合美国政策的利益。桑地诺是显著的例外，他受到了他的自由党的谴责。史汀生确信国民警卫队能遏制——即便不是击败——桑地诺。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以前，国民警卫队将一直由美国军官指挥。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美国国内越来越反对海军陆战队留驻，而自从1928年哈瓦那第六届泛美会议上首次出现不满以来，拉美对美国占领的谴责也与日俱增。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1929年后世界贸易的瘫痪使巴拿马运河航运清淡，因此，在尼加拉瓜开凿第二条运河（布赖恩——查莫罗条约确保了美国开凿这条运河的权利）的必要性就不太迫切了（1932年进行了尼加拉瓜运河路线的最后一次勘探）。

20多年内，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干预几乎没有中断过。这种干预的记忆是不愉快的。国务院的支持者可以声称有一些积极的收

获：财政稳定得以实现；在美国监督下进行的1928年、1930年和1932年大选是尼加拉瓜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美国国务院不再被人认为偏袒一个党（保守党）而可以与新一代的自由党人打交道了，从而使不干涉政策成为可行。另一方面，只有牺牲了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财政稳定才得以实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及时对外债还本付息而牺牲了增长。1926—1927年的前十年内，平均每年有1/3的政府开支用于还本付息；1927年成立国民警卫队后，军事开支成为财政预算的一个沉重负担，1929—1930年约占30%；用于公共工程的开支非常少，在财政计划中是支付所有其他开支项目后的剩余部分。一位美国的财政专家于1928年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用于这些项目的资金非常少，而且其中很大部分资金虽然指定用于公共工程，却可能已被用于其它目的，正如公共教育投资情况一样。公路占用了公共工程拨款的大部分，但除了首都有一些新近铺设的街道以外，这个共和国的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一流水平的公路。其他公共工程基金已被用于建造或修理公共建筑，但这方面的成果也与拨款数额不相称。"①

美国的干预还扭曲了尼加拉瓜上层社会人士的观念和行为。所有一代人已习惯于关于美国干预的思想；大部分尼加拉瓜精英人士——在政府和企业中——不仅把美国的干预看成难以避免，而且还欢迎美国进行干预。1927年，尼加拉瓜财政部长建议：美国应把其对尼加拉瓜的财政控制扩展到包括国内课税和海关关税，应成立一个大部分成员为美国公民的预算委员会来制订这个国家的预算，美国的审计长应监督尼加拉瓜的一切政府开支。同年，阿道弗·迪亚斯总统重复了他的提议（第一次提议于1911年提出）：修改尼加拉瓜宪法，允许美国进行几乎随心所欲的干预，以换取一笔为数不大的美国贷款。确实，到20年代末，由美国自

① 见W·坎伯兰：《尼加拉瓜：经济与金融概览》（首都华盛顿，1928年）第106页。

身造成的这样谄媚态度已使美国感到有点难堪。

胡佛政府关于从尼加拉瓜撤出海军陆战队的决定是在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之前作出的，但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不干预政策是不可信赖的。财政监督仍然继续进行，布赖恩—查莫罗条约使美国获得了开凿运河和建立陆、海军基地的权利；这一条约仍然有效。此外，尼加拉瓜的精英们不相信美国的不干预政策。大约25年内，他们已练就一套本事，把美国偏好的艺术用来作为促成自己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手段。人们仍然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尼加拉瓜有它偏爱的人物，这些人物能获得任何竞赛的胜利；因此，政治上的成功取决于使公众确信某个人或某一派享有美国的明确支持。

大萧条的影响

当美国海军陆战队终于撤离尼加拉瓜时——最后一批于1933年1月2日撤出——世界经济危机使困难进一步加剧。1929年大萧条前夕，尼加拉瓜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而且又以咖啡为主；一半以上的咖啡出口到美国，美国则提供了约2/3的进口货物。关税和这些进口商品的附加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商业、交通和服务业的活动水平。

尽管咖啡部门有着许多外国企业家，但该部门的特点仍然是低效率和低产量；这个共和国的咖啡没有获得高质量的名声（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则有此名声），因此种植者获得的价格低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价格。早在1925年，这种价格就已升得很高，但直到1929年以后才突然大幅度下跌。最初两年（1930年和1931年），出口量保持在萧条前的水平，但1931—1932年季节的坏收成使出口量下降49%，1932年的咖啡出口值只及1929年水平的25%。

尼加拉瓜的其他出口（主要是香蕉、木材和黄金）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不如咖啡那样严重，但咖啡的重要性足够使出口收入从1928年的1170万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450万美元。与此同时，

在美国财政干预的监督下，这些减少了的外汇收入仍然要用于偿付公共外债的还本付息；以名义价值而言，这些外债的数额未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大量削减进口，削减幅度大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从1928年的1340万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350万美元。这一下降是在不破坏科多瓦与美元的汇兑比值的情况下实现的，尽管尼加拉瓜确实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并在一个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于1931年11月开始实施外汇管制。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海关总管、国民银行的美国经理和尼加拉瓜财政部长。

公共债务（内债和外债）因此能得到及时偿付，虽然1932年以后外债的分期偿付被部分地终止。30年代，尼加拉瓜与阿根廷、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如数支付外债利息的拉美国家。但尼加拉瓜的回旋余地甚至不及上述其他国家，因为除了优先偿还公共债务以外，还须筹措训练和招募国民警卫队所需的额外开支。蒙卡达政府竭力试图通过征收海关附加税来保护政府财政收入，① 但财政收入仍然从1928—1929年的560万科多瓦减少到1932—1933年的380万科多瓦；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时，用于国民警卫队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开支所占比重上升到50%。

这一危险的形势因1931年3月的地震而变得更加恶化。这次地震发生在马那瓜，1000人死亡，毁坏了几乎所有的政府建筑物。为了筹措资金以进行重建工作和减少拖欠的公共部门工资，政府于1932年、1933年和1934年向国民银行商借了一系列紧急贷款，但用于卫生、教育和道路建设的开支实际上都停止了，政府解雇雇员成为司空见惯。蒙卡达政府为帮助农业部门而于1930年10月建立的抵押银行尚未开业就于1931年倒闭，直到1934年10月才重新开业。1929—1932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数下

① 这些附加税使平均税率从1928年的34%提高到1953年的50%。

降了22.9%，这在中美洲是最大幅度的下降。[①] 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撤退——其数量1929年1月超过5000人——使尼加拉瓜失去了一个难得的购买力源泉，[②] 这恰逢大萧条对尼加拉瓜带来最严重影响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于1936年达到最低点，成为中美洲地区的最低水平，也是拉美地区的最低数之一。

桑地诺插曲[③]

1933年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撤退使桑地诺和他的军队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EDSN）逍遥自在。在6年时间的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或由美国军官任职的国民警卫队都未能摧毁桑地诺的军队，尽管美国军队为支持地面部队而首次使用了空中轰炸。桑地诺军队的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00人（其中许多人是半职业军人），他们曾取得一些了不起的军事胜利，包括破坏弗莱彻家族的拉卢斯—洛杉矶矿；但其活动基地主要限制在新塞哥维亚、希诺特加和塞拉亚这些人烟稀少的边远省份。[④]

在一次暴力事件后，桑地诺于1920年离开了尼加拉瓜。他曾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美国公司中工作，这一经历使他了解了外国（美国）资本在拉美活动的内情。如前所述，第一批美国军队撤退后爆发的自由党暴动鼓舞了桑地诺，因此他于1926年返回尼加拉瓜。美国海军陆战队再次来到尼加拉瓜后，桑地诺拒绝根据史汀生于1927年5月提出的协议中确定的条件投

---

① 见V·布尔默—托马斯：《1920年以来的中美洲政治经济学》（剑桥，1987年）表A3。

② 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于1931年1月减少到1412人，1933年1月2日最终撤退时只有910人。

③ "插曲"的原意是指"希腊悲剧中两段合唱曲中的一个间歇"；这个定义似乎非常合适。

④ 尼尔·麦考利所著的《桑地诺事务》（芝加哥，1967年）一书对桑地诺插曲的军事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降。桑地诺发动拥护宪政者战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符合宪法的政府重新回到胡安·萨卡萨领导的自由党人手中。但是萨卡萨接受了史汀生—蒙卡达条约；1928年11月，蒙卡达本人为自由党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因此桑地诺的目标又是保护民族主权，这就至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尼加拉瓜。但是，20年的美军占领已创建一种代表美国利益的广泛的网络；在拥有这种网络的国度，维护民族主权实非易事。

柯立芝政府和胡佛政府纯粹是用军事眼光来看待桑地诺的，并在官方公报中称他为土匪，虽然在美国占领军代表送给他的信中依然称他为桑地诺将军。与此同时，美国公众获得的大多数关于桑地诺的新闻都来自合众社和美联社驻尼加拉瓜的代表，第一位是美国海关总管，第二位是他的美国助手。[①]但当美国军官的过度自信导致一系列军事上的失利后，北美洲的公众舆论开始受到关于海军陆战队死伤报道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转而采用另一种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是国民警卫队，而非海军陆战队；美国甚至同意成立一个党派性很强的辅助性团体，以补充据称是无党派的国民警卫队的工作。

这一政策转变的后果是尼加拉瓜人双方都蒙受了大量伤亡。1926—1933年，共有136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但其中只有47人是死于对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的战斗行动——平均每7周死1人。[②] 这一小数字意味着桑地诺维护民族主权的目标只得通过尼加拉瓜人杀尼加拉瓜人来实现。这一状况说明：在一个帝国主义势力能利用民族代理人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度，维护民族主权是困难的。

虽然华盛顿视桑地诺为土匪，但拉美的公众舆论则把他看成

---

① 见C·比尔斯：《香蕉金子》（费城，1932年），第304—305页。

② 其他人死于：谋杀（11人）、事故（41人）、（自杀12人）、疾病（24人）和因拒捕而被杀（1人）。见麦考利《桑地诺事务》，第239页。

是同“北方巨人”进行斗争的英雄和象征。[1] 在1928年的哈瓦那第六届泛美大会至1933年的蒙得维的亚第七届泛美大会期间，拉美的反干涉主义情感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桑地诺的运动在拉美地区赢得了广泛的追随者，并在欧洲、亚洲甚至在北美洲引起了共鸣。

1928年年底以前，桑地诺的主要代表是洪都拉斯诗人和政治家弗罗伊兰·图西奥斯。他编辑了一份发行很广的评论性刊物《阿列尔》。[2] 但在一次争执后，图西奥斯与桑地诺分道扬镳。这次争执显示出桑地诺在制订一个维护民族主权的始终如一的战略时发现的困难。在蒙卡达当选为总统后，图西奥斯于1928年12月致信桑地诺，建议达成一个和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蒙卡达应要求美国军队立即撤出，尔后桑地诺应放下武器和承认蒙卡达政府，以此作为对蒙卡达政府的承诺的回报；蒙卡达政府的承诺是恢复宪法和废除所有违反宪法的法令和协议。[3] 桑地诺立即拒绝了图西奥斯的建议——图西奥斯因此而辞去了作为桑地诺的代表的职务，但在两周后桑地诺就致函特务中队的美国海军司令塞勒斯少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洛根·费兰德准将，说他只能与蒙卡达将军达成和平协定，“因为蒙卡达——他是自由党成员，但他已背叛该党——能通过其承诺来改正错误；他能代表尼加拉瓜人民和自由党本身来作出这样的承诺，即尊重我们的军队在适当时机将提出的建议”。[4]

---

① 早自1927年起，桑地诺的斗争就在拉丁美洲引发了异常多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关于这些语气不同的著作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可参见桑地诺主义研究所的《桑地诺主义——基本文献》一书（马那瓜，1983年），第211—231页。

② 《阿列尔》的名称取自乌拉圭人何塞·恩里克·罗多于1909年撰写的一部小说，象征着拉美与美国之间的斗争。见乌戈·坎西诺·特龙科索的《桑地诺运动的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尼加拉瓜人民与民族革命的先例，1927—1979》（奥登斯，1984年），第56页。

③ 图西奥斯信件的全文载于S·拉米雷斯编著的《桑地诺的灵活思想》第二版，（圣何塞，1976年），第156—158页。

④ 见拉米雷斯：《桑地诺的灵活思想》，第155页。

因此，桑地诺不能肯定其维护民主权的目标能通过恢复蒙卡达（或自由党的其他代表人物）领导下的合法政府这一途径来实现，也不清楚他的目标是否应消灭所有那些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传统体制（包括自由党在内）。消灭这些传统体制是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阿普拉）和共产国际都想把桑地诺推向这一立场。阿普拉党是流亡的秘鲁人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于1924年在墨西哥创建的。对于阿普拉党来说，桑地诺的战争象征着整个拉美大陆争取民族主权、独立和社会平等的斗争。弗罗伊兰·图西奥斯被授予阿普拉党的名誉党员称号；秘鲁人埃斯特万·帕夫莱蒂奇于1928年被派往新塞哥维亚，加入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帕夫莱蒂奇获得了桑地诺的信任，并在1929年6月至1930年5月期间陪伴桑地诺长期侨居在墨西哥，以便在拉丁美洲为他的斗争扩大支持基础。正是从阿普拉党那里，桑地诺借用了"印第安美洲主义"这个用语；他计划在阿根廷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以促进开凿一条由国际控制的尼加拉瓜运河，这主要参照了阿普拉党关于从美国手中夺取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设想。

桑地诺还借鉴了阿普拉党的社会分析，如在某一个场合他声称："我们的口号既不是极右，也不是极左。因此，我们的斗争没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我们的斗争是以没有意识形态标记的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① 这一分析似乎符合尼加拉瓜社会现实，因为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仅产生出少数无产者（即在香蕉种植园和矿业中），而大多数劳动力（1920年的统计为80%）则从事农业，无地劳动力只占少数。同样，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的官员——既有尼加拉瓜人、又有其他拉丁美洲人——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但桑地诺有时却使用阶级的措词。他在1930年的一封

---

① 引自R·塞尔达斯·克鲁斯：《桑地诺、阿普拉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者》（利马，1984年），第65—66页。

信中写道："由于斗争在激化和来自美国老银行家的压力在增强，动摇者和胆小者（因为斗争采取了现在的这种形式）正在脱离我们；只有工人和农民愿意坚持到底，只有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将取得胜利。"① 这封信自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以来一直很出名。1931年，桑地诺在给他的最亲密的军官佩德龙·阿尔塔米拉诺的一封信中声称：桑地诺运动应与所有资产阶级分子切断关系，因为赞同与美国实现屈辱的和解有益于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

这一立场反映了共产国际和美洲反帝联盟对桑地诺的影响；美洲反帝联盟成立于1925年，它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但共产党人在其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正是通过这个联盟，桑地诺才与当时拉美的一些主要共产主义者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些人包括曾在拉斯塞哥维亚拜访过桑地诺的委内瑞拉人古斯塔沃·麦查多和——更为重要的——委内瑞拉人卡洛斯·阿庞特和萨尔瓦多人阿古斯丁·法拉本多·马蒂。阿庞特和马蒂两人都于1928年加入了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两人都晋升到少校军衔；尤其是马蒂，他获得了桑地诺的信任和友谊。

桑地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不时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阶级分析方法，更多地反映了他想获得美洲反帝联盟的支持的愿望，而不是真正地热衷于阶级斗争。这些差异最终于1929年年底显露出来，当时桑地诺在墨西哥作为期10个月的侨居生活，而且正好在他拜访墨西哥总统波特斯·希尔之前。到1930年初，决裂已成定局，共产国际开始将桑地诺指责为一个已成为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考迪罗的叛徒。由于他既被图西奥斯抛弃，又被共产国际及其外围组织抛弃，桑地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孤立；自1930年年中起，他不得不着手处理使人摸不着头脑的尼加拉瓜政治形势，他的周围是一群具有勇气和军事技能出众、但政治经验极少的军官。

1930年5月桑地诺从墨西哥回到尼加拉瓜后，主权保卫军取

---

① 见塞尔达斯·克鲁斯：《桑地诺、阿普拉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第106页。

得了大量军事胜利，而且显然获得了其行动基地周围群众的全力支持，尽管一些大城市中的支持不太稳固。桑地诺呼吁抵制1928年、1930年和1932年大选的号召以及保卫军的破坏运动没有成功；在每次大选中，投票率都很高。①桑地诺未能在主要城市建立起保卫军的政治势力：1928年在莱昂建立的、由埃斯科拉斯蒂科·拉博士领导的工党（PL）很快就解散，在马那瓜建立的、亲桑地诺的共和自由党（PLR）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1932年大选的前一年，桑地诺提议奥拉西奥·波托卡雷罗——生活在萨尔瓦多的一名尼加拉瓜人——任临时政府的总统，但这一倡议也未能赢得支持。

这些政治上的失望使桑地诺对他与传统政党的关系、尤其是与自由党的关系捉摸不定。有时他似乎认为所有政治精英都因美帝国主义而变得不可救药地腐败，因而难以保卫国家主权。但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领域那样，他并非前后一致，他的窘况因自由党候选人胡安·萨卡萨在193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而变得更为严重。萨卡萨于1933年1月1日就任总统，即在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撤离的前一天；虽然桑地诺感到萨卡萨背叛了他，但他不能忽视事态的变化，这一事态因萨卡萨任命桑地诺的同情者索福尼亚斯·萨尔瓦铁拉为农业部长而变得更富戏剧性。

萨尔瓦铁拉是爱国者小组的领导人，该组织是为了促进桑地诺与政府之间的和平而于1932年成立的。谈判于1932年12月开始，桑地诺于1933年1月23日提出的和平草案指明："保卫国家主权"应包括结束美国的财政干预、修订布赖恩—查莫罗条约和改组国民警卫队，使其受制于尼加拉瓜宪法。② 令人惊奇的是，最终达成的和平条约——于2月2日在马那瓜签署——却没有提及

① 1928年，148831个选民中有133633人投了票——投票率为88.8%。见坎曼：《寻求稳定》，第166页，注释第49。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投票人数降为129508。

② 见G·塞尔瑟：《桑地诺》（纽约，1981年），第161—162页。

上述问题。相反，桑地诺答应了这样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主权保卫军同意交出武器，其条件是：获得科科河沿岸的国有土地，桑地诺可拥有 100 人的贴身保镖（一年后应重新审定）以及政府应承担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内为北部省份兴建公共工程。

桑地诺后来声称，他同意这一条件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使美国获得第三次军事干预的借口。但这个条约使所有除美国在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干预以外的问题悬而未决，尤其忽略了国民警卫队的违反宪法的特点。不出数日，国民警卫队与主权保卫军的前成员之间发生了冲突，从而使桑地诺拒绝交出剩余的武器，其理由是：国民警卫队不是一个充分符合宪法的权力机构，因而不能获得他的武器。这激怒了国民警卫队的军官们；他们的怒气又变成了恐惧，因为桑地诺提出派 600 名武装人员来挽救政府——桑地诺的这一行动是对萨卡萨于 8 月颁布的临时戒严令作出的反应。在此以前，国民警卫队的主要军火库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爆炸事件。1934 年初，紧张关系急剧恶化，国民警卫队的高级官员在其总司令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领导下，秘密地同意利用桑地诺计划于 2 月赴马那瓜这一机会将他和他的许多支持者暗杀掉。主权保卫军的残余力量和他们在北部省份的农业合作社被无情地消灭，这一消灭实质上在多年时间内擦去了人们对桑地诺的记忆。自 50 年代末起，他的军队中只有两位成员在尼加拉瓜的游击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加拉瓜人被迫依靠一本由为索摩查捉刀撰写的书来查找所有有关桑地诺著作的参考资料。[1]但是，对于那些决心记住这些情况的一小批尼加拉瓜人（主要是学生）来说，桑地诺插曲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保卫民族主权不能仅仅局限于结束美国军事干预；其次，不能相信保守党和自由党中的传统政治精英能保卫民族利益。

---

① 见 A·索摩查：《真正的桑地诺或塞哥维亚的苦难》（马那瓜，1936 年）。

索摩查统治（1934—1951年）的巩固

1931年1月史汀生宣布撤出海军陆战队的时间表加快了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的建立。如前所述，国民警卫队被指望是无党派的。但是，鉴于尼加拉瓜自由党和保守党家族之间有着剧烈的抗争，这一目标永远不会是现实的，尤其是因为尼加拉瓜的政治忠诚具有浓厚的地区色彩。[1] 由于训练尼加拉瓜军官的时间短促，无党派国民警卫队的目标就更不现实了。到1932年3月，即海军陆战队撤离之前的9个月，由海军陆战队创建的军事学院仅毕业了39名军官，而最低的估计数则需要178名。国民警卫队的美方司令卡尔文·B·马修斯觉得这些军官太年轻和缺乏经验而不能胜任更高的职务，但国务院关于不推迟海军陆战队撤离时间的决定意味着将一些未经正规军事训练的尼加拉瓜人提拔到最高职位。因此，1932年11月5日（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在美国驻马那瓜的公使馆中达成了一项协议：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总统候选人将各自从自己的党派中提名同样数量的人员，可由他们取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员。即将卸任的蒙卡达总统将在大选以后任命取胜的候选人提出的人选，而继任总统则将从他们的军队中选择新的国民警卫队首领。因此，尼加拉瓜军事警察的"无党派"性质是建筑在它的高级军官的政治忠诚这一基础上的——就名称上说这是一个矛盾。

萨卡萨在1932年大选中的胜利确保自由党的被提名者将担任国民警卫队的最高职务。对于总队长这个职务，蒙卡达的意中人是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该人曾支持1926年的自由党暴动，任总统的私人顾问，后来经历了一段短时间的王事后，任

---

① 莱昂市是自由党基地，保守党的基地在格拉纳达。由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剧烈抗争，马那瓜早在19世纪就已成为首都。

总统的外交部次长。[1] 在1927年的和平会议上，作为翻译，索摩查引起了史汀生的注意。自那时起，索摩查一直得到美国军方的支持。蒙卡达选择索摩查无疑受到了这一支持的影响。到1932年年底，美国公使马修·汉纳和国民警卫队的美方首领都深信索摩查是这一职位的合适人选。但萨卡萨却并不这么看，他的第一选择是自由党元老卡洛斯·卡斯特罗·瓦斯默。但是，由于卡斯特罗既不能被蒙卡达又不能被美国官员所接受，萨卡萨被迫从一个得到批准且包括索摩查在内的三名候选人中作出选择。[2] 在压力之下，他选择了索摩查，即其侄女的丈夫。因此，索摩查与萨卡萨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紧张，而索摩查则深信自己得到美国的支持。

1934年2月桑地诺被国民警卫队刺杀一事在短时间内削弱了索摩查的地位，但萨卡萨未能从中渔利，而年轻的总司令则渡过了他的最严重的危机后，变得尤为坚强有力。索摩查曾亲自对美国新任公使阿瑟·布利斯·莱恩作出许诺，他不会对桑地诺下手；他的行为迫使萨卡萨进行报复，与暗杀行为有牵连的数名官员得到了新的任命，许多新官员是萨卡萨的亲戚。此外，萨卡萨还临时采纳了总司令这一军衔。但索摩查却仅仅被要求当着外交使团的面重复一次他的忠诚誓言。尽管莱恩公使曾多次提出要求，但华盛顿不愿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以阻拦索摩查与萨卡萨政府作对，而总队长则“透露”出一系列内情，这些内情不仅表明索摩查下令刺杀了桑地诺，而且还表明他这样做是与美国官员有关的。索摩查为自己塑造了这样一种形象，即他是华盛顿的人，而国务院的默不作声则使尼加拉瓜人相信这一形象是真实的。美国于1934年承认萨卡瓦多的马丁内斯独裁政权之后，又宣布美国正在放弃1923年的华盛顿条约中确定的不承认政策，这一切使萨卡

---

① 见B·迪德里希：《索摩查与美国卷入尼加拉瓜的遗产》（伦敦，1982年）第13—14页。

② 见R·米利特《王朝的卫士》（纽约州，马里诺尔），第134—135页。

萨的地位更为软弱。此外，1935 年萨卡萨的妻子告诉莱恩说，她的丈夫将要求索摩查辞去国民警卫队首领职务，如遭索摩查拒绝，那么来自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飞机将轰炸其总部。这时，美国国务院即刻进行了干预，中止了总统的计划。

萨卡萨的地位因经济软弱而进一步受到损害。世界咖啡价格保持在萧条前最高数的 1/4，而食糖出口则因美国拒绝根据一个互惠贸易条约向尼加拉瓜提供数量可观的食糖配额而受害非浅。[①] 30 年代初期曾对咖啡的重要性提出挑战的香蕉出口，1933 年以后因受病虫害影响而开始急剧下降，到 1943 年已完全停止出口。在这一有限的财力范围内，政府尽力而为：1934 年，抵押银行终于开业，它采取了有利于咖啡种植者的信贷政策，这种政策旨在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必要性。同年还成立了全国大众贷款公司（当铺）。该公司向小农提供低息贷款。为了减轻农场部门存在的问题，两个法令（资金供给法和高利贷法）被通过；到 1934 年年底，生产者的出口能从官方汇率中获得一些适度的好处。但在萨卡萨的整个任职期间（1933—1936 年），出口处于严重的不景气之中，从而压缩了进口，并使政府收入长期处于危机之中。

萨卡萨的困难并没有自动地有利于索摩查。1934 年，在萨卡萨出国期间举行的一次集会未能成功。而且索摩查对国民警卫队的控制尚未得到彻底的保障。此外，索摩查想当总统的野心又因宪法中的两个条款而受挫；第一条规定国民警卫队的首领不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第二条要求现任总统的任何亲属本人在继任总统之前必须有 6 个月的间隔时间。索摩查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条款，包括成立一个特别立宪会议来修改这些规定，但由于索摩查本人与萨卡萨之间缺乏信任，索摩查的努力毫无收获。

因此，索摩查被迫耐心等待和把全部精力用于建造一部政治

① 这一条约最终于 1936 年签署，在此之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曾对尼加拉瓜施加了经济压力，以要求其降低一些进口商品的关税。

机器。他组织了一帮刺客，名为蓝衫党，有意识地模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棕衫党，并利用他的《新新闻报》来博取人们对他想当总统候选人这一主意的支持。索摩查的真正突破出现在 1936 年 2 月，当时他干预了因石油短缺而爆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罢工。他的和解性态度成功地平息了罢工，这与萨卡萨的强硬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索摩查的姿态使他获得了劳工领袖和企业界领导人的好评。翌月，美国公使莱恩被博阿兹·朗取代，他对索摩查及其总统野心更有好感。到 5 月，索摩查感到已有足够的力量来向负责莱昂地区阿科萨斯科要塞的萨卡萨的侄子挑起对抗。总统以异常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命令其侄子进行抵抗，并召集了一次有自由党和保守党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推举莱昂纳多·阿圭略为 11 月总统选举的联合候选人。

索摩查泰然自若。他的国民警卫队部队在力量上超过拉蒙·萨卡萨在阿科萨斯科要塞的部队，从而使索摩查在军事上彻底控制了全国。萨卡萨于 1936 年 6 月 6 日辞职；3 天后，驯顺的国会提名卡洛斯·布雷内斯·哈尔金为临时总统。大选被推迟到 12 月；11 月，索摩查辞去国民警卫队总队长一职，因此，他的晋升能符合宪法。成立民族主义自由党（PLN）是为了推举索摩查为总统候选人，这个党也得到一部分保守党人的支持。反对派要求美国监督这次大选，当美国没有这样做时，反对派退出了选举。但阿圭略的名字仍然保留在选票上，并获得了 169 票，索摩查得到 107201 票。尔后，当选总统重新获得了对 3000 多人的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并自 1937 年 1 月 1 日起将总队长与总统的职务合二为一。

对索摩查的支持并非像投票数字所表示的那样大。传统的政治精英曾在索摩查身上看到了追逐其自身野心的手段，现在他们开始认识到：他的垄断地位已构成了威胁，而国民警卫队中的一些成员则对总统处理军务表示不快。但索摩查拥有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这个系统使他很快地巩固了在国民警卫队中的地位，并

使其政治对手分裂。他为国民警卫队成员大幅度增加工资，并开始建设由国民警卫队控制的空军和海军。国民警卫队的作用还扩大到包括控制国内财政收入和国有铁路，它对邮政、电报和国内电台以及对移民的控制都加强了，从而为这支部队的成员补充工资和保持社会控制提供了无数机会。

对于来自传统政治精英的威胁，索摩查的反应是更加巧妙的。虽然他有时也诉诸强硬战术，包括在1937年的一次集会上逮捕了56名保守党成员，但他也认识到这些强硬战术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农业停滞，因为传统精英——自由党精英和保守党精英——的经济利益与这一部门的财富密切相关。最为重要的措施是始于1937年3月的一系列货币贬值，使科多瓦与美元的汇率从等价降为1939年年底的5科多瓦兑换1美元，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农产品出口、尤其是咖啡出口；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实施的新的出口税和外汇交易税只对这种出口刺激产生局部影响。银行系统被鼓励向新兴农作物提供资助，因此棉花和芝麻生产都获得很快的发展。索摩查还通过了有利于外国投资的法令；结果黄金出口的增长尤为迅速。但他没有忽略他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所有公共部门工资征收5%的税、对牛肉出口征收每磅1.5分的税以及对外国矿业公司利润的抽成都被认为是流到他手里去的。

这些经济措施使生活费用大幅度上升。1937—1939年期间，食品的零售价格提高了124%，依靠固定收入的那些人因而受害非浅。但国民警卫队却能受到大幅度提高工资的保护，传统精英则能得益于提高农产品名义价格。精英们对索摩查的反对开始瓦解，他在总统大选中的宿敌莱昂纳多·阿圭略率先将自由党统一成尼加拉瓜新考迪罗的后盾。因成功而满脸喜色的索摩查说服国会，使它于1938年年底变成立宪会议；它将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6年，而且不必经过连选（不包括现任总统）。数月后，立宪会议又改成全国代表大会，其第一个行动是宣布索摩查总统的任期

为8年，直到1947年5月。

当他的全国性权力基础得到巩固后，索摩查开始转向罗斯福政府；罗斯福政府已邀请他于1939年赴华盛顿进行一次国事访问。罗斯福满足了索摩查的大部分要求：对尼加拉瓜军事学院训练国民警卫队官员提供帮助，进出口银行提供购买美国商品所需的贷款以及为铺筑一条连接说英语的大西洋地区与人口密集的太平洋沿岸省份的道路提供经济与材料方面的援助。这一次旅行的价值对于索摩查来说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它证实了流传甚广的公众信念，即总队长受到白宫的支持，因而他不可能被推翻，否则将激怒华盛顿。在尼加拉瓜，不干涉和睦邻政策认可了这样一位总统，他的腐败和残忍深为美国官员所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尼加拉瓜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并临时产生出爆发一次反索摩查暴动的可能性。在不可兑换的旧马克币制中，德国与尼加拉瓜30年代进行的贸易持续增长。1939年后德国和欧洲市场的丧失最初并没有因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而得到弥补。与此同时，索摩查的中止宪法保障和实施戒备状态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由保守党人埃米利亚诺·查莫罗领导的流放者组织试图发起一次挑战，但国民警卫队内一次迅速的人事变动——包括撤消里戈韦托·雷耶斯将军的总参谋长职务——使索摩查的控制更为牢固。1941年10月与美国签订的租赁协议向国民警卫队提供了价值130万美元的现代化装备，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由流放者组成的、装备落后的志愿军以传统的尼加拉瓜方式发动任何起义的可能性。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为索摩查提供了以非常小的代价就能显示他支持罗斯福政府的许多机会。尼加拉瓜立即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因此美国应邀为这个共和国兴建海军和空军基地。政府参与了美国向巴拿马运河区提供水果和蔬菜的计划，同时泛美公路的工程作业迅速进行。尼加拉瓜加快发展太平洋地区的棉花生产，将其作为西半球向美国提供战略原料的努力的组成部分，

这种原料以前是从远东获得的。根据泛美咖啡协定给予尼加拉瓜的配额使咖啡生产得到了稳定，黄金出口也快速上升。

1938—1944年，出口值几乎增长了两倍，但进口却受到运输以及其他短缺的影响，因而进口值仅增长了1倍。所以，在战争期间，尼加拉瓜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使货币流通量增加，导致价格明显上涨。一个由美国海关总管领导的价格控制委员会未能制止价格上升，1939—1945年，价格上升了325%。另一方面，价格控制以及进口限制为索摩查家族进行贪污提供了众多的机会，战争期间，这个家族的财富迅速膨涨。到战争结束时，据说索摩查控制了51个牧牛场、46个咖啡种植园、2个甘蔗种植园、1个航空公司、1个金矿、1个牛奶厂和一些生产纺织品、水泥和火柴的工厂。其中许多财产是通过没收轴心国国民的企业这一途径落入索摩查之手的。

生活费用指数的迅速上升在城市工人中产生了不满；战争期间，城市工人的数量增大了。另一方面，传统的精英们也不满索摩查在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利用价格和进口控制来中饱私囊。甚至罗斯福政府也在索摩查公布其参与1947年的连选总统计划时开始怀疑自己对索摩查的支持是否明智。自1944年起，所有上述因素都对索摩查政权构成了威胁，但是由于索摩查的反对派中缺乏团结以及这个独裁者拥有无可置疑的高明手段，从而使得这个王朝得以顶住对其生存构成的最大挑战，直至1979年被推翻。

自从1936年2月出租汽车司机罢工以来，索摩查一直以有组织劳工的朋友自居。他把一些微不足道的社会改革包括进了1938年的宪法，这就使尼加拉瓜劳工党（PTN）陷于困境；该党是作为有组织劳工的政党于1931年成立的。它的领导人后来在劳工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来对付索摩查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该党于1939年解散。战争期间，索摩查邀请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劳工领袖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到尼加拉瓜，并经常许诺要制订一个劳工法。这个劳工法成为亲索摩查的劳工组织和尼加拉瓜社会主

义党（PSN）的主要要求；社会主义党是尼加拉瓜劳工党的前领导于 1944 年建立的。但这些组织的态度并没有与索摩查发生冲突；索摩查想方设法使劳工组织认可了他的连选计划。

传统的精英党得这个独裁者如继续掌权，他们的损失将更大，因此他们的态度更具敌意。1944 年初索摩查试图连选连任的决定分裂了自由党，并导致独立自由党（PLI）的成立。该党与保守党抱同样的宗旨，都要发动一次旨在于 1944 年年中将索摩查赶下台的罢工。但劳工运动仍对劳工法抱有希望，它不支持这次罢工；这次罢工还因美国海关总管兼价格控制委员会领导人欧文·林德伯格的声明而受到影响，他的声明称：参与罢工的任何企业将被没收。

没有授权林德伯格进行干预的华盛顿同样急于阻止索摩查连任。索摩查于 1944 年和 1945 年向美国提出关于增拨武器的要求被拒绝，并且还受到强大的压力。但这个独裁者并没有屈服，直到 1945 年年底；当时，独立自由党和保守党已同意推举埃诺克·阿瓜多为它们的联合总统候选人。索摩查邀请他在 1936 年的对手、年迈的莱昂纳多·阿圭略来代表索摩查事业，阿圭略于 1947 年 5 月取得了漂亮的胜利。但这位新总统表现出惊人程度的独立性，他立即通过重新委任官员这一做法来攻击索摩查在国民警卫队的权力基地。独裁者震惊了，但很快就恢复镇静，因此不出一个月就发动了一次政变，将阿圭略赶下台，并确保国会选择索摩查的舅舅维克托·罗曼—雷耶斯为临时总统。

这一行动触发了一场严重危机，因为杜鲁门政府拒绝承认新政权，甚至在新政权制订了一个有强烈反共条款的宪法以后也不予承认。1947 年末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对罗曼—雷耶斯政府的承认稍微减轻了该政权的孤立，但杜鲁门总统在 1948 年 3 月以前一直毫不动心；当时，作为最后一张王牌，索摩查侵入哥斯达黎加，以支持特奥多罗·皮卡多总统；皮卡多政府在哥斯达黎加内战中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杜鲁门政府渴望看到哥斯达

黎加政府中的共产党影响被清除掉，因此劝说索摩查撤出其军队，作为回报，美国将承认罗曼—雷耶斯政权。1948年4月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以后，美国正式采取了这一步骤。此后30年内，在支持索摩查家族方面，历届美国政府从未犹豫不决。

与此同时，索摩查还与他在劳工运动中的昔日盟友翻了脸。1945年的劳工法被冷落，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被定为非法，有组织劳工被彻底压倒而在70年代以前一直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学生的反对使人对桑地诺记忆犹新，这种反对因大学被关闭和有选择地监禁一些人士而受到影响。但传统的精英却受到相当不同的对待。在达成一系列战术协议以后，索摩查与埃米利亚诺·查莫罗于1950年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该条约，保守党将保证获得国会中1/3的席位以及参与政府与司法。尤为重要的是，精英们的“经商自由”将得到保证，这意味着索摩查家族将与那些传统的统治阶级一起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1950年的条约为索摩查与查莫罗进行总统竞选铺平了道路，这一竞争为前者提供了又一个为期6年的总统职位。

到1951年，即在索摩查最后一任总统任期伊始之际，他的统治已得到有力的巩固。通过巧妙地使一个反对者攻击另一个反对者，索摩查挫败了那些想将他赶下台的所有努力。除了1947—1948年攻击劳工运动以外，他没有依赖过度的镇压，而是采用流放和短期监禁来软化他的对手。他设法对付美国对其继续当权的不满，呼吁军队在必要时反对美国国务院。尼加拉瓜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出口部门弱小，资本积累的机会有限，但1950年的协议最终解决了索摩查家族与传统精英之间的分工，并确保后者在此后的20年内支持该政权。

经济变革与索摩查王朝的基础

在索摩查—查莫罗协议签订前夕，尼加拉瓜经济实际上已停滞；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20年代末的水平，事实上自

1941 年以来没有变化。[1] 人均实际收入不仅在中美洲是最低的，而且在除海地以外的拉丁美洲也是倒数第一。[2] 在几乎一个世纪内，尼加拉瓜采用的是出口导向模式，其收效最为一般化：1949 年的出口仅为人均 23 美元（哥斯达黎加为人均 63 美元）；如不包括黄金出口（这实际上全由外国经营），那么这一数字下降到令人可笑的 15 美元。但 1949—1970 年，尼加拉瓜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任何其他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到 60 年代中期，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他中美洲国家（除哥斯达黎加以外），并达到了拉美的中等水平。在同一时期（1949—1970 年），尼加拉瓜的出口增长了 667%（年增长 10.2%），整个拉美为 178%，因此人均出口 1970 年达到了 98 美元，居中美洲第二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在拉美名列前茅。

这一经济变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显著的周期：50 年代前半期和 60 年代前半期是增长异常快的阶段，各后半期的 5 年是经济的适度发展阶段。快速增长和周期都决定于出口部门的运气，该部门使传统出口产品的名单上增加了几个新品种。

增加的这些新产品中第一个是棉花，它在 30 年代后期曾短暂地出现在出口产品名单上。1949 年，棉花占总出口的不足 1%；1955 年，上升到 38.9%，使棉花的重要性大于咖啡（34.9%）和黄金（10.2%）。此后是一个收缩阶段，这是因为世界价格下跌和技术困难引起的。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上半期，当时的第二次繁荣期在 1965 年以前的 5 年时间内使棉花出口量增长 4 倍。1958 年后牛肉出口的增长可以说是同样了不起的。牧牛业是以格拉纳达为基地的保守党精英的传统优势，这一行业因采用现代化的屠宰场和高效能的运输系统而得到改变。索摩查在向美国出口牛肉方面发挥了先驱作用；牛肉出口从 1958 年的零提高到 1970

---

① 见 V·布尔默 托马斯：《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学》表 A3。

② 见拉美经委会：《拉美增长的历史系列》（圣地亚哥，1978 年），表 2。

年的近3000万美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15%。继牛肉之后，食糖也成为一种成功的出口商品；蔗糖因1960年后美国给予古巴的食糖配额被重新分配而获益匪浅。就蔗糖而言，主要受益者是保守党的佩利亚斯集团，它是圣安东尼奥榨糖厂的主要股东，尽管60年代末索摩查家族拥有在尼加拉瓜开业的6家糖厂中的两家。

农产品出口之所以出现繁荣，是因为经济政策将这一农业部门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在科多瓦于1955年正式贬值之前（从1美元等于5科多瓦降为7科多瓦），农产品出口商能以优惠的自由市场汇率将其美元兑换成当地通货。贬值以后（最后一次是1979年），尼加拉瓜农场主享受着非同一般的价格稳定，这一稳定使投入的成本牢牢地得到控制。他们还得益于以下因素：农村工会软弱无力、未能对农业工人实施1945年的劳工法以及没有规定最低的农业工资（至少1962年以前是这样）。这些因素加上人口压力，保证了固定实际工资的劳动力充分供应，即或在收获季节亦非例外。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信贷的发放被特意用来促进农产品出口，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出口获得的信贷仅支付最高为2%的利率（用于其他目的的商业银行贷款利息为8%）。

农产品并非是尼加拉瓜出口繁荣的唯一来源。196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为尼加拉瓜向其他中美洲国家扩大制成品出口奠定了基础。许多产品，如食用油和纺织品，是以新兴农产品出口为基础的，但其他产品则是更为常见的进口密集型“最后成品”的消费品，这种消费品因中美洲共同市场采用新的关税制而变得极为有利可图。跨国资本（主要来自美国）被那些工业机会吸引到尼加拉瓜，加上异常吸引人的税收待遇和农产品出口商业化中的赢利机会，那些吸引力就更大了。但农产品出口的生产一般仍然掌握在本国人手中。

50年代初期出现的棉花繁荣非常有利可图，使受惠者即刻拥有大笔金融盈余。这就促使两家不受索摩查家族控制的私有金融机构得以成立。第一家是美洲银行（BANAMER），成立于1952

年，创建者是以格拉纳达为基地的一批商人，他们的首领是保守党精英中的一员西尔维奥·F·佩利亚斯。第二家是尼加拉瓜银行（BANIC），于1953年开业，其主要股东与莱昂和自由党有联系。在确立尼加拉瓜的现代资本主义方面，这两家新银行发挥了主要作用。它们剥夺了索摩查家族在发放稀缺的信贷方面拥有的实际垄断权。每家银行都在不同的部门中建立了一系列企业，这些企业全部或部分地控制在股东手中，因此有可能在尼加拉瓜经济中出现两个不属于索摩查家族的主导集团。美洲银行集团、尼加拉瓜银行集团和索摩查家族在农产品出口、制造业和商业中都有重要的利益，而前两个集团则在建筑业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至少70年代初期以前是如此）。

在与公共金融机构的关系方面，索摩查家族继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一地位因1953年建立全国发展委员会（INFONAC）和1966年创建住房银行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尼加拉瓜银行和美洲银行的建立为传统精英和一小批新兴企业家分享经济变革的好处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资产阶级以不公正竞争为由对40年代期间索摩查统治的巩固进行的反抗结束了，直到70年代中期才再次出现。

但是，1950年后经济变革好处的分配是十分狭窄的：60年代后期，1%的存款人拥有几乎50%的储蓄存款。[①] 与此同时，农业的迅速变革产生了一种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新兴出口产品的发展不是出现在未开发的边远地区（靠近大西洋海岸），而是在有人居住的太平洋沿岸省份。因此，一部分农民被赶往未开发地区不太肥沃的土地，其他人则沦为无地的农业工人，还有一些人流向城市（主要是马那瓜）。

这种社会动荡也反映在其他中美洲地区，但它在尼加拉瓜的

① 参见约翰·莫里斯·瑞安等：《尼加拉瓜地区手册》（华盛顿，1970年），第312页。

影响却更具戏剧性，因为尼加拉瓜的变革速度快于其他地方，而且因为为了抵消社会动荡的影响而进行改革的努力尤为软弱。虽然土改法得以通过，并且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影响下于1963年建立了全国土地协会，但其影响是有限的。同样，为促进面向国内市场的农产品生产而设立的尼加拉瓜国内外贸易全国委员会（INCEI）也因缺少资源而无法刺激国内生产和增加食品保证。1962年，劳工法中增加了一项最低工资的条款，但最低工资的数额被定得如此之低，以致它对工人获得的工资没有明显的影响，而1957年实施的社会保险计划则从未超出马那瓜市。

伴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变革的社会动荡从未严重地困扰索摩查独裁。相反，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使索摩查在保守党和独立自由党中的反对派精神涣散。因此，索摩查·加西亚不仅能用最少的镇压来进行统治，而且还能建立一个王朝——加勒比地区的其他独裁者在那些时期都未能成功地实现这样的结合。

索摩查的两个合法儿子路易斯和阿纳斯塔西奥（“塔切托”）早在几年前就被指定为接班人。大儿子路易斯——一个受过训练的农业工程师——于1947—1948年期间在帮助独裁政权打破国际上的孤立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阿纳斯塔西奥结束了在西点军校的军训后于1946年回到尼加拉瓜，参加了国民警卫队。第三个（不合法）儿子何塞早在1933年就应征加入国民警卫队，40年代已被提拔为军官。路易斯于1950年进入国会；到1956年，他已获得第一接班人的主要地位，因而能保证使这个索摩查在其父亲遇到什么事情时可填补总统位置。与此同时，阿纳斯塔西奥已成为国民警卫队代理总队长，何塞被提拔为少校。

索摩查对尼加拉瓜国家机器的控制于50年代中期得到确立。但他仍然受到来自加勒比军团的外部威胁；加勒比军团是一个由革命者组成的组织松散的团体，旨在推翻本地区的独裁统治；它的最大成就是何塞·菲格雷斯在哥斯达黎加内战中取胜。菲格雷斯没有忘记加勒比军团对他的帮助，因此，他于1954年4月参与

了由埃米利亚诺·查莫罗领导的尼加拉瓜流放者刺杀索摩查的计划。虽然这一计划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但索摩查因卷入1954年5月推翻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左翼政府而暂时未对菲格雷斯进行报复。索摩查长期十分起劲地玩弄反共牌，并获得了大量美国军事装备的奖赏，还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美军使团和一个美国军援项目。作为回报，尼加拉瓜遂向危地马拉的反革命分子提供训练中心和其他后勤援助。阿本斯的垮台使索摩查能放手对菲格雷斯进行报复，因此，国民警卫队于1955年1月为一股由流放人员组成的武装力量进攻哥斯达黎加提供了帮助。菲格雷斯以组建志愿军和发动外交攻势来进行反击；这一外交攻势促使美国在巴拿马的驻军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也使美洲国家组织温和地谴责了尼加拉瓜在这一侵略中的作用。但索摩查已达到目的；9月，两位领导人签订了两国间的友好协定和和解条约，因此，尼加拉瓜独裁者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麻烦。

当索摩查于1956年9月遇刺时，他的独裁统治在国内外都没有遇到严重的威胁。在此以前，他已为连任下一届总统而获得了自由党的提名。总统的继承是相对顺利的，并因来自美军驻巴拿马医院的一则令人误解的报道而变得更为容易。索摩查是在美国大使的干预下飞往巴拿马的，这则报道说这个独裁者将得到康复。路易斯成为代总统；阿纳斯塔西奥为国民警卫队总队长；在索摩查被刺后的日子里确保国民警卫队忠诚的盖坦上校尽管费尽心机，但还是被流放到阿根廷任大使。

通过1957年2月的欺骗性选举，路易斯·索摩查正式掌握了总统职位。这次选举遭到了除保守国民党（PNC）这个傀儡以外的所有反对派的抵制。基督教社会党（PSC）是为了对这次大选作出反应而创建的，并获得了较为年轻的保守党人的支持。这些保守党人因他们的党无法对独裁统治施加任何政治影响而感到不满。在路易斯执政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大规模的镇压是一个特征——包括监禁《新闻报》主编佩德罗·华金·查莫罗和在

1947 年大选中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埃诺克·阿瓜多博士。但是，一旦索摩查就任总统，他就表明：他既想使尼加拉瓜实现现代化，又要维护索摩查家族的霸权。重要的是，不管这一切是多么虚伪，战后时期所有主要的社会——经济改革都是在他的 6 年任期（1957--1963 年）内出现的。此外，新闻也变得相对自由，1959 年，从宪法上禁止连任总统的规定被重新提出。

1955 年与哥斯达黎加签订的条约或许结束了菲格雷斯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挑战，但古巴革命却产生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潜在威胁。与此同时，古巴革命为这一王朝提供了一个玩弄反共牌和讨好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的良机。早在 1959 年年中，即在卡斯特罗获胜后的第六个月，路易斯、索摩查就指控古巴支持推翻其政权的努力，因此尼加拉瓜在 1961 年 4 月的猪湾失败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为运送军队和空袭提供基地。对美国的这种支持远非无关紧要，因为古巴革命鼓舞了索摩查王朝的较为激进的反对者：猪湾事件发生数月后，由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领导的一批尼加拉瓜流放者成立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

尽管反对这个王朝的阴谋不胜枚举，但路易斯·索摩查有足够的信心在 1963 年 2 月的总统选举中作为旁观者稳操胜券。由于索摩查家族坚持要选择一个较受欢迎的人物，自由党推举雷内·希克为路易斯·索摩查的候选人。一俟人们知道选举舞弊将确保希克取胜，保守党候选人费尔南多·阿圭罗立即退出竞选。希克是一个傀儡，但他竟然触怒了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因为他将一个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国民警卫队官员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并为保证使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被流放而不是被监禁进行了干预。国民警卫队总队长从不认为其兄弟的间接统治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希克的所作所为使他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决心参加

1967 年 2 月的选举。①

另一个索摩查就任总统的前景促使反对派对独裁统治发起了自 1944 年以来最激烈的挑战。保守党、独立自由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反对派联盟 (UNO)，在总统候选人费尔南多·阿圭罗博士的领导下为大选而斗争。全国反对派联盟吸引支持者的规模以及肯定会发生的选举舞弊，使反对派领导人深信能组织起一个民众运动来推翻这个王朝。1967 年 1 月，4 万到 6 万人在马那瓜举行了一次集会，但国民警卫队仍然忠于索摩查家族，驱散了人群，造成了巨大伤亡。翌月，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稳稳当当地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并担任了国民警卫队头目。如同其父亲那样，他控制了尼加拉瓜两个主要机构；当他的兄弟路易斯于 1967 年 4 月去世后，另一种限制性影响力消失了。

1967 年的事件粉碎了合法的反对派；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城市或农村人口中都无法建立基地。由于反对派已士气低落，年轻的索摩查想起了他父亲的主意，即与反对派达成一个协议，为反对派提供最低限度的参与，以此来交换他们对索摩查家族霸权的承认。这个协议于 1971 年 3 月达成，美国大使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该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由 3 人组成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委员会，这 3 人是费尔南多·阿圭罗和索摩查任命的两人。这一执政委员会将从 1972 年 5 月起领导这个国家，直到 1974 年 12 月举行新的总统选举。这个协议使反对派出现了分裂，但协议却能被彻底实施，从而使仍然担任国民警卫队总队长的索摩查牢固地掌握着实权。索摩查获得了尼克松政府的全力支持，他面临的合法反对派力量既软弱无力，又四分五裂，来自革命左派的威胁也微不足道；当他退出总统职位时，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确保这个王朝的生存方面，他与其父亲一样，都是成功的。

① 自由党同意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参加竞选后不出两天，希克就死了；洛伦索·格雷罗取代希克，完成了最后几个月的总统任期。

王朝的覆灭

与1950年的索摩查—查莫罗条约不同的是，索摩查—阿圭罗协议未能巩固当局的权力。相反，人们对这一协议的反应象征着独裁统治分崩离析的第一阶段。索摩查主义的成功是以以下几个支柱为基础的：强大的国民警卫队忠诚于索摩查家族；美国无条件给予支持；与资产阶级中最有力的部分达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存在这样一种政党体制，使反对派在向当局发起挑战时一般严格遵守苛刻的限制以换取报刊和广播自由以及使镇压减少到最低限度。独裁统治还依赖于天主教教会，教会赞同独裁统治的政治纲领，并只为灵性需要而传教。

政党体制和天主教教会的传统作用都因索摩查—阿圭罗协议而出现裂缝。自1968年起一直由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大主教任领导人的天主教教会拒绝同意这个协议，并通过一系列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批评独裁统治，发出了进入政治舞台的信号。自60年代后期起，基督教的基层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尼加拉瓜；如同拉美的其它地区那样，尼加拉瓜的天主教教会愈加关注社会问题，尽管这一关注在主要分布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新教教会中不太明显。保守党是索摩查主义面临的合法反对派的传统中心所在，该党因阿圭罗决定与当局合作而发生了重大震动，并分裂成4个团体。甚至索摩查派的自由党也受到了影响，因为这个协议实际上保证索摩查在预期于1974年的选举中再次担任7年总统，从而剥夺其他人晋升高职的机会。索摩查的亲戚、曾在政府各个部门任职的拉米罗·萨卡萨博士正式退出该党，另建立宪主义自由党（PLC）。

索摩查或许能经受住这些困难，但1972年12月23日夜摧毁马那瓜的地震进一步损害了对当局的支持。在那些日子里，索摩查无法控制国民警卫队，因为它在肆无忌惮地抢劫；在一段短时间内，法律和秩序掌握在美国和一些中美洲国家的军队手中，这

些军队是根据1964年的军事条约即中美洲防务委员会(CONDE-CA)的协定而派驻尼加拉瓜的。国民警卫队的战无不胜论和对索摩查家族无可怀疑的忠诚大为动摇；当局的一些反对派确信国民警卫队内部会发生一次政变，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也深信其武装斗争战略确实能成功。

索摩查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是建立一个全国紧急委员会，并将运气不佳的阿圭罗赶出已经毫无权力的3人统治集团。作为该委员会的头目，索摩查有权决定如何分配国际社会为救济地震灾害而慷慨提供的资金。花费这笔资金的方式包括大规模的腐败（尤其是国民警卫队所为）和偏爱现有的和新建的索摩查实业；索摩查家族已在土地开发、建筑和金融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不诚实竞争这一指控之下，与资产阶级的心照不宣的联盟开始垮台；尼加拉瓜银行集团和美洲银行集团与私营部门的保护伞组织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COSEP）一起，抱怨索摩查利用其特权地位在牺牲其余私人部门的条件下扩展其家族的利益。

地震还使沉默了25年的工会运动获得了新生。在进口型通货膨胀下以及受由地震导致的国内商品短缺的影响，生活开支在1972—1973年期间上升了20%。所有尼加拉瓜工人的实际工资都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但马那瓜的建筑工人则处在要求调整工资的有利地位；总的说来，他们在1973年的罢工是成功的，象征着工人联合会（独立工人总联合会CGTI）取得了巨大胜利；该联合会是由非法的社会党于60年代成立的。

劳工运动于1948年被摧毁后，劳动力获得了快速增长，其中雇佣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农产品出口的重视使农村无产者的数量和重要性得到显著提高，而许多小农场主则感受到大规模农业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威胁。这为独裁统治的政治反对者提供了机会，但劳工组织（尤其在农村地区）遇到了受国民警卫队支持的雇主们的强烈抵抗。建筑工人的胜利使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获得了富有希望的新生，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尤为迅速地利用这些新

出现的机会，在农村地区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1974年，索摩查决定连任7年总统（他必然会取胜），这一决定为反对派力量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催化剂。其结果是成立了民主解放联盟（UDEL），由佩德罗·华金·查莫罗领导；该组织将不满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主要是萨卡萨分裂出来的组织）与独立自由党、基督教社会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和独立工人总联合会合成一体。这是迄今为止反对索摩查主义的范围最广的反对派组织，包括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和传统精英的代表，它标志着过去的宗派主义和个人至上主义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民主解放联盟不包括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后者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来指责前者所搞的阶级合作。民主解放联盟没有得到美国官员的认可，因为美国官员仍然忠于索摩查主义，并因反对派中有共产党人而感到不安。同样重要的是，民主解放联盟也没有得到所有私营部门的支持。

1972年地震后，私营部门或许已经对索摩查集团的不诚实竞争表示出不满，但大量有利可图的机会却损害了整个反索摩查力量的团结。在1969—1972年的相对停滞阶段过去以后，尼加拉瓜经济因地震后的重建和农产品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而在1973和1974年获得迅速的发展。标准果品公司于1972年重新进入这个国家，香蕉出口快速增长，而棉花则于1970年开始其第三次战后繁荣，棉花出口在7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水平。但化肥成本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大幅度提高，因此棉花的发展只能通过利用新的土地来实现。这就对国内的粮食生产增加了压力，人均粮食生产未见增长；1972年以后的高通货膨胀使农业劳动力（40%的农业劳动力无地）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难以忍受。

民主解放联盟的成立对索摩查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这个联盟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老对手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获得了声望；联盟倡导战术性阶级联合的战略，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则始终反对这种联合。阵线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并没有排除吸收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天主教徒为成员的可能性，但阵线对尼加拉瓜资产阶级及其与索摩查的合作仍然怀有强烈的敌视。因此，微不足道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4年底出色地绑架了数名尼加拉瓜主要杰出人物；这次绑架使该阵线引来了全国（以及国际上）的注意，并再次断定：阵线的武装斗争战略将取代民主解放联盟所强调的反索摩查力量广泛联合和对话。

这次绑架迫使索摩查满足了阵线的几乎所有要求，包括释放其被关押在监狱的领导人。因此，这个丢了面子的独裁者开始掀起自索摩查主义问世以来最为强烈的镇压浪潮。虽然王朝准备必要时（主要是1948年、1956—1957年和1967年）使用武力，但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并不是索摩查父亲和兄弟的特征，因为这两个人都容忍了一些报刊、电台对当局的批评，并常常在一段安定时期以后从监狱中释放一些反对者。而阿纳斯塔西奥对这一老练的手腕并无同情感，因而对绑架事件所作出的反应是实施戒严、军事管制、新闻检查以及开展一个由国民警卫队控制的恐怖运动。其结果是人权组织在国际范围内谴责这些做法，从而使索摩查在1977年初的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中处于不受欢迎的显著地位；此外，尼加拉瓜的私营部门（繁荣时期现已过去）开始拉开与当局的距离。增加税收遇到的是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要求进行抵制的号召，资本外流1977年真正开始，因而当局被迫依赖于举借外债，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银行；举借外债是为了弥补政府赤字和维持通货稳定。

镇压浪潮并没有成功地削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已分解为3个集团。重要的是，其中两个集团——无产阶级派（TP）和持久人民战争派（GPP）——认为尼加拉瓜革命将是一场长期和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包括在城市（无产阶级派的主张）和农村（持久人民战争派的主张）的群众中进行耐心的意识形态工作。第三派认为，尼加拉瓜内部状况的分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应立即进行一次全面的起义。因此，由丹尼尔·奥尔特加和温贝托·奥尔特加领导的这一起义派被迫承认有必要与反对当局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结成战术上的联盟，以确保起义取得成功。这一态度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层中占了上风。1977 年 10 月，起义派（又称第三派）主持组建了一个由 12 位著名尼加拉瓜人参加的团体（十二人集团），这一派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这 12 位尼加拉瓜人坚持要求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参加索摩查以后的政权。同月，起义派试图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暴动，但这次暴动被索摩查不费吹灰之力击败了，并被其他两派公开指责为不成熟和冒险。

在卡特政府的压力下，索摩查——勉强地从两次心脏病中恢复健康——于 1977 年 9 月撤消了戒严令。这为反对当局的一系列抗议提供了一个信号。但索摩查仍然感到相当安稳。国民警卫队是忠诚的，并且表明，在反对起义派方面，它能有效地打击游击队的袭击；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仍然流进来，尽管索摩查批评卡特政府；而且，索摩查的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远未实现团结。但是，1978 年 1 月佩德罗·华金·查莫罗的被判则使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查莫罗是《新闻报》的主编、民主解放联盟的圣雄式领袖以及索摩查家族的终生敌手）。明显要当继承人的索摩查儿子与这次刺杀有牵连。这一谋杀引起了此伏彼起的罢工浪潮和自发的造反。尤为重要的是，它促使当局的反对者进行对话，并在几个月内产生出了一种反索摩查的团结；这种团结在此前 40 年中是从未有过的。

到 1978 年 5 月，关于联合的对话已产生出一个新的组织：反对派广泛阵线（FAO）；它包括了民主解放联盟以及保守党中的其他各派。私营部门对反对派广泛阵线的支持因尼加拉瓜民主运动（MDN）的参与面得到保障。尼加拉瓜民主运动这个组织是由尼加拉瓜的主要企业家和索摩查的批评者阿方索·罗韦洛于 1978 年 3 月创建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是反对派广泛阵线的成员，但

十二人集团同意加入，从而确保阵线在索摩查下台后的政府中至少获得一个少数派地位，如果谈判能成功地使索摩查交权的话。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仍然是一个微不足道和四分五裂的组织，其成员不足1000人。它甘冒被反对派广泛阵线排挤的危险，尽管十二人集团已参与该阵线。然而，1月和2月的自发性造反已提高了起义派的地位，并为与其他两派实现统一铺平了道路（最终于1979年3月实现）。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反对派广泛阵线的回答是于1978年7月成立人民团结运动（MPU），它包括了学生和青年组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已与民主解放联盟脱离关系）以及由马克思主义左派控制的小规模劳工组织（其中包括阵线于1977年成立的农村劳动者协会（ATC））。但是，人民团结运动缺少反对派广泛阵线具有的那种普遍的感染力，因此这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于反索摩查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成功的联合所作出的防卫性行动。

可见，到1978年中期，索摩查面临着两个定义清楚明了的选择：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派广泛阵线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团结运动。反对派广泛阵线将当局的传统反对派与私营部门和基督教民主党人联合了起来。它利用私营部门的罢工来削弱当局，获得了卡特政府内一些人的支持（卡特政府于1978年停止对索摩查提供军火），并深信自已能通过谈判或调停来为索摩查下台后的政权提供一种过渡。与此相反，人民团结运动将其希望寄托于武装斗争和全国性的造反，通过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组织，直接向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团体发出呼吁。

反对派广泛阵线的态度并没有因卡特政府对待索摩查的某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受益。对于索摩查在美国国会中的许多朋友施加的压力，卡特的反应是1978年年中致信这个独裁者，祝贺他在改善人权方面获得了进展；与此同时，索摩查的助手却在试图使人们支持一个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将导致独裁者辞职、"保留国民警卫队和排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这个一揽子计划很快被说

成是“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8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占领了尼加拉瓜国会使用的国家宫，这使反对派广泛阵线的地位更加软弱。这一行动使索摩查丢尽了脸，并在9月触发了一个自发性造反的浪潮，从而使起义派——这一派已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团结运动中居统治地位——深信其战略是正确的。占据国家宫和此后的造反虽被国民警卫队击败，但它壮大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阵营，因此，到这一年年底，其成员已达3000人，国民警卫队则为1万人。

来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挑战为那些寻求谈判解决方案者（主要是反对派广泛阵线和卡特政府）增添了一种新的紧迫感。反对派广泛阵线的罢工和罢市政策未能成功地打击独裁统治，而独裁者却继续能获得大量外国贷款（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9年5月提供的一笔大额贷款）；而卡特政府则开始认真对待来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团结运动的挑战。甚至索摩查也最终被迫承认谈判的合理性，并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倡议。根据该倡议，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小组（由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组成）将在索摩查与反对派广泛阵线之间进行调停。该小组于10月中旬开始工作，但立即在索摩查的要求和华盛顿的愿望方面遇到了困难；索摩查坚持要求完成其于1981年终止的任期，华盛顿希望为索摩查的自由党和国民警卫队保留一种政治作用。到10月底，十二人集团（反对派广泛阵线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唯一联系途径）退出了反对派广泛阵线。翌月，一直以重重疑心注视着调停进程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重新诉诸武装斗争，从而促使反对派广泛阵线接受索摩查提出的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这就导致更多的组织退出反对派广泛阵线，因此，到1979年初，该阵线的主动行为戏剧性地转向起义派推崇的起义战略。由于索摩查拒绝接受美洲国家组织的条件，即由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他应否继续掌权，调停努力终于失败。

1979年2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利用谈判失败的机会，通

过成立全国爱国阵线（FPN）来壮大其基础。全国爱国阵线包括十二人集团、独立自由党和70年代中期从基督教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基督教人民社会党(PPSC)。该阵线的纲领比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团结运动的文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它为与反对派广泛阵线（包括私营部门）进行政治合作提供了基础。但是，无可置疑，谈判的失败以及不断采用起义的趋势已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3月正式统一）在反索摩查的统一战线中居领导地位。

最后一次进攻于5月底发起。当时，索摩查政权在国际上已陷于孤立；一些拉美国家已收回其承认，桑地诺分子经哥斯达黎加从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古巴那里获得了军火。卡特政府为复活"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主义"计划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但在美洲国家组织中被彻底击败。美洲国家组织接受了反索摩查联盟于6月任命的5人执政委员会提出的保证，即实行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和不结盟。独裁者辞职后于7月17日将权力交与不知名的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他出逃到迈阿密一事促使国民警卫队出现了最后的瓦解。胜利者于7月19日进军马那瓜，从而结束了一场已使300万总人口中5万人丧生的战争。

导致索摩查倒台的事件表明在反独裁斗争中取得团结一致的重要性。首先由民主解放联盟、尔后由反对派广泛阵线代表的广泛联合已表现出反索摩查王朝的深度，但这种联合未能动员劳工运动中的各派，并在劝说独裁者下台时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团结运动在把劳工运动（尤其是农业工人）结合进斗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在1978年末对独裁统治发起直接的军事挑战，但他们的战士仍然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警卫队的对手。谈判的失败和调停的失效使反对派广泛阵线除了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合作或与索摩查和好以外，别无选择。它选择前者是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技能的一种称颂，也是对索摩查的蔑视。

1979 年 2 月以后新出现的联合终于将反对独裁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结成一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勇气和胆量吸引了城市青年、学生和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武装斗争中承认阵线的权力，接受阵线的领导。到 6 月，由阵线训练或由它装备的战士的数量在军事上已能向国民警卫队发起挑战，而独裁者则在政治上完全孤立。虽然这一广泛联合中的许多团体在关于与阵线合作是否明智尚有保留，但这种战略在打击索摩查以及索摩查主义方面是极其有效的。

桑地诺统治的巩固

索摩查的出逃和国民警卫队的崩溃标志着反索摩查联盟取得了军事胜利，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经济满目疮痍，国内生产总值1978 年下降 7.8%以后，又于 1979 年下跌 26.4%。这个国家的国际储备已彻底枯竭，索摩查留下了 16 亿美元的债务，其中不少部分从未投在尼加拉瓜，因而难以还本付息。农产品出口受到了内战的严重影响——棉花种植业降低到 50 年代的水平，通货膨胀因严重匮乏而上升到 60%。

由于独裁者下台，反索摩查联盟也开始遇到了困难。[①]在哥斯达黎加达成的协议（蓬塔雷纳斯协议）要求由 5 人组成的执政委员会确定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和不结盟外交政策。第一个目标将通过成立一个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占少数席位的国务委员会以及在某个未确定的时期举行自由选举来实现；还将建设一支无党派属性的国民军队来取代国民警卫队。但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是从起义中产生的，其立场比与其结成战术联盟的团体的立场强硬得多，而这些团体未能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那里得到任何关于实施蓬塔雷纳斯计划的保证。对于因久经沙场而变得强大的

---

① 索摩查于 1980 年 9 月在巴拉圭被刺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被刺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所为。

军队，桑地诺分子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这支军队已击败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的残余人员已逃往洪都拉斯。因此，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一年前还是一个弱小和四分五裂的组织，现在却处在十分有利的地位，通过对军队的控制及其在执政委员会中潜在的多数席位，决定了尼加拉瓜革命的开始阶段。丹尼尔·奥尔特加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执政委员会中唯一公认的成员，但莫伊塞斯·哈桑（人民团结运动和全国爱国阵线的领导人）是一个亲密的同情者，塞尔希奥·拉米雷斯自 1975 年以来一直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非战斗的秘密成员。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建设一支常备军即桑地诺人民军（EPS），以及一支警察力量即桑地诺警察。顾名思义，这些组织的党派属性很强；他们非常重视政治教育，训练工作主要掌握在古巴人和东欧人手中（美国、巴拿马和委内瑞拉有礼貌地提出了帮助，但都遭到了严正拒绝）。1979 年年底，贝尔纳迪诺·拉里奥斯（前国民警卫队官员）的国防部长之职被温贝托·奥尔特加取而代之——温贝托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和桑地诺人民军总司令。在此以前，人们对建设一支有党派属性的军队的反对一直沉默不言；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违反蓬塔雷纳斯协议的。到 1980 年年底，桑地诺人民军已超过国民警卫队人数最多时的规模，1983 年通过征兵法以后达到 6 万多人；应征者服务两年后转入后备役。

1979 年 7 月执政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把主要经济职务（除土改以外）交给私营部门的代表。这些部长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就外债进行谈判、通过国际复兴基金会（FIR）来协调外国援助以及向私人和公共部门分发信贷。在最初阶段，这一领域的进展是相对顺利的；来自双边、多边和商业渠道的外国贷款为数不少，债务成功地根据慷慨的条件进行了重新安排。政府的重点体现在被称作“1980 年计划”的文件中；恢复农产品出口获得了特别的重视，工资增长被控制在通货膨胀率之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1980

年增长了11%后，又于1981年增长了5.3%。

在实施经济恢复计划的最初阶段，主要的挑战不是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极左派。这些团体认为，政府经济政策本质上的保守性质（甚至索摩查的劳工法也未被废止）背叛了革命，因此它们通过发动罢工和示威来进行反抗。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对此作出了强硬的反应，1980年初通过紧急状态关押了极左派领导人，并禁止其组织开展活动，同时对由亲桑地诺的农村劳动者协会领导的侵占土地事件作出了一些让步。土改计划的实施于1981年年中进一步加快，当时通过一个法律，允许没收利用率低或被废弃的不属于索摩查的财产，但收益高的农产品出口商不受影响，而且对农场规模的上限不作规定（不同于萨尔瓦多）。

在有些方面，对于政府来说，重建崩溃的经济是革命的最容易的阶段，因为反索摩查联盟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方面有着广泛的一致性。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中的9名成员在三派中平均分配。这个委员会始终坚持在尼加拉瓜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但这被看作是一个长远的目标。由于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原因，人们认识到私营部门在重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全国领导委员会认为，这个长远的目标完全不能被推迟，因此，第一个步骤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有部门（人民所有制部门）。这一步是通过没收索摩查的财产以及将金融机构、外贸和本国资源（包括矿业）收归国有来实现的。

这些措施在其他拉美国家或许会引起私营部门的强烈反对，但在尼加拉瓜却仅激起一些微不足道的涟漪。索摩查财产（包括全国可耕地的20%及一些效率最高的农场和工厂）显然是战利品，而金融机构（因资本外流而告枯竭）则陷入破产境地。在新的土改部门的指导下，没收的农业地产（生产众多出口农产品）被改成国营农场；到1980年，人民所有制部门已控制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4%。

尽管革命的第一阶段中经济政策的性质是温和的，但到1981

年年底，私营部门的保护组织（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已与政府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该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被监禁或流放，还有一人被杀。导致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主要是桑地诺分子的政治纲领，而非政府的经济政策（尽管早在1979年11月，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就已表露出它对私营企业前途的担忧）。索摩查的出逃使旧的政治体制彻底崩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赞赏古巴革命；他们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设尼加拉瓜国家。这就使得私营部门毫无施加政治影响或甚至分享权力的余地。

索摩查政权在最后几年中的镇压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或其他任何党派）难以发展群众组织。1977年，阵线为农业工人和妇女成立了协会（农村劳动者协会、妇女国是研究会即AMPRONAC）。但它们到1979年7月尚未上升到群众组织的地位。在革命时，桑地诺分子对城市劳工、小农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控制不太稳固，而且阵线还在所有这些社会力量中面临着来自其他政党及其隶属工会的竞争。1981年年底，这一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桑地诺工人中央工会（CST）在城市劳工中获得了统治地位，亲桑地诺的全国农牧民联合会（UNAG）在小农和中农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村劳动者协会在农村无地劳动者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妇女协会（“路易莎·阿曼达·埃斯皮诺萨”尼加拉瓜妇女协会，AMNLAE）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街道的保卫桑地诺主义者委员会是依照古巴的对应机构建立起来的，[①]它因在食品配给和组织民兵方面发挥的作用而获得了显赫的重要性。不属于桑地诺的“群众”组织只有少数几个小规模的劳工协会，它们与各个反对党保持联系。

桑地诺群众组织的成功是此后桑地诺主义得以巩固的关键，也是由各个因素造成的。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由于阻止民

---

① 即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译者

众组织的产生，索摩查主义留下了一张白纸，从而使革命中最有生气的力量从零开始。其次，桑地诺分子挫败了他们的左翼竞争者想在无组织群众中获得立足之地的努力。再次，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想帮助建立非桑地诺群众组织的所有努力遭到了拒绝。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公众承认对桑地诺主义的支持能带来积极效果（如保卫桑地诺主义者委员会发放配给卡），这是对人们参与某个群众组织的一种有力刺激。

阵线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因 1979 年年底的几次内阁成员变化而进一步加强，并在 1980 年 4 月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宣布了国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桑地诺派不仅没有按照蓬塔雷纳斯协议的规定阵线在政府中占少数地位，反而与它的群众组织一起，享有绝对多数。据宣布，5 年内不进行大选。此外，桑地诺派通过将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政党（包括独立自由党）结合成一个联盟（革命爱国阵线 FPR），进一步削弱了私营部门及其政治代表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由于被剥夺了权力，它们在执政委员会中的两个成员（阿方索·罗韦洛和比奥莱塔·查莫罗）辞去了职务，由能被阵线接受的两个非桑地诺派阿图罗·克鲁斯和拉斐尔·科尔多瓦取而代之。罗韦洛试图将其尼加拉瓜民主运动变成一个主要反对党的努力被桑地诺分子挫败后不久就离开了尼加拉瓜，成为反革命领袖。

罗韦洛的出走使私营部门遇到了明显的震动，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立即行动起来，为私营企业的前途作出了保证。全国领导委员会公开和秘密地把资产阶级区分为“爱国的”和“卖国的”，强调前者在经济领域应发挥一种作用。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不情愿地加入了国务委员会，直到 1980 年后期。当时，阵线与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的关系严重恶化，因为阵线抱怨私营部门通过非资本化和资本外逃来滥用自由。为对付非资本化而实施了严厉的惩罚；外汇管制进一步加强；执政委员会还在 1981 年 9 月开始实施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私营企业最高理事会的一些领导人被

监禁。

墨西哥政府的干预使阵线与私营部门的关系1982年得到了改善，但当时，桑地诺分子遇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多种阻力。1980年9月，大西洋沿岸的布卢菲尔兹镇发生了骚乱；桑地诺军队对此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从而使大量米斯基托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从事反革命武装活动。大西洋沿岸的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索摩查的重视，而且在起义中实际上没有发挥作用。他们反对桑地诺分子残酷地迫使他们参与尼加拉瓜革命。用武力迁移许多米斯基托人的做法使国际上对桑地诺派是否尊重人权提出了疑问；阵线费时多年，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的政策，以便在大西洋沿岸争取自治的要求与反革命试图推翻桑地诺派的统治之间打入一个楔子。

阵线最难对付的敌手始终是里根政府。全国领导委员会认为，与美国的对抗是避免不了的，但它希望能将这种对抗推迟到桑地诺主义得到巩固以后。最初，卡特政府对阵线深表疑虑，并对尼加拉瓜在关于联合国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投弃权票表示不满。利用古巴人训练桑地诺人民军这种做法以及大量古巴人参加1980年的扫盲运动这件事情，美国都感到不快；而且，卡特政府还不高兴地看到尼加拉瓜于1980年3月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然而，卡特总统决心避免重演20年前在古巴问题上的失败，因此艰难地促成了一个为数不小的援助计划（对于这个计划，国会坚持要求增加一系列侮辱性的修正条款；这些条款损害了援助计划或许能产生出来的任何善意）。

里根总统早在1981年1月上台以前就已清楚地表明他是坚决反对桑地诺分子的。但是，一上台后，他又小心谨慎地行事。他的第一步是中止援助计划；该计划后来彻底停止，因为有人指控桑地诺分子深深地卷入了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装备和训练的事情。经济压力于1982年进一步升级，当时，美国参与程度很高的那些多边机构停止向尼加拉瓜放贷，美国给予尼加拉瓜的食糖配

额也被取消。贸易禁运终于在 1985 年实施，但那时两国间贸易已大大减少。

无论言词多么激烈，里根政府仍然如同其前任那样，对如何处置桑地诺分子毫无把握，尽管总统本人想清除这些人的愿望从不动摇。所有的人在事后都认识到，索摩查倒台之前的几个月是美国政府影响尼加拉瓜革命进程的最佳机会。这一良机已经失去，因而美国政府只能削弱而非推翻桑地诺分子的权力。政策在"彻底性解决"的建议与利用雇佣军来施加军事压力的主张之间摇摆不定。后一个选择因里根总统于 1981 年 11 月同意中央情报局进行反对尼加拉瓜的秘密活动而占据上风；这一秘密活动旨在动摇桑地诺派和中断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军火。

中央情报局开始把一批批毫无纪律的前国民警卫队队员"反政府武装"组织起来。他们是 1979 年 7 月逃往洪都拉斯的，此后通过跨越边境的袭击对桑地诺分子进行报复。到 1981 年年底，对桑地诺革命感到失望的志愿人员使反政府武装的数量猛增（这些志愿人员中的大多数来自大西洋沿岸），尽管其军事领导仍然牢固地掌握在索摩查分子手中。这一控制使所有反桑地诺力量不能进行成功的联合，其中有些力量（主要是 1981 年 7 月放弃革命的埃登·帕斯托拉）拒绝与那些以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反政府武装进行合作，而在哥斯达黎加开展自己的游击战运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影响下，反政府武装对桑地诺政权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尽管在公开的战斗中这支武装根本不是桑地诺人民军的对手（1981 年以来人民军一直用苏联和古巴的装备武装）。1984 年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毁坏外国船只；这一发现在短时间内软化了美国国会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但是，里根总统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个人努力使 1986 年的资金援助得到增加。然而在当时，反政府武装显然缺乏永久性地控制尼加拉瓜领土的能力，更不用说推翻桑地诺政权了，而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已促使里根政府无数次地违反国际法和美国本国的法律。

其他国家以不断增长的忧虑注视着里根政府与桑地诺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尼加拉瓜革命在初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也获得了社会党国际的支持；阵线在社会党国际中拥有观察员地位。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社会民主党人对革命的进程感到失望，从而使社会党国际在1982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政策仍然支持尼加拉瓜革命；一些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尤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在桑地诺政权与里根政府之间发挥了非官方的调解人作用。其他拉美国家惊恐地注视着美国在中美洲进行军事干预这一可能性；1983年1月成立了孔塔多拉集团（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以寻求地区性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个集团设计了一个关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21点纲要，并要求所有中美洲国家签署。但是，孔塔多拉文件没有获得里根政府的支持；里根政府不欢迎任何可能使桑地诺派继续掌权的协议；尽管华盛顿在形式上支持孔塔多拉，但它能通过其在中美洲的盟友（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来破坏谈判进程。1985年后期，孔塔多拉因成立了一个支持集团（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秘鲁）而更加强大。但那时，尼加拉瓜与其邻国的关系如此之紧张，以致即使没有美国的疑虑也难以就和平条约达成一致。1984年年中，里根政府本身开始与桑地诺政权在墨西哥进行双边对话，但这种对话在一种相互指责和互不信任的气氛中于1985年初告吹了。

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于1986年当选哥斯达黎加总统后，尼加拉瓜与其邻国的紧张关系有所松弛。阿里亚斯任期的开端是捉摸不定的；此后，他决心在5个中美洲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一个解决办法，而孔塔多拉则发挥着次要作用。1987年2月宣布的阿里亚斯计划在同年8月得到了所有5国总统的认可，因而预示着地区性危机的结束将要到来。该计划要求各个中美洲国家的政府通过民族和解委员会来与反对派集团对话，对那些为反政府而拿过武器的人实施大赦，外来军队停止支持“非正规军”。

就尼加拉瓜而言，阿里亚斯计划含蓄地承认了桑地诺政府的合法性；该计划保证以结束内战来换取深入的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因此，这个计划不符合里根总统的意愿，但里根政府（其地位因关于向伊朗出售军火和非法将资金转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丑闻而受到削弱）无法使国会接受其中美洲政策。在国会，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吉姆·赖特越来越积极地在华盛顿与马那瓜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尽管国会再次禁止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但里根政府却试图维持反政府武装的存在，而阿里亚斯计划获得了动力，因此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与反政府武装于1988年3月签订了停战协定。除了一些不重要的违反以外，这个停战协定得以保全，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的布什政府。当时，得不到美国军事援助的反政府武装显然已濒临崩溃。1989年2月，在根据阿里亚斯计划举行的第3次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上，一致同意采取措施，使反政府武装解除武装；桑地诺分子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来提出大选日期，在1990年2月而不是11月举行选举。

尼加拉瓜经济因美国的压力而深受影响，但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对经济实绩并没有帮助。由于汇率越来越定值过高，非传统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旨在以确保赢利的价格来提供投入，但这种政策不能抵御世界价格的下跌，因此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6.46亿美元下降到1988年的2亿美元。由于通货膨胀扩大了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之间的差距，用来保护城市穷人实际收入的食品补贴体系就难以管理了。因此，财政赤字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政府试图于1985年和1986年逐步减少补贴的努力使通货膨胀达到三位数，而财政赤字却没有得到控制。当时，财政赤字首先是因对付反政府武装威胁的国防开支而引起的。黑市因高通货膨胀和官方控制而不断发展，从而鼓励人们向马那瓜移民，未注册的小商业迅速出现。官方的分配渠道越来越受到冷落，1981年后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年尼加拉瓜受到了一次飓风的袭击）退回到了50年代的水平，是中美

洲的倒数第一。

到1989年初，通货膨胀率超过100%，桑地诺政权面临着金融和财政体系彻底崩溃的可能性。遏止通货膨胀的正统措施已无法回避（由于把赌注下在反政府武装的灭亡上），桑地诺政权开始解雇数千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包括军队成员，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1990年总统选举的风险中。官方市场和平行市场上的汇率开始接近；相对价格多年来第一次获得了一种外表上的合理性，尽管私营部门因考虑到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而非常不愿意进行投资。

尼加拉瓜的经济困难没有妨碍桑地诺主义的进一步巩固。革命的最初几年使卫生、教育和扫盲（1980年进行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扫盲运动）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一切只是在经济下降的几年中才有所退步。这些成就以及群众组织的发展使阵线在工人和农民中获得了坚固的基础；阵线将工人和农民视作天然的选民。桑地诺人民军、民兵和预备役人员使政府的潜在军事力量达到30万——占成年人口的极大比例。1982年重新实施的紧急状态被定期延长，从而使当局获得了控制或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巨大力量。反对派报纸《新闻报》在严格的新闻检查中得以生存下来，直到1986年才停刊18个月。由于把电视控制在国家手中，并使独立的电台受到严格的管制，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控制通信手段方面获得了垄断地位。

但阵线并不试图彻底清除国内反对派，或者说它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桑地诺分子相信爱国的或民主的资产阶级能在国家计划确定的经济重点中予以配合，他们还希望出现一个在新的政治体制中能接受桑地诺领导权的忠诚的反对派。将大选提前一年的决定（比里根总统1984年11月再次当选早两天）使这一问题早日出现；7个从极左到中右派的政党（其中包括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内）进行了注册。政府试图让民主协调委员会参与大选，但未成功。该委员会代表着国务委员会中的右翼联盟，成立于1982

年。它退出了大选。大选使阵线获得了总统职位（丹尼尔·奥尔特加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并使阵线在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中获得坚实的2/3多数席位。在国民议会中，其他政党以不同程度的犹豫发挥着正式的反对派作用。国民议会起草的新宪法于1987年1月生效，权力牢固地集中在总统手中。

这次大选清楚地表明了反对党的局限性，从而使天主教会成为抵抗巩固桑地诺主义的主要力量。在革命初期的几年时间内，由于民间教会得到发展，一些激进的教士参与政府，教会的僧侣统治被削弱。但是，米格尔·奥万多—布拉沃升为红衣主教后，就开始批评政府，其顽强性如同他批评索摩查那样，因此他在公共布道时吸引了许多人。在对付僧侣统治时，桑地诺分子交替使用镇压和对话，并希望（可能是天真地希望）教会能尊重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包括征兵）。但宗教自由本身并不是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一个问题。

桑地诺政权面临的另一个反对派来自群众组织本身。在最初的5年中，土改计划被用来建设国营农场、发展合作社和向那些拥有不稳固财产权的小农分发土地证。首要任务是维持农产品出口；虽然国营农场部门1982年以后开始衰落，但获得单独土地证的无地工人为数极少。1985年，来自农村劳动者协会和全国农牧民联合会的压力迫使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土改法于1986年1月被修改，以适应新的政策，数以千计的无地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这些土地在过去的许多情况下是用于农产品出口的。这一变化富有戏剧性：在一段短时间内，保守的尼加拉瓜改革计划变得激进了，从而影响到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与此同时，新计划也有可能出现损害最后一个出口收入来源的危险，并使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美国的禁运没有阻碍尼加拉瓜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尤其因为出口仍然是多样化的。但是，在战略性进口物资（如石油）方面尼加拉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尼加拉瓜国

际收支的支持却持续增长。苏联多次表明它不会像对待古巴那样负担尼加拉瓜革命的经济和财政费用，但尼加拉瓜与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地缘政治逻辑却迫使俄国人一年又一年地扩大其承诺。到 1989 年初，尼加拉瓜开始从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获得为其农产品出口提供的特别条件，还成为经互会观察员，并希望最终成为正式成员。西欧的双边援助仍然进入尼加拉瓜；根据西欧与中美洲于 1985 年签订的合作协定，尼加拉瓜是西欧多边援助的受惠国，但其相对重要性却在下降。

1987 年 1 月新宪法的实施完成了桑地诺革命的体制化。如根据政治多元化、不结盟和混合经济的公开承诺来判断，那么革命已失败，因为这些特征是以一种严重扭曲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尼加拉瓜没有成为第二个古巴，而且阵线可以有理由声称：桑地诺主义创造了一个新尼加拉瓜，而非另一个古巴。桑地诺政权没有主管所有生产部门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农业中牢固地确立了私人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被继承，但不能被买卖）；农业和工业中的私人大生产者得到容忍，但须在价格、信贷和外汇方面受到多种限制，而少数跨国公司仍然在尼加拉瓜营业，宪法还许诺将制订一个新的外国投资法。在严格的限制范围内，对当局的批评是容许的，忠诚的反对派萌芽已开始在议会中显露；尼加拉瓜与许多类型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仍然存在，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最密切，而且尼加拉瓜在联合国的投票模式非常类似于古巴的模式。

然而，新尼加拉瓜的建设并不意味着桑地诺分子已成功地解决了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似乎不愿意通过选举来分割权力；首先由美国于 20 年代提出的无党派军队这个梦想仍然是遥远的。桑地诺分子希望建立一个较少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世界市场条件的经济，但他们的作用已降低为管理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膨胀的外债和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阵线仍然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但生产水平和实际工资远远低于革命前的最高

水平，而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正统性已让位于印刷货币和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大西洋沿岸的居民依然不信任来自马那瓜的统治，他们融合进尼加拉瓜生活依然远远没有完成。

在反对巩固桑地诺主义的人们中，没有人能相当满意其自身的努力。阵线在反索摩查斗争中的盟友已表现出异常的天真；反政府武装尽情地从事骇人听闻的违反人权的事情，在军事上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合法的政党因内讧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14 个政党为参加 1990 年大选而结成一个集团是以最为脆弱的团结为基础的，虽然它至少提供了一个通过选举来击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机会。卡特政府未能在一年前迫使索摩查辞职，因而失去了一个在尼加拉瓜促进民主的良机，而里根政府则因单方面攻击尼加拉瓜而使西方盟友极度紧张。

不仅仅桑地诺分子的反对派常出现错误的判断。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也错误地评价了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认为其“爱国的”成分在剥夺了政治权力和外汇以后仍然会继续生产和投资。因此，混合经济战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损害，但桑地诺政府缺乏资金来接管私营部门。阵线领导人有时还不能很好地抓住国际外交中的微妙之处，从而使尼加拉瓜不必要地失去了一部分外国的支持。全国领导委员会使尼加拉瓜历史不适当地影响了它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领导人显然对过去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

1930 年以来的尼加拉瓜历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悲剧。地理的偶然性使尼加拉瓜付出了超级大国的觊觎所导致的一切代价，好处则一无所有。国内的困难为美国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但在地理位置不太敏感的国度，这些困难不会受到外部强国的注意。索摩查家族知道尼加拉瓜的地理位置为这个国家的主权带来的局限性，因此王朝的创始者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战术天才。但他的小儿子缺少父亲的这种炫耀，并使这个国家受庇护的地位陷入声名狼藉之中。在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尼加拉瓜

人愿意重建旧秩序，即或在索摩查家族消失以后也是如此。桑地诺分子试图建立一种新秩序的努力使美国获得了一个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称的地位，而里根政府试图贬低桑地诺分子的企图却没有考虑其民族自豪感。到1989年初，尽管布什总统决心在外交政策上低调处理尼加拉瓜，但显而易见，只要桑地诺分子仍然掌权，美国与尼加拉瓜在和谐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将需要多年时间。

第 8 章

1930 年以来的哥斯达黎加[①]

1930 年，哥斯达黎加的国土面积为 5 万平方公里（比萨尔瓦多的面积大一倍还多），人口近 50 万。首都圣何塞[②]有居民 5 万；其余城市的人口都不足 8000。经济自主人口的 60%以上大约有 15 万人从事农业。咖啡种植业是生产活动的中心，咖啡主要出口到美国和英国。香蕉是第二项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着香蕉的生产。哥斯达黎加还出口可可豆，虽然出口量较小，却远销到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上述三种作物的收入占哥斯达黎加总收入的 94.3%。

传统的咖啡经济产生出一种社会金字塔现象，在金字塔的底层是种植园工人，在顶端是种植园主和出口商，出口商主要是德国后裔。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还通过私人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信贷。金字塔的两端之间是重要的中小生产者集团，它在社会和经济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这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 世纪末以来大西洋沿岸香蕉生产的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影响，使社会和经济发生了某些分化，但这仍然是次要的。在这期间，显然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雇佣劳动阶层．虽然这个阶层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因而不能用更适合于发达社会的

---

① 本章由伊丽莎白·拉德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

② 首都圣何塞（San José）又译圣约瑟。——译者

“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词来严格描述它。30年代期间，中产阶级企业阶层的出现虽不太引人注目，但其潜在的意义很大。寻求替代那些因世界经济危机而无法获得进口的产品和开发新的生产领域，这两种需要共同激励了知识分子的核心，他们怀疑现存的秩序，抨击咖啡寡头势力和外国资本（尤其是北美洲的资本），并探索国家发展的新战略。这一进程的最初阶段，涌现出一代受到共产主义和阿普拉主义强烈影响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倾向从民众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进主义，并于1931年建立了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几乎紧随其后出现的另一个运动比较倾向于阿普拉主义中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罗德里戈·法西奥（1917—1961年）智睿的领导下，1940年这个运动成立了国家问题研究中心；1948年内战爆发后，它与另一个政治运动何塞·菲格雷斯领导的民主行动党合并，于1951年10月建立了民族解放党（PLN）。

这两个运动是在严密控制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出现的。在本世纪的前30年里，除蒂诺科兄弟短期的独裁统治（1917—1919年）外，克莱托·冈萨雷斯·比克斯和里卡多·希门尼斯领导的两个自由主义政党操纵着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生活，这两个政党实行家长式统治和崇尚个人至上。前者被国人称为唐克莱托，他在1906—1910年就任总统，他的第二任期（1928—1932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时期，咖啡种植园主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经济危机加速了反对派集团的发展，它们向其后20年间哥斯达黎加的权力分配提出了挑战。可是，以唐里卡多著称的希门尼斯在他的第三任期即最后一届希门尼斯政府（1932—1936年），在危机面前不得不首当其冲。

虽然这个国家已经实行了一些民主变革，例如1902年的选举改革，把传统的选举体制改革成为普遍的、无记名的直接投票选举，但国家的政治生活依然处于大咖啡种植园主、大进口商和大银行家的控制之下，他们通过金融的和家族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经历不同，哥斯达黎加的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角逐，而没有把权力全部地交给军队或局外人。

1931 年的竞选运动是按照传统的个人至上论的方式进行的。参加竞选的是主要社会团体的著名政治人物，虽然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正经历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最初影响。角逐 1932 年 2 月选举的多组织中，共和党的卡洛斯·马里亚·希门尼斯获得 22%的选票；民族共和党候选人里卡多·希门尼斯赢得 46.4%的选票；其余 29.1%的选票由共和联盟党（PUR）候选人曼努埃尔·卡斯特罗·克萨达获得，他得到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得到与联合果品公司关系甚密的著名资本家费尔南多·卡斯特罗·塞万提斯的主要财政资助。正如预期的那样，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所要求的绝对多数票，所以最后结果导致局势紧张，终于在 1932 年 2 月 15 日上午，也就是公布选举结果的第二天，卡斯特罗·克萨达挺而走险，试图占领贝亚维斯塔要塞而夺取政权。随后爆发的武装冲突进一步确立了里卡多·希门尼斯在票数上已取得的胜利，他通过对叛乱分子实行大赦使这一胜利获得巩固。国家经历的动乱和社会动荡，使新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和权力。

共产党未被准许以党的名称参加大选，仅允许它的候选人以工人与农民集团的名义参加议会选举。共产党是由一批学法律的学生于 1931 年 6 月 16 日创立的，这些学生与早已存在于哥斯达黎加的工匠和工人行会建立了联系。虽然共产党宣称它参加了第三国际，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遭受挫折之后，共产国际就放弃了这一地区（1931 年共产国际宣布桑地诺是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卖国贼，1932 年大屠杀以后共产国际宣布法拉本多·马蒂为叛徒而与他一刀两断），这就使新诞生的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处在无所归属的地位，这倒反而救了它。共产主义运动在哥斯达黎加现代史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远远超出其国度的大小，这除了古巴以外在加勒比国家

中是无与伦比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哥斯达黎加，为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 1924—1929 年咖啡繁荣之后，咖啡价格持续下跌，以 1929 年为基年，出口指数为 100 计算，1930 年下降到 87，1931 年为 83，1932 年为 43。以 1925 年为基年，咖啡价格指数为 100 计算，伦敦咖啡价格从 1930 年的 81 降到 1933 年的 43。香蕉的出口，1928 年为 7323481 串，总收入 5492611 美元；1935 年减少到 2908836 串，总收入 1493512 美元。这直接影响了国家财政．财政收入以整数计算，从 1929 年的 3500 万科朗减少到 1932 年的 2300 万科朗，1934 年增加到 2600 万科朗。1930 年、1931 年和 1932 年的财政赤字最大，形成了财政上动用没有储备金保证的货币。进口额下降，1920 年为 2000 万美元，其中原材料进口为 400 万美元，1930 年分别减少为 1100 万美元和 230 万美元，1932 年减少为 600 万和 170 万美元。显然，进口、尤其是原材料进口的明显恶化说明国民经济的全面衰退和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失业状况日趋严重，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有的人认为这些数字过低），直接或间接失业人数为 2.7 万人。失业者中 75.65％是农业工人，19.67％为产业工人。

摆脱了罗慕洛·贝坦科尔特[①]（后来的委内瑞拉总统，当时是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党员）称之为“共产国际的圣旨和无能”以后，哥斯达黎加共产党人把新兴社会阶层的要求结合进国家政治体系，这显示出了吸引这些阶层的必要的灵活性，尽管局势仍不乏紧张和暴力。1934 年 8 月，共产党领导大西洋沿岸的香蕉工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当时正值全国范围的社会动乱。虽然遭到政府的镇压和抵制，但罢工的最后结果使香蕉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并在自由派制度上打开了一个有利于工人们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权利的政治缺口。

---

① 旧译罗慕洛·贝当古。——译者

国家政治体系的整个发展过程表明它能摆脱主要经济集团而保持某些重要的自主权，且具有进行改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政府允许新的政治团体提出其要求，甚至准许其中许多要求通过共产党提出来，这样，政府就能有效地使自身合法化，并为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哥斯达黎加共产主义在对苏联继续保持国际主义言词的同时，在国内政策上奉行激进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比较注重纠正弊端和过激行为，而不是完全改变习惯措施和实际工作。这开创了除古巴和智利之外拉美前所未有的政治前景。一方面，国内状况有利于形成多阶级联盟，以完成迫切的改革，并推动特别针对美国的保护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从1936年起，共产国际的策略与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的实践趋于一致，当时共产国际设法在欧洲推广人民阵线的经验。这既巩固了党的本国倾向，也使党服从于对共产国际十分重要的反法西斯与反帝国主义国际战线的任务。

同哥斯达黎加这样与世隔绝的小国所期望的相反，国际局势使国内政治变得极其复杂化。许多大咖啡种植园和大出口商家族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各自的社区中存在着亲佛朗哥分子和亲墨索里尼分子，而且哥斯达黎加与轴心国、特别是与德国有大量贸易往来，这些使得组成既赞成国内革新又接受反法西斯对外政策的国内联盟变得十分困难。然而，改革的迫切要求驱使共产党在政治结盟问题上进行了各种尝试。第一次尝试是在1939年的竞选运动中，共产党与里卡多·希门尼斯总统结盟，他是克里奥尔自由主义无可争辩的卓越领导人。第二次更为重要的尝试是，1941—1942年共产党与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总统的政府和天主教会领导人维克托·曼努埃尔·萨纳夫里亚大主教建立了联盟。这个盟约一直维持到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1944—1948年）下台。

1936年，法西斯主义势力上升，对哥斯达黎加的当地政治有着特别尖锐的影响，当时西班牙内战爆发，导致哥斯达黎加各派

势力严重对抗，并影响着1936年的大选，在大选中，莱昂·科尔特斯获胜（1936—1940年）。科尔特斯作为极端反共的民族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60%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国民党候选人、老资格的保守派律师奥克塔维奥·贝切；以工人与农民集团名义参加竞选的共产党仅获得5%的选票。

由于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政治上同情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经验，因此这两个国家与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之间早已存在的家族和金融的传统联系得到了加强。德国成为哥斯达黎加咖啡（18.9%）和可可（80%）的主要买主之一，有材料表明，1939年德国可能购买了哥斯达黎加生产的40%的咖啡。德国人不仅是主要的咖啡种植园主，还拥有80%的糖厂，德国的移民们在不断地支持哥斯达黎加的德裔人参政，其中有些人已进入莱昂·科尔特斯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然而，与其说科尔特斯本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还不如说他只是欣赏德国人的行政效率，德国的独裁主义思想对他的中右政治哲学并不完全陌生。

科尔特斯的确推崇政府内那些显然具有纳粹主义思想的德国成员，而且甚至同意他们利用其政府公职来实施反犹主义政策，主要是针对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移居和经商活动。可是，科尔特斯从来没有认真想要改变传统的政治体制，他在1939年竞选运动中的作法与他的前任如出一辙。科尔特斯竭尽全力尽量不使选举结果有利于共产党人，他破坏了当时与共产党人结盟的里卡多·希门尼斯的候选资格，为此确保了执政党候选人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他共获得90%的选票，然而不久卡尔德隆竟成了科尔特斯最强有力的敌手和共产党人的盟友。

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政府中有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代表：科尔特斯的追随者、民族资本的代表、佛朗哥主义分子，还有一个力图促进体制和政治改革的新的青年团体。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个混合体迅速瓦解。曾留学比利时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

为进步的天主教神学所鼓舞，坚定地加入了反对轴心国的民主联盟。这使他站在了大咖啡家族的对立面，后者从人身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对总统采取全面的孤立行动，以致使总统不得已与1939年竞选时他唯一的对手共产党结盟。尽管这个联盟没有违背他社会改革的思想方法，但却与他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传统天主教观念的本质格格不入。

卡尔德隆与共产党的联盟使政府站到同盟国一边，在同盟国不断地施加压力之下，哥斯达黎加很快就出现了反对国内德裔少数民族的具体行动，不仅亲纳粹分子受到攻击；所有意大利和德国血统的人都遭到迫害。在外国的帮助下，政府拟订了所谓的黑名单，通常黑名单上的人全家都被送往设在国内和美国的集中营。他们的财物被任意没收，还受到种种虐待，这造成了普遍的政府腐败行为，这也是战争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和进口品短缺所助长的。

正当政府与其竞选支持者的分离日趋严重的时候，苏联参加了反轴心国的战争，以及罗斯福的新政给美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改革的气息，因此政府与共产党的联盟也就合法化了。罗马教廷也顺应国内外这个局势，任命维克托·曼努埃尔·萨纳夫里亚（1899--1952年）为圣何塞大主教和哥斯达黎加天主教会领导人：他刚满42岁，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十分通晓天主教的社会教义和本国的历史。一个尽善尽美的政治家出现在教会的最前列，它的信徒在国内构成了绝对多数。萨纳夫里亚很自然地站在反纳粹的力量一边，他一贯信奉的教义使他拒绝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并不害怕马克思主义，或仅仅把它看成是逐出教门的对象。1943年6月13日，共产党自行宣布解散，而改称为人民先锋党（PVP），党的总书记曼努埃尔·莫拉向大主教发了一封公开信，显然事先已征得对方的同意，莫拉在信中询问大主教是否认为天主教市民支持该新党同它合作或联盟存在什么障碍。萨纳夫里亚大主教见信的当天就答复了莫拉，明确地告诉他，天主教徒可以赞同新党

的纲领，可以参加新党而不会于心不安。可是，这并没有妨碍萨纳夫里亚带头争夺在此之前从未受到挑战的共产党人对工会的管辖权。由萨纳夫里亚发起并建立了由本哈明·努涅斯神父领导的求新会工人联合会，努涅斯后来成为其领导人和主要反对派何塞·菲格雷斯派的活跃人物。虽然如此，萨纳夫里亚参与政府的联盟，不仅对于社会改革的成功，而且对于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决定积极参加改革进程并将其进行到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0 世纪 40 年代，哥斯达黎加政府与天主教会和共产党的联盟，比实际表现的要复杂得多，在各个派别内部和它们之间，始终潜伏着根本性质的矛盾冲突，只是到了后来，矛盾才逐渐表露出来。盟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可以称之为“敌人联盟时代”，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 1948 年内战中叛乱者取得胜利后不久。一边是老的咖啡寡头集团，这个集团反对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反德政策，反对他的社会改革以及与共产主义结盟的政策，同时这个集团也被政府机构的贪污腐败行为所激怒，对在选举中政府的营私舞弊、欺诈行为感到愤慨。与寡头集团结盟的是小工商企业者阶层，这个阶层的社会政治纲领与寡头集团的纲领性质截然不同，但在反对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和共产党的斗争期间，它们纲领的分歧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政府颁布的社会改革措施主要是采取立宪形式，首先，在 1871 年的宪法中增添了新的一章，这一章保证结社自由、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承认政府有责任帮助生产，保障合理分配财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工人们可以享受医疗保险、退休保险和人寿保险，还包括妇女的孕产期保险。社会保险制度所需的资金来源由政府、雇主和被保险人三方义务捐献，同时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社会保险基金会来进行管理。新的一章还规定，雇员被辞退有权得到预先通知，受到无理解雇时有权领取失业救济金，以及有权每年享受工资照付的休假，加班要发给加班费，以及诸如此类的权利。这些权利与传统的个人保障的

条款一道被写入宪法之中，遭到了资本家的反对，美国大使馆也持反对的态度。但是，改革仍然缺少具体的实施机构，而且各种特别法令必须要获得议会批准，才能使新宪法提出的总体原则生效。卡尔德隆的联盟面临着在1944年大选中失败的威胁。

在卡尔德隆—共产党联合政府的反对派内部，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国家问题研究中心的成员，支持社会改革，但反对推动改革的程序，也反对政府把改革用于政治目的。用一个主要的反对派代言人、新闻记者奥蒂略·乌拉特的话来说，那种改革只不过是“社会保障的麻醉剂”。1944年大选中的反对派候选人、前总统莱昂·科尔特斯宣布，一旦当选总统，他将中断改革进程。的确，失败的危险是非常现实的，连反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本哈明·努涅斯也投了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特奥多罗·皮卡多的票，只是为了要保护新宪法。

皮卡多是不可能唤起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曾经享有过的那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的。皮卡多温文尔雅，集历史学家、律师和教师于一身，但是他性格柔弱，根本无法与科尔特斯杰出的政治才能相比。皮卡多虽然与人民先锋党达成的联盟能保证他得到一些重要团体的支持，但他的力量显然抵不过反对派的力量。因此，政府就借助军队的暴力和警察的插手，以使局势能有利于官方候选人。共产党“突击队”的出现（该党说它是正当自卫的工具）加剧了业已形成的充斥暴力和互不妥协的政治气氛，并不断削弱了选举制度的合法性。

一些政治家（其中有人民先锋党领导人莫拉）试图寻求一个取得全国共识的候选人。但是，皮卡多和科尔特斯两人都拒绝放弃他们的候选人资格，尽管1943年9月的议会通过了新的劳工法，因而这已经不再成为竞选活动的主要议题。总统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曼努埃尔·莫拉和萨纳夫里亚大主教亲自坐在敞篷车里率领一支联合的游行队伍通过圣何塞的街头，此举只起了把反对派团结在科尔特斯周围的作用。然而，在1944年2月13日的

大选中，皮卡多以 82173 票对科尔特斯的 44435 票而当选为总统。但是，竞选中的欺诈行迹和人民支持反对派的情况表明，双方得票结果要比正式公布的票数接近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到 1948 年，北美洲对于哥斯达黎加时局的看法并不是一贯明确的或者并不是没有矛盾的。起初，美国认为人民先锋党在性质上是与其他派别相同的，特别是与萨纳夫里亚大主教性质相同。虽小而很重要的哥斯达黎加共产党被认为并不完全和其他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僵化模式一个样，认为它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思想，而不是第三国际的思想。然而，这种观点不久就被共产党对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敌视态度给推翻了，尤其敌视联合果品公司及电力债券和股票公司，在这些公司里，与工会的冲突特别尖锐。

哥斯达黎加本国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的不满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最终使得美国国务院改变了对人民先锋党的态度，虽然这个转变要晚于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因为从反对轴心国集团的总体斗争的角度看，共产党与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政府以及与波卡多政府的国内联盟似乎还在情理之中，不足以大惊小怪。应当记住的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古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当政时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联盟。至于哥斯达黎加，必须分清美国因国内压力（首先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美国投资者的压力）所导致的这些态度转变以及因冷战结果所造成的美国政策的变化，两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但类似的行为却有不同的依据，这就说明为什么美国对哥斯达黎加的政策特点就是摇摆不定，这个特点在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执政期间体现得尤为充分。

随着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到来，反对轴心国联盟与人民先锋党商议盟约时的合法性终于消失殆尽。反对派领导人，特别是奥蒂略·乌拉特，相继出访美国和欧洲，使美国与苏联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展现在哥斯达黎加公众舆论面前，也给了皮卡多政权的

对手一个良机来谴责世界共产主义的危险并宣称与共产党人订立盟约和结盟是靠不住的。冷战的发展和美国压力的增大无疑动摇了这个联盟，并增加了共产党人的疑虑，虽然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明白变化中的国际局势的真正性质。

战时反对轴心国的世界联盟出现了分裂，这一事实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哥斯达黎加政府内唯一的政治方案，这一点虽然较不明显，但并非不重要。共产党人倡议发起的改革，其方向在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全面调整，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格外有利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再存在，政府的方案就垮了。卡尔德隆分子没有自己的政治方案。他们利用共产党的方案，听任与反对派的冲突发展成为或者是传统的咖啡集团所希望的干脆复辟，或者是小工商业主阶层夺得统治权，这个阶层的政治军事领袖是何塞·菲格雷斯。

1942 年，政府指控菲格雷斯勾结和同情纳粹主义，因而根据国家安全的理由将他驱逐出哥斯达黎加。他曾一度流亡美国、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对他被逐的背景情况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按照菲格雷斯本人的说法，此事完全是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总统对他的迫害；可是根据曼努埃尔·莫拉的说法，此事是美国大使馆直接插手的行动。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档案里没有找到能够证实这一说法的材料。可是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当时的妻子伊沃内·克莱·斯普尔德在她的回忆录里明显证实了莫拉的说法。菲格雷斯在政治上反对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兄弟，在 1944 年的竞选中，他领导的政治组织民主行动支持的候选人是莱昂·科尔特斯，最后皮卡多获得大选胜利，而菲格雷斯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却成为选举欺诈行为的直接牺牲品。

1943 年 7 月，菲格雷斯参与创建了中美洲革命部队以推翻中美洲地区的独裁政权，哥斯达黎加被认为是开始实现这一讨伐运动的最佳地点。根据这个精神，菲格雷斯就把其反对卡尔德隆－共产党政府的斗争与更大范围的地区性目标结合起来。1944 年，

危地马拉豪尔赫·乌维科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同年12月，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当选为危地马拉总统，这对于实施菲格雷斯的计划十分有利。在阿雷瓦洛的支持下，所谓的加勒比协议在1947年12月16日于危地马拉城正式签署。

尽管阿雷瓦洛具有民族主义和反帝的倾向，但他的中美洲政策仍沿袭了其独裁和反动的前任的作法，竭力谋求危地马拉在本地区的霸权。协议的签署国约定，在推翻现存的军事独裁政权之后，要建立一个中美洲共和国，菲格雷斯的计划是与这个前景完全吻合的。虽然哥斯达黎加政府实行进步的社会政策并与支持阿雷瓦洛政府的共产党人结盟，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危地马拉政府放弃对菲格雷斯的支持。围绕殖民地时期都督辖区建立中美洲联邦的传统课题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社会政策和普选制这些新课题则退居次要地位，它们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种国家间的联盟关系在政治上确是相互矛盾的，阿雷瓦洛政府奉行民主主义政策，在社会政策上是进步的，又得到危地马拉共产党人的支持，但它却反对与其性质类似的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后者过去受乌维科的困扰，乌维科在1944年的大选中支持科尔特斯。阿雷瓦洛现在支持菲格雷斯，菲格雷斯曾统帅哥斯达黎加反对派运动的武装队伍，这个反对派运动开始是由科尔特斯领导的，在他死后，由奥蒂略·乌拉特领导。而且，阿雷瓦洛还积极热衷于建立中美洲联邦，为此目的，他力图取得保守的萨尔瓦多卡斯塔涅达政府的支持，这就不能不引起洪都拉斯卡里亚斯政府、尼加拉瓜索摩查政府和哥斯达黎加皮卡多政府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皮卡多和索摩查由此而产生双重的担心：一方面，他们担心危地马拉将来在巴拿马地峡称霸；另一方面，他们害怕阿雷瓦洛对企图武装推翻这两国政府的政治集团给予支持。这就为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国联盟创造了条件，然而却同两国的国内政策相矛盾，皮卡多是亲共，而索摩查是反共。美国政府没有马上直接插手有关各国政府的行动，使得这种矛盾关系趋于深

化。

美国对哥斯达黎加的政策很明确地反对皮卡多，支持反对派，因此也反对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解决方案是希望反对派取得胜利，把皮卡多赶下台，这要靠菲格雷斯的武装压力来保证，但美国却不让菲格雷斯有机会夺取政权或者履行他在加勒比协议里的诺言。阿雷瓦洛就这样与中美洲其他国家保持对峙状态，加勒比协议无法实现，尼加拉瓜可以自由行事，哥斯达黎加的政治状况也将得到满意的解决。然而，哥斯达黎加以及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动力。

在1948年2月的大选中，两个主要政治竞选联盟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第一个联盟是由政府和它的共产党盟友组成的，正式的候选人是前总统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第二个联盟包括：保守的民主党、中间和自由派的民族联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集团（那是由罗德里戈·法西奥领导的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和何塞·菲格雷斯领导的民主行动党联合建立的），奥蒂略·乌拉特是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这时候在哥斯达黎加，各派间的相互敌视加剧，暴力活动不断增多，在这种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国家的分裂加深。乌拉特提出的口号是，“如果他拥护卡尔德隆，就别理睬他，不要买他的东西，也不要卖给他东西。”政府官员对反对派的活动采取了残暴的方式，动用警察镇压，而带来的后果却不但没有吓唬住反对派，反而使反对派更趋激进化。

工会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哥斯达黎加总工会（CGTC）与求新会工人联合会分道扬镳。前者实际上是人民先锋党的工会支部，它支持皮卡多和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政府，动员工人支持政府进行社会改革和颁布劳工法，在选举后爆发的内战中，它在动员和组建民兵的活动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它的领导人是1933年在莫斯科工会学校接受教育的鲁道夫·古斯曼和共产党创始人、1934年香蕉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梅·塞尔达斯·莫拉。它的主要力量来自香蕉工人，虽然它在城市里的制鞋工人、建

筑工人和面包工人当中也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基层组织。

另一方面，求新会工人联合会是萨纳夫里亚大主教倡议组建的，他想要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工会组织，使之成为可供工人选择的又一个工会。其预想的目的，既不是想要分裂工人运动，也不是想要推行反共政策，而是为了向所有的工人，不论他是不是天主教徒，提供一个既非教会、也非共产党的维护社会权利的途径。可是，萨纳夫里亚把求新会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本哈明·努涅斯送到美国去学习社会学，使他逐渐熟悉工会组织。努涅斯很快接受了强硬的反共观念，因此，他与反对派打成了一片，特别是与何塞·菲格雷斯及其组织紧密配合。求新会工人联合会的另一领导人路易斯·阿尔韦托·蒙赫（后来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与菲格雷斯的关系甚至更为密切。求新会工人联合会依靠本国大资本家和美国劳工组织的资助，前者力图要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后者当时正欲向拉丁美洲扩展。这两个工人联合会在1948年发生冲突之后，双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在内战中，努涅斯成为一个突出人物，菲格雷斯取得胜利后建立了执政委员会，努涅斯担任劳工部长。不出所料，他当即命令解散哥斯达黎加总工会，但与此同时他无法挽救求新会工人联合会自身逐渐衰落直至消亡的命运，该组织再也没能从内战前卷入政治活动的状况中恢复过来。

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每公斤咖啡平均出口价格，1944—1945年是35美分，1947—1948年上升到60美分；咖啡出口值从7488761美元增长到14189041美元。然而，在这期间，贸易赤字从1945年的1500万美元增加到1947年的2500万美元。主要的进口物品都是与食品、饮料和烟草生产有关的商品，1946—1947年，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货物的进口有所增加。1948年，各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农业是43%，商业14.7%，服务业10.9%，工业7.6%，公共部门10.9%，同时国债达5600万美元，其中3020万美元是外债。

联合政府加紧实施社会福利措施，例如建设低成本的住宅、以此尽力争取公众的支持。然而，无论是这项措施还是其他措施都没有能够阻止政府威望的下降，迫使政府不得不大力依赖其镇压机器和议会控制局势，卡尔德隆—共产党联盟在议会中仍然保持多数席位。

反对派对1944年竞选中的欺诈行为依然记忆犹新，他们要求保证进行公正的选举，这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人制订了一部选举法，使选举进程最终有章可循。但在当时，反对派对这部选举法并不满意。到了1947年7月22日工商界领导了一次罢工活动以后，政府对反对派的压力作出让步，同意给予选举保证，然而执政党的一些党员认为，政府实际上就是把选举机器交由反对派控制。

由此而产生的局面是，传统的欺诈行为与操纵投票不仅为反对派所抱怨，而且也成为政府自己抱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先锋党领导人，他们已察觉有投票人的非法活动，即从已登记选民名单中排除一些公民，等等。而当奥蒂略·乌拉特击败了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时，共产党人却倾向于接受这个选举结果，因为人民先锋党人当选议员的人数占总共45个议席中的12个，还不算同时当选的属于卡尔德隆派的那些人。然而，在选举中被击败的共产党盟友卡尔德隆派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结果。最后，党派利益压倒了冷静的政治分析和对体制的关注。因此，失败的卡尔德隆派和人民先锋党——后者已赢得议会中几乎1/3的席位——竭尽全力要使选举结果无效。

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暴力冲突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这种情况是武装对抗的直接原因。

这个国内冲突与另一个同样复杂的国际性冲突互相作用。一方面，菲格雷斯在加勒比协议中已许下诺言，要趁机利用哥斯达黎加的局势——“最便于也最易于利用”——去推翻哥斯达黎加的政府，然后开始颠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

独裁政权；在危地马拉及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明显的霸权统治下统一中美洲；用更强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推动加勒比地区建立新的国家实体和邦联。索摩查的政策与上述意图相对立，此项政策企图阻止加勒比阴谋者和美国的行动——美国谋求推翻索摩查政权而在可以信任的国民警卫队监督下在尼加拉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相比之下，美国对哥斯达黎加的政策，与其说是在谋求使皮卡多垮台而让乌拉特掌权——它已停止实行这一政策——不如说是企图把共产党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因此，1948 年 3 月 22 日，索摩查和美国商务参赞伯尔霍姆先生共同向皮卡多总统提出一项建议：使用尼加拉瓜军队去消灭菲格雷斯和共产党人。这项建议并不十分新颖，早在两年前，莱昂·科尔特斯就向皮卡多提出过一项支持其政府的协定：条件是皮卡多政府不再与共产党结盟，并将共产党人从政府中驱逐出去。1946 年 3 月科尔特斯去世，使这一计划成为泡影；皮卡多对其盟友人民先锋党的忠诚，又使索摩查和美国的计划失败。

武装冲突成为解决对抗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尽管在叛乱队伍中，也有一些人赞成和平解决和协商的方案，这可以防止更多的流血，特别是乌拉特本人和马里奥·埃昌迪都有这愿望，但菲格雷斯的方案占主导地位，按照加勒比协议，菲格雷斯决心要把战斗进行下去，不但要在哥斯达黎加境内开展，而且要把战斗扩大到中美洲全地区。叛乱者提出了口号，要求选举自由和普选权，要求尊重选举结果，要警惕共产党的威胁，以此为基础争取同情者。另一方面，政府及其先锋党盟友动员人民的论点是，进行社会改革，提出劳工法有被废除的危险，以及自相矛盾地谴责选举中的舞弊行为。

大选于 1948 年 2 月 8 日举行。乌拉特和民族联盟党获选票 54931 张，而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民族共和党获得 44438 张选票。按照法律要求，要由选举法庭一致宣布获胜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选举法庭的意见出现分歧，选举法庭庭长以选票的计数

已被人操纵为由拒绝表态，因此以多数意见公布了选举结果。2月28日，选举法庭的另外两名成员发表了他们的声明。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向国会提交了立即取消选举结果的要求，根据宪法规定，国会必须最迟在3月1日作出最后裁决。在3月1日立法会议开会时，街上发生了难以控制的抗议示威游行，国会以多数票赞成取消了这次总统大选。

3月12日，在圣何塞南部首都与巴耶—德尔赫内拉尔之间的群山中，菲格雷斯的庄园里爆发了武装起义，反叛部队很快占领了巴耶—德尔赫内拉尔。在首都北边的圣拉蒙地区也发生了起义，是由弗朗西斯科·J·奥尔利奇领导的．但这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其重要性要小于南方战线，主要的战斗都集中在南方地区。反叛者需要控制圣伊西德罗—德尔赫内拉尔，以便能占领一个机场，用于运送按照加勒比协议从危地马拉送来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反叛部队立足于群山之中，使他们能够割断圣伊西德罗镇与首都之间的交通，与阿雷瓦洛政府保持一条畅通的供给线。不久以后，反政府武装攻打卡塔戈城并占领了该城。与此同时，来自加勒比军团的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士兵组成的部队，占领了大西洋沿岸的利蒙港。

大部分的战斗任务是共产党人承担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直到4月12日才号召他的党徒参加战斗），共产党人一再说他们有足够的人，但需要一部分武器就可以对卡塔戈城形成包围圈，推翻菲格雷斯，那时，皮卡多政府承认了失败，决意要寻找一个投降方案。4月12日，总统召开了一次外交使团会议，请求各国外交官合作以解救圣何塞。一个外交官代表团很快来到卡塔戈城会见了菲格雷斯，菲格雷斯向他们提出了某些要求，这在乌拉特周围的政治派系内部引起相当大的忧虑，因为反叛领导人要求自己担任总统．这当然意味着同意取消选举结果．在这次大选中，乌拉特是获胜者。这是后来叛乱的反对派取得胜利后，发生分裂的第一个征兆。

这个问题威胁着第二天开始的谈判，4 月 13 日，由外交使团主持，在墨西哥大使馆进行了谈判，参加者有皮卡多，另外还有人民先锋党的曼努埃尔·莫拉以及所谓的民族解放军的本哈明·努涅斯神父。在谈判正常进行时，美国大使纳撒尼尔·戴维斯宣布，皮卡多政府请求索摩查干预哥斯达黎加内战，而尼加拉瓜的部队已经进驻离尼加拉瓜边境不远的克萨达城。国民警卫队向反叛者的一些阵地发起了进攻，这表明：它声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提出干预仅仅是为保护尼加拉瓜边境不受革命活动的侵犯，纯属谎言。最严重的方面在于，索摩查政权主观臆想让皮卡多总统向尼加拉瓜呈交一份请求，授权索摩查干预，从而使尼加拉瓜的行动合法化——尼加拉瓜独裁者把这个想法传递给了其他中美洲国家的政府，当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正在波哥大出席第九届泛美会议。在哥斯达黎加，皮卡多否认索摩查的解释，虽然他并不否认他曾经派出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兄弟向索摩查要求封锁他本国的边境，以阻止人们越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出席波哥大会议的代表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他是菲格雷斯的同盟者）向尼加拉瓜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求书，要求尼加拉瓜政府停止干涉哥斯达黎加的内部事务，并从哥斯达黎加领土上撤走它的军队。

支持政府的武装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人民先锋党的民兵组织，它纪律严明，人数众多，战斗力强，但武器装备较差；政府自己的军队，其武器装备要好些，但它不具备人民先锋党民兵组织的那种战斗精神，而且遭受到其内部受皮卡多总统的兄弟搞破坏政策的不利影响；卡尔德隆派的集团，其组织紊乱，大部分住在城市，领导层摇摆不定，希望尼加拉瓜进行干涉，但又担心被流放。在战争结束后，从已失败的政府的指挥部里发现了成箱的从未使用过的新式武器，面人民先锋党的民兵战士用的是单响步枪，这些新式武器许多是从国家的兵工厂取出来的，由国际部长卖给或送给了尼加拉瓜的国民警卫队（后来这位国防部长在尼加拉瓜寻

求避难），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亲政府的联盟内部出现分裂，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鉴于类似的原因，和平谈判不能仅仅限于合法政府，而必须让人民先锋党参与，该党不仅从军事观点上看是独立的，而且在冲突结束时，它实际上已经从政治上控制了政府。

4月18日，努涅斯神父、菲格雷斯和曼努埃尔·莫拉之间进行了平行的谈判，目的是要提供可以结束战争状态的补充保证。随后，上述三人再加上人民先锋党的军事指挥官卡洛斯·路易斯·法利亚斯，在前线举行了会谈。法利亚斯是莫拉在最后一刻请来的，为的是证实他所说的前线官兵的议论。会议达成了著名的奥乔莫戈协议。虽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在开会地点没有必要的设施——但总的行动方针已为胜利者所接受。这特别指的是保持社会保障和劳工法，工会及人民先锋党享有合法地位。所有这些内容是由努涅斯在菲格雷斯指示下写给莫拉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所阐述的，在墨西哥使馆协议的第6点里也提到了，该协议签署日期为4月19日，从而结束了武装斗争。努涅斯神父给共产党领导人莫拉的信件也是同一日期。

墨西哥使馆协议的签署，结束了武装斗争，但不久以后它即被胜利者宣告废除。在桑托斯·莱昂·埃雷拉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过渡政府，但几乎立即就被菲格雷斯为首的执政委员会所取代，它自称为第二共和国创始委员会。

菲格雷斯领导的执政委员会（1948—1949年）的建立，标志着胜利者集团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歧。执政委员会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并不完全一致，没有进入执政委员会的那部分人内部也不十分团结。然而在获胜者当中，从一开始就分成两个阵线分明的政治中心。一边是聚集在当选总统乌拉特周围的、具有保守派和中间派特点的、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政治阶层。另一边是菲格雷斯领导的、具有民众主义和改良主义特点的、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然而缺乏公众支持的军人阶层。

在政府执政委员会中组织起来的菲格雷斯集团、其中一小部分人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参加了立宪议会，该集团努力要制订一个关于社会、教育、金融、经济和体制改革的真正计划。第二共和国关于国家要在社会和经济中担当新的现代角色的思想，顺应了正在崛起的、以经商为业的中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却与目光短浅的传统上层分子的视野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卡尔德隆—共产主义的垮台即意味着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地位。

由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新宪法草案，包含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成分：有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阿普拉主义，加上英国社会主义的温和分配主义思潮；有北美的实用主义，有哥伦比亚自由主义的社会进步特点。智利和乌拉圭的经验为国家分权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模式。这些思潮正好顺应了寻找超越传统农业出口模式的新的企业和生产领域。最重要的是，通过罗德里戈·法西奥、阿尔韦托·马滕和国家问题研究中心的知识分子们的努力，制订了关于教育、经济、金融和行政分权方面的各种方案，试图在哥斯达黎加开始一项崭新的社会和政治计划。

乌拉特集团是围绕民族联盟党及其报纸《哥斯达黎加日报》组织起来的。最有名的资本家们早已开始通过 1946 年创建的《民族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报没有明确赞成任何政党，但代表着哥斯达黎加传统的保守思潮和国内外大农业、大商业及大出口集团的利益。至于乌拉特，他完全不反对社会变革。恰恰相反，乌拉特认识到发生在前 10 年里的变革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不仅赞同最重要的资本家阶层的要求，而且也赞同中小生产者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后来乌拉特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大资产阶级终于撤回了对乌拉特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的乌拉特—菲格雷斯协议，消除了对于菲格雷斯实际意图的怀疑和保留态度，在协议里，菲格雷斯答应在 18 个月内，最多不超过 24 个月，将政权移交给乌拉特。

执政委员会宣布共产党（人民先锋党）不受法律保护，以充当共产党工具的罪名宣布哥斯达黎加总工会为非法，无偿解雇在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前政权的同党。执政委员会还建立了特别法庭，审判失败的联盟的支持者，在最初阶段，对非格雷斯在加勒比协议中所做的承诺以及在哥斯达黎加的武装外国人的问题上发生严重争吵，这些外国人正力图煽动国际性的革命冒险行动。这就成为以公共安全部长（负责警察局）埃德加·卡多纳为首的政府内部一伙军人抗议的原因，这些军人在 1949 年 4 月 2 日至 3 日试图发动一场反对执政委员会的政变，这场政变被称为“卡多纳政变”。

在非格雷斯政府期间，明确地阐述了一些后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思想，例如，国有化和发展电力工业，调整国家与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和财政关系。但从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措施是 1948 年 6 月 21 日宣布的银行国有化，以及对超过 5 万美元的资本实行征税 10%的措施。由于货币流通和信贷等银行业务掌握在经营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商品的私人集团手中，这是使新的企业阶层获得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这个阶层在政治上后来联合成为民族解放党。因为这个企业阶层的发展，过去一直被农产品出口集团和商品进口集团对私营银行与信贷实施的金融控制所阻碍。

咖啡寡头集团没有时间来品尝它幻想的 1948 年的胜利，它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盟友几乎立即就宣布自己独立。早在战争期间，攻打卡塔戈省的战役时，菲格雷斯就拒绝了一些资本家劝说他废除劳工法和社会保障的企图。当菲格雷斯在取得胜利的几个星期之后，他便着手打破金融垄断，削弱通过家族纽带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大咖啡种植园主和大商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事实上政府所实施的国有化措施对它们的打击最大。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权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而如此转入国家之手，不是作为一个中立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促进新生的政治企业家阶层发展的有效手段。

受这项政策影响的人们把它看成是"共党政策"，由于它可能同加勒比协议有联系，所以不是最终看法。当废止国有化政策的幻想成为泡影、新掌权者扩大了社会支持的基础并成为一个通过民族主义战略谋求哥斯达黎加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霸权的集团时，上述不信任感就增大了。无论是早先时期的保守派盟友，还是共产党人，当时都没有能认识这些变革的深刻性质，保守派盟友只看到菲格雷斯及其国际同盟者思想中包含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只感到执政委员会周围的镇压和反共。

对执政委员会的政府行为中最有争议的方面之一，是关于公共基金的管理问题。缺乏适当的法律条例；决定赔偿菲格雷斯在战争期间的财产损失；颁布所谓的第 80 号法令，授权丹尼尔·奥杜维尔可以不受控制和管制地使用公共基金；不久后，菲格雷斯政府即被怀疑其贪污的气氛所笼罩。凡此种种，自然是被那些反对执政委员会的人夸大了，他们是内战中的战败者，也有执政委员会自身的暂时盟友，他们都开始怀疑菲格雷斯和执政委员会，并正在为下一次的政治战役筹集武器。

应当强调的另一方面，是执政委员会与教会之间发生的冲突，尤其是当政府正准备签署一项协定，设立 7 个主教职位和两个大主教职位的时候。鉴于萨纳夫里亚大主教与旧政权的关系，这项措施是对他的教会领导权的明显打击。而且，这位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仍在不断地插手反对侮辱内战中的失败者；在大西洋沿岸通往利蒙港的埃尔科多德尔迪亚夫洛火车站上，一批共产党工会领导人被枪杀的时候，囚禁于中央监狱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被计划同时处决，萨纳夫里亚果断地阻止了这一企图。

1948 年 12 月，执政委员会面临一场大胆的进攻，那是由当时在尼加拉瓜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所组织、由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主谋的。索摩查预见到菲格雷斯及其在加勒比协议中的盟国对自己已构成的威胁，就利用哥斯达黎加流亡者中普遍存在的复仇心理，鼓动他们对哥斯达黎加发动入侵，制造两国间的边境冲

突。索摩查不仅想以此吓唬一下美国国务院，也想警告菲格雷斯不要对他发动任何侵略。尼加拉瓜的独裁者一旦确保了自己的利益，分散了菲格雷斯的注意力，他就抛弃了卡尔德隆·瓜尔迪亚，从刻意筹划的联盟中退出，他促成这个联盟是专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失败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决定流亡墨西哥，在那里等待另一次机会，以发动军事政变，1955 年进行了政变，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卡尔德隆要求其追随者不参加 1949 年的全国制宪议会选举。这使得卡尔德隆派的一些人、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人非常难以参加并影响制宪议会。

1949 年 1 月 15 日，全国制宪议会建立，乌拉特的民族联盟党占主导地位，共获得 34 个代表席，而菲格雷斯的社会民主党人好不容易仅有 4 人当选。虽然卡尔德隆派没有参加这次选举，但被认为是倾向于卡尔德隆派的立宪党获得 6 个席位。

虽然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决定抵制这次议会选举，把希望寄托于反叛活动，可是他以前的盟友共产党反对这条路线，共产党和以立宪党名义参加竞选的一些人达成了某些谅解。当时的选举结果标志着内战时期各个“敌人联盟”内部开始出现根本的分裂。在获胜的一方，有迹象表明，思想上的分歧也很深。虽然菲格雷斯及其支持者夺取了军事上的突出胜利，但政治上的主动权却不在他们手中，而是在乌拉特及其追随者的手中。在失败的一方，共产党人强调社会纲领和国内民主化，但当时的方式使他们不能在政治制度内合法活动而被迫要为取得合法承认而斗争；他们的卡尔德隆派盟友谋求与受到加勒比协议威胁的加勒比专制政府结成新的联盟，加勒比协议的矛头就是针对他们的，并使菲格雷斯政权成为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掌权不久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控制下的委内瑞拉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制宪议会没有采纳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制订新宪法的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更为现代化的、起调节作用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文件），而是把修改 1871 年的宪法作为讨论的基

础。此外还加上若干修正和改革，以求能综合前10年中激动人心的社会革新和体制试验。新宪法提出了一种自治的和半自治的体制，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地方分权和国家干预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进程敞开了大门。宪法还限制了至今仍盛行的总统制政权，规定了要保障政府雇员职位的稳固。与中美洲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宪法规定设立最高选举法庭，作为国家的第4个权力机构，它独立行使职权，处理一切选举事务。力求消灭选举总统和议员时的腐败行为，加强公民权益，这不仅指的是保护个人与社会的权益，而且特别指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行政关系。宪法承认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虽然如此，宪法却重申了执政委员会原先颁布的一项禁令，禁止那些在活动上、纲领上、国际交往上被认为可能与共产党一致的政党的存在。此项禁令一直保留到1974年。

宪法取消了军队作为一个常设体制。尽管菲格雷斯早已解散了军队，但这一行动得到宪法的确认．对于哥斯达黎加民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使得它明显地不同于它的邻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克莱托·冈萨雷斯的第一次任期内，军方力量已开始减弱，到1948年，军队已被减少成为一支小型的机动部队，内战期间，国防部长解散了这支小队伍。以宪法条文来废除军队，使获胜的集团在战争结束时不能靠自身的军队而上台掌权。与此同时，宪法承认司法权独立，由此而加强了老自由派关于权力划分的传统。两项措施标志着哥斯达黎加进入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顶峰，这使得军队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使得司法权的独立不可避免。如同取消军队一样，两项措施对于哥斯达黎加社会的民主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与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其他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新宪法通过加强国家在有关公共利益领域的干预机制而批准国家在生产和全国财富分配方面的活动。虽然宪法没有具体规定，但无论是制宪议会，还是在整个社会，都确信有必要设法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政治民主联系起来。

老的咖啡寡头及其盟友未能适应新的形势，只是尾随他人的倡议。除了乌拉特这个人物，咖啡集团无法再找到能够使他们团结一致和增强意志的领导人；但它们也很快与他决裂了。同样，卡尔德隆·瓜尔迪亚集团对于自身遭到过的迫害也只是要求政治平反和经济赔偿。共产党人的被摧毁，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后开始的国内残酷镇压，另一方面是由于冷战的迅速发展，这在拉丁美洲的政治气候中已经有了明显的标记了。这使得国家的未来寄托在年轻的政治企业家身上，他们在 1951 年建立了以菲格雷斯为首的民族解放党。菲格雷斯组建新党，靠的是他新近采取的军事上的胜利，靠的是在竞选领域没有一个强大的敌手，靠的是一批对国事有着自己政治方案的、具有事业心的人们。菲格雷斯和乌拉特都同意接受 1948 年 2 月的总统选举结果，在那次选举中，乌拉特当选为总统。但是，他们却宣布议会选举结果无效，当时卡尔德隆派——共产党人已获得了大多数议席。这是在获胜者中达成的一项政治安排，菲格雷斯即使很不情愿，也还是把权力交给了乌拉特，虽然他感到后者所代表的势力和利益是与他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纲领相背的。

乌拉特政府（1949—1953 年）遇到了有利于经济恢复的良好气候。在国际上，欧洲重建对世界贸易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朝鲜战争也有助于咖啡价格的回升。农业出口仍然是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1951 年，咖啡和香蕉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89.2%。工业中的就业人数占经济自立人口的 10%强，而农业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 50%以上。农业机械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国际市场对于哥斯达黎加国民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影响非常巨大。1949 年，以每公斤平均价格为 0.667 美元计算，出口 16603580 公斤咖啡所得收入为 11087136 美元；到 1952 年，每公斤咖啡的平均价格上涨到 1.147 美元，出口量达到 21194786 公斤，总收入为 24323613 美元。

虽然哥斯达黎加农产品出口的基础是不稳定的和依赖性的，

但国民经济仍显示出了活力和增长势头，因而促进了在内战结束和制宪议会召开以后出现的政治和体制进程。乌拉特政府拥有两个有利条件来保护新生的现代化：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主要是共产党和卡尔德隆派，由于共产党仍处于非法状态，卡尔德隆派流亡国外且声名日下，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实际上已不存在；金融状况和经济形势允许对国家和公共财政进行健康的改组。乌拉特政府采取措施推动一些重要机构的建立，如哥斯达黎加电力研究所、中央银行、全国生产委员会（实施新干预主义的国家中最重要的机构），还有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基金会，与此同时，科朗币值保持稳定，财政也出现盈余，这在1953年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乌拉特还设法减少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从1950年的4.03亿美元减少到1953年的3.28亿美元。

面对竞选挑战，乌拉特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中立态度，1951年10月12日，在何塞·菲格雷斯无可争辩的领导下成立了民族解放党，使竞选挑战愈演愈烈。因而开始实施一项计划，这是一年多前在罗马拟订的，参与拟订计划的3个人后来全部以新党的候选人身份先后当选为总统，他们是：菲格雷斯、弗朗西斯科·J·奥尔利奇、丹尼尔·奥杜维尔。除民族解放党外，还出现了两个新的政治组织：民族联盟党（PUN）和民主党（PD）。早在1948年，以奥蒂略·乌拉特领导的反对派联合阵线就打着民族联盟党的蓝色旗帜，1952年马里奥·埃昌迪（乌拉特政府的外交部长，民族联盟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主要人选）对它进行了重新改组。民主党聚集了最有势力的资产阶级，它最后推举费尔南多·卡斯特罗·塞万提斯作为它的总统候选人。卡斯特罗·塞万提斯拥有大量资产，得到联合果品公司的信任，并且可以依靠日益倾向于《民族报》政治观点的富有集团的支持，不过《民族报》也注意避免让选举偏见左右其维护自身更长远利益的坚定立场。第4个党试图以独立进步党的名义参加竞选，该党提出的候选人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华金·加西亚·蒙赫，他曾在智利留学，并是

很有影响的文化杂志《美洲文集杂志》的创办人兼社长。人民先锋党支持加西亚的候选人提名，尽力回避它的非法地位，虽然加西亚·蒙赫受人尊敬，可该党却被宣布为非法，按照宪法第98款规定，没有资格参加竞选。

竞选辩论多是围绕民族解放党以及菲格雷斯这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菲格雷斯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共产党人，说他与国际冒险军人订有秘密协议，说他在行使权力时沉缅于政府贪污行为。不久，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支持卡斯特罗·塞万提斯，逼迫埃昌迪与民主党合作，仅让他作为圣何塞地区无党派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人民先锋党和卡尔德隆派最终都支持卡斯特罗·塞万提斯，其动机更多是由于对菲格雷斯的宿怨，超过了敌对派别中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差别。妇女首次参加的这次大选于1953年7月26日举行。选举结果明显有利于菲格雷斯，他获得了123444张选票，占总计票的65%。

在大选的同时，乌拉特举行了一场无约束力的全民公决，目的是要将卸任总统重新参加竞选需等待的时间由8年改为4年。全民公决结果，大多数人赞成缩短时间，但菲格雷斯及其组织不承认这个结果。此事必须要交由立法议会裁决，议会否决了这项宪法修正案，从而堵死了乌拉特重返政权的可能性。这就加深了乌拉特与菲格雷斯之间的对立，从此以后，他们俩人彼此势不两立。

这项宪法修正案的被否决，明显地暴露出民族解放党企图控制国家政治以反对内战中的敌手和以前的盟友。由此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的反对执政党的竞选联盟。保守派认为，菲格雷斯是共产党人，理由是他与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有联系以及他主张只适用于“俄国和哥斯达黎加”的国家主义政策。乌拉特与菲格雷斯最后决裂时，他翻出了贝当古第一次流亡哥斯达黎加时带来的旧时文件，当时贝当古是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内富有战斗精神的党员，乌拉特利用这些文件抨击贝当古与菲格雷斯的友情。

甚至卡尔德隆分子对菲格雷斯的国有化倾向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菲格雷斯的这个思想似乎更接近于他们从前的共产党盟友。这样一来，人民先锋党更加孤立了。所有的这些非难肯定了民族解放党的独立性，同时迫使富有的保守派集团与卡尔德隆分子结成联盟，后者的政治纲领仅仅是要击败菲格雷斯。

新政府上任时的经济形势是良好的。每公斤咖啡的出口平均价格，1953 年是 1.193 美元，1956 年上涨为 1.483 美元，虽然 1956 年咖啡出口量减少，但销售收入却远略高于 1953 年的数额。在民族解放党的第一届政府时期，咖啡出口量和价格的变动通常是相互补偿的。民族解放党政府要求消费国对哥斯达黎加的出口产品支付公平的价格，谴责总体上不利于拉丁美洲发展的那些贸易。这一政策导致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摩擦，当时联合果品公司与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政府的关系正处于对抗状态，对于菲格雷斯在此时刻大力调整哥斯达黎加国家与联合果品公司经济关系的行动，华盛顿也持不信任态度。在与该香蕉公司谈判时，菲格雷斯设法提高了政府在联合果品公司所得利润中的份额，从 15%提高到 30%。菲格雷斯实行加强消费并为新企业部门发展国内市场的政策，为此，菲格雷斯提高了工人工资。

菲格雷斯政府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行政管理专业化和扩大自治机构等措施，实现国家机关的现代化和稳定化。国家开始提供各种服务，发展交通网，承建重要的能源工程，在全国普及教育。因此，国家成为新党选区的大雇主，以及中间阶层崛起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机制。1950—1958 年，经济自立人口每年平均增长 2.77%，同期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平均增长 7.44%。主要出于政治和竞选的考虑。国家还成为商品和劳务的大市场。1950—1953 年，公共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1954—1958 年间超过了 22%，其中自治机构和公共工程部所得的投资份额尤为突出。

由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和菲格雷斯亲自精心拟订的这个经济发

展战略，由于现在明确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用罗德里戈·法西奥的话来说，国家的富人们被认为是“缩手缩脚、缺乏魄力，不能大胆承办新的经济企业”，政府试图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其在组织上和心理上的弱点。实施这个战略的财务杠杆是银行国有化，这通过国家机构实行提高工资的政策，增加商品和劳务消费，从而对出现的面向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国内消费的新企业部门补充提供所需的经济资源。

对现代化进程的资金筹措主要依靠征收间接税，1946—1958年期间，间接税数额占政府收入的48%，直接税占12.6%。资金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举借外债和内债：1953年，公共部门欠债3.8098亿美元，1956年达4.52384亿美元，其中1/4以上是外债。

国家获得发展，不能全部归功于菲格雷斯的作用。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哥斯达黎加就存在着国家发展和体制多样化的现象，这种状况3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941—1948年所经历的过程中，尤为明显。菲格雷斯战略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和他的集团把发展进程同新企业家阶层的出现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阶层谋求利用国家来使本国实现现代化并形成一个国内市场。新企业家阶层试图通过民众主义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霸权，有国家作为雇主，民众主义就能使他们获得长远的社会基础和选民基础。他们已经在农民中有了影响力。新的措施不仅在私营企业中，也在国家官吏中，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间阶层，它为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国家强大有力。

菲格雷斯政府在两条战线上遭遇到政治冲突。在国际上，它与加勒比独裁政权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使菲格雷斯政府拒绝出席1954年在加拉加斯召开的第10次泛美会议，在这个会上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受到责难，也使菲格雷斯政府在巴拿马召开的各国总统会议上拒绝与索摩查及其他独裁统治者表示亲善。此外，菲格雷斯政府一再要求国际市场支付较高的价格，以及它对流亡政

治家（包括委内瑞拉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胡安·博什和众多的尼加拉瓜流亡者）持友善的态度，所有这些使菲格雷斯政府同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和美国的某些阶层相对立。虽然如此，菲格雷斯还是听从了几个自由派的北美朋友（如阿道夫·E·伯利等人）的忠告，尽了很大的努力以改善他在美国、特别是在民主党人眼中的形象。他甚至还向一个公共关系部门支付了巨额酬金，要它宣传自己是民主斗士，在1955年发生的反对菲格雷斯政府的武装入侵时，上述作法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之前，中美洲的国家首脑中只有索摩查竭力培养良好的形象，试图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

在全国范围内，民族解放党在议会中构成了压倒的多数，它与势力很大的反对派在议会中发生了对抗，其中马里奥·埃昌迪的才思敏捷和咄咄逼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埃昌迪受到对手们的仇恨但受到卡尔德隆派群众的拥护，他们认为埃昌迪对政府的攻击真正代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忘记了这个火暴性子的议员曾经是1948年大选时乌拉特阵营中非常重要的领导人，是内战中活跃的敌手，是乌拉特政府的外交部长。菲格雷斯政府在这个死敌面前感到弱点日益严重，而埃昌迪虽无纲领却手腕高明，利用了政府的失误。也许埃昌迪缺乏纲领，反而有助于他与那些以反对菲格雷斯及其政党为共同点的政治力量紧密联合。不论怎样，埃昌迪虽稍许有些专制，但政治作风直率而有智谋，使他获得公众广泛的支持，并使后来的埃昌迪政府带有传统主义共和政体的色彩。

按照卡尔德隆派的看法，采取武装行动推翻菲格雷斯政权的国内外条件业已形成。这一看法得到公众越来越强有力的支持——公众常常在体育场内对部长们嗤之以鼻，并公开抗议政府的措施。在国外，顽固的反共风潮正席卷整个拉丁美洲，并使特鲁希略、佩雷斯·希门尼斯和索摩查的专制政权合法化。谋反者们确信，华盛顿将会支持民众主义的卡尔德隆主义与保守的资本集团结成的新联盟。卡尔德隆派毫不犹豫地退出了从前与人民先锋

党的联盟，他们秘密的叛逆电台不断攻击菲格雷斯据说与共产主义的结盟。卡尔德隆·瓜尔迪亚重新执政被认为实际上已成定局。

索摩查利用这种局势的精明狡猾毫无不逊色，他在1948年12月就曾干过。而今他还得到了加勒比地区其他独裁者的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力，索摩查再次打算尽其所能地检验一下他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要促成显然已岌岌可危的圣何塞政府的垮台。虽然如此，索摩查对自己的意图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旦对他政权的挑战行为被压制，他完全准备与菲格雷斯政府和平共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他首要的是想推翻菲格雷斯，并且打算在实现这一目的时候该采取极端手段。

“丛林之狼”——卡尔德隆派叛乱者在他们受训的尼加拉瓜城镇被人们这样称呼——在1955年1月进入哥斯达黎加，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叛乱领导人和他们的盟友所期待的胜利。面对入侵，人民仍然是消极的，这场入侵不是人民所希望的，不代表人民的意愿。而且，哥斯达黎加政府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有强大的外力卷入，因此呼吁美洲国家组织，如不指责尼加拉瓜的话，就应插手斡旋两国的边境争端。入侵从一开始就表明是一场徒劳无益的冒险，只是帮助政府恢复其已经丧失的声誉。美国支持的是菲格雷斯的立宪政体，它以一美元一架的象征性价格卖给哥斯达黎加三架战斗机，以此表示它对索摩查行动的否定。美洲国家组织派出部队封锁了哥尼边界，解除了叛乱者的武装，叛乱者又一次失败地回到尼加拉瓜，索摩查出卖了他们（当时索摩查看到美国态度坚定，而入侵即将失败，他就停止向卡尔德隆派运送武器，中断了他已允诺的后勤援助）。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在战斗中一目失明，他背负着军事失败和与独裁者结盟的羞辱，决意再次流亡墨西哥。

民族解放党想乘此机会贬低议会中的反对派，尤其是埃昌迪派。政府指控埃昌迪和另一名卡尔德隆派议员与入侵分子相勾结，

便剥夺了他们的议员豁免权，对他们以叛国罪起诉。在这次议会会议期间和会后，发生了无礼的诽谤行径和暴力行为，埃昌迪对毫无根据的指控决计不做任何抗辩．由此他获得了国家最高法院的完全赦免。他的那些议会中的反对派同事决定拒绝出席立法会议，直到恢复两位议员的豁免权，这种局面僵持达8个月之久。这次胜利可谓是平分秋色：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政府是赢家；但埃昌迪也跟着获得了政治上的和个人的成功，使他能够战胜其他两名反对派候选人的竞争，作为民族解放党唯一的、颇得人心的对手参加1958年的大选。

相比之下，民族解放党却分崩离析。保守的前财政部长、追求民族解放党候选人提名的豪尔赫·罗西，在斥责针对他的欺诈行为时退出了民族解放党并建立了独立党，成为独立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另一部分人，显然同开始被称为党的机器有联系，提名弗朗西斯科·J·奥尔利奇作为候选人。菲格雷斯公然无视选举法，支持奥尔利奇，后者是菲格雷斯的一位老战友，民族解放党就是靠他的产业而建立的。

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然十分脆弱。民众中的一部分人感到被排除在政治竞争之外，他们不得不支持严格说来并不代表他们的那些候选人，虽然卡尔德隆派的许多领导人依然流亡国外，但还是以共和党的名义登记了他们的议员资格。共产党打算以人民联盟党的名义参加大选，却又一次被宣布为非法而不得不在制度允许参加大选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选举进程已经朝着较为廉洁和较为民主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则必须搬掉一个巨大的障碍，即1948年和1955年的军事对抗所产生的国家分裂和政治上排除异己。

大选于1958年2月2日举行，参加投票的人数达229543人，埃昌迪获得46%的选票，奥尔利奇获得43%，罗西获得11%。当选总统于5月8日就职。但是，埃昌迪没能获得立法议会的多数席位，因为反对民族解放党的选票仍然在两派议员之间保持分裂：

一派是支持埃昌迪的民族联盟党议员，一派是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的共和党议员。对此，无党派人士和民族解放党人由两派中最有才干的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议员团，他们之间的分歧，更多是由于纯粹的竞选考虑而不是由于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

与人们所预料的相反，埃昌迪的任期具有温和的特点，政府奉行对话和尊重法律的精神。新总统的明确目的即是要巩固法治，尊重舆论，并使新宪法所产生的各项体制具有实质内容和保持稳定。

可是，埃昌迪最困难的任务是去消除1948—1949年和1955年军事斗争所导致的分裂。在这方面总统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准许卡尔德隆·瓜尔迪亚重返哥斯达黎加，一些人对埃昌迪缺乏报复心而感到惊讶，另一些人则对此感到愤怒，他们不希望看到埃昌迪政府犯下导致卡尔德隆分子复辟的危险错误，"博士"的回来引起了国内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一次群众示威。这一事件表明，哥斯达黎加的民主必须包括支持"8年政权"（对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和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的贬称）的哥斯达黎加三分之一民众的参与。特别法庭发布法令，归还卡尔德隆分子在内战后被没收的财产，在同一时期被所谓的"紧急制裁法庭"判刑的那些犯人也被释放。

议会中反对派议员的才干和进攻性，使埃昌迪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处境更加复杂，但他却凭着巧妙的手法和丰富的经验，使民族解放党竞选议长的愿望落空，议长决定议会各委员会的组成，因而它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1959年太平洋沿岸香蕉业工人的罢工给政府造成严重的压力，工人们要求香蕉公司一年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金。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由政府来支付当年的奖金，但罢工表明，香蕉行业的工会组织得到了恢复，劳工对外国公司进行激烈集体谈判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尼加拉瓜一侧的边境局势仍然不稳定，但这并不是由于菲格雷斯继续怂恿和参与反索摩查的阴谋活动所造成的。尼加拉瓜政府在略

罗纳角查获了一个隐匿武器的据点，并展示了民族解放党领导人参与向叛乱者运送武器的证据。少量流亡于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人企图进行反索摩查的军事行动，索摩查扣押了一架哥斯达黎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以示报复。一直小心谨慎地与尼加拉瓜独裁者维持友好关系的埃昌迪，对索摩查扣押飞机的行动持强硬反对的立场，逼迫他归还飞机。在一次边境事件中，一位哥斯达黎加官员——总统的一位密友——被杀害之后，埃昌迪对这类恐怖活动的态度进一步强硬。

由于古巴卡斯特罗取得了胜利，埃昌迪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恶化了，但他注意不去使用旨在对付共产党的宪法禁令中所规定的行政措施，那是严重限制人身保障的行政措施。总统开始采取行动，让内政部发还被海关部门没收的出版物，并允许电台播送曼努埃尔、莫拉在菲格雷斯政府时期被禁止的一篇讲话，埃昌迪还越来越倾向于把禁止共产党以本党名称参加大选的措施交由法院裁决其确切的含义。与此同时，他批准开放人民先锋党总部，允许该党举行集会和会议以及出版和发行该党的报纸。甚至在哥斯达黎加与古巴的革命政权断交之后（由于巴蒂斯塔的支持者被处死），埃昌迪尽力阻止反古巴的非法军事活动。

古巴革命使哥斯达黎加的土地问题活跃起来，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与党的宣传相反，哥斯达黎加真正的基层压力相对较少。财产的集中是不可否认的——超过 2400 公顷的地产仅占全国农场土地的 0.11%，而占可耕地面积的 26.56%——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

在 1962 年的大选中，内战时期的老对手们与他们自己的政党重新开始了角逐。民族联盟党候选人奥蒂略·乌拉特获得 14%的选票，民族共和党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赢得 35%的选票，民族解放党候选人弗朗西斯科·J·奥尔利奇以 50%的选票获得胜利。左翼的人民民主行动党也参加了竞选，虽然在遭受这么多年的政治排斥之后，该党的竞选目的主要在于取得议会的席位。

60年代初，迫切的任务已不再是巩固民主的问题——埃昌迪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是发展经济。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给该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咖啡、香蕉和可可的价格下落。1951—1957年期间，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6.6%，1962年仅增长2%。加之1963年、1964年与1965年伊拉苏火山喷发影响了咖啡收成，并使中部高原地区所有的农业生产受挫。从菲格雷斯执政最后一年到埃昌迪任期结束这段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不到4%。

奥尔利奇政府(1962—1966年)接受了争取进步联盟的目标，导致国际多边组织的资本大量流入哥斯达黎加，并开创了一项向外借债的政策，在初始阶段要为生产和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政府认真地促进工业化进程，首先靠的是执行1959年通过的一项工业保护和发展法，后来则通过哥斯达黎加加入中美洲共同市场而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1951年，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就开始谈判和研究建立中美洲共同市场，这个磋商阶段一直持续到1958年。1960年，这项工作取得进展，签署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建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但这项条约的最终定稿竟然排除了拉美经委会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些提议。哥斯达黎加因此而陷入两难境地，是接受实际上出于北美利益的、由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主张的条约，还是置身于中美洲共同市场之外。埃昌迪政府采取了双边谈判和逐步加入的办法。这样可以防止外国资本突然竞相涌入而无需支付哥斯达黎加投资所承受的社会义务，并为本国资本确保国内市场。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在不断扩展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下（这是人口爆炸的结果，反映出国家的卫生及其他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一味简单地反对一体化是不明智的。

相反，民族解放党却急于要参加中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1962年7月23日，大选一结束，奥尔利奇总统就表示，哥斯达黎加愿意成为中美洲共同市场的一部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参加了中

美洲共同市场就意味着采取了以技术利用为基础的进口替代政策，虽然某些技术在最早应用它的国家里已经过时，但对于不发达的哥斯达黎加经济来说，却是够先进的，它逐渐取代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的政策。实行进口替代被认为是一体化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投资并不是地区化的，而是最终由各成员国之间进行竞争。5个参与国狭小的国内市场总额有限，因此5国认为暂时无法通过农业改革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内部市场。对于公共财政的打击同样是破坏性的。哥斯达黎加运用《工业法》中的奖励政策，把免职作为主要的手段，尽力与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其他国家竞争外国投资。这造成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几年以后积累成一场经济总危机。

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使各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在财政保护下，参加共同市场的本国企业家日见增多，与外国资本建立联系的企业家也增加了。随着工业取得有限的扩展，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也发展起来了，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相比，它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交往都有所不同。这一阶层的特点使得在私营部门组织强大的工会变得非常困难，工会活动仍然集中在香蕉生产地区和公共部门。

虽然新企业家们最终要同传统的咖啡种植园主和农业出口集团实行某种结合，但他们同中美洲共同市场的联系开始时就遭遇到代价高昂的工业保护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对抗气氛。新的企业家和新的经理们没有能力巩固独立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开始加入现有的各个政党。通过这一途径以及他们所设法控制的一些国家部门，他们最终对经济政策施加了重要的影响。

奥尔利奇政府，除了实行一些有利于咖啡行业的国际政策外，还试图通过鼓励大西洋沿岸地区本国的香蕉生产，实行从内部求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政府还与对在哥斯达黎加投资感兴趣的一些跨国香蕉公司谈判，从而打破了联合果品公司对全国香蕉生产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到1975年，香蕉产量大大增加，其中的

41%是本国企业生产的。然而，产品的销售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哥斯达黎加香蕉公司（COBAL）最初由德国资本控制，后来归属联合商标公司所有，它的出口农产品中95%来自本国生产者；哥斯达黎加香蕉发展公司（BANDECO）原由西印度公司拥有，后转属德尔蒙特公司，它的出口中55.5%来自本国生产者；卡斯尔·库克公司的子公司标准果品公司的这个数字是44.1%；与此相比，联合果品公司自身经营的种植园提供它出口量的97%，来自本国生产者的产品仅为3%。本国香蕉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重要的企业家阶层，但它的主要社会影响在于发展起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农业无产阶级，同时太平洋沿岸的农业无产阶级力量也在增强，这一状况壮大了共产党工会运动，直到1984年危机。

生产的多样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例如糖的出口（古巴糖的出口份额在其他拉美产糖国中重新分配，这有利于糖的出口），以及肉和牛的出口。这带来了大量新的外汇收入，也使工业化——糖厂、肉类加工厂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畜牧业发展很快，国家为此开发大面积牧场和有计划地砍伐森林。还种植了棉花和菠萝，这项种植计划与牧畜饲养业加在一起所花费用，就占去了旨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外部贷款的一多半。

奥尔利奇政府明确采纳了扩大政府开支和国家干预的政策，随之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自治机构，资金来源部分是通过增加外债的方式筹措的。这对政府的独立性（尤其表现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发生很大的影响，大概这就是1965年哥斯达黎加为什么要派国民警卫队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支持北美干涉该国内部事务的原因之一。这些政策的实施还使奥尔利奇政府提高税率，停止向社会保险基金会支付国家所承担的份额，并开始发行政府公债来筹集公共工程建设资金——在奥杜维尔政府任期结束时（1978年），政府公债的发行达到失控的地步，到卡拉索任职期间（1978—1982年）形成了债务危机。

奥尔利奇继任者的选举于1966年2月6日举行。民族解放党

在大选中是团结的，但党内最主要的领导人之间已显示出分歧日益增大。该党的候选人是丹尼尔·奥杜维尔，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是国家问题研究中心的创办者，担任过1948年政府执政委员会的部长和第80号法令的执行官——这个法令对于管理公共基金至关重要。在奥尔利奇政府时期，奥杜维尔还担任过立法议会议长和外交部长，他是律师，曾留学法国和加拿大，在党内他仅次于菲格雷斯和奥尔利奇，是第三号人物。另一方面，反对派为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去掌握选举，不得不经受了一次政治变革。这意味着排除了主要党派以往的候选人，而选择了一名折中性候选人何塞·J·特雷霍斯·费尔南德斯教授，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专业的学者，为人非常沉着和容忍。

反对派打算在竞选运动中围绕共产主义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做文章，指责奥杜维尔与这两个问题均有牵连。民族解放党则主要强调1948年的经验，宣扬它自身执政的业绩。这却给予反对派反对民族解放党连续执政的机会，特雷霍斯公开向1948年以后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他支持银行私有化，明确提出一项原则：国家应该仅仅干预私人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那些领域。共产党人试图参加与社会主义人民联盟党的结盟，社会主义人民联盟党提出的候选人是从前的民族解放党军事领导人马西亚尔·阿吉卢斯，他已脱离了他原先的政党而与人民先锋党联合在一起。然而，1967年10月民族解放党提出了一项议案，在立法议会中几乎获得一致通过，人民先锋党因此而再度被宣布为非法。

1966年的大选也许是国家历史上双方得票数最为接近的一次：特雷霍斯·费尔南德斯获得222810张选票（占50.5%），奥杜维尔获得218590张选票（占49.5%）。尽管如此，在总统选举的当天与地方政府同时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民族解放党仍然控制了议会，共获得29个议席。被称作反对派联盟的全国统一联盟有26人当选为议员；一个半军事性的右翼组织——这个组织不久就解散——获得了余下的两个议席。

新政府继承了8.7亿多美元公共债务，但拒绝偿还所欠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基金的债务；外债总额已达1亿美元。特雷霍斯·费尔南德斯为此实行了一项紧缩政策，控制政府的支出。由于仅允许私营部门招工，引起乌拉特和卡尔德隆的不满，他们各自的选民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国营部门提供就业。特雷霍斯依据他的"国家是私营企业的补充"的思想，企图废除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地位。这个提议引起了一场特别激烈的争论，1967年7月23日，这场辩论达到了最高潮，计划终遭否决。

1970年4月，政府挑起了进一步的论战，它批准了一项与跨国的美国铝公司签署的合约。该合约遭到学生们的唾骂，也被左派斥责为不公、偏私、违背国家利益。在国民议会内反对这项合约的议员中，有罗德里戈·卡拉索，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拓展了自己的政治舞台和雄心。在两党议员以多数赞同通过了这项合约后，立法议会大厦就遭到学生们的乱石投掷，4月24日大厦险些被烧毁。尽管首都发生骚乱，人们与警察发生冲突，但政府仍然立即批准了此项合约。虽然如此，由于美国铝公司在这个有争议的地区无法开展工作，不久该公司就撤回并终止了此项合约。

这一事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影响。首先，它有效地阻止了从香蕉契约时代继承下来的向外国公司提供特许权、保证它们的特权而损害国家主权的作法。第二，它鼓舞了学生运动及其他各阶层的人民寻求共产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其他政治选择，自1970年起，各种左派组织相继涌现。

由于咖啡价格大幅度下落，特雷霍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时极为棘手。1966—1968年间，咖啡出口每公斤平均价格从0.959美元下跌到0.806美元，在出口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才避免了收入的锐减。自1969年起，价格略有回升，到1970年每公斤出口价已达到1.057美元，出口量的进一步增加，使咖啡的销售总额达到了7300万美元，特雷霍斯政府的最后一年比执政第一年咖啡收入提高了大约50%。1969年总投资为1.733亿美元，有3670

万美元，即占总投资的21.1%投于制造业部门。因此，尽管存在着咖啡价格下跌这一总的不利局势，由于特雷霍斯政府采取了控制公共开支、稳定国家财政、放慢国营部门增长的政策，经济仍然呈现出一些活力。然而，到1970年，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危机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

在1970年2月1日的大选中，两位前总统，何塞·菲格雷斯和马里奥·埃昌迪彼此再次相遇，虽然两人都没有轻而易举地获得提名。菲格雷斯成功地说服了丹尼尔·奥杜维尔把竞选愿望推迟到下届大选，但罗德里戈·卡拉索（当时还是菲格雷斯的政治门徒）却傲慢地在会上自我提名，与那位老考迪罗相对抗。卡拉索获得了1/3的选票，此事加剧了矛盾而使他实际上被开除出民族解放党。不久，卡拉索靠他的领导魅力为基础创建了民主复兴党。

在埃昌迪方面，要解决两个巨大的难题：要瓦解坚决支持提名乌拉特为候选人的力量，以及少数卡尔德隆分子企图提名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虽然埃昌迪设法使乌拉特孤立于资产阶级，孤立于他的执行委员会，甚至孤立于乌拉特自身的民族联盟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乌拉特这位1948年的老将对埃昌迪发动的猛烈抨击，严重损害了埃昌迪作为候选人的信誉。同时，卡尔德隆派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新的组织国民阵线党，尽管随着竞选活动的开展，这个新党的力量遭到削弱，但光是它的存在，再加上乌拉特的活动，就无可挽救地削弱了埃昌迪战胜菲格雷斯的可能性。卡尔德隆·瓜尔迪亚亲自组织了一场支持埃昌迪的强大的竞选活动，力图以此来克服分裂的恶果。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当时，卡尔德隆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到1970年底，他那多姿多彩的和喜好冒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970年的大选由于以下的事实而引人注目：基督教民主党首次作为一个政党参加大选；共产党即社会行动党得以参与竞选，这是因为，尽管最高选举法庭认为，社会行动党属于宪法第98条款

禁令之列，立法议会却没有及时地发觉这一情况，由于该党没有获得宪法所要求的 2/3 的选票，也就没有颁布不准该党参加竞选的禁令。1948 年的禁令被认为与菲格雷斯密切相关，如今他却要求给共产党人完全的合法地位（事实上，菲格雷斯不赞成内战以后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法令，虽然他接受了强烈反共的执政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多数决定）。很明显，由于菲格雷斯的医生路易斯·伯斯廷——曾是共产党的一位斗志旺盛的党员，与曼努埃尔·莫拉的关系极为密切——的牵线，莫拉与菲格雷斯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两人商定，莫拉将力促苏联购买哥斯达黎加剩余的咖啡，这些咖啡只有在新辟的市场上才能找到销路，作为交换，新的咖啡出口商可分享报酬和手续费，额外利润用来资助菲格雷斯的竞选费用。至于菲格雷斯，他答应要让共产党合法化，并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大选结果，菲格雷斯以 54.78%的选票获胜，埃昌迪获得 41.17%的选票，另外三位候选人得票不到 2%。

在 1961—1971 年期间，社会中间阶层的收入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中上层人士显然逐渐集中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专业人员的数量增加了，其中许多人是为国营公司或大型私营公司工作的。同样，在第二产业部门工薪阶层的人数所占就业百分比有所增加，农业部门就业人数随之相应减少，这是由于在家畜业、蔗糖业、香蕉业以及后来的水稻业中，民族企业家重要核心阶层的出现，使农业内部发生了显著的分化，这一变化有助于工业部门（不论是本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中管理阶层的发展。

因此，在中美洲共同市场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在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获得增加，其所占经济自立人口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48.1%增长到 1970 年的 55.1%。在竞选活动中，菲格雷斯不仅主张建立民主政体，特别是司法独立性，而且主张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提出要同极端贫困作斗争，在他看来，极端贫穷预示着哥斯达黎加社会有发生暴力的危险。除赢得了总

统的职位外，菲格雷斯还在立法议会中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议员中有 2/3 是民族解放党人，有两名共产党人代表（其中一人是曼努埃尔·莫拉），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人，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是执政党的附庸。执政党还在几乎所有的市政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此外，由于与卡尔德隆派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卡尔德隆·瓜尔迪亚达成了秘密安排，从而使政府能够运用第 4646 条法律来控制自治机构。该条款规定，在这类机构的董事会中，要保证政府占 4 个席位，主要反对党占 3 个席位。

菲格雷斯拥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就能够建立社会援助混合委员会（IMAS），该委员会的使命是用 10 年的时间在哥斯达黎加消除极端贫困。菲格雷斯实施了家庭津贴计划，扩大了社会保险范围（受保险人数所占人口比例从 46%提高到 1978 年的 85%），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增加到 4 所，大学学生达 4.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6%）。菲格雷斯还默许一部分民族解放党人提出创办哥斯达黎加开发公司（CODESA）的建议，他还保证，从国家预算中给司法部门划出一个固定的比例，从而在体制上巩固司法部门的经济独立性。菲格雷斯履行了他与曼努埃尔·莫拉达成的协议；他的政府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行动遭到右派的反对和左派的欢迎，菲格雷斯政府取消了宪法第 98 条款的第 2 段，使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不久政府就发觉自己卷入了几起丑闻中，其中最大的丑闻是由于政府对国际逃亡分子罗伯特·贝斯科实行庇护而引起的，菲格雷斯总统亲自撰写了为贝斯科辩护的演说。这位金融家在美国被指控非法洗钱，他在 1970 年和 1974 年哥斯达黎加大选中资助了民族解放党部分的竞选经费，并且创办了一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纸《至上报》，与《民族报》展开竞争。但贝斯科事件仅仅是一系列金融丑闻和政治丑闻中最为臭名昭著而已，这些丑闻关系到国家和福利事业的膨胀，致使国家预算连年出现赤字，公共债务增加。

1973年石油价格的暴涨虽对哥斯达黎加经济打击是致命性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哥斯达黎加炼油厂(RECOPE)①的收益被用以修建体育馆、运动场和港口娱乐设施。政府只能采取赤字财政和借债政策，先是发行国内公债筹集科朗，接着又举借美元外债，债务达几十亿美元。

尽管菲格雷斯掌握着国家行政大权，控制了立法议会、地方政府以及自治机构，他仍然感到无法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他提出，哥斯达黎加的国家机构变得过于庞大，已难于进行管理，他认为，应当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一个事实上像1948年时期的政府，以使改革进程不会受到法规的限制，或受到官僚机构的阻碍，待改革取得成效后再重新建立4年举行一次大选的正常制度。

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民族解放党的反对派又一次没能联合推举出一位候选人参加竞选。各党派提出的候选人有：民族解放党的丹尼尔·奥杜维尔和全国统一联盟的费尔南多·特雷霍斯·埃斯卡兰特，除此之外还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在内的其他六位候选人：新组建的民主复兴党的罗德里戈·卡拉索，独立民族党的豪尔赫·冈萨雷斯·马腾，(该党主张保护一体化经理人员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义行动党②的曼努埃尔·莫拉。

反对派分歧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反对民族解放党。共产党头一回不得不面对其他政治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的政治信仰或多或少接近于共产党。比共产党还要左的是，具有卡斯特罗主义倾向的真正革命运动以及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党；比共产党稍右的是人民阵线党，该党只提出了自己的议会候选人。

反对派内部的分裂确保了丹尼尔·奥杜维尔的胜利，他获得

---

① 是当时哥斯达黎加唯一的一家炼油厂，1974年以前属美国公司，后收归国有。——译者

② 即人民先锋党，1953—1970年该党以社会主义行动党的名称参加议会选举，1974年8月获得合法地位。——译者

了 43.44%的选票（将近 30 万张选票）；其他各党派的得票率是：全国统一联盟的候选人 30.39%，卡拉索 9.1%，冈萨雷斯·马腾 10.9%。左派组织中，莫拉获得 2.4%，社会主义党 0.5%——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得票数相同。

新总统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以“打倒腐败”为主题的演说，使菲格雷斯大为恼火；接着新政府又以惊人的速度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奥杜维尔完成了社会保险的普遍化、判定了他自己的家庭补助计划，扩大了国家的服务范围和公路网。奥杜维尔增加征购土地以便在农民中进行分配，他促进了通信设施以及电力生产的现代化。保健设施覆盖面由 1970 年占居民总数的 46%扩大到 1978 年占居民总数的 86%，1978 年婴儿死亡率降至 21%；而人口的平均寿命超过 70 岁。

从政治上来说，奥杜维尔政府（1974—1978 年）打破了权力更迭的状况，奥杜维尔政府实际上是民族解放党政府 8 年（1970—1978 年）执政的第二阶段。在奥杜维尔执政时期，民族解放党没有获得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虽然时常能够与全国统一联盟达成一致意见，但政府不断受到其他新党的严厉批评。政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咖啡价格的大幅度上涨，1974 年每公斤价格为 1.384 美元，1977 年提高到 4.721 美元，上涨幅度为哥斯达黎加历史上前所未有；同期，咖啡的销售总额从 1.248 亿美元增长到 3.192 亿美元。在 1974—1975 年的国际经济危机期间，政府还利用了国内外的信贷来扩张经济。虽然民族解放党政府作出了卓越的努力以建立企业国家，上述政策却使该党的这项计划江郎才尽。这一政策是与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出现相关的，构成这一代领导人的不是那些需要政权为其现代化目标创造条件的企业家（“政治企业家”），而是一些想要进入生产领域以扩大其权限并增加其私人资本的政客和官僚。这个集团可以称之为“企业政客”，或者“官僚资产阶级”。

不久就清楚地看出，民族解放党的第一代“政治企业家”的

主要代表仍然是前总统菲格雷斯，而第二代则由丹尼尔·奥杜维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作代表，由路易斯·A·蒙赫在社会方面作代表，蒙赫在1982年竞选总统获胜时提出的口号是他唯一的企业就是民族解放党。

1970—1978年民族解放党的连续执政，得以使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实施企业国家的政治计划，其采取的主要行动之一即表现为建立了哥斯达黎加开发公司，创办这个公司是基于以下的看法：国家应当在若干经济领域发展一些私营部门可能感兴趣、但苦于没有必要的财力物力的项目。为了不让外国公司控制这些部门，国家应当进行创业资本的投资，一旦企业赢利，国家就把这些企业转给私人经营。被认为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仍然由国家直接掌握。然而，事实上建立哥斯达黎加开发公司的有关法律条款却很少被执行。哥斯达黎加开发展公司除承担了社会基础设施的活动，例如烃化物酒精和水泥的生产以外，还从事私营企业经营不下去的那些部门以及那些因管理不善、亏损和产品质量低下而导致政治和金融丑闻的部门。因此，对经济混乱状况的不满和怀疑政府贪污腐败的指责，大大冲淡了企业国家和哥斯达黎加开发公司某些方面含有的民族主义思想。

随着向企业国家的转变，公共部门再次膨胀起来，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保证了早先只有成功的私营企业主才拥有的收入（高工资，减免税收，旅差费，汽车，住房，贷款等等）和声望。这种政治计划的资金来源包括：扩大财政赤字，对生产者和公民提高税率，大量举借外债，大量发行公债，增加内债。因此，因公共企业的重要性而享有的投资规模资本集中和特权使一个对盈利、效率、减少浪费、良好的工作水平等概念的确切含义一无所知的企业政治家阶层，变成了传统私营部门危险的竞争者，最终变成了私营部门肯定的对手。

国营部门中的企业家主义加深了国家的分割状况。每一个官僚部门都力图通过自身机构的封建化来保护自身利益。在关于政

策、退休金、工资、佣金、许可证、假期等问题上，各机构的特殊性成为主题。不仅在各机构之间，而且也在机构内部出现分化，重演了贫、富、中等收入之间的社会总分化。与此同时，明显地缺乏协调，一系列的指令化成了等级森严的程式，无法改变政策。因此，国家加快地、但混乱地发展。这一状况影响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了身躯臃肿、头部瘦小的政府形象。

在奥杜维尔政府末期，菲格雷斯发表了一次讲话，称政府公事私事界限混淆，从而证明怀疑政府贪污腐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还表示相信，参加 1978 年大选的民族解放党候选人蒙赫将被反动派击败。因为 1969 年 7 月宪法改革后明确禁止卸任总统重新当选，所以菲格雷斯能发表这种挑衅性的声明而无损于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因此，他突破了他的党的传统，宣布哥斯达黎加国家不仅是腐败的，而且还是官僚主义的，的确难以治理。

奥杜维尔任期结束时，不仅发生了财政危机，还出现了党派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关于国家性质的危机。行将离职的总统的企业国家试验陷于流产。奥杜维尔的继任者在同一天里开张而又封闭了哥斯达黎加开发公司属下的、国内生产无水酒精的最大糖业中心 CATSA 公司的设备安装，这一行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1978 年的大选虽然有 8 位候选人参与竞争，投票数却集中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上：团结党，它的候选人是罗德里戈·卡拉索，以及由路易斯·A·蒙赫领导的民族解放党。独立民族党和全国统一联盟被其支持者所抛弃，因为据说这两党与奥杜维尔同谋合作，两党都没能选上议员职位。人民先锋党联合了几个小的左派团体，以统一人民联盟的名义参加竞选。卡拉索以明显的优势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得票率为 50.5%，蒙赫为 43.8%，人民先锋党 2.7%，声称代表真正卡尔德隆主义并把弗朗西斯科·卡尔德隆·瓜尔迪亚看作其领导人的全国统一联盟得票率仅占 1.7%。然而，由于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家族的几个成员——特别是他的儿子和遗孀

——和主要领导人的适时更替，卡尔德隆的名声及其选举遗产都被保留了下来，传给了他们帮助创建的团结党。

卡拉索总统曾是民族解放党的领导人，他的经济政策受到他原来政党的政策影响，虽然那些政策也含有新自由主义的倾向，以及在决策时采取十分明显的个人至上的方式。卡拉索还主持着一个松散的联盟，该联盟在某些问题上与民族解放党站在一起，他上任伊始就发觉国会中没有自己的嫡派。新的团结党选出的议员对联盟领导人并不完全都忠诚，不久，当面临无法控制的国内外困难时，政府发觉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

每隔4年主要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成为哥斯达黎加国家纠正民族解放党政府经费超支和公共投资过大这种作法的一个要素。纠正进程表现为对财政和金融事务进行谨慎的调整，对政府开支和外部资金的使用采取较为节制的态度，以使公共财政取得平衡，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由于菲格雷斯和奥杜维尔先后当选总统，民族解放党政府连续执政，以及后来与其前任有着相同政治思想渊源的卡拉索总统上台执政，从而中断了上述的调整进程。因此，卡拉索政府没有能实施那种可以挽救国家财政状况的改正措施。总统没有建立健全的通货基础，未能提出有力的新政策以削减政府开支，或者在政府周围建立共识，以便可以革除向国内外滥借贷的恶习。

在此期间，哥斯达黎加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卡拉索政府的失策更加引人注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下降，1979年增长率为6.4%，1980年降到0.8%，1981年为－2.3%，1982年为－7.3%。公共外债从1979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7亿美元。不过，出口走的却是不同的节律，1978年出口总额达到10亿美元，而进口额是13亿美元；1980年出口12亿美元，进口16.5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从1979年的7.8%提高到1982年的81.8%。科朗同样丧失了它的币值；1981年科朗实际贬值51%，是该国经济史上最大幅度的一次贬值。在下届政府的头

两年里，货币贬值23%，1984年和1985年分别贬值9.6%和12.7%。

这次经济危机导致卡拉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发生了一系列公开的冲突，造成了外交事务的紧张气氛；直接侵犯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战争更是大大加剧了这一气氛的紧张程度。虽然卡拉索领导的是一个公开宣布其保守性质的联盟，但他仍决定公开支持反索摩查政权的起义活动。在国际范围，把总统的个人倾向与国家合法的政策相结合，又有哥斯达黎加人民反索摩查传统思想的卫护，卡拉索政权渐渐直接卷人了尼加拉瓜的冲突。索摩查政权的垮台意味着普遍的不稳定这一前景被忽视了，在哥斯达黎加这样的社会里非法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所带来的后果同样被忽略，哥斯达黎加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有效的机制来应付和控制这种局面。

不过危机甚至更为深刻，它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缺乏政治领导。老一代人失去了自己最优秀的领导人：卡尔德隆和乌拉特已去世了；菲格雷斯现在年事已高，而且他的影响受到丹尼尔·奥杜维尔的抵销；莫拉不仅忍受年迈的压力，党内还对他的领导提出严厉的质疑，导致1984年12月人民先锋党出现了重大的分裂，其工会组织受到削弱；曼努埃尔·莫拉被免去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同年发生了冲突，这是得到苏联大使馆鼓动的；当莫斯科正在中美洲推行激进政策和全力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时候，苏联人认为莫拉既软弱又是个改良主义者。人民先锋党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是由温贝托·巴尔加斯和阿诺尔多·费雷托领导的，这派倚仗苏联的帮助。巴尔加斯和费雷托接管了中央委员会以后，莫拉立即组建起一个新的组织哥斯达黎加民族人民党，该党得到了古巴政府的政治支持，而且莫拉仍然控制着原人民先锋党的资金。巴尔加斯和费雷托领导的一派继续使用人民先锋党的名称和旗帜，在太平洋南岸香蕉种植园组织了一场罢工，为的是展示一下它在全国的力量和对工会的领导地位。罢工发生时，正值联合

果品公司决定要终止在哥斯达黎加种植香蕉。罢工只不过是促使这家公司更快地实施这一计划，这完全是一场大灾难。香蕉工业的停产使香蕉工人长期集中的状况不再存在，哥斯达黎加工会运动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对这些事件的责难都落到了人民先锋党的身上，但人民大众则惩罚整个左翼力量，它在1986年的大选中得票率甚至不足5%。

哥斯达黎加政治制度的危机，其标志是缺乏领导和社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集团而多派之间形成一种中立化，从而加剧了哥斯达黎加国家和经济的普遍危机。问题到了盘根错节的地步，必须要求举国上下达成一种共识，或者至少在主要的社会力量之间达成共识，以便摆脱战后以来政治战略所带来的困境。随着中美洲地区冲突的加深和美国加强对本地区事务的影响，哥斯达黎加作为一个具有本国文化和历史的主权独立国家，其真正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1982年，政治钟摆又回到了民族解放党一侧，该党再次提名路易斯·A·蒙赫为总统候选人。蒙赫和本哈明·努涅斯过去是工会领导人，1949年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了制宪会议。蒙赫长期与美国保持着联系，这时，他在强烈反对卡拉索并主张与美国大使馆更紧密结盟的选民中找到了支持力量。

在卡拉索政府镇压下，团结党为政府受指责的危机所迫，提名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为候选人，他是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的儿子，卡拉索政府的前外交部长。参加竞选的还有民族运动，其候选人是前总统埃昌迪（当禁止总统再次参加竞选的法令成文时，他已受豁免），人民先锋党和在统一人民联盟名义下与它结盟的组织以及民主党和独立党这两个党派（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纲领）。民族解放党赢得了58%的选票，团结党得票率为33.6%，埃昌迪的民族运动仅获得3.8%的选票，统一人民联盟得票率为3.3%。

蒙赫新政府所继承的问题是严重的，可是民族解放党取得了

巨大胜利，足以使它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进行深刻而又剧烈的变革。不过新总统并不要求进行这种变革，他的治理无精打采，到他执政末期出现了大批极其重大的政治丑闻。也许最大的丑闻是在国际方面，虽然蒙赫宣布了一项中立政策，但政府在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允许里根政府在哥斯达黎加国土上进行反桑地诺的活动。

蒙赫政府明显交了好运，能够利用本地区特殊的局势而得利，当时这一局势吸引外国机构和外国政府不可多见地卷入到本地区事务中，向中美洲注入大量财源，这股财源在其他情况下也许会流向其他地区。因而仅仅是公共部门接受的外部资金总额，1981年为4.694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4.942亿美元。1981—1985年，如果加上拖欠的外债本息和延期支付的数额合计，所得外资总数达41.32亿美元。这种外部援助允许甚至鼓励了早些时候经济停滞和瘫痪的状况继续下去。国有部门就业中产生的特权继续存在，虽然在国际借贷机构的压力下，哥斯达黎加不得不暂时放弃了企业国家模式中最卑劣、最关键的方面，并为匆匆忙忙又乱哄出现的、与这些国际借贷机构有密切关系的私人金融阶层开了绿灯。

没有进行重要的整顿工作，以及美国慷慨援助的人为气氛，都丝毫不能阻止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最软弱的经济部门和中产阶级，它们受到生产停滞、实际收入下降、高额征税和债务还本付息的直接影响。1979—1982年期间，实际收入下降了30－40%。1982年收入下降到最低的水平，通货膨胀率达到9%的最高峰，同时生产降低了7%。据估计，即使生产不下降，国民总收入也将减少12%，这是由于汇率低下和外债偿付的结果。

外部经济援助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有联系，这种政策主张经济非国有化，主张在简单财政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定向，使之适合于非传统商品的生产和出口。换句话说，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所在，不是要消除哥斯达黎加的危机和重新建立国家健康的发展方向，而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保证哥斯达黎加按照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具有倾向性特点的协议来偿还所欠国际银行系统的债务。

对国际机构来说，这符合它们以经济自由化、缩小政府投资范围、加紧履行公共债务偿债规定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如借贷、结构性调整、意向书等等）的逻辑。这期间公共外债如下：资金收入1982年为2.07亿美元，1983年6.09亿美元，1984年4.545亿美元，1985年4.917亿美元；实际已支付的外债本息合计，上述各年份分别为1.69亿美元，6.377亿美元，3.154亿美元，5.631亿美元，对外资金收支净额：1982年为0.38亿美元，1983年为负0.287亿美元，1984年为1.39亿美元，1985年为负0.714亿美元。

从全国观点来看，问题要比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复杂得多。比较国际成本的标准通常是，估价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再算出所有经济部门最终的清偿能力。对外部资金的依赖造成这样一种情况：资金流入哪怕有极小的减少，都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国民经济长期依赖于国际机构和友好国家的好心以及它们的援助分配。

这样的一种事态延缓了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但它确使公众重新树立起信心、并且维护了社会安定。形成这种状况主要不是哥斯达黎加政府自身行动所取得的成效，而是美国政策的结果，美国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中美洲地区局势的稳定和非军事性影响，对这一地区实行了资金优惠政策和给予馈赠援助。在此期间，外援重点提供给私营部门，这就使外援的主要受益者有可能积累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来打破当前的困境并建立起一种新的霸权地位。1984年，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地位遭到削弱，这强烈地预示着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私营部门的方向发展。

可是，私人金融部门缺少经济自主权。它的经营活动基本上是投机性的，1982年后，私人金融部门严重依赖于外部经济援助资金的流入。由于公共部门几乎得不到这种援助金额，新的金融家肯定能取得不寻常的资金。但是，对外援的依赖以及受援时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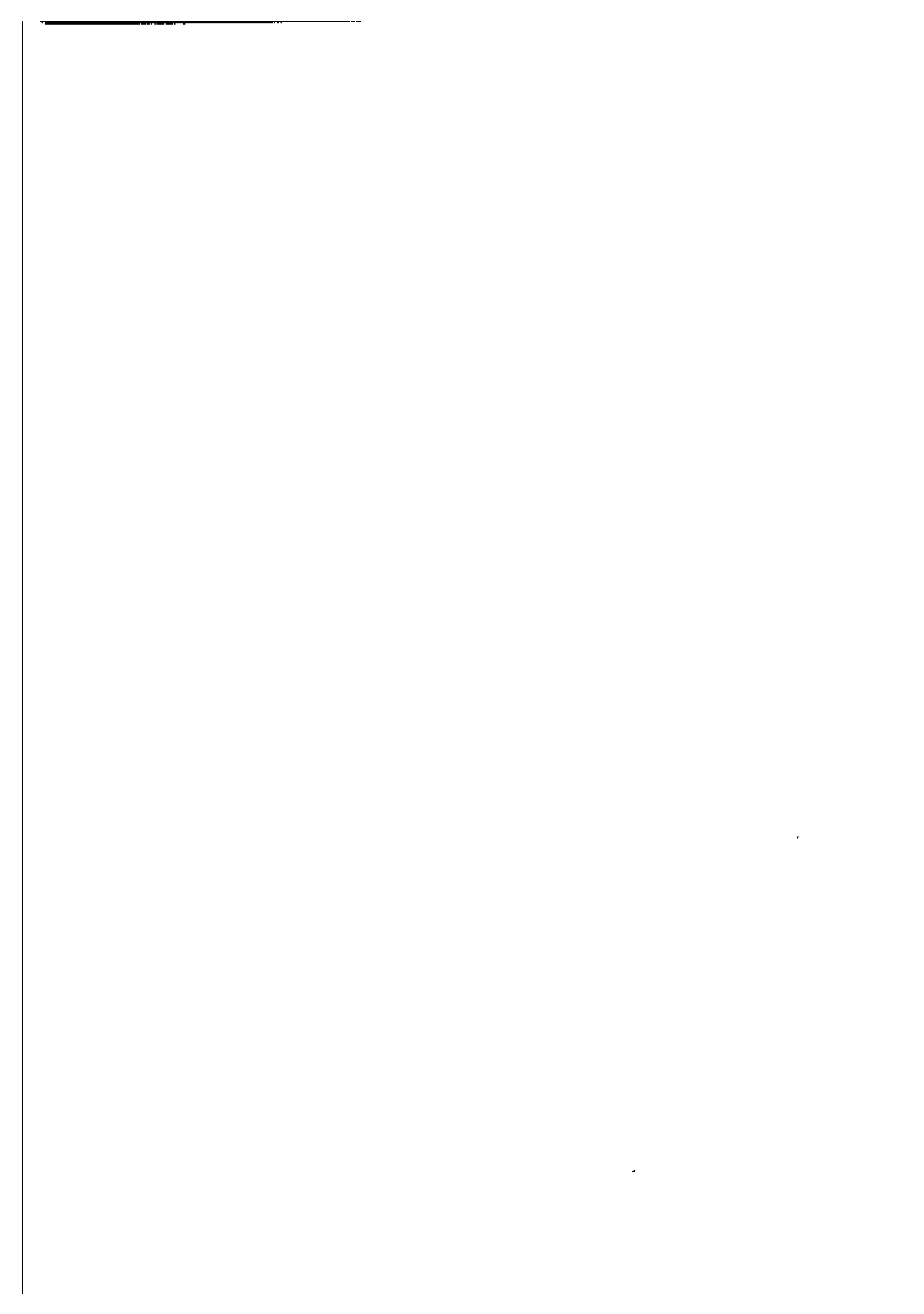
到的特别偏爱，自然会受到援助金额本身波动和国际经济形势波动的制约。因而当这些因素由有利转变为不利时，对当地金融部门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来得相当迅速。其次，对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客观限制，除了外币交易和国家证券交易外，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许多投机活动包含了外币交易，在很多情况下避开了中央银行制订的限制措施。这些投机活动与其他活动的结果，产生了金融丑闻和大量的新金融家的破产，这种状况降低了对这些公众新金融组织的信心，而间接地加强了国家银行制度。

80 年代期间，虽然经济危机、地区冲突和外来影响的加深，给哥斯达黎加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这也有助于推动哥斯达黎加民主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哥斯达黎加的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指标仍是中美洲国家中最高的；政党制度、自由选举和尊重人权是哥斯达黎加人民的真正成就，哥斯达黎加虽然资源稀缺、具有不发达和依附性等固有的问题，但人民懂得怎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民主和独立。

民族解放党候选人奥斯卡·阿里亚斯取得了 1986 年大选的胜利，给哥斯达黎加带来了欣慰，使该国具有了民族、民主及和平的特征。新总统孜孜不倦地试图纠正蒙赫政府模棱两可的作法，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1987 年 2 月，阿里亚斯提出了一项计划，以求得本地区内战停火，停止外国对这一地区的武装干涉活动，为此他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1987 年 8 月中美洲各国总统正式通过了这项和平计划。这项倡议并没有能立即平息地区的战斗，仅仅适度减少了哥斯达黎加易受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的脆弱性。虽然如此，倡议使地区武装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大气候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它向哥斯达黎加邻国的暴力活动注入了一点点哥斯达黎加的镇定态度。在提出这项外交政策方面的著名计划以后，余下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制定一项战略，以防止取得巨大成就的哥斯达黎加社会腐败衰落，克服前 10 年里的不利条件，并在本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为经济福利和政治民主化提供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础。

第 三 编

加勒比地区



第9章

约1930—1959年的古巴[①]

1898年结束的古巴与西班牙的战争，使古巴无处不受到战争的破坏。从东部山区越过中央平原到西部河谷，到处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那是一场残酷的冲突。交战双方的军队似乎下了决心要惩罚这片国土，而不是要进行战争。在几乎4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一切形式的掠夺。10万多个小农庄、3000个畜牧场和700个咖啡园被破坏。据估计，1894年注册的制糖厂共有1100家，而其中只有207家保存了下来。城市和农村的业主们都负债累累，无法取得资本和信贷。

这场大破坏并非人们事先没有预料到和没有计划到的。古巴人深深懂得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这的确是一场破坏财产的战争。到1898年，分离主义的策略实现了分离主义的战略目标。西班牙到达了崩溃的边缘。然而，古巴军事战役的成功，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与此相反，它带来了美国的干涉。到这时，古巴人的一切计划都失败了。他们孤注一掷地将一切投入了反对西班牙的战役。对西班牙作战的胜利使他们精疲力竭，十分脆弱。

武装干涉导致了军事占领。到1902年5月，美国终于有效地使得古巴的独立徒具形式。普拉特修正案否定了新生的共和国有

---

① 本章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毛相麟研究员的帮助。——译者

缔结条约的权利，确定了它的国债限额，并批准了北美的干涉，说这是为了“保持一个能够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双方签订的互惠条约，不仅把古巴的主要出口商品蔗糖束缚在美国这个单一的市场上，而且使得古巴经济的关键部门落入外国——主要是美国——的控制之下。这些关键部门是：农业（特别是蔗糖和烟草）、畜牧业、采矿业（特别是铁矿）、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公用事业（煤气、水、电话）和银行业。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英国的投资总额达 6000 万美元，主要在电话、铁路、港口和蔗糖等部门；法国投资达 1200 万美元，主要在铁路、银行和蔗糖业；德国投资达 450 万美元，分别投在工厂和公用事业。美国在古巴投资的资本超过 2 亿美元。根据双方签订的互惠条约，古巴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享有优先待遇。这使得古巴更加依赖蔗糖生产，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依赖烟草生产，并加强了外国对古巴经济关键部门的控制。互惠待遇也鼓励土地从小单位变成大庄园，从本国家庭所有变为外国公司所有，从而不利于经济多样化。互惠待遇的影响还不仅限于农业。古巴降低了关税——有的关税原来高达 40%——使得这个岛国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向北美的进口品敞开大门。美国制造商享有的向古巴出口的特权，为古巴资本造成了一个极为不祥的投资气候。早在 1903 年以前，古巴资本的贫乏和经济条件的萧条就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互惠条约的签订使得本国企业的前途更加暗淡。北美的制造品充斥了古巴市场，妨碍着古巴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许多古巴公司无力与美国制造商竞争，企业破产日增。

独立战争结束后 10 年内，美国在古巴的存在无孔不入，完全地统治了古巴的经济，彻底地渗透到了古巴的社会结构之中，完全地控制了古巴的政治进程。美国在古巴的无孔不入的存在，构成了这个共和国早期的基本性质。

古巴独立之后不久，其政治就具有了明显的分配性。[①]国民经济的很大部分迅速落入外国人手中。拥有政治权位就保证那些有了官位的古巴人和追随他们的支持者能够通过政府——政府是唯一完全属于古巴人的企业——取得资源的手段和分配利益的机构。连任公职的作法违反了轮流任职这个上层阶级内部的不成文协议。由一党或一党中的一派垄断公职，会威胁其他人，使他们无法担任国家的挂名差事。在政府中当官成了上层阶级谋生的主要手段，选举便成了一个体制化的进程，使权位的竞争者或多或少平等地保证能轮流进入政府。人们把保持这个制度看得至关重要，以致总统的继承问题造成了1906年的武装抗议，当时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连选连任总统，1917年又击败马里奥·G·梅诺卡尔继续当选为总统。

1928年，赫拉尔多·马查多第二次被选为总统，遭到传统的保守党和人民党的反对，他自己的自由党内部也有反对。1927年，卡洛斯·门迭塔脱离了他的政党，另建民族主义联盟，公开反对总统连任。其他一些知名的政党领袖如心怀不满的自由党人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和罗伯托·门德斯·佩尼亚特以及前保守党主席马里奥·G·梅诺卡尔对总统连任也表示抗议并流亡到国外去组织反对马查多的势力。

但是，对于马查多分子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已经存在的各个政党。当时在古巴社会中新的力量正在蕴酿之中。到20世纪20年代，在共和国出生的第一代古巴人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他们感到共和国缺少些什么。民族的失望首先表现在思想阵地，表现在大学改革中、新的文学和艺术潮流中以及新的历史观点中。对于文化新生的渴望与对于政治革新的要求结合起来，使失望变成了不满。政治日程扩大了，包括了反帝、民族主义和社会正义。但这一代人的怒火，首先是针对国内政治的腐败和政府官员们的不

---

① 指把古巴政府职务像分赃式地分配给亲信。——译者

廉洁。1923年3月，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发表了一项宣言，谴责政府的腐化。一个月以后，全国公民革新委员会发表长篇檄文，谴责贪污、腐化和欺骗。8月，退伍军人组织与原解放军的军官们联合起来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起要求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不满情绪传播到社会的其他部分。1923年，大学生组织了大学生联合会（FEU）。随着省一级和国家一级的工会的扩大，劳工的战斗性加强了。1925年，工人们组织了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CNOC），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劳工组织。同年，古巴共产党（PCC）成立。

知识分子、学生和劳工把不同政见推进到传统的政党政治的限制以外，将它推到了改良和革命的范畴。全国辩论的内容变了。共和国的一代具有一个特殊的革新使命。这个使命的目的是完全地革新共和国。它不仅对马查多的政府提出挑战，而且对马查多进行统治所依据的思想提出挑战。

然而，1927年，马查多使用恐吓、强迫和贿赂等手段，终于使得各传统政党联合提名让他连任总统。这项安排被称为合作主义，它把自由党、保守党和人民党联合起来支持马查多连任总统。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从此结束了政党独立和政治竞争的一切外表。而这些本是反对总统连任的暴力行动的传统原因。1927年晚些时候，马查多还使国会通过一项决议，修改了宪法，把总统的任期延长了两年。1928年11月，马查多作为唯一候选人，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当选连任总统，任期6年。

从许多方面来看，马查多重新当选总统是各传统政治上层人物对古巴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所作出的集体反应。合作主义本身就是那些进行争斗的传统政党为了战胜日益增大的对旧秩序的挑战而形成的一个必要的联盟。30年来，19世纪历次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们一直主宰着这个岛国的政治。他们彼此就政治妥协问题讨价还价，以保证他们能继续居于要职。1928年，这种政治利益群体在合作主义共识方面找到了合乎逻辑的结果。合作主义的确许

许在政客们本身遭到围攻而且面临他们在共和国 30 年统治中最严重挑战时稳定他们的内部政局。

1928 年马查多重新当选总统，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并使得不同政见者更加突出。但是，世界大萧条加剧了政治对抗并激化了社会冲突。蔗糖生产减少了 60%，而蔗糖生产是整个古巴经济得以平衡的支柱。1930 年年中，当时美国制订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而使古巴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这一关税法是一项保护主义措施，它增加了对古巴蔗糖的进口关税（古巴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比重从 1930 年的 49.4%下降到 1933 年的 25.3%）。蔗糖生产者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以减少生产，力求保持偿付能力。糖季收获工作减少到 62 天，只需要几万名蔗糖工人两个月的工作量。在 390 万人口总数中，有 25 万名户主（代表着将近 100 万人）完全失了业。有幸能逃脱完全失业的人们也很难找到临时工作，工资也压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 75%。甘蔗种植地区的工资一天降低两角钱。在有的地区，工人只能得到食品和住处。随着商业、银行业和制造业的破产事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市无产阶级的工资降低了 50%。1930 年，政府宣布，除军队外，所有政府雇员的薪金大大削减，第二年又在国营部门实行了一系列裁员中的第一批裁员。有地位的中产阶级成员，特别是那些传统地享有安定生活和丰富收人的文职人员和政府雇员，是最新加入日益扩大的失业者队伍的人。

到 1930 年，经济危机的全部后果打击着整个岛国，古巴社会的所有部门实际上都与马查多政府对立起来。1930 年 3 月，处于非法地位的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组织了一次总罢工，得到 20 万工人的支持，使整个岛国陷于瘫痪。9 月，学生举行了一次反政府示威，造成暴力事件，大学被关闭。随着群众示威的发展，工会会员增加了。1929 年和 1930 年罢工使得关键经济部门的生产停顿，包括雪茄烟制造业、冶炼业、建筑业和纺织业。1930 年的总罢工

最后遭到残酷镇压。逮捕、拷打和暗杀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加强镇压未能减少抵抗。与此相反，反对马查多的活动增加了。农村爆发了零星的战斗，有人放火焚烧甘蔗田，破坏了成百万阿罗瓦[1]的甘蔗。在内地，各处都有武装的群体，他们伏击火车、切断电话、电报线，并袭击孤立无援的乡村警卫队岗哨。1930 年 11 月，政府宣布全岛处于紧急状态。全副武装的军队在省城和小镇上执行警察的任务。在比那尔德里奥、马坦萨斯、拉斯维利亚斯、卡马圭和奥连特，军事督导代替了文职省长，军事法庭代替了民事法庭。12 月 1 日恢复了宪法保证，但 10 天以后又停止了。镇压活动依靠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组建了秘密警察队伍——专家处，他们是酷刑的专家。大棒党成了政府的行刑队。古巴成了一个兵营。在这个政权下，中立者被当作嫌疑犯，小小的批评就被当作颠覆。

有组织的反对派作出了具体反应。好几个组织拿起武器向马查多提出挑战。ABC 党由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学生组成。他们组成秘密小组，系统地用暴力对付政府，以便为革命创造条件。革命激进细胞组织（OCRR）也采取小组的组织形式，并以武装斗争和破坏作为推翻马查多的手段。1931 年，在大学生指导委员会（DEU）内部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争论，结果产生了左派学生运动（AIE），该组织献身于对古巴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组织了进行城市游击战的“行动小组”，并在街头进行斗争。古巴共产党扩大了它的革命活动，并在主要工会（其中最有名的有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中取得了领导权。1932 年，蔗糖工人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工会全国糖业工人工会（SNOIA）。与此同时，各种妇女抵抗组织、大学教授们、师范学校老师和学生们参加了一个献身于对马查多进行武装斗争的地下网。到 30 年代初，危机发展到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随着经济条件的恶化和社会动荡的扩展，反对马查

---

① 阿罗瓦是西班牙重量单位，用于南美某些国家，1 阿罗瓦合 25.36 磅。——译者

多的斗争越来越变成一场力图推翻一个制度而不仅仅是推翻一个总统的运动。

1933年，古巴在革命的边缘颤抖着。60%的居民生活水平低于最低限额，年实际收入不到300美元。另外30%的居民工资仅处于最低限额水平，年实际收入为300—600美元。1933年初，流亡在外的反对派领袖们在纽约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并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来推翻马查多。古巴驻华盛顿大使私下向美国国务院承认，被围困的马查多政府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困难，并向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呼吁立即援助。他冷静地预言道，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混乱，而且是一种很可能需要美国出兵进行干涉的混乱”。[①] 然而在1933年，美国不愿意考虑武装干涉的想法。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保证他的政府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以“睦邻”的思想为基础。他不愿意出兵古巴，因为这会使他在西半球的关系中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华盛顿宁愿通过谈判求得政治解决，要马查多在他1935年期满以前辞职，以便允许一个温和的政治团体联盟来组织一个临时政府。

美国关心古巴的事态发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美国担心它对古巴经济的控制正在松脱。在签订美古互惠条约30年来，一系列的事态使得美古贸易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变化。1927年的关税法有助于古巴实现一项进口替代计划，过去需要进口的一些产品，包括蛋品、黄油、猪油、鞋类、家具和针织品越来越可以自给自足了。美国向古巴出口的商品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在古巴市场上，其他外国商品与美国商品的竞争加剧了。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古巴购买力的降低，使得这个岛国成了一个价格低廉的市场。它过去从美国进口高质量的商品，现在却向欧洲和日本的便宜商品敞开大

---

① 威廉·菲利普斯：《同古巴大使谈话备忘录》，1933年5月5日，文件号550S、S、华盛顿/415，国务院总类档第59组，国家档案馆，首都华盛顿（此后摘引时，出处注RG59）。

们。

影响是很大的。从1923年到1933年，古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由1.9亿美元下降到2200万美元，古巴向美国的出口由3.62亿美元下降到5700万美元。古巴的进口品中，美国货所占比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74.3%下降到1922年的66.7%和1927年的61.8%。到1933年，又下降到53.5%。古巴由美国货的第6位买主下降到第16位。据美国农业部估计，仅仅是美国粮食在古巴所失去的市场就等于美国农业停产817267英亩。美国向古巴除粮食以外的原料和制成品出口从1924年的1.33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1800万美元。

因此，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有两重目的。第一是结束古巴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第二是恢复美国对古巴市场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美国国务院任命萨姆纳·韦尔斯为驻古巴大使。给韦尔斯的指示是，要他提供美国的"友好调停"，以便促使古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达成"明确的、详细的、具有约束力的谅解"。[①] 6月初，韦尔斯促使参加古巴政府的各党派与温和的反对派（包括ABC党、革命激进细胞组织和民族主义联盟）之间达成协议，同意参加讨论。

夏初，对于韦尔斯赴哈瓦那的真正使命，人们不得而知，也没有透露出来。韦尔斯有条不紊地、耐心地操纵着调停活动，以达到两个目的，即说服马查多辞职，从而使古巴的政治危机和平地结束。但这只是手段而已。美国的目的是要结束对古巴体制结构的革命威胁（古巴的上层分子就是利用这种结构来进行统治的，美国霸权也以此结构为依靠），并力图在古巴建立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将同意与美国重新谈判一个新的互惠条约，从而恢复北美洲在古巴对外贸易中的首要地位。韦尔斯从哈瓦那写道："此时

---

① 科德尔·赫尔致萨姆纳·韦尔斯，1933年5月1日，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对外关系》，1933年，五卷集（首都华盛顿，1941）5：285。

此刻与古巴谈判一个互惠的贸易协定，不但将使古巴重新具有活力，而且将使我国实际上控制一个10年来我们逐步失去的市场——不但是我们的制成品市场，而且是我们的农产品市场。"①

马查多已经没有用了，他第一次总统任期内所建立的秩序和稳定——华盛顿为此而支持他连任总统——现在已经垮台了。反对马查多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常规政治竞争的范围，而发展成了一个革命形势。经过将近5年的持续不断的国内斗争以后，事实明显地表明马查多已无力恢复秩序。马查多继续执政，已成为阻碍恢复秩序与稳定的最大障碍。7月底，韦尔斯通知毫不怀疑的马查多总统说，要满意地解决危机，他必须在任期届满以前一年下台。马查多的反应先是不肯相信，接着便是怒不可遏。马查多召开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来谴责韦尔斯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发誓要任职到期满。

在随后的日子里，韦尔斯进行活动来破坏马查多在国内所得到的支持，以迫使他早日退休。如果说马查多的下台完全是由于北美洲施加了压力，那么与马查多合作而身败名裂的各传统政党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景：要么彻底改组——这是最好的，要么被完全镇压——这是许多反对派派别所要求的。反政府的内部造反如果成功，将使老的政党结构同样遭到灭亡的威胁，因为这会使马查多的支持者们受到政权反对派的政治报复。但是，支持美国大使建议的那些政党得到保证说，马查多下台以后这些政党可以继续存在。于是8月初，自由党、保守党和人民党的领导人正式支持调停者的建议，在国会提出一项旨在加速马查多下台的法案。

接着，韦尔斯攻击古巴政府的外交支柱，威胁说美国要撤消对马查多的支持。韦尔斯坚持说马查多没有按照普拉特修正案维持一个能够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韦尔斯警告马查多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美国就需要进行干涉。韦尔斯向

① 萨姆纳·韦尔斯致科德尔·赫尔，1933年5月13日，833.00/3512，DS/RG59。

华盛顿建议说，如果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马查多仍然拒绝提早退休，美国就应当撤消对他的外交承认。韦尔斯向国务院保证说，这样就会使马查多不可能再执政多久，从而避免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必要。

仲夏，美国大使与古巴总统之间的斗争达到了新的紧迫程度。7 月 25 日，哈瓦那的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一项新的税收。一周之内，抗议的公共汽车司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出租汽车司机、有轨电车司机和卡车司机的同情罢工。首都交通运输业的罢工蔓延到其他行业。数天之内，人员和货物的运输全部陷于停顿。到 8 月第一周周末，总罢工已具有革命性进攻的规模。韦尔斯和马查多现在面临着一个比过去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威胁着要把马查多的政权和美国的霸权一扫而光。

马查多和韦尔斯认识到罢工的严重性，立即设法要使日益炽烈的革命形势降温。他们两人各自采取非常措施来迫使罢工结束。马查多与古巴共产党和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举行会谈，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并承认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它们支持结束罢工。共产党抓住了这个机会。根据协议的条款，政府在罢工结束后从狱中释放了劳工领袖和共产党人，并宣布古巴共产党享有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发出了复工的命令。实际上，马查多和古巴共产党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政府以为共产党控制了罢工；古巴共产党则把政府看得过于强大。实际上，罢工已发展到共产党无法控制的地步，政府已经无可救药。

对于韦尔斯来说，马查多的下台已经不能等到 1934 年 5 月——这是原来选定的马查多总统提前下台的日子。必须让他立即辞职。大使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场瘫痪性的罢工发出了不祥的征兆”，必须采取“剧烈的解决办法”来对付古巴问题，以“阻止

否则会不可避免的大动乱”。[1] 8 月 11 日，韦尔斯汇报他与古巴国防部长及前军队首领阿尔韦托·埃雷拉将军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韦尔斯提出让埃雷拉当总统。作为交换条件，他要埃雷拉支持迅速解决危机。这项安排实际上是直接请军队来实施政治解决。

军队本来就蠢蠢欲动。事实上，政治冲突的结局如何，与军队的关系极大。调停活动并没有增加最高统帅部内部的信心，而反对派日益强烈的反军情绪却在军官团内部普遍引起了不安。各反对派组织利用谈判作为一个讲坛来谴责军方。ABC 党鼓吹裁减军队和限制军队的权威。在哈瓦那广为流传的一个报告说，反对派打算把军队官兵人数从 1.2 万减少到 3000 人。商业界和自由职业者团体不满于支付巨额税款来支持军队，也主张裁减军队。因此，1933 年 8 月军队的干涉不是无条件的。韦尔斯事先得到了反对派领导人的保证，保证今后的政府尊重军队的完整。只是在这以后军队才采取行动。有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保证在 1935 年 5 月 20 日（这是马查多连任总统期满的日子）以前不对军队作任何变更。条款还规定不得以不符合现行法律的任何形式“撤换……上述军队成员。”[2]

8 月 12 日，军队要求马查多辞职，马查多同意辞职。但是，埃雷拉继任总统一事遭到反对，理由是这位国防部长与下台的总统关系太密切。韦尔斯并未罢休，他继续寻求以有秩序的、合乎宪法的办法来解决危机。除埃雷拉一人外，原马查多内阁成员全部辞职。埃雷拉当上了临时总统，但他只当到委派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担任国务卿为止。后者是一位政治上无足轻

---

① 萨姆纳·韦尔斯：《睦邻政策的两年》，美国国务院，拉丁美洲文件集，第 11 卷（华盛顿特区 1935 年第 8—9 页）。

② 《备忘录》1933 年 8 月 11 日。奥雷斯特斯·费拉拉给萨姆纳·韦尔斯的附件，1933 年 8 月 12 日。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档案 1933 年第 800 号。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外交档案第 84 组。

重的人物，或者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这是他给自己的尊称——是一个不得罪人的妥协性候选人，他不参加任何政党或政治流派。这时，埃雷拉就辞职，让塞斯佩德斯接替他担任总统。

塞斯佩德斯政府使得马查多时期所产生的矛盾更加突出了。韦尔斯的调停使得原来处于非法地位的各个反马查多的团体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保证把它们包括进新的政府。另一方面，原来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及时地抛弃了马查多这个独裁者，这就保证了它们在马查多以后的古巴还能有政治地位。政府的职位分配给了各种力量的代表，包括ABC党、自由党、民族主义联盟、保守党、革命激进细胞组织和人民党——它们过去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就能使马查多政府期间未获解决的争论体制化了。

可是，新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还不限于内部矛盾。马查多下台后，政府立即停止了镇压。政府的更换显然缓和了国内紧张局势，并使得日益增长的革命压力减少了。但古巴仍处于大萧条的剧痛之中。曾经使得马查多政府陷入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失调现象在8月12日以后依然存在，丝毫没有减少。劳工的战斗性遍及全岛，罢工持续不断。过去曾经抵制调停的那些组织——主要是马查多的反对派中那些主张不仅仅要更换总统的组织——认为，由塞斯佩德斯上台的解决方案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当中的许多团体——包括大学生指导委员会和左派学生运动这两个学生团体以及共产党——曾经为革命艰苦奋斗多年，它们不满于一场宫廷政变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结局。

塞斯佩德斯还面临其他问题。公共秩序被破坏了。在整个8月，马查多出逃所引起的动乱断断续续地出现，乌合的群众对被怀疑为马查多官员的人采取革命的正义措施。军队和警察当局过去是群众痛恨的对象，现在它们要是采取行动来控制民众过火行为的话，也只是暂时性的。许多军官担心，在塞斯佩德斯领导下严格地维持秩序，只会引起现在掌权的原反对派的反军情绪。军

队的士气一直很低。高级军官们深怕由于自己在马查多政府期间的所作所为而受到逮捕和报复，低级军官则在迫切地等待马查多时期的司令官被清洗以后自己肯定可以得到提升。军士们和士兵们听到谣传说将会降低军饷和裁减军队而越来越不安定。

塞斯佩德斯政府是由于一个极为罕见的和想不到的原因而下台的。9月3日晚，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中的中士们、下士们和士兵们开会讨论他们的不满。讨论结果，起草了一系列准备向司令官提出的要求。但是，值班的军官们拒绝讨论骚动的士兵们所提出的要求，就离开了岗位。突然间，军队出人意料地控制了哥伦比亚兵营，发生了兵变。在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中士领导下的军士抗议者们告诫军队要守住岗位，直到军队司令部同意考虑他们的要求时为止。

士兵们的抗议立即得到各反政府团体的支持。9月4日清晨，大学生指导委员会的学生领袖们来到哥伦比亚兵营，说服中士们把运动扩大。民众的干涉改变了军士抗议行动的性质，把兵变变成了政变。这次兵变后来被人称作“中士的叛乱”，它原来的目标并不是雄心勃勃的。中士们原来只是想对服役条件表示抗议，特别是反对军饷太低、居住条件差和传说要裁员。他们并不打算赶走军官团或推翻塞斯佩德斯。现在他们出人意料地发现是在搞兵变，正在有效地对政府发动叛乱，他们并不热衷于在现政权的统治下回到兵营。学生们提出了另一方案。这是一个权宜的联盟，它并非没有缺陷，但它可使叛乱部队免负责任，并可使不同政见的民众获得政权。经过民众与军队之间这种初步一致意见的达成，产生了一个革命执政委员会，由拉蒙·格劳·圣马丁、波菲里奥·弗兰卡、吉列尔莫·波特拉、何塞·伊里萨里和塞尔希奥·卡尔沃组成。

革命执政委员会从哥伦比亚兵营搬到总统府，使得古巴的权威中心转移了。权力落入了一些长期以来处于共和国政治边缘的

力量手中——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手中。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使命的代表和民众意志的工具。9月5日清晨，发表了一项政治宣言，宣布建立一个新的临时革命政府，确认国家主权，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并“向着创建一个新古巴前进”。

旧古巴的势力对于9月的夺权怒不可遏。原来参加政府的各党派曾经抛弃马查多以求在身败名裂的政权垮台后还能存在下去，他们现在又面临迫害和灭亡。被赶下了台的原马查多政府的军官们也一样，他们曾想方设法使自己在马查多下台后免遭报复，现在又面临可能要被起诉和监禁的局面。企业界和商业界的代表们对于政府的更迭感到恐惧而畏缩不前，他们公开预言古巴的经济会崩溃。反对革命执政委员会的还不仅仅是旧古巴。新的政治团体（包括ABC党和革命激进细胞组织）为了在马查多下台后的古巴获得政治权力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现在它们在国家政治中初次登台以后又面临着突然的、不光彩的结局。一个由激进学生组成、由兵变士兵缔造的政府，立即使得原来执政时处于对立地位的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反对派。

临时政府所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是美国大使萨姆纳·韦尔斯。政变破坏了宪法的合法性，推翻了保守派的权威，而这二者是韦尔斯所热心捍卫的。韦尔斯的反应十分迅速和毫不含糊。他立即建议美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促使塞斯佩德斯重新执政，但他没有成功。韦尔斯有意把古巴的新政府描写得使华盛顿产生怀疑和反对。韦尔斯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古巴的军队已落入“极端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古巴政府是“直言不讳的共产主义的”。伊里萨里被描写成一个“极端派激进分子”，格劳和波特拉也被描写成“极端激进分子”。①

临时政府早期就遭到反对，这种情况立即带来了若干变化。9

---

① 萨姆纳·韦尔斯给国务卿的报告，1933年9月5日，837.00/3757，RG59，以及《国务卿赫尔与韦尔斯之间的电话备忘录》，1933年9月5日，837.00/3800，RG59。

月中旬，执政委员会解散，建立了拉蒙·格劳·圣马丁领导下的比较传统的政府行政机构。政府担心政治阴谋与军队里的混乱结合起来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于是提升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为上校，并任命他为军队首领。巴蒂斯塔得到指示，要他委任足够的新军官以维持军队的稳定。10月初，政府宣布前军官为叛逃者，下令逮捕他们，从而为在巴蒂斯塔领导下完全改组军队开辟了道路。这样作肯定加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但是，清洗旧的军官团也是军队的一个政治胜利，也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个人的一个胜利。这加深了临时政府内部的矛盾。学生与士兵们继续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违抗宪法的权威。临时政府的命运如何，与他们休戚相关。如果临时政府失败，他们将遭到共同的命运。但是，9月4日以后，学生与士兵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学生们把古巴带入了试验性政府的范围，因为这个政府至少是第一个不是在华盛顿支持下组成的共和国政府。改革令入向往。100天来，学生们一直在满怀豪情地献身于改造国家的事业。新政府下令要实现“为古巴人的古巴”，以飞快的速度制订了一些改革的法律，致力于经济重建、社会变革和政治改组。新政府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解散了参加马查多政府的所有政党。公用事业的价格降低了40%，利率也降低了。妇女得到了选举权，大学自治了。在劳工事务中，政府的改革包括：确定甘蔗工人的最低工资，实行强制性劳资仲裁、8小时工作制和对工人的补偿，设立劳工部，制订劳动力国有化法，规定工业、商业和农业中50%的雇员必须是古巴国民。在农业方面，由政府主持创建了垦殖农协会，保证农民对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享有永耕权，并开始实施一项土地改革计划。

随着学生们继续向着“创建一个新古巴前进”，军队这个伙伴越来越不愿意了。军队对于临时政府的支持，与其说是支援，无宁说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是这个政府批准了中士的暴乱、委任了数百名新军官，给了新的军队指挥部以合法地位。但是，新的军队指挥官急于立即实现政治解决，起码是为了使他们最近所获得

的这些东西明文规定下来。军队指挥部认为社会试验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徒然会使动荡不定的局面持续下去。许多9月派的军队指挥官们认为学生们的方案是让政府进行危险的冒险和拙劣的计划，而指挥官们要依靠这个政府的能力来使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委任合法化。

韦尔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情绪。仲秋，韦尔斯不再致力于促使各反政府派别团结起来，他转而在政府支持者内部助长分歧。韦尔斯是一位机敏的古巴政治的观察家。他十分了解临时政府内部正在日益深化的各种矛盾。韦尔斯提醒华盛顿说，当初中士们搞叛乱，"不是为了让格劳·圣马丁上台"。韦尔斯还补充说："军队与政府内部文职官员之间的分歧迅速地变得明显"，随着巴蒂斯塔影响的增加，"学生和格劳·圣马丁的权力正日益缩小"。[1]韦尔斯推理认为，另一种政治联盟本身应能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府，而且愿意认可9月派的军队指挥部。它可以说服巴蒂斯塔放弃那个曾经给予军队中的兵变以合法军事地位的政府。

几个月内，韦尔斯第二次直接呼吁军队推翻一个已经不受美国喜欢的政府。10月4日，在前军官们被捕许多天以后，这位美国大使宣称曾与巴蒂斯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十分坦率的讨论"。韦尔斯现在把巴蒂斯塔说成是"今天在古巴唯一代表权威的人"。韦尔斯告诉这位古巴军队首领说他"已得到古巴商业界和金融界绝大部分人的支持。这些人寻求保护，并认为他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保护的人"。韦尔斯还解释说，几个星期以前还公开反对他的那些政治派别，现在"一致认为应当让他继续作为参谋长控制军队，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并愿意支持他充当这一角色"。但是，大使暗示说，妨碍公正安排、承认和恢复正常状况的唯一障碍"是一小撮应在大学上课而不应玩弄政治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为自私目的而与他们联合的人们的不爱国的和徒劳无益的

---

① 见萨姆纳·韦尔斯给国务卿的信，1933年10月5日，837.00/4131，RG59。

固执”。韦尔斯不加掩饰地以警告的方式提醒巴蒂斯塔说，由于他参加政府，他已经使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这个政府一败涂地，这种灾难必然会大大影响他和共和国的安全，而他曾公开宣誓要保卫这个共和国。”①

巴蒂斯塔对于韦尔斯的这番评论不能作任何其他解释，而只能认为韦尔斯在鼓励他去缔造一个新政府。历次会议明显地说明巴蒂斯塔的立场捉摸不定。美国的不承认继续助长着反对派和抵抗力量。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可能会发生叛乱来推翻临时政府，取消9月派军队指挥部的合法地位，并逮捕前中士。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也没有完全消失，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帮助塞斯佩德斯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巴蒂斯塔继续支持一个在外交上遭到国外反对、在国内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的政府，使他在军队中的权威受到威胁。军队受他指挥，只不过依靠他批准一个前途莫测的临时政府。巴蒂斯塔只不过是400名新近提拔的未经委任的军官之一。这400人的军阶和任命有赖于在哈瓦那取得一项新的军队统治集团所能够容忍的——至少不是反对的——政治解决方案。只要9月派的军官们继续与这个没有合法地位的、而且无权永远批准9月4日提升的政府站在一起，他们就要冒与这个在国内外都遭到反对的政权共命运的风险。巴蒂斯塔本人在军队里的地位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通过一项使得各个有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团体以及华盛顿都满意的政治解决办法来使得各项新的任命合法化。

不久，事情就到了尽头。韦尔斯于12月颇为满意地报告说，巴蒂斯塔担心军队内部会出现阴谋，反政府的阴谋会继续下去，而且担心美国干涉，因此正在积极寻求改变政府。1934年1月，巴蒂斯塔收回军队对于格劳的支持，并转而支持心怀不满的老牌自由党政客卡洛斯·门迭塔。5天之内，美国承认了门迭塔。新政府在外交上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在国内得到现存政治势力的支持，

---

① 见萨姆纳·韦尔斯给国务卿的信，1933年10月5日，837.00/4131，RG59。

下是立即批准军队中新的委任状。第 408 号法令正式解散了旧的国民军，并宣布由新建的护宪军队取而代之。新的军队由法令宣布时的所有现役军官、军士和士兵组成。

马查多执政期间出现的主张变革的力量，并没有因为格劳政府的下台而消逝。与此相反，他们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新的军队首领巴蒂斯塔和老牌自由党领导人门迭塔的确使得古老的政权获得了新生，但也并非没有引起新的挑战。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1934 年建成了古巴革命党 PRC/真正党，使得短命的临时政府的改良计划从制度上获得了活力，在前格劳政府部长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的领导下，激进分子们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名叫古巴青年会。古巴青年会有意避开选举政治，以武装斗争作为反对巴蒂斯塔—门迭塔政府的主要手段。暗杀、爆炸和破坏又成了政治上进行反对的主要形式。随着 1934 年哈瓦那大学的重新开放，学生反对派的活动又恢复了。反政府的示威和劳工的抗议活动又变得司空见惯了。从 1934 年到 1935 年，全岛发生了 100 多次罢工。

1935 年 3 月，一次反政府的总罢工使全岛陷入危机，这时要求革命变革的势头达到了巨大的规模。与 1933 年 8 月不同，现在政府不愿意与劳工谈判，而且毫不犹豫地迫害罢工参加者。宣布戒严、公开实行恐怖统治一直持续到春末。罢工领导人被捕，其中许多人被拷打和暗杀，另一些人逃亡到国外。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大学被占领。在随后的几周里，军队的行刑队处决了赤手空拳的持不同政见者。1935 年 5 月，军队杀害了安东尼奥·吉特拉斯。

1935 年的总罢工，是这个共和国一代人的最后一次革命高涨。几天以后它就崩溃了。但它的影响在这整整 10 年中一直存在。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军队镇压的残酷程度在统治集团联盟内部引起了不满并导致了这个联盟的解体。到 3 月底，门迭塔发现支

持他的人只剩下民族主义联盟以及军队当中他自己的那一派了。几个月内，他也辞职了。这次罢工的的确确产生了它预期的影响，但未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门迭塔政府确实垮台了，但它垮台后出现的政治真空被巴蒂斯塔和军队填补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都落入军队手中。军队的监察员代替了省一级和市一级的官员，军队的指挥部清洗了参加罢工的文职人员并控制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军队成了最重要的庇护力量和公共雇主。巴蒂斯塔现在成了全岛最有势力的政治力量。

巴蒂斯塔恢复了秩序和稳定。他的威信在整个30年代不断上升。华盛顿发现出现了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和平盛世，完全有理由继续在外交上支持这个独裁者的历届傀儡总统和影子政府：何塞·A·巴尼特（1935—1936年）、米格尔·马里亚诺·戈麦斯（1936年）和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1936—1940年）。30年代反对巴蒂斯塔的人没有恢复元气。经过10年来的风风雨雨，巴蒂斯塔—门迭塔政权时期许多最知名的反对派人士都在1935年丧生了。活着的有的为了个人安全而流亡国外，有的到别的国家去举起革命的旗帜，其中最突出的是去西班牙。各革命团体遭到破坏和扼杀。1937年大学重新开放，在平淡中复了课。古巴革命党（真正党）转而采取选举政治，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党的基础和争取基层支持这项艰苦的任务。而且到30年代末，共产党已经与巴蒂斯塔言和。1938年以后，共产党采取了改良主义的公开合作态度，巩固了它对工会的控制并取得了合法地位。作为交换条件，共产党对以巴蒂斯塔为后台的政府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党报公开出版和发行了。30年代末，党出现在选举活动中。共产党对工会运动的控制扩大了，终于在1939年建立了古巴工人联合会（CTC）。

社会安定的恢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军队指挥部实施了一项计划。巴蒂斯塔的确把古巴军队变成了一个有效的镇压工具。但与此同时，军队领导人贪污腐化的规模为古巴历史上所少见，虽然巴蒂斯塔本人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和个人财富。他

命令军队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从1937年起开始实行军民学校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由中士担任所有农村中小学的校长。这些旨在向乡村居民传播有关农业、卫生、营养等知识的教育工作团，开始在内地建立起一个初级教育网。军队管理着成千所学校，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成人上课。到30年代末，军队指挥部已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军事部门，专门从事社会活动。制订了一个三年计划来改良农业、教育、公共卫生和住房。这项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巴蒂斯塔30年代末期直接进入国家政治打下一个纲领性的基础。

30年代，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古巴的蔗糖在美国市场上逐步占有了较大的比重，虽然它始终未能恢复到20世纪头10年的末期以及20年代初期那样突出的地位。根据1934年琼斯—科斯蒂根法案的条款，美国降低了对于进口糖的保护主义关税，以进口配额代替关税保护作为援助本国糖业生产者的手段。这些法律授权美国农业部长来确定美国每年糖的需求，并根据1931—1933年美国国内和国外糖生产者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比重来确定他们的定额。选择1931—1933年作为依据，对于古巴生产者很不利，因为正是在这几年——霍利·斯穆特年代——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比重最小。不过，从1933年到1937年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上所占比重还是略有增加，由25.4%增加到31.4%。而且，这几年古巴蔗糖的总产量增加了，增产部分的糖价上升了。从1933年到1938年，古巴蔗糖总产量从190万吨上升到290万吨。蔗糖总价值从5370万比索上升到1.202亿比索。

但这次经济的缓慢恢复，同古巴蔗糖在美国市场上的比重略微增长一样，都是付出了代价的。根据门选塔政府与美国于1934年新签订的互惠条约，古巴农产品出口到美国有了一个有保证的市场，但交换条件是，美国的许多种商品向古巴出口的关税降低了，美国产品在古巴国内市场上的税率也降低了；美国所作出的让步涉及35种商品，古巴所作的让步涉及400种商品；美国对古

巴商品的减税率为20—50%，古巴对美国商品的减税率为20—60%。新的协议还规定，已经详细制订的税率表不得由于币值变化而更改。

因1934年协议受益最大的商品是蔗糖，而蔗糖是古巴的主要出口物。因此新的条约肯定有助于古巴经济的恢复。美国对于古巴原糖所征收的关税由每磅1.5美元减少到90美分。古巴向美国出口的烟叶、雪茄烟和卷烟以及蜂蜜、鱼类、农业制成品、柑桔类水果、菠萝和其他农产品的关税也减少了。但是，1934年的这个条约对古巴为实现经济多样化而作的努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数十个农业和制造业企业（其中许多企业是实行1927年关税法以后兴起的）受到了不利影响。从广义上来看，这项新的条约使美国的贸易得以适应古巴市场的变化，最终使美国能在古巴经济中重新占据首要地位。古巴又一次与美国密切联系起来了，因此这个岛国又回到了大萧条前的依附地位。1933—1940年，北美向古巴进口商品的总值从2260万美元上升到8100万美元。同期，古巴进口商品中美国货所占比重由53.5%上升到76.6%。

伴随着古美互惠条约的重新谈判，永久条约也重新谈判了。后者是普拉特修正案的合法形式。条约中除规定美国使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外，其他长期侮辱古巴民族情绪的敏感性条款取消了。从此，形式上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成了两个"独立的、然而是友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这10年的最后时期，由于经济危机已过去，并恢复了政治稳定，特别是由于真正党和共产党接受了选举政治，造成了一种有利于立宪改革的气候。巴蒂斯塔的政治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他只有表示支持改革要求才能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倒霉的格劳政府所制订的许多措施这时仍继续得到许多国民的支持。1901年的旧宪法作为一个耻辱而长期保留在古巴，因为这部宪法把可恨的普拉特修正案作为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一部新宪法要允许与过

去决裂并把马查多下台后古巴所取得的成就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于是，1939 年召开了一次有各种不同政治组织参加的立宪议会来起草一部新宪法，参加者包括老的马查多派到古巴革命党和共产党人。这次会议为对共和国政治中一切关键问题重新进行辩论提供了一个讲坛。政治上结盟的情况并不决定辩论中的方向。亲政府的联盟包括臭名远扬的自由党人和垂死的民族主义联盟，也包括共产党。反对派由真正党人领导，它包括 ABC 党和前总统米格尔·马里亚诺·戈麦斯的支持者。因此，意识形态超越了党派界线。左翼一自由派代表（不管是参加政府的还是参加反对派集团的）常常联合起来形成选举中的多数派来反对保守派。其结果是于 1940 年制订了一部令人吃惊的进步的宪法，规定进行公民表决、普选和自由选举，并批准了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民权。这部宪法有关社会问题的规定包括了最长工作时限、最低工资、养老金、工人补偿金、罢工权和国家防止失业的保证。

然而，1940 年的宪法尽管有开明的条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有关宗旨的宣言，是未来工作的议程。新宪法没有关于实施的规定，它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不过，这部宪法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重要性的位置，因为它交替地起着两个作用，即作为动员政治支持的旗帜和作为衡量政治表现的标准。30 年代的许多奋斗目标都在新宪法中得到了维护。新宪法也为此后 12 年中提供了合法性和政治共识的基础。从此以后，古巴的政治就是各政党争相许诺要最忠实地解释和最有力地执行宪法的主要条款。

新宪法的制订也为 1940 年庆祝总统选举布置了舞台。巴蒂斯塔脱掉了军装，格劳·圣马丁从流亡地回来向他的老对手提出挑战。竞选活动进行得很激烈，这次选举活动属于共和国将近 40 年的历史上最廉洁的一次。巴蒂斯塔以 80 万张选票战胜了格劳的 57.5 万张选票。

巴蒂斯塔 1940—1944 年任总统期间在好几个方面有值得赞扬的作用。最直接的是，他结束了反常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有

效的政权从符合宪法的文职官员手中转到了军队参谋长手中）。1940 年的选举使得符合宪法的总统职位同巴蒂斯塔个人的权力和威信重新结合起来了。这时，人们对于总统巴蒂斯塔的要求，已不同于过去对于军队首领巴蒂斯塔的要求。他已经具有更大的符合宪法的身分，他对于把他抬上总统宝座的政治联盟是欠了情的。巴蒂斯塔当了总统以后，要加以报答，在总统的宫殿里给他们恩惠和官职。海关长期以来是军队贪污的一个来源。1941 年初海关转归财政部管辖。原来由军队主管的教育项目现在转给教育部负责。灯塔、海上警察、商船和邮政转回政府有关部门管理。

这些事态发展对于老的 9 月派军队司令部是一个猛烈的打击，它长期以来习惯于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威。许多军官曾经对巴蒂斯塔担任总统抱很大希望，认为这是 10 年来军队居优势的必然结局。因此，把军队的特权转交给文官机构很快就引起了 9 月派高级军官的愤怒。军队对巴蒂斯塔的信任减少了。哥伦比亚兵营与总统府之间的磨擦增加了。到 1941 年初，爆发了高级军官的叛乱，但很快就失败。军队阴谋的失败，使总统的权威更加提高。数十名 9 月派军官被命令退休，其他一些军官被调往国外就任新职。一年以后，军队裁减了，军队的预算也减少了。巴蒂斯塔任期届满时，他已经恢复了宪法的权力平衡，并重新建立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

巴蒂斯塔很幸运地担任了一位战时总统。古巴 1941 年 12 月参战，有利于古巴同美国签订几项贸易协议和从美国得到几项贷款和信贷。遭受战乱的亚洲和欧洲的糖产量下降，刺激了古巴的蔗糖生产。从 1940 年到 1944 年，古巴的甘蔗产量从 270 万吨增加到 420 万吨，是 1930 以来最好的收成。同期，古巴原糖的产值由 1.1 亿比索增加到 2.51 亿比索。古巴也是与美国好几项重要贸易交易的受益者。1941 年，古巴与美国签订了一项租借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向古巴运送武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使用古巴的军事设施。同年，美国同意以每磅 2.65 美分的价格收购古巴

1942 年全年的甘蔗产量。又签订了一项同样的协议来收购 1943 年的甘蔗产量。随着蔗糖生产的恢复，经济摆脱了不景气的状况，公共工程扩大了，繁荣恢复了。

战争并非纯属好事。物价上涨，各种物品的短缺已司空见惯。船运的短缺以及运货横渡大西洋所冒的风险，严重地限制了古巴与欧洲的贸易。古巴雪茄烟制造商失去了欧洲的奢华市场。古巴向美国出口的烟叶不管增加多少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旅游业大大缩减，旅游者人数从 1940 年到 1943 年由 12.7 万下降到 12 万。因此，当 1944 年准备举行总统选举时，不满情绪已足以引起活跃的政治辩论。政府所提候选人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在巴蒂斯塔的积极支持下参加竞选。拉蒙·格劳·圣马丁作为萨拉德里加斯的对手积极进行竞选活动。萨拉德里加斯吹捧巴蒂斯塔政府，格劳则热切地回顾他在 1933 年执政的 100 天。格劳的神密性和真正党人的号召力主要来自 1933 年那些令人陶醉和兴奋的日子。1944 年，格劳又提出了更多类似的诺言，选民对他抱有希望。在 6 月的投票中，格劳得到了 100 多万张选票，在 6 个省的 5 个省中均获得大胜，只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失败。格劳·圣马丁和真正党人进行了 10 多年夺取政权的斗争，节节失败，现在终于赢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

真正党赢得胜利引起了民众对改革纲领抱有很大期望，这一改革纲领既是古巴革命党的遗产，又是它的诺言。但是，格劳政府（1944—1948 年）和继任的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政府（1948—1954 年）都未能实现古巴人的期望。真正党人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遭受迫害、监禁和被迫流亡。在共和国出生的第一代人从 20 年代反马查多的最早政治骚乱起，经过了 30 年代的革命动乱以及 40 年代初令人失望的选举失败，现在被迫进入了政治洪流。这一代人在古巴政治中的初次登台表演既不光彩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到 40 年代中期，理想主义已让位于犬儒主义，担任公职不再提供集体改进的机会而是提供个人发财的机会。政府落入一

群贪婪地追逐官职者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贪欲是难以满足的。真正党人第一次取得了对于肥缺和特权的分配权。国家一级、省一级和市一级政府的每个部门里，充满了利用公职侵吞公款、贪污、腐化和干坏事的事例。政治竞争成了一场争夺发财机会的激烈斗争。政治落入了政党暴徒的手中，在古巴政治行话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流氓主义"。暴力和恐怖成了政党政治的延伸和真正党统治的标志。

从 1943 年到 1949 年，领政府薪金的人增加了一倍多，从 6 万人增加到 13.1 万人。到 1950 年，在国家、省和市各级政府中担任现职的大约有 18.6 万人，占劳动力的 11%。另外还有 3 万名退休雇员由政府供养。1950 年，80%的国家预算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金，养老金另占国家支出的 8%。真正党人对于他们竞选胜利的反应是惴惴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任期和统治短暂。因此，古巴革命党的腐化与它的前任有所不同，它注重捞取眼前利益，贪污惊人。格劳被指控贪污 1.74 亿美元。1948 年下台的教育部长据说贪污 2000 万美元，普里奥政府中的财政部长被指控挪用成百万准备销毁的旧纸币。

在真正党人执政的年代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如此充斥于共和国的体制机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古巴经济战后出现了繁荣。当时亚洲的甘蔗生产者和欧洲的甜菜生产者都处于破产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糖产量下降了将近 60%，甘蔗和甜菜的总产量从 1940 年的 2860 万吨下降到 1810 万吨。直到 1950 年，世界糖产量才超过战前水平。随着世界糖产量的下降和糖价的上涨，古巴的食糖生产者显然有机可乘。这次繁荣没有完全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元狂舞"那样的规模，但它确实造成了自那时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从 1943 年到 1948 年，古巴的糖产量增加了将近 50%，从 280 万吨增加到 580 万吨。到 1948 年，糖在这个岛国的出口总值中占 90%。

美好时光戏剧性地降临到了古巴。从 1939 年到 1947 年，糖

的出口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了近40%。糖出口量的空前高水平和战争所造成的进口货的短缺导致了国际支付巨大顺差，从1943年到1947年年平均顺差达1.2亿美元。在这10年中，国内的工业和商业活动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从1937--1938财政年度的7570万美元上升到1949－1950财政年度的2.443亿美元。1939年到1948年，食品价格上涨了几乎三倍，生活费用上涨了两倍多。如果不是由于战争期间进口货少，而且许多个人和团体愿意将大部分存款闲置，通货膨胀将会更加严重。1939年到1950年，货币供应量增加500%，同期生活费用仅增加145%。大约在同期，国库所拥有的美元、黄金和白银从2500万美元上升到4.02亿美元，在国外的净结余从600万美元上升到2亿美元，公众所拥有的美元从1400万上升到2.05亿万美元。

战后的经济机遇被浪费了，这不仅由于贪污腐化，而且由于管理不善和估计错误。很少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革，长期存在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农村秩序不好。这一切都毫无变化。40年代末经济开始下降，只是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糖价上升所提供的暂时缓和才推迟了不可避免的危机。通货膨胀的问题激化了。由于战后繁荣所产生的资本或者投资到国外去了，或者在国内经营不善。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报告，在那些年，“古巴人的存款中很大部分到了国外，或用于囤积居奇、建造房地产和投机。”[1] 1946年到1952年，古巴固定投资总额仅占总收入的9.3%（阿根廷为18.7%，巴西为15.7%，墨西哥为13.4%）。

当然，这些事态发展并不全是新鲜事。长期以来，这与古巴蔗糖经济的盛衰心理有联系。但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这种状况有着深远的影响。糖业继续在古巴经济中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使潜在的投资者们认为应当将资产中的很大部分保持为现金。这助长了人们快速获取利润的欲望，使人们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

①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关于古巴的报告》（巴尔的摩，1951年）第7页。

和搞经济多样化。古巴继续依赖一种竞争特别剧烈的出口产品的生产。由于战争而引起的竞争者们的产量下降，给古巴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实际上，古巴的经济并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增长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大约每年2.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些问题是历史的、结构性的问题，不能以简易办法解决，即使对于最开明的政府也是一个挑战。更何况真正党人远非开明。这是以巨大希望开始，却以失望和幻想破灭而告终的年代。

与此同时，古巴共产党——现在改名为人民社会党(PSP)——的处境总的来说也是艰难的。由于与巴蒂斯塔合作，这个党进入了内阁。1944年大选中，人民社会党在参议院获得3个席位，在下议院获得10个席位。1948年大选时，这个党号称有16万支持者。但在真正党执政期间，人民社会党的运气明显地变坏了。冷战破坏了人民社会党的影响，真正党人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各工会进攻，到40年代末，古巴革命党控制了各关键性的劳工组织。政府没收了人民社会党的广播电台，并不断骚扰其党报。但是，虽然人民社会党的影响下降了，但这个党仍然是一支有效的政治力量。

古巴革命党领导人对1933年的历史的抉择和1944年的选举胜利显然毫不关心，这在党内引起了不同政见和紧张形势。1947年，古巴革命党因治政不善造成了公开分裂。著名学生领袖爱德华多·奇瓦斯于1933年与真正党人决裂，另行建立了古巴人民党(正统派)。正统派要求维护30年代的理想，总的来说，它联系人民所向往的经济独立、政治自由、社会正义和政府廉洁的主张。奇瓦斯也许是那个时代最有天才的演说家。他在一次游说中惊人地指责和揭露了政府高层人士的腐败现象，表达了公众对于在职的真正党人的意见和群众对他们的不满。奇瓦斯对于最终把真正党政府搞臭、使公众丢掉对于真正党政府还保留的一点信任起了很大作用。然而，奇瓦斯于1951年自杀，使得群众幻想破灭、听天

由命并对事态漠不关心，不过普里奥政府在同这位去世的正统派领导人进行 3 年斗争以后大大地削弱了。彻底身败名裂、政治软弱、道德沦丧的真正党人在主持着一个臭名远扬的政府和一个灰心丧气的政权。

事后，巴蒂斯塔得意洋洋地详细叙述了他 1952 年重新执政的情景。他吹嘘说，在 1 小时零 17 分钟的时间内，军事阴谋家们就推翻了真正党人的政府。的确，3 月 10 日的军事暴动要归功于计划者们非凡的组织才能。凌晨 2 点 40 分，造反者们夺取了首都各主要的军队岗哨，部队通过这些岗哨进入首都去驻守各战略阵地。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码头、发电厂、电台、银行和政府各部办公室落入军队控制之中。这天早上晚些时候，当市民醒来时，他们听到了关于政变的谣传，打开收音机只听到无间断的音乐。通往内地的电讯联系中断。有人准备举行抗议示威来反对政变，却被军队控制住了。大学和反对派的报社被查封。一些工会和共产党的地方总部被占领，主要的积极分子被捕。宪法中的保证条款停止执行。

可是，巴蒂斯塔和军队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实现阴谋和巩固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由于他们有施展阴谋的天才。各级文官政府将近 10 年来的贪污、腐化和丑闻为 1952 年军队重新执政绝妙地铺平了道路。军事暴动只不过是对一个垂死的政权实行一举消灭。人们对这次政变普遍漠不关心，说明全国人民对政治已深深地抱讥讽态度。身败名裂的真正党政府既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又缺乏道义上的威望，无法号召群众支持它。它的被推翻根本没有引起群众的愤怒。与此相反，许多人认为这次政变是早就该发生的变化。巴蒂斯塔向企业界和商业界保证会出现有秩序、稳定和劳工安宁的局面。他向美国许诺将尊重外国资本。他向各政党许诺将于 1954 年举行一次新的选举。

真正党和正统派都无法对巴蒂斯塔的夺权作出有效的反应。

正统派没有领导人，真正党无法进行领导。1925年以后，古巴两个主要政党对于解决政治危机已经无所作为。正如30年代的危机导致各传统政党的下台一样，50年代的事态加速了真正党和正统派的灭亡。的确，这两个政党都及时地谴责了违反1940年宪法的行为，但这两个党对于军队的夺权都没有提出一个全面的纲领或必要的行动计划。为数甚少的反对派大部分来自各现存政党的范围之外，主要来自被解职的军官、分裂出去的政治小团体和主要政党内部的个人至上派。新一代古巴人又一次响应了号召，填补了政治真空。

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早期挑战失败了，无声无息地失败了。发生了一次流产阴谋，例行公事地逮捕了咖啡馆里的阴谋者，悄悄地命令持不同政见的军官退休。这一切都不足以唤起国民的良心和鼓起国民的抵抗。1953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攻打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的行动也失败了。但这次失败的角度不同于其不幸的前人：这次计划是大胆的，它的失败是惊人的。它像炮弹一样把卡斯特罗发射出来，使他参加了反巴蒂斯塔势力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把武装斗争上升为50年代中期反对派的主要手段。

人们迫切盼望的1954年大选，使所有的人感到恼怒，除了那些诡秘的巴蒂斯塔分子。各主要政党最后都拒绝参加这次大选，主要的反对派候选人退出竞选。于是巴蒂斯塔在选举中没有遇到反对派，只有40%的选民投票，巴蒂斯塔得到了其中的多数票，再一次当选总统。1954年以后，那些曾经指望通过选举来解决国内紧张局势问题的温和派政治力量，感到自己孤立，别无他策。1955年，温和反对派的代表与巴蒂斯塔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这是企图通过谈判来政治解决1955年发生的日益加深的危机的最后一次努力。后来被人称作“公民对话”的这些讨论设法要求总统答应举行保证有各方面参加的新的选举。他拒绝了。现在，武装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不久即有了初步反响。1955 年末，学生举行示威，结果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随后遭到镇压。镇压使学生领袖们深信，必须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运动即革命指导委员会。一年以后，一群起义的真正党人拿起武器攻打了马坦萨斯省的戈伊库里亚兵营。1957 年，革命指导委员会刺杀巴蒂斯塔未遂以后也转入农村举行起义，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组织了一个游击队阵线，叫作埃斯坎布雷全国第二阵线。但是，决定巴蒂斯塔政权命运的，是奥连特省马埃斯特腊山上的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 3 年之后，在圣地亚哥组织了另一次起义，当时他正从墨西哥乘小游艇“格拉玛号”回国。但是，“格拉玛号”上的人员还没有踏上古巴国土，1956 年 11 月 30 日的起义就被粉碎了。政府对于远征军的来临提高了警惕，派出人数远远超过登陆部队的军队到奥连特省南部的阿莱格里亚德皮奥去，把大约 80 人的登陆部队消灭得只剩下 18 人。“格拉玛号”上的幸存者在一次戏剧性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失败了，失去了武器、弹药和给养，只得到东南山脉中避难。

此后所进行的游击战的方式，是符合马埃斯特腊山的地缘政治特点的。卡斯特罗及其部队在古巴岛国的周边地区开始行动，他们决心要推翻的那个政府在本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仅限于一些孤立的乡村警卫队。起义者对这些乡村卫队发动战斗，既打击了巴蒂斯塔地方政权的基础，又打击了哈瓦那在马埃斯特腊山地区的象征性的存在。数十年来，乡村警卫队的指挥官们专横地对乡村居民实行恐怖统治。因此，不管起义者对乡村警察取得的胜利多么微小，这些胜利都是对哈瓦那在奥连特省的政治和军事权威的严重挑战。

“格拉玛号”幸存者所招募的最早的战士来自山区的居民。起义者的力量因此而略有加强以后，便发动了早期的进攻。到 1957 年 1 月，起义军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乡村警卫队在拉普拉塔的哨所。在 1957 年 5 月的第二次行动中，游击队拔掉了乡村警卫

队在埃尔乌维罗的据点。起义者胜利的消息使古巴人活生生地看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地区开展的斗争，并吸引了更多的新战士加入游击队阵营。起义者的行动迫使政府军去追击乡村起义者，从而放松了对城市的守卫。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采取专横的野战行动，因则进一步脱离了乡村居民，并使人们更加支持游击队。

起义者的胜利迫使政府在奥连特省到处让出飞地给解放区。1957 年全年和 1958 年初，起义军壮大了，起义军的野战行动也扩展了。到 1958 年年中，劳尔·卡斯特罗指挥下的一支 50 人的队伍在古巴东北部开辟了第二战线，统一了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好几支起义队伍。随后，由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的一支大约 35 人的队伍在古巴圣地亚哥周围地区开辟了另一条战线，也成功地统一和扩大了起义队伍。1958 年 4 月，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带领一支 8 人或 10 人的巡逻队离开山区据点。在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率领下的另一支队伍在图基诺峰以东的地区活动。

伴随着乡村日益扩大的斗争，城市的抵抗活动也日益发展。城市的地下组织，其中特别著名的有公民抵抗运动，在古巴各主要城市配合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随着绑架和暗杀事件的增加，政府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手段，这使得它自身更加孤立。

反政府活动不仅限于民众政治组织。到 50 年代中期，不同政见在军队内部也很普遍。巴蒂斯塔重新当权象征着军队指挥部的全面改造，在真正党执政期间退休了的许多老牌 9 月派军官又重返指挥岗位。50 年代初期，提升干部和任命指挥官都靠政治关系和裙带关系。巴蒂斯塔把职业军官团几乎解体了。9 月派军官返回军队，在年轻指挥官中引起了广泛的灰心，后者因自己在军事院校受过训而自豪，对于任命一些专业水平简直是可笑的人并安排一些老中士担任指挥官感到不快。

1956 年 4 月，一系列军队阴谋中的第一次阴谋震动了政府。由拉蒙·巴尔金上校领导的阴谋有 200 多名军官卷入，包括一些最有名的军队野战指挥员。在后来的改组中，有大约 4000 名官兵

被撤职、重新分配或退休。1957年9月，另一次阴谋导致了西恩富戈斯海军基地的一场兵变，这是席卷全岛各主要海军设施的一次更大规模的阴谋的一部分。同年，还在空军、陆军、医疗部队和国家警察中发现了阴谋。到50年代末，巴蒂斯塔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民众造反和一支在政治上越来越真相莫测、业务上越来越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抵抗。

50年代的古巴危机已远远不只是巴蒂斯塔与他的政治对手的冲突。在反巴蒂斯塔的斗争中，许多参加者肯定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解释这场斗争的，认为在这场斗争中，中心的问题就是要消灭邪恶的巴蒂斯塔和恢复1940年的宪法。但是，这10年中人们的不满既是政治上的怨恨所造成的，又是社会——经济的失败所引起的。到50年代，蔗糖已不再是促成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不能靠蔗糖来维持经济的继续发展。然而，古巴经济的各个部门仍然受到国际糖业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1952—1954年糖价的下跌，造成了这10年中古巴经济一系列衰退中的第一次衰退。与此同时，1934年的美古条约造成了损失，阻碍了古巴在战后时期获得如其他拉美国家那样的工业发展。古巴仅有的一点本国工业面临着强大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关税保护，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制造商发展轻工业消费品——主要是食品和纺织品——以外的商品。古巴人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每年达到就业年龄的男青年就有5万人，而1955—1958年仅有8000个新的就业机会。

投资的模式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国内储蓄赶不上工业投资的需要。与此同时，很大部分资本转移到了国外，主要是以外国在古巴投资利润的形式或通过古巴在国外的投资转移出去的。很少有古巴人投资购买政府证券或长期股票，而宁愿保留现金，主要是变成国外银行的短期资金或存在国内银行保险箱里。少数人作长期投资也主要是购

买美国股票。1955年，房地产投资超过1.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与此相对照，美国资本却控制了古巴90%的电话和电力业务、50%的铁路和40%的蔗糖生产。美国银行在古巴的分行控制了全部银行存款的25%。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在大萧条时曾经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稳步上升，1958年达到10亿美元的高峰（其中3.86亿美元在服务业，2.7亿美元在石油和采矿业，2.65亿美元在农业，8000万美元在制造业）。

在50年代，不但劳工在净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了，例如，1953年到1954年由70.5%下降到66.4%；而且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增加了。1957年是50年代中期最好的年份，一般有17%的劳动力被列为失业，另有13%沦为就业不足。制糖工业（这是古巴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之一）估计雇佣着47.5万名工人，约占劳动力的25%，其中大约60%每年只受雇6个月或不到6个月，只有30%受雇10个月以上。制糖工人平均每人每年只受雇不到100天。随着失业的增加，工人也日益反对提高产量的措施了。蔗糖工人成功地反对了机械化收割和大量装载甘蔗，制雪茄烟工人通过斗争使机械化受到了限制，码头工人也顽强斗争反对机械化。40年代和50年代所通过的各个劳工法，使得解雇工人成为几乎不可能，就业保障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古巴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成功地竞争的能力进一步削弱。

古巴劳动力内部存在着重大差别。一个典型的农业工人每月所得不到80比索，比产业工人平均收入低。后者每月工资约120比索，此外还有养老金和其他工资外补贴。如果该工人受雇于一家大公司或者参加了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其收入就更比农业工人高。此外，古巴乡村很少拥有古巴城市普遍拥有的优越环境和服务设施。与此相反，居住在乡村的古巴1/3人口生活在悲惨的贫困和经常被人忽视的状况之中。能用上自来水的乡村居民仅为15%，城市居民则为80%。可用上电的乡村家庭仅为9%，城市居民则为83%。医护人员和牙科医生以及医院和诊所都集中在大

城市，乡村则既穷困又闭塞，几乎得不到任何教育。全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为20%。其中乡村人口中，文盲的比例为40%。在奥连特省，文盲在乡村人口中的比例为50%。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政治生活之外。这种状况短期内也不可能改变。古巴乡村广大地区被大庄园主的农场所占领。22家大公司经营着古巴1/5的农用土地，其中很大部分土地被迫切等待出现周期性繁荣的种植园主们保留闲置。养牛场也占有广大的土地，大批农民被排斥在外，不得进场当工人或占有土地。

到50年代中期，连古巴城市中产阶级也觉得自身处于危机之中。确实，古巴是拉丁美洲人均收入（374美元）最高的国家之一，1957年仅次于委内瑞拉（857美元）而居第二位。在每千人拥有收音机和电视机数量方面，古巴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在电话、报纸、客运机动车方面，古巴居第一位。在每人每天平均食品消费量方面，古巴仅次于阿根廷和乌拉圭。居民所消费的外国进口货——主要是美国产品——从1950年的5.15亿美元上升到1956年的6.49亿美元，1958年又上升到7.77亿美元。但是，以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古巴的物质消费水平，把这个岛国的人均收入说成是接近拉丁美洲的最高点，并不能给古巴中产阶级以多少个人的安慰。古巴人拿来作比较的不是拉丁美洲，而是美国。古巴人完全同美国公民一样，直接参加而且完全依赖美国的经济制度，但又不能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且就业水平与工资水平都比北美洲低得多。古巴人均收入374美元，同美国的人均收入2000美元相比（即使同美国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1000美元人均收入相比）也大为逊色。而且在1956年，哈瓦那是世界上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仅次于加拉加斯、安卡拉和马尼拉而居于第4位。这种差别引起了很大的沮丧，特别是当古巴中产阶级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落后于美国人收入的提高。古巴的人均收入实际上降低了，例如1952—1954年衰退期间下降了18%，把战后那几年所取得的缓慢进展冲淡了。1958年，古巴人均收入水平仍同1947

年差不多。50年代末，古巴中产阶级开始公开支持巴蒂斯塔，但这时其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已低于20年代。

巴蒂斯塔继续执政，给日益增长的危机火上加油，因为他所造成的政治条件使得经济不可能重新增长。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后来得出结论说：1958年阻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障碍是“政府的不廉洁和政治上的非法行为”。[1] 政治上的不稳定和冲突，使经济陷入大混乱。在1955—1957年的短期繁荣以后，旅游业又一度低落，起义者的活动使得从乡村向城市运送奶制品、蔬菜和肉类的业务停止。货物短缺使得基本主食的价格飞涨，对于产业的损毁和破坏进一步加深了经济的混乱。甘蔗生产下降了。到1958年，起义者的活动在东部三省已达到最高涨阶段，而这三省的甘蔗田占全国甘蔗田的80%以上，三省每年的甘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以上。汽油和石油的短缺使得铁路、公路和制糖厂停止活动。1958年，七·二六运动在全国向产业和生产开战，以便孤立巴蒂斯塔，使它得不到外国的和本国的经济上层阶级的支持。信息是明确的：除非让巴蒂斯塔下台，否则不可能恢复正常状态。2月，游击队的领导人宣布，游击队打算攻打制糖厂、卷烟厂、公用事业、铁路和炼油厂。破坏甘蔗收割，这成了起义者战略的主要目标。七·二六运动不断发出呼喊：“要巴蒂斯塔就没有糖季，要糖季就不要巴蒂斯塔。”3月，起义军司令部宣布，已经向全岛每一个甘蔗生产省点燃了一支火炬，估计将要毁坏200万吨甘蔗。早在1957年9月，《纽约时报》常驻哈瓦那记者就在电文中说过：“自从巴蒂斯塔1952年接管政府以来一直全心全意支持他的”工商界人士和资产阶级“对于这个岛国继续存在的暴力活动越来越感到不能忍受”。[2] 到1958年，这种不能忍受的情绪变成了愤怒。

---

① 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古巴与法制》（日内瓦，1962年），第25页。

② 1957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第4版，第11页。

在 195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一直处在革命的边缘。7 月，各主要反对派组织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开会，以组织一个反巴蒂斯塔的统一阵线和制订一项反巴蒂斯塔的共同战略。加拉加斯协议确立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反巴蒂斯塔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确立起义军为革命的主要支柱。随着加拉加斯会议的召开，巴蒂斯塔向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发动了最凶猛的进攻。巴蒂斯塔军队的各部队都参加了这次进攻，估计向马埃斯特腊山进军的有 1.2 万人。空军中队向被怀疑为起义部队驻守的地区进行轰炸和扫射，沿海的海军部队则向东南山脉进行炮击。但是到夏末，政府的攻击崩溃了，这标志着古巴政府武装部队解体的开始。随着开小差和叛逃现象达到如瘟疫流行的程度，军队停止了战斗。撤退的军队成了向前推进的游击队很容易捕捉到的对象。士气低落变成了恐惧，最后变成了惊慌失措。

游击队于夏末发动了反攻。几周之内，古巴东半部的政府军陷人武装反对派排山倒海般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因为各省城镇相继落入游击队手中。地方军事指挥部常常是一枪不发就投降了。忠于政府的军队拼命想在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地从东面冲向哈瓦那以前回到西部。

有两件事现在是清楚的了：巴蒂斯塔政权必将灭亡，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下的七·二六运动已经明确地确立了对所有革命派别的领导权。夏天，在巴蒂斯塔政权覆灭之前几个月，曾经在巴蒂斯塔第二次执政时期遭到禁止的共产主义政党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结成了联盟。人民社会党转向菲德尔主义，使得该党在七·二六运动中赢得了好几个关键性职位，最突出的是在劳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起义军部队中。这些职位成了人民社会党在革命后的古巴扩大其权力的基础。

到 1958 年，巴蒂斯塔增加了一个敌人：美国政府。对古巴政府来说，这一年一开始就不吉利。3 月，华盛顿对古巴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举动等于是收回美国对古巴政府的支持。在古巴政府发

动春季攻势前夕，美国宣布了这一决定。美国停止向古巴运送武器使得巴蒂斯塔对其支持者——包括民众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一直是忠诚于巴蒂斯塔的。巴蒂斯塔向军队保证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无条件支持。1958年3月以后，军队指挥部对这一点已不再相信了。美国大使厄尔·E·T·史密斯恐吓说，华盛顿不再支持巴蒂斯塔，这对古巴军队有着“严重的心理影响”，是“国务院为了促使巴蒂斯塔下台所采取的最有力的步骤”。①

1958年是选举年。这给了巴蒂斯塔一个机会来向华盛顿显示，在古巴，民主进程仍然能够运行，尽管在进行内战。不出所料，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安德烈斯·里韦罗·阿圭罗获胜。这场选举骗局进一步削弱了巴蒂斯塔在国内和国外的地位。官方所提候选人获胜，使得少数曾经希望用政治办法解决武装起义问题的人们失去了幻想。那些在个人关系上忠于巴蒂斯塔的军官们看到政权转移的前景而灰心丧气，再没有热情来捍卫一个在选票箱前已经被人取代的领袖。华盛顿公然反对被操纵选出的总统接班人，事先宣布不会在外交上承认里韦罗·阿圭罗，从而破坏了对古巴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实际上，华盛顿已决心要让巴蒂斯塔下台。1958年的危机使人想起了1933年的危机。在1933年，一个不得人心的当选总统，成了使这个岛国陷入政治动乱和社会骚动的威胁，华盛顿又一次企图消除古巴紧张局势的根源，以拆除革命形势的导火线。12月初，美国国务院派遣金融家威廉·D·波利到哈瓦那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波利后来回忆说，美国曾要求巴蒂斯塔“向一个看守政府投降，这个看守政府对巴蒂斯塔不友好，但我们感到满意，我们能立即承认它并给予它军事援助，以便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执政”。12月9日，波利与巴蒂斯塔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① 厄尔·E·T·史密斯：《第4层楼》（纽约版，1962年），第48页和第107页。

表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与家属一起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去平静地过退休生活。这位美国大使对古巴总统说：美国"将努力阻止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上台执政，但是看守政府必须是他（巴蒂斯塔）的敌人，否则就行不通，否则的话，菲德尔·卡斯特罗就要么必须放下武器，要么承认他是一个为夺取个人权力而反对一切人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者"。[①] 巴蒂斯塔拒绝了。

当美国还在力图说服巴蒂斯塔下台的时候，革命的势头已经决定了这个政权的命运。政府进攻的失败和游击队反攻的成功对古巴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引起全国各地自发的起义。军队撤退后，大量武器装备落入民众手中，包括大炮、坦克和各种小型武器。在1958年的最后几周内，城市抵抗力量和游击队的队伍都迅速地扩大了。1958年12月，圣地亚哥的巴蒂斯塔军队指挥部宣布90%的居民支持游击队的行动。同时，卡马圭的自发起义战胜了地方军的一些支队。在圣克拉拉的决定性战斗中，格瓦拉的队伍得到当地居民决定性的支援。在政府军开展夏季攻势时，游击队大约有5000名官兵。到1959年1月，起义军人数已约达5万。

牺牲巴蒂斯塔是军事阴谋的一个信号。在农村已经停止战斗的军队，成了城市政治阴谋的中心。到12月，军队中已酝酿过十几次阴谋。1959年1月1日凌晨，一支游击队横跨古巴中部平原，欧洛希奥·坎蒂略将军夺取了政权并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卡洛斯·彼德拉为临时总统。七·二六运动反对这次政变，要求政变者向起义军无条件投降。菲德尔·卡斯特罗保证要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号召总罢工。

全国各部队听到巴蒂斯塔逃跑的消息后，都停止抗击向前推

---

① 美国国会参议院：《负责调查国内安全法及司法委员会其他国内法执行情况的小组委员会上的听证：共产主义通过加勒比海对美国的威胁》第86届国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特区，1959—1960年）第10部分，第739页。

进的起义军。坎蒂略向美国大使馆抱怨说，他接管了一支“死亡军队”的指挥部。坎蒂略力图恢复已经垂死的作战力量，他求助于已被投入监狱的拉蒙·巴尔金上校，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巴尔金命令立即停火，向起义的“解放军”致敬，命令哥伦比亚军营和拉卡瓦尼亚军事要塞向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西奥投降。一周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到达哈瓦那。

第10章

1959年以来的古巴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一直是古巴国家事务中居统治地位的人物。自1933年9月军事政变以来，除1944—1952年由真正党统治外，巴蒂斯塔一直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古巴。直到他最后一次当总统的最后几周为止，他似乎是很自信和很有能力的。忽然之间，巴蒂斯塔走了。1958年新年之夜，他不干了，带走了他的政府最上层的许多人。一位年轻的留着长须的新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两年来一直在古巴东部领导着一场游击战争，逐渐地将其部队的影响扩大到西部各省，慢慢地取得了对于城市和农村反巴蒂斯塔抵抗运动的领导权。他现在向哈瓦那进军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军事战役和政治斗争都十分大胆和有成效，在公众场合讲话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他成了未来的领袖。权力出乎人们意料地转入了新一代古巴人的手中。

1959年1月，古巴的旧政权垮台了，革命掌权了。过去的规章制度不再适用。古巴独立以后长期统治着古巴生活的军队已经土崩瓦解。起义军成了新的国家政权的捍卫者，把过去几十年中统治政治生活的各个政党一扫而光，只有50年代被巴蒂斯塔禁止、1959年又复出的共产党（人民社会党）现在还原封不动。旧政权的灭亡要求人们制订新的规章制度来代替那些已经崩溃或已经被推翻的规章制度。古巴此后30年的历史是具有革命创造性的历史。它不断努力在革命中创造新秩序，并对于实现这种新秩序保持着革命的信念。

巩固革命政权

（1959—1962 年）

古巴过去一直受到国际事务中风浪的冲击。地理上，它处于美洲地中海的心脏，许多世纪以来列强一直对它垂涎欲滴。西班牙 400 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以后，美国于 1898 年在古巴确立了首要地位。在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几乎成了古巴对外关系中的唯一中心。

1959 年，美国政府十分担忧地注视着这个似乎是异乎寻常地脱离它控制的国家的事务。美国重视古巴，是由于古巴的战略地位和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决定的。美国根据 1903 年条约的规定，在古巴占有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该条约名义上承认古巴的主权，但又保证美国有权无限期地使用该基地。虽然后来古巴曾提出抗议，但美国仍保留了该基地。几十年来，除在关塔那摩外，美国没有在古巴驻扎军队，美国政府官员在古巴内政中所起的作用也减少了。但在 50 年代的古巴，美国大使仍然是仅次于古巴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号最重要的政治人物。1959 年，美国在古巴制糖业、采矿业、公用事业、银行和制造业投资的价值，超过它在除委内瑞拉以外的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投资的价值。古巴出口货物的大约 2/3 销往美国，古巴进口货物的大约 3/4 来自美国（据估计，外贸收入占古巴国民收人的约 2/3）。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以及参加革命战争的其他革命力量都力图肯定古巴的民族主义。从他们所使用的象征物和要求人们回忆的历史以及他们对问题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来看，他们很注意要使古巴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历史。在革命战争期间，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企业在古巴的活动的批评是有限的。卡斯特罗曾强烈批评美国早期根据两国正式军事协定给予巴蒂斯塔政府的适量的军事援助。这种援助最终被削减了。卡斯特罗也曾谈到要没收美国所占有的公用事业。但在游击战争

后期，由于策略上的原因，卡斯特罗似乎收回了他所提出的没收办法。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古美关系中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美国不信任，对美国批评古巴的事情感到愤怒。古巴政府审判了曾在巴蒂斯塔政府和军队中供职的许多人，他们大部分被判了刑，其中许多人被处决。这些审判在古巴国内和在美国都遭到指责，说审判很少遵照一定的程序来保证被告的权利，并说许多案件判得太重。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其他领导人对此十分恼火，他们谴责美国新闻媒介（特别是广播）中和美国国会里的批评者。从1959年1月开始，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发生恶化，这是由于革命者对正义和惩罚的价值观与一个自由派社会关于甚至对自己的敌人也要公平和温和的价值观二者之间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对美国在古巴经营的公司所施加的早期影响。1959年，罢工次数急剧增加，工人们在较为有利的政治形势下要求从厂方得到更多的东西。外国拥有的公司受到这种罢工的影响，在有些地方产生了公司被没收的问题。例如，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炼油厂举行的一次罢工，提出了没收英国财产的问题。造反者是为了报复英国卖武器给巴蒂斯塔政府而通过一项法律授权这样做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迫壳牌公司作出了慷慨的让步。作为交换条件，古巴“暂时”不予没收。[①] 类似的来自下面的压力也影响着农村的革命。土地改革法（1959年5月颁布）也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尽管它在许多方面是温和的。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INRA）比较愿意去干预外国拥有的农场中的劳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严格执行该项法律以没收外国拥有的土地。这类地方性的土地冲突使得美古关系紧张。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历史言论集》（哈瓦那，1959年）1：50—2，第75—81页。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是古巴对新的私人外国投资和对国官方援助的态度变化不定。1959 年 2 月 18 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公开表示欢迎外国资本，1959 年 3 月 20 日，他承认有大量援助。1959 年 4 月 2 日，这位总理宣布他即将访问美国，陪同他的有国家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目的是为古巴寻求资金。1959 年 4 月的美国之行，是他们作出决定的最后期限，在此以前这项决定被那些过分劳累的革命者们推迟了。古巴新政府想同美国建立密切关系吗？这个革命决心让古巴对多国公司开放和让它们有利可图吗？这个革命的领导人能够在联合果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或美孚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进行一场真正的、激进的革命吗？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经济紧缩政策、拥抱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并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大门口宣布美古友谊吗？卡斯特罗在前往美国的途中对他的经济内阁说，在访美期间，他们如遇到美国政府、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不得向他们寻求外援。因此，此行的目的不是寻求援助来进行资本主义发展，而是赢得时间来进行深入的变革，变革的具体形式尚未确定。没有事实证明美国或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曾经拒绝给予古巴政府它所要求的援助。事实上，古巴没有要求援助。如果古巴要求了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这种援助就会把古巴的未来与世界资本主义和美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 50 年代的这种援助往往是附加这种条件的。因此，少数革命领导人远远走在了公民的前面，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要在古巴进行革命，不同美国进行重大的对抗是不可能的。要革命就必须实行已经许诺的广泛的土地改革，大概还需要由国家对公用事业、采矿业、制糖工业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制造业部门进行新的、深人的干预。由于美国在这些部门有大量的投资，而且美国对国有化抱敌视态度，在古巴国内进行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同外国的对峙。

土改法批准后，1959 年 6 月出现了第一次内阁危机，其结果

是温和派离开了政府。美国大使菲利普·邦斯尔于6月11日提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抗议，抱怨古巴在早期对美国公司执行土改法时有违反规定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古巴空军领导人佩德罗·路易斯·迪亚斯·兰斯于6月底辞职并逃往美国。他指责古巴政府被共产党渗透。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总统于7月底被迫离职，使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无可争议的领袖。对于乌鲁蒂亚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问题。他曾坚决驳斥关于古巴政府搞共产主义的指责，并曾指责共产党人企图颠覆革命。乌鲁蒂亚被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取代(他担任总统直到1976年)。对于古巴与苏联之间缓慢演变着的关系来说，共产主义问题也很重要。古巴与苏联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是1959年6月由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开罗进行的。当时苏古贸易还像革命前一样微乎其微。从1959年10月起，古巴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于1960年2月访问古巴，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重要的双边经济协定，并促进了其他关系的发展。

1959年下半年，美古关系继续恶化。关于共产党在政府中影响问题的争论变得频繁和紧张。随着卡斯特罗以越来越尖锐的口气辱骂美国，华盛顿对古巴政府的看法变得更坏了。1960年3月初，一艘运送武器和弹药给古巴政府的比利时轮船《拉库布雷号》在哈瓦那海港爆炸。卡斯特罗总理指控美国政府进行破坏。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抗议。在私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古巴流亡者，准备将来入侵古巴。

1960年春、夏，美古关系恶化的速度加快了。6月底，古巴政府要求外国拥有的炼油厂加工它从苏联买来的原油。当这些公司拒绝政府的要求时，它们被没收了。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酝酿通过一个新的蔗糖修正法案。该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削减古巴糖的进口限额。这个法案于7月3日通过。7月5日，古巴部长会议下令没收美国在古巴的一切财产。7月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古巴向美国出口糖的限额。7月15日，新建

立的外贸银行成了古巴唯一的外贸机构。8月7日，没收了美国在古巴拥有的所有大型工农业企业。9月17日，没收了在古巴的所有美国银行。10月19日，除不受补贴的食品和药物外，美国政府禁止对古巴的一切出口。10月24日，古巴没收了美国拥有的所有批发和零售贸易企业以及现在还剩下的美国拥有的小型工农业企业。10月29日，美国召回菲利普·邦斯尔大使。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快要下台的日子里，美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最终地、正式地断绝了。

与此相反，在这一时期，古巴与苏联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于1960年7月9日宣布，苏联准备用导弹来“象征性”地捍卫古巴。在苏联保证“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防止美国对古巴的武装干涉”①以后几周内，古巴与苏联签订了第一个正式的军事协定。可以预见，古巴与苏联在军事上日益加强的合作，加深了美国政府对哈瓦那的敌意。

在美古关系发生迅速而戏剧性的变化的同时，古巴国内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也进行了改组，其后果之一是大规模地向美国移民。华盛顿通过各种特殊计划来助长这种移民，目的是要丑化古巴政府。1960年到1962年，从古巴移往国外的移民净数约达20万人，平均每年6万人以上，这是一个空前的数目。移民大多是经济上层人士和社会上层人士，其中的成年男子一般是自由职业者、公司经理和行政负责人，也包括许多白领工人。另一方面，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在移民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低于他们在古巴全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移民中几乎没有古巴农民。在这些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城市移民中，白人所占的比例大于白人在古巴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古巴人民的一部分历史将在美国展开。第一次移民高潮中的移民部分地是由于他们能把自已的技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将在今后30年中取

---

① 古巴：《革命报》，1960年7月21日，第1页。

得相对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在政治上，他们成了一支强大的反共势力，常常与美国其他讲西班牙语社区中流行的政治观点发生尖锐矛盾。

1960 年末和 1961 年初，有可能成为古巴裔美国人的人仍然是古巴人。他们从祖国流亡出来，还打算回古巴去。1960 年下半年，美国与古巴两国政府发生了冲突。华盛顿更想帮助古巴流亡者去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是，古巴流亡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过去与巴蒂斯塔有密切关系的人遭到在起义时或在卡斯特罗政府最初几个月里曾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共事的流亡者的反对（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与卡斯特罗决裂），双方都彼此憎恨；古巴需要复辟还是需要一次非共产主义的变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分歧双方都有着许多不同层次的意见，个人性格的冲突更使得人际关系复杂化。美国政府认为，为了让美国尽量少干涉而又要成功地推翻卡斯特罗政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古巴流亡分子领导班子。

1961 年 3 月 22 日，好几位主要的流亡分子领导人同意成立古巴革命委员会，由何塞·米罗·卡多纳任主席。此人曾于 1959 年 1、2 月间在古巴革命政府中担任第一任总理。古巴革命委员会的知名成员包括曾任总理的安东尼奥（“托尼”）·巴罗纳（他是巴蒂斯塔的反对者）以及曾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的曼努埃尔·拉伊。曾任古巴起义军中尉的曼努埃尔·阿蒂梅成了入侵军的政治领导，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成了入侵军的军事指挥官。在一旦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以后，这个委员会就将成为由米罗·卡多纳任总统的古巴临时政府。流亡者的第 2506 旅在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完成了训练。

约翰·肯尼迪政府于 1961 年 1 月 20 日上台后，继承了这个入侵计划。那些鼓吹入侵古巴的人拿美国 1954 年秘密支持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作例子，说明美国付出的代价很低，美国军队无须直接卷入。支持入侵古巴的人争辩说，要趁卡斯特罗

政府还没有从苏联手中得到足够的武器来挫败这种挑战之前，赶快动手。4月3日，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指责卡斯特罗和他的密切支持者背叛了一场真正的革命。美国政府认为，古巴需要一次非共产主义的变革。肯尼迪总统同意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入侵部队放手去干，只要不使用美国部队。

4月15日早上，由古巴流亡分子驾驶的飞机轰炸了古巴的几个机场，造成很大恐慌，但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警察作出的反应是，监禁了成万名有嫌疑的持不同政见者。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早上，第2506旅在古巴中南部猪湾的吉隆滩登陆。古巴政府动员了它的正规军和民兵。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率领下，他们在48小时内击败了入侵的部队，俘虏了1180人。由卡斯特罗等人在古巴全国电视台上对俘虏进行了审讯。这些俘虏最终于1962年底获释，对此，美国必须付给古巴药品等物资。入侵古巴失败以后，肯尼迪政府内部和各流亡分子团体内部都互相发生了争吵，卡斯特罗则胜利地宣布古巴已经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够击败古巴国内的敌人，而且能够击败北方的超级大国。

如果说在古巴进行一场激进的革命必须与美国决裂，那么在美国的进攻面前捍卫一场激进的革命就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1961年12月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他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并且至死不变。1962年7月，武装部队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苏联认为，在古巴设置战略导弹的可能性似乎是一场政治和军事政变。苏联在古巴设置战略导弹可以平衡美国包围苏联的基地。这样，苏联对美国发动核进攻的反应时间将会更快，命中率将会更高。1960年7月的“象征性”导弹到1962年10月变成了真正的导弹。苏联终于在古巴设置了42个中程弹道式导弹。美国情报机关收集到这个情报后，肯尼迪总统认为苏联和古巴将设法对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平衡作重大改变。10月22日，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进攻性导弹”，并强行对古巴这个岛国实行海军“封锁”，以阻止苏联运送更多的

武器去古巴。肯尼迪还要求苏联撤走战略轰炸机，并承担今后不在古巴设置苏联战略武器的义务。

全世界屏息注视。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扔下核弹以来，核战争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迫近。两个超级大国在战争的边缘上互相虎视眈眈，在军事关系上互相耍弄手段。苏联事先没有与古巴商量就作出了让步，撤走了在古巴的全部战略部队，以换取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危机便这样结束了。美国作了这项保证，但条件是由联合国来核查苏联撤走战略武器的情况。但是，愤怒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允许到现场进行调查。事实上，虽然美国没有正式保证不入侵古巴，但美苏两国在与古巴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某种"谅解"，苏联将不在古巴设置战略武器，也不利用古巴作为操纵核武器的基地，美国方面将不图谋推翻卡斯特罗的政府。因此，古巴导弹危机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在当今世界的中心问题上公开地羞辱了苏联政府。不过，从此美国就完全失去了它在古巴的影响。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对手古巴流亡分子都失去了他们各自的超级大国盟国的全力支持。但是，卡斯特罗最终认识到他所得到的比他的对手所得到的多得多，因为苏联的明智行动挽救了他的统治。

随着1959年初和平回到古巴的乡村，经济开始复苏。革命政府力图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想用改变需求结构的办法来实现再分配的目标。非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增加了，城市低房租住房的租金降低了50%。1959年初，政府没收了原属巴蒂斯塔及其亲密伙伴的全部财产。古巴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国家在拥有和直接经营生产活动方面起重大作用。与大部分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不同，古巴在1959年以前经济中没有形成一个国营企业家阶层，因此对于如何经营国营企业没有什么经验。1960年以后，许多经理被解雇、移民出国或被捕，使这些问题更复杂化。

混合经济的试验时间很短。前面已经提到，古巴政府在与美

国对抗时实现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这次对抗本来没有必要影响古巴本国资本的企业。但1960年10月13日，382家古巴本国资本的公司，包括所有的制糖厂、银行、大型工业部门以及最大的批发和零售企业，全实现了社会主义化。三天以后，城市改革法将所有商业资本拥有的房地产实行了社会主义化。1959年的土地改革法已经摧毁了古巴本国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的大庄园，但还允许中小型私人农场。由于许多古巴企业家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被认为是反对革命政府的，为了革命政权的生存，似乎有必要把企业的管理权和所有权都转入忠诚的革命者手中，不管他们在技术上是多么不称职。这些行动也反映了他们决定有意识地实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虽然直到1961年4月官方才宣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作出这种决定所依据的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且直接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被认为是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经济集中化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合理步骤。革命领袖们并不是被迫实行经济社会主义化的，他们是自动的，而且他们认为是慎重地为他们想要建立的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权力必须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以实现多数人的抱负：那就是运转中的意识形态的核心。

1959年10—11月，在古巴与美国决裂前的几个月，也就是在古巴与苏联签订第一个条约前几个月，古巴内政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0月15日，非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担任了国防部长（后来改称武装部队部长），此后他一直担任此职。劳尔·卡斯特罗有着杰出的军事生涯。古巴武装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后来在猪湾和海外战争中取得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他。在革命统治的最初30年中，军队是古巴所建立的一个毫无疑问有效的组织。劳尔·卡斯特罗还是仅次于他哥哥的全国一切事务——包括文职和军事事务——的第二统帅。他在70年代期间党和政府的整顿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菲德尔死去，劳尔是他正式指

定的接班人，有权继承他的职位。

1959年10月18日，在大学里竞选大学生联合会（FEU）主席的选举中，罗兰多·库韦拉斯——他是得到共产党支持的“联合”候选人——击败了七·二六运动的候选人佩德曼·博伊特尔。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这次选举进行了干预，让大学生联合会与当时走向马列主义的潮流结合起来（库韦拉斯后来在1966年被捕，原因是他阴谋杀害菲德尔·卡斯特罗。看来他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

10月19日，卡马圭省的军事司令官、革命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乌韦尔·马托斯因对于政权中共产主义的影响日益加强感到不满而与另外14名军官一起辞职。当马托斯被捕时，七·二六运动卡马圭省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辞职，其领导人被拘留。马托斯在狱中度过了20年。他在狱中英勇抵抗，不愿与逮捕者合作，不向逮捕者的意志低头，成了反对派力量的象征。

11月，古巴工人联合会（CTC）举行第10次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人。七·二六运动的候选人显然得到多数票。政府要求与共产党人“联合”，但到会代表拒绝。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讲话时，他的话语被“二六、二六”的呼声打断。他指责有人利用这个招牌来“把尖刀插入革命的心脏”。[①] 他争辩说，为了保卫革命，必须避免党派之争。他要求代表大会授权他建立一个劳工领导班子，代表大会确实授权给了他。他挑选了“联合”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共产党人。

11月底，部长会议里所剩下的温和派或自由派的大多数人（包括公共工程部长曼努埃尔·拉伊和国家银行行长费利佩·帕索斯）都被赶下台。1959年1月任命的21位部长中，到年底已有12人辞职或被撤职。1960年，随着革命向着马列主义政治制度发展，又有4人下台。原来的联合体清除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和反共

① 古巴：《革命报》，1959年11月23日，第4页。

分子，政权与工商界发生了冲突，这是对革命政治进行变革的内在因素。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巩固了集中的、独裁主义的统治。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现在处于反对派地位，只有具有政治工作经验和行政工作经验的共产党人来使得新的制度运转。

1960年和1961年，随着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深化，政府形成了它的组织机构。领导班子控制了大学生联合会和古巴工人联合会以后，又建立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民兵来争取人们的支持和威吓国内的敌人。1960年8月成立了古巴妇女联合会（FMC），1960年9月成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CDR），后者最终拥有数百万成员。在城市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栋大楼、每一个工厂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建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以帮助国内安全机关发现敌人（后来，设在工作场所的保卫革命委员会被取消了，以免与工会的工作重复）。说闲话成了国家权力的一个武器。1960年10月，成立了革命青年协会（AJR），它把老共产党、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七·二六运动的青年组织融合在一起。几年以后，革命青年协会变成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JC），它是共产党的青年组织。1961年5月，成立了全国小农协会（ANAP），它不吸收中型农场的所有者（他们的财产于1963年被没收），力图打破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界线。

1961年夏，成立了一个新的共产党。它叫做统一革命组织（ORI），是由原来存在的三个组织融合而成的。这三个组织是：七·二六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和老的共产党即人民社会党。此时，前两个组织已经成为实际上不存在的组织，其中革命指导委员会在1959年1月以后已经失去了很多独立能力，七·二六运动也因为夺取大学生联合会和工会控制权的斗争而失去了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能力。人民社会党党员给统一革命组织带来了若干好处。他们是其余领导人与苏联之间建立关系的搭桥者；与统一革命组织的其他人相比，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他们还具有长期从事政党政治和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古巴工人联合会头10年

是由人民社会党管理的，人民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是统一革命组织成员中唯一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在革命前的年代曾在国会里工作过。40年代初期有几名人民社会党党员参加了巴蒂斯塔的战时内阁（包括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因此，在开始阶段，人民社会党党员在统一革命组织中居统治地位。

党支部的建立、党员的选择以及一切有关提升和开除的问题都得在党的强有力的组织书记、人民社会党老资格领导人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的办公室里决定。党支部的权力超过了行政人员，在军队中实行了初步的政委制度。吸收党员时，强调吸收那些原来属于老的政治组织的人，不鼓励吸收真正的新来者。埃斯卡兰特愿意吸收人民社会党的老同志。他们最了解如何组织一个党而且对他个人很忠诚。这一切是七·二六运动的老成员们、特别是游击战中的军事指挥官们所无法接受的。1962年3月，菲德尔·卡斯特罗谴责埃斯卡兰特搞“宗派主义”，撤销了他的组织书记职务，并把他流放到捷克斯洛伐克。接着，统一革命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统一革命组织的大约一半成员被开除，其中许多人是原人民社会党党员。作了新的努力来吸收成员，不仅吸收原来属于老的政治组织的成员，还吸收1959年以前因太年轻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党在军队中的权威被大大限制。因此，军事指挥官在军队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权威。1963年，统一革命组织改名为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PURS）。

到1962年，革命政权已经巩固，虽然领导人在此后好几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导弹危机的解决，来自美国的威胁已开始减退。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古巴政治，并确立了他高于一切对手的显赫地位。在他的非凡魅力的影响下，进行着革命统治的组织工作，虽然这种工作到70年代才见成效。在60年代的头5年，反对古巴政权的人们在每个省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埃斯坎布拉依山区的势力特别强大。在这场重起的内战中（1960—1965年），成千名古巴人丧生。叛乱者包括

马坦萨斯省南部的农民以及那些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显然受到冲击的人们。他们于1965年被彻底打败（许多与他们思想相同的古巴人移居国外，实际上输出了反对派）。政府的主要任务成了管理经济，经济的迅速缩减已经妨碍了政府其他目标的完成。

经济政策与效益

在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指令性经济。革命古巴的早期经济政策力图通过迅速工业化来求得发展。古巴过分依赖制糖工业被认为是不发达的一个象征。正如工业部长、这项战略的设计师切·格瓦拉所说："一个没有发达工业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工业代表着未来。"[1]

在多方面——特别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央各部并制订了一项发展规划。但古巴并没有为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准备好条件。古巴缺少技术人员（当时他们在美国或者在监狱里），也缺少统计资料。1962年的规划和1962—1965年的规划都是幻想。这些规划都没有统计资料作依据，经济管理的知识也是很原始的。规划要求实现很大的增长目标。与此相反，1962年古巴的经济崩溃了。政府冻结了物价，大部分消费品强行实行配给。配给卡从此成了古巴人生活中一项固定的东西，它说明古巴政府经济效益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它在促成经济增长方面相对地失败了；另一方面，它在保护最穷苦古巴人的需求方面和在缩小基本商品与服务的供应不平等方面相对地成功了。再分配的政策不仅力图提高穷人的购买力，而且要限制富人的购买力。工资标准不仅规定最高工资，而且规定最低工资。政府以惊人之举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货币：凡没有在国家银行存款的人，不能用旧比索兑换新比索。他们的储蓄变得一文不值。

1963年，古巴经济进一步衰退。由于政府采取了激进的政策

---

① 古巴：《革命文件10》，1964年，第14页。

把甘蔗单一经济制变为多种经济制，1963年糖的生产比1961年下降了1/3强。其他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也受到了不良影响。为了加速工业化而进口机器和设备，再加上糖的出口收入减少，使古巴面临国际收支的危机。1963年6月，卡斯特罗总理宣布了一项新的战略，重新强调蔗糖生产，并放慢了工业化的速度。1964年，重申了以蔗糖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这时，苏联和古巴签订了第一个长期协定，保证苏联给予更加优惠的、稳定的糖价，最终由苏联为古巴糖提供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补贴。

政府的这项战略要求提高糖产量，到1970年要生产1000万吨原糖。这项政策遭到制糖工业中若干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反对。但是，他们的意见被压制。1970年糖的生产指标成了一件令人自豪的事，说明古巴人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能掌握自己的历史。正如50年代末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们推翻了巴蒂斯塔，实现了一个似乎不可能的梦想一样，60年代末他们又会实现另一个似乎不可能的梦想，把蔗糖产量从1963年的380万吨提高到1970年的1000万吨。事实证明，怀疑论者会又一次估计错误。

但是，在古巴最高层就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争论，使得新战略复杂化了。争论的一方以工业部部长切·格瓦拉为首，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是一个单一体；货币、物价和信贷只是在同古巴消费者或外国打交道时才起作用。为了迅速走向共产主义，能够而且应当消灭供求的市场规律。集中计划是关键。一切企业都是中央各部的分支机构。一切金融活动都由中央预算通过无偿、无息赠与方式进行。企业的一切赤字都由国家偿付。国营企业之间的买卖只是简单的转帐。货币是会计单位，而不能用以评估利润。对工人的物质刺激（包括工资差别、奖金和超时工资）将逐步取消。中央政府根据计划产量来分配资源，并规定会计需要的一切价格。另一方则认为古巴的国有经济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而是由国家独立拥有和经营的一些不同的企业。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的转移是买卖关系，深入地关系到资源分

配问题。为了保持对生产的有效控制和评估经济效益，必须通过货币和信贷。企业必须支付自己的生产费用，不能简单地由中央银行付钱来支付他们的赤字。企业必须提供自身进一步投资、维修和发明所需要的资金。必须给予工人物质奖励以维持生产率和质量并降低成本。如果说第一种模式要求的是格外的集中，那么第二种模式要求的是各公司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

1965年，切·格瓦拉离开了工业部（他到非洲和南美洲去从事革命战争，直到1967年底去世），这场辩论才最终解决，工业部被分成了它原有的那些部门。格瓦拉在其他各部的一些同盟者失去了职位。但总的来说，格瓦拉的政策还是执行了，而且是极端地执行了。60年代末经济效益的灾难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格瓦拉的错误观点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事们在行政工作中所造成的混乱造成的。1970年7月26日，当古巴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时，卡斯特罗本人在一篇戏剧性的讲话中承认了这一点。

激进的模式要求对经济实行更全面的集中化。早在1963年就通过了第二个土地改革法来没收实行1959年那个法律以后还保存下来的中型农庄。到1963年底，国家占有了全部土地的70%，私人成分中只有一些小农庄。1968年春“革命进攻”时达到了集体化的最高潮。这时，消费服务商店、餐馆和酒吧、修理店、手工作坊、街头食品店甚至街头摊贩都改为国有和国营。除了农业中很有限的范围以外，60年代末古巴任何经济生产活动都必须通过政府机构来进行。连卖热狗的摊贩、卖冰淇淋的小店、理发师和无线电修理师都是国家的。虽然出现了非法的黑市，如卖蔬菜和修理管道，但政府还是把经济捆得死死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经济的彻底集中化，集中计划和集中控制的手段都被放弃了。60年代末，既没有年度的国家计划，也没有任何中期计划。从1966年末起，只有部门经济计划而且是在有限的基础上，很少作出努力来协调互相没有联系的企业和工程

对于同一种资源的互相矛盾的要求。放弃了中央预算，10年以后才又搞这种预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指责“官僚主义”使好几个中央机构陷于瘫痪。金融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停止了。统计仅限于具体数量(如多少双鞋)。大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不可能确定。

劳工政策的变化是同样戏剧性的。在逐步取消物质刺激的同时，重新强调精神刺激：人民的革命觉悟会保证生产率和质量的提高以及成本的下降。不管工人的努力程度和工作质量如何，他们的报酬都一样。期待人们自愿加班加点，不给予额外报酬。金钱被看作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根源。这一政策变化是在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以后出现的。古巴在革命前的公开失业率一直很高，60年代初迅速下降，变成了劳动力短缺。原来失业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在国营企业里找到了工作。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人均生产率突降，产量也降低了。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效率低下和就业不足成为体制性现象。但这又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人道成就：使得大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古巴人能够庄严地从事某种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贡献于建设性事业。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结构性变化，使经济效益变得复杂化。革命以前，由于至关重要的制糖工业的高度季节性，就业模式随季节而有很大波动。工人们在有工作可做时努力干，以便存下钱来渡过“没活干季节”的失业期。革命政府保证所有能干活的人全年可以就业(或者有足够的失业补贴)，革命前那种要努力干的结构性刺激就削弱了。于是，革命政府成功地消灭了一种经常的痛苦根源——对贫困的恐惧刺激工人干活，但这却没有被要求高质量工作的新的有力刺激所代替。除了这些结构上的变化以外，还取消了物质刺激，结果工人劳动生产率低下而且不断下降，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日益恶化。精神表扬没有足够的刺激力。

由于精神刺激不足以促进生产和提高生产率，政府便在甘蔗田和其他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动员。这些所谓的志愿者——他们往往无权拒绝——低效能地被安置到全国各地。后来，又派了

很多军人去补充他们的力量。武装部队在1965年击败了国内反革命以后，便直接投身于生产性经济活动，包括收割甘蔗的工作。军官们成了收割甘蔗的监工，拼命努力要在1970年生产出1000万吨糖。与此同时，转而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和依靠革命觉悟。以培养一种新型的革命公民来领导古巴走向经济解放。

据报导，1970年生产了850万吨糖（有意编造了1969年的低数字）。这是古巴历史上糖产量的最高数字。但比原来的计划还差15%。1968—1970年，古巴经济严重失调，资源被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而不考虑实现这种不可能的梦想要花费多大代价。中央政府的行动加深了混乱。劳工被迫在军事纪律下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报酬。1968—1970年，畜牧业和林业生产下降了，68%的农产品和71%的工业品生产也都下降了。连革命统治下效益最高的捕鱼业的产量也有减无增。

到1970年，古巴经济增长的情况很凄惨。7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共出现了两次经济衰退，其间的年度经济也只适度复苏。生活是简朴的，各级都出现了不满情绪。卡斯特罗总理亲自对灾难承担责任并在70年代头5年改变了经济政策。这是卡斯特罗的功劳。

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使古巴的经济松了一口气：这就是世界糖市场的情况。从1970年到1974年，自由世界市场的糖价从每年平均上涨3.68美分发展到每年平均上涨29.6美分。糖的出口仍占古巴出口总额的大约4/5，因此糖价的大大上升对于70年代头5年古巴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作用。政府采取行动来改革国内的经济组织，采用了苏联经济模式并使之适应本国情况。70年代初，重新有了集中的宏观经济计划，使古巴能在1975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过于乐观，许多指标没有完成（增长率低于计划的1/3），因为这项计划所估计的世界糖价高于70年代末的实际糖价。但这项计划比政府过去所制订的历次计划都要符合实际。且又一次制订了中央

预算，并从1977年起执行。重新实行了财政核算和审计工作。重新强调物质刺激，在货币、物价和工资政策方面的多项改革力图更准确地适应供求关系。苏联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源来帮助古巴经济克服困难。

说明60年代古巴经济组织多么糟糕的一个事实是，70年代初古巴所制订的许多新措施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得以实行。引起拖延的一个原因是，有人反对古巴经济的自由化。到了80年代初，农民获准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完成国家定额后所剩余的产品。在市场上，价格没有规定，交易在私人之间进行。在手工业市场上和在业余服务工作及周末服务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终于可以不通过官僚机构就找到一个管道工或者买点西红柿了。国营企业直接雇用合同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而无需完全依靠中央劳动机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逐步采用和实行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使得经理们有更大的自主和权威。这项制度允许每一家企业保留一些利润以在年底分给职工，并用来改善企业和劳动条件。工资差别、加班费和奖金在劳工刺激中开始起主要作用。提高工作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都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

70年代头5年，经济令人吃惊地繁荣了。这几年古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上经济效益最高的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但在70年代后5年，除1978年外，经济停滞了。1979年年中出现了革命政权建立以来的第三次较大范围的严重经济衰退，造成了1980年突然出现大规模移民，正如60年代末的长期衰退曾经引起那几年移民潮增长一样。

80年代初经济效益低下，使得古巴在偿还外债方面受到压力。虽然古巴不是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主要债务国，但1982年它的硬通货外债已达大约30亿美元。古巴的对外贸易更加集中于苏联，能偿还硬通货外债的古巴出口收人减少了。随后古巴与欧洲、阿拉伯国家和日本银行家所进行的谈判导致了这样一些政策，根

据这些政策，古巴为了完成它的偿债义务，80年代初降低了消费水平。

这两个时期在经济效益方面的一个主要差别是糖价。1970—1974年，糖价稳步上升，但到了70年代后5年又下降到平均每磅大约8美分。世界粮价在1980年末和1981年初曾短期上升以后，接着便下降到每磅6—8美分。而且，1981年，苏联因本国经济困难而将古巴出口到苏联的食糖价格削减了1/6，与此同时，继续提高它向古巴出口的产品价格。1982年，古巴与苏联的贸易条件比1975年低1/3。1982年时，古巴不得不与市场经济债务人重新商定偿债期。在此后的年代里，苏联恢复了付给古巴的糖价，防止了一次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古巴与苏联的贸易条件仍大大低于7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水平。糖价仍然与古巴经济效益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说明这个商品在古巴经济中一直起着中心作用。

70年代初进行的某些经济改革迅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但到70年代末，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更难了。198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古巴还“缺少完整的全国性经济发展计划”。他还说，新的管理体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未能贯彻始终并加以完善。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一直缺乏必要的创造性来使这种体制适应于我国的条件——这个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别国引进的。”甚至连“预算也继续不起作用。预算非但不能控制支出，反而加速了支出”。[1]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斯特罗于1986年4月发起了一个他称之为“纠偏”的进程。古巴是80年代末为了增加生产和提高效率而从市场机制后退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卡斯特罗谴责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成了学徒资本家。他严厉谴责“万恶的金钱”的诱惑力。为了消灭市场的罪恶，古巴政府于1986年5月封闭了曾于

① 《格拉玛每周评论》，1986年2月16日，附刊第6、7页。

1986 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农贸市场。还采取了其他反市场的措施。卡斯特罗严厉谴责依靠奖金来刺激工人的行为，再一次呼吁依靠精神刺激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1986—1987 年，古巴经济陷入衰退，这一事实部分地说明古巴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痕迹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是无效的。但是，还有另一个长期性的问题。70 年代的后 5 年，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非洲战争。古巴用动员后备役军人的办法派出了大批军队去海外作战。在这些战争处于最高潮时以及在美国入侵时，古巴在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军队、古巴在安哥拉的大约 4/5 的军队以及在格林纳达的几乎全部古巴人都是后备役军人。古巴为了赢得这些战争，而且为了在海外的军事作用表现得好，从国内经济岗位上抽调了一些最优秀的经理、技术员和工人到海外参军，这使得 70 年代末以来国内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效率都下降了。虽然 80 年代中期古巴在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大大减少，但到 80 年代末仍然有 3 万多古巴军队在安哥拉。

古巴革命政府从上台以来一直力图使经济增长，但除 70 年代初期经济有所恢复以外，这些政策都没有成功。60 年代，经济毫无增长。1975 年以后，许多经济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古巴的经济只取得过小小的实际增长，却遇到了一次重大的衰退和严重的国际债务问题。生产结构的多样化只取得了很少一点成就，仍然以蔗糖为主，蔗糖的收入占出口收入的大约 4/5。不过，政府执行了一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该战略 70 年代逐步发展，80 年代继续发展——大部分主要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战略。古巴的工厂现在能够提供较多的轻工业和中型工业的产品了。但是效率低、质量差仍然是一个问题，制糖业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效益一直很低（蛋类、柑桔类水果等少数例外）。古巴没有能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的国际经济关系多样化；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产品（仍然是甘蔗）和一个国家（现在是苏联）。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倾向是继续依赖这二者。

另一方面，政府在再分配方面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给人以深刻印象。它有着坚强的、而且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决心来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提供充分就业，甚至不惜以就业不足和低效率为代价（虽然70年代又出现了隐性失业，1979年达到5.4%)。同样，通过配给制度使得人们能以低价购买到基本商品，甚至以补贴消费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政府在60年代的各项政策引人注目地减少了社会各阶级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农村贫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突出的。70年代和80年代使用物质刺激的倾向导致了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等刺激了良好的管理和工人的效益。但不管怎样，古巴领导人仍然致力于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拿拉丁美洲的标准来衡量，古巴仍然是一个非常平均主义的国家。

古巴革命政权上台以后，社会动向出现了一个人口方面的变化。60年代初出现了“婴儿出生高潮”，婴儿净出生率比50年代末增加了大约1/3。接着，从1960—1968年，婴儿净出生率保持在大约每1000人30个婴儿。出现婴儿出生高潮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再分配政策使低收人古巴人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农村地区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工资提高了，公开失业消灭了，房租降低了，保证人们能享受到基本必需品，包括受教育和医疗卫生。这一切为全体古巴人民提供了“安身之处”。与此同时，政府开展了一个提倡结婚的运动，包括宣布原已存在的许多未婚同居现象为合法。过去从美国进口的避孕药具由于美国的贸易禁运而断绝了来源。移居国外使得一些家庭破裂，那些留在古巴的家庭成员为新建家庭创造了条件。医生和其他医疗卫生人员的移居国外，减少了作人工流产的机会。革命前就存在的限制人工流产的法律现在执行得更严格了。

婴儿出生高潮所产生的最初影响为移民所掩盖了。60年代初，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但是，在导弹危机时，移民的第一次浪潮结束，人口增长率达到2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年增长2.6%以上。婴儿出生高潮开始对小学体制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

响。小学必须在一夜之间扩大，对于年轻人提供的其他社会服务设施也有影响。政府居然能够提供这些服务，令人吃惊地说明政府是决心支持年轻人的，甚至在经济衰退的年份里也是如此。

婴儿出生高潮以后出现了婴儿出生低潮。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婴儿净出生率减少了一半。到70年代末，人口增长率为60年代中期的1/3。由于大规模移居国外，1980年人口总数减少了。古巴的年龄金字塔表明，15—19岁的人口（他们是婴儿出生高潮时出生的）比20—24岁的人口（他们是革命前夕出生的）多50%。由于有了婴儿出生高潮，古巴政府得以经常将3.5万名年轻人驻扎在海外部队中。5岁以下的人口（婴儿出生低潮时出生的）略少于20—24岁的人口，比15—19岁的人口少1/3。婴儿出生低潮同婴儿出生高潮一样对社会服务有许多影响。最初的一个影响是古巴可以出口小学教师到海外去执行外援任务了。从长远来看，婴儿出生低潮可能会使古巴在90年代难以在海外驻扎部队。

古巴的生育率在革命前已逐步下降。生育率的再次下降大概与社会的高度现代化有关。但70年代生育率如此大规模地、如此突然地下降，不能仅仅从长远的进程来解释。新的生育率下降的现象是在6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急剧恶化而出现的。但在70年代头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在7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时期，这种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一直没有变化。经济效益低必然是生育下降的一个原因，但并非唯一的原因。1964年，放松了对于人工流产的限制。人工流产成为合法的和容易办到的了。从60年代起，古巴的人工流产率（即每1000个孕妇作人工流产的数目）逐步增加，到70年代末，2/5的孕妇作了人工流产。古巴的人工流产率仅低于保加利亚、日本和苏联。人工流产大概成了古巴主要的节制生育的办法。从1968—1978年，人工流产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婴儿活着生下来的数目下降了2/5。此外，国家保健部门还提供其他避孕手段，这也是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原因。60年代结婚人数大大增加以后，70年代中期和末期，结婚率稳定了下来。但离婚率比革命

前增加了4倍。在整个70年代，大约有1/3的夫妻离婚。离婚率的提高，很可能是出生率降低的原因之一。持续存在的住房严重不足也使得人们不愿结婚，因为结婚后双方都不愿与姻亲住在一起，即使住在一起，也很少有地方给孩子住。70年代末有5万古巴人长期留居海外，也是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原因。

据1981年古巴国家人口调查，共有970.6369万人居住在古巴，其中1/5住在哈瓦那城——比1970年的比例略低。古巴已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1953—1970年城市化的速度缓慢，由57%提高到60%，但1981年一跃而为69%。除首都外，其他地方的城市化程度也提高了。从1970年到1981年，哈瓦那的人口增加了7.7%，维多利亚德拉斯图纳斯的人口增加了58%，奥尔金和巴亚莫的人口都增加了40%以上。在同一时期，另外7个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24%强。70年代，拥有9.5万或9.5万以上人口的小城市增加了一倍多。总之，古巴的城市化大部分出现在首都哈瓦那以外的地区。这在拉丁美洲是罕见的。

在革命政权统治下，妇女的地位大大改变了。前面已提到，妇女比以前更容易结婚、离婚和作人工流产了。60年代，妇女生孩子的机会比70年代多得多。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增加了一倍。70年代末，妇女占劳动力的30%。但这个比例是逐步增加的，并不是在革命以后突然增加的。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这反映了正在发展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虽然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起了促进作用。与此相反，移居美国的古巴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比在古巴国内高得多，这个比例的增长速度也比在古巴国内快得多。1970年，在美国，古巴血统的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古巴国内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一倍。大部分在美国的古巴妇女都参加了工作。在古巴国内，只有1/4的妇女参加工作。

古巴政府的某些政策阻碍妇女参加工作。政府把某些职业专

门留给男子，理由是如果妇女从事这些职业，其健康会受到损害，虽然它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婴儿出生高潮"时期出生的年轻工人迅速地进入了劳动力队伍，政府力图在劳动力中保持一个固定的男女比例，而不是设法提高妇女所占的比例。

在教育系统，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过去，男子占绝对优势的大学某些专业里，如医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妇女所占比例与妇女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同。妇女在工程学和农学中所占比例仍低于妇女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妇女在中小学教员中所占比例以及在文史哲学中所占比例仍然高于妇女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变化。政府强行限制某些专科学校——如医学院——的女生人数，理由是妇女比男子更容易半途而废，而且女医生不像男医生那样适于在军队里工作。

妇女在参政方面相当落后。1980 年和 1986 年当选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妇女只占 13%。在党的书记处和政府最高机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中，均没有妇女。到 1986 年，才有第一位妇女进入党的政治局。她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夫人、全国妇联主席比尔马·埃斯平。在中层领导人中，妇女所占比例也低于妇女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调查结果表明，家庭中存在着有关夫妻关系的陈规陋习（虽然 70 年代中期政府通过了一项家庭法，以图使配偶双方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在工作场所和在政治中也是如此。妇女和男子都遵照传统的有关妇女地位的观念行事。

对于革命后的种族关系，很少研究。古巴黑人和黑白混血人在贫民中所占比例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而政府的政策主要使穷人受益，因此这些政策使黑人受益。现有的材料表明黑人比白人更加支持政府。1980 年以前，黑人在古巴流亡者中所占比例大大低于黑人在古巴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 1980 年出国的移民潮中包括城市黑人，他们在移民中所占比例相当于黑人的城市

人口比例。古巴政府关闭了革命前就存在的少数几家合法的种族歧视酒吧，但是影响不大。古巴政府企图用古巴有非洲传统这个象征来说明古巴在非洲国家的行动是正义的。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鸿沟可能并没有很大改变。例如，虽然全体古巴人的卫生水平提高了，而黑人发病率高（特别是危害穷人的寄生虫病）这一现象仍然继续存在。白人和黑人在就医的条件方面所存在的差距没有很大变化，虽然大部分古巴人在这方面无疑都是受益的。

也许因为50年代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当中白人所占比例大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且他们后来继续在高层掌权，所以黑人在政府和党的高层机构中所占比例仍大大低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从革命前——巴蒂斯塔是古巴第一位黑白混血人总统——到1986年党的代表大会时为止，黑人的执政比例没有发生变化。1986年党的代表大会时，卡斯特罗总统宣布，党的政策是要增加黑人在党的最高机构中的比例。根据1981年人口普查，全国居民有1/3是黑人，而1986年党的中央委员会中黑人仅占1/5。只是在市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当选的黑人数量才可与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称。

既然政府声称已经解决种族问题，如果有人争辩说种族问题哪怕还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也被认为是搞颠覆活动。政府查禁了革命前曾经存在的黑人知识分子与政客社团。一些坚持认为在古巴社会中仍然存在严重种族问题或者认为在非洲裔古巴人中存在明显的文化问题的人遭到了流放。

古巴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是革命政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政府大大地减少了文盲（据1970年人口普查，人口中文盲率已降低到12.9％，1979年下降到5.6％），1961年开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这一活动后来通过广泛的成年人教育体制继续了下来。政府因此推动了古巴的社会现代化。政府没收了所有私

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经历了60年代的困难以后，政府实际上已普及了小学教育。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水平在1964年劳工普查时仅仅是识字，到1974年劳工普查时已提高到小学6年级水平，1979年大规模人口调查时已提高到8年级水平。1979年全国2/5的居民念完了9年级，2/3的居民念完了6年级。

小学教育的繁荣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有意识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婴儿出生高潮"所带来的问题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到70年代末，由于婴儿出生率下降，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也开始下降。1974—1975年（这是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最高的一年）到1980—1981年，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包括幼儿园）下降了20%。特别灵活的学校制度使得初中在校学生人数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21%，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427%。70年代，每年有40万到70万人在成人学校学习。

古巴的小学教育制度缩小了城乡之间受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差别，但没有消灭这种差别。古巴还有一个慷慨的奖学金计划，有助于缩小小学后受教育机会的阶级差别。60年代，古巴学校中有若干严重的质量问题——辍学率高、教员受训水平差，师生课堂表现不好。虽然这些问题有的还没有解决，但70年代质的进步可与60年代继续下来的量的巨大成就相媲美。这些成就应归功于许多人，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他们对于教育的关心是古巴政府忠于教育事业的一个主要特点。长期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教育部长的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特别值得提一下。他巧妙地安排了从"婴儿出生高潮"到"婴儿出生低潮"的转变，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在校学生人数，并明显地提高了教育质量，虽然他承认还存在一些问题。

高等教育有着一部更加曲折的历史。60年代，大学入学人数减少，直到70年代才增加。由于政治原因而解雇和移民的影响，教师队伍受到很大损失。大部分学生夜间上课，教育的质量和教员的经验参差不齐，因为许多教员工作太累，教员的来源有限，学

生太多。大学分科很不平衡，鼓励工科，不鼓励人文学科。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被忽视了。仅有的一点研究也回避具有政治意义的古巴国内的当前问题，但从1959年起，在史学方面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其中最光辉的例子是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写的18世纪和19世纪蔗糖厂三部曲（《天才》）。好的历史书一般只写到1935年左右为止。在这以后开始的巴蒂斯塔与共产党之间令人难堪的联盟便没有人写了。

大学是按一个广泛的“产业模式”组织起来的，按照等级制度训练专业人才。它们不强调发展文科以及对重大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问题进行积极的学术批评的可能性。60年代和70年代，古巴许多主要作家住在海外（其中包括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塞韦罗·萨杜伊、雷纳尔多·阿雷纳斯、埃韦尔托·帕迪利亚、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和安东尼奥·贝尼特斯·罗雷），或者已经去世（阿莱霍·卡彭铁尔和何塞·莱萨马·利马）。政治标准是决定录取学生的因素之一，连那些非政治性专业（如医科）也是如此，虽然各大学和科学院都强调应用技术研究。医学研究以及有关甘蔗种植和加工的研究在革命前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是取得科学成就的主要领域。

革命前，古巴的识字率就很高（大约占成年人的3/4）。相对来说，中小学的入学人数也很高。但在20世纪中期就停滞不前了。革命政府把20年代放下了的教育现代化任务拾了起来，使得教育革命制度化。理所当然，这是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应当引为自豪的一件事。这样坚持不懈地忠于教育事业，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古巴的教师们很称职地为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也为三大洲普通学生的需要服务。但古巴的教育系统对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不同政见者是不欢迎的。它限制言论自由，镇压了许多批评者。因此，教育和文化的成果被削弱了。古巴这个可悲的损失是一个反面教员，使人看到利用政府的权力去限制人类才能的充分发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和工作也取得了令人赞誉的成绩。政府上台后不久即确认医疗卫生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扩大了在革命前即已存在的免费医疗。在农村，很早就取得了进展，改善了医疗卫生的实施方法，缩短了城乡在这方面的差距。但在60年代，医疗卫生的总的实施情况变得比革命前十分高度发展的保健制度落后了。这一倾向主要是由于大城市医疗卫生情况变差了，而大部分人民居住在大城市。许多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离开了祖国。他们原来都集中在哈瓦那。因此首都哈瓦那所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扰乱了现有的医疗服务和医疗机构。医药生产的效率低，与美国关系的中断导致了医药供应的短缺，对于有条件购买进口药物的高收入城市消费者的影响尤其大。进行了医务人员紧急培训来弥补流亡者所造成的空缺，但培训的质量不平衡。60年代的组织工作失调对医疗系统也像对其他系统一样影响很大。

60年代初，婴儿死亡率和全国人口死亡率都提高了。婴儿死亡率（即每1000个一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959年的35‰上升到1969年的47‰。在这几年里，各种主要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了。政府用于城市医疗卫生的预算不稳定，钱被用于农村了。截至70年代初为止，古巴医疗卫生的状况也和古巴经济一样，在不同社会阶级和不同地理区域之间再分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绝对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到70年代中期，部分地由于前一个时期经济状况好转，医疗卫生系统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81年人口普查时，婴儿死亡率已下降到18.5‰。各种严重疾病的发病率也降低了。但必须记住，在革命前夕，古巴就已经有一个相当成熟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1981年8项主要致死原因中有6项与1958年完全相同。它们是：心脏病、癌症、中枢神经疾病、流感和肺炎、意外事故、儿童早期疾病。1958年，急性腹泻、谋杀、结核病、肾炎属于10大死因。到1981年，它们已为自杀、糖尿病、先天性畸形和呼吸道疾病所代替。这些变化使古巴更接近

一个工业国家的典型的卫生情况。这一点从古巴长期以来医疗卫生现代化的情况即可预见到。

80年代初，古巴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最重大的成就仍然是缩小社会各阶级之间和各地区之间在享受医疗卫生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哈瓦那与古巴东部之间的差距缩小了。60年代的缺点克服了，健康水平确实提高了，把50年代已经是良好的、然而是不足的水平提高了。古巴把它的有才能的医务人员派到世界上36个国家。其中有些项目是向某些国家的政府出售医疗服务，为古巴的跨国国营企业赢得外汇。这些项目大部分是向受援国免费提供的援助。

革命政府在住房建筑方面效益不高，这是由于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生产不足、效率低、组织紊乱。政府在分配建筑物资时，没有优先满足居民的住房需要。政府在这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建造医院、学校和军事设施以及派遣某些最好的建筑队到海外去。

革命前，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当时古巴的人口为30年后的一半），古巴每年几乎要盖2.7万套住房。60年代初，每年只盖1.7万套住房。在60年代末那个激进时期，住房盖得很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年）每年只盖1.6万套住房。70年代末的倾向是，住房建设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把更多的建筑工人派往国外，古巴的军队也扩大了。1973年，古巴盖了将近2.1万套住房（这是1959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但1980年，盖了还不到1.5万套住房。

由于移民出国，住房状况得到了某些缓和。从1959年到1975年，因移民出国，平均每年腾出9300套住房。这些年间，平均每年建造1.18万套住房。这就是说，每年有1/3新申请住房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革命前所盖的住房有许多已经破旧不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成千套住房由于年久失修而倒塌。80年代古巴面临着可怕的住房问题。住房不足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拥挤不堪，是古巴离婚率高和生育率迅速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和政府

古巴革命政治的中心人物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领导一直具有非凡的魅力。这就是说，他依靠人们的一种信念，相信他不是靠追随者们“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权威或某种“历史力量”所“选出来的”。他依靠古巴公民都具有的这种信念，这种使命感是卡斯特罗许多公开言论中的一个主题。他因1953年7月26日攻打蒙卡达兵营而受审时的辩护词经过编辑后发表了。他在这个辩护词的最后一句话中第一次公布了关于这种信念的重要言论。他说：“判罪吧、我不在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① 历史像上帝一样选择了这位革命领袖来同他的追随者一起行动，并为他们而行动。当他公开谈到60年代末古巴经济崩溃时，卡斯特罗发表了也许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一次讲话。他说：“如果我们有一点价值，这一点价值就是我们为一种与人民有联系的思想和事业而服务。”② 历史选择了这位领袖作为这种事业和这种思想的化身来进行统治。卡斯特罗在他的同事中和许多普通公民中的影响，是当代古巴历史中一个最惊人的政治事实。

卡斯特罗的政治风格强调积极参与而不强调理论研究。它强调自我纪律和自觉行动的力量。它反对像革命前的共产党人那样，要等待客观条件成熟才去发动革命。当时卡斯特罗的力量一跃而夺取了政权。这种风格也反对那些认为1970年生产1000万吨糖的战略是发疯的经济学家。主观意志是革命领导人用以在战争、政治和经济中克服客观障碍的根本手段。一个先锋队，社会的中坚分子，必须领导人民，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只有为了最美好的目标才值得尽最大努力去奋斗。看来无法实现的目标也值

---

① 见《革命斗争，1947—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选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年），第1卷，罗兰多·博纳切亚和内尔松·P·巴尔德斯合编英文版。

② 《格拉玛每周评论》，1970年8月2日，第6页。

得去为之奋斗，因为男男女女的革命觉悟显然是夺取胜利的主要依靠。一个积极的、有决心的先锋队要为争取未来而奋斗，而且会征服未来。

对于政治的这种态度，使古巴革命夺取了政权，并引导革命政府进行了若干成功的活动，从非洲海角战场上的胜利到扫除文盲。它也导致了一些灾难和悲剧，其中60年代末的经济试验和社会试验是最典型的例子。另外还有许多较小的项目也是灾难。卡斯特罗一时心血来潮或闪过什么念头，下面的人便热情地、忠心耿耿地、毫无合理目的地响应，这种领导作风不能容忍批评者和不同政见者，甚至不能容忍那些稍有不合常规的人，这种统治作风把那些认为伟大领袖的政策可能有错的假设统统反掉——直到灾难临头。

革命政权之所以合法，不仅由于领导人的特殊魅力，而且由于他的表现。古巴的新领导人从他们1959年夺取政权的那一天起就说他们把古巴从一个恐怖主义的、腐化的、滥用权力的、非法的政治制度中解救出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卓越讲演才能——时而温和，时而凶猛，对他的敌人进行讽刺和侮辱，在专业人员面前富于思考、充满感情、学识渊博、思路精细，在与学生对话时朴素、诙谐、温和——这一切成了革命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他指挥着古巴在1959年时就已经十分发达的广播和电视。他像一个革命先知那样不断在全国各地走动，感动人民，教育人民，锻炼人民去斗争：为了新的生活、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了反对已知和未知的敌人而奋斗。

政府不断强调要进行有利于低收入人民的再分配，在教育和卫生领域政策尤其执行得好。甚至在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经济增长战略失败时，他们也强调在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社会裂缝比在古巴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在60年代初的艰苦日子里，革命政权就是依靠这一点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的。民族主义是合法性的另一个依据，它肯定古巴民族的文化、

政治和历史的完整性，它强调全体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强调某一部分人民——如无产阶级——的合法性。通过反对美国政府的斗争，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的力量。阶级敌人是“蛀虫”，外国敌人是“帝国主义者”。

从1959年到1976年，没有举行全国选举，也没有其他有效的组织途径可供人们倾诉苦情和提出意见，统治的权利通过领导人的非凡魅力、政治报告，再分配和民族主义这些支柱得以行使。革命本身以及革命最高领导人自称是合法的，虽然这一点肯定没有被普遍接受。

1959年所接管的各群众组织以及1960—1961年所成立的群众组织从接管和成立时起就动员居民从政治上支持政府并防止国内的敌人。它们基本上都响应集中的指令。但是到了70年代，它们表现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倾向。尤其是全国小农协会，它是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维护农民私人利益的强大的游说集团。它代表农民要求提高价格、放宽信贷和使市场更自由化，它还要求国家减少对农民土地的强迫没收。在60年代末的激进时期，这个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自主权实际上被取消了。大学生联合会于1967年12月—1971年期间被解散。在激进主义的最高潮时期，不容忍任何像大学生那样的自主性和不同政见。但是到了70年代，连保卫革命委员会也变了，虽然它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持“革命警惕”，但它也担任社区自我服务的任务。各群众组织参加领导人所发起的大部分运动，包括有效的和无效的运动。其中完成得最成功的任务是减少文盲和通过群众性的防疫运动来控制疾病。保卫革命委员会在这两项工作中也像在政治控制中一样做得很有成效。古巴妇女联合会在大大减少妓女和对以前的妓女进行再教育并引导她们参加新的生活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60年代末，工会的作用是支持管理当局。工会根据命令为增加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为超额完成经济计划的指标、为在工人中

组织劳动竞赛以便完成官方规定的指标以及为降低成本而奋斗。要求工人超越狭隘的、暂时的利益（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为了人民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提倡劳工作出英勇的努力和响应精神鼓励。义务劳动成了无报酬加班加点的美化说法。1969年8月，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谴责"滥用加班加点，用加班加点骗人"，但他的呼声是孤独的，他的官衔很大，他的权力却很小。[①] 1970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作出了对这一时期工会的最恰当的评价。他说："不幸的是，最近两年来，我们的工人组织一直坐在后排——这不是由于工人组织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过错，而是由于我们的过错，由于党的过错，由于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过错。"[②]

到1970年下半年，工人们已经受够了。他们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罢工就是非法的。所以领导人把1970年的事件说成是"大规模旷工"。虽然明显是事先没有配合好，但在1970年8月和9月的不同日子里共有40万工人，也就是说1/5的工人不上工。在革命的摇篮奥连特省，1970年8月大部分农业工人不上工。1971年1月，1/5以上的农业工人仍然不上工，虽然当时正是新的甘蔗收割期。1970年秋天的地方工会选举，是1959年以来最自由、竞争性最强的一次，取消了对选举过程的许多限制。当时当选的将近3/4的地方劳工领导人都是第一次担任这种职务。70年代头5年开始实行的政策转变，部分地是对"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反应，这些变化迫使政府看到劳工已不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了。

随着70年代初劳工状况的改善，对工会的政治控制也重新建立了。1973年举行第13届劳工代表大会时，又使用了对候选名单

---

① 见《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总统在工业部干部学校的讲话》，载《思想评论，45》，1970年10月，第148页。

② 《格拉玛每周评论》，1970年10月4日，第2页。

无异议就鼓掌通过的办法来选举（而不是无记名投票）。参加劳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支持工会官僚，只有少数席位留给基层选出的代表。在1970年工会选举的全盛时期又重新强调了工会在保卫工人利益方面所应起的作用，但到1973年，更保守的态度又占了上风，工会可以对错误的“具体”事情提出具体的批评，但必须避免比这更自主的政治行为。

70年代末，各群众组织的会员都趋于稳定。各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占成年居民的4/5，古巴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占成年妇女的4/5。截至70年代中期为止，有关居民参加上述这些组织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比例一直比较稳定，此后会员人数的增加大多是由于人口统计的变化而出现的。显然，大约有1/5的成年古巴人不愿意同任何群众组织发生关系，这些组织也不愿同他们发生关系。

80年代，参加一个群众组织是在古巴生活顺利的先决条件。负责人的职位只向那些参加一个或几个群众组织从而参加革命进程的人开放。因此，很可能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并不支持现政权。他们之所以参加这些组织，是为了使生活轻松些。80年代的流亡者当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过去参加过这些组织。有些组织，特别是工会，负责分配某些物资，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先进分子的人才有权得到缝纫机、电冰箱和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也只有他们才能分到少有的住房，其他工人即使有钱也得不到这些东西。因此，群众组织控制着谁能过上美好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生活。

各群众组织以及其他政治和官僚机构都服从于党，这种关系是在1976年宪法中明文规定了的。1965年秋天，党的名称又改成古巴共产党。与此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布了组成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00名委员名单以及两个较小范围的机构即负责作出基本政治决定的政治局和负责执行这些决定的书记处。但总的来说，60年代党的影响一直是有限的。直到70年代初，才作了认真

的努力来使党成为一个有效的执政的共产党。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75 年 12 月召开。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是走向古巴共产党的统治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党纲和若干声明以及有关国家政策的各种主题的"论点"。它通过了国家新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于 1976 年经公民投票批准。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其他经济政策，更新了中央委员会，将委员人数扩大到 112 人，另有 12 名候补委员。赋予政治局和书记处以更多的权力和活动。到 70 年代初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开始时，古巴才可说是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执政的共产党。1980 年 12 月举行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86 年 2 月举行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都对前 5 年的各项政策进行回顾、作出评价和批准其中的大部分政策，更换党的各个主要机构的成员和批准五年内各项新的经济政策（包括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党员人数从 1926 年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下台时的大约 1.5 万人增加到 1965 年共产党建立时的 5 万人。到 1970 年，党员人数刚超过 10 万，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为 20 万多一点，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为 43.4143 万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为 52.3639 万人。1980 年，25 岁和 25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 9%是党员。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主要变化是军人所占比例下降了，正式中央委员中军人所占比例从 1965 年的 58%下降到 1986 年的 17%。正式中央委员中官员所占比例在 1980 年以前一直是大约 1/6，到 1986 年上升到 1/4 以上。正式中央委员中军人人数的下降是政客们的一个胜利。职业政客（包括各群众团体领导人）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从 1965 年的 17%上升到 1986 年的 41%。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这一状况说明越来越需要进行日常政府工作的技能。

60 年代，军人的影响很大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古巴迅速地、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起来是为了同美国作斗争。许多军事指挥员是 50 年代末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而且向国内反革命和在猪湾战争中成

功地进行了斗争。60年代，在劳尔·卡斯特罗领导下，军队是古巴社会中唯一真正很好组织起来的一部分人。军队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了党，在军官的指挥和领导下保持着政治权威。到70年代初，4/5的军官是党员。在60年代末的激进时期，军队具有建党所必须具备的常规和程序，而在非军事部门往往缺少这些东西。因此，政府往往依靠军队来执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任务。60年代，这些担任许多工作都很称职的"民间士兵"在党的各级队伍中都占优势地位。

70年代，随着党内平民成分的增加，许多"民间士兵"被调去从事民间任务，军队集中力量搞军事，取消了许多（不是全部）严格说来是非军事的活动。随着激进时期的结束，非军事的组织方式扩展了。但是，中央委员会中军人所占比例减少，并不是说曾经当过军官的个人被清洗出了中央委员会。与此相反，中央委员的更换是缓慢的。70年代和80年代离开军队到党和政府机关任职的中央委员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党的高层机构中，老共产党员（即人民社会党党员）所占比重一直是大约1/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略有降低（前人民社会党党员一般比其他领导人的年纪大一些，身体也比较差一些）。特别在60年代，由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派系分裂，人民社会党人在高层领导人中所占比例受到了影响。其中两次最引人注目的分裂是1962年取消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党的组织书记职务和1968年揭发了一个"小宗派"（也与埃斯卡兰特有联系）。60年代末，人民社会党的影响明显下降了。

1967年末，最高领导人在古巴共产党内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小宗派"。它主要是由那些认为政府和党在国内和国外的政策都错了的前人民社会党党员组成的，这个小宗派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为领导，它同苏联和东欧政府和党的官员们建立了联系。这个小宗派被揭发后，原来是中央委员的，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还有许多人被开除出党。小宗派的领导人因思想罪和结社罪而被投

入监牢，虽然他们并没有从事其他任何可以被解释为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对于古巴政策的分析最终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持有正确的见解而被惩罚的。

大部分前人民社会党党员——不管是不是小宗派成员——都支持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和与大多数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他们反对攻击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对游击运动持慎重态度，他们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需要物质刺激，并认为工会应在政治中起更突出的作用。小宗派的成员认为，仅仅依靠意志和主观估计是轻率的，必须了解古巴本国以及国外的情况。他们认为，集中计划、预算、金融的成本核算以及其它这类工具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对于用群众动员运动来代替这些常规政策持怀疑态度。小宗派要求更多地运用党的机构和其他政治团体，并使之制度化，支持重新实行选举并制订一部宪法。并非只有前人民社会党党员才具有这种信念，但他们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最明显的“派别”。70年代的政策变化相当一贯地遵循了这些人民社会党人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老牌政客们击败了他们早日的对手，而是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同事们被他们的明智观点说服了。

有些前人民社会党党员不像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那样，他们始终忠于菲德尔·卡斯特罗，70年代他们有着特别的影响。其中布拉斯·罗加和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是党的资历很深的两位领导人。罗加负责新宪法起草工作以及其他基本立法工作，并负责监督其执行。他对70年代的制度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罗德里格斯是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转变的学术设计师。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意见对于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对待艺术和文学的政策都有影响。

70年代对政府的改组、制度化和提高效益作出贡献的人还有：教育部长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武装部队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外贸部长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温

贝托·佩雷斯和内务部长塞尔希奥·德尔瓦列。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于1979—1980年的危机中被解除职务，他曾使古巴的经济关系多样化，并彻底打破了美国对古巴实行的经济禁运政策。温贝托·佩雷斯曾经吃力不讨好地向政府汇报了经济状况的基本真相，并从60年代的崩溃中把经济重新组织了起来，他曾力图使供需平衡，采用中央计划经济所常用的机制，刺激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设法降低成本，与此同时促使管理人员和工人更多地参与经济事务；经济效益不高是由于这项任务太艰巨而不是由于佩雷斯无能，但他还是在1985年被解除了职务，全面调整经济的任务交给了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对内务部长塞尔希奥·德尔瓦列的工作很难作出评价，他的责任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反对派并保持政治上的充分控制，有一件事他有功：他减少了60年代曾经存在的专制控制的残酷性。根据政府的官方数字，政治犯的人数从60年代中期的大约2万人下降到70年代中期的4000人。在德尔瓦列于1979—1980年危机中被撤职时，政治犯只剩下1000人。在德尔瓦列任职期间，拷打犯人的情况减少了，性质也变了。肉体上的拷打几乎绝迹，监狱的条件得到了改善，虽然偶尔还用心理办法进行刑讯逼供。警察开始遵守诉讼程序以保护被告的权利。在70年代末革新的法庭上，由于缺乏证据或由于违反诉讼程序而取消起诉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德尔瓦列任职的末期仍有许多国内安全措施应当受到批评。但是，他使得他的工作专业化了、加强了法制，减少了专断。

在70年代的头5年里，政府的组织有了重大的变化。1972年11月，部长会议被改组，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该执委会由总理和所有的副总理组成，他们每人负责监督好几个部。执行委员会成了政府的主要决策机关。1974年，在马坦萨斯（古巴的六个省之一）的地方政府里也进行了试验。根据1976年批准的宪法，这项程序在全国各地执行时因地而略异。

1976年的宪法规定成立一个有立法权的新的国民议会。从

1959 年到 1976 年，立法权是由部长会议行使的，国民议会选举国务委员会。国民议会闭会期间，由国务委员会行使其职能。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代替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成了国家元首。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不一样，古巴的宪法要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同一个人，这是典型的拉丁美洲模式。

1976 年对全国领土进行了新的政治划分和行政划分。原先从 19 世纪继承下来的 6 个省（比那尔德里奥省、哈瓦那省、马坦萨斯省、拉斯维利亚斯省、卡马圭省、奥连特省），现在改为 14 个省：比那尔德里奥、哈瓦那省、哈瓦那市、马坦萨斯、西恩富戈斯、比利亚、克拉拉、桑克蒂、斯皮里图斯、谢戈德阿维拉、卡马圭、拉斯图纳斯、格拉玛、奥尔金、古巴圣地亚哥和关塔那摩。松树岛不久改名为青年岛，成了一个特别市。原来属于各省的区被取消了，设立了 169 个市。最令人注目的变化是奥连特省划成了 4 个省，拉斯维利亚斯划成了三个省。

宪法还规定省级和市级政府官员由选举产生。1976 年在全国各地举行的选举是 1959 年以来的第一次。但唯一的直接选举是市议会代表的选举。市议会议员选举各市议会执行委员会、省议会代表和国民议会代表。各级议会代表都不是专职的，他们在担任代表期间仍保留原来的职业。国民议会在正常情况下每两年召开一次，每次开会两至三天。这种状况使得国民议会同政府和党组织比起来处于较弱的地位。

选举法以及宪法有关程序的某些规定，使得上述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有限。不可能自我提名参加选举，候选人只能在国民议会中用举手的办法提名；禁止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他们不能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只有共产党和政府可以进行选举活动和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使得持批评意见者不可能交换意见和情报；他们不能作为一个政党而结社，因为宪法只给予古巴共产党以结社权；由党和政府来发表候选人的传略，候选人本人对于传略的内容不

能否决；如果一个人违反党的意愿被提名为候选人而又要避免受到公开的污辱，唯一的办法是退出竞选。

这项选举法加强了党对高级职务的控制。省级代表、市和省级执委会委员以及国家级代表候选人名单都由党所领导的提名委员会拟定；国民议会代表中，党员占 9/10；而且，省级代表和国民议会代表并不是由参加市议会的人直接选出的；提名委员会可以提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人。1976 年选出的任期 5 年的国民议会代表中，将近 44.5%的人从来没有直接同选民见过面。

市、省和国民议会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它们的实际权力比人们阅读宪法时所得到的印象要小得多。国民议会中对可以用来控制执行机构的法案（如年度计划和预算）所进行的辩论都是例行公事，表决结果总是一致通过。在省级和市级，预算极端有限，中央级国家机关的权力却非常大，因此国民议会的权力很小。不过，国民议会对宏观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外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比较自由和有影响的辩论。在有关普通犯罪、环境保护和家庭立法等问题上，代表们对法案的内容有一些影响力。在地方一级，市议会代表的工作很像一个巡视官的工作。这些代表收集公民的意见，力图冲破官僚的障碍来改善政府为选民服务的工作。的确，政府官员接手去解决地方的需要——这是政治机器的标志——成了古巴政治参与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革命政权建立 15 年以后与革命政权建立头 15 年的一个基本区别是，现在鼓励公民提意见以纠正地方政府的错误和满足一些要求。在早些年代里，唯一被允许的政治参与方式是群众动员，公民的抗议很有限，而且时常受到压制。现在专制秩序已经比较制度化，政权便依靠比较巧妙的政策。在地方一级，现在允许——有时是鼓励——公民对具体问题提出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古巴现在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但专制约束手段在各级都限制着结社自由。不允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结社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抗议或批评。而且，即使在地方一级，对政府提出一般性或抽象的

批评，也是不受欢迎的。

在省级和国家一级，政治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的约束。从1960年春天起，所有新闻媒介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除偶尔发表读者来信以及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对地方问题提出具体批评外，新闻媒介对于政权的政策和活动给予坚决的（往往是干巴巴的）支持。在艺术和学术资料的出版方面，有着略多的言论自由，虽然也是有限的。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概括了古巴政权的文化政策，他说："属于革命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允许。反对革命的，任何东西都不允许。"① 凡是反对革命的资料都不许发表；虽然没有明确地批评古巴政权，但作者是知名的反对派，这种材料也不许发表；作者的行为被认为不合常规的和古巴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例如确实有或传说有同性恋行为），他们的作品命运也不可预测（同性恋者60年代末最受敌视，后来1980年又受到敌视）；但是那些在政治上支持革命的人或者其作品的主题与当前政治无关的人，能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

尤其是60年代，当时古巴并不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与苏联相反，当时在古巴有选择艺术和文学形式的自由。到了70年代，在展览会和出版物中，政府优先选择那些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作品，虽然某些抽象派的绘画仍然可以出版。政府对艺术家和学者的政策中一个麻烦的方面是：政策可能会变，作者认为是"保险的"，检查官不一定这样认为，因此，作者对作品进行自我检查（而不是更粗暴的措施）是艺术和学术的言论自由所受到的主要限制。

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阐述，是知识界一项历史较短的政治活动。马列主义的主要教材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演和本国的其他产品；不过，70年代以后作了较为认真的努力来传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这是通过党校和出版物、大学

---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知识分子言论》（哈瓦那，1961年）。

里的研究工作和著作以及新闻媒介来进行的，并作了比以前更为自觉的努力以使这些理论著作与当代古巴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全国主要的日报《格拉玛报》是古巴共产党的正式机关报，它是1965年秋天由七·二六运动的报纸《革命报》与人民社会党的报纸《今日消息报》合并而成的。《格拉玛报》经常用一版的篇幅来刊登关于理论和历史题材的文章。马列主义成了大学各科学生的必修课。

80年代开始时，古巴政权显然已巩固其统治。可以把它描写为一位无可争论的领袖领导下的协商性寡头政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掌握着中枢，这是1959年以来古巴政治的特点。但他把责任分给他的亲密同事，使得古巴政权具有寡头政治的性质，而不单单是个人政治。在党、国家和政府的上层机构里确立了一个杰出人物统治集团。1980年12月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6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同时是部长会议成员，政治局委员中有14人属于国务委员会（他们在国务委员会中占多数），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的14名委员中，有8人是政治局委员。到1986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时，他们认识到需要有更大的代表性。这时，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仍保留另一个重要的上层职位，但14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人还同时是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成员。但是，至今仍由二三十人占据着党、国家和政府的所有重要的高级职位。

现在存在着比较明确区分出来的第二梯队和比这更低的梯队，其中专业组织工作人员占优势，与最高领导层的情况相反，后者是抓全面的干部占优势。第二梯队和第二梯队以下的干部是专修技术经济问题、军事问题或党的问题的。他们之间联系较少。对于他们来说，从革命前遗留下来的历史派系分裂不那么重要。杰出人物之间有公平的机会进行辩论，他们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以及企业管理人员与中央各部门之间的经常关系来施加某种影响。

古巴的政治制度将很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最高层。虽然70年

代中期有过某种非集中化的倾向，但古巴仍然有着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大部分根本性决定都是由哈瓦那相当少数的人作出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身居高位已经将近 30 年。由于党、群众团体和经济决策机构以及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特别是中央计划部门的变化，古巴的权力关系已经变得比 70 年代更制度化了。

在政治金字塔的最底层，大约有 1/5 的成年人口受排斥，不能有效地参加群众团体，因为他们是政权的反对者——他们自己这样认为，当局也这样认为。对这些人的政治镇压的程度，70 年代明显地减轻了，但 1979 年末和 1980 年又有上升之势。内务部长塞尔希奥·德尔瓦列被他的前任拉米罗·巴尔德斯所取代。后者恢复了——虽然不是全面恢复——革命政权早期的严酷的国内安全政策。同一时期，司法部长、首席检查官和最高法院院长也都换了人。他们的过错是 70 年代初期执行警察权力和法庭权力时过于"宽大"。从一个专制政权的角度来看，他们太"自由化"了。1979 年和 1980 年，政府重新强调它在反对社会和政治上不同意见者方面有着最高的权威（巴尔德斯于 1985 年 12 月被解除内务部长职务，1986 年 2 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在中层一级，经理和厂长现在在工作单位解雇和雇用工人以及对工人采取纪律措施方面有了比以前更大的决定权。他们第一次得到了处置企业利润的权力——虽然是有限的权力。他们开始要求更大的权力。各群众团体表现出一些利益集团的特点，首先是全国小农协会代表农民私人进行游说活动，古巴妇女联合会这个妇女组织也进行这类活动，但不那么有力。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搞寡头政治的政治制度里，原已存在的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的人（如军队）掌握着越来越大份额的国家资源。他们被认为有理由这样做，不仅由于他们在 70 年代后 5 年要执行"国际主义"任务，而且因为 80 年代美国对古巴进行新的威胁。

60 年代革命的效果之一是，打破了社会阶级出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过去有权力的人当中，许多人已经死了，或被关押了，或

者移居国外了。新近获得权力的人当中，许多是出身贫寒的。60年代初，革命令人注目地促进了杰出人物的活动。但到了8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权力地位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革命统治制度化以后大大减少了杰出人物的活动。1959年夺取政权时革命领导人还十分年轻——只是20多岁或30岁刚出头。现在他们已经老了，但他们的头衔还很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每年长一岁，新增加的中央委员往往是他们的同辈人，有着同样的经历，很少有真正的更新。

统治制度化以后，寡头政治和等级制度加强了。不过，也制订了更多的有效的协商手段。过去，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表一篇鼓动性的讲话，听众举手，便是唯一的协商手段。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地方各级和在国家一级，特别是在权力机构的中层和最上层，在实行一项新政策前，往往比以前作出更加系统的努力来同可能受新政策影响的人协商。协商成了各有关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途径，虽然对于广大居民来说，协商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这种协商有助于减少这个专制政权还保留着的专制特点。

卡斯特罗总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在革命中绝不可忽视对于秩序的要求。"① 他概括了他的政府对于1980年混乱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是：经济危机、政治反对派和镇压以及大规模移居国外。他发出的信号说明领导人认为政治层次和加强秩序更加重要了。今后若干年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在革命中加强秩序的要求是否与在革命中进行革命的口号相矛盾，或者盖过了甚至取消了后一口号——这是60年代末的伟大口号。对于许多古巴人来说，50年代末的梦想曾经使革命成为一篇民族史诗。现在越来越多地划分政治层次和社会层次，这些梦想还能实现吗？未来的古巴会更多地响应秩序呢还是更多地响应革命？

---

① 《格拉玛每周评论》，1980年12月28日，第13页。

国际关系

1962年导弹危机解决后，华盛顿抵制了同古巴的一切经济关系，并企图得到别国政府的支持以扼杀古巴的经济，从而推翻古巴政府。这时古巴政府对于苏联会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义务尚捉摸不透，因此制订了一项维护自己利益的全球外交政策。为了使古巴革命政权得以生存——这是古巴领导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必须实行一项既是全球性的、又是积极的外交政策。古巴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能干的外交队伍，他们精于外交、国际、经济、情报与军事。古巴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力图利用外交政策来取得古巴进行社会改造和经济改造所需要的资源。在这两种优先考虑的关系中，同苏联的关系是中心，与此同时，哈瓦那力图与全世界尽可能多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美国政府想把封锁强加于古巴，古巴的这项政策就是为了冲破美国这种企图。为此目的，古巴愿意同非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另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是扩大古巴在国际左派运动中的影响，不管对方是否正式组织为共产党。古巴的领导人认为他们领导了一场真正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马列主义在古巴已得到确立，不像大部分东欧国家那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占领那些国家的副产品。而且，这场土生土长的加勒比革命，不是老牌共产党领导的。古巴革命者认为他们对于第三世界的革命应当如何产生和如何向马列主义演变有着某些根本的远见；总之，对于如何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支持革命，他们可以教给苏联人一点东西。

古巴领导人所感兴趣的，不仅是他们的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去促进革命。在一个拥有许多友好的、反帝的革命政府的世界里，古巴的未来才会更安全些。而且，革命正处在历史的刀锋上，未来属于那些正确分析历史并采取恰当行动的人。仅仅任凭历史自行发展是不够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正是犯了这个错误），人民必须创造自己的历史——即使他们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

做，革命者有责任去进行革命。但是，这个立场往往很难同尽可能广泛的各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这种需要协调起来。

6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制订了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它常常与苏联发生矛盾。古巴有力地支持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古巴将物质援助给予大部分中美洲国家和安第斯国家的革命者和在非洲与葡萄牙帝国作斗争的人以及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和北越的友好革命政府。1966年1月，在古巴举行了一次三大洲会议，会上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OSPAAL）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这两个组织都以哈瓦那为基地并由古巴人担任主管，都支持革命运动。古巴领导人尖锐地批评那些不进行武装斗争以争取革命胜利的人。他们指责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大部分拉美共产党谨小慎微——如果不说他们是胆小鬼的话。

卡斯特罗宣称，如果武装斗争是必由之路，那么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委内瑞拉共产党1967年企图结束委内瑞拉的游击战并重新加入正常的政治活动便是背叛。决心搞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但这还不够。有些人拒绝遵循古巴的政策（如危地马拉的革命者容·索萨）就被谴责为托洛茨基分子。古巴想要促进革命，但它更想要保持和扩大古巴对左派的影响。为了保持古巴的首要地位，古巴不惜在国际上和在特定的国家里分裂左派，甚至不惜破坏革命的胜利。这些政策使哈瓦那与别国政府发生了冲突，特别在拉丁美洲。当古巴被人发现它在积极支持委内瑞拉革命者时，委内瑞拉政府于1964年指责古巴进行侵略，并根据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里约条约）对古巴进行指控，对古巴采取了西半球集体制裁行动，要求所有签字国中断与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美国以及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除墨西哥外）都照此执行。

这些政策也给苏古关系带来冲突。苏古之间除了对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那些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上有冲突外，古巴的领导人，特别是工业部长、阿根廷出生的革命战争英雄埃内斯

托·切·格瓦拉批评苏联的超级大国行为，特别是它对古巴的援助太小气，把苏联和东欧的产品称为“废旧物”。古巴政府似乎轻蔑地认为它的苏联盟国是一个在国内和国外都不革命的国家。古巴人举起了被别人扔掉的革命旗帜。当古巴领导人把苏联及其盟国同古巴国内的小宗派联系起来时，古苏之间于1968年初爆发了一场对抗。苏联进行报复，放慢了向古巴交付石油产品的速度，迫使古巴革命政府对石油产品实行严格的配给。苏联还撤退了大部分技术顾问。经过苏古之间艰难的谈判以后，卡斯特罗总理于1968年夏天在电视讲话中出人意料地说，他准备支持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这时危机才克服，这是苏古关系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后来关系逐步改善，到70年代末在非洲战争中合作时达到最高峰。

60年代末，外交政策遇到了其他尖锐问题。切·格瓦拉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在玻利维亚内地阵亡——他们是到那里去发动一场革命的——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总的来说，通过武装斗争来推进革命的战略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失败了，其结果要么巩固了民主政权——如在委内瑞拉，要么巩固了专制王朝——如在尼加拉瓜。许诺变革的非暴力战略看来是更为可行的了：1968年末秘鲁一个左倾的军政府上台；1970年智利左派的一个广泛联盟赢得了总统选举。

60年代中期，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恶化了。虽然中古两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中国在60年代初期曾经给予古巴相当大的经济援助，但当中国领导人要求古巴在中苏争论中完全支持中国而且直接向古巴军事干部和党的干部提出这一要求时，两国关系就恶化了。60年代中期，两国的经济状况都恶化了，两国之间商业上的冲突加剧了。虽然贸易关系和其他关系从来没有完全中断，但这些关系都大大地减少了。1966年初以后，双边政治关系仍然不佳。

虽然有这些困难，但古巴在外交上最优先考虑的根本要求还

是实现了。革命政权生存下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古巴把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看作比支持革命更为重要的优先考虑的政策。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这种支持从60年代末起增加了——古巴政府是不可能继续执政的。1972年12月签订了一项重要协议，将苏联在1973年1月以前借给古巴的一切贷款的本息偿还期推迟到1986年1月，后来又将偿还期推迟到21世纪（事实上，到1986年偿还期又推迟了好几年）。苏联为了帮助古巴支付1973—1975年的双边贸易赤字而给古巴的贷款是无息的，本金从1986年才开始偿还。从1960年到1974年，苏联为了帮助古巴解决双边贸易赤字而给古巴的补贴总额将近38亿美元。在大部分年月里，苏联还给古巴向苏联出口的糖以价格补贴，60年代共补贴大约10亿美元。如果没有这种补贴，古巴的贸易赤字会更大。1976年，部分地是为了报答古巴在安哥拉作战勇敢和取得了成功，苏联又一次同意通过一个复杂的办法来补贴古巴糖的出口，规定古巴以5倍或6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将糖出售给苏联。此外，苏联还对它向古巴出售的石油和从古巴买进的镍给以价格补贴。1976年以后，苏联给予古巴的补贴一直很高，等于古巴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0以上。

可以预见，这些补贴加强了古苏贸易关系。1975年以前，古巴与苏联的贸易额平均占古巴对外贸易额的45%，80年代初超过了60%。东欧各国同意补贴古巴糖价以后，古巴与东欧各国的贸易也增加了。这些变化也是由于古巴同硬货币市场进行贸易有困难所造成的（古巴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大部分是内含价格的易货贸易）。此外，古巴在经济发展工程和派技术人员到苏联接受培训等方面得到苏联的援助，苏联还派出技术顾问驻在古巴。

苏联给古巴援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军援。苏联除向古巴提供军事保护以反对美国外，还把古巴军队建成了拉丁美洲第一流的军队。拉美地区没有任何军队在技术、经验和装备精良程度方面可与古巴的陆军和空军相比。古巴的海军是目前发展落后的唯一

军种。苏联给古巴的武器是免费的，古巴军队的装备和现代化 80 年代初达到最高峰，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古巴最终决定派遣 3.6 万人的军队在 1975—1976 年爆发的安哥拉内战中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从此开始了苏古军事合作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没有苏联的援助，古巴不可能参加这场胜利的战争，但从作战的时间表、军队部署的格局和主要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主要决定都是古巴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而不是苏联——作出的。1978 年 1 月，古巴应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请求——当时索马里入侵埃塞俄比亚，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大片领土——派遣数千人的古巴军队在苏联和东德军官的支持和率领下（加上古巴军官的领导）帮助击退了索马里的入侵。这次事件处理的方式说明是苏联和埃塞俄比亚带头制订和执行这些政策的。

总之，到 80 年代，苏古联盟很亲密也很复杂，照顾到联盟双方的明显的利益，尊重双方的独立，允许双方在与对方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制订自己的政策。没有苏联的支持，古巴不可能在非洲战争中赢得胜利。没有古巴的军队，苏联也不可能赢得胜利。

总的来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即使在 60 年代执行激进外交政策的年代里，古巴也与好几个西欧国家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佛朗哥西班牙的情况特别引人注目。从 1963 年到 1975 年佛朗哥去世为止，古巴一直与西班牙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经济关系，古巴不在西班牙推进革命，以便保持可贵的官方关系。古巴也与墨西哥政府保持着正确的外交关系，控制自己不去支持 1968—1971 年墨西哥左派的反政府示威。70 年代初，古巴稳定地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改善了关系。古巴的经济从 60 年代的破坏中恢复以后，古巴与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改善。1975 年，美洲各国对于古巴的集体政治制裁和经济制裁取消了，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古巴建立了贸易关系。在此后 5 年中，墨西哥和阿根廷与古巴的贸易变得重要了。连古巴与美国的

关系也开始改善。华盛顿投票赞成取消对古巴的集体制裁，并修改了美国的立法，以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政策中所埋藏着的第三国对古巴的制裁。1975年，福特政府与古巴政府举行了双边讨论，虽然这些会谈因安哥拉战争而中断，但卡特总统上台后不久又于1977年恢复了会谈，这些新的会谈导致了一系列小小的双边协议，而且两国彼此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外交“照顾利益办事处”，这些程序后来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不过1978年古巴参加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战争以后，古美双方关系又开始恶化起来。

70年代，古巴与非洲和亚洲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古巴于1961年加入了所谓的不结盟运动，虽然古巴与苏联结成越来越密切的军事同盟，但1979年于哈瓦那召开的不结盟运动首脑最高级会议上，古巴仍被选为该运动任期为三年的领袖。古巴部署了数千人参加的外援任务，对古巴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80年代初，大约有1.5万古巴人在大约36个国家执行海外文职任务，主要从事建筑、医疗卫生和教育工作。[①] 此外，古巴还有大约3.5万人的军队和军事顾问（包括安全专家）经常驻扎在大约24个国家（大部分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古巴海外驻军与古巴人口的比例，比在越南战争最高潮时期驻越美军与美国人口的比例还高。古巴在安哥拉大规模驻军的时间同美国在越南打仗的时间一样长。

古巴在外交政策上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新的主动行动，是从1977年起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起义分子反对阿纳斯塔西奥·

---

① 古巴应下列国家的要求执行了援外任务：智利、秘鲁、巴拿马、尼加拉瓜、牙买加、圭亚那、格林纳达、苏里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塞舌尔群岛、赞比亚、加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刚果、尼日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马达加斯加、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一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马里、南也门、叙利亚、伊拉克、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上述某些国家，如在利比亚和伊拉克，古巴人在那里服务是有报酬的，往往在建筑项目或医疗卫生项目中工作，古巴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很像跨国公司出售劳务，而不是外援。

实际存在该国的统治。这是这10年当中第一次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在美洲推进起义。1979年7月尼加拉瓜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与桑地诺政府和1979年3月在格林纳达上台的革命政府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哈瓦那派遣了好几千名文职和军职人员去尼加拉瓜，还派了好几百名去格林纳达。古巴自己承认，它还给萨尔瓦多的起义者提供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支持，特别是在1980年和1981年初。

尼加拉瓜的革命成功，是古巴革命以来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它吓坏了周围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就职以后又一次以武装侵略威胁古巴。古巴的后备役军人与1983年10月入侵格林纳达的美国军队英勇作战（虽然没有取得胜利）——这样的武装冲突是25年来的第一次。

许多在国际上积极活动的古巴人在非洲的战场上为了他们自己的祖国而英勇战斗并在三大洲援外项目中服务。与此同时，将近100万古巴人勇敢地同他们的政府决裂，摆脱了它的控制，移居国外。前面已经提到，第一次移民高潮发生在革命刚刚胜利以后，到1962年突然停止。第二次移民高潮从1965年底开始，到70年代初逐步减少。第三次移民高潮是1980年春天的一次令人注目的猛然增加。几千名古巴人冲入驻哈瓦那的秘鲁大使馆以后，古巴政府允许在美国的古巴籍美国人乘坐小船渡过佛罗里达海峡到马列尔港来接走朋友和亲戚，条件是他们必需愿意同时把被古巴政府称为“渣滓”的为数众多的少数人接到美国去。这些人是被国内保安部队围捕的或者是从古巴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判驱逐出境的。美国的迈阿密成了世界上除哈瓦那以外古巴居民最多的一个城市。

古巴革命是在加勒比海一个小岛上爆发的，现已逐渐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古巴外交政策在保证革命统治生存下来和争取到苏联的物资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对许多非洲国家政府产生了影响，但是在促使美洲国家的造反派成为革命政府方面却

不太成功。它的领导人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各国的政治家不能不关注它的政策；它的人民遍布世界各地。由于它所关心的事务和执行的政策对于它在许多国家中的千百万朋友和敌人有重大关系，所以古巴革命的舞台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了。

第11章

1930年以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

特鲁希略时代（1930—1961年）

1930年2月23日，多米尼加共和国奥拉西奥·巴斯克斯总统的政府被陆军总司令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将军领导的一场政变所推翻。不同于19世纪期间和20世纪初期考迪罗领导的其他军事起义，这次政变标志着与传统的政治秩序的最后决裂。多米尼加人民被迫屈从于持续31年之久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在这个期间，独裁者的个人利益与多米尼加国家本身的利益相融合。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一名统治者对其人民的思想和财产进行如此全面的控制。

在多米尼加于1844年最后从海地分离出去到1916年被美国占领这70年期间，曾蒙受一百次以上"革命"、起义和政变的国家屈服于长期的暴政统治，这一暴政竟能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情绪的高潮，而只是在1961年暴君遭到谋杀才告结束。

了解特鲁希略的31年政权之所以能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全面裁军。美国海军陆战队从1916年5月至1924年7月统治着多米尼加。这一全面裁军一劳永逸地破坏了传统的游击队领袖的权力和影响，并有可能建立一支只忠于中央政

① 本章由伊丽莎白·拉德译自西班牙文。

府的全国性职业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帮助外国军队进行绥靖战役，镇压该国东部地区为抗击外国干预而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

192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时，留下一个由从占领以前时期最积极的政客所组成的全国性政府，由前考迪罗奥拉西奥·巴斯克斯主持。巴斯克斯迅速将最高军事指挥权置于无条件忠于他的党——国民党的人们手中，其中有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1927年，当巴斯克斯违反宪法将总统的授权从1928年延长到1930年时，特鲁希略便被任命为全国陆军总司令。

由于总统决心重新当选而在1930年5月引发的政治危机，不久就变成为反对党——公民爱国联盟——反对巴斯克斯的一场公开计谋。联盟的领导人说服总司令背叛巴斯克斯并和他们一起推翻政府。他们却不知道特鲁希略将军有他自己的野心，在2月23日废黜巴斯克斯之后，他会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恫吓反对者，并在经过一场激烈的选举运动迫使反对派退出竞争之后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参加被操纵的选举。1930年5月，特鲁希略在投票人数不足全国选民一半的情况下，几乎被一致选为总统。

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什么计谋可施的余地。虽然美国外交代表曾试图阻止政变，但一旦面对事实，他们接受特鲁希略作为政治稳定的保证者，并认为这是替代革命的最合理的办法。海地当时仍由美国军政府统治，而特鲁希略是受过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的军官这一事实保证了岛的两部分保持平静。在特鲁希略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整个时期，美国认为他是一个比他的内外敌人更好的选择。因此，特鲁希略获得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除外），当时国务院中若干敌视特鲁希略的开明官员反对他的政权，而且试图赶他下台，但未获成功。

拉斐尔·特鲁希略1891年出生于距离首都圣多明各约30公里的圣克里斯托瓦尔村庄一个具有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海地人血统的下层阶级家庭。1918年他加入当时的多米尼加国家警察部队，这支警察部队是由美国占领军组建的旨在消灭考迪罗和革

命团体以及平定国内秩序。特鲁希略学会了美国人在公共行政管理中采用的军事组织和纪律的新方法。特鲁希略由于纪律意识强和智慧超群而很快熟悉了业务，并在部队中获得迅速提升。这支警察部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离开该国时改名为国民警卫队，1921年又更名为国民军。

特鲁希略随着地位的上升，利用他作为地方司令官的日益增长的权力，通过安排为士兵购买食品、衣着和后勤供应的交易而发了财。他是一名残酷无情的军官，使用诡计将他的主要敌人从军队中排挤了出去，因此，当1927年他成为总司令时，他已经非常有财、有势。到1928年，他投入城市土地和产业的资本非常之多，被视为是肆无忌惮地热衷于那种财富，这在经济活动仍集中于传统上占有土地和农业的社会里是很不常见的。特鲁希略逐渐将军队变成为自己谋利的个人事业和工具。1927年军队预算出现赤字，特鲁希略无法说明那一年钱是怎样花费的。1929年，巴斯克斯总统为了政府部门现代化而雇用一个美国工作组对该国的行政财务进行研究，由此揭露了特鲁希略把军事预算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腰包的一些渠道。尽管工作组建议纠正这一局面，而且执政党的若干政治领导人要求罢免特鲁希略的职务，但巴斯克斯总统却继续支持特鲁希略，没有怀疑特鲁希略已经在同他的敌人密谋，而且几个月之后会推翻他。

特鲁希略一旦获得政权，就取消了经济竞争并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垄断。1931年他对盐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垄断。他利用总统的职位通过法律禁止对海盐的传统生产，这样公众就不得不购买他本人控制的巴拉奥纳矿开采的盐。实行垄断以后，盐价每百磅从60美分增至3美元。根据当时的报告，这为特鲁希略每年增加利润约40万美元。在对盐实行垄断以后，接着对肉类实行垄断，由于控制圣多明各市的宰屠场，每年使他的收入又增加了50万美元。特鲁希略还实施稻米垄断，禁止进口稻米，要多米尼加人购买由特鲁希略的公司推销的当地稻米，并将米价由每磅6美分按

质提高到 12 或 15 美分。特鲁希略扩大其经济控制范围，垄断首都牛奶的销售，建立由他的妻子玛丽亚·马丁内斯经营的兑付政府支票的银行，她实施一种制度，规定国家职工支付工资的一部分就可以提前兑现其支票。在随后几年，从这些早期企业积累的钱使特鲁希略能购进若干公司的股票，最终把那些公司从原来老板的手里抢过来。举一事例，特鲁希略迫使某保险公司老板将公司出售给他，改名为“圣拉斐尔”公司，此后政府的一切保险合同都归这家公司。以该国最大的烟草厂“烟草专卖公司”为例，公司最初被迫将股票出售给特鲁希略，然后不得不将公司的几乎所有资产让与特鲁希略。烟草专卖公司在特鲁希略政权倒台之前一直是该国唯一的香烟制造厂。由于拥有这些公司和许多其他企业（从卖淫业到水果出口业）、以及占有公共工程租让合同佣金和从国家职工工资中扣除 10% 作为对他的政党多米尼加党（PD）（该党的帐目由特鲁希略亲自掌管）的支持的费用，到 1934 年 8 月，他在首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已成为该国的首富。在他的余生，他可以利用政治和军事权力来中饱私囊，并使他的家族成员和最密切的支持者发财。

虽然特鲁希略总是将政府视为扩大个人权势的一种手段，但他的追随者试图为特鲁希略政权提供一个以民族复兴的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他们辩解说，在 1930 年前，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个落后的停滞的国家，政治上因考迪罗之间的长期倾轧而四分五裂。国家受到外国外交和军事干预而蒙受耻辱。而特鲁希略却着手一项基于政治统一和开发国家资源的复兴进程。多米尼加主要出口品价格的暴跌意味着，在 1929 年经济大危机后的若干年，多米尼加未留下足够的外汇以支付最需要的进口品款项或分期偿还其公债，更不用说实施发展计划了。但是一旦经济于 1938 年左右开始恢复时，特鲁希略政府就开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施从未有过的极其宏伟的公共工程和建设计划，恢复公路、桥梁、灌溉运河及农垦的长远工程。数十万公顷荒地由国家向数以千计的农民

重新开放并分给了他们。垦殖计划实际上是初期的土地改革，由于垦殖计划的实施，各个部门的农业生产都有增长，使得国家在稻米、玉米、豆类和其他粮食方面达到自足。

特鲁希略政府推进工业化，是给多米尼加经济打了最深刻的标志。从1910年起，世界市场上多米尼加出口的产品价格上涨，造成了当地生产所无法满足的消费品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造成的匮乏，以致小工厂和小车间激增。但是，当1919年美国军政府推行一项关税，取消从美国进口的700多种消费品的所有税收时，手工业者在战后就几乎消失了。多米尼加市场上进口的制造品泛滥，使大部分本国制造商破产。在192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后，即使巴斯克斯政府设法扭转这一局势，对这类进口品征收消费税，但直到特鲁希略成为共和国总统后，才实施了明确的工业化政策。

特鲁希略政府因30年代危机造成的进口品匮乏而使经济直接受到了推动。1934年4月，提出了第一个工业免税法，以吸引资本投入工业并作为特鲁希略想要确立的刺激新工业投资的一种合法手段。他决心要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家。虽然这一法律为时短暂，但特鲁希略的领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建立生产鞋类、啤酒、烟草、酒类、通心粉和植物油的新工厂的主要支持因素。此外，许多其他小工厂和小车间在危机年代里是在政府同情关注下建立起来的。大部分这类新企业很小，因为193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还不足130万。尽管如此，这些小企业代表着多样化制造业的基础，可以替代进口并使用当地生产的原料。圣地亚哥、普拉塔港和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等城镇，拥有比较有活力的手工业阶级，其内地具有比圣多明各较富裕的农民阶级，成为比首都本身更为发达的工业中心，对这一趋势特鲁希略设法予以制止，特别在圣多明各旧城于1936年易名为特鲁希略城以后。

1942年，特鲁希略修改宪法，允许政府行政部门有权对以替

代进口和节省外汇为目的而建立的新工业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和免税。当然，他是实施这些措施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因为他同本国和外国企业家有联系，他们要么加入他的公司，要么被迫允许他参加那些已建立多年并且已显示有利可图的公司。特鲁希略的合伙人有本世纪初参与第一阶段进口替代的西班牙、叙利亚、黎巴嫩或多米尼加的商人和工业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制造品出现新的匮乏，特鲁希略经济帝国的增长有了扩展，特鲁希略利用他的资本和同伙人的资本建立新的工业来满足这一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多米尼加共和国因热带产品的世界性需求而获利。多米尼加出口品——蔗糖、可可、咖啡、烟草及香蕉——的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收入以增加国内需求，这就带来进一步促进工业化的自然刺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开办了生产水泥、巧克力、酒精、饮料、酒、纸张、硬纸板、奶制品、面粉、钉子、瓶和玻璃、咖啡、稻米、大理石、药品、油漆、麻袋、电线和针织品、纺织品、服装和蔗糖等新工厂，特鲁希略工业联合体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些年代创建的几乎所有的工业，包括特鲁希略并非直接合伙人的工业，都被授予特许权并免予赋税，且受到政府保护，不受劳工骚乱、工会要求和外国竞争的干扰。大部分新的现代工厂建在特鲁希略市内或周围，从而在不到 15 年时间里将旧的行政首都变为吸引来自该国内地日益增长的移民浪潮的工业和商业中心。

1938—1960 年期间，多米尼加共和国制造业企业数目几乎翻了一番；资本投资增长 9 倍；职工人数增长近 2.5 倍；1960 年产业部门支付的工资额 10 倍于 1938 年；制造业部门使用的本国原料的价值增长了 14 倍；燃料和润滑剂的支出上升 22 倍；工业销售额增加 12 倍多，从 1330 万美元增长到 1.644 亿美元。在为期 21 年时间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增长。而且，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特鲁希略在蔗糖工业中的大规模投资。

蔗糖是特鲁希略最大的工业投资之一。由于在整个 30 年代糖

价下跌，特鲁希略从未专志掌管蔗糖业。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生存了50多年的蔗糖厂的外国厂主获取了巨额利润，这势必引起特鲁希略的关注。1949年，特鲁希略在距离圣多明各25英里的阿尔塔格拉西亚镇郊外他所拥有的土地上开始建造一座名叫中卡塔雷伊的规模不大的糖厂。在一年时间里，他已经开始建造中里奥爱纳糖厂，他希望这个糖厂将成为该国最大的糖厂。在以后的年代，特鲁希略利用国家资金和个人资金购买了在该国经营的大部分外国糖厂，从而使他自己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大的蔗糖制造商。他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外国控制蔗糖工业。他通过沉重的出口税对外国糖业公司增加压力，这使得外国糖厂主确信他们的最佳出路是将糖厂卖掉。到1961年，特鲁希略尚未购买的仅有的糖厂是卡萨维西尼糖厂和中罗马纳糖厂（后一工厂为南波多黎各糖业公司的财产，五月份独裁者被谋杀，从而中断了该厂的出售）。

特鲁希略政府还买下了国民城市银行（1941年他使该银行成为储备银行）和电力公司（后来是多米尼加电力公司）。这位独裁者还是该国最大的地主，他的地产包括一些大牧场以及广阔的森林资源，他通过众所周知的傀儡头目开发这些土地，从而使他可以垄断该国的木材市场。特鲁希略的经济帝国如此庞大，到1961年他寿终正寝时，他控制了全国近80%的工业生产，他的公司雇用了全国自立人口的45%。再加上他绝对控制的国家所雇用的15%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近60%的多米尼加家庭以各种方式受他任意支配。人们通常说，在他的政权统治期间，局势达到如此极端地步：多米尼加人若不为特鲁希略或其家族提供某种利润，就不可能获得食品、鞋子、衣服或藏身之处。

当特鲁希略于1930年经济总危机中上台时，国家的财政限度直接与1924年美国—多米尼加协定中多米尼加所承担的义务有关。该协定不仅规定未经美国同意不得筹措新的贷款和提高关税，而且还规定，关税收入的分配由美国通过海关总署实施，由此，要

扣除50%的关税收入以偿付外债。1931年，特鲁希略政府开始与美国谈判延期偿付，以便在世界经济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支付债务的利息。这些谈判产生了积极结果，并使特鲁希略能获得比他根据1924年条约条款所能享有的更多资金。

同时，多米尼加政府开始与美国就恢复多米尼加管理本国海关的权利进行谈判。多米尼加海关从1905年起一直由美国掌管。这一协议拖延了若干年，主要是因为很难使债券持有人相信他们会继续享有偿债的同样保证。但最后，1940年9月24日，特鲁希略（已经担任两任总统现被提名为驻华盛顿大使）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签订条约，修改1924年的协定，大意是说，今后海关不再按美国政府的指示进行工作，海关各部门及分署将成为多米尼加国家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该条约（即众所周知的特鲁希略——赫尔条约，于1941年2月15日获得批准）成为多米尼加政府大规模宣传运动的目标，将特鲁希略说成是恢复国家财政独立的人物。政府辩护人利用该国可耻的和不景气的金融历史，将特鲁希略描绘成能够恢复共和国主权的救星，因为外国管理海关肢解了共和国的主权。事实上，尽管海关的管理现已转到多米尼加人手中，但根据商定的条款，多米尼加政府在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必须存放在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该银行在圣多明各有一个支行。因此，代表债券持有人的一名支行官员就可以在多米尼加政府和外国债权人之间分配款项。同时，外债从1930年的1600万美元下降到1947年的940万美元，当时是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储备来清偿的。

特鲁希略设法解决并加以利用的另一个长期性问题，是海地人在多米尼加领土上的长久定居问题。19世纪中期海地一多米尼加战争期间海地人曾和平地定居到多米尼加人放弃的农田长达一个多世纪。尽管多米尼加努力与海地达成一项协议，但证明难以解决边界问题。1929年1月的条约终于确定了边界的划界，可是

数以万计的海地农民继续生活在多米尼加一侧的西南和西北，而其他人则在岛的东南地区的糖厂当劳工，或者作为家仆、农民或小商人在内地许多城镇谋生。

住在边界附近的海地人在多米尼加社会里完全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占有的领土有效地成为海地的延伸部分。海地货币在多米尼加主要农业区锡瓦奥自由流通，在南方流通范围远到距离圣多明各仅120公里的阿苏阿。这对特鲁希略来说是极其讨厌的事，1937年10月初，特鲁希略旅行到边界，并于10月4日发布非常命令，下令灭绝所有留在多米尼加的海地人。在此后的几天里，约有1.8万海地人丧生。幸存者是设法越过边界的人和受到糖厂保护的人，因为糖厂不希望失去劳动力。

对海地人的大规模屠杀造成了国际丑闻，并激起所有拉美国家和美国的谴责。同时也在多米尼加人中间引起惊愕和恐慌。经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抗议、调查和外交调停之后，1939年2月这一事件告一段落。多米尼加政府付给海地政府52.5万美元作为对官方称之为"边界冲突"事件中所造成损失和伤害的赔偿。[①]特鲁希略政府试图将这次屠杀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多米尼加农民和海地的家畜小偷之间的边界事件，说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当时多米尼加人因家畜被偷而决定袭击海地人并设法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如此，这一行为被广泛认为是一桩种族灭绝。

1941年，政府提出一项使边界"多米尼加化"的重大计划，沿着新划的边界线上建造城镇和设置军事哨所以防海地人的进一步渗入。在此后几年，边界的多米尼加化变成了某种民族讨伐，以夺回一个多世纪之前丧失而多米尼加人过去无法收复的地区（最初是因为独立战争期间海地的入侵，后来是因为边界贸易）。不到

---

① 协议最初是1938年1月31日达成的，当时所规定的赔偿费为75万美元，其中特鲁希略预先支付25万美元。后来特鲁希略派遣一个特使前往太子港，这名特使在对海地政府某些政客行贿后，设法将第二次和最后一次赔偿于1939年2月减少到27.5万美元，赔偿总计52.5万美元。

几年时间，在许多新的农业垦殖区，被授与土地的多米尼加家庭重新移居边界。天主教会应邀加入这一运动，耶稣会教团派遣教士前往边境前哨向原先受伏都教影响的人们传播基督教。边界地区有许多道路灌溉运河纵横交错，它已成为纳入全国总的生产体系的永久移民区。特鲁希略以此强调他是保持该国西班牙和天主教传统精华的真正救星。

就政治上而言，特鲁希略政权实现了明显的稳定，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流亡者策划了许多次阴谋和入侵。根据宪法，特鲁希略担任了四任共和国总统，第一任从 1930 年到 1934 年、第二任从 1934 年到 1938 年。虽然对总统无限期的重新当选没有作出法律规定，特鲁希略 1938 年还是辞退了，并主持选举了哈辛托·B·佩纳多。佩纳多在此之前一直是担任特鲁希略的副总统。1940 年佩纳多去世，由他的副总统曼努埃尔·德赫苏斯·特龙科索·德拉孔查接任。根据一些消息说，佩纳多和特龙科索·德拉孔查于 1938 年当选，是因为美国考虑到海地人遭到屠杀而反对特鲁希略重新当选。但是，那个时期的外交函件并未证实这一观点，只是表明一直谣传美国政府对特鲁希略可能继续担任总统表示不愉快。无论怎样，一旦边界多米尼加化的计划实施并用 5 年时间忘掉那场冲突，美国政府并不反对特鲁希略担任第三任总统，从 1942 年起再任 5 年，也不反对他在 1947 年重新当选再任 5 年。1952 年特鲁希略安插他的兄弟埃克托尔·B·特鲁希略任总统，1957 年使他再次当选，如同 1934 年以来的所有总统选举那样，几乎是一致通过。埃克托尔·特鲁希略充任总统直到 1960 年 8 月，当时因政府面临美洲国家组织在他的兄弟试图暗杀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之后对多米尼加实施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国际危机而辞职。当时的副总统华金·巴拉格尔后来成为新的傀儡总统。

多米尼加流亡者进行了两次未遂的入侵，即 1949 年 6 月对卢佩龙的入侵和 1959 年 6 月对康斯坦萨、迈蒙和埃斯特罗翁多的入

侵，只有后一次入侵才对政权造成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新政府支持叛乱者，因而坚持组成重要革命联盟的许诺。入侵部队主要包括多米尼加流亡者和一些曾在马埃斯特腊山伴随卡斯特罗的军事指挥官。但是，他们一抵达多米尼加领土，就迅速被特鲁希略军队击败，几乎所有的远征队队员均丧生。从那时起，古巴广播电台不断播送鼓励多米尼加人民起来反对独裁者的消息。许多人受到这些消息的鼓舞，开始密谋，但大部分迅速被发现。到60年代中期，监狱里挤满了各个社会阶级的数百名政治犯。多米尼加政府加紧其长期的恐怖和间谍活动，拷打和杀害许多反政府人士。1960名被杀害的人中，有来自受尊敬的米拉瓦尔家族的三姐妹，她们的丈夫因参与导致1959年6月入侵的最初密谋而被监禁。1960年11月25日米拉瓦尔三姐妹被杀害，激起了对特鲁希略的广泛谴责，由于入侵失败以及试图杀害贝坦科尔特以后美洲国家组织施加制裁，大大加剧了特鲁希略政府已经陷入的危机。

到了这一阶段，华盛顿的许多人深信，如果特鲁希略继续当政而且该国经济状况在美洲国家组织制裁下继续恶化的话，多米尼加共和国可能面临一场类似在古巴那样的共产党接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在减少对拉美独裁统治的支持，这一政策于1961年由新任肯尼迪政府加以确认，肯尼迪政府与特鲁希略政权内部的高层阴谋分子建立联系。前将军胡安·托马斯·迪亚斯是特鲁希略的童年朋友，因为迪亚斯的姐姐是政治反对派而使他失去他的地位和独裁者的宠爱，以迪亚斯为首的一伙人在美国支持下，图谋在特鲁希略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基金会庄园”的途中枪杀他。策划者在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1961年5月30日晚在联结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圣多明各的公路上一场戏剧性的汽车追赶之后终于杀死了特鲁希略。

独裁者被暗杀事件正发生在美洲国家组织年前实行经济制裁而使政权处在混乱之际。特鲁希略近几个月对天主教会拒绝授予

他“教会恩人”头衔之后对教会发动了攻击（特鲁希略希望除了拥有“大元帅”、“祖国恩人”和“新祖国之父”等头衔外，再加上“教会恩人”这个头衔），虽然如此，民众们反抗日益加强。由于多米尼加主要出口品价格下跌，1958年以后多米尼加经济发生危机，而经济制裁大大加剧了危机。1955年后，该国的确经历了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当时特鲁希略为纪念他当权25周年而花费3000多万美元建造一个国际博览会。在此之后，特鲁希略由于支付现金给外国投资者以购买50年代末已收归国有的若干糖厂和所有的电力工厂而降低了国家的国际储备。多米尼加政府在享有特别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达50多年之后，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9年中期，签订了一项1150万美元备用贷款的协议，协议规定多米尼加要实行进口限制和其他货币管理。但是，1959年6月游击队的入侵，吓坏了特鲁希略的许多亲戚和同伙，他们立即开始将存款转移到外国银行，此事还提醒特鲁希略花费8000万美元购买武器和军需品。1961年特鲁希略去世时，他的家族在国外大约有3亿美元存款，特鲁希略的公司都在经营和赢利，因为这些公司享有政府的一切可能的保护。许多公司不用纳税，工人工资低微；有些公司使用国家职员、军人和罪犯当工人。每当某公司表明有亏损时，特鲁希略就把公司卖给国家而从中获利。当公司亏损得到弥补时，特鲁希略再将其买回，并从中获利。所谓特鲁希略将多米尼加国家变为其私产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虽然多米尼加政权一贯保留着宪法的外观并拥有国会，但参议员和众议员由国内唯一的政党多米尼加党遵循独裁者的个人推荐“选举”产生。参议员和众议员在被任命前，签署一份不注明日期的辞呈交给独裁者，这样就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方便地予以免职。许多电台、唯一的电视台和两家主要日报，都是独裁者及其亲戚直接拥有，他们利用这些宣传媒介压制反对派的一切言论，并为其政权歌功颂德。在为期30年的时间里，这种意识形态控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学校教科书完全重写了国家历史以吹捧特鲁希

略，几代多米尼加的学童就是接受这种教科书的教育。在大量生产的大众歌曲和诗歌中也同样唱特鲁希略的赞歌。这一切比压制不同政见要远远严重得多；它制约了数十万公民的思想，使他们沦为臣民。

当然，独裁者的专制主义世袭论的确并不存在于社会真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而且不中断地持续到1960年的工业化，改变了圣多明各市纯行政管理的性质，而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心，吸引着从内地城乡来寻找工作的数以万计的多米尼加人，这种内部移民模式在多米尼加其余的城市中心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样，到1960年只有60%的居民生活在农村，而1920年时有84%的居民住在农村。保健与卫生状况的改进也使城市生活对许多农民和劳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在一个新工业部门找到工作，在这种希望的引诱下，开始第一次形成充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在后来提供给多米尼加工业以廉价劳动力。医院的兴建，数以百计的新医生的培训，预防寄生虫病运动的大力实施，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抗生素的引进，使死亡率大大下降，并使多米尼加妇女生育力提高，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标志着人口爆炸的开始。迟至1944年，多米尼加政客们认为该国人口不足，因而在长达15年多的时间鼓励生孩子，对大家庭提供鼓励措施，尽管1950年人口普查有300万人，而1920年还不足100万人。许多人为人口增长而赞扬特鲁希略政府，他们认为人口增长是社会成熟与发展的标志。人口的增长还为多米尼加经济提供本国劳工的来源，许多世纪以来多米尼加经济因长期缺乏本地劳工而受到限制。

人口的增加要求政府扩大其官僚机构和公共服务。一支约20万士兵的军队对多米尼加经济是沉重的负担，但也是一个就业的重要源泉，而且为社会进步、为贫困的农民青年提供各种机会。同时，学校入学人数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有了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圣多明各大学1932年曾进行整顿并且许多年来入学人数

保持在1000人左右，1950年末入学人数增加到3000人，每年通常约有100名专业人员毕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国家提供新的中等社会阶层，一旦特鲁希略政权倒台时他们将会承担政治和经济领导。许多在特鲁希略时代最后10年毕业的专业人员离开本国到国外学习或担任外交职务，带着新思想回国；还有些人带回对以后几十年加速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能力。

尽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1958年经济高涨了，但是多米尼加400万人口的大多数仅享有微不足道的国家财富。1960年，保健事业明显不足；学校无法对付人口的增长，文盲率增加了。生活费用上升，而实际工资仍停滞不前；城市的失业人数在增长，而特鲁希略小小的家族寡头集团使国家的资本枯竭，而无法使之用于再投资以提供新的就业。同样，农村经济陷入衰退状态，几十万公顷土地落入地主的手中，他们掠夺农民的传统土地来扩大其地产。值得注意的是，因工业发展而新近致富的城市集团，在50年代往往利用其储蓄购买农村地产，作为获得经济安全和社会威望的一种手段。由于贯彻了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农村无产阶级扩展了，该阶级由于丧失土地而变得日益贫困。60%的人口仍生活在农村，但是随着无业无地的大批男女在主要城市外围地区定居，城市贫民区加速产生了。这些幸运者成为对现代化城市经济提供廉价劳工的现成市场。

人们可能争辩说，1930年特鲁希略开始统治一个两个阶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落后社会，而当1961年他去世时留下一个仍然不发达的过渡性社会，一个因垄断性工业增长而造成的畸形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将国家资源的控制置于绝对肆无忌惮的一个家族手中，垄断性的工业增长使多米尼加像其他拉美国家具有的均衡经济发展的小小机会也被剥夺了。

特鲁希略以后的时代

1961年5月特鲁希略的死亡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紧张进程，

这一进程以1962年12月20日的自由选举（1924年以来第一次这样的选举）而达到顶点。这次选举是由包括7名成员的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组织的，多米尼加革命党（PRD，1939年成立于古巴）候选人胡安·博什当选。在特鲁希略统治期间，博什的成年时代是在流放中度过的，1961年他与其他流亡者一起返回多米尼加。1963年2月27日立宪政府执政，但没有明确的经济发展计划。博什关于经济发展总的想法是50年代他在哥斯达黎加和古巴学到的改良主义和民众主义型的经济发展思想。但是，对许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来说，这些想法过于先进了，博什不久就被工商界戴上共党或亲共的帽子。

多亏国务委员会在争取进步联盟的帮助下实施紧急计划，1962年多米尼加经济开始复苏。尽管如此，大部分企业家宁可等待新的立宪政府就职并为新的投资提供坚强保证。尽管极端右翼组织散布反共言词，但甚至那些不信任博什的工业家们也认为博什是无辜的，而且愿意支持博什政府进行新的投资。新的立宪政府在试图整顿国家财政时所提供的政治自由和乐观气氛，开始了加速发展最佳办法的辩论。国务委员会对工业利益集团作出迅速的呼应，但是博什新政府并不是易于驾驭的，不到两个月时间，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业协会要求他阐明他的经济政策。工业协会是1962年由极其重要的工业企业家创建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由于战后年代经济的非凡增长而在50年代富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特鲁希略的企业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其他一些人干脆就是特鲁希略的亲信，或者是特鲁希略一些企业的合伙人，他们在特鲁希略的垄断公司成为国家财产时，设法度过了1961—1962年发生的没收浪潮而幸存了下来。工业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是奥拉西奥·阿尔瓦雷斯。他是软饮料制造商，而且是几乎同过去一百年间历届政府都有联系的多米尼加最老的家族成员之一，他在特鲁希略政权时代是有影响力的。阿尔瓦雷斯同大部分特鲁希略派企业家一样，曾受到国务委员会的保护，参与了反对博什的竞选运动。许多企业

家现在成立了多米尼加无党派人士行动会(ADI)并与全国企业主委员会(CNHE)建立了反对博什政府的共同阵线。当时全国企业主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博什，为此目的他们为多米尼加无党派人士行动会的理事筹措资金。这些理事协同极右翼的教士团体，开始组织大批农民召开重申基督信仰大会，抗议共产党对共和国的渗透，抗议博什政府，他们指控博什政府将国家引向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全大陆加紧发动反对古巴革命的宣传运动的年代。多米尼加共和国欢迎数以百计的古巴流亡者，特别是商人和教士，他们正发动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积极宣传运动，并错误地将博什政府同卡斯特罗政权联系起来，认为博什政府的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对他们的利益是一种威胁。

反对博什的趋势日益高涨。在经历了25年的流亡生活后，博什完全不了解多米尼加的现实，这就导致他与各个社会集团、包括他自己的党发生矛盾。不到几个月时间，博什总统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独境地。企业集团终于号召发动工商界罢市，致使国家瘫痪数日之久并示意军方发动他们已筹划若干周的政变时间已经成熟，当时没有人保护博什政府。1963年9月25日，博什被免职，由一个三人执政委员会取代，其成员是大公司总经理和律师，其内阁由与多米尼加的企业界有联系的企业家和律师组成。从一开始，三人执政委员会的调门是既反特鲁希略又反共。

由于三人执政委员会是由一场军事政变产生的事实上的政权，因此它极其不负众望，而且只有靠美国和武装部队中特鲁希略派将军的支持才能够继续执政，三人执政委员会给这些将军极大的特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并为博什所接受的货币自由兑换政策，进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和通货膨胀。当三人执政委员会容许军方建立一个全国军需处出售由空军飞机运进多米尼加的走私外国制造品时，这一形势进一步恶化。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2500万美元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持续几乎一年的严重旱灾所引起的农业生

产危机使这一新的备用协议规定的调整复杂化了。国营企业的工人和出租汽车司机经常举行罢工，同样，学生也经常举行游行示威，这就迫使三人执政委员会不断派警察上街平息动乱，逮捕政治领袖、工人和学生。

一些民主政党被迫进行秘密活动，它们转向与当时流亡在波多黎各的博什以及被排挤于权力边缘而希望恢复立宪政权的一批年轻军官合谋。同时，特鲁希略的最后一位傀儡总统华金·巴拉格尔与特鲁希略时代唯一的政党多米尼加党的干部成立了改革党。既然博什和巴拉格尔已结成了联盟，三人执政委员会也就成了没有任何重大政治后盾的孤家寡人。右翼文职集团组织了一个名叫进化主义自由党的新党，号召立即举行选举，使三人执政委员会合法地重新就职，三人执政委员会主席多纳尔德·雷德·卡夫拉尔已同他们达成参加1965年9月总统竞选的谅解，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选举将在多米尼加两个最大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博什和巴拉格尔不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虽然雷德·卡夫拉尔指望得到博什的多米尼加革命党（PRD）的一个派别的支持，这派认为解决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选举。

但是，博什和基督教民主党分子（1962年初组成为政党）已经一致同意指责选举并动员公众舆论赞成“不举行选举而恢复立宪”，这一程式其实就意味着要推翻三人执政委员会。这一立场得到人数很少、但有影响的多米尼加共产党以及相当一部分工会和学生组织的公开支持。当密谋活动于1965年4月24日最后被发现时，没有人出来保卫三人执政委员会。相反，富人和穷人都涌向街头庆祝三人执政委员会的倒台。这一消息在电台和电视台错误地提前播出，引起了军队内部的严重危机。军队分裂为两派，一派希望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博什官复原职以完成宪法规定他的任期，一派希望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取代三人执政委员会并最终举行新的选举。

雷德·卡夫拉尔耍计谋力图获得军方的支持，但徒劳无益。不

到 24 小时，以前曾支持卡夫拉尔的军人在国家宫将他俘虏，并开始同立宪派军官们谈判。当他们不能迅速达成协议时，发动这次密谋的军官们将武器分发给支持他们的老百姓。1965 年 4 月 25 日，在圣多明各市爆发了内战。左翼集团和博什的追随者组织起游击队来歼灭昔日的特鲁希略军队，这支特鲁希略军队不曾受到国务委员会、博什和三人执政委员会的触动，它曾借口共产主义威胁而推翻了近 40 年来选举产生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经过在圣多明各的 3 天紧张巷战，立宪派部队设法击败了正规军并准备对圣伊西德罗空军基地发动最后的攻势。这个空军基地是反对博什复职运动的主要中心。内地的军事哨所在其昔日军事指挥官的控制下观望等待。但对圣伊西德罗的攻势从未实现。为了阻止博什东山再起和“防止在美洲出现第二个古巴”，美国总统约翰逊借口保护在多米尼加的美国人生命和美国利益，于 1965 年 4 月 28 日下令 4.2 万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进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此，开始时的一场内战结束时却成为一场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升级、美国反对古巴的政策以及后来美国宣布要拯救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主联系起来的。

当时，圣多明各市分为两个由对立部队占领的地区。立宪派军队包括几百名得到数千男男女女援助的正规军官兵，起义开始时，向数千名男女分发了武器，他们将自己组织成几十个“立宪突击队”以保卫这座昔日的殖民城市以及本世纪初建成的郊区。另一方则是获得美国、巴西、洪都拉斯和巴拉圭军队支援的多米尼加陆海空三军，这些国家在操纵美洲国家组织之后，设法组成一支所谓泛美和平部队，使得美国单方面的干预显得合法化，虽然这一行动违反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以及联合国宪章。

外国军队尽管占有优势，但冲突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美国必须进行谈判以终止叛乱并撤走外国军队。1965 年 5 月至 9 月间，多米尼加共和国事实上有两个政府：一个政府由立宪派组成并由反叛的军人领袖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陆军上校主持；另一

政府则以刺杀特鲁希略的刺客之一安东尼奥·因贝特·巴雷拉斯将军为首，他公开宣称反对博什和共产党。美国很快使后者就职，以便可以操纵多米尼加政治。内战结束，经过4个月的紧张谈判，加之在圣多明各市街头又时而发生流血战斗，两个政府均辞职了，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授权于1966年5月举行自由选举。结束内战的1965年9月3日和解决议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军人立宪派应重新返回军队，其领导人应被任命担任外交职务。美国设法改组多米尼加军队，使之作为直接受美国指挥并完全依靠美国政府提供工资、衣着、食品、军需及装备的一支力量。

随着和解决议的签署而开始的多米尼加生活的正常化，要由埃克托尔·加西亚·戈多伊主持的临时政府付诸实施。戈多伊是斗争双方经过激烈的谈判后选定的一名职业外交家和企业家。双方同意，占领军将留在多米尼加直到新的立宪政府掌权。两名主要候选人是华金·巴拉格尔和胡安·博什，他们两人均从国外流亡回来并着手重组他们相互竞争的政党，巴拉格尔的改革党不久获得特鲁希略派陆军军官和右翼的支持，他们发动恐怖主义活动反对博什的多米尼加革命党，350名多米尼加革命党的政治积极分子于1960年1—5月期间被杀害。博什本人不得离家外出参加竞选，只得通过电台向他的选民发表每日广播讲话。实际上，竞选活动只是延长了内战，很少军人立宪派得到他们昔日战友的支持，他们当中有几十人要么是在临时政府过渡时期、要么是在巴拉格尔1966年5月16日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后被暗杀的。圣多明各市的生活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因为公开的内战由长期的反共恐怖主义和左翼城市游击队活动的浪潮所替代，那些左翼城市游击队组织是由老的立宪派突击队队员组成的，他们仍有武器，并且认为通过杀害警察和士兵的办法就有可能在街头发动革命。

在巴拉格尔反共势力所施加的恐怖活动下，多米尼加共和国

遭殃近8年之久。[①]为了使得正规军队的地位不那么显眼，巴拉格尔组织了一支名叫“后备团”的准军事组织，由左翼政党的脱党分子和军事情报预算来雇用的职业杀手所组成。1966年至1974年间，有4000多名多米尼加人在恐怖主义活动中丧生，只是当左翼政党领导层被清除以及左翼政党完全解体的时候，战役才结束。但是，减少镇压也是由于巴拉格尔为了力争于1974年5月再次当选，他力图造成政治正常化的印象，以便对多米尼加革命党在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发动宣传运动之后于1973年开始的支持民权的国际呼声作出反应。

1974年选举后，对恐怖主义活动只是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因为左翼的力量如此衰弱，以致它们对政权不再构成一种威胁。弗朗西斯科·卡马尼奥陆军上校在设法建立类似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企图建立的游击中心时，在山区被俘获，随后于1973年2月被暗杀。内战之后，卡马尼奥离开多米尼加前往伦敦，作为派驻多米尼加大使馆的武官，从那里他秘密地前往古巴，他在古巴呆了若干年，接受思想灌输和训练，以备有朝一日他会返回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当他于1965年起义之后8年，即1973年2月抵达多米尼加山区时，国家已发生巨大变化。军队已接受过进行游击战的再训练，由于经济得到恢复，工业增长和加速城市化的政策得到执行，国家本身已发生转变，产生了多米尼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一定富裕程度的中产阶级，卡马尼奥的许多旧日同志在这8年期间在亲眼目睹他们的同伴成为政府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之后，他们也发生了变化。其他一些人在经济发展情况下加入了企业界。1970—1974年间，多米尼加经济在拉美国家中取得最高的增长率。

左翼政党的大部分残存者被巴拉格尔通过各种机制加以罗

① 在广泛使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对派之后，巴拉格尔于1970年“再度当选”。多米尼加革命党未提出候选人。巴拉格尔在选举中没有对手。

致：工程师和同类的专家得到国家公共工程的合同，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由于1000多名教授被任命到国立大学任教而得到抚慰。巴拉格尔将这些工作交给左翼政党成员，一方面为了使他们能就业，同时可以将他们置于监视之下。在数以千计的正在进行的公共工程中或在经济繁荣期间涌现的许多新公司中，为左翼激进分子提供了工作。巴拉格尔在实施他的土改纲领时甚至也利用多米尼加共产党。土改纲领在1972年以后结束了国内稻米产区的大地产制。共产党员变为相信政府平均地权论的主要思想家，成为沟通巴拉格尔政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政府在使他们保持中立化方面十分行之有效，允许他们自由进出多米尼加，出版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公开举行会议。作为对共产党的合作和和平活动的报答，1977年11月多米尼加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多米尼加政府把内战后国家的安定作为华金·巴拉格尔的重大政绩之一。从牺牲人命来看，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但巴拉格尔对他的英雄业绩引以自豪，在他的演说中总要夸夸其谈。

当1966年6月华金·巴拉格尔担任总统时，多米尼加政府是受国家各级行政部门中大约400名美国职员和顾问所控制的。军队实际上是由65人组成的美国军事工作组所支配；农业部是由实际上作出一切决定的45名美国技术人员所控制；由其中1/3是中央情报局成员的15名专家在有关国家安全事务上对国家警察和保安部队出主意。其它政府部门，诸如社区发展办公室和多米尼加农业研究所，如同教育部一样同美国顾问协同工作，这些顾问对他们的多米尼加同事施加强大压力，要他们遵循由国际开发署（AID）或美国大使馆制定的政治或行政方面的政策。内战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由于交战双方政府均无法征税以致财政收入几乎消失。若不是美国倾注了大规模经济援助，多米尼加就会完全瘫痪。多米尼加人已对美援习以为常，但怨恨他们的国家严重依赖美援。外国军队撤离后，美援已成为美国实行控制的主要工具。

同多米尼加经济规模相对比，1966—1973年间流入多米尼加

共和国的美国金钱的数额是巨大的。1965 年 4 月—1966 年 6 月，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约 1.22 亿美元，其大部分是采取赠款的形式，目的是防止破产。在此后 3 年中，即巴拉格尔当第一任总统期间的其余几年，这一援助增加到每年 1.33 亿美元，其大部分采取资助开发计划的长期贷款形式。这些贷款是通过国际开发署商定的，而且不止一次是根据 480 号公法的范围实施的（这是一项粮食特别信贷计划）。从 1969 年 6 月到 1973 年 6 月，每年的援助下降到 7800 万，大部分援助也是根据 480 号公法实施的。多米尼加经济对外援的依赖，特别是在 1966—1970 年期间，的确是很明显的。无疑，如果华盛顿没有直接倾注现金和提供蔗糖额度，多米尼加只有实施极端紧缩的政策伴以失业率的危险性上升，方能幸存。在此期间，来自美国的直接外援和来自蔗糖额度的收入占国家外汇收入的 32%。这些年，很大一部分国家预算是用来支付工资的，大部分投资是靠外援款项进行的，这意味着国际开发署、美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决定有效地确定公共投资计划。援助的一个条件是，它指定多米尼加国家预算提供美援资助计划的对等资金。然而，多米尼加政府不愿拨付资金来从事这些项目，认为将其资金拨付给具有肯定政治影响的投资在政治上更为有用，诸如公共工程，因为公共工程的投资成果明显，并能迅速提供就业。

国际开发署的资金通常用于发展农业，而多米尼加政府则在城市部门进行投资。政府对国际开发署资金的唯一兴趣，是拿到外汇来改善国际收支。1972 年政府的农业政策有了明显变化，而在 1972 年前，巴拉格尔想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换取继续当权的单纯的权宜倾向是很明显的，这也说明 70 年代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所在。

尽管多米尼加政府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纲领给予较少的优先考虑而且挥霍开支，从而导致同华盛顿的经常摩擦，但多米尼加政府还是接受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因为巴拉格尔及其顾问们知

道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每当多米尼加政府必须谈判一个有利的蔗糖限额以获得外汇来支付其进口时，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蔗糖的限额是多米尼加官员在华盛顿和圣多明各两地进行紧张游说的目标。1973年巴拉格尔总统向尼克松总统——不是向多米尼加国会——提出辞职，如果万一他自己成为获得蔗糖限额的阻力的话。当然，巴拉格尔并未辞职；所要求的限额（70万吨）实现了，由此他得以增强其政府的经济地位，而且表明美国在政治上支持他。糖的限额在巴拉格尔头两个任期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在那段期间多米尼加这一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平均价格在美国市场比在世界市场上高得多。比如说，1966年所规定的糖的限额意味着额外增加收入5350万美元，若是将这些糖在世界市场出售，这笔收入就不会进到多米尼加。在以后的几年直到1971年，这一数字仍保持大体稳定（1967年为5590万美元，1968年为7670万美元，1969年为5020万美元，1970年为4860万美元，1971年为4350万美元）。但是1972年，世界市场糖价突然大幅度上涨，因此收入的差额只有1290万美元。1973年，多米尼加共和国认识到把糖出口到美国去没有好处；没有把糖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出售是吃亏的。1975年和1976年，由于世界市场糖价猛涨，多米尼加共和国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出口收入，政府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掩盖了增长虽十分迅速而极不稳定的深刻的经济矛盾。美援和糖的限额对于资助多米尼加进口实际上成为不必要了。

1966年，美援和糖的限额合起来占外汇总收入的47%；1972年，仅占8.77%。这一百分比下降既表明多米尼加已从1964—1967年危机中复苏，又表明多亏外援才使这一复苏成为可能，因为外援被用来刺激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水平。对经济起飞至关重要的其他因素包括糖产量的增加（糖生产受到限额增大的刺激）和外国及本国投资（投资人由于意识到华盛顿对多米尼加政府继续给予政治支持，因而将资本投入矿业、工业、银行业和服务业部门）。但是，尽管外国投资的绝对量有了增长，但与国内投

资相比，仍大致保持在1964年的同一水平，即占总投资的35%。

私人投资和外援是多米尼加经济的主要资本来源。1966—1971年间，投入多米尼加的资本约有10亿美元，相当一大部分投入诸如矿业和能源等重要部门。多米尼加政府对这些投资提供的条件总是极其慷慨的。比如，多米尼加福尔肯布里奇公司是一个在加拿大名下经营的美资企业，致力于开发该国中部地区的镍矿，它投资约2.05亿美元，由美国提供保证以防范各种类型的政治风险特别是被没收的风险。规模不大、但却很重要的外国公司如多米尼加罗萨里奥金矿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多米尼加合资的多米尼加炼油厂以及由雀巢公司经营的乳制品工业，在同多米尼加政府谈判签订合同时获得重大好处，就如同海湾和西方多国公司在华金·巴拉格尔总统任职期间为蔗糖及旅游业务获得巨大优惠一样。多米尼加政府经常公开地说明需要外国投资以资助多米尼加的发展。每当政府内外的政客们呼吁对美国投资给予限制、管制或没收时，巴拉格尔总是加以辩解，指出他称之为加勒比海的"地缘命运论"，就是说，鉴于美国的巨大，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本地区永远只能是美国的卫星国，因为美国人绝不允许在加勒比地区出现另一个古巴。

巴拉格尔的上述见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很流行。人们记得，美国1916年占领并统治该国达8年之久；他们还记得，由于特鲁希略去世，美国国务院通过其领事和外交官的操纵，对多米尼加的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人们记得，他们一度曾以为由文官——军人运动重新把废黜的博什总统扶上台的做法可以成功，但由于美国大规模使用军力而落了空，美国军队是直到建立一个可以赖以保护并促进美国利益的政府才离开多米尼加的。在多米尼加人中间对于美国控制他们的国家一事抱有某种政治宿命论观点，当美国1978年再次采取直接政治干预时这种观点得到了确认。1978年5月，卡特总统公然阻止巴拉格尔以欺诈方式继续任职，因为这种行动违背了美国当时的人权政策以及使多米尼加共和国民主

化的计划。

巴拉格尔和他的同伙行使了12年的大权之后，拒绝接受1978年5月16日的选举结果，在选举中，安东尼奥·古斯曼作为多米尼加革命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以压倒多数获胜。那天晚上，当居民正在观看全国电视播放计票情景时，支持巴拉格尔重新当选的军官进入中央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并中断了计票，当时记票已经表明古斯曼肯定获胜。他们立即开始没收并捣毁票箱，监禁一大批政党的代表。这一强力行动激起了多米尼加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公愤。全国的各个组织立即发动和平抗议与抵制运动，表明多米尼加全国决不会接受巴拉格尔政府以欺诈方式延长任期。当时在圣多明各代表美洲国家组织、美国民主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党国防的外国观察家，率先发起一场谴责巴拉格尔及其军人黑帮耍阴谋诡计的国际运动。这一次，美国的立场坚定，不承认任何未曾赢得大多数选票的政府。美国这一立场立即得到委内瑞拉以及对多米尼加革命党友好的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巴拉格尔最终不得不退让。经过3个月的深刻政治危机之后，巴拉格尔于1978年8月16日将政府移交给安东尼奥·古斯曼，这次政治危机证明巴拉格尔政府从多种意义上说是特鲁希略时代的延续。

安东尼奥·古斯曼就任了，他获得的政治支持比多米尼加共和国任何政治家所享有的要多。大多数多米尼加人民在目睹巴拉格尔和军官们耍弄各种计谋力图夺走多米尼加革命党的选举成果之后，终于背弃了巴拉格尔。古斯曼利用巴拉格尔及其军事首脑的不得人心，解散了巴拉格尔在1966年加以改组并从此一直掌权的特鲁希略式军事机器。这一军事机器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在1978年竞选运动最后几周内竟迫使巴拉格尔取消了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但是，最触犯舆论的事情是军人领袖不断滥用职权，在他们内部放肆地瓜分公共工程合同。他们想要的所有消费品都可以享受进口免税，而且都腰缠万贯充当同传统工商集团进行不

公平竞争的投资人和企业家。

多米尼加人投票要求变革。古斯曼是变革的候选人，他的整个竞选运动就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在那之前，古斯曼看来是一个忠于他的党的官僚机构的人。人们认为，该党在野 15 年之后会以 1963 年胡安・博什所试图采取的方式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完成基本的社会改革和加速土改的进程。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古斯曼企图建立一个家族统治的政府，而背叛了多米尼加革命党。古斯曼从他当政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执政的是他的政府，而不是他的党。他任命自己的孩子、侄女、兄弟、表兄弟和他最亲密友人的子女担任最重要的职务，而他们则按对自身有利的方式治理。贪污腐化在巴拉格尔时代达到了可耻的地步，因为许多人卷了进去，而现在贪污腐化则集中在一个家族的亲友身上。

结果，多米尼加革命党分裂为两派，那些在野的，立即参加到反对派行列。当古斯曼开始步特鲁希略和巴拉格尔的后尘设法无限期连任时，分裂变得更深了。由于这样做需要党的机器，而多米尼加革命党是向来反对总统连任的，古斯曼试图收买中层领导和党的积极分子，办法是将他们安插进政府就职。古斯曼在他任期第一年结束之前任命了近 8000 名新的国家职员，不到 3 年时间，他增加大约 18 万名由国家发饷的国家新职员。

政府的运转开支不久耗尽了几乎 100%的国家预算。公共工程项目停工了，因为缺乏投资资金，美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资助的许多其他开发项目一样也停工了，因为多米尼加政府没有对等基金。政府为了弥补公共部门空前的赤字，在没有必要储备的情况下大印钞票。最初，古斯曼及其政府设法为他们的经济政策辩护，说什么他们是在奉行以增加公共开支和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式。批评政府的人指出，多米尼加经济是极端开放的，对外部门要抵挡住货币流通量的过度增加，必然会造成国际收支的巨大逆差。不仅工业和农业无法供应国家，而且政府本身也需要进口以便确保它的经费，因为 43%

的公共税收来自进口税。经济辩论不时地激烈进行，但古斯曼及其政府继续为他们放松债务作辩护，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包括公共部门，进行资助补贴。

随着经济的畸形变得更加明显，人们认识到许多现象源于巴拉格尔时代，当时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鼓励进口替代工业的迅速增长，而且奉行冻结农业价格的政策以利购买工业产品的广大城市消费者，因为工业品价格不受控制。古斯曼试图赞成发展农业(在巴拉格尔政府期间农业发展落后了)，他大力支持农业改革，但为了资助他的农村计划，他还必须印刷更多纸币，所以他作出的有利于农产品的调整（诸如允许价格上涨）由于通货膨胀而被抵销了。

价格的上涨也严重影响公共企业。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公共企业部门在拉丁美洲属于规模最大之列，因为特鲁希略的全部工业、商业、农业和畜牧业在1961年和1962年被国务委员会没收后变成了国家的财产。多米尼加国家本身是全国60%的蔗糖生产业主，是多米尼加电力公司和近50%的商业和工业公司(于1966年被合并为多米尼加国营企业公司(CORDE))的业主。1968年，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国营公司价格制订委员会(INESPRE)，它的目的是干预农产品和农工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目的是通过津贴城市消费者的办法来保持价格稳定。因为农产品短缺，价格制订委员会过了一段时间就变为该国最大的食品进口商，其预算要多于海地共和国的预算。由于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增加(这是由于480号公法和美国商业信贷公司低价津贴所造成的)，多米尼加农业面临产品需求下降的局面，因为多米尼加农业无法与低价进口的产品和与价格制订委员会在城市低价销售的产品进行竞争。

随着1979年石油价格再次上涨，所有这些费用也开始提高。燃料和石油价格的内部调整，开始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不论是当地生产的还是进口的）的价格上反映出来。随着国际收支出现日益增大的逆差，多米尼加货币正丧失其价值，这样，到1982年，

1美元在自由市场上值1.35多米尼加比索，尽管政府试图保持官方的比价。各种各样的汇价逐渐兴起，这就掩盖这一事实，即政府想要使它的货币保持官方的过高定值，甚至不惜减少出口。当国际收支必须支持一种有利于某些特定工业品进口汇价和进口限额制而日益恶化时，这一政策消除了从外部取得外汇以支付进口的可能性。

现实终于暴露古斯曼及其经济学家们愿望的错误，外债的增加和石油价格的猛涨使得政府剩不下外汇来支付其他进口货款。公共企业为了使其产品价格降到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程度而不得不经常亏损，因此债务增加了，而且开始以高额利率的硬通货来举借外国贷款。古斯曼政府试图从出售多米尼加罗萨里奥矿业公司(1979年底收归国有)的黄金中所得资金来津贴中央政府，但徒劳无益。到1981年，整个公共部门已经很明显地处于破产的边缘。

古斯曼对8亿多外国贷款和赠款未加使用，因为缺乏对等资金，而这笔贷款本可以用来资助国际收支的逆差。尽管糖价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国营糖厂仍为其历史上最高的负债额而遭殃。多米尼加电力公司继续奉行出售廉价能源给公众的政策以使政府在政治上争取民心。但与此同时，它必须购买昂贵的外国石油，而它的现金周转的短缺现象极其严重，使它经常处于无法及时支付给卖主的境地，国家往往勉强留下供一周使用的石油储备供应。古斯曼为了力图争取民心，另一个做法就是设法扩大价格制订委员会的作用，使补助食品的供应范围扩大到更多数量的城区人民，结果使公共部门的赤字进一步恶化。

古斯曼尽管竭尽一切努力，但他的声望开始消失。他的政府被广泛视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骗局，在这一骗局中，总统利用多米尼加革命党来使他的家族致富并设法使自己无限期地当权执政，人们普遍失去幻想。从一开始就被古斯曼的官员敌视的商人和工业家，不断埋怨来自公共企业和价格制订委员会的不公平竞争。土地所有者抗议政府农业官员对他们不断施加威胁，这些农

业官员要在各地实施土改，而又不按法律办事，不对被没收土地的业主提供赔偿。工会及贫苦大众也对生活费用的上涨不断表示抗议。

随着古斯曼日益失去人心，提出了在政治上为巴拉格尔平反的问题。同古斯曼政府相比，巴拉格尔政府日益获得好评。巴拉格尔政府冻结流动开支的政策以及巴拉格尔实施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曾推动了经济，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并使许多社会阶层、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工商企业家们致富。古斯曼的最明显成就是政治方面的，他解散了巴拉格尔的军事黑帮，尊重出版、言论自由，同时允许国会有行动自由，而在巴拉格尔时代，国会只不过是行政部门的延伸。

同时，多米尼加革命党早已分裂为不可调和的两派，主要成了一个反对党，在党的总书记何塞·弗朗西斯科·培尼亚·戈麦斯和首都地区参议员萨尔瓦多·豪尔赫·布兰科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布兰科是著名的律师，1977 年曾在第一次党的初选会上同古斯曼竞选。当古斯曼认识到不可能再使他的党提名他连任时，他就设法使他的副总统哈科沃·马赫卢塔获得支持，但已为时太晚。多米尼加革命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并选举豪尔赫·布兰科作为 1982 年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布兰科答应建立一个属于党并服务于党的政府，而且他表现出一种甚至为他的敌人所公认的无可非难的正直形象。

古斯曼及其家族出谋划策以阻止豪尔赫·布兰科当选总统。他们竟然同华金·巴拉格尔缔结盟约，并向军方提出要它阻止选举，或者使豪尔赫·布兰科即使当选也活不到就职之日，但是军方拒绝了。由于古斯曼本人在他任期的头两年实行军队非政治化，以及由于美国坚持认为，为了避免发生像 1965 年内战那样的大动乱，多米尼加军队必须是支持民主的力量而不是阻碍民主的力量，所以军队的组成已有变化。其结果是，豪尔赫·布兰科终于击败华金·巴拉格尔而在 1982 年 5 月 16 日当选。这场竞选运动确实

令人难忘，可以说种种最新推销手段都用上了。古斯曼及其家族发现自身处境孤立而且很不光彩，有些人就利用他们任期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大捞一把。在全国银行界，一些政府官员将资产转移到大开曼岛和巴拿马，并在圣多明各交易所收购巨额美元，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古斯曼本人变得十分消沉，1982 年 7 月 3 日午夜他对准脑袋开枪自杀。副总统哈科沃·马赫卢塔立即宣誓就任共和国总统，竭力说服曾支持过古斯曼的军官接受豪尔赫·布兰科。1982 年 8 月 16 日布兰科终于在一场使多米尼加共和国濒于破产边缘的财政危机之中就职。

豪尔赫·布兰科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在他当选之前几个月拟定的，而且在全国大部分有组织的集团参加的许多公众讨论会上就预先透露过。豪尔赫·布兰科在竞选运动中许诺将以"经济民主"来完善政治民主。可是，他对危机的处理，就像他的政府必须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的调整计划一样，埋葬了建立这种经济民主的美梦，而且导致了多米尼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收入集中的突出现象。这一情况的发生正值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引人注目地下降而下层社会正承受多米尼加共和国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负担之苦。

当豪尔赫·布兰科于 1982 年中期开始他的任期时，宣告他的政府将要纠正折磨多米尼加经济的畸形发展。他说，在一个因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而受折磨的国家，想靠提高汇率来保护进口是不可能的，因为提高汇率根本无法适应货币贬值的现实。他认为公共部门继续举债以津贴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当国内价格不反映世界经济的价格结构（包括利率，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美国相比，利率极低）时，这对国民经济是有害的。如果说 1982 年 8 月对多米尼加危机有任何一致看法的话，那就是经济需要重新调整：农业因缺乏刺激因素而处于停滞状态；工业因国家提供过分的保护和巨额补助及优惠措施而效率低下；公共企业因政府付不起日益提高的津贴而处于破产

边缘；财政体系已丧失吸引资金来充分资助公共部门的能力；国际收支逆差使得国家欠款 4 亿多美元，在净国际储备中有 7 亿多美元赤字。

对一个只有 560 万人口、年出口值不超过 10 亿美元、预算仅有 10 亿多米尼加比索的小国来说，如果不作特别努力来实行紧缩，不限制开支和公共信贷，不大大增加外援、特别是应急援助以着手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话，这一局面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曾经十分乐意借款给古斯曼政府的外国银行，现在都拒绝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信贷，除非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项协议。而就这一协议进行的谈判是极其激烈的，因为政府试图利用这种谈判来表明实行紧缩、缩减信贷、降低工薪和提高物价以及对进口实施新的限制，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豪尔赫·布兰科的经济学家们投身于经济调整的拙劣运动，他们拒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但试图使得公众相信这些决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尽管经济失去平衡是由于结构失调，但中央银行仍力图控制经济。货币当局决定调低与美元的汇率以达到很久以前失去的平价，对布兰科施加压力，要他派遣警察和军队去关闭交易所，这样，人们就必须到商业银行去买卖美元。眼下可以预测的结果是，金融异常混乱，资本大量外流，投机浪潮使比索贬值了 100％以上。不久，政府就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的考虑欠妥，最后决定使交易所合法化以力图恢复财政平衡。但是，汇率仍保持在 3 比索对 1 美元，而物价并未停止上涨，因为进口商立即调整了他们的国内价格以反映新的汇率。豪尔赫·布兰科政府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欲强加的条件仍持谴责态度，这些条件基本上是：停止发放一切无保障的款项，冻结公共开支，对国营企业的赤字及公共赤字加以控制，提高直接税以增加财政税收，加强对进口的控制和提高利率。

在豪尔赫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些措施。但是，政府发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是它可以转嫁调整计划中的政治过错的坏蛋。这种谋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类性质的纲领意味着调整国内价格以适应实际汇率，其结果是，价格上涨而使大部分居民无法容忍。这一政策的受挫于1984年4月底变得很明显了，当时政府的决策人企图利用复活节前的一周假期来提高所有必需产品的价格，因为城市中产阶级没有防范，不在城里。政府的决策人缺乏政治敏感性，看不到抗议会来自穷人，穷人既未上山也未下海。在下一个星期一，全国就目睹了一场民众起义，军队杀死了70多名反对政府经济政策而发动抗议的人们，起义在3天后才得到平息。

尽管人们叫喊要豪尔赫·布兰科替换中央银行总裁，但政府在1984年12月之前继续推行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抗的政策。1984年12月，事态已很明显，多米尼加共和国若不与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债务的话，就难以为继了，更不用说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一项协议来阻止国际收支的全面崩溃，否则，就意味着断绝一切外国信贷，缺乏石油而使全国瘫痪，以及取消大部分工业品进口。

中央银行总裁终于被解职，当1985年1月25日颁布普遍贬值的法令并为该国所有金融活动规定一个新的统一的汇率时，豪尔赫·布兰科恢复了他在一些工业家和商人中的声望。当许可美元在市场上自由浮动时，多米尼加经济全面地进入了类似其他拉美国家在以前危机年代所经历过的美元化的正式进程。贬值的影响立即显现。财政预算和国际收支的失衡状况仍继续存在，但是新的国内价格和新的官方汇率有助于促进以前不曾存在的新的出口部门的发展。而且，农产品的价格以前必须受到控制，而此时被许可浮动，从而为生产和出口农工产品提供新的刺激因素，多米尼加的农业得以复苏。

与此同时，各政党开始准备定于1986年5月16日举行的普选。这是多米尼加现代史上最有争论的选举。改革党的华金·巴拉格尔以4万票的微弱多数险胜多米尼加革命党候选人哈科沃·

马赫卢塔。考虑到巴拉格尔是在1978年他名誉扫地和青光眼已使他完全丧失视力的时候失去他的总统职位的，这位年届80的前总统在25年内第5次东山再起，确实是十分异乎寻常的。巴拉格尔尽管失明和有病，但仍能够团结和整顿他的党，仿效老的基督教民主党走过的路，他的党改名为基督教社会改革党并接受一种类似多米尼加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和类似多米尼加革命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络网的国际关系结构。多米尼加革命党与社会党国际有多年的联系。

多米尼加革命党内部不断的倾轧及其8年统治期间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处理的缺陷，帮助了巴拉格尔的东山再起。1986年举行的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初选代表大会以枪声和严重混乱而告结束，巴拉格尔虽然面对这样一个已瓦解和分裂的党，但看来还能够重新组织经济和施行政治权威。1986年总统选举入选的第3名是前总统胡安·博什，近年来他曾设法组织一个由革命干部组成的大型的意识形态的党，名叫多米尼加解放党（PLD）。该党赢得了1986年选票的几乎20%，比它在1982年选举的成就翻了一番，从而表明打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通过选举上台的一个激进左翼有了迅速发展。博什的党给国家带来了不同的政治风格，这可以主要说明它为什么壮大了；而其他的传统大党却仍然保持某种反映内部倾轧或领袖利益的说教，相反，博什的党则一贯保持一条维护国家最穷苦人的政治路线，而且显示出能从国家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中获得政治好处的本领。

第12章

1930年以来的海地

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海地经历了生活水准的逐步下降、土地状况的恶化（全国土壤流失出现惊人的发展），以及人口从250万急剧增至大约600万。尽管海地政府偶尔作出一些努力以及外国使团无休止地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对于制止这个国家衰落却无所作为。诚然，这些外国的干预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十分有害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所要求作出的改进不是为了农民的个别利益，而只有在某一地区的全体土地所有者作为合作社企业进行经营时才会行之有效。海地历届政府通常不可能或不愿意给予保证以使这类项目成为可行。①

所有这些年中，海地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生产供当地消费的食品以及一些出口作物。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咖啡。鼓励大规模生产诸如蔗糖、棉花和西沙尔麻等其他作物的努力，成功有限。大部分工业消费品是进口的，主要从美国进口 。曾试图开发铜矿和铝土矿，但成果不大。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大部分位于首都和首都周围的轻工业和装配厂有了迅速增长。这些工业占了1985年全国外汇收人的一半以上，当时海地以世界最大的垒球制造国闻名。但是，1986年让—克洛德·林瓦利埃倒台后，40

---

① 马茨·伦达尔在许多著作中着重强调这些因素是构成海地贫困的原因。见《农民与贫困：对海地的研究》（伦敦，1979）和《海地经济》（伦敦，1983）。

家以上的这类企业关闭了。旅游业发展颇为不均，其繁荣取决于该国政治和卫生的声誉起伏。海地因为贫困，在加勒比地区仍处于最为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之列，出口和进口系数大大低于该地区其他岛国。

1930年以后这段时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移民，内部的和外部的移民。如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海地也有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妇女，流向首都太子港，到20世纪80年代，太子港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同样重要的是，海地砍甘蔗工，主要是男人，移居邻国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其中，有些人是季节性移民，其他一些人居留数年，许多人则在东道国定居。在杜瓦利埃家族统治下，移居美国的移民人数已逐步上升为一个为数众多的人口流。

在这个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穆拉托人精英阶层的权力衰落，虽然还没有迹象表明居民的财富出现重大的重新分配。穆拉托人的政治实力在埃利·莱斯科（1941—1946年执政）被推翻之后衰落了，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杜瓦利埃时代，他们仍设法保有（日益减少的）国家财富中的主要部分。农村和城市的黑人中等阶层继续变得日益重要。甚至在19世纪末，他们就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了。在美国占领期间（1915—1934年），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加强，莱斯科未能认识黑人中等阶层的力量，可以部分地说明莱斯科政府倒台的原因。因此，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些论述海地的作家认为黑人中等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无足轻重。迪马赛·埃斯蒂梅（1946—1950年执政）和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57—1971年执政）的黑人政权使得黑人中产阶级一部分受宠的阶层获益，但通常也从一些穆拉托人政客那里得到支持。在杜瓦利埃总统时期，阿拉伯商人家庭是最后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权（1971—1986）变得日益依赖于企业界的亲善友好。

从最早年代直到美国占领期间，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对海地的政治发展施加过一定的影响。可是这一作用是时有时无的，而

且多半是消极的，因为这一作用通常是采取将已经变得无法容忍的政府推翻的形式。广大群众对如何治理国家很少有什么重要的发言权。1986年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被推翻，的确表明农村首创精神的传统有了恢复，尽管有黑人领袖们的民众主义言论，这一传统在美国占领之后衰落了，政治活动日益集中在首都。

尽管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经济日益衰退，而且出现向日益激烈的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势（至少到60年代中期），但在193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诗歌、小说、视觉艺术、音乐和舞蹈都繁荣了起来。然而，杜瓦利埃独裁统治将创作的作家流放国外，许多重要的原作来自海地流亡者。

正如1860年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间所签订的宗教事务协定以来的情况那样，罗马天主教会在海地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了中心作用。在1941年针对伏都教而进行的有力的、有时是暴力的甚至"反对迷信"运动遭到了失败，这使天主教会受到挫折。埃斯蒂梅政府和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政府被视为反教权的，这些政府利用它们的权力，特别在教育领域限制天主教会的影响。的确，"老大夫"杜瓦利埃对天主教会政治上的自负给予了若干严重打击。教会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对批评杜瓦利埃统治的人给予的支持，是推翻"小大夫"的重要因素。

美国驻海地高级专员在其1929年的报告中确信地断言海地农民不再以疑惑的眼光看待美国的占领，"现在反而认为美国是朋友"。[①]美国一直管理这个黑人共和国的事务达15年之久。1915年7月对海地的入侵，是控制加勒比地区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华盛顿由于获得古巴的关塔那摩，对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海军基地的愿望减弱了，但它十分关注，以防止欧洲国家在该地区建立任何更多的阵地，因此对德国在海地的侨民区日益增长的力量尤其感

① 美国高级专员第7次年度报告（1919年1月3日），第1页。

到惊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人控制了海地的大部分对外贸易，美国国务院担忧获胜的德国可能试图增加它在海地的势力。此外，美国人非常想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一些有利于美国国民进行私人投资的政权。因此，1915 年美国部队占领海地，既有战略动机，又有经济动机，而且认为美国有道义责任来“援助”这些加勒比国家。

少数讲法语的重要阶层和一般浅肤色的精英分子对美国的占领表示欢迎，美国的入侵只遇到零星的军事抵抗。精英集团将海军陆战队的到达视为自己可能在该国重新建立控制的一种手段，而在这以前的几十年，他们手中的控制权失去了。美国人发现菲利普·絮德雷·达蒂格纳夫（1915—1922 年执政）是一名驯从的傀儡总统，因而强行制定一部新宪法，规定外国人土地拥有权合法化，而这是从 1805 年以来所有宪法（除了亨利·克里斯托夫的宪法）都禁止的。以劳役形式再度引进强制劳工的企图，是爆发 1918 年夏尔马涅·佩拉尔特领导的抑制占领的游击战的原因之一。这造成了重大恐慌，美国派遣增援部队，经过许多月的战斗，伤亡数千人，佩拉尔特身亡，起义被平定下来。

1920 年后，日益增长的反对派力量通常限于正规的政界和新闻界。尽管 1929 年美国高级专员表示乐观，但后来同年发生的抗议运动造成了美国飞机轰炸莱凯，致使参加和平示威的 20 多名农民身亡。胡佛总统作出反应，派遣了前足球教练和前驻菲律宾总督威廉·卡梅伦·福布斯为首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福布斯由三名年长的记者和一名退休外交官陪同，于 1930 年 2 月到达海地。调查委员会中无一人讲海地克里奥尔语，只有一人讲法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们在海地度过了两周，主要时间花在首都访问海地精英人士中的不满分子和美国官员。委员们回国后建议武装部队和文职人员迅速实现海地化，导致了 1936 年的撤军。两名委员赞成立

即结束占领。[1]

到1930年，路易·博尔诺的卖国政权（1922—1930年）已变得普遍不受欢迎，福布斯调查委员会建议在一名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总统主持下举行新的选举。选举结果是上层中产阶级的穆拉托人斯泰尼奥·樊尚得胜，他的两名主要对手是一名穆拉托人精英分子塞穆·普拉代尔和一名海地北部的中产阶级黑人让·普顿斯·马尔斯。新总统不久开始要求美军及早撤离，并与富兰克林·罗斯福达成于1934年结束占领的协议。

1930年迄今，海地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80%以上的人口从事于这一经济部门。这些人中大部分居住在并耕种于由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占有的小块地产，或者居住和耕种他们的家庭已占耕数代人之久的土地。他们生产咖啡和蔬菜，咖啡出售给投机商（中间人），蔬菜供当地消费，保留一些供家用，其余部分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妇女在农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她们不仅在农田耕耘而且还是市场经营的主力。主要出口物是咖啡，蔗糖变得日益重要。其他出口物包括西沙尔麻、木材和香蕉。虽然大部分土地被分成小块，的确也还存在若干大种植园，为海地人或美国公司所有。这些公司，诸如海地—美国糖业公司（HASCO），获得政府土地的租让权，剥夺了小农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因此，为新创建的庄园提供了潜在的劳动力。尽管如此，但也进行过发展像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那样的大规模农工业的尝试，但失败了。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状况混乱，需要采取长期的花费昂贵的法律行动来澄清这一局面。在美军占领期间开始了地籍测量，但是记录却被大火神秘地烧掉了。大部分制造品及奢侈品是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进口的。在

---

[1] 见罗伯特·斯佩克特：《威廉·卡梅伦·福布斯和驻海地胡佛委员会》（1930），马里兰州，拉纳姆，1985。

城镇，有一些生产鞋、肥皂和其他家庭必需品的小工业，但工资很低。美国金融顾问悉尼·德拉鲁反对提高工资的措施，因为资本不会再吸引到该国去了。

蔗糖工业在海外的发展以及土地的被剥夺，导致大批人从海地移居他国，最初是去古巴，后来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海地侨民人数从1916年的5000人，增加到1930年的可能约8万人；仅1936—1937年一年，就有3万多海地人从古巴被遣返回国，1937年，数目不详的人数（也许1.5—2万人），由于特鲁希略实行“边界非非洲化”的政策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被屠杀。[1] 多米尼加政府承认对这一起屠杀负有责任，并同意支付赔偿，但看来赔偿费没有多少能到达死亡者家属的手中。

占领后的年代，美国进一步对海地投资，即使美军撤离后，经济仍继续受华盛顿控制，一名财政官员被留下来以监督政府的各项政策。但是，樊尚总统（1930—1941年）软硬兼施地对付反对派人士而设法获得基础相当广泛的支持，他提出了一部新宪法，授予总统以包揽无遗的权力，并为他的再次当选铺平道路。但是接近30年代末，不满情绪特别是一些黑人中产阶级中间的不满情绪，开始深化。出现了关于陆军发动政变的谣传，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樊尚以鼓动骚乱为由罢免了一些参议员。1938年，英国领事劝阻调解委员会访问海地，调解委员会是被任命来研究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动乱的原因的，他认为，这类访问会鼓动不满情绪，置海地政府于困难境地。樊尚总统公开表示他相信民主制不适宜于海地的政府制度，并直言不讳地钦佩一些欧洲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他的这种表示使美国政府感到尴尬。1941年樊尚由埃利·莱斯科接任，他是博尔诺政府和樊尚政府的原内阁部长，多

---

① 见H·何塞·金略编：《有关1937年多米尼加——海地冲突的文献集》（圣多明各，1985）；另见胡安·曼努埃尔·加西亚：《对海地人的大屠杀：1937年特鲁希略的灭种罪行》（圣多明各，1983）。

年来他也在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手下工作。

新总统在当选前是海地驻华盛顿大使，众所周知，他是强烈亲美的。他立即作出安排，对美国控制的海—美农业发展协会（SHADA）给予大批土地租让，以生产橡胶和西沙尔麻。这涉及了将4万多户农民家庭从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上撵走，大约清理出20万英亩优质农业土地；到1943年，海--美农业发展协会雇用了9万多名工人。像独立后的几乎所有大规模农业方案一样，橡胶项目惨遭失败；传统农业中断了多年；好几千人无家可归；损失了百万计的美元。当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莱斯科立即对轴心国家宣战，趁机没收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占有的财产。与樊尚不同，莱斯科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保持黑人和穆拉托人之间的某种平衡；黑人发现自己一贯被排斥在有利可图的职位和公共生活的影响之外，而莱斯科家族成员都被任命担任政府职务。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镇压也随之加剧；但是，1945年盟国获胜，到处出现新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许多海地知识分子仍寻求启迪的法国，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的左翼联盟看来正在兴起。激进的社会变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了。由于莱斯科政府的镇压政策，不满情绪日益加剧。1945年12月，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的海地之行是点燃革命营垒的火花。由包括雅克·斯泰芬·亚历克西和勒内·德佩斯特在内的一批年青知识分子编辑的《道路》杂志出版了特辑以祝贺布勒东的访问，特辑还刊登了布勒东的演说全文。警察查封了该杂志。学生提出抗议，很快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示威。1946年1月，由三人组成的军人委员会接管政府，并很有礼貌地护送总统到机场。人民歌唱道："莱斯科离开了，哑口无言地离开了。"

莱斯科的离开标志着一个紧张的政治活动时期的开始。一些政党成立了，一些政党分裂了，一些联盟和"阵线"建立，一些解散了。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全国，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们崭露头角。新闻出版活动是空前的，1946—1947年，出版了60多家日报

和周报，大部分杂志则以首都为基地，但也有许多出现在各省。仅戈纳伊夫一个地方，至少出版了4种杂志：《都市》、《民众》、《阿蒂博尼特》及《光辉》。

在1946年的最初几个星期，总统竞选运动是以意识形态和阶级问题为主的，但是随着竞选运动变得更加激烈，始终存在的肤色问题作为组成联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出现了。最有影响的左翼政党，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社会党（PSP），是以精英家庭出身的穆拉托人居统治地位的，但该党支持南方的一名自由派黑人候选人埃德加·内雷·努马。这一集团的主要思想家是艾蒂安·沙利耶和安东尼·莱斯佩斯。小小的海地共产党（PCH）主要是一个黑人团体，由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费利克斯·多莱昂·朱斯特·康斯坦领导，他还被一伙年轻的激进分子——海地青年人民民主党（PDPJH）拥为候选人，该党与《道路》杂志有联系。

在黑人当中，工农运动（MOP）以达尼埃尔·菲尼奥勒为首，他是一名具有领导魅力的数学教师，是太子港穷人崇拜的偶像。这一运动的秘书长是莫测高深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他在该运动抗议精英权力方面一向慷慨陈词。该运动的政治力量是以菲尼奥勒、埃米尔·圣洛特和克洛维斯·德西诺尔为首的国家民众党。由于菲尼奥勒太年轻，无法竞选总统，工农运动提名D·P·卡利斯特为候选人，他是海地警卫队的原头目，被樊尚总统免职，黑人的《火炬》杂志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穆拉托化”政治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范围广泛的更为保守的黑人赞同《阿蒂博尼特》杂志社内来自韦雷特的中学老师迪马赛·埃斯蒂梅，他们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强大。这些黑人组织，再加上海地共产党和海地青年人民民主党，组成一个名叫海地革命阵线的松散联盟。

保守力量分裂为许多政治集团，这主要决定于对个人和家族的效忠。民族发展民主党控制《观察家》杂志，不妥协国民党出版《真理》，《投石器》周刊实际上是布鲁图斯家族的内部杂志。大部分保守派支持比尼翁·皮埃尔—路易，尽管面对当时的激进趋

势，获胜的希望渺茫。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所有主要的总统候选人都是黑人。很明显，肤色是 1946 年政治斗争中最突出的因素。

1946 年 5 月举行参议院和立法议会的普选。由两院的联席会议上选出总统。《国家行动》呼吁“选举黑人，赢得革命”。虽然很明显新总统会是黑人，但黑人谴责皮埃尔—路易和内雷·努马是精英阶层的傀儡。在谈到重要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时，以穆拉托人居于优势的集团一般都避免明确提到肤色，但黑人却不那么抑制。他们要选举一个黑人群众“真正的”代表，责骂穆拉托人精英分子的排他思想和妄自尊大。

当埃斯蒂梅在第二次投票中当选时，他的主要对手一起支持他了。卡利斯特宣告他退出公共生活；工农运动的菲尼奥勒和人民社会党的乔治·里戈同意参加他的第一届内阁；海地共产党和海地青年人民民主党的大多数也宣布支持他。勒内·德佩斯特认为新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先锋，准备实现“生活条件的全面转变”。但是，这种一致是为期短暂的，这些集团不久就成为反对派。人民社会党的穆拉托人攻击政府实行种族歧视，而工农运动则声称政府根本没有为黑人群众做什么事。工农运动的《堆栈》杂志在 1946 年 11 月一篇题名为《穆拉托很邪恶》的文章中，宣称“历史证明，尽管黑人对穆拉托人友好，黑人总是穆拉托人伪善和玩世不恭的牺牲品”。在埃斯蒂梅总统的整个任期内，弗兰克·拉沃、安托万·勒韦尔和保罗·马格卢瓦尔的军事三人小组仍在幕后。1946 年 1 月他们发动政变，昔日的军人主义传统再度出现。美国占领当局组成一支非政治性的职业军队的企图显然失败了。

政府对反对派采取越来越压制的措施，并企图取缔一些工会。工会团体中说话最多的是工农运动，它在船坞、自来水公司、拔佳鞋厂和蔗糖生产领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海地工人联合会，代表电力、铁路、印刷和铜矿业的工人。第三个组织是全国联盟，隶属于美国劳联—产联。它在烟草、制革、海关和面包房有会员。还有一些独立工会，包括司机导游和建筑工人工

会。工会集中在首都，因此其影响同人数不多的会员不相称。安静而不显眼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曾担任过一个时期负责劳工与公共卫生的国务卿，对这些劳工运动特别感兴趣。在埃斯蒂梅政权时期，杜瓦利埃与洛里默·丹尼斯相勾结，也利用他的影响促进“民间”运动，并培植对伏都教比较同情的态度。这导致了同诸如佩尔·富瓦塞和保罗·罗伯特主教等人为代表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世界市场上咖啡价格上涨，这意味着海地人口中的重要阶层享有某种程度的繁荣。埃斯蒂梅打破了标准果品公司对香蕉出口的垄断，对支持他的人作出让步。但香蕉业明显地衰落了。埃斯蒂梅鼓励旅游业，并组织举行太子港建港200周年隆重的庆祝活动。他设法将一些国家恩惠扩大到人数很少的精英阶层以外，适度地改进了他的家乡阿蒂博尼特省和太子港黑人中产阶级的地位。据估计，到1950年，首都黑人中产阶级人数几乎有4万人，也就是说，占首都人口的1/4。但是，埃斯蒂梅招致一些重要集团的敌视；流亡分子在特鲁希略的支持下开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组织起来，当埃斯蒂梅企图修改宪法以便使他能第二次连任时，激发了同一个三人执政委员会——拉沃、勒韦尔和马格卢瓦尔——发动的军事政变，莱斯科已被三人执政委员会处决。

这一政变及其后果，表明精英阶层拚命试图重新确认其霸权。马格卢瓦尔（1950—1956年执政）实际上是1950年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企业界和天主教会欢呼他的当选是明智和文明的胜利。马格卢瓦尔尽管出身于黑人家庭，却表现为民族团结的鼓吹者，而且被视为穆拉托人精英分子的代言人。戈纳伊夫的罗伯特主教从他新建的三层宫殿里，将马格卢瓦尔说成是给全国带来“一次新的解放”的“救世主”。像当泰斯·贝勒加德及吕克·富歇等知识分子也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马格卢瓦尔与美国和特鲁希略均保持良好关系，他在首都总统活动中挥霍无度。他的政府对道路

和的大作了一些改善，但他的一些重大项目，如佩利格尔水坝，未能实现。在最初年代，经济状况对政府是有利的。世界咖啡价格持续上升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生产保持相当的稳定。在马格卢瓦尔年代，旅游业发展很迅速，访问海地的人数增长 4 倍。

随着马格卢瓦尔任期的接近结束，不满情绪增长了。1954 年 10 月，一场飓风毁掉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不仅使城镇遭到破坏，而且将咖啡树和可可树连根刮倒。政府的贪污腐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总统开始作出连任的安排。当一些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集团抗议时，恐怖活动加剧了。首都爆发的人民示威进一步表明政权的虚弱性，提醒最高司令部清除他们的同事并护送马格卢瓦尔到机场。

马格卢瓦尔的离开象征着 9 名主要人物之间竞争总统职务的公开政治竞争时期的到来。一系列为期短暂的临时政权企图维持控制并根据他们认为有利于其候选人的条件安排选举。军队在这些谋略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军官团几乎同文职政客们一样四分五裂。计划于 1957 年 9 月举行选举，届时仅有两名有效的候选人仍留在这一领域。有些人发现进程太艰苦而退出了；菲尼奥勒被流放海外；克莱芒·胡梅莱曾经与马格卢瓦尔关系密切，军队对他害怕。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是态度温和的黑人乡村医生和业余民族学家，他的对手是南方和蔼的穆拉托人企业家路易·德茹瓦。安东尼奥·凯布罗在军队内部是权力斗争的获胜者，他赞成费朗索瓦·杜瓦利埃，认为杜瓦利埃可加以操纵。精英阶层、天主教会领导层和美国大使馆赞同德茹瓦。但是，圣公会主教已经说服美国大使相信杜瓦利埃是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

选举结果，杜瓦利埃明显获胜。他在北方和阿蒂博尼特以及大部分城市里获选票特别多。德茹瓦只有在他家乡南方及首都周围获得多数选票。无疑，双方均有舞弊现象，但其结果很可能一般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情绪。

伏都教仍然是海地绝大部分居民信奉的宗教，虽然他们多数人也会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伏都教作为一种逐步吸收基督教成分的若干非洲宗教的混合物，是在殖民地时代圣多明各的奴隶当中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崇拜上帝（Granmet 或 Bondie）和神灵（他们称之为 Iwa）。礼仪包括祈祷和唱圣歌，伴以击鼓和饮白朗姆酒，奉献祭品，出现"着魔"现象，这是人类学家们所作的使人产生错误印象的描述。而海地的皈依者自己则谈论要变成马（Cheval）被神灵"坐骑"，这多少有点不同的含义。

在整个 19 世纪，受过教育和识字的海地人往往贬低伏都教的重要性，甚至拒不承认它的存在，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民间舞蹈。对他们来说，欧洲提供了应该遵循的文化模式；像伏都教这类体制显然使人难堪。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类文化学运动之后，许多海地人同 J·C·多圣维尔和让·普赖斯·马尔斯有了交往，开始接受并重视民众文化中的这些非洲成分。这一运动与主张结束占领的民族主义要求有着密切联系，但 1934 年后，这一运动在种族理论方面变得更加激进。

在人类文化学运动、特别是阿蒂尔·奥利的深奥理论的启迪下，有些年轻人，像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及其文学伙伴洛里默·丹尼斯，开始坚持认为海地人由于生物学上是属于非洲种族或黑人种族，所以在心理上不同于白人，不应设法遵循欧洲文化、教育和社会结构的模式。这些人中有些组成了黑人巫师、乐师集团，是以传播民间智慧给年轻一代的非洲村中智叟命名的。对他们来说，伏都教不是巫术，也不是迷信，而是"返回传奇般往昔的心灵作用……在不可思议的今世面前一个种族意识的超常表达"。[1]这一伙人主要包括出身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年轻黑人，但也包括著名的穆拉托诗人卡尔·布鲁阿尔。布鲁阿尔的父亲是商人，有一

①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和洛里默·丹尼斯：《种族心理与沿革》，载《黑人巫师、乐师》4（1939 年）第 500—501 页。

个时期担任太子港的市长。当时，布鲁阿尔为伏都教写圣歌和诗篇，这些诗篇浪漫主义地描绘一个带着产品从山而降的瘸腿农民。

像这批人中许多人一样，布鲁阿尔钦佩欧洲法西斯主义并为以民众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独裁主义政策进行辩护。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前，他已成为这些人所追求的某种政治领导典范，这是海地知识分子认为的真理时刻，他们猛烈地批评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欧洲民族的无所作为。但是，有些穆拉托人天主教作家继续讲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好话，而“法国行动”找到了代言入热拉尔·德·卡塔洛尼尔。甚至希特勒也有他的海地辩护人。樊尚总统从崇拜他的独裁主义立场的穆拉托人和黑人那里得到支持，尽管他本人也批评黑人强调海地的非洲传统，将它看成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倾向。

若干海地诗人，包括鲁桑·卡米耶、让·F·布里埃和勒尼奥·贝尔纳，作为黑人文化运动的先知而在法语世界获得国际声誉，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其他作家则受到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强烈影响。这一运动的两名主要代表人物是勒内·贝朗塞和克莱芒·马格卢瓦尔·圣奥德。后者的《我的明灯的对话》(1941) 也许是这一倾向的最激进的表现。雅克·鲁曼把这一倾向描绘成“一种凶残的机器：反资产阶级，但是消极的和无政府主义的”。1946 年这一年，在年轻一代中，文学人才猛增，特别是同《道路》杂志有关的人。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 21 岁的勒内·德佩斯特发出的尖刻声，德佩斯特的诗集《火花》反映当时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

1941 年罗马天主教会在莱斯科政府的充分支持下发起的所谓反迷信运动，在争取文化领域中无上权威的斗争中标志着一个决定性阶段。可以将它视为穆拉托精英分子力图维持他们的霸权的尝试，办法是压制或至少遏制对民间创作的兴趣、特别是对伏都教信仰的复兴。他们在全国举行了传教活动，信徒们在传教中被敦促要立下“反迷信”的誓言并毁掉他们的伏都教圣物（万加），伏都教庙堂被毁，物品被烧掉。反迷信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包

括戈纳伊夫的主教保罗·罗伯特和海地青年神父雷米·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这一运动创作了圣歌集；这些人物在杜瓦利埃20世纪60年代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中再次出现。这一运动激起猛烈的反对，以致几个月之后，当教堂内在举行传教活动中发生开枪事件时，这一运动就突然结束了。

对这一运动的主要批评者是民族文化局主任雅克·鲁曼。他谴责政府和天主教会领导层，他争辩说，海地人民并不比其他人迷信；伏都教应像所有宗教一样被视为一种宗教，它是异化的产物，而且必然会随着它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消除而消亡。在美国占领后的年代，鲁曼曾成为权威的左翼知识分子而暂露头角，1907年他出身于穆拉托精英家庭，他主要是在欧洲接受教育的，1927年返回海地，立即加入以《突破口》和《土著杂志》为中心的文学界。鲁曼一方面为民族主义运动辩护，要求结束美国占领；一方面则又声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正在利用这一运动加强对群众的控制。肤色偏见也是各种肤色的肆无忌惮的政客们为其各自目的玩弄阶级矛盾的一个面具。20世纪30年代初，鲁曼成立了共产党，但不久即被樊尚流放国外。

鲁曼主要是在普赖斯·马尔斯和人类文化学运动的影响下撰写有关海地农村的诗歌和小说（具有非洲传统），以及撰写描述首都资产阶级生活空虚的故事。他最驰名的著作《露水总督》出版于1944年（他逝世的那年），是关于一名砍甘蔗工从古巴返回家乡的故事，他在家乡对人民听天由命的态度提出挑战。小说提供的信息是，男男女女通过了解现实以及通力协作，就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灌溉自己的土地，成为“露水的主人”。鲁曼坚持认为，必须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重要武器。①

那个时期，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与政治生活需要专

① 雅克·鲁曼：《肤色歧视与阶级斗争》载《系统分析》，第32、34页（太子港，1934年）。

家治理。诸如朱尔·布朗谢这样一些人，撰写文章谈专家的重要性，并且设想了一个官僚乌托邦，在那里社会科学家们规划一个更加光明的前途。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一般说，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阶层的现象，未作出什么努力来争取农民或人数很少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注意或支持。

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上台执政，他获得主要是黑人中产阶级政治家中重要集团和地方领袖的支持。在乡下，这些人拥有中等规模的财产，能够为他们较贫困的邻里提供临时就业，并借款给他们购买种籽、肥料及其他必需品，他们中有些人是投机商，他们购买小农的咖啡，然后出售给港口的一些出口公司，从而构成连接城乡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还包括一些伏都教牧师，这些人在乡村生活中起着有影响的作用。上个世纪的游击队领导人正是出身于农村居民的这些中等阶层，正是他们领导了反对美国占领的武装斗争。杜瓦利埃也获得首都和各省城镇的中产阶级的集团的支持，他还获得民族团结党的支持，该党成立于1957年2月，出版物为《概览》。这一集团还包括朱尔·布朗谢（同老的人民社会党有联系）及其兄弟保罗，还有米歇尔·奥堡、约瑟夫·巴吉代和其他黑人思想家。这些人代表杜瓦利埃主义的“左翼”——言辞上是民族主义的、反美的，因此被美国大使馆称为“秘密共党分子”。杜瓦利埃还得到一些不满的穆拉托政客们的支持，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迪维尼奥和维克托·内韦尔·康斯坦，商人埃内斯特·贝内特和前纳粹同情者让·马格洛瓦尔。最后两人同圣公会有联系，该会主教在确保美国早期支持杜瓦利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杜瓦利埃在海地历史上第一次任命一位神父担任教育部长，此举聪明地使主教们感到放心。杜瓦利埃宣布他正在邀请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团来帮助训练武装部队。这些步骤把该国两个强大因

素——天主教会和美国大使馆——有效地捆住了手脚，能使新总统处理更为迫切的问题。

杜瓦利埃最初的步骤是直接针对他的政治对手和军队领导层。他在由克莱芒·巴尔博组织和领导的被称为“蒙面人”的民兵的帮助下，对反对派领袖采取恐怖手段，并对他们企图推翻其政府的笨拙的尝试给予无情打击。他将若干高级陆军军官调到农村地区，然后罢免孤立无援的凯布罗的职务。杜瓦利埃在其早年经常更换军事领导，罢免有政治野心的军官，提拔忠于他本人的年轻黑人士兵。对民兵进行整顿，将其组织成国家安全志愿部队、杜瓦利埃派统合会和其他小机构。这些组织即众所周知的“通顿马库特”特务机构，那是依据强行将顽童装进背包的民间传说人物来命名的。虽然马库特主要是实行恐怖和警戒的工具，但它们也履行如下重大职能，如在全国为政权征得支持，鼓励海地老百姓感到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通过这些组织汇集少许财政赞助。

杜瓦利埃在消除了对他的政权最燃眉之急的威胁之后，将矛头对准一些神父，特别是从事教学的神父。圣灵神父会的头头佩雷·艾蒂安·格里昂昂贝热是早期的受害者，他原是马格洛瓦尔总统的密友，用内阁部长保罗·布朗谢的话说，他同另一名神父一起，因鼓动反对派组织和破坏“国家的精神团结”而于1959年8月被流放出境。大主教提出抗议，政府对他发了逮捕状，但又撤销了。当天主教日报《部队》有节制地支持一些学生抗议逮捕时，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随即进一步加剧。

1960年末，普瓦里耶大主教被驱逐出境，理由是他曾资助一些学生共产党组织（他持独裁主义的右翼立场，这样的控告是不寻常的）。《部队》被政府查封，十几名神父和修女被逮捕。杜瓦利埃以及所有与大主教被驱逐有关的人，均被革出教门。对罗马天主教会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包括关闭神学院，驱逐耶稣会教士，停办教会杂志，取缔天主教工会。对圣公会的一些成员也采取了措

施，圣公会大主教后来于 1964 年被驱逐出境。到此时，原教育部部长让·巴蒂斯特·乔治和另外一名神父都是参与策划从迈阿密入侵的主要流亡领袖。

在那期间，杜瓦利埃还正在同其他潜在的反对派势力进行较量。1960 年中期，他已意识到一起由美国大使馆鼓动、由通顿马库特头目克莱芒·巴尔博领导的暗杀他的阴谋。巴尔博及其若干支持者被捕，但他从狱中获释后过了一些时间，他对政府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这场运动开始是明显企图绑架杜瓦利埃的孩子。1963 年 7 月，巴尔博及其兄弟在一场同政府军的枪战事件中终于被打死。

由于杜瓦利埃的残酷无情，企业界以罢市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传统手段起不了作用。杜瓦利埃干脆命令马库特用铁橇将店铺打开，让暴民去抢劫，业主们不久就只得返回。同样地，杜瓦利埃也对学生罢课作出反应，关闭原来的大学并在政府牢固控制下开办一所新的"国立大学"，如果学生希望继续学习下去，就不得不重新注册。工会保留其独立性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 1964 年工会也终于被剥夺了所有的自治权。[1]

一个证明比较麻烦的权力中心是美国大使馆。自从 1915 年美国入侵以来，华盛顿曾享有某种权利以确定在海地所发生的一切。如上所述，美国曾经准备好接受杜瓦利埃当总统，并同意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去帮助训练海地部队。这一海军陆战队于 1959 年初到达，由趾高气扬的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率领，他对他将在杜瓦利埃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十分有限。

约翰·肯尼迪总统发现，对人权极不尊重的海地作为"自由世界"的一员，令入尴尬。美国对海地滥用援助提出抗议，并对 1961 年杜瓦利埃"重新当选"表示不快，在那次选举中，"海地总

---

① 对海地工会主义史的有用的概括，可以见 J·J·杜布和于尔里克·若利的《论海地工会运动的发展》（出版地点不详，1974）。

统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大夫”在国会选举的选票上名列前茅。选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陈述事实，但事后发现——除非他们真的将他的名字划掉——他们已选他继续担任一届6年的任期。然而，当古巴被美洲国家组织开除时，华盛顿在美洲国家组织里，特别是在1962年埃斯特角会议上，需要海地的一票。在最后时刻，海地同意利用它的关键一票支持把古巴开除，以换取更多的美援。尽管如此，后来当年的美援却由于海地方面贪污腐化而实际上全部停拨。

根据宪法，杜瓦利埃的任期应于1963年5月期满，但是随着时间的接近，很显然他无意引退。反对派组织开始搞恐怖活动，杜瓦利埃进行残忍的报复；他的亲密助手海地红十字会主席雅克·富尔康博士宣称：“尸体将堆积如山”，“海地将血流成河”，东南西北一片废墟，“不分昼夜，大火弥漫”。[①] 男女老少，被马库特杀害，各大使馆挤满了难民。杜瓦利埃的部队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带走两名难民，与该邻国的关系引起了一场危机，多米尼加共和国已作好入侵的准备。美国拒不承认杜瓦利埃的第二届任期并降低其外交代表的等级。肯尼迪加紧破坏海地政权的稳定，鼓动在美国以及（与胡安·博什总统合作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流亡组织。杜瓦利埃散布谣言说他打算逃离海地，停止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边界的入侵。但是，杜瓦利埃非但没有离开，反而加强了对据说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并开始策划举行终身总统就职典礼——终身总统这一职务可追溯到海地的早期历史。

这一运动导致了确认杜瓦利埃为终身总统的公民表决，杜瓦利埃的宣传家们日益利用宗教的象征。出现了耶稣搂抱着杜瓦利埃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我已经选定了他”。让·M·富尔康出版了《革命的教义问答集》，包括为此而改编的圣歌和各种祷文。杜瓦利埃被宣告为历代最伟大的爱国者、群众的解放者和国家的振

---

① 《纽约时报》，1963年4月27日。

兴者和历代伟大领袖杜桑，德萨林纳，克里斯托夫，佩蒂翁和埃斯蒂梅的化身。小册子包括信心、希望和仁爱的条例、忏悔词和对杜瓦利埃讲的"主祷文"。"信徒教义"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信奉我们的大夫，我们全能的首领，新海地的缔造者，信奉他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救世主 1957 年当选总统，他为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而受苦，他于 1961 年再次当选并宣告为终身总统……。"

海地政权早期所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总统决定改变海地的国旗，从平行的蓝与红色变为垂直的黑与红色，黑色靠近旗杆。前者曾是独立时代的国旗（虽然杜瓦利埃拒不承认独立时代），但根据 1805 年宪法，由德萨林纳易色为黑与红。当 1806 年海地分治时，克里斯托夫保留黑与红色的国旗，而佩蒂翁则恢复到蓝与红。后一国旗在杜瓦利埃时代之前一直是官方的旗帜，据说象征着黑人（蓝色）和穆拉托人（红色）分享权力，两种颜色均靠近旗杆。而黑色与红色则以黑色靠近旗杆，象征着黑人应掌握权力。另一个有关国旗的深奥解释是一名美国占领时期的黑人作家阿蒂尔·奥利提出的，他坚持认为国旗应易色为黑与红。①杜瓦利埃企图于 1957 年作出这一改变，但是反对意见十分强烈，以致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但是到 1964 年，他地位有力而提出黑色与红色旗（蓝色与红色旗的再度出现，是 1986 年 1 月和 2 月游行示威中的明显特点；这一示威导致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的倒台）。

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部分外援中止了，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几乎没有钱可用来支付政府正式职工的薪金，更不用说马库特了；文职人员收到总统几本主要著作以代替现金。尽管如此，杜瓦利埃的支持者，认为在另一个政府的统治下他们也不可

① 阿蒂尔·奥利：（'Her-Ra-Me-El）Dra-Po：e'tude e'soterique de egre'gore africain，traditionnel，Social et national（太子港，1928）.

能好多少，所以仍然保持效忠并期待着境况改善。由于许多海地商人逃到美国和其他各地，企业界这一领域畅开大门，使一连串可疑的金融家源源涌入，其中包括埃及人穆罕默德·法耶兹，伊朗的阿佐德王子和美国的乔治·莫伦斯柴尔德。这些人由于主要与海地银行家克莱芒·约瑟夫·夏尔相勾结，得到了各种商业特权，期望他们会将急需的外汇带入海地。几个月之后，法耶兹设法将一大笔公款转到他自己的帐上，然后很快失踪了。

在某些方面，1965 年可以被视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政权的转折点。那时，他已将国内外对其政府的主要威胁清除了。他与美国达成了谅解，同企业界留下的人达成了含蓄的协议，取消了独立的工会，迫使陆军领导就范。他只剩下同罗马天主教会达成和解了，1966 年他将注意力转向这一问题。梵蒂冈同意任命一个新的当地领导集团，由圆通的弗朗索瓦·沃尔夫·利贡代担任大主教。年迈的库西诺主教是剩下的唯一白人主教。总统在典礼上宣称，了解到他现在可以指望得到“世界上最高道义权威的支持，是巨大的安慰”。教会统治集团因此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几乎达 20 年之久。杜瓦利埃后来采取进一步行动反对圣灵神父会，理由是该会是一支颠覆性的势力，该会控制了首都主要中学之一。[①]

80%的海地人在农村劳动，可是农村经济继续被许多问题所困扰。除了偶尔的飓风袭击和干旱外，土壤侵蚀已成为长期性问题。对小农缺乏有效的刺激，难以获得信贷，这就阻止了农业部门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世界咖啡价格下跌，每英亩咖啡产量仍低于拉美大部分国家。然而，农村合作社有了缓慢增长，到 1963 年，农村合作社数目已超过 200 个。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最初是铝矾土、然后是铜，成为重要的出口项目，60 年代

---

① 有关当时政教关系的详情，见戴维·尼科尔斯：《海地的政治与宗教》，载《加拿大政治学杂志》3，第 3 期（1970 年）；又见《海地天主教会文献集》，国际 IDOC，北美版，6（1970 年 6 月 27 日）：第 6—7 页。杜瓦利埃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可以见《第三世界领袖回忆录》（1969 年，巴黎）。

末，美国公司开始利用海地的低工资，兴办了劳动密集型轻工制造业和装配厂。在那以后的10年间，这些工业稳步增长，到1974年，使用当地组件的工厂获得的外汇收益猛增。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患了几个月疾病之后，于1971年4月逝世。1964年的宪法早已作了修正，使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有权任命他的继任者为终身总统，就在他逝世之前，他提名他十多岁的儿子让一克洛德。这一步骤导致总统家族的某种危机，野心勃勃的姐妹们及她们的丈夫竞相争夺权力。外国新闻记者都预测，这个政权最多只能持续几个月。可是，"老大夫"已建立了强大的权力结构，居民中的重要阶层支持政府，而反对派的潜在中心多半已不起作用。而且，美国政府认为保持一定形式的连续性总比公开冲突好一点，因为在公开冲突中，激进力量可能上台。在杜瓦利埃逝世后的日子里，美国海军在岛的周围巡逻，以阻止流亡分子的入侵，实现了权力的顺利移交。

让一克洛德在母亲的密切关注下，从事他的政治生涯。他设法以一个利益集团制衡另一利益集团，经常更换内阁成员，密切注视军队领导层。海地政府宣布，由于老大夫已赢得了政治革命，所以他的儿子将致力于经济革命。在1970年咖啡收成不佳之后的几年间，咖啡产量有了重大增长，蔗糖生产也发展了。20世纪70年代初，旅游业也有了恢复。更加强调外国投资，轻工制造业部门进一步扩展。海地政府在吸引开发援助方面也获得相当大的成就，外援从1970年的900万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1.06亿美元。在法国和美国援助下，道路有了重大改进。但是，要获得这些发展，政府必须减少恐怖活动，并给各个国际机构和捐赠国政府造成良好的形象。在让一克洛德统治下，马库特的活动以及昔日杜瓦利埃主义分子的权力因而受到限制，70年代的一个特点是，一批年轻的"专家治国论者"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许多人出身于穆拉托精英分子家庭。

让—克洛德总统 1980 年同穆拉托商人埃内斯特·贝内特的女儿米希尔结婚，这就有力地制止了他母亲的影响力并增强了他同商业界一些部门的联系。同时，海地政权丧失了黑人中产阶级的许多支持，他们曾经是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中坚力量。地方的部门头头和农村马库特领袖看不到多少给他们的恩惠，而且对总统及其妻子的挥霍无度和赤裸裸的贪污腐化甚表沮丧。埃内斯特·贝内特所起的日益有力的作用，也是造成这些人不安的原因。海地政权作出了努力以增强它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就此向地方官员的头目发出了呼吁。电台节目作了安排，允许海地百姓对地方上的贪污腐化和低效率进行投诉，建立了"社区委员会"以及让—克洛德行动全国委员会（CONAJEC），尽力设法增强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力图将政权描绘成年轻的、有生气的和进步的，这与昔日的杜瓦利埃统治形成鲜明对比，但徒劳无益。

20 世纪 70 年代固然是经济适度增长的年代，但海地由于 1979—1980 年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和飓风的袭击而受到打击。由政府支持的蔗糖、香精油和渔业三个工业项目在财政上遭到重大损害。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支 2000 万美元使海地不出现赤字，但一笔相同数目的款项几乎立即从国库转移到总统府。尽管政府拼命寻求进一步的财政援助，但是直到 1982 年 3 月任命世界银行前官员马克·巴辛为财政部长时，这些尝试未获成功。巴辛宣布他将进行重大的财政改革，并保证将所收到的总款项的用途作适当说明，但不久他就被免职，他的 5 名助手也被关进监狱。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继续提供援助，海地从里根总统的加勒比地区倡议中能够获得一定利益。[1]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卡特总统强调人权，这导致美国对杜瓦利埃施加压力，要他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恐怖活动尽管略有减少，

---

① 有关 1971 年后美国与海地的关系，见埃内斯特·H·普里格：《海地与加勒比地区计划：是变革和机会的时候》（1985，迈阿密）。

但批评政府的人经常被捕和受刑，发生了多起对反对派任意殴打的事件）。在西尔维奥·克洛德和格雷瓜尔·欧仁领导下，成立了带有自由派基督教民主党色彩的两个政党。建立了一个保卫人权的组织，出版了小册子和宣言。但是，这些活动除了在首都知识界少数人外，没有什么影响。这些活动虽然一般都批评政府，但几乎不攻击总统本人。电台评论员在一个文盲占人口80%的国家里有着广泛得多的号召力，用克里奥尔语播放的广播可以传到该国最偏远的角落。一小批一小批人往往聚集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周围，收听孔佩尔·菲洛、让·多米尼克等人对当前政治问题发表的机智而锐利的评述。迪厄多内·法迪恩及其伙伴出版周刊《周末小晚报》，他们的立场比较矛盾，他们虽然对政府进行公开的批评，但很清楚，他们可能通过贝内特家族同总统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1980年11月取缔了反对派组织以后，这一周刊还继续出版；它代表谨慎的独立呼声，在年轻人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权执政期间，有过几次流亡分子的袭击，但是都没有成功。1972年，有10多个人在托尔蒂岛登陆，有一段时间抵抗住了政府军的打击，但最终被击败。以迈阿密为基地的埃克托尔·里奥贝旅，也组织了一些游击式的袭击。在一次进攻后，若干阿拉伯裔的年轻人被捕，他们被认为是里奥贝旅的内部同情者。虽然他们最终获释，但被告知，如果他们不离开海地，就会遭殃。

尽管如此，采用让—克洛德的父亲全部压制批评者的办法现在已不可能了。海地政权变得日益依靠穆拉托精英分子，因为穆拉托精英分子对美国的压力作出的反应比黑人中产阶级快得多。任何可能威胁其商业企业和高生活水准的事都受到谴责，这意味着要同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穆拉托精英分子对天主教会统治集团的呼声作出的反应也要快于黑人中产阶级。因此，海地政权支持基础的这一主要变动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使它日益受到美国压力的影响，或者受到来自内部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特别是

得到天主教会所支持）的影响。

内部的和外部的移民是整个杜瓦利埃时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出现了从农村，特别是从南方迁向首都的重要移民流。这些移民主要是妇女，他们在太子港比男人较容易找到工作，主要受雇于从事家务劳动和新的轻工制造业。结果，到80年代中期，首都人口已增长到大约100万人。

海地的砍甘蔗工继续流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很多争议集中在由两国政府运行的季节性“契约”劳工制上。70年代和80年代，被招募的多达1.8万人，为每一名工人要支付海地政府一笔费用。这些契约劳工的生活状况使人毛骨悚然，以致成为国际机构包括反奴隶制协会的调查对象。但事实仍然是，海地人非常想应召，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了应召的条件。到20世纪80年代，住在邻近共和国的海地人也许多达20万。[①]

在杜瓦利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有大量政治流亡者前往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和其他北美城市。他们中许多人是熟练工人，其中包括医生、农学家和其他专家。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亲友也跟着去了，这样到1980年，大约有50万海地人合法地和非法地居住在美国，有4万人居住在巴哈马。在法国，在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在波多黎各和墨西哥，也有很多海地人。70年代末，出现了向美国移民的新浪潮，数以千计的海地人乘坐小船驶往佛罗里达沿海，1980—1981年，每月平均有1500人在佛罗里达州登陆，另有一些人在海上丧生。只是当两国政府达成协议许可美国海军舰只在海地北岸巡逻并将正在离开的移民遣返时，这一移民流才告停止。有些海地政客反对这种不体面的做法，但海

① 有关这次移民，见莫里斯·勒穆瓦纳：《苦糖》（伦敦，1985年）；拉蒙·安东尼奥·贝拉斯：《移民，海地人，奴役》（圣多明各，1983年）。另见《社会研究》（圣多明各），第59期（1985年1月），《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专辑。

地是否继续获得美国援助则视这一安排而定。①

向外移民产生了某些重要结果。首先，大量移民将外汇汇回给海地的家庭和友人；根据一项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汇款额每年多达1亿美元。这可以成为海地从中获益的最有效的外援形式。回国的移民也将钱随身带回，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其次，移民使海地失去了人口中许多技术上合格的、富于想象力的、有魄力的人员。虽然移民本人发展了充满生气的文化传统，办杂志，写剧本、小说和诗歌，但他们在企图影响海地的政治事态方面却是不起作用的，流亡分子的入侵常常证明是一场大失败，杜瓦利埃政权的倒台最终是由于国内运动造成的。

杜瓦利埃在海地统治的年代，对繁荣文化方面不是引人注目的，可是却有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在虚构文学领域，早期就出现了一批积极的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包括勒内·德佩斯特和雅克·斯泰芬·亚历克西。这些人热爱政治活动，信仰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久就彼此争吵，与政府闹纠纷。亚历克西事实上在1957年竞选运动中同德茹瓦曾有密切关系，1922年他出身于戈纳伊夫，是一位著名作家的儿子，如前所述，他是1945—1946年出版《道路》杂志的那一伙人之一。他的驰名小说有《孔佩尔将军的太阳》(1955)，《音乐家的树》(1957)，《眨眼之间》(1959)及《星上的抒情曲》(1960)。亚历克西在发展海地文学的“出色的现实主义”思想时，批评了早一代一些对黑人文化传统有自豪感的作家所主张的坚如盘石的黑人文化或非洲文化的信念。他认为，民族的和地区的各种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海地文学传统。亚历克西访问苏联之后，于1961年从古巴乘船返回海地，他企图领

① 有许多论述这种移民的文章，其中包括G·洛希切尔和J·斯坎伦：《人权、美国对外政策和海地难民》，载《泛美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26，第3期（1984年）；以及A·斯特皮克：《美国的海地难民》(伦敦，1982年)。关于巴哈马的移民，见唐·马歇尔：《海地的问题：向巴哈马的非法移民》(牙买加，金斯敦，1979年)。

导一次反杜瓦利埃政府的起义，他被逮捕，受到拷打并被处决。[①]

勒内·德佩斯特最重要的诗集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但他陆续出版小说、诗篇以及文学作品和政治评论。同亚历克西一样，德佩斯特认为他自己是雅克·鲁曼在海地开创的工作的继续。在1957年时，德佩斯特基本上是支持杜瓦利埃的，但他不久到国外，而且从他在古巴的基地强烈批评海地政权。1955年他与艾梅·塞泽尔发生的一场争论中，他攻击黑人文化传统自豪感的主张，后来他指责这种主张为杜瓦利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认为这体现在让·普赖斯·马尔斯[②]的著作中。其他一些海地人在流放国外时一直进行写作，其中包括让·F·布里埃、安东尼·费尔普斯和保罗·拉腊克。

在海地国内，勒内·菲洛克泰特、弗朗克·艾蒂安和让—克洛德·菲尼奥勒出版了重要著述，许多是用克里奥尔语写的。这些著作避免明确提到海地政治，但在70年代后期隐射已变得司空见惯了，弗朗克·艾蒂安的《极强音》(1972)是螺旋主义的最明显例子，那是这些海地作家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体。在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权的最后几年，街头小剧团的演出几乎不加掩饰地抨击海地政权，类似主题的电影《佩兰特》也极受欢迎。

法文虽然是海地的官方语言，但居民中能流利地讲法语的不到10%。全体居民，包括讲法语的少数民族，都讲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精英阶层、甚至黑人中产阶级重视他们讲两种语言的能力，因为这增强了他们对权力工具的控制。许多受30年代民族文化运动影响的人们认为，应当承认克里奥尔语至少与法语

---

① 见M·拉罗什：《星上的抒情曲和雅克·斯泰芬·亚历克西的抒情著作》(巴黎，1978年)；J·万克尔·达什：《雅克·斯泰芬·亚历克西》(多伦多，1975年)；达什：《1915—1961年海地文学和意识形态》(伦敦，1981年)，第7章。

② 勒内·德佩斯特：《黑人文化传统自豪感的盛衰》(巴黎，1980年)。

处于同等地位，是该国的官方语言之一，而且认为低年级的学校教学和诉讼程序应当用海地的大众语言进行。

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半心半意的步骤，只是到1979年约瑟夫·贝尔纳担任教育部长时才作出决定性的尝试来修正学校的教学大纲，允许在低年级用克里奥尔语教学。这一建议是较大规模教育改革的组成部分，导致许多精英分子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些穷苦的海地人也认为这样做是图谋不使他们的孩子学会讲流利的法语，因为会讲流利的法语是摆脱农村贫困的途径之一。由于政府关于变革的准备工作不充分，老师未受到适当培训而且没有教科书，这就使反对派有机可乘来迫使贝尔纳退职和制止改革。法国大使馆，特别是法兰西学会，非常关心保持法语的地位，但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住在农村的其他人，只讲克里奥尔语。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改革得到美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并且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但是，由于海地人向美国和巴哈马移民，以及由于美国商业继续介入该国，海地人正开始认为英语比法语更有用。同时，许多家庭，甚至昔日讲法语的精英阶层，正将其子女送到美国学习。

杜瓦利埃，特别是在他与主教们斗争期间，欢迎许多基督教新教组织光临海地。在早年，他同一些主要的圣公会教友有密切联系，但到1963年，这一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然而，更多的福音派组织往往避免明确参与政治，对“未来的政权”给予暗中支持。福音派组织得到布道、改变信仰、办学和经办各类农村开发项目的最大限度的自由。到20世纪70年代，福音派组织如此之多，以致任何在农村旅游的白人会被当地人民自发地称为“牧师”。1976年，一位政府部长奥雷利安·让蒂谴责这些基督教新教徒是外国人手中的工具和“非法的基督教帝国的骷髅”。到80年代中期，很可能有多达20%的海地人会称他们自己是基督教新教徒，但这未必意味着他们肯定与伏都教或天主教决裂。

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的发展，显然惊动了罗马天主教会。从70

年代末起，主教们很谨慎，不使自己同政权或精英阶层过于认同。在公开表态时，他们谴责政府贪污腐化和违背人权；他们也支持穷人的要求。1982 年末，一名杰出的天主教俗人被捕，激起了主教们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在随后的 3 月份访问海地期间，坚持认为在海地的“情况必须改变”。天主教会在教区一级开始主持相当数目的开发项目，包括农业合作社、灌溉、排水系统、梯田化以及手工艺项目。虽然许多这类项目（如在拉博德由佩尔·赖奥经营多年的大型企业，以及在南方省莱昂格莱地区由玛丽宗教献身团主持并得到诸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这类自发机构所支持的综合项目）多少带有家长主义色彩，但它们加强了农民的信心，并引导他们对地方权力结构提出疑问。

1986 年 2 月，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总统采取了大家熟悉的总统流亡的道路。这一情况在某些方面是 40 年前导致莱斯科总统政治下野的事态的重演。一个日益受精英阶层小集团控制的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和主要的中等阶层中已经丧失了任何支持的基础。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学生抗议之后就接着更广泛的游行示威，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陆军接管了，接着是一个政治上不稳定的时期。

但是，两种运动之间仍有重大的不同。首先，教会领袖和天主教索莱伊广播电台谨慎而积极地支持新近的抗议活动，曾通过在全国由他们主持的开发项目来帮助促进抗议活动。第二，1946 年革命开始于首都，所有的活动看来都集中在那里，而 1985—1986 年的运动是在戈纳伊夫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小戈阿沃、海地角及其他省城，最后发展到太子港。事实上，从美国占领时代以来这类运动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开始。也许国家安全志愿队（马库特）在农村群众中招募人员以及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民众主义言辞产生了原来未曾预计的更激进的后果。

天主教会无疑是杜瓦利埃倒台这场话剧的主要演员之一。

1982年，一名天主教俗人、广播员热拉尔·迪克莱维勒的被捕，标志着教会权力增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他在全国教士谴责拘留他的事件之后就获释了。教皇的海地之行加强了主教们的权力；主教在谴责违反人权和海地极端贫困状况方面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了。天主教索莱伊广播电台成了批评政府的一个主要渠道“小大夫”由于变得日益依赖于企业界和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能够像他的父亲那样忽视或压制教士们的批评，因为资产阶级至少在政治上往往同天主教会有联系。主教指责在1985年11月戈纳伊夫游行示威中枪击学生事件，其为受害者举行的安魂弥撒被视为支持抗议运动的一个重要姿态。在这个时期，索莱伊广播电台成了各省游行示威新闻传遍全国的最重要渠道。杜瓦利埃企图关闭该电台，但是主教的压力很快迫使他收回这一企图。

从另一层次看，罗马天主教会和一些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影响也是意义重大的。如上所述，地方教区往往在国际机构的援助下，多年来一直资助各种开发项目和合作社企业，从而使少数农民可以讨论地方问题和组织社会行动。这些项目的组织者从直接意义上说通常并不抱有政治意图，而且这些开发项目还受到激进的流亡分子攻击，说这些项目是保守的，因为它们鼓励农民容忍无法忍受的局面。可是，于1985—1986年对政权提出挑战的领袖正是从这些人中间涌现出来的。《周末小晚报》在危机的中间，把天主教会称为“无名的政治领袖”，编辑者们提问道：“我们是在一场基督教革命之中吗？”

如果将过去几年天主教会的作用仅仅看作是在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统治下蒙受耻辱的复仇，或看作是通过站到日益增强的反对派运动一边来试图重新树立它作为海地主要政治力量的原有角色的部分做法的话，那么就太具有讽刺意义了。虽然这些考虑可能有一些重要性，但是许多教区的神父和一些主教真挚地支持全国穷人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天主教会是享有足够信任感而能在这一局势中有效行动的很少几个海地机构之一。

在整个这一时期，伏都教在海地老百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在农村以及在城镇的较贫困地区，是一个重要因素。像所有宗教一样，伏都教在其社会问题方面通常是保守的。尽管如此，有的时候它起着比较激进的作用。伏都教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使广大群众永久保持非洲的认同意识。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善于利用这一点，而从若干“乌恩风”（houngans）那里获得对他的黑人意识形态的支持。让—克洛德对伏都教的兴趣不如他的父亲，而且从未声称超自然权力。可是他对许多“乌恩风”的猛烈攻击，是他倒台的一个标志。对 1986 年初杀害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从约 100 人到 1000 人以上不等。但是，应当强调指出，并非所有的伏都教教徒都支持这个政权。

让—克洛德由于他的父亲将精心安排的结构传给了他，他就能够预先采取行动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虽然如此，他逐步丧失了许多马库特首领的支持，到 80 年代初，这些首领显然不愿意保卫这个政权，1985 年 11 月，在他们的队伍中，有严重的失望情绪和混乱现象。让—克洛德的一些马库特支持者对几周前内政部部长罗歇·拉丰唐的被免职表示强烈愤慨。以杜瓦利埃逃跑而达到顶点的这些事态发展的明显特色之一，是国家安全志愿部队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只是在最后日子里，他们当中一些人才支持总统并强烈试图压制反对派。

尽管 1986 年 1 月已出现局面混乱的动向，但是军队领袖们显然不愿意独立行事以接管国家。在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 29 年期间，新一代的军官成长起来了，对他们来说，军事政变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到 1964 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曾能声称——确有一定道理——他已经消除了军队在政治事件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在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离开后，亨利·南菲将军终于同意领导一个军人委员会，这是美国大使馆、一些海地政客和杜瓦利埃本人进行说服的结果。美国在保持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执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在最后的日子里，华盛顿才决定减少损失，并

利用它的影响来确保总统的离开。即使在当时，美国的意见还是有分歧的。人们广泛地认为，美国前大使欧内斯特·普里格提出的建议是，华盛顿应当说服杜瓦利埃留下并应当帮助支撑住他的政府。

80年代经济状况恶化是造成"小大夫"政权削弱的一个因素。随着海地农村群众所感受的艰难困苦的加剧，使"小大夫"施恩的来源也减少了。从多米尼加共和国传来的猪瘟使得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加重。海地政府在美洲国家组织的压力下，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居民消灭强壮的黑猪，可是对许多海地人来说，这些黑猪代表着他们唯一的资本投资。政府为此作出了给予补偿的安排，但大部分钱却落到了别处。各种机构提供了进口的红猪，但一般要求保证为这些猪供应进口的猪饲料，住在水泥地的猪圈里。由于贫苦农民买不起这些奢侈品，受益者都是富裕农民。陆军将军，包括南菲，趁机利用了这一要求（这一局势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是那些领取红猪的人对上述保证不予置理，用原来喂养黑猪的同样的残羹残菜来喂养红猪，可是这些红猪也上膘了）。造成80年代中期艰难局势的另一原因，是停止了"船民"移居美国，当时在华盛顿的压力下，杜瓦利埃政府同意美国海军舰只在海地沿岸巡逻，把移民的船只赶回去。

1986年2月7日，让一克洛德·杜瓦利埃离开，由军人控制的国务会议（CNG）负责治理国家。在最初几个月，以亨利·南菲为首的军人委员会通常只限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而不是着手重大的政策变革。据认为，南菲本人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诚实人，他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听取各种不同倾向的意见。军人委员会在公共舆论（表现在示威和罢工上）的推动下，排除了一些臭名昭著的杜瓦利埃分子，而且将少数马库特交付审讯，作为支持根绝杜瓦利埃主义的一种姿态。他们将海地国旗改回到1964年以前年代的蓝色与红色，也是对旧政权的一种象征性声讨。军人委员会有名气的"强人"是威廉·雷加拉上校，他领导

内务部，他和财政部长莱斯利·德拉图尔被广泛地谴责为政治保守派，是美国的特务，军人委员会为制定新宪法和为最终在1987年11月选举一名新总统提出了时间表。

1985年11月开始的并以杜瓦利埃的倒台而达到顶点的动乱，加重了海地的经济困难。装配部门和轻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一些公司关闭了，从而失去了1.2万个工作岗位，这部分是由于政治不稳定、害怕要求提工资（这是因自由工会的成立而造成的），美国对纺织品进口规定了新的限制而造成的。而且，美国卫生条例导致了进口海地水果的种种问题。旅游业也衰落了，旅馆无人居住。美国削减从多米尼加共和国蔗糖进口的限额而造成了蔗糖极大过剩，这些过剩的糖大部分运到海地，从而破坏了当地蔗糖的销售并导致糖厂的关闭。数以千计的职工，还有更多的小蔗农失去了工作。在临时政府统治期间，各种走私品涌入海地，大部分走私品受到高级军官的控制。比如说，来自美国和别处的稻米使价格下降到低于当地农民可以赖以生存的价格。水泥、小麦、汽车和其他制造品也非法进入。在国务会议统治下，贪污腐化甚至超过了历届杜瓦利埃政府。

教会仍处于分裂状态。回国的流亡神父要求大主教利贡代辞职，因为他过去同杜瓦利埃家族有交往。一些年轻的神父，特别是撒肋爵派的让—贝特朗·阿里斯泰德，他将穷人组织成行动小组，并要求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热雷米的威利·罗米拉斯主教是唯一具有激进倾向的主教，他对这些运动给予慎审的支持，但以海地角的加约为首的其他主教赞成1945年后基督教民主党的旧理论，并对遍及整个海地的基本社区抱怀疑态度。

由于杜瓦利埃的倒台，许多流亡者回国创建政治运动：被认为是“温和派”的莱斯利·马尼加和马克·巴辛领导一个与社会党国际有联系的政党的塞尔日·吉勒和共产党领导人勒内·泰奥多尔。仍留在国内的政治领袖有西尔维奥·克洛德和格雷瓜尔·欧仁及其竞争对手各基督教民主党，还有让—克洛德·杜瓦利埃

统治时期的内阁部长于贝尔·德·龙瑟雷。

三个不同的工会组织出现了。一个曾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因而也与美国劳联/产联)有密切联系，其他的工会在政治上更偏向左翼。海地工人自治联合会(CATH)一分为二，一个同拉丁美洲劳工运动(CTAL)有联系，联合会的领袖们在前一届政权统治下被迫流亡国外。这些工会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政治发展仍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工会会员集中在太子港。

公众对选举宪法委员会没有什么兴趣，但新宪法几乎被参加投票的居民的50%左右所一致通过。新宪法规定，正在服役的军事人员不能当公职候选人，并包括一项对杜瓦利埃独裁统治有密切联系的人实行10年禁令。新宪法成立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以监督选举，9名成员由各社会集团提名。克里奥尔语第一次被承认为海地的官方语言，废除了反对伏都教的立法。

计划于1987年11月29日举行普选，选举委员会抵制国务会议试图接管投票工作的企图。12名总统候选人被取消竞选资格，因为他们参加了杜瓦利埃政权，虽然至少还有其他5人也在一定阶段参加过。在剩下的23名候选人中，有4人以主要的竞争者出现：西尔维奥·克洛德，民众主义牧师，曾积极反对“小大夫”政权；马克·巴辛，前世界银行官员，曾担任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府财政部长几个月时间；热拉尔·古尔格，是教育家和人权积极分子；路易·德茹瓦二世，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主要反对者的儿子，是唯一的穆拉托人。巴辛、德茹瓦和古尔格以各自的方式代表着商业界精英分子与广大穷人运动之间的联盟。精英分子继续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他们显然认为通过这样的联盟可以最好地确保其特权地位。古尔格的情况最为明显，他得到整个农村许多基层组织的支持。原罗马天主教神父让—克洛德·巴若是促成这一阵线的关键人物。精英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这一联盟主要针对黑人中产阶级，后者中许多人曾与杜瓦利埃政权有联系，在农村地区担任要职，充当部门的头目、

投机商或是有中等规模地产的农民，在城商充当文职人员、教师或农学家，最为重要的是，在军队中担任要职。这些黑人中产阶级害怕从这样的选举中产生的任何总统很可能对他们在杜瓦利埃统治下获得的利益提出挑战。

一伙枪手在一些失去竞选资格的杜瓦利埃分子的收买下和军人的保护下，在街头游荡，制造恐怖活动，不让投票材料送到北方省和阿蒂博尼特的目的地。在十几名投票者被屠杀后，选举被取消了。国务会议声称，在它任命的新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选举将于1988年1月举行。4名主要候选人拒不参加，剩下只有那些军队同意的人才成为可行的候选人。1988年1月17日，很平静地举行了投票，投票人很少，而且有许多违法乱纪现象。大部分军队所赞成的候选人莱斯利·马尼加被宣布获胜并于2月7日就职。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部官员，马尼加曾同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政权有过联系，在他撰写的有关海地历史的著作中采纳了黑人立场。马尼加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同杜瓦利埃断绝了关系，度过了25年的流亡生活，在巴黎、特立尼达、加拉加斯和耶鲁大学担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师。他的权力任期只持续了4个月。6月，一场同军队领导的冲突导致了他被确保他当选的同样那批军队官员所罢免。紧接着是直接军事统治的时期。

人们往往将海地称为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国家，从物质观点看，情况大概是如此。但是，就人力资源和文化传统而言，海地是本半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处理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问题时，海地人经常显示出某种非凡的才智。1985年11月开始的抗议活动证明海地农民并不是人们往往认为的那样“无动于衷”。在让—克洛德·杜瓦利埃逃走之后，有许多五彩缤纷的壁画出现在整个首都，其中一幅壁画是对当时乐观主义情绪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它画的是珍珠鸟，那是海地国家的象征，在珍珠鸟的胸上刻有“我们必须高飞”的词句。

第13章

1940年以来的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经过400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后，于1898年受美国直接控制。这一状况一直维持至今。波多黎各在美国政治体制内部的地位，一直是含糊不定的。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被认为是“合并”到美国的领土，因而具有将来加入联邦体系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的候补资格。波多黎各不同于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它被置于“非合并领土”这一新颖的司法类别之中。美国政治权威中无一人同意下述观点，即波多黎各不同于古巴和菲律宾而应甚至被导向名义上的独立。

因此，在一个新的不同文化的强国统治下，这个岛的殖民依附地位持续到20世纪。当然，随着20世纪的结束，依附地位仍然是个问题。波多黎各在美国统治下过了90年，波多黎各青年参加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大量移民在波多黎各及其北部宗主国之间来回流动，经济上完全一体化，并且受到美国主宰的各种形式的“现代化”影响。可是波多黎各基本上仍是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对于好歹它作为组成部分的这个体系，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明显地感到格格不入。

在1940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岛上的行政权力仍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总督行使；教育制度仍坚定地致力于“美国化”这一帝国思想；受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主要工业蔗糖业明显衰落；失业、贫困和不满情绪激增；政治暴力在增加；民族主义浪潮和积极争取肯定西班牙文化的运动在加

强势头和影响。40 年的直接殖民统治——虽然这种统治往往是拙劣多于残暴——看来已达到了危机点。

岛上的政权曾经一向是个古怪的混合体。经过两年的美国直接军事统治之后，美国国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文人政府结构。美国直接通过一名任命的总督和一大批由联邦任命的波多黎各政府重要官员（诸如最高法院法官、审计长和教育局长）来行使权力。曾有人民选举的下议院，还有 1917 年直接选举的参议院。地方的党派政治（其根源可追溯到很早以前的西班牙统治时期）往往很不自在地与外国行政权力同时并存——地方领袖对这一体制安排很不满。不管他们相信最终成为一个州，还是民族独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形式，他们都反对美国人所强加的政治自卑感。

在美国的控制下，岛上的经济起了甚至更加深刻的变化。蔗糖迅速取代咖啡和烟草，成为主要的出口作物，大部分经济主要成为外在业主拥有的大规模公司化农业工厂，农业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流离失所和疏离异化——这一切发生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条件下。阶级分野开始影响政党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立了社会党。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它对蔗糖工业的影响，加重了社会骚动，助长了很快爆发轰轰烈烈的再度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为首的国民党，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它促进了不满情绪和民族认同，但该党却未能有效地利用广泛的劳工骚乱，特别是蔗糖工人的骚乱。

对于 1940 年开始的重要事态发展，必须了解以下的当地背景：经济衰退，蔗糖业衰落，罗斯福新政试验及其在波多黎各的有意思的变化，岛上民族主义的再起；以及对那里的政治制度感到无可救药和与已无关。1940 年标志着岛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美国与波多黎各之间的殖民关系这些词语开始重新加以界定，即便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政治与地位

1940年宣告了25年一党统治的到来，这将确定波多黎各的发展并将界定它以后的许多问题和挑战。人民民主党（PPD）创建于1938年，在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的领导下，迅速成为40和50年代波多黎各事态发展的推动力。该党的建立和取得的初步成就，可以从起源于30年代的许多问题中若干因素的汇集加以理解。第一个因素是当时一些政党的分裂和衰落。从1932年起，波多黎各曾经被共和党和社会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所控制，两党均含糊地赞同波多黎各最终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继承原来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但很长时间以来决心奉行恩惠政治。人们普遍认为选举制度是不可靠的，腐化的，而且是造成广泛疑惑的根源。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联邦政府救济和复兴计划对该岛施加的政治影响，以及执行上述计划的罗斯福政府殖民地行政官员与当地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政治史，可以解释为当地政客图谋控制美国新政输出到波多黎各的援助与经济复兴计划，或至少从中捞取政治好处。1936年之前，穆尼奥斯·马林在这一过程中曾占有优势，因为他善于在华盛顿培植他的联系人，他的地道的英语，他的口才，他对新政的同情心，这一切对罗斯福政府很有用。

最后，还有人民民主党后来作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出现所依靠的意识形态背景和阶级基础。穆尼奥斯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曾同圣地亚哥·伊格莱西亚斯·潘廷的社会党有过交往。社会党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工党，务实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是，它是亲美的。从该党成立时起，曾拥有主张波多黎各独立的派别，但在伊格莱西亚斯强有力的领导下，社会党的官方立场对“地位”问题不感兴趣，它认为“地位”问题同改善工人的困境毫不相干。由于社会党变得日益保守和亲美，穆尼奥斯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转向自由党。1932年穆尼奥斯被选进参议院并任参议院议长。

1936年初，岛上的政治暴力导致弗朗西斯·里格斯警察总长被暗杀，结果穆尼奥斯的生涯出现了新的转折。当时他拒绝了波多黎各复兴政府头目欧内斯特格里宁提出的要求：如果美国人也谴责在警察总部实行私刑，那么才可谴责谋杀警察总长一事。在这些激动事态的复杂反响下，穆尼奥斯丧失了几乎能自动进入来自华盛顿的权力圈子的机会。他还同自由党领袖断绝了关系，他在企图接管该党的控制权时实际上被开除了，他被责怪使该党在1936年选举中失败。

人民民主党最初的意识形态立场至少有3个基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温和的独立主张。这个新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取得独立是波多黎各多年来的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这不是秘密。主张建立州制的政治联盟，就是控制蔗糖经济的、主要是在外业主拥有的公司利益集团，因而在艰难的危机年代成为人民不满的目标。这一不满情绪主要表现为民族主义情感的加强，而人民民主党反映了这一情绪。

然而，人民民主党的独立主张从未采取严格的官方承诺的形式。比如说，穆尼奥斯·马林始终把他的独立主张，在政治可能性的范围内，同主要优先直接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的问题调和起来。因此，这个新党设法消灭选举中的腐化和特权，并建立可以更加一贯地指导经济活动的行政基础结构。这些目标将通过选举制度中合用的政治手段以及在与美国联邦当局随后的谈判来加以实现。在人民民主党意识形态武器库中，实用主义要强于独立的主张，这更接近于罗斯福的新政思想，而不是阿尔维苏·坎波斯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年轻的圣地亚哥·伊格莱西亚斯的社会主义。

人民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也来源于该党领导的特性以及它同一般百姓和选民的关系。开始时，人民民主党是个彻底的民众主义党，尽管它不具有其他民众主义运动往往特有的反知识分子的色彩。这同运动的领袖和创建人的个性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民众

主义活动成熟之际，人民民主党善于出色地综合利用领袖的魅力、群众的接受能力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崩溃到几乎无足轻重的地步的种种因素。在穆尼奥斯领导下，该党受政治“委任论”的主导影响，在每隔4年的选举中要接受群众的批准（和再确认），然后，该党就有权自由地管理国家事务。

人民民主党在经过一场引人注目的竞选运动之后，在1940年11月的选举中赢得了总投票数的38%。这一数字还不足以选举驻华盛顿的驻节专员（1904年后波多黎各有资格成为联邦众议院的非选举成员），但该党在参议院赢得了明显的多数，穆尼奥斯被选定为参议院议长。人民民主党通过与老的自由党内对它同情的党员的合作在4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能够控制众议院。

人民民主党获得选举的成功之后，1941年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被任命为总督。一名有经验的新政“智囊团成员”（保证忠于理性计划的原则和公众权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和一名可声称公众支持其改革纲领的行动主义的党的领袖，两人的巧合产生了一段紧张活动和合作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殖民地行政官员与当地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史上确实并不总是愉快的，但却是非同寻常的。人民民主党领导的议会发现特格韦尔总督易于采纳建议，就力促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强波多黎各政府行政基础设施并使之集权化的重要措施。1942年建立了计划委员会和预算局。在1941年通过的一项有争议的立法中谈到了土地分配与土地改革的问题，这项立法建立了土地管理局并规定所谓“按比例受益”农场的一种新的农场所有制和管理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了法定程序之后，政府采取行动将公司拥有的土地限制到500英亩。这些管制措施曾被采纳进波多黎各民事管理组织法中，但在面对蔗糖工业公司肆无忌惮地扩展的情况下从未实施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产生了许多问题。在经济领域里，这意味着岛上某些基本供应和货物日益短缺，意味着需要强加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化管理，而这种管理一般与殖民地总督和新兴政

治领袖的行动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战争给波多黎各带来特别的恩赐，因为通过在大陆越来越多地出售波多黎各朗姆酒产品而有大量收入流入岛上国库（根据对 1900 年和 1917 年组织法的行政与法律解释，在美国出售波多黎各产品所征收的一切税款都归波多黎各国库）。战争还对地位问题的任何直接攻击起了同意推迟的作用。阿尔维苏·坎波斯由于被岛上联邦法院判有图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罪，从 1938 年起就被监禁在亚特兰大。穆尼奥斯和人民民主党进行 1940 年竞选运动时的口号是：岛上的政治地位不是选举中的问题，以及该党如果获胜将专门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在 1941—1944 年期间，人民民主党领导在幕后牢牢地、明显地保有主张独立的倾向。

到了 1944 年，人民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该年 11 月的选举（波多黎各选举和选定美国总统选举团成员的联邦选举是同一天），以及人民民主党获得彻底胜利并建立的一种模式，直到 1968 年才有些微小变动。该党赢得 64.7%的公众选票，除了两个席位外，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全部议席。给予了穆尼奥斯所要求的民主授权；当时的任务是要解决基本的贫困问题，寻求社会平等以及用民主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穆尼奥斯和人民民主党领导一贯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互不相干的。他们的战略是利用与美国当时的关系所提供的资金来处理经济发展问题，而在处理政治地位和消灭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则采取渐进的、逐个解决的方式。这种实用主义的战略反映了人民民主党领导有理由认为可以从反共世界霸主的美国获得所期望的东西，只要它的民族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它愿意消除殖民主义的严酷表现。这一战略的发展提供了波多黎各战后时期政治史的框架。

人民民主党的经济战略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拟定了。1942 年建立了工业发展公司和政府开发银行，作为促进岛上工业发展的机制。最初，对工业发展公司的政策上有意见分歧：应该在资助和管理工业工厂方面起直接作用呢（或者作为带头项目，或者作为

推动和努力赶上私人部门的模式)，还是作为鼓励和初步津贴外界(美国)投资者引进新工业的一种渠道。特格韦尔本人对后者很谨慎，但人民民主党政府中那些明确赞成工业部门主动吸引外界投资者的人们赢得了政策斗争的胜利。特格韦尔于1946年辞去总督职位，到那时，已经着手执行鼓励工业的政策，如对新工业实行免税，对政府建立的工厂提供供应，对政府资助的工人进行培训以及对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总的目标指导和援助。

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农业改革计划，虽然通过土地管理法提出的按比例受益农场的安排进行了温和的土地再分配和减少一些大蔗糖公司地产，但是农业改革计划同大力推行的工业化政策相比还是软弱无力。由于对工业发展的压倒热情使新政权的农业政策方针黯然失色，土地改革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在经济政策中出现了这些事态发展的同时，对地位问题也以类似的实用方式予以关注。人民民主党再次发动第二次竞选运动，对殖民地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未作出正式承诺。虽然人民民主党一些著名的领导成员急欲该党采取赞成最终独立的更加开放的立场，但是穆尼奥斯所持的官方立场是，要到战后才能面对地位问题。穆尼奥斯的经济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通过自由的市场准人、共同的货币和金融制度以及美国的公民资格使得波多黎各继续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政治依附这一问题必然要在经济现实这一范围内得到解决。当时的民众主义领袖们确认殖民主义是法律地位的问题，而不是与殖民主义习俗和体制决裂的政治问题。

到1946年，很清楚，穆尼奥斯已放弃了他一度曾抱有的任何独立倾向。他在一系列的公开声明和党的部署中，同党内主张独立的坚决分子强行摊牌。该年，他们当中一批人脱离了该党，成立了波多黎各独立党(PIP)，该党将参加即将来临的1948年选举。同时，由前总督特格韦尔、参议院议长穆尼奥斯·马林与杜鲁门总统之间一系列通信为开端的进程达到了顶峰，美国国会通

过了362号公法，授权直接选举波多黎各总督。[1] 1948年选举和人民民主党第二次压倒性胜利的阶段已万事俱备。人民民主党领袖当时已担任了正式的总督职位。工业发展政策即将进入最紧张阶段，宪法改革问题（长期等待的解决地位问题的途径）在波多黎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和华盛顿官方的同意下，最终将获得解决。

紧接着1948年的胜利之后，在建立后来英语称为波多黎各共同体[2]和西班牙语称之为波多黎各联系自由邦的建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这是岛上实行自治的理想的顶点——本地治理、自治，在与宗主国联合的框架内管理本地事务——这在整个波多黎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美国国会在与杜鲁门总统进行通常的磋商和信件交流后，通过了第600号公法，授权岛上制宪会议起草一部波多黎各宪法，该宪法要经美国国会最后批准，按1917年原琼斯法案的决定，维持美联邦与该岛关系的基本框架。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在圣胡安举行了制宪会议。制宪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是人民民主党党员，但他们是国家共和党（PER）和社会党（1952年选举后，社会党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即将消失）的少数派代表。波多黎各独立党拒绝参加选举。波多黎各制宪会议在接受了两项重要的宪法修正后，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波多黎各宪法。宪法经波多黎各选民举行的公民表决获得批准。1952年7月25日宪法开始生效。

从一开始，共同体的安排就是法律和政治争执的症结所在，大量的著述被用来证明，共同体的安排是不是、可不可以成为解决该岛殖民地问题的办法。这为美联邦制占压倒优势权限下实施地方宪法奠定了基础。它规定实行内部自治，但是美联邦的行政和军事机构继续在岛上充分起作用；根据1947年选举总督法，美国

[1] 有关导致这一法律被通过的过程，可见苏伦德拉·巴纳：《美国和波多黎各地位问题的发展（1936—1948）》（1975，堪萨斯州，劳伦斯），第92—103页。

[2] 英语为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西班牙语为 Estado Libre Asociado。——译者

国会已经授权波多黎各选举产生的总督对教育局长和最高法院法官有任命权（1952年宪法终于将对国家审计长的任命权移交给了总督）。

主张独立派从一开始就谴责宪法，认为它是一场骗局和一服迷惑剂；主张建州派认为该宪法具有导致全面并入美国联邦的一个过渡性法律地位。在人民民主党内，宪法的辩护士和主要起草人尽管承认宪法具有广泛性，却倾向于认为宪法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是解决殖民地困境同时又维护经济持续性和进步条件的创造性的独特办法。充其量说，在与美国国会协商之下，宪法仍需时时加以调整。对人民民主党党员来说，1952年波多黎各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方面已得到解决，剩下的问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进程，即与美国当局进行政治协商以确保波多黎各继续实行自治，并合理地消除可能留下的一切殖民地痕迹或不平等现象。

但是，改进或完成共同体的企图失败了。美国国会证明是不妥协的或者是无动于衷的；波多黎各各政党在组成和结盟方面的变动，使波多黎各无法在自治的框架范围内为“解决”殖民地问题进行大规模动员。波多黎各社会在民众主义监护下发生的变化，引起了新的政治运动，它反映了固定在殖民地依附车轮上阶级分裂的社会的种种矛盾，使人们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运动。

波多黎各政治史上一党的民众主义时期始于1964年。该年，穆尼奥斯·马林决定辞去总督职务，并将这一职务让给他的长期心腹之交和排忧解难者罗伯托·桑切斯·比莱利亚。这个时候，人民民主党的地位看来很牢靠了。仅有的反对党是波多黎各独立党和老的共和党。波多黎各独立党在1952年获得了最佳结果，赢得了19%的选票，但从那时以后选举力量不断衰落；老的共和党现称国家共和党，是基本原封不动地幸存下来的唯一的30年代的政党。美国国会以不采取行动来拒绝修正联邦关系法，即1950年

"费诺斯—默里议案"。[①]当时工作出新的尝试来完成制宪的局面；正在继续轰轰烈烈地实行经济发展计划；使人民民主党体制化的时间看来已成熟。

然而，国会继续持不妥协态度以及波多黎各生活中新的政治事实，使这些意图落空了。新的总督与穆尼奥斯以及党组织的重要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人民民主党霸权地位的结束。在桑切斯任期届满之前，举行了一次决定波多黎各政治未来的公民投票，波多黎各总督事实上已被撵出了他自己的党，一个主张建立州制的新党作为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出现，人民民主党最终在选举中失败。

1962 年，人民民主党政府第二次向美国国会递交一份要求修改联邦关系法的正式请求。国会没有同意原来的请求，而是于 1964 年建立了一个研究波多黎各未来地位事宜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地和全面地探讨一切可能的替代办法，向国会提供指导将来采取行动的可靠方针。该委员会由 7 名美国人和 6 名波多黎各人组成，委员会于 1966 年发表了它的冗长报告，报告说明所有三种替代办法（建立州制、共同体/自治以及独立这典型的三部曲）具有同等价值，而且建议波多黎各人民明确地宣告他们的优先选择。虽然报告并不承担义务，结论也决非激进，但报告允许人民民主党政府支持共同体的地位并就三个替代办法举行公民投票。

1967 年 7 月 23 日举行公民投票。主张独立的运动抵制了选举，人民民主党经过穆尼奥斯亲自领导的紧张的竞选运动之后，集中了 60.5%的多数选票，赞成实行共同体。但余下的 39%主张建立州制，这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主张建立州制的主要鼓吹者是工业家路易·A·费雷，他曾多年担任国家共和党领袖之

---

① 下段提到的费诺斯—默里议案以及第二次试图修改共同体协定的命运，见亨利·韦尔斯：《波多黎各的现代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9），第 250—258 页。又见何塞·特里亚斯·蒙赫：《波多黎各宪法史》，第 4 卷（1980，里奥彼德拉斯）。

一。费雷曾公然反抗该党，因为该党正式决定不参加公民投票。他现在同一个热情的新的政治组织核心在一起。同年，该政治组织改建为新进步党（PNP）。

人民民主党桑切斯·比莱利亚脱党，并组成了自己的党，并获得总投票的大约11%。新进步党得益于这一形势，在1968年选举中，费雷当选总督，人民民主党扮演了反对派角色，尽管该党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席位。人民民主党于1972年重新获得总督职位和简单多数，但是新进步党继续在1976年和再次在1980年当选总督，尽管1980年仅获微弱多数。1984年选举时，新进步党仅以大致3%之差在总督竞选中败北——1976年它以大约3%之差赢得总督竞选。

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主张“自治”的人民民主党的选举力量和主张建立州制的新进步党的选举力量相当势均力敌。1968年后，从来没有一位总督赢得总投票的绝对多数；1969年和1973年间议会内出现了旗鼓相当的局面，1981年和1984年间，一个党控制了行政，另一个党控制了议会两院。这一新兴的“两党制”反映了社会重新组合和阶级矛盾的复杂进程，围绕着地位问题而形成的选举动员的政党意识形态和程序扭曲了这一复杂进程。

人民民主党的战略，正如地位问题委员会报告所认可的，是着手与美国国会合作以组成一些特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双方可以接受的有关共同体地位的修正案，以便扩大波多黎各的自治范围和对美联邦体系的贡献。然后这些修正案条款分别由美国国会和波多黎各选民在公决中予以接受。人民民主党与总督桑切斯的决裂，阻止了在他的任期内对上述组织的提名，新进步党1968年的胜利破坏了这些计划，直到人民民主党于1973年再度掌权。费雷总督在他任期内的确组成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负责报告有关扩大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权的可行性。特设委员会1971年提交一份有利于总统选举的报告，但1972年人民民主党的获胜制止了进一步采取行动，随后两

党权力的替换使得无法协调一致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人民民主党第一届政府拉斐尔·埃尔南德斯·科隆总督任职期间（1973—1976），为修改共同体地位而作出了迄今最认真的努力，但蒙受了重大的、也许是最终的失败。经过好几个月的准备后，一个特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人民民主党党员称之为"新条约"的计划。美国政府方面对此计划极为冷淡，因为美国政府正受到水门事件后果的影响并受一个对人民民主党没有天然同情心的共和党所控制。人民民主党传统上与美国民主党结成松散的联盟。福特总统在其任期结束时实际上拒绝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并发表一份声明，说明已到了着手安排使波多黎各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的时候了。

1976 年新进步党第二次获胜，再加上福特的声明，以及 1978 年一伙同新进步党结盟并致力于建州的年轻政客们在波多黎各赢得了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这一切似乎表明波多黎各在烦人的地位之战中到达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随着 1980 年选举的临近，新进步党在职总督卡洛斯·罗梅罗·巴尔塞洛（在 1972 年费雷失败之后，他接管了该党）试图在 1980 年他推测再度当选后动员舆论就地位问题进行对峙，办法是计划举行一次只包括建州和建立共同体两种选择的公民投票。然而，那一年巴尔塞洛极其勉强获胜——几乎是一场平分秋色的选举，这实际上终止了那种可能性。

在选举的政治活动、迅速工业化和按照人民民主党自治论所吸收的波多黎各文化认同感这个背景下，独立运动在 1940 年后的时期是不能够取得多大进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加强了同化的倾向而不是分离主义倾向。虽然如此，政治地位的捉摸不定，建州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以及殖民地依附的事实——不论对它们如何理解——使得独立运动成为波多黎各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因素。虽然存在着许多意识形态和策略迥然不同的争取独立的组织，但 80 年代中期争取独立运动的主要组织是波多黎各独立党（PIP）和波多黎各社会党（PSP）（后者不应同 50 年代中期消失的老社会党相混

滑)。波多黎各独立党从1946年成立之时起就在政党体系范围内占有体制化的地位。该党作为拥护独立的主要选举组织，组成两党结构的一个选举卫星的核心。它试图构想某种中间道路的思想，近年来主张对“民主社会主义”保持一种松散的信仰，直截了当地避免同比它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波多黎各社会党认同，而加入欧洲和拉丁美洲民主社会党的社会党国际。

波多黎各社会党是1961年由波多黎各独立党原不满分子创建的波多黎各争取独立运动（MPI)，1970年采用它的新名称，并正式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选举方面，它是个很小的党，1976年获得选票不足1%，1980年则更少了；1984年它未选出候选人。然而，它曾在岛上的政治结构中有某种影响力，这是由于它通过发行一份周报和其他各种出版物（这些报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波多黎各政治问题)，由于它同劳工运动中一些部门的关系，以及由于它与国外社会主义政权、特别是与古巴小心培植起来的（即使并非总是愉快的）联系而形成的。

经济和社会变革：困境的加深

波多黎各的“现代化”在许多方面是感人的和匆促的。早在1956年，制造业部门对国民生产作出的贡献要大于农业，到1964年，制造业已超过农业，成为波多黎各工人净收入的主要来源。[①]在整个战后年代，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农业的下降是迅速的和连续不断的。到1980年，仅4%的岛上净收入来自农业；1940年，则曾超过31%。蔗糖工业的下降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经很明显了，随着甘蔗播种面积从1950年的40万奎尔达减少到1980年的8.5万奎尔达，蔗糖工业持续地急速地衰落。[②]

---

① 韦尔斯：《波多黎各的现代化》，第153页。

② 波多黎各计划委员会编：《给总督的经济报告》，1980年。安赫尔·L·鲁伊斯：《波多黎各蔗糖工业的代价和社会经济影响》，载《公共管理杂志》，16，第2期（1984年3月）。一奎尔达相当于4000平方米，几乎约一英亩。

工业化热是在政府的直接刺激和鼓励下通过吸引外部投资来实现的，工业化热导致了1952年建立约170家工厂和1963年建立2246家工厂。[1]大部分这些工厂是美国公司的“劳动密集型”小公司。到60年代中期，工业发展计划开始将精力投在吸引比较重型的、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特别是石油化工和石油提炼工业。70年代初石油价格危机严重影响了石油工业，结果是，大规模减产，工厂停产和发生破产。将石油化工工业转变成众多下游的、毗连的、从属性工业的核心，则从未实现。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大大放慢了总的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的下降甚至更大。

岛上制造业发展的最新篇章，是美国制药业和其他高技术工业部门（诸如电子产品和电器产品）的分公司的建立和扩散。80年代，制药公司成了众所周知的“领地公司”范围内最大的集团，根据1976年联邦税收改革法第936款，“领地公司”被免征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其他领地”营业和被动投资收入的联邦所得税。这些“936号公司”（波多黎各对这些公司的称呼）在1982年提供大约7万个工作岗位，占岛上全部就业量的约10%和制造业部门就业的一半以上。1976—1982年这个时期，在波多黎各的这些公司有400—500家，制药企业占全部净资产的几乎46%，其次是电气和电子设备公司，占19.5%。1970—1983年间，化学工业占岛上制造业总收入从11%增长到37%。[2]1984年当选的埃尔南德斯·科隆政府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阻止美国国会以税收改革、预算平衡和堵塞税收“漏洞”为名减少或削弱根据“936款”所核准的税收优惠。也许再也没有比波多黎各对美国的这种特殊牌号的依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弱点更说明问题的了。

战后波多黎各职业结构的变动，反映了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

---

① 韦尔斯：《波多黎各的现代化》，第152页。

② 美国财政部编：《领地公司税收制度的运用和影响，第5次报告》（1985年5月，首都华盛顿），第1—2页，31—38页。

和农业的绝对衰落，反映了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的重要性，以及反映了作为主要就业来源的公共与服务部门的稳定增长。从7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就业占就业劳动力和支付薪金的约1/4。1985年的上述数字分别为23.7%和25.1%。① 经济发展计划未能大幅度地减少失业率。60年代早期，官方的失业数字徘徊在12%左右，70年代开始上升。到1983年，失业率达到了创记录的23.4%，非官方的估计还要高得多。② 波多黎各经济在利用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现有劳动力中年龄在14岁以上者占人口的比例很低。70年代初，这一数字已经很低，为44.5%，1983年下降到41%（1976年大陆美国的相应数字为62%）。③

尽管如此，正是工人移居大陆美国的“安全阀”才使失业率没有上升得更高。波多黎各人散居的历史是异常戏剧性的。20世纪50年代，波多黎各人开始大批离境乘飞机前往美国东部。50年代头4年，每年净移民人数平均接近5万。60年代，每年下降到大约2万，60年代以后进一步下降。然而，这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1982—1983财政年度，净移民人数约3.5万。④

波多黎各工人大规模移民，只不过是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之前已经开始了的人口移动现象的最新发展。这意味着岛上大部分无产阶级通过运用经济压力和容易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被“重新安置”在宗主国的城市。由于宪法上的地位问题未获得解决，由于大陆和波多黎各岛上人员和信息交往容易而且不断，以及伴随面来的继续抵制他们同化进美国的主流，波多黎各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已成为一个分裂的民族，其人口的几乎一半住在岛外。近

---

① 波多黎各计划委员会编：《给总督的经济报告》，1985。

② 《给总督的经济报告》，1984。1974和1975年官方失业率分别为12%和15.4%，《给总督的经济报告》，1976。

③ 《给总督的经济报告》，1976。美国财政部编：《经营活动》，第23页。

④ 何塞·L·巴斯克斯·卡尔萨达：《波多黎各的人口及其历史轨迹》（1978年7月，圣胡安，波多黎各大学，医学科学领域）。美国财政部编：《经营活动》，第18页。

年来，有些波多黎各人较长时间在大陆定居之后又返回岛上，其中包括许多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年轻的“少数民族”波多黎各人（美国的称呼），出现了波多黎各人回流的明显特点，这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在波多黎各岛本身，在人们移居大陆的同时，农村地区的人口迅速相对地减少，特别是在中部山区，而在大都市地区，特别是圣胡安及其近郊则人口猛增。1980年，几乎2/3的人口住在城区，几乎1/3住在构成圣胡安首都地区的7个市内。

到20世纪40年代初人民民主党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已经急剧削弱和分裂。[①]工业化计划的基石之一，是吸引进口的资本投在劳动力供应相对便宜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一个“抱合作态度的”劳工运动。波多黎各的宪法地位意味着美联邦最低工资不一定适用于岛上，多年来政府对最低工资的政策是在特例基础上执行的，许可地方作出低于联邦最低工资的调整。70年代，这一政策被放弃了。上述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现在也适用于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和大陆的实际工资差别仍然存在，但是差距则慢慢地、但明显地在缩短。

到20世纪80年代，有组织的劳工仍然大大少于就业劳动力的15%。在极其重要的制药工业，实际上没有有组织的工会，但是公共部门职工组织有了加速发展。到70年代末，在公共部门工人中成立了一些最有战斗性的工会，尽管事实是，并没有制定岛一级的有关承认或管理工会组织事宜、集体谈判或在公共部门罢工权等总的立法。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具有潜在的严重性，因为公共部门的就业在波多黎各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战后时期，现代化在数量上取得的成就不完全是通过经济自行增长进程或工业发展进程来实现的。波多黎各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直接来源于联邦政府对政府计划给予直接津贴或赠款的形

---

① 见安赫尔·金特罗·里韦拉：《波多黎各的工人阶级与政治进程》，载《社会科学杂志》20期（1976），第3—48页。

式提供的资金转让，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是以退伍军人福利、社会保险养老金、失业保险金以及从1974年实施的食品券（1982年改为直接支付现金的制度）等形式直接付款给公民。

1976年，联邦转让给个人的款项合计14.933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9.8%，比上一年增长43.7%。食品券计划一项就占8.06亿美元（据1975年估计，几乎74%的人口有资格参与食品券计划，55.5%的人口已经在领取食品券津贴）。1980年，联邦给个人的直接净转让占波多黎各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乎23%；如果给政府的净转让包括进去的话，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乎1/3。由于联邦预算削减和公共服务工作计划终止及联邦对波多黎各营养援助规定了法定最高限额，到1985年这些金额略有下降，但对个人的转让总计仍达31.838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1.5%。①

这些联邦援助计划像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救济机构一样，对维持波多黎各的经济，或许还对维持波多黎各社会和政治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人同时也将这些计划视为加强了依附性，基本形成了长远的政治态势。

抵制与顺应

现代化是以直接而不加掩饰的“美国化”形式来到波多黎各的。可是，岛上的精英分子有下述近似一致的看法：波多黎各的文化不应当被同化到美国主流文化中去。主张建州的人将其论据立足于所有美国公民均享有平等政治权利这一观念之上，立足于建州据说会给予保证的经济和社会安全感上，而不是立足于波多黎各人有效地变成美国人这种被人们所领悟的见解上。当然，主

① 数字摘自1976年和1985年的《给总督的经济报告》；安赫尔·L·鲁伊斯和帕里马尔·乔杜里：《食品券对波多黎各经济的影响：一项投入—产出观点》，（里奥彼德拉斯，波多黎各大学经济系，论文与专著系列第7期，1978年9月）第5期；美国财政部：《经营活动》，第24—25页。

张共同体和独立的人们是以民族分立和民族特性这一前提为出发点的。支持建州的人同其对手的分歧，并不是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或“波多黎各化”的分歧，而是关于那种地位是否能表示或确认波多黎各特性的有效目的。

到20世纪最后10年，波多黎各的问题仍然是最广义的“政治性”问题。有关政界本身的适当范围和定义这些充满感情的基本问题，仍未获答案，未得解决。自1940年以后，对于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的事实进行抵制或妥协的相互作用，变得更为复杂了。

在美国军队中服兵役（1940年后有25万波多黎各人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移民从美国返回（70年代晚期，在公立中、小学，约有2.5万名学生被列为主要讲英语但需要双语教育），新闻媒介所发表的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新闻几乎全来源于美国，这些对于使波多黎各“结合进”它的美国社会关系，都是重要的因素。①

进行研究、讨论的公众对美国化的政策和态度中最有争议和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是语言和教育政策。从美国人来到之后，语言曾是波多黎各的一个主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1948年选举总督法实施之前，岛上的美国官员仍坚持认为必须将英语放在首要地位。一旦人民民主党的权力牢牢树立以及教育局长由总督直接任命，各个层次的公立中、小学教育均规定要用西班牙语教学，英语是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二年级的第二必修语言。西班牙语是群众的语言，在公立中、小学教育中是教学的手段，是群众书面

① 在陆军服兵役的数字由公共事务办公室提供（圣胡安，布坎南堡）。要考察纽约和波多黎各的语言问题和双语教育，见语言政策特别工作组编：《语言政策和波多黎各社区》，载《双语评论》（纽约市立大学，外国语言系，5，第1和2期（1978年1—8月）；作为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的复印本，纽约市立大学论文集第1期（1978年）。要研究波多黎各的日报，见罗伯特·W·安德逊：《波多黎各的报刊》（圣胡安，人权委员会报告，1977--人权委员会—006E，1977年7月13日）。

和口头交往及文艺表达的工具。但是英语仍占有特权地位，英语对波多黎各语言现实的影响正在加深，有些人对此感到沮丧，另一些人则表示赞同。① 1976年，总的学龄人口中，约17%在私立学校注册。其中许多学校（教会学校和世俗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② 按照英语语言能力而形成社会分层，显然是可能的，尽管尚无旨在揭示岛上居民这方面情况发展程度的研究。

1940年后，教学水平和正规教育的进步，曾是波多黎各发展的突出口号。据估计，1980年，在6至18岁的人口中，约80%上学。③ 波多黎各岛自夸是世界上大学年龄人口中就读于高等院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1977年占40%。在整个4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波多黎各的一些大学，最突出的是里奥彼德拉斯波多黎各国立大学（1975年约有2.5万学生）的校本部，是反帝和主张独立的学生运动的重要并十分突出的中心。这些学生运动通常密切呼应校外的政治组织，而且几乎总是一致起来反对与政府联合并在经济上依赖政府的大学当局。由于国立大学系统的分校增加，由于私立大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技术课程的日益强调，波多黎各大学校本部作为抵制"美国化"的舞台所具有的政治及文化中心地位已略为减弱了。1976年，在私立大学注册的学生第一次多于公立制大学（58625对52686）。到1984—1985年，岛上全部大学生中几乎有63%的人上私立高等院校（大学全部注册人数为155726人，读私立高等院校的有97549人）。④ 波多黎各的教育制度由于致力于提高数量，而且划分为公立和私立、教会的和世俗的、工艺院校和传统文科等复杂层次，因此与其说这种制度是抵

---

① 比如说，见赫尔曼·德·格兰达：《现代波多黎各的语言文化转移与语言干扰（1898--1968）》（1972年，里奥彼德拉斯）。

② 语言政策特别工作组编：《语言政策和波多黎各社会》，第10页。

③ 数字摘自波多黎各自由联系州教育改革委员会编：《最后的报告》（1977年6月20日，阿托雷伊），第51—53、202页；以及摘自教育局直接提供的信息。

④ 波多黎各，里奥彼德拉斯高等教育委员会编：《1984--1985学年波多黎各高等教育机构统计》（1985年3月），表1。

制“美国化”的可能来源，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化”的重重困难和矛盾。

波多黎各带着它原封不动的殖民地困境和令人困惑的地位问题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年代。波多黎各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仍不确定。联合国通过它的非殖民化委员会，表示它继续关注这个未获得解决的地位问题，即使1953年联合国大会免除美国每年必须提交有关波多黎各作为“非自治领地”的报告的义务。[1]主张独立的人士为此积极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50年代，共同体政府企图加强波多黎各在加勒比地区作为一个自治实体的作用，但鉴于共同体地位本身的限制所固有的困难以及大部分当地舆论反对这类自治地位，这些尝试并不深入。然而，共同体的主张者则坚持要求扩大自治的波多黎各在共同体结构范围内可以承担的国际作用。[2]

从1985年起，埃尔南德斯·科隆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党政府曾试图鼓励扩大波多黎各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业及商业作用。它的战略是促进“领地公司”，建立“双车间”工厂，将资本投入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联营企业，以便将那些公司的活动同里根政府的“加勒比地区倡议”计划联系起来。同时，波多黎各政府寻求确保有利的“936”税收优惠的持久性，而这些优惠显然只有在目前地位所默认的“财政自治”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是旨在加强共同体的现状，而不是旨在从法律上或正式地削弱这一现状。自治的加强继续作为人民民主党的一种抽象的、反复推迟的目标。

对波多黎各非殖民化问题的曲折情况所产生的困难和矛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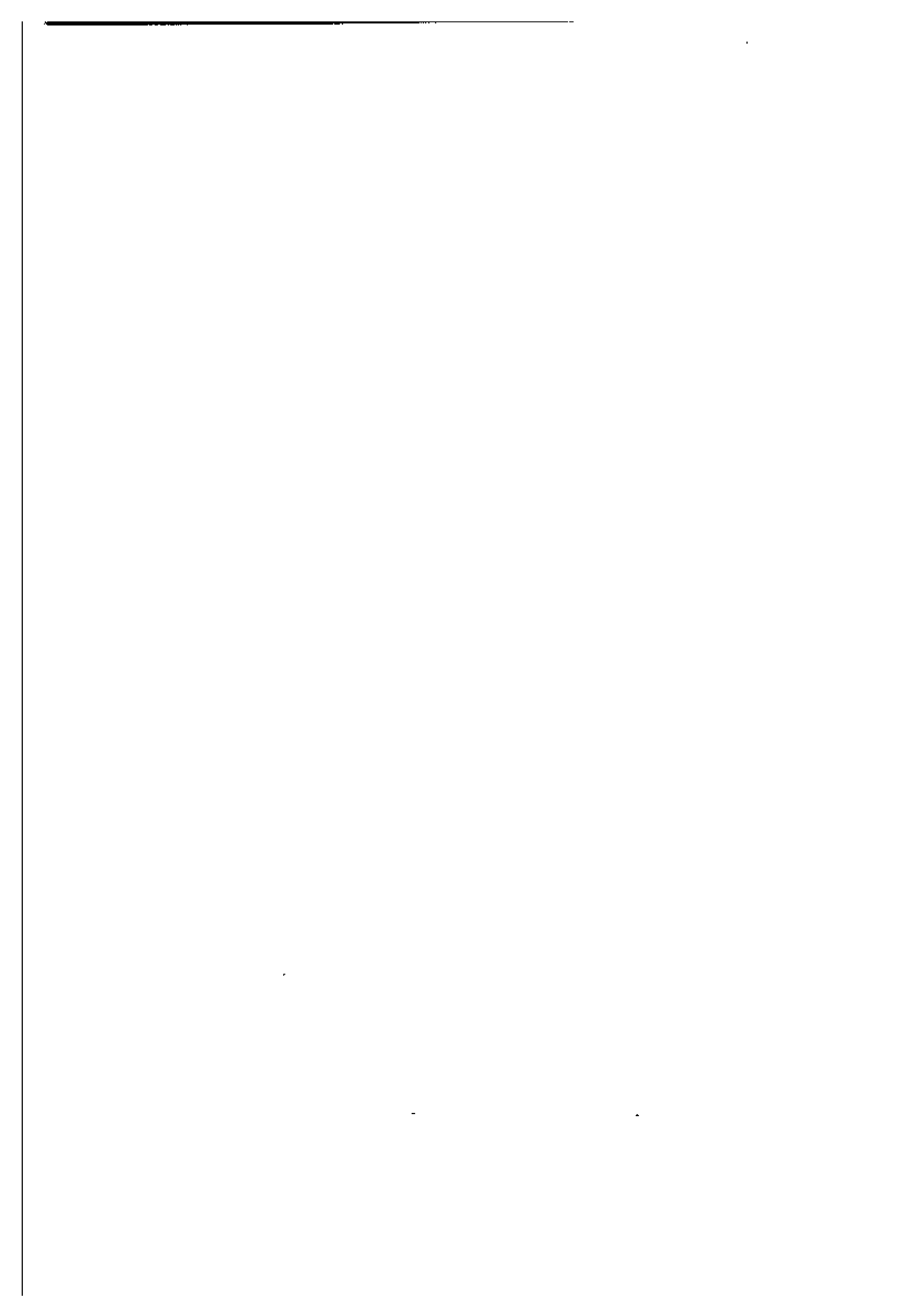
① 有关波多黎各问题在联合国的编年文件材料，见卡门·高铁尔·马约拉尔和玛丽亚·德尔皮拉尔·阿奎略斯合编的《波多黎各与联合国》(1978年，里奥彼德拉斯)。

② 比如说，见W·M·雷斯曼：《波多黎各与国际进程：联合中的新作用》，美国国际法学会，《跨国法律政策研究》，第6期(1975年，首都华盛顿)。赫伯特·小科克伦：《加勒比国际合作的模式》(1970年，达拉斯)，首先叙述在人民民主党历届政府领导下共同体在加勒比地区的作用。

可能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不管波多黎各处在什么特殊的环境，波多黎各不成为一个拉美国家的事实无论如何看来是不会很快出现的。

第四编

巴拿马



第 14 章

1903 年以来的巴拿马

巴拿马地峡自 1501 年被“发现”以来，一直是各条路线的一个交汇点。在西班牙殖民地时代，骡马大队运载货物通过地峡，联结着西班牙与太平洋的交通。位于加勒比海岸的波托弗洛每年的交易会吸引了各大商行的代理商，用成吨的秘鲁白银换回欧洲的货物。甚至在交易市场衰落以后，仍然继续因商业和航运业而繁荣兴旺的巴拿马，18 世纪仍在西班牙统治之下，而在 19 世纪则已是独立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个行省。

各种不同出身的人到巴拿马定居。第一批西班牙人创建了一小批城镇，把印第安人分派到委托监护地，在太平洋沿岸最好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几百个这类家族形成了一套农村寡头政治。这些家族虽不特别富有，但是，既控制了土地也控制了人民。此外，西班牙政府还把巴拿马城选定为太平洋一侧的一个关键性的商业点和防御点，而太平洋则被视为自己的内海。巴拿马城的居民主要有官僚、军官、商人、海员、工匠和非洲奴隶。以后，加勒比商人的代理商们也在巴拿马定居。

巴拿马在殖民地时期和 19 世纪的经历，对于这个在 1903 年以后才成为一个国家的巴拿马，都有影响。两类社会精英分子之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类是常被称之为“内地人”的农村精英，他们是早期定居者的后裔；另一类则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都是混杂的，并且以巴拿马城和北部的转口港科隆为其基础。巴拿马与外界的多种联系为人民带来了资本和其他利益，

但也使它的命运受制于国际经济的影响。此外，该省的战略位置以及狭窄状况（为它带来了最大的天然财源）诱使世界强国争相在此扩充势力。最后，巴拿马的海运和商业业务也削弱了它与毗邻地区的地缘政治共同性。

巴拿马在20世纪的历史也深受其独立性质的影响。1821年巴拿马的领袖们宣布脱离西班牙，但决定加入当时刚刚成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然而，在19世纪期间，往往因为波哥大采取保守政策，他们曾几度与哥伦比亚破裂。哥伦比亚使用武力镇压了这些分裂运动。此外，美国（根据它同哥伦比亚缔结的1846年比德拉克—马利亚里诺条约）保证尊重哥伦比亚在巴拿马的主权，特别是在一家纽约的巴拿马铁路公司修建了巴拿马铁路（1855年通车）后，更是如此。因此，反对外来控制的仇恨情绪，从针对西班牙转移到了哥伦比亚和美国。

对重新开始开凿一条横贯巴拿马的跨越地峡的运河工程（这项工程自19世纪80年代倒霉的法国方案失败以后被废弃）抱有希望，加上唯恐开凿运河的地址可能被换到尼加拉瓜去的担心，促使分离运动分子的意念死灰复燃，在美国的支持下，导致了巴拿马1903年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但是，由于独立得晚，使巴拿马在自主管理方面相对地准备不足，而且巴拿马人（同古巴人一样）在着手建设他们的国家时必须迁就美国的利益。一位权威曾指出，巴拿马“为了贪便宜而嫁给”美国，产生了一个“损害主权的杂种国家”。[①]

美国在巴拿马行使绝对的权力大约直到1930年为止，巴拿马只不过徒有其名，已沦为美国的一个保护国。其后，美国放弃了公开干涉，但仍在多方面施加影响。美国保证旨在使运河运营的法律和命令得以贯彻；从外部施加威力保护通行区；监督政治；并

---

① 古斯塔沃·阿道弗·梅利安德：《巴拿马政治中的美国》（伊利诺斯州，丹维尔，1971），第189—190页。

以运河发放工资和购买货物来扶持当地的经济。美国官员首先希望船舶通过运河运行并保护美国在地峡的利益，他们指望巴拿马人接受这些目的。另一方面，巴拿马精英分子则需要从运河及其辅助服务行业中赚钱，以便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建设国家。在目的方面的这种不同点，在两国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文件：8个条约（1903年、1909年、1926年、1936年、1947年、1955年、1967年、1977年——第3个、第5个和第7个没有完成）；两个协定（1904年塔夫脱协定和1942年基地协定）；产生了几次对抗和全面的纠纷关系。

独立以后，大量人员从全球各个角落涌入，巴拿马社会的混杂性增加了。从1896年至1930年，人口总数从31.6万增至51.2万。移民为该国带来了丰富的技术，却阻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种族和文化等方面差异使巴拿马人四分五裂，尤其在政坛上更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的影响，有一位作家把巴拿马称之为“得了萎缩症的国家”。①

1904年以后，巴拿马的领导人们奉行过若干全国性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修改和最终废除令人痛恨的1903年条约而努力奋斗，美国就是根据这个条约而取得了运河区和开凿运河及营运运河的半主权。另一点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谴责美国（例如，1927年在国际联盟、1944—1946年在国际劳工组织和1973年在联合国的所作所为），让世界舆论重视该国的特殊问题。第三，巴拿马舆论一致反对北方巨人，导致了运河雇用人员与军事人员之间不愉快的共处关系。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拿马企图使它的经济多样化，以减轻它对运河转运、运河发放工资和运河采购货物的依赖。

尽管经常采取对抗的战略，巴拿马的精英分子们通常仍与美

① 埃里克·德·莱昂《论巴拿马人社会心理性质及其社会问题》（巴拿马，1970），第22页。

国合作。在共和国早期的岁月里，美国与巴拿马官员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和解的，并结成了非正式的联盟。这种情况允许两国遵循各自的目的而不致中断运河的运营。这种潜在的合作，由于巴拿马历史上比比皆是的喧嚣的演说、谴责、骚乱以及愤怒的头条新闻而显得十分隐晦了。此外，它还有助于当地的精英分子继续掌权并控制群众。

独立和1903年条约

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的独立，通常被视为是开凿巴拿马运河这出戏的序幕。代表两个大陆金融和政治利益的一伙强人，为了实现使开凿一条横跨巴拿马的运河重新开工这一目的，共同密谋使巴拿马省脱离哥伦比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参与了这一计划，支持这伙密谋者，并口授了一个迫使巴拿马人接受的对美国有利的条约。

巴拿马独立运动发端于巴拿马铁路公司的官员之中，这些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头面人物，他们与他们的铁路公司纽约总部以及拥有铁路和运河开凿权的法国控股公司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主要的担心是，唯恐参与建设洋际运河的美国会选择尼加拉瓜而不选择巴拿马作为运河的河北。巴拿马过去从来就没有同哥伦比亚紧密地合为一体，巴拿马人认为哥伦比亚指望从巴拿马地峡榨取财政收益而不是促进其发展。巴拿马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哥伦比亚人步调也并不一致。他们倾向于反教权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者，具有一种面向国际的倾向，而哥伦比亚人一般则是保守的、信奉天主教并且心胸狭隘。最后，巴拿马人需要和平以便寻求他们的商业利益，而哥伦比亚似乎命中注定要承受永无休止的内战，其中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包括巴拿马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遭到破坏的千日战争（1899—1902）。

美国和法国的利益集团对巴拿马人密谋起事给予了支持。罗斯福被哥伦比亚人否决当时商谈的海—埃兰条约的举动所激怒，

宁可在排除哥伦比亚参加的情况下授权开凿运河。他也切望重新开工，希望利用运河在他1904年竞选运动中拉选票。菲利普·比诺·瓦里拉这位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与运河工作结下不解之缘的法国工程师，在美国官员与巴拿马密谋者之间充当了联络员。他坚持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将法国公司的权利卖给美国政府，也希望能安排巴拿马运河工程善始善终以维护法国的荣誉。比诺听取了纽约巴拿马铁路公司律师威廉·纳尔逊·克伦威尔的劝告，后者赞助持有法国公司大量股份的股东的利益。

1903年8月主要策划者之一，前省长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军医（1833—1909）到纽约会见了克伦威尔并知悉美国将支持叛乱的态度。经过几次会商，由于哥伦比亚公使提出警告，克伦威尔废除了合约。阿马多尔于是去会见了比诺，比诺向他作了保证。这项保证是以比诺与罗斯福及国务卿海约翰的几次谈话为基础的。他们说，将承认巴拿马的独立并将保护革命者。比诺甚至制订了一整套"独立大全"，包括一面国旗、一项宣言、军事计划并答应供给10万美元。作为交换条件，他迫使巴拿马人任命他为驻华盛顿特命全权公使。

阿马多尔欢欣鼓舞地回到巴拿马，但仍然对举事犹豫不决。他为了鼓动密谋者的热情召集了几次会议，因为他们光凭这位法国人的一项保证难以拿自已的命运、事业甚至生命去冒险。然而，埃斯特万·韦尔塔斯将军使这一情况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他是一位年轻的军事英雄，他的部队使独立有了保证。在预定造反的那一天，即1903年11月3日，阿马多尔、他的妻子多尼亚·玛丽亚、韦尔塔斯将军和另外几个人（包括巴拿马铁路公司的美国负责人）设法买通了当地的卫戍部队，监禁了前来视察的哥伦比亚将军并使他的部队保持中立，于是宣告巴拿马独立。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人死亡。当晚，巴拿马城市政厅批准了这项决议并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三天以后就承认了，美国军舰停泊在巴拿马城和科隆近海以保证新共和国的安全。

第一届独立政府是由最初造反的人员组成的一个执政委员会：何塞·阿古斯丁·阿朗戈、托马斯·阿里亚斯和费德里科·博伊德，他们领导了一个既有自由党人又有保守党人组成的内阁，他们是当地精英分子和巴拿马铁路公司的代表。阿马多尔和博伊德受权同美国谈判签订一项运河协议的事宜。与此同时，新近被任命的巴拿马驻华盛顿公使比诺则开始与海会谈，意欲在巴拿马人抵达之前签订一项条约。海同意，他知道他提出任何要求比诺都必须接受。他起草了一份远比哥伦比亚人已经拒绝的条件更苛刻的条约。根据该条约，巴拿马须将该国中部10英里宽的运河区(约500平方英里)的主权永远让与美国，由美国一次付给1000万美元和每年付给25万美元作为回报，实际上使巴拿马沦为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有权对巴拿马城和科隆进行干涉以便维护公共秩序)，此项条约在11月18日、正是在阿马多尔和博伊德到达华盛顿递交全权证书的几小时以前签订的。

巴拿马执政委员会尽管对条约的条款大为不满，还是批准了该条约，因为比诺和海暗示，如果拖延，将会导致（美国）同哥伦比亚进行新的谈判。因此，运河条约的签字事件，在巴拿马的独立中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1903年条约变成了损害两国之间关系的一种原罪①长达数代人之久。

形成时期：1903—1930年

巴拿马执政委员会定于1903年12月末举行选举，推选出32名代表组成制宪议会，后者将于下一个月召开会议。选举只有少数人参加，其中，各省的亲独立派的市政领导人占优势。从名义上讲，保守党和自由党拥有同等名额的代表，但实际上保守党人在执政委员会和制宪议会中都占有优势。他们在一个月内制订了

① 原罪（original sin)，基督教教义之一，指人类因其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与生俱来的原始罪过。此处系借喻。——译者

一部宪法，规定行政部门中央集权化（各省省长须经任命）但设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关和一个法院加以平衡。通过第136条时，在议会中出现了党派性的分裂。托马斯·阿里亚斯受到附加于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的启发，建议美国应该拥有在巴拿马任何地方进行干涉的权利，以维持和平与宪法秩序。这项措施是在自由党代表反对声中通过的，他们认为这侵犯了国家主权。当制宪议会完成它的任务之时，推选了阿马多尔担任任期4年的总统，然后转变为国民议会。制宪议会于1904年6月解散。

阿马多尔任命了比较多的保守党人进入他的内阁，这样就损害了两党平衡的性质并引起了危机。当阿马多尔想对那支250人的部队行使更大的权力时，自由党的韦尔塔斯将军则提出了他将撤销对新内阁任命的要求。这次危机在11月到达了顶点：阿马多尔请求美国进行干涉以防止韦尔塔斯发动政变。美国大使警告韦尔塔斯说，他若做出任何违反宪法的行动，美国将派出海军陆战队进驻。韦尔塔斯没有别的选择，只得辞职并退出政治生涯。

阿马多尔趁韦尔塔斯辞职之际，将部队全部解散，这个主意是同美国外交官们商讨后决定的，他们同意，运河部队可以用来保护巴拿马抵御外敌以及平定内乱。此外，一支军队不但要花费许多钱而且往往还会使政局不稳定。作为替代，阿马多尔建立了国家警察，它保证了保守党执政，但也使巴拿马更加依赖美国。

独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阿马多尔及革命者们淡化了他们保守党的本性，称他们自己为立宪派。但是，新政府的权力一旦巩固时，党派性就再度表面化了。巴拿马的政党扎根于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但具体情况并不相同。首先，巴拿马精英分子比较务实并具有商业意识，从而避免了导致像哥伦比亚内战的那种敌对状态。在巴拿马，不能解决的冲突比较少，而且宗教并没有重大的影响。个人和家族关系的分量超过了意识形态。然而，巴拿马保守党人往往是白种人并属于“内地人”的精英分子。他们不多的几种强烈信念之一，就是认为私人承包公共工程更好。另

一方面，自由党领导人则往往具有黑人或具有印第安人血统，他们出身于工匠阶层、小牧场主和“现代黑人”，而且在获得非白种人群众的支持方面比较成功。

美国政府厚爱保守党人，而且自1903年以后即同他们有一个默契的联盟。为此，自由党曾向美国公使提议：两党在担任官职方面应该平分秋色，但遭到拒绝。然而，当自由党人在1904年12月市政选举中以压倒多数大获全胜以后，这种对保守党人的偏爱就不太站得住脚了。此后，美国官员插手的方式就比较谨慎了。

阿马多尔总统花费了许多时间去遏制自由党人。1905年年中，他策划了一个计谋以褫夺贝利萨里奥·波拉斯（1856—1942）的公权，后者是千日战争中的英雄，作为自由党主要领导人而崭露头角。1905年最高法院以他未曾参加1903年巴拿马独立运动而撤销了他的公民资格，但国民议会却很快就恢复了他的公民资格。1906年6月的中期选举中也暴露了保守党的走投无路。在美国的默许下，国家警察使尽了一切舞弊手段才保证了保守党赢得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的胜利。

到1908年时，在回顾阿马多尔4年任期时，可以说已取得了若干成就。他使该国的独立得以巩固，监督了宪法的制订成文并使承袭自哥伦比亚的法律成为法典，建立了官僚机构的基本原则，从美国那里争得了在运河区的特许权（塔夫脱协定中就巴拿马与运河区之间的贸易作出了规定），并为该国制订了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制度。

1908年，直到7月大选前4天总统继任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总统在两名候选人中进行抉择：何塞·多明戈·德·奥瓦尔迪亚，是一位自由党的长者；里卡多·阿里亚斯是受到阿马多尔和别的政府要员支持的保守党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候选人却各自都受到另一个党的支持。罗斯福内阁，也许是唯恐导致1906年古巴那样的危机，及早地决定秘密支持奥瓦尔迪亚。国防部长威廉·塔夫脱是美国大选中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于5月去巴拿马

并事先得到简要的指令。相信奥瓦尔迪亚和自由党将在一场公平的竞选中获胜而安下心来，塔夫脱见到了阿马多尔并指示采取专门的措施以保证自由投票，并由美国监督投票。

1910年3月奥瓦尔迪亚去世。副总统卡洛斯·A·门多萨(1856--1916)是该国最孚众望的人物之一。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和政治家的家庭，自青年时代起就在政府中十分活跃，是参加1903年革命的革命者并撰写过独立宣言。门多萨身材高大，口齿清晰，胆大果敢并具有英俊的黑人气质，他在圣安娜区非白人居民中拥有大量追随者。这个区有一个广场位于旧城的边缘，是运河区的焦点，它是示威游行和政治集会的现场。门多萨被人描绘为大城市领袖的典型人物，因为他在城市下层阶级中具有影响。[①]根据宪法的规定，议会将选择一位总统继任奥瓦尔迪亚余下的任期。门多萨是被选中的幸运儿，但他的继任被实施运河计划的美国总指挥乔治·戈瑟尔斯上校和美国驻巴拿马代办理查德·O·马什阻止了。戈瑟尔斯和马什都不喜欢自由党人，认为他们对美国不友好并毫不负责地煽动下层阶级。两人都不喜欢门多萨的黑皮肤，认为选择他是对巴拿马大多数白种人精英分子的一种侮辱。马什掀起了迫使撤销门多萨接受任命的运动，甚至威胁说，他如果抵抗就要进行占领。最后，门多萨接受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而75岁高龄的巴勃罗·阿罗塞梅纳在两党支持下就任了总统之职。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评论说，“说巴拿马是一个独立国家简直是句笑话。它实际上只不过是运河区的一个附属品”。[②]门多萨受到美国和英国官员的普遍赞扬，他，正如外交纠纷排除能手威廉·富兰克林·桑兹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他著的书中所说的，是“弱肉强食外交”的牺牲品。与此同时，戈瑟尔斯不再追随马什的干涉主义政

---

① J·孔特·波拉斯：《阿努力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巴拿马城，1980）第46页。

② 马利特致格雷，1910年8月22日，外交部371/944/33140，公共档案局，伦敦。

款，国务院不体面地召回了马件。

政变的另一个牺牲品是贝利萨里奥·波拉斯，他是拉斯塔布拉斯人，曾去波哥大攻读法律，当他还是18岁时就已成为自由党的积极分子。在巴拿马他打动了自由党的考迪罗布埃纳文图拉·科雷奥索，获得一笔去巴黎学习法律的3年奖学金作为报偿，并回来在法国运河公司法律部工作。波拉斯1895年后曾流亡中美洲，同哥伦比亚的保守党人作对的波拉斯终于在千日战争期间指挥巴拿马部队作战。波拉斯从尼加拉瓜流亡归来后，批评了1903年的起义，他认为这是保守党人的一次夺权，随后即把主权交给美国。他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从未改变过他的信念，这导致了1905--1906年被取消公民资格。然而，临近1912年时，波拉斯却变成了顺理成章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门多萨给予支持，但以1916年获得总统提名作为交换条件。尽管美国代表监督了这次选举，但由于保守党反对派的退出才使波拉斯得以保持自由党霸权地位达20年之久。

波拉斯第一届政府期间（1912--1916）该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也相当稳定。党派斗争平息了。运河于1914年完工，第二年举行了一个国际博览会以资庆祝。前几任总统创始的一些计划——法典、电报线路、巴拿马城现代化和开办学校——都已完成。波拉斯建立了民事和土地登记处，并授权在西奇里基省建筑一条铁路以便鼓励香蕉种植。

正当运河完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际，巴拿马经济受到不景气的影响。运河官员解雇的西印度劳工数以千计并将工资降到最低限额。由于运河发放的工资是该国收益中唯一最大的财源，从而使整个经济蒙受了损失。该国政府敦促运河当局遣返西印度人并采购当地产品以使情况缓解，但收效甚少。1914年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强迫巴拿马将无线电独占权出让给运河当局以便监视商用船舶和海军舰艇来往状况一事，使波拉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其后，1916年年中，美国海军以国家警察的

敏感警区掌握火力强大的来福枪危险性太大为理由，收缴了国家警察拥有的这类枪支。许多巴拿马人把这个行动引为国耻，以后又认为此举在 1921 年给了哥斯达黎加部队入侵争议地区以可乘之机。

1916 年波拉斯未践前言，拒绝支持门多萨出任总统（后者于当年 2 月去世）。波拉斯宁愿自由党人拉蒙·M·巴尔德斯取而代之。波拉斯本人则赴华盛顿出任驻美大使，他的威望大大提高，而巴尔德斯在两年后死于任上，战时的紧急状态使他无法取得多少成就。自由党人在巴尔德斯去世后因总统继任问题而导致分裂，理论家欧塞维奥·莫拉莱斯的支持者企图修改宪法，将只有在本国出生的巴拿马人才有资格被选任职的规定删去。但是，他们失败了，贝利萨里奥·波拉斯再度就任总统。

波拉斯接任了巴尔德斯剩余的任期，其后，又连选连任 1920—1924 年这一届。在这几年期间始终在贯彻他本人于 1912 年开始的建设政策。1918 年，他为该国的第一所大学——法律和政治学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他创立了：财政署（以改进税收），国家出版社，一所师范学院，国家奖券，国家档案局；修建了 200 所新学校和许多道路，此外还建立了科伊瓦反省院。他还创办了圣托马斯医院和巴拿马医院——该国第一批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医院。

波拉斯在外交事务方而不尚成功。1914 年巴拿马拒绝接受有关它与哥斯达黎加边界问题的一项仲裁决定，1921 年 2 月哥斯达黎加部队占领了争议地区。巴拿马城群众举行了抗议活动并要求进行军事征讨。国家警察没有多少枪支，但波拉斯动员了志愿人员，杂乱无章的战斗打了两个星期，战事蔓延到大西洋沿岸的博卡斯地区。当时，美国敦促他接受 1914 年仲裁。在冲突之初，波拉斯曾宣布说："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之间发生战争……将是荒谬的……我决定这件事通过外交解决。"在听到波拉斯的讲话之后，一群乌合之众聚集在圣安娜广场并向总统宫进发准备撵他下台，

但一支美国陆军小分队终于驱散了这次示威游行。几个月后，哥斯达黎加得到美国的允许，占领了争议地区。波拉斯以再派志愿队相威胁，但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所阻止。这对巴拿马人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波拉斯的反对派常常把领土丧失作为把柄，给他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这起边界争端于1941年最后在有利于哥斯达黎加的条件下解决了。

波拉斯遇到过好几次运河问题的挑战。1920年，非美国籍雇员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集体合同和工作保障。罢工者大多数是西印度人但也有相当多的巴拿马人卷入，公众舆论也支持他们。波拉斯的代总统埃内斯托·勒菲弗尔拒绝了运河当局对巴拿马城和科隆罢工集会进行破坏的安排。但是，当局以军事占领相威胁时，他屈服了。罢工终于失败，所谓“白银级”（非美籍）职工被列为低等地位。

波拉斯选择鲁道夫·恰里，一个糖业富商和养牛业大王接替他的总统职务。恰里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儿子，相对而言，他在地峡政界中还是一个新手。恰里受到波拉斯的厚爱，波拉斯挑选恰里是想努力扩大他自己的势力。在恰里任职期间奇里基铁路延伸到太平洋一侧的阿尔穆埃列斯港口，对香蕉业具有重大意义。他还继续执行了波拉斯的道路和公共工程计划，这些计划是由美国银行的低息贷款和发行债券资助的。然而，到1928年时恰里已夺得了对自由党的控制权，以实业家和技术官僚取代了前总统的中产阶级律师和知识分子。因此，他能够阻止波拉斯重新竞选，而代之以弗洛伦西奥·阿莫迪奥·阿罗塞梅纳（1872—1945）。

阿罗塞梅纳是一位工程师，他以“遵守秩序、努力工作、勤俭节约”为竞选纲领顺利地开展了竞选运动，阿罗塞梅纳一直听从恰里的吩咐直到1931年1月2日被推翻为止。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政府是特别贪污的一届，因为他把许多建设工程合同包给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然而，他本人却是清廉的。他的主要成就有：建成了圣地亚哥—戴维公路、坐落在戴维的一家医院和坐落在巴

拿马城外的派蒂利亚机场。

到本世纪 20 年代时，巴拿马领导人终于接受了一位历史学家所称之为的“保护性家长式统治”。据此，美国划定了政治家们可以提出问题和使用何种办法的范围。[①]巴拿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决不能妨碍运河的建设、运营、维护和保卫事宜。同样，他们还允许美国外交官有权就挑选总统和内阁部长人选提出建议，而且有时还有权否决。因此，巴结美国人的某些做法还是必要的。波拉斯甚至说，驻华盛顿使馆是“制造巴拿马总统的决策地”。巴拿马人了解到美国官员们喜欢同白种上层阶级的巴拿马人而且是会说英语的这类人打交道。最后，他们试图遵照美国的愿望，使政治既有适度的民主、符合宪法、安定太平，又是可以预见的。

这种妥协非正式的保持着，并且由于运河和该国精英分子通过婚姻、俱乐部会员关系、富裕巴拿马人在运河区就业、精英分子青年子弟在运河区高中接受教育、商业往来和社交活动等的彼此搀和而得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要求似乎并不太高，而实际上却是使若干名门望族受益。

在这些尺度下，巴拿马的政治精英创立了一种政府制度，即使不是完全的宪法政府，但也有规则、制裁和褒奖。政府提供好处（挂名差事、合同、特许权、特权和荣誉称号）给显贵和有功人员，而政治家则通过选举赢得这种好处的分配权。有一位观察家甚至谈到巴拿马人的“东方式的政府观念”。[②] 政府实践中充满了个人至上主义和以家族为基础的活动。政治团体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内容，往往以谁领导它们来表示其派别，例如：“波拉斯主义”和“恰里主义”。家族关系的影响（即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通常都比思想方面的影响大。权力往往集中在尽可能少数的人的手中。总统委派省长，省长又委派市长。市政会和国民议会对行

① 梅利安德：《巴拿马政治中的美国》，第 193 页。

② 戴维斯致国务卿函，719.00/8—2950，国务院文件，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

政官员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理论上他们应分享权力。

政治家们由于他们能够获得的权力、金钱和地位都十分有限，试图将晋升到他们这种等级的途径加以限制。老的精英家族试图垄断官职，但是他们不可能阻止有才能和有雄心壮志的人打进社会生活圈。精英领袖们于是用有利的联姻、生意伙伴关系、金钱、党员的好处和荣誉地位来拢络新来者。新来者的标志就是加入非公开的联合俱乐部作为会员，该俱乐部的豪华大厦耸立在主教座堂广场附近，俯视着海湾。

既然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建筑在"权贵政治"[1]（或称"地方头头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老百姓也就享受到社会生活的某些影响。在主要城镇，每一个聚居区都有一个长期的头头，由他安排好处、解决问题、分配工作，并一般地作为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员。他办理投票登记并在选举时把选票交到投票处。头头毋须费神去询问他的选民什么政策性的大问题，而只要保证在最低水平上使市民们满意就行。对美国利益并不构成威胁的示威游行，可能对事件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些政治活动造就了诸如被称为"大城市领袖"之类的人物，以多明戈·特纳和德梅特里奥·波拉斯（贝利萨里奥的那位社会主义的儿子）为典型的一种民众主义雄辩家。煽动群众的最容易的办法之一，就是攻击美国这只标准的替罪羊。

当地精英分子们深感失望的是，1903 年条约并未保证让他们承包赚钱的建筑工程和劳务的任务。相反，许多美国承包商和商人在运河区内开业，对巴拿马经济没有什么好处。此外，财政方面的安排也很可怜：巴拿马只获得与哥伦比亚过去从铁路方面收取的相同数额的年金——25 万美元。然而，运河区官员倒也为 60 名巴拿马显要人物委派了中等的管理职务，他们都名列在不公开

---

① gamonalismo，一译"酋长制"，源于 gamonal（酋长）一词，但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酋长，而是指"头头"。——译者

的黄金级雇员名册上。同样，成千上万西印度劳工和其他劳工的到来（他们绝大多数不得不住在巴拿马城或科隆），为巴拿马的商贾阶级提供了大量顾客。在靠近运河的地方拥有土地的投资者们建起了公寓、商店、酒吧、妓院及其他设施。许多人也与美国投资者合资兴办公共事业、银行、电车、啤酒厂和工厂。最后，还有一大批人扩展了他们的律师业务，代表那些因运河区的建立而丧失了资产的人们。运河和外交使团的美国代表们承认为巴拿马富裕家庭提供充分收入的合法性和现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运河采购经纪人开始让巴拿马供应商承包了运河区消费的主要日常用品。战时的匮乏也保护了这些供应商的国内市场。总的说来，咖啡来自多山的奇里基省；牛来自阿苏埃罗半岛；食糖来自科克莱；甜酒来自埃雷拉（产自奇里基和博卡斯地区的香蕉绝大部分运往美国）。只要巴拿马供应商按合理的价格交付合格的货物，运河区就向他们购买，以便扶植当地经济。这种关系使运河当局对当地政府拥有相当大的影响。

本世纪 20 年代的巴拿马 50 万居民并不像大熔炉里的混合材料，其中包含了许许多多互不相容的群体，他们不愿同别的群体搀和在一起。最大的群体是西印度人，他们在修筑运河后即长期定居。约有半数居住在运河区内，另一半人居住在巴拿马城和科隆。尽管西印度人的原籍和文化各不相同（他们之中有巴巴多斯人、牙买加人、马提尼克人等等），巴拿马人把他们统统贬称为 chombos。他们则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保护性亚文化，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兄弟会、体育俱乐部和工会。

其他的民族群体不像西印度人遭到那样深的歧视，但也保持了他们单独的特性，尽管 1923 年的一项宣言谴责了“横阻在面前的种族差异性，而使各族彼此溶合起来”，[1] 但影响不大。华人在经营零售商业、洗衣业和饭馆业方面比较活跃。犹太社区长期以

[1] 孔特·波拉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第 62 页。

来就在商业和银行业方面是一支强劲的力量。有为数可观的一批黎巴嫩人经营商店，但在巴拿马城居住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居民人数却并不多。

1925 年发生了唯一的一次民族暴力冲突，即圣布拉斯群岛库纳族印第安人里的所谓“图莱革命”事件。库纳族是一个凶悍的独立的民族，1915 年以前一直对巴拿马的有效控制进行对抗，1915 年时两个部落联盟之中的一个才允许巴拿马建立一个管理总部和一支特警队。后继的旨在消灭库纳文化的政府方案，导致了无数次的对峙和零星的暴力冲突，而终于导致了 1925 年有组织的叛乱，一些警察在这次事件中被杀害，其余的警察逃离该地。

这次叛乱是前美国代办理査德·马什挑起的，他曾于 1924 年带领一个库纳代表团去华盛顿并写了一大篇宣言宣布成立独立国。美国公使 J·G·索思安排了由美国和巴拿马官员组成的人员作为一方去到停靠在圣布拉斯附近海面的《克利夫兰号》巡洋舰上，并经过调停达成协议，于是印第安人放下武器，但以保证改善待遇作为交换条件。由于库纳族领袖们否认了马什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索思的安排下，他被驱逐出该国，但未受到处分。在那时以后，库纳族曾就他们的关系问题与巴拿马重开过几次谈判，让他们紧密地与全国结合在一起，但享有重大的自治。

在本世纪 20 年代期间，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抵制和抗议。大战时期组织起来的工会，在战后衰退期间变得更富于战斗性。博卡斯地区的香蕉工人 1919 年为抗议当地种植园关闭而举行了罢工。众所周知，运河区的白银级职工在 1920 年举行了大罢工。1921 年，巴拿马工会领导人们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何塞·马里亚·布拉斯克斯·德·佩德罗领导下成立了巴拿马劳工联合会。不久，劳工斗士们在联合会内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30 年成立的），即共产党的前身。20 年代，还有另一些工会和联合会崭露头角。罢工通常并非都有成效，在后继的 50 年里工会的力量仍然很弱，但是它们的出现确实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留下了不安定的

影响。同样，为了挫败美国的横行霸道和制止巴拿马的丧权辱国，20 年代也举行了许多次抗议。1920 年珀欣将军就塔沃加岛并入运河区一事访问巴拿马时，被巴拿马示威群众所包围。1925 年反对贫民区房地产主的罢工罢市，部分也因美国政府在科隆拥有过多的不动产房地契而火上加油。1927 年初的抗议和示威活动有助于说服国民议会拒绝批准（代替塔夫脱协定的）一项运河区条约以及最近与美国的谈判。

到 20 年代末，巴拿马已有某种程度的稳定和立宪政府，但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的监护和干涉（最后一次是在抗租罢工罢市期间发生的）、民族的差异性和混乱的经济都妨碍巴拿马人完全掌握自己命运。

锻造民族国家：1931—1959 年

1931 年 1 月 2 日早晨，秘密组织共同行动协会（AC）占领了警察总部和总统官，废黜了阿罗塞梅纳总统。这次政变为巴拿马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是一次以争取从内部来巩固国家为标志的政变。美国仍是民族主义者追击的主要目标，但国内建设已展现为紧迫的课题。经济衰退并不是这次政变的起因，但 30 年代初期的困难刺激了造反者，其中有几个人曾参加过独立运动。

1931 年的政变标志着一代政治人物的消逝，并把两位非凡的兄弟推到了全国生活的中心，这两兄弟就是：阿莫迪奥·阿里亚斯·马德里和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阿莫迪奥·阿里亚斯（1886—1962）在 30 年代期间支配了政坛，而阿努尔福·阿里亚斯（1901—1988）自 1940—1941 年首次就任总统以后公共形象数度沉浮。阿里亚斯兄弟都出生在科克莱省，19 世纪中叶他们的父亲从哥斯达黎加移民至此定居。他们属于农村的中产阶级，同阿里亚斯寡头集团没有联系。这两位子弟均到巴拿马城学习，然后又去国外攻读专业学位，阿莫迪奥去剑桥学习法律，（多年以

后）阿努尔福则去哈佛学医。阿莫迪奥留英返国后当了一名律师并开始涉足政界，尽管他在鼓动群众方面并没有展现多少才干。阿莫迪奥性格孤癖，说得少，听得多，但他具有处理人际关系的巨大能力，与他的专业声誉相结合，以致英国公使把他描述为巴拿马唯一的政治家。

阿莫迪奥在政界崭露头角是靠共同行动协会的赞助。这个组织由反对当时该国统治方式的一群青年富裕专业人员于 1923 年组成的。他们强调民族主义和加强该国的体制。他们希望重申传统的巴拿马价值观和文化，包括西班牙语在内。最重要的是，他们谋求结束美国对巴拿马的监护，正因为如此而严厉批评恰里总统在 1925 年抗租罢工罢市期间求助于美国警方行动的做法。

阿莫迪奥与共同行动协会的会员们一样，都对波拉斯政府深恶痛绝并在 1924 年参加了反对派议员的竞选。他谴责当时总统讲话中所说的“巴拿马是由于并为了运河而存在的”。相反，阿莫迪奥说：“巴拿马是由于并为了巴拿马人而存在的。”作为共同行动协会在议会的非正式发言人，阿莫迪奥支持民族主义的提案，诸如主张设置方便旗①以鼓励航运公司把它们的船舶在巴拿马登记注册等。他最大的胜利就是阻止了 1926 年运河条约。他把秘密文件印发公诸于众并附了一份声明，指责它破坏了巴拿马的主权。他掀起的运动是大得人心的新闻，但使恰里政府难堪并导致国民议会于 1927 年初拒绝批准这项条约。1928 年阿莫迪奥进一步投身政界，购买了《巴拿马美洲报》，这是一份采用耸人听闻手法的日报，刊登两种语言的稿件。

阿努尔福是一个十分不同的人，真正领导共同行动协会 1931 年 1 月 2 日政变的是他。当阿莫迪奥离家之时，阿努尔福才两岁。阿努尔福同他这位被母亲赞颂备至的兄长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①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指允许外国船只以巴拿马为船籍港悬挂巴拿马旗。——译者

他后来在生活中以一种同胞手足之间犹豫不决的竞争心情，时而模仿又时而否定阿莫迪奥的事业。但在阿莫迪奥这一方面通常总是保护他这位好冲动的弟弟，甚至当弟弟反对他时仍是这样。阿努尔福留学回国后，开始在圣托马斯医院医治病人，但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他的血液中就有政治细胞"。[1] 他口齿伶俐、英俊和刚毅果敢，盼望成名。1930年他参加了共同行动协会。当时反对阿罗塞梅纳的政变正在策划之中。

1931年1月1日夜晚，当共同行动协会的密谋者们获悉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给当局时，他们立即占领了警察总部，切断了总统宫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并制服了总统宫的警卫人员。在最后的这次行动中，阿努尔福的表现如同一个英雄。革命者俘虏了总统及其家属，推举阿莫迪奥·阿里亚斯就任临时总统。然而，为了走宪法的形式，产生了一个由里卡多·阿尔法罗（1882—1971）领导的过渡政府，他曾任1926年条约的谈判代表。阿莫迪奥在共同行动协会的激进分子中是一个温和的人物，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是一名候选人，美国拒绝对他进行干涉。

这次政变的牺牲品——恰里派企图通过对弗朗西斯科·阿里亚斯·帕雷德斯（"唐·潘乔"）的提名反对阿莫迪奥，进行反扑。唐·潘乔是巴拿马最富有的牧场主之一，以他的豪华侈奢的服饰和汽车而有"绅士政治家"之美名，然而他却是一位有能力的演说家并对左派集团有号召力，尽管美国大使馆认为他是亲美派。阿莫迪奥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站在共同行动协会的民族主义者一边，他许诺要巩固国家和增强该国的集体自尊感。他以"里奥格兰德的乔洛小子"和"穷人的候选人"自居，许诺要保护西印度人社区不受驱逐和沙文主义立法的侵扰以换取他们对选举的支持。在赢得合理公正的选举胜利后，阿莫迪奥任命阿努尔福（后者在竞

---

① 约翰·根瑟：《拉丁美洲内幕》（纽约，1941），转引自拉雷·拉雷·皮平《雷蒙时代》（斯坦福，1964）第22页注下。

选运动中颈部受到枪伤）为卫生部长，共同行动协会的其他许多忠实的成员都在政府中安插了职务。曼努埃尔·皮诺上校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司令以保卫阿里亚斯兄弟及其同盟者。

阿里亚斯政府提出了克服经济衰退影响的计划，与美国谈判签订新的条约和创立了巴拿马大学。主要由于运河解雇而引起的失业，威胁了该国的政治稳定；1932 年的一次新的抗租罢工罢市导致了暴力行动；要求驱逐西印度人（他们在失业者中占大多数）的示威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特点。阿莫迪奥企图通过建立工农基金会和分配一些政府土地来支援农业。他实行了几个计划以帮助城市的穷苦人和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建立一家大众储蓄银行——储蓄公司。

1933 年以前阿莫迪奥一直避免债务延期偿付，只是到了 1933 年才暂停支付债款并直接要求华盛顿方面减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 1933 年 10 月接待了阿莫迪奥，答应修改 1903 年条约以增加巴拿马在贸易方面的收益。随后的谈判产生了 1936 年 3 月签订的新条约（但美国直到 1939 年 7 月才批准此约）。主要内容是美国放弃对巴拿马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利，从而结束保护国的地位；发表了一项宣言，申明运河区将来要获得土地须经巴拿马同意；采取了若干措施，从缩减运河区日用物资供销店对巴拿马市民的销售量。在睦邻政策精神的指导下还作了其他的改革，其中包括对退休的“白银级”雇员予以遣送回国，或者给予退休金以减轻失业者的负担等。最后，还就建筑跨越地峡的公路一事达成协议。

阿莫迪奥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 1935 年创建了国立大学。虽然一些高等学院的课程过去已经开设，但创立综合大学的建议却是人们急切盼望了几乎二十年之久的事。阿莫迪奥敦促议会通过了立法，然后任命著名作家奥克塔维奥·门德斯·佩雷拉为校长。该校于 1952 年在自建的校园举行了落成典礼，在此之前，该校则设在法学院和国立学院。到 30 年代中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替代了独立时期的老一代，而这所大学变成了他们的家。他们被称为新自由派，反对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而热衷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涂尔干的机体论。他们喜欢中央集权的、干涉主义的政府；通过普及教育实现一体化；通过国家的干预实现阶级和谐、社会正义；并且主张限制财产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这一代人把美国看成是巴拿马国家强盛和进步的障碍。大学生举起了这些旗帜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35 年，阿莫迪奥·阿里亚斯试图修改宪法以便连选连任，但这个倡议使他的党陷于分裂，并且终于失败。然后，他决定支持他的那位势单力薄的外交部长胡安·德莫斯特内斯（“J·D·”）·阿罗塞梅纳（1879—1939）。阿努尔福组织了一个新的联盟，即民族革命党（PNR），安排阿罗塞梅纳的竞选。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其代价就是支持阿努尔福在 1940 年竞选。1936 年的选举充满了欺骗和暴力行为，败坏了阿莫迪奥公平竞争的名声，但保住了阿罗塞梅纳的总统职位。阿努尔福的民族革命党人自称为巴拿马主义党人，他们在阿罗塞梅纳内阁和各省的任命人选中占统治地位，有效地孤立了恰里派并为年轻的阿里亚斯 1940 年获胜奠定了基础。

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小心谨慎地修饰自己的形像来接管他哥哥的权力。1935 年，阿莫迪奥曾任命阿努尔福当农业和公共工程部长，向承包商收款，当时，他还在圣托马斯医院继续行医赢得了作风严谨医生的美名。1936 年选举以后，阿努尔福曾在欧洲当过几任外交官，包括驻德公使和驻意公使。批评家们后来在阿努尔福身上觉察到他有希特勒式种族主义和莫索里尼那种煽动性的影响，并把他称为克里奥尔人元首。不论怎样说，阿里亚斯的确是一位特殊的政治领袖人物，为人勇敢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言词使群众为之倾倒，尽管并不都符合语法规范。他在进攻时最善于发挥他之所长，阿努尔福在操纵正直的改革者方面展现了他的天才，而阿莫迪奥则在组织上给予支持，在他的《巴拿马

美洲报》的办公室里布置好实业界支持的阵容并指挥运动。里卡多·阿尔法罗相信美国将在下届选举时支持他并于 1940 年 1 月返回巴拿马与阿里亚斯这尊偶像决一胜负。但是，对他恶毒的攻击迫使他不得不在 5 月退出竞选，阿努尔福轻而易举地赢得了 7 月大选的胜利，但这是该国暴力行为和贿选最厉害的一次选举。

1940 年 10 月，阿努尔福·阿里亚斯继承了总统职务。这为他开创了一项出色的事业，他 5 次竞选总统，3 次获胜，但 3 次被国家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罢免。在此后的岁月中，阿努尔福当了两年半的总统，被关进监狱两年，流亡在外 15 年。在几十年里他是巴拿马最成功的选票得主，是一个庇隆式的、阿亚·德拉托雷式的和贝拉斯科·伊瓦拉式的真正的民众主义者。

阿里亚斯 1940 年的就职演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在"巴拿马人的巴拿马"的口号下本地的价值观和传统取代了外国的方式。另起草一部新宪法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部宪法行将反映 30 年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潮，特别是何塞·莫斯科特作品所侧重的民族主义、种族的纯净和国家的社会责任。阿努尔福迫不及待地中止了 1904 年宪法，在 12 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并在 1941 年 1 月 2 日，即 1931 年政变 10 周年纪念日颁布了新宪法。这部宪法加强了总统对议会的职责，把总统任期延长到 6 年一任，并包含了类似 1917 年墨西哥宪法的一些社会政策。妇女具有投票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最有争议的是，宪法对公民资格的限制很严格，以致成千上万的移民及其子女丧失了他们在以前的立法中所获得的权利。这些条款的主要目标是针对来自西印度群岛、亚洲和中东的非白种人移民。这些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被批评家们斥之为宪法法西斯主义。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对外国人经营零售商业进行了限制并要求某些企业雇用的大多数雇员必须是巴拿马本地人。总统还暗示，他希望将美资电力和电灯公司这类公用事业国有化。有几次他下令由国家强制收购饲养者和种植者的牛、稻米和糖。尽管这在某种程序上是为了确立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公众储蓄银行、

土地改革法、公共财产权利、农牧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而实行的，但这些措施，特别是在战时的情况下，对该国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响。甚至有些批评家认为，他的民族主义似乎是在培养一种光荣感和公民意识。

这位总统的独裁和严格纪律的作风引起了对行不通的"细枝末节规则泛滥成灾"的一片批评。小学生和教员必须穿着制服；在公共场所必须说西班牙语；酒吧间里弹奏过多的外国音乐要处以罚款。由民族革命党的支持者们组成的一支公民警卫队负责执行这类规定和维护政治上的正统性。与此同时，阿努尔福开办了几家官方报纸，批评不听从他控制的那些人。他还想控制阿莫迪奥的《巴拿马美洲日报》，他一直未能使这家报纸沉默不语。他使赌博合法化，这一行业提供的贿赂相当可观，而且开始从政府工作人员工资中扣除了民族革命党的费用。总之，专断的组织化代替了 1930 年以前盛行的容忍和妥协。一位传记作者把阿努尔福称之为"民众欢迎的暴君"。[①]

阿里亚斯也为美国政府制造了困难。他认为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使巴拿马尽可能长时期地保持中立，友好对待轴心国家的外交官们，并且明确表示巴拿马已不再是北方巨人的马前卒。警察宽容轴心国的特务和宣传活动，另一方面，总统却公开拒绝应邀参加美国之友协会。他反对输入牙买加劳工来从事运河的新工作，拒绝运军火的船只悬挂巴拿马旗，即使附近就有潜艇活动也不行。最后，他还为美国要求在运河区外租借防御基地一事设置障碍。虽然这种轻率的政治作风和作弄美国佬的做法是得到工人阶级的赞同的，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却感到不安，特别是由于阿努尔福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在精神上的反复无常性。阿莫迪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他的弟弟是夸大妄想狂和偏执狂而与弟弟决裂，并警告美国官员们说，阿努尔福派分子可能会危害运河

① 孔特·波拉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第 8 页。

的安全。

阿努尔福独自进行统治，避免同亲密的合作者来往。不过，他倚靠司法部长里卡多·阿道弗·德拉瓜迪亚（1899—1969）处理国内政治和管理警察。不论德拉瓜迪亚是否参与过任何密谋，但他肯定知道1941年年中的政变计划。同年10月他自己就处决了一个人。阿努尔福曾微服出行，飞到古巴去会一位女士，而运河官员向德拉瓜迪亚通报了此事。这种未经许可的旅行违反了阿努尔福自己制定的宪法，因此德拉瓜迪亚有理由罢免他。德拉瓜迪亚与运河区的文职情报处长商议后，确信将阿努尔福罢免，会受到美国当局的欢迎，于是宣布自己就任总统。阿努尔福回到巴拿马后，被监禁了一个星期，然后飞往马那瓜并终于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漫长的战争时期。

德拉瓜迪亚立即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宣布支持盟国。防御基地的协议敲定了，1942年签署另一项接受巴拿马12点要求的清单作为交换条件。警察和情报人员兜捕了1200多名间谍嫌疑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并遣送500名关进了美国的集中营。

德拉瓜迪亚与华盛顿密切合作，但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因此，他不得不组成大党的联合政府，并中止实行宪法中最狭隘的部分作为补充。然而，这届政府普遍被认为是无能的和腐化的。鉴于二次大战将近结束，某些政界和商界人士想要重新燃起民族主义情绪之火，但同时又要防止阿努尔福派的民族沙文主义。当时新成立的工商业家协会希望限制经济中的外国产权。外交部长希望对以前运河区独家经营的民航公司取得控制，并希望日用物资供销店和陆军消费合作社不向巴拿马人销售货物。要求减少美国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和保护巴拿马主权的公众舆论压力高涨。文化领袖们开始提倡西班牙特点，或者说，西班牙价值观，而政府则敦促1942年签订的12点协议付诸实施。虽然巴拿马人仍然试图从运河方面获得最大限度的现金，但他们越来越偏重于主张经济

多样化和工业化以减少对运河的倚赖。

德拉瓜迪亚总统在1944年末遇到了困难的过渡期，因为和平时期即将到来，人们盼望民主、宪制政府的心理益加急切。此外，仍在实行半法西斯宪法令人厌烦，以致人们对总统失去信任。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他于同年12月解散了议会并中止了宪法。他通过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内阁的办法，设法坚持到1945年6月，他同意让在此前一个月选举产生的制宪议会任命一位替代者。曾在1932年竞选总统的唐·潘乔·阿里亚斯·帕雷德斯，被认为是最可能代替德拉瓜迪亚的人物。他在战争期间曾组织了各个反对派集团与他自己的革新党组成联盟，他仍然很得人心并赢得西印度人后裔——现在被称为“土生西印度人”——的支持。但是，由于策略上的原因，唐·潘乔和他的党支持了恩里克·A·希门尼斯（1888—1970）于1945年6月就任临时总统。希门尼斯的绰号叫“潜水艇”，由于他具有像潜水艇那样在恰当的一瞬间浮出水面放射鱼雷攻击敌人的才能，故面得名。由于唐·潘乔在选举前已去世，因面未能按原订计划安排，希门尼斯一直到1948年10月才卸任。

希门尼斯首先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阿努尔福·阿里亚斯，他把他的流亡变成了资本，并且越来越得人心。为了削弱这种影响，希门尼斯1945年10月批准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国。但是，阿里亚斯立即采取主动进攻，要求出任合法总统，并密谋推翻希门尼斯。这样一种反应的导向被证明是错误的：1945年12月的一次造反完全失败，而且在事件中因一名警察死亡面受到牵连，阿里亚斯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监禁。与此同时，制宪会议产生了一部新宪法，其中包括了进步的社会和劳工法条款，禁止各种歧视，并把总统任期限制到4年一任（恢复到1941年宪法以前的情况）。

1945年以后，巴拿马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47年希门尼斯政府就美国在巴拿马现有基地加以延期的协议进行了谈

判，但是，议会同街上的示威游行相呼应，否决了这项协议。关于建筑托库门国际机场、修筑通往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公路的交易，以及在运河区内的劳资关系则有更多的困难。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否决 1947 年条约这个巴美关系的决定性最低点起了作用。然而，在内政方面，希门尼斯却靠建立科隆自由贸易区和努力促进经济的多样化获得了好处。

40 年代，学生在教育政策和国家事务方面赢得了较大的发言权。巴拿马学生联合会（FEP）组织了代表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很快就形成了联系中等教育和学院学生的网络。巴拿马学生联合会在反对 1947 年条约中起了主要作用，并在以后的对外政策争论中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因素。劳工联合会也试图干涉战后的对话。工人工会联合会（FST）于 1946 年成立，运河区雇员的本地 713 工会也于同年成立，它们都在为保护工人免受因大战结束后引起的经济混乱影响而努力。例如，运河区大量削减了雇员并压缩了工程建设，特别是 1947 年以后更是如此。

40 年代，国家警察加强了它作为文职政治活动仲裁人的作用，警察头子——何塞·安东尼奥·雷蒙——通过同政客们和实业家们打交道面发财致富。警察部队的人数共有 2000 多一点，但它的骑警队，是摩托化的分队并具有现代化控制群众的技术，使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奏效。自 1941 年以来，雷蒙就招募了像他一样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并在 1948 年创立了一所旨在培养警察真正的军事能力——但对运河区并不构成威胁——的训练学校。这支部队在 1948 年总统选举时进行了部署——这是自 1940 年来的第一次——大有政治效益。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出狱后立即投入了选举运动，他的竞选纲领中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内容。尽管他 1940—1941 的那届政府带有独裁和种族主义的形象，但他反对与华盛顿签订防御协定的势头使他的声誉为之膨胀。与此同时，希门尼斯则提名多明戈·迪亚斯·阿罗塞梅纳（1875—1949）作为官方候选人。政府干涉竞选运动形成了一种同 1940 年同样紧张

的政治气氛，特别是警察更越来越不得人心。未上班的官员和雇用来的无赖们组成了支持迪亚斯的一帮，被称为“战时编制人员”，对反对派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试图罢免希门尼斯，他只是因为雷蒙的支持才能留任，当政府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宣布多明戈·迪亚斯获胜时，被巴拿马主义党的报纸煽动起来的不满分子涌上了街头。阿里亚斯本人则到哥斯达黎加去组织一次革命。具有能够不使用暴力而办事的传统的政治精英们严重分裂。

迪亚斯就任仅10个月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他的主要政绩就是与美国签订了一项航空运输协定，商业航线将使用新建的托库门机场而不再使用运河区的机场。这项协定暂时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但却为反对派提供了更多的攻击政府的弹药。抗议和警察进行镇压成了当地的特产，而阿里亚斯兄弟则企图发动另一次政变。从1949年7月末到同年12月，该国在临时总统丹尼尔·查尼斯和罗伯托·恰里任内出现了重大动荡局面。丹尼尔·查尼斯强迫雷蒙辞职未能成功。罗伯托·恰里是前总统鲁道夫·恰里的儿子，雷蒙的表兄弟，是雷蒙一手推上总统宝座的，但在一周之后又被最高法院罢免。雷蒙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国王拥立者，但在大多数公众和政治家眼里只是一个坏蛋，当时他又做了把阿努尔福·阿里亚斯推上总统宝座而令全国意外的惊人之举。雷蒙自30年代中期以来就与阿里亚斯弟兄是敌对的，但这位警察头头认识到，如果不给阿努尔福一个机会当总统来证明自己有能耐——或者丢人现眼——公众舆论是不会满意的。于是，他让选举委员会把结论翻过来，宣布阿努尔福为总统。作为交换条件，阿里亚斯同意雷蒙继续留任并扩大他的预算。

阿努尔福·阿里亚斯的第二任总统任期是以“不负责任、掠夺和特权”为其特征的。[①] 任人唯亲泛滥成灾，总统把政府职务委派给他的亲属。由于总统自己没有儿女，于是阿莫迪奥的几个儿

① 皮平：《雷蒙时代》，第64页。

子备受他的宠爱，党的头头们则被赐给承包合同和现金，以及参与走私活动，价值成百万美元的毒品和黄金走私都受到保护。下决心补足已失去的时机，他几乎对这些活动毫不掩饰，他强制银行 经理批准他的私人借款，迫使政敌们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财产。他自己接收了该国最大的咖啡园阿尔科伊里斯种植园。贪污受贿的官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公共财政陷于混乱。阿里亚斯与雷蒙的关系仍然并不稳定，尽管他谨慎地避免冒犯这位警察头头，也不公开地威胁后者，但他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指挥的200名秘密警察队伍。

美国政府为了对他的继承总统职务表示不满，对他的承认推迟了好几个星期。在他的任期内没有签订过实质性的援助项目。最大的打击是1951年对运河的整顿，在经过几年对运河运营的仔细检查后，美国政府决定缩减费用，这也意味着在巴拿马缩减开支。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巴拿马的失业上升并面对着严峻的财政问题，这就只能使困难的政治局面恶化了。

1951年初，阿努尔福变得越来越孤立和独裁，完全应验了批评家们对他的看法，即他是不适应于民主政治的。他的独断专行、没收财产、党派性和新闻审查制度等等，使他的威望下降。1948年他曾经一度争取到西印度人社区对他的支持，但以后他又制订了损害他们公民资格的措施。一位合作者认为他有精神病，这种病态使得他在理性行为和强烈的偏执狂症之间翻来复去。阿莫迪奥及其儿子，任报纸主编的罗伯托（“蒂托”）早就反对阿努尔福了。1951年5月，阿里亚斯告诉内阁，他将重新施行1941年宪法，如果有必要，他就解散国民议会。这些言论激起了普遍的抗议，阿努尔福对此的反应却是：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权力来对付共产主义。雷蒙在他能干和野心勃勃的妻子塞西莉亚的鼓动下，以及在要对阿努尔福“采取点什么行动”的舆论压力下，开始想到要竞选总统的事。1951年5月10日，在阿努尔福被议会弹劾以后，警方承认阿尔西维亚德斯·阿罗塞梅纳（1883—1958）按宪法规定

递补继承总统职务。阿努尔福和大约500名支持者拒绝离开总统宫，两名军官试图接近阿里亚斯，当场被手枪击毙。警方于是袭击了总统宫，造成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阿努尔福被议会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并被投入监狱一年以谋杀总统宫警卫长的罪名候审。

阿罗塞梅纳完全依靠雷蒙。在企业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的经济衰退声中，雷蒙在幕后作出决策，委派人员。国务院给予了一些援助以使情况缓解，但它并未消除运河整顿带来的影响。政治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发生。

雷蒙也许是有能力维持秩序和向美国多敲榨点钱的唯一人选，他变成了仅有的可行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事实上由警察部队司令官参加总统竞选是没有先例的。雷蒙的祖先是19世纪初到巴拿马农村定居的。1914年他的父亲死于酒精中毒（他本人也深受其害），他的母亲省吃俭用地供他上学，先到巴拿马城的国立学院、以后又去墨西哥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他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墨西哥军事学院，回国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并成为与共同行动协会领袖们斗争的对手，1935年被前者勒令辞职。只是到了德拉瓜迪亚总统任内才恢复了对他的委任。他同塞西莉亚（“塞西”）皮内尔的婚姻最初并不美满，彼此都不愉快，膝下也无子女，但以后塞西莉亚的野心却点燃了他的政治事业之火。

1952年雷蒙竞选遇到的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阿莫迪奥·阿里亚斯和学生们，而警方给他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支持。雷蒙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自1947年当上警察头头以来对学生进行镇压和对犯人实行刑讯。他没有多少个人的魅力，形象上也毫不引人注目。众所周知，警方在与之打交道中捞到成百万的美元，他本人则在养牛业、屠宰业、公共汽车业、汽油批发业、一家建筑公司、毒品交易和《民族报》中都有经济利益。他通过家族关系或商业往来大约与巴拿马1/4的精英分子们都有联系。塞西莉亚夫人仿效埃维塔·庇隆，试图给雷蒙加上一点庇隆的魅力。她是一

位精力旺盛的竞选运动的鼓动者，她驾着吉普车周游全国执行她的社会援助计划：赠送盆盆罐罐和提供医药。她于是赢得了“宽宏大量的夫人”的美名，并为雷蒙的竞选做出了很大贡献。

雷蒙同 5 个党的领导人达成协议，成立了全国爱国联盟(CPN)。他辞去了警察首脑的职务，以便合法地参加总统竞选。他还与西印度人社区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由他的夫人安排，驱车周游全国，展开了辛勤的竞选运动，在竞选纲领中，他许诺恢复国内秩序、发展经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且答应所有公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公民，都有到政府工作的机会。他的竞选口号是“和平、工作和面包”。雷蒙的反对派在 1952 年选举中没有多少机会站稳脚跟。阿努尔福试图赢得一些影响，但是反而弄巧成拙，终于命令他的追随者们抵制这次竞选。反对派集中支持罗伯托·恰里——他在 1949 年曾被雷蒙推上总统宝座当了几天总统。恰里竞选经费不足，竞选运动起了反作用，恰恰使雷蒙的胜利合法化。经过了一场平静的选举之后，选举委员会裁定雷蒙获得 63%的选票。

雷蒙领导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的兄弟就任议长，在一个以亲政府议员占多数席位的议会中主持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这个政府。为了减轻巴拿马对运河和对传统商业行业的依赖，进行了经济改革，为了减少预算赤字还整顿了税收制度。由于运河区采购量的增加，商品农业兴旺发达，而且总统雄心勃勃的公路建设和公共工程计划也吸收了运河区解雇的一些失业工人。雷蒙规定，凡政党均须征集到 4.5 万人的签名才符合被承认为合法的要求，使政党分散林立的情况减少了。他自己的全国爱国联盟是主要的受益者，而许多分裂的派别，甚至连阿努尔福的党都不符合要求。他有效地禁止了罢工，取缔了激进组织，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并强制报界接受“自愿的”新闻审查。与此同时，通过政治委派和威胁削弱了司法部门的权力。这些变革建立的一个半独裁制与尼加拉瓜那位与雷蒙同辈的强人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不

相上下。1953 年雷蒙把警察改为国民警卫队，这是他多年来所提倡的变革之一。虽然它比一支正规军还差一点，但国民警卫队现在获得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准军事性质的责任和利益。它的镇压力量和它在国外的威望提高了，现在巴拿马可以有资格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且能够参加同邻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雷蒙征募中下层阶级的黑人和梅斯蒂索人，把他们选拔到军官团，这一政策在几年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雷蒙迅速敦促对美巴关系作出修整并且成功地在 1953 年 9 月拜会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经过 16 个月的谈判，在巴拿马公众示威游行声中，于 1955 年 1 月签订了一项新条约。赢得美方的主要让步有：把运河的年金增加到 193 万美元；对美国在运河区内部供销社的销售和劳务人员作了限制；把对过往船舶的销售转让给巴拿马，对同一级别的雇用人员不论其国籍如何实行同工同酬。这些新条款的受益者主要是巴拿马的国库和当地的企业家们。雷蒙对美国施加压力的策略其重要意义较之条约本身也毫不逊色。总统于 3 月 15 日的演讲中开始要求对运河的运营进行深刻的变革，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要施舍也不要千百万，我们要的是正义！"而在 8 月 27 日他召集了被称之为"应祖国之约"的大规模市民大会。但是，老资格的政治家，诸如阿莫迪奥·阿里亚斯、奥克塔维奥·法夫雷加和里卡多·阿尔法罗等反对雷蒙愿意以比他们所建议的低得多的条件向华盛顿作出让步。

1955 年 1 月 2 日雷蒙被暗杀，距离行将缔结的新条约签字日期只有几个星期。他遇害的这种黑社会式的处决方式令人吃惊，其真相尚待彻底查清。但是，后继的调查暴露了涉及总统及其夫人、政治伙伴和政敌、国际贩毒走私者和雇佣杀手的离奇古怪的丑闻。雷蒙普遍受到好评的形像因此暗然失色，并且使全国爱国联盟领导人继续掌权的计划从此无限期地结束了。正如一位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所作的结论：纵然雷蒙"本人对于他过早的死亡负有部分的责任"，但就他在其未结束的这届任期内的许多成就而

言，他仍然是有功的。[1]

雷蒙死后，全国爱国联盟设法选举了企业家埃内斯托·德拉瓜迪亚出任1956—1960年的这一届总统。但是，暗杀案审理中传播的丑闻大大有损于该联盟，以致联盟在1960年选举以前就分崩离析了。此外，与1956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对比，当时刚从美国那里赢得的让步显得相形见绌，微不足道，于是政治家们煽起了公众的失望情绪。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指出的："巴拿马高级官员公开谈论这一协议不能满足巴拿马人的愿望，并蓄意掀起了一个运动，通过单方面的解释来扩大（美国所作出的）让步的许多条件"。[2]

德拉瓜迪亚的竞选运动作为号召的口号是："面包和自由！"但未能振奋人心，而他的这届政府由于企图增加税收而开始不得人心。在罢工和游行示威频繁出现的情况下，德拉瓜迪亚试图以委派塞西夫人出任劳工、卫生和福利部部长的举措来缓解社会紧张状况。他承办了一项学校建设计划以适应巴拿马爆炸的人口增长（1960年该国人口突破了百万大关），他建立了住房和城建委员会负责重新安排被迫迁出运河区的数以千计的家庭。德拉瓜迪亚试图促进工业化，但外国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唯一的重大新投资项目是在科隆兴建的标准石油公司炼油厂。

外交部长阿基利诺·博伊德要求美国按运河通行费交付一定百分比提成的办法代替固定的年租金，并要求恢复矿产权、领海权以及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虽然此举导致了他的被撤职，但公众意见现在明显地支持巴拿马从运河方面获得更多利益的这种要求。

1930年以后，巴拿马显然已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现在它已

---

① 《雷蒙时代》，第161页。

② 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藏的1956年11月报告，1984—1865文件，《解密文件目录季刊》（华盛顿特区，1975）。

经收复了被邻国和运河区蚕食的领土。美国既已不再向该国派遣部队，国民警卫队则成了独一的人身镇压工具。绝大多数巴拿马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同属一种文化，而且他们都承认自己的政府是合法的权力当局，它在全部领土上实施统一的法律。剩下的关于国家地位的主要问题是巴拿马人的信念。只要运河区存在一天，他们就感到没有主权。巴拿马人认为这是对他们领土的侵犯。尽管1903年条约中作了永久性的规定，但他们仍然认为运河区是他们的，只是暂时转让给美国。14个军事基地既对他们是威胁又最终保护了他们。居住在运河区的西印度人后裔和其他移民群体，由于大多说英语和信奉新教，并未与社会完全溶为一体，人们认为他们对美国的效忠程度超过了对巴拿马。

同美国达成协议（1959—1981年）

1959年是巴拿马历史上的--个转折点。这一年有过三次暴动，其中包括：阿莫迪奥之子蒂托·阿里亚斯在古巴支持下的一次遭到挫败的人侵；科隆的穷人和失业者在该国第二大城市举行了反饥饿示威游行；以及在11月学生举行抗议，两次涌进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以象征该国的主权并随之发生了巴拿马历史上最具爆炸性的反美暴力冲突。从此，巴拿马领导人再也不能把老百姓唯命是从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改善美巴关系——宣布了一项使运河区雇员受益的9点方案；任命新的官员，明确地授权美国大使负责掌握美国政策；并允许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华盛顿方面批准了向巴拿马赠款和贷款约1100万美元，用于修筑道路和弥补预算，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建议在20年内建筑一条海平式运河，此举将要求政府“保持我国在运河区的利益并……让巴拿马有所准备以便在海平式运河的筹备工作中和以后的运营中进行负责的合作”。这个阶段开辟了巴拿马政治和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1960年的选举遭到了阿努尔福派的抵制，在这次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罗伯托·恰里作出了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许诺（这样可以防止发生革命），从而获得胜利当选总统。恰里的口号是："变革的时候来到了"，表明寡头政治集团十分担心民间的骚乱将会造成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经济问题的序幕。尽管1958年和1959年的反美暴乱没有后来1964年的严重，但也对企业界造成了损失，并有引起总暴动的危险。因此，恰里的目标同1961年拉开帷幕的争取进步联盟是完全并行不悖的。

恰里得到美国的援助，开始实行一项重大的建设计划。他为社会保险局建成了一所现代化医院，为横跨南北美洲的大桥举行了落成典礼，并为农村城镇建立了短波通讯系统。然而，随着香蕉工人的不断罢工、大学生的罢课和农民联合会的开始建立，局势日益紧张。1962年6月恰里会见了肯尼迪，要求美方作出更多的让步。肯尼迪委派了一名新的运河区总督，加紧研究海平式运河方案，并作了一些无须更动条约的改变。一个美国的专门工作组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建立的两国委员会提供了建议。但是，修订条约事宜推迟到两国总统选举之后，1963年年中由于进展缓慢，加之恰里相信当年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引起的一阵核旋风将妨碍海平式运河的开凿，因此两国关系冷淡了下来。恰里召回了他的谈判代表，而泄气的美国大使也辞了职。

1964年1月9日，爆发了群众骚乱的暴力事件，至少有22人丧生。这次事件是由于运河区学生在未经批准的地点升起美国国旗而不准巴拿马人升巴拿马国旗而引起的。恰里总统对这次冲突提出了抗议，并与华盛顿断绝了关系。这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遇到的首次外交危机，他甚至未能派遣美国驻巴拿马的大使。在经过美洲国家组织调查和两国领导人作出某些和解姿态之后，恰里和约翰逊恢复了关系，并同意就运河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对另缔新约替代1903年条约事宜达成默契。

恰里在1964年总统选举时支持他长期的伙伴和亲属马科·

罗夫莱斯。罗夫莱斯是一位以强硬著称的中产阶级人士，他答应了“立即改革”，批评美国，并保证为另缔新约替代1903年条约进行谈判。此前，阿努尔福·阿里亚斯打出他惯用的民族主义旗帜和竞选运动，但现在采取了对美国比较和解的姿态而集中抨击寡头政治。1941年被他剥夺了公民资格的许多西印度人后裔，如今投票支持阿努尔福，以表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他很可能在选举中获胜，但按官方选票记录，罗夫莱斯以一万票之差的优势取胜。

罗夫莱斯与美国政府就缔约问题重开了谈判。美国政府支付的援助数额超过以往，1966年6月科隆爆发了因抗议一名学生领袖被杀害而引起的骚乱以后，援助水平不断提高。各种类别的公共工程项目保持了高度的就业，并为穷人提供了学校和住房。罗夫莱斯为首都通往哥斯达黎加边界的一条公路以及贝拉瓜斯水电站大坝举行了竣工典礼，尽管如此，土地改革和税收改革从未实行，因为总统仍然偏袒那些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富裕家庭。

1964年后期开始举行的运河问题谈判，于1967年6月产生了替代1903年条约的三项互相有联系的条约。第一项条约是关于水闸式运河的，承认巴拿马对有关领土拥有主权，但将美国的运营延长到1999年。管理工作将由两国组成一个委员会作出安排，而且，巴拿马将直接分享通行税收益。运河区的绝大部分劳务将由两国共同管理。第二项条约给予美国修筑并共同运营一条海平式运河的选择权，于是水闸式运河的所有权将移交给巴拿马。第三项条约授予美国在巴拿马继续设基地的权利。

两国总统选举的临近使条约的批准政治化了，条约因此被束之高阁。罗夫莱斯的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埃莱塔对谈判内容秘而不宣引起了群众的怀疑。运河区的巴拿马工会的领导人担心在共同管理后工资和工作条件将会下降。民族主义分子和学生们则要求立即结束美国的占领。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对条约的价值表示怀疑，但没有批评美国。1967年年末，当罗夫莱斯知道他没有足

够的票批准条约时，他通知了国务院。国务院经过考虑于是撤回了条约并取消了大部分援助。由于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热衷于这些条约，这些束之高阁的条约在 1968 年总统竞选期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罗夫莱斯的联盟在总统继任问题上陷于分裂，于是他立刻变成了无法再连任的跛脚鸭。他在 9 月曾宣布说，他将支持他的财政部长戴维·萨穆迪奥继任总统。萨穆迪奥是一个在美国培养的技术官僚，不属于古老的家族，而且他的税收方案是直接与恰里和寡头政治集团的大多数人对立的。此外，罗夫莱斯总统也不能给萨穆迪奥多少支持，因为他在 1968 年 2 月曾遭到议会弹劾，只是由于国民警卫队司令博利瓦尔·巴利亚里诺保驾才免于被废黜。

古老的家族（阿里亚斯、瓜尔迪亚、德拉瓜迪亚、阿罗塞梅纳、恰里、博伊德、巴利亚里诺）通过诸如印刷业、炼糖业、养牛业、水泥制造、啤酒业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垄断行业以及法律事务所、进口和批发公司来赚钱。他们通过政府的合同和与运河区官员亲密的关系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现在可遇到了一个靠不住的集团掌权，而且在同美国未来的和解方面也面临巨大的不安定性，他们决定一改他们过去一贯反对阿里亚斯的做法，并且设想：67 岁高龄、被削去公职的阿里亚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磨练已经成熟了，他可以被控制和加以利用。此外，阿努尔福·阿里亚斯还主持着该国唯一的大党，因为他受到群众的尊敬。阿里亚斯在 1968 年大选中结成了包括许多恰里派分子、西印度人社区、国民警卫队分子和大部分议会代表在内的广泛联盟，他获得了 55%的选票。

1968 年不寻常的选举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力斗争中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说 1931 年以前时期是几大家族之间的竞争倾轧，那么在 1931—1959 年期间则是新来者（阿里亚斯兄弟和雷蒙）的侵入，1968 年选举包含了甚至更复杂的恒等式。警卫队仍

然是主要的仲裁人，但已不再是统一的意志了。官僚机构掌握在诸如罗夫莱斯、萨穆迪奥和埃莱塔之类的人物手中，他们新近才跻身于政坛，他们的财产得济于对公款的操纵。如果他们能够掌权，他们可能对条约的缔结起推动作用，并获得大量的财政报偿。他们提倡的遵循争取进步联盟路线的改革，表明他们并不尊重古老家族的利益及事业。萨穆迪奥 1968 年的竞选纲领令寡头政治集团深深感到由他掌权是靠不住的。

然而，这次选举并没有使政治气候稳定下来，对于舞弊的谴责之声、街上的冲突和军营中的密谋活动令人焦躁。发展趋势中最大的不祥之兆是警卫队军官们的政治化倾向。虽然巴利亚里诺拒绝了恰里提出的邀请他竞选总统的建议，并尽其可能地不介入这场竞争，但他无法阻止下级军官们参与选举活动。人们最初准备支持罗夫莱斯作为总统候选人，但当他要求保持中立或转向他们的传统的敌人阿努尔福时，许多人感到恼怒。根据一位分析家的看法，雷蒙过去一直只与几个最高级的同僚们之间保持政治性活动，但 60 年代由于不断职业化的缘故，这类活动扩展到了中级军官间。9 月，最高级的军官们与阿努尔福做了一笔交易。当选总统要求巴利亚里诺在 10 月 1 日总统就职之后退役，而后者则提出只有在他的代表何塞·曼努埃尔·皮尼利亚·法夫雷加执掌指挥权和不触动统治集团的条件下才同意此项要求。巴利亚里诺可以在这届政府中获得一个文职职务，指望通过这笔交易将制止警卫队的政治化，从而保护他自己和寡头政治集团。然而，阿努尔福断定统治集团若不改组就不会接受他的支配，于是他在 10 月 4 日宣布撤销巴利亚里诺和皮尼利亚的职务。许多高级军官，由于在选举期间及其以后从事亲萨穆迪奥的活动，也将被撤换，调离首都派往国外工作。此举导致警卫队在 10 月 11 日推翻了阿努尔福，政变领导人首先要求副总统执政，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建立了一个以皮尼利亚上校为首的执政委员会（巴利亚里诺已在几天前退役）。美国当局立即表示反对这次政变；它允许阿里亚斯及其内阁

在运河区内暂时获得政治庇护，以后并安排他们流亡到佛罗里达。美国直到11月才承认了执政委员会。

执政委员会任命了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但立场保守的内阁。这个内阁与许多政治营垒都有联系，并颁布了一个目标十分温和的声明，尽管如此，过去支持阿里亚斯的官员都已退休。然而，没过几天，在这次政变中冒风险最大的两位强人奥马尔·托里霍斯中校和博里斯·马丁内斯少校，作为新政府的真正领导人而崭露头角。托里霍斯年长资深，1952年已参加警卫队，在处理文官事务方面比大多数军官更有经验。由于他50年代在司令部、公民行动计划和反颠覆行动中担负的任务，他掌握领导权是理所当然的。他以平易近人、态度温和而闻名遐迩，他深孚众望，并被视为“武夫习气最少”的高级官员。由于难以赢得寡头们的支持，托里霍斯开始与可能给予军方支持的非精英分子的民间集团接触。马丁内斯是一个更强和更大胆的人物，他在政变中夺取了戴维城，但是由于他缺乏政治技巧而屈居第二位。到1968年12月，托里霍斯巩固了他的地位，当上了警卫队司令，两个月后他把马丁内斯驱逐出境。

托里霍斯1929年生于贝拉瓜斯省，他是既未经历过独立运动又没有参加过1931年政变的这一代的巴拿马领导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本人曾在内地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学运中心的圣地亚哥师范学校学习过。当他随母亲来到巴拿马城时，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当时他眼见母亲乘公共汽车路过运河区时，被美国警察推推搡搡受到侮辱。以后他在谈起这件事时说，这使他认识到，巴拿马必须收回运河区。1947年他获得奖学金进入萨尔瓦多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于该校。他当军官后曾有一次被巴拿马城的联合俱乐部拒之门外，从此他再不登门，并命令他的下属军官们也拒绝登门；在悠闲自在的表面底下，小城镇的言行中充满了强烈的反美和反寡头政治的情绪。

托里霍斯依靠几种战略来巩固他的权力。最重要的是使用武

力惩治反对者。有许多人被监禁和拷打，有些人被虐待致死。不合意的公众示威则被强行驱散，实行这类恐怖行动便于威胁和驱逐反对者。托里霍斯还使用现代情报技术来跟踪反对者。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谍报机关是由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指挥的，后者终于继承他当上了警卫队司令。托里霍斯还利用公民行动计划来树立有利于自己的形象，强调他支持建设计划和关心穷苦人，运用他在谢尔曼堡服役期间任教练时学到的技巧，类似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在秘鲁使用的方式方法。托里霍斯鼓励警卫队军官们在政府工作岗位上谋利，这是始于雷蒙的传统手法，以减少队伍中叛离倾向，便于他保持牢固的控制。最后，托里霍斯扩大了警卫队的规模并经常提拔军官。

托里霍斯首先试图拉拢到他这一边的学生，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他把大学关闭了几个月。然后，他组织了新巴拿马运动，但也不受欢迎。同样，他提出成立一个支持现政权的单一的劳工联合会的建议，也从未得到工会的合作。然而，托里霍斯通过制订一个高度优惠的劳工法典，的确在工人阶级当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1976 年由于企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该法典的效力减弱了）。托里霍斯最成功的原动力来自农村地区，他指挥了那里的公民行动计划，并且能够应用亲切的语句与农场主和农民谈话。他在那里享有民众考迪罗的形象，乘着直升飞机在全国飞来飞去，对农村的乡镇给予帮助。他建立了合作社、乡村学校、诊所和集贸中心，并分配公地给人垦殖。由于 70 年代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巴拿马城和科隆省，他的目标之一是制止涌向这些城市移民的浪潮。同样，他在农村的工作也赢得了已经在城市贫民区定居的那些人的尊敬，而且支持他的人还有一批为数惊人的乡村教师，他们在 1968 年以后，往往已涌现为地方的领袖人物。到 70 年代中期，托里霍斯已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奥马尔”或“将军”而闻名遐迩，在农村群众中享有超凡魅力的普遍声望。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格雷厄姆·格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友谊

更增添了这种神秘感。

1972 年，托里霍斯通过控制市政代表选举，操纵了制宪议会。议会确定托里霍斯为国家元首，批准了由他任命的傀儡德梅特里奥（“吉米”）·拉卡斯为总统和一部具有独裁色彩的中央集权的宪章。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是新来者，决不代表寡头政治集团，它仍旧处于权力中心之外。1968 年被解散的政党仍处于非法状态。

托里霍斯的主要成就是 1977 年 9 月与美国签订了两个条约（最后于 1978 年 4 月批准）。1977 年的两个条约是以 1967 年三个条约草案中的两个条约草案，即关于现营运河和防卫问题的两个条约草案（美国取消了关于海平式运河的计划）为基础的，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享有完全的主权（因此运河区即不复存在），并同意两国共同经营运河直到 1999 年为止，届时运河则完全由巴拿马单独管理，并同意两国共同防卫运河，仍由美国保持主要责任直到 1999 年为止。与此同时，付给巴拿马的通行费和年金将大量增加。

托里霍斯时期的另一个成就是使经济多样化。1970 年他颁布了法令，鼓励在巴拿马建立国际银行，保证经营业务可完全保密。巴拿马的客籍银行业迅速繁荣，巴拿马城的资本投资、白领雇员就业人数和高层建筑随之增加。通过这些银行流入的一部分金额是来自南美向美国出口毒品的价款，但托里霍斯及其继承者们保护秘密帐户免受调查。银行业在经济上给了巴拿马一臂之力，使该国减轻了对运河的依赖。

为了使经济多样化和使巴拿马成为国际劳务出口国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航运路线，还采取了其他办法。办理悬挂该国的船旗和保险条款以及其他便利条件的登记，现在已是传统的措施。由于运载阿拉斯加原油驶往东海岸的超级油轮太大，无法通过运河，于是铺设了一条横贯巴拿马西部的输油管，不过，将石油转抽到小油轮上通过地峡却可以省钱。把重点放在服务业上，其部分原因

在于扩大出口商品有困难。香蕉业已不再是一个发展的行业，而一度丰产的渔场现已枯竭。巴拿马的劳动力成本太高，无法向外销售热带农产品。冶炼巴拿马西北部塞罗科罗拉多的铜的一项很有希望的计划已被废弃，它是70年代末期世界价格下跌的牺牲品。但是，多样化总的结果是成功的，巴拿马国民收入中来自巴拿马运河的收入比重显著下降了。运河区的劳务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8.6%下降到1975年的5.8%。但是，其代价是人物外债水平为世界之最。

在1977年运河新条约签订以后和美国批准该条约的激烈辩论进行之前，托里霍斯开始从政治生活的第一线退下来。他对于治理该国事务和处理运河谈判感到劳累并且饮酒过多。此外，美国谈判者们担心他中间偏左，独裁者的形象可能损害参议院对该条约的批准。因此托里霍斯建立了民主革命党（PRD）以协调他所吸收的各种集团和各个阶层。该党与官僚机构紧密地交错在一起并享有官方的大力支持。托里霍斯还选定了新的文职总统阿里斯蒂德斯·罗约，他是条约的谈判代表之一，也是一位深得信任的随从者。罗约原是一位大学教授，温文尔雅，也是一个赶时髦的左派人物，不过，他的权威完全是依靠托里霍斯对他个人的信任。实施运河条约的1979年巴拿马运河法（9670号公法）——巴拿马人称之为墨菲法，因众议员约翰·墨菲所提的议案而得名——却原来是一粒难以吞咽的苦药，因为它破坏了谈判者脱离五角大楼和国会的牵制去建立一种半自治的运河管理机制，并让1999年以后美军在巴拿马的问题留待谈判解决。因此，尽管巴拿马人不得不按此共处，他们却仍继续关注着条约与该法之间的矛盾之处。

1981年8月，托里霍斯旅行乘坐的那架小飞机坠毁爆炸，悲剧式地了结了他的半退休状态。关于阴谋破坏的指控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毫无疑问，巴拿马失去了它最强有力的和最绚丽多采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去世使该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

就此结束。

托里霍斯以后的巴拿马

1977年条约生效以后，运河在巴拿马政治生活中已远非主要问题。从1979年起，它已由一个双边委员会进行管理，而到本世纪末巴拿马则将获得更多的经营管理权。1990年开始，运河的首席执行官员即理事，将是一位巴拿马人。

1981年以后，政局动荡，没有明确的方向。然而，诺列加将军很快就挤掉了政敌，控制了警卫队（1983年后称为巴拿马国防军）。重要的决定由他作出，并在幕后任命文职政府官员。当总统既不舒服又不保险。罗约被迫辞职，由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代替，后者在1984年又被废黜。尽管军官们继续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但诺列加似乎心中也并没有特别的办法。

美国政府对诺列加态度冷淡，特别是当揭露他靠毒品洗钱、武器销售和出卖情报获利之后，更是如此。国务院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总统（1984年在选举中舞弊战胜阿努尔福·阿里亚斯而当选），把巴拿马从经济停滞中拖出来，从而使文职政府赢得较大的权威。外援大量进入，因而使巴莱塔博得了好技术官僚的美名，但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既未赢得寡头政治集团也未赢得民主革命党分子的支持），加速了他的下台。执政仅一年，由于他被授权调查在残杀一位深孚众望、抨击现政权的批评家乌戈·斯帕达福拉一案中诺列加所起的作用而被迫去职。

1987年年中，一连串的民间抗议行动引发了这几十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诺列加强加的和平局面崩溃了。当诺列加试图强迫他的第二司令罗伯托·迪亚斯·埃雷拉退休时，后者反对并公开控诉了诺列加的重大罪行，其中包括处决斯帕达福拉和1984年选举舞弊等。民间团体——学生、商会、雄狮俱乐部——联合在迪亚斯周围，组成一个广泛的反对派运动，称之为全国公民反对军人干政运动，迫使诺列加辞职。他们进行抗议和示威达

数月之久，诺列加则对此实行了非同寻常的暴力镇压。民间的抗拒行动与广大的居民相结合，形成了中产阶级反对派的后盾。1987年的危机暴露了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从而导致了美国参议院对诺列加的谴责，但巴拿马国防军仍然忠于它的首脑。这种情况使美国政府陷入了一种特别狼狈的局面，它必须与巴拿马代表们合作处理运河事宜，但在1988年初却又掀起了一场推翻该国政府的公开运动。

经过6个月的僵持，华盛顿对这个经济上特别脆弱、经不起外国干涉的国家采取了强硬的外部限制措施。美国冻结了巴拿马的资产，停止付给运河的费用，拒绝供应美钞——美钞是巴拿马经济的基础，因为该国没有自己本国的纸币——立刻就使战略金融体系倒闭，并造成了严重的危机。由于政府不能在正常的基础上履行国家的义务或发放工资，反对派扩大到下层阶级。然而，美国指望诺列加方面会很快退却的估计是错误的，他轻而易举地制止了一场未遂的政变，并换上了一名新的傀儡总统。美国驻运河区的卫戍部队扩大了，增加了许多特别部队。

另一方面，诺列加及其支持者们则谴责美国将直接干涉该国的计划，全国公民反对军人干政运动在感到靠它自己的抗议运动显然无法把这个独裁者赶下台时，曾经提出过请美国干涉的要求。这个政权已经声誉扫地，没有多少别的选择，只有采取加紧镇压的措施和唱起民族主义的高调。所能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潮自然是可想而知的，群众的真正支持率使诺列加大失所望，因为现在普遍认为，把他赶下台是有可能多少恢复一点正常状态的唯一办法。然而，巴拿马政府掀起的运动却导致了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发表宣言反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它也为被美国佬控制运河而激起民族感的巴拿马人心中铭记的历史性冲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表达形式。哪怕是名声最坏和信誉扫地的政权，也可能借口保卫国家主权来捞取政治资本。

1988年11月乔治·布什当选总统，诺列加认为他同美国的

问题可能没事了，因为他把新任总统视为自己的盟友。70 年代布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曾负责管理诺列加的情报收集工作，1985 年时再度会晤，后者显然与伊朗—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交易有联系。如果这些接触泄露出来会使新总统难堪。同样，诺列加还可能在军事基地上制造更多的麻烦，而美国居民则会变成大量潜在的人质。

然而，诺列加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89 年 5 月巴拿马总统选举时，布什支持反对派候选人吉列尔莫·恩达拉，提供了 1000 多万美元，并派出了竞选观察小组。当投票结果有利于恩达拉时，诺列加宣布竞选无效，发动美洲国家组织和国际新闻界进行谴责。4 个月后，诺列加安排一位密友充当傀儡总统，布什拒绝承认这个新政权（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根据 1977 年条约，1990 年 1 月运河的理事将由一名巴拿马人担任，而诺列加任命的人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诺列加现在碰到的是一个意见统一的美国政府，它不惜用任何手段要把他赶下台。秘密使节们试图说服他下台，但他们也鼓励国防军的指挥官们进行密谋活动，并扬言要打开行刺外国领导人的杀戒。1989 年 10 月，美国支持的由不同政见军官发动的一场政变失败后，白宫下令执行一项军事接管计划。由于诺列加宣布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从而最后引发了这次进犯。1989 年 12 月 20 日，一支大约 1.4 万名的进攻部队在巴拿马登陆，与驻军汇合，几天内即实行了军事管制。这是巴拿马自独立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未经邀请的军事干涉，也是自越战以后美国最大的军事行动。

诺列加首先到梵蒂冈驻巴使馆避难，其后，终于向美国当局投降，以毒品走私、洗钱及其他罪行被控告受审。美国安排恩达拉当总统并帮助他恢复秩序和重整经济活动。但是，恩达拉政府没有多少合法性，并且为了依赖华盛顿方面，未来还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巴拿马的国家地位仍然特别脆弱。确实，巴拿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地位或多或少前途未卜。

第15章

1904—1979年的巴拿马运河区

20世纪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巴拿马运河以及运河区，总是具有一种巨大的象征性意义。这条运河横贯一个小小的西语共和国，这个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依赖于美国的保护，而这条运河则完全由美国控制达75年之久。这条运河一直是华盛顿以强权统治西半球弱小国家这一突出的象征贯穿本世纪。

美国决定控制中美洲地峡通道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合众国版图已到达北美洲太平洋海滨。1846年与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签订的一项条约给予华盛顿建筑通过巴拿马（当时哥伦比亚的一个省）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保证哥伦比亚对该省享有主权。1855年时，美资巴拿马铁路公司已经开业。有些人把这条铁路视为由美国控制运河的一个前兆，但英国根据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却坚持未来开凿任何运河的计划都要平分秋色，而且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对人们的吸引力，使北美洲倡议开凿运河的势头进一步减弱。于是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在苏伊士运河的设计师德莱塞普斯的主持下，开始在巴拿马开凿一条海路通道，不过，该项冒险事业在远未完成之际即已破产。

尽管法国人一败涂地，美国人对开凿运河的劲头仍然保持着，最突出的有诸如阿尔弗雷德·马汉舰长及其赞美者西奥多·罗斯福等主张建立海军强国的鼓吹者。而且，1898年同西班牙的战争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因为当时“俄勒冈号”战舰从西雅图驶往古巴竟必须绕道合恩角才行。只要打胜了这场战争，华盛顿同新

近获得的夏威夷和菲律宾等太平洋属地的联系，通过一条运河来沟通看来是必不可少的。美国迅速行动起来，首先同英国谈判废除1850条约的问题，消除由美国独自控制运河所碰到的障碍，然后又决定以巴拿马而不是尼加拉瓜作为准备开发的航道。1903年1月，罗斯福政府着手与哥伦比亚签订海—埃兰条约，该条约给予美国广泛的权利以修建并运营一条横贯巴拿马的运河。

当哥伦比亚参议院坚持要求更好地条件并拒绝批准条约时，罗斯福作出了他任总统期间最没有把握的行动之一——怂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巴拿马人担心罗斯福放弃巴拿马而转向尼加拉瓜作为替代，法国运河公司也同样担心，该公司要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它的资产。两者在阴谋脱离波哥大的问题上志同道合，利用德莱塞普斯以前的助手菲利普·比诺—瓦里拉作为他们的华盛顿代理人。比诺—瓦里拉被告知，美国将支持分离运动。而且，美国海军舰只已部署在巴拿马城和科伦这两个终端港口，以阻止在1903年11月3日分离派政变后旨在重申波哥大权威的哥伦比亚部队登陆——尽管1846年答应保卫哥伦比亚的主权。美国的干涉使这场叛变不可逆转，而哥伦比亚则被剥夺了一项潜在的无价之宝。罗斯福后来自夸说："我拿到了这条地峡"；或者正如塞缪尔·早川教授一句令人难解的名言："我们是正正当当地偷窃了它"。

在巴拿马宣布独立两个星期之内，国务卿海约翰和比诺—瓦里拉就签订了一项新的运河专约，该专约给予美国的条件甚至比早先美国与哥伦比亚达成协议的条件还要优厚。比诺—瓦里拉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全权负责签署整个文件，然而实际上条约的绝大部分是在国务院里起草的。为了要保证让美国参议院能顺利批准，条约中规定大量的特许权，由美国负责处理运河所有事项，与此相应，巴拿马则被排斥在外，甚至连过去名义上给予哥伦比亚的那种表面上的参与都没有。

华盛顿付出的代价大大低于它从海—比诺—瓦里拉专约所获

得的一切。巴拿马将获得一笔1000万美元的一次性巨额价款以及每年25万美元的年金作为它转让权利的补偿；但是，它对运河和铁路都放弃了物归原主的权利，放弃了铁路每年25万美元的年金以及在运河总收益中提成的权利。它也没有在运河或铁路在两个终端城市拥有的土地中取得任何土地。该条约中没有一处地方提到巴拿马的主权，而在海—埃兰协定中却明确承认了哥伦比亚的主权。海准备承认的至多只是通过给予巴拿马一项独立的保证而使它成为美国的一个保护国，但是甚至连这一点也仅仅是想制止哥伦比亚夺回。

巴拿马则让渡它的中心地带作为回报，而且更多，为了运河的目的，永久性地让出了一条10英里宽、横贯共和国中心的地区，而比诺—瓦里拉则走得更远。尽管他成功地把海原先划在区内的两个终端的城市划在区外，但他代表巴拿马给了这个地区以全部的治外法权。根据第3条，美国将在这个区内或运河所需的区外任何土地上均享有不亚于主权的权利。这将成为美国在其占有期间在这条地峡所享地位的基石。此外，根据第7条，比诺—瓦里拉还给予美国为了加强公共卫生措施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干涉巴拿马城和科隆的权利。因此，巴拿马脱离波哥大的后果，就是成为华盛顿的附庸：意味深长的独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未展现。

第一代（1904—1929年）

1904年建立的运河区是以19世纪强加于中国的那种特许使用地、势力范围和租界的综合体为其模式的。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和一块只有一种理由而存在的飞地：为了1914年通航的水路航道的有效工作。它是名副其实地通过一名行政官员只对美国总统负责，这名行政长官自1907年起一直是由一位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高级军官担任的。这种结构胜过下列任何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在管理方面将会对被视为蒙昧的西半球不断提供教导的一个文职权力机构；以及一个以运河区卫戍部队一名将军为首脑的军事司

令部。

运河区的体制充满了矛盾。在许多方面作为一块陆军专用地的运河区却像为商业利益服务的民营企业从事运河事业，并且与它主要是战略性功能的这种思想严重抵触。与此同时，它又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完全对立，因为在一种强烈地怀旧式的福利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美国居民被允许投票或者拥有个人不动产。到 20 年代，运河区已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小型国家，通过一位总督与巴拿马打交道，而总督个人的权力活像一国的君主，华盛顿名义上的主人们对他实际上已鞭长莫及。当哈定政府 1921 年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时，委员会敦促进行的绝大部分改革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运河区继续像过去一样照旧办事，工程兵部队的统治被视为——像美国在地峡存在本身一样——是永久性的，而且不受外界干涉的制约。

运河当局在一个重要的领域被迫抑制了它对无限权力的追求。在条约于 1904 年生效后不久，运河区即筑了一道高高的关键壁垒封闭起来，同巴拿马相隔绝，来自美国的进口货完全免税。这一行动对一个全国收益严重依靠关税收入的国家的经济是破坏性的打击，它被罗斯福撤销了，因为他担心，这将引起严重的政治动荡，对正在进行的运河建设不利。一个妥协的安排，即所谓塔夫脱协定，在运河开放之前，即巴拿马将对进人运河区的某些货物征税并消除关税壁垒之前，就此做出了一项暂时性的协议。

然而，以后不久，由于巴拿马商人不能以竞争性价格向运河劳动力提供食品，促使运河区商业自给自足投标承包的出价被大大抬高了。在好几年里，铁路日用物资内部供销店不仅为运河工作人员运进了日用必需品，而且侈奢品也与日俱增，并且还在运河区内开业经营一应俱全的补给品以满足消费需要。巴拿马方面的抗议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理由是，这些措施都是条约所允许的；确实，该条约的文字十分笼统，足以令运河的长官们干他们随心所欲的事。

然而，美国当局，首先是戈瑟尔斯将军，这位运河委员会主席和1914年第一任总督，却被塔夫脱协定惹怒了。戈瑟尔斯决意设法废除该协定，以便为大规模发展大西洋终端的保税仓库扫清道路，这将使运河成为一块吸引国际贸易的磁石。运河区管理机构还认为，随着该协定的取消，它们将会有权任意向无所约束的巴拿马顾客和旅游者以及美国政府雇员出售任何商品。从这两方面来看，它们都与国务院背道面驰，而国务院则渴望那些在他们看来自大傲慢的运河领导人有所节制。虽然塔夫脱协定1924年废除了，其目的却是与巴拿马开始谈判一项补充条约，并不是把全权交给运河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再同一位总督的意见相抵触，国务院认为这位总督蔑视巴拿马人，把他们视为"劣等种族，应该受制于人并应该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此外，国务院还支持罗斯福的方针，即绝不能打算把运河区办成一个商业保税区。

1926年7月签订的条约反映了一定程度的退却。保税仓库被批准了，巴拿马把科隆的新克里斯托瓦尔区出让给运河区，但运河被迫接受对它的市场实行永久性的限制：将来它只能向与运河区有官方联系的顾客出售货物。此外，运河区的领土上不得再增添任何私营企业开业经营。尽管1927年初由于巴拿马拒绝批准，该条约成了一堆废纸，但运河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塔夫脱协定仍然非正式地保持着效力，而且巴拿马因此而免遭运河区全面的竞争。

运河区对该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并不亚于对其商业的影响。运河在输入劳动力的形式下把一个崭新的社会引进了巴拿马的生活以便建设航道和一旦完工后进行运营。从一开始，这些劳动力就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技术人员、领取金元者被列入少数精选的黄金级人员工资名册内，而半技术和非技术性劳工则被列入白银级工资名册并付给银币。实际上所有拿金元的都是北美白人，他们的生活水准特别优越，领取免税的薪俸，比美国大陆同工种人员的薪俸高出25%，节假日工资照领，食宿、医疗和子女上学都

免费供应，而且还能到铁路内部商店购买廉价商品。作为点缀安插在白银级人员中的北美白人或黑人并没有多少，白银级人员主要是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绝大多数来自巴巴多斯。开始运河建设的工程师们非常喜欢从中国国内雇来的中国苦力，但是美国工会和巴拿马公众舆论都阻挠这种选择。西印度群岛人成群结队地到来，他们不像过去那些为法国人劳动的他们的先驱们，他们到这里来定居，搬到终点城市巴拿马城和科隆城的大规模聚居点住下来。

巴拿马本地人既不具备列入黄金级人员的那种技术，又缺乏干白银级那种活所需的体力，他们都不在这两类之列。有一小批人员是作为友好姿态而被纳入黄金级名单之内的，在精选担任黄金级工作职务方面，巴拿马人与北美人名义上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巴拿马政府知道这种许诺的象征性质，它并不坚持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运河开工以后巴拿马人仍旧处于劳动力中出现的冲突的边缘。

黄金级人员经常向运河管理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尽量扩大他们的特权和减少西印度群岛人可能晋升到技术职位的机会。由于他们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并得益于劳联同国会的密切联系，他们有自己的门路。例如，1915 年向黄金级精英们索取房租的一道行政命令被中止，第二年终于被撤销。而另一方面，对西印度群岛人则漠不关心。运河当局并不催促他们遣返，因为它清楚地知道，有一支失业大军作为调节的蓄水池以备不时之需是有利的。黑人劳工既廉价，数量又多，而西印度群岛人贫困的生活条件则令人吃惊。由于地方组织机构实际上几乎没有，因而他们的问题更多；1920 年 2 月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以底特律为基础的黑人铁路员工工会发起的。当所有居住在运河区的罢工者被立即赶出运河区撵到巴拿马地界之后，这次罢工不到一周就彻底失败了。在将近 20 年期间，西印度群岛劳动力再也没有试图认真地组织过工会。

在这次罢工彻底失败之后，西印度群岛人还遭受到另一次挫折。一个关于运河运营问题的联邦调查委员会建议通过使大批劳动力"白银级化"的办法来大量削减经费，这就是说，尽可能地用白银级人员来代替黄金级人员。在劳联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大力支持下，黄金级人员的院外游说集团顺利地推翻了这个建议。西印度群岛人不得不请求运河当局提高报酬和改善环境以及改善子弟上学的条件，但不起什么作用。1927 年，被允许按黄金级雇用的人达到 100 人，但他们不满意的基本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他们仍然是底层阶级的群众，受到敌对的巴拿马法律的惩罚，完全依赖于运河当局家长式的施舍；20 年代结束时，看来他们还没有什么别的前途。

运河区令人感到它正确无误地存在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它对巴拿马政治的影响。当然，华盛顿对此感兴趣的是要巴拿马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以便运河能够不受干扰地运营。换句话说，这个新国家应该断然放弃拉丁美洲政变和反政变的传统而稳定下来过一种秩序良好、符合宪法的生活。为此目的，1904 年美国公开施加压力，迫使以考迪罗自诩的埃斯特万·韦尔塔斯将军辞职并解散了小小的巴拿马陆军。自此以后，巴拿马至多只保持了一支警察部队，但美国很快就发现，这种改善并不可靠，美国周期性地动辄对巴拿马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贯穿了该国的早期时代。

由于巴拿马城和科隆这两个肇事的主要发源地，即使不是在行政区划方面至少也是在地理位置上嵌进运河区的这种实际情况，使得干涉的势头大大加强，因为那里掀起的高潮可能引起危及运河的反响。此外，绝不能把 1846 年条约解释为允许美国仲裁地峡政治纠纷的指导文件，华盛顿现在卷人巴拿马太深，不干涉政策已不可行。美国一方面很有成效地驳回了某些巴拿马保守派提出的完全与美国合并的要求，与此同时，巴拿马宪法却承认美国有权对该国全境干涉，这一点连同运河条约第 7 条（允许美国在紧急情况时对终端城市采取警察行动），为华盛顿方面实行保护

制度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只要它愿意实行。

在运河修建的10年期间，当碰到选举时，美国的监护人的身份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国务院也用监护的眼光盯住巴拿马的公共开支。历届总统都有指责前任浪费的报告，以致巴拿马想以附加借款方式使用运河任何经费开支都很难办到，而且由于受到否决权的箝制，也使巴拿马为此而修改宪法的任何要求都无法提出。然而，控制全国警察的试图很不成功。1909年，美国公使说，终端城市的情况令他联想起，简直就像黑山淘金狂热时期枯树镇的状况一样，警察对外出上街的北美行人进行暴力攻击。在几名美国公民被杀害后，委派了一名美国警察教官，不料此事竟被一位与当地妓女深夜鬼混的警察首脑所忽略。看来，如果要使巴拿马政治制度方面留下任何持久的印象，就必须把干涉主义提高一档。

在运河运营的最初几年期间，那就是说，在1914年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似乎总是这种状况。很快就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而运河区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认为对付巴拿马贪污腐化蔓延和周期性骚乱的唯一真正的答案就是实行军事占领。但是，华盛顿方面——正如当时巴拿马驻纽约代理人助理，年青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所建议的——突然停止了把自己指派的候选人强加于1916年选举的做法。此人很可能认为采用改革措施已得到默许，但是，当预期的清理工作没有落实时，运河当局就把事情抓到自己的手中了。卫戍司令理查德·布拉奇福德将军是一位负有使命的人。美国为巴拿马引进了公共卫生设备；他将赋予该国以精神的健康。他的改革运动开始于1918年5月，当时他下了一道命令规定一切休假人员的活动范围须以在运河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场所为限。一个月以后，针对政府表示要推迟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一事，他援引了1903年条约的第7条，这为美国陆军接管终端城市扣动了扳机，布拉奇福德曾公开把这些城市——不适当地——与梭东城

和娥摩拉城[1]相提并论。占领是短暂的，但是，却采取了巴拿马循规蹈矩的更加基本的措施。当年年底，1917 年委派的美国警察教官被赋予决定性的权力，而且，按照华盛顿在其他拉美附庸国的现成的模式一样，也安插了一名财政顾问，牢牢地控制巴拿马的国家财政。

然而，20 年代的干涉并不出人意料。两次是应巴拿马的要求而进行的：1921 年是为了把波拉斯总统从一群敌对的暴民中解救出来；1925 年则是把恰里总统从城市贫民窟愤怒的房客包围中营救出来。在现场的美国官员都是激烈的干涉主义者：1921 年，运河总督毫不犹豫地动用第 7 条相威胁；1925 年，进行指挥的将领精心起草了一份军事管制计划。但是，国务院把它制止了，拒绝再对任何一次总统选举进行监督，也不在幕后支持警察教官或者财政顾问。这种忍耐的理由往往是，在条约谈判整个过程中需要保持给巴拿马尝点甜头，而谈判过程长达 10 年之久。其结果出现了美国没有能力决定该国事件的进程。两笔巨额借款—— 1923 年的 450 万美元和 1928 年的 1200 万美元——没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华盛顿方面对于巴拿马统治阶级如何使用这些赏赐不存什么幻想，虽然是决定让它自行支配这些钱。

当然，对巴拿马事务的一切卷入，都是服从于运河这一中心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了船舶、特别是为了美国海军舰只高效率地通过地峡。运河赋予一支海洋舰队以将近两支海洋舰队的能力，因为运河使它们能在最需要的时刻相对迅速地集聚起来。运河本身就是一笔具有中心战略重要性的国家资产，虽然有一种主张运河中立化的思想流派在 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里甚嚣尘上，然而华盛顿方面决定，这条运河应该是一条设防的航道，而且其防务应完全由美国掌握。

---

① Sodom 和 Gomorrah 两个古代城市，根据圣经的记载，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同时被神毁灭。此处意指罪恶的城市。——译者

防务将是陆军的任务而不是由海军承担。罗斯福不愿让海军为沿海的防卫琐事所羁绊。运河两端的要塞将使海军摆脱羁绊而从事其主要任务：与敌方舰队作战。这些要塞将压住港湾海军炮击的火力，阻挡向地峡登陆的行动，并对通过运河往来两洋的美国战舰进行掩护。到1914年运河开通时，炮台已经安排就绪，但上岗的守备部队力量明显不足——这是塔夫脱实行的一项节约措施，其理由是在紧急情况时增援部队可以迅速赶到就位。

在运河接近完成时所详细拟定的方案中，把巴拿马仅仅看成是一个顺从的附属国而已。海军控制了运河区无线电通讯的收报和发报业务，它要求在该国全国的无线电讯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获得了此项权力。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下令规定巴拿马所有的铁路计划必须符合运河安全的要求。巴拿马对于其主权被进一步侵犯的这些事件感到不愉快是可想而知的，但它别无选择，只得对它实际上的主人的意志俯首贴耳。

1914—1918年世界大战之际，运河受到首次巨大考验，作为一条交通干线而登场。但它并非自始至终一帆风顺，彩旗飘扬。运河中段的滑坡是一件不断令人困扰的麻烦事，以致1915年秋后运河关闭了整整一年。当美国显然有可能与日本和德国交战时，威尔逊作出了建立两洋舰队海军建制的抉择，而这种建制在运河设计时曾被认为已不必要了。此外，由于华盛顿方面1917年年初已经参战，显然，当时最新的海军火炮射程已超过前不久才装备的要塞炮的射程，运河的防御工事显然也十分脆弱，无法抵御来自海上的炮击。

与此同时，运河区内部，在总督戈瑟尔斯将军与卫戍司令爱德华兹将军之间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德华兹提出了一项在巴拿马修筑道路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便在运河边界外提供远距离的地面防御。他打算建立两支民兵，一支由运河的劳动力组成，另一支拟在巴拿马招募。戈瑟尔斯则反对这种计划；他制订了现行的近距离防御运河设施的方案，并且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废弃

它。他决定，凡是他的人员所负责的运河运营工作岗位，均不得改由兼职人员担任警卫值勤，而且他还拒绝把武器交到西印度群岛劳工手中，更不用说交到容易激动的巴拿马人手中了（他好不容易才把巴拿马的警察解除了武装）。但是，1917 年春季，随着爱德华兹的离去，辩论毫无结果，而在美国成为交战国的短暂过程中，运河却处于一种宁静的战争状态。1914 年以来人员明显短缺，这倒也不必惋惜，然而，战后的十年情况并没有改善。炮台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虽然它们已经陈旧过时，不过舰队的炮击已日益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极小的意外事件。但是，另一种威胁却立即代替了前者。20 年代举行的三次舰队演习显示了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能够易如反掌地突破落后的防空体系，因此，如何对付空袭成了运河区的首要急务。另一个缺点是船闸太狭窄。德国在大战前就已将基尔运河的船闸拓宽到 147 英尺，而巴拿马运河的船闸宽度却只有 110 英尺，到 1919 年不得不因此把新战舰和航空母舰的船幅缩小。根据 1922 年裁减海军军备的华盛顿公约，[1]在后继的 10 年间中止了主力舰的建造，推迟了必需扩大船闸容量的决定而没有将它淘汰，运河通过巨型战舰的潜在能力已达到极限。

由于技术革新迅速发展使这一航道黯然失色的情况，在某些区域显然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1918 年 11 月塔沃加岛上有 4/5 的地方需要建立防御工事。以防止来自海上的袭击，而现在看来则未必是这样了。在与巴拿马的条约谈判中，陆军和海军都要求对巴拿马共和国的民用航空和无线电广播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管制，随着这两个领域出现的迅速发展情况完全不一致了。总之，巴拿马仍旧像在大棒时代一样被任意驱使，并在大战期间作出让步，委曲求全，自动把领土无保留地交给华盛顿支配。看来，这甚至

---

① 此处指 1921 年 11 月 12 日到 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 9 国华盛顿会议签订的 3 个条约之一——《五国公约》，又名《五国海军协定》，其中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和巡洋舰吨位比例为 5：5：3：1.75：1.75。——译者

超过了1903年无所不包的规定。然而，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这项条约[1]被巴拿马否决了。第一代美巴关系既已近结束，这就为随之而来的第二代的变化带来了一个不祥之兆。

第二代（1930—195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并预料还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形势笼罩下的时期，运河的防御问题在运河区的轻重缓急中占据了更高的地位。本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和日本的挑衅不断增加，对于安全问题的忧虑，按正比例地上升。1934年春季，据陆军情报部门的报告，日本有一项待（美国）舰队通过运河进入大西洋之后破坏运河的阴谋。因此制订了一项计划，采取了周详的对应措施，其中包括对船只进行检查和派驻过境保卫人员。1934年12月日本废除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一事，激起了关于完全由海军负责安排建立第三套大型船闸的立法。建立防空网的经费在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极其缺乏，但在希特勒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得手后，终于因罗斯福扩充陆军航空大队而得到了大力支持。

防务问题也是重新谈判条约的中心问题，从条约内容看，武装部队部门确信，罗斯福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正在安抚的名义下出卖美国的利益。根据1936年3月签署的条约定稿第2条的规定，华盛顿放弃向运河区以外要求取得土地的权利；根据第10条，凡有涉及航道的国际危机事件发生时，美国必须同巴拿马磋商。海军截止到当时对巴拿马无线电业务绝对控制的状况受到了损害，而关于允许陆军在巴拿马领土上进行调动和演习问题则没有达成正式协议。结果，条约在参议院搁置了3年之久，直到从巴拿马方面就磋商条款和调动、演习得到圆满的保证时为止。条约在1939年7月（正是欧战爆发前几周）被通过。

[1] 指1926年7月签订的条约，1927年初巴拿马拒绝批准，见本章第1节第3段。——译者

运河是在防御脆弱状态下步入战争时期的。反破坏的计划立即实施，但没有密集牢固的防御网。此外，巴拿马也并不是罗斯福原来预期的合作伙伴。当要求在该国设基地的谈判开始时，发现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在土地使用权、租金和管辖权等重点问题上却是一个特别难对付的谈判对手。甚至当他在1941年10月突然被废黜后，他的继任人也表现得几乎与他同样坚决，都想叫山姆大叔作出代价昂贵的让步。1942年5月有关基地问题的协议是用一大笔赏赐换来的，此举，韦尔斯在以前还斥之为勒索，但现在他却不得不作为必需的交易代价而接受了下来。这笔交易是在美国担心运河安全问题达到顶峰时敲定的。然而，预料的日本航空母舰的袭击并未成为现实，同时，由于海军在中途岛取得胜利，重蹈珍珠港覆辙的梦魇不久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战争期间运河继续作为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一条有效的捷径，是个无价之宝。然而，这次战争也对这条运河长期的战略意义提出了疑问。1940年夏季，国会对建立两洋海军给予经费，两洋海军一旦建立，运河作为迅速转移一洋舰队的手段使之发挥最大作用的原有重要性，注定要削弱。1942年5月出现了更加不祥的发展兆头，当时，大战虽未结束而第3套船闸工程却已停止，原因是针对这些船闸而设计的6万吨蒙大拿级巨型舰决定暂不建造。此后，原有的船闸闸室已无法通过当时经过改装、加上反鱼雷外壳的战舰，甚至第3套船闸也不能适应当时正在建造的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1945年原子弹的出现，推倒了运河是第一等国家资产的论据。同样，华盛顿在国际环境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如今承担了世界责任，而它对欧洲和中东关注的主要焦点的转移，已把这条运河推向急剧变化的前景。这条运河是为一个拥有军事资源比较有限的地区性强国的目的而建造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因而这条航道开始日益呈现出它似乎已是一个过时的历史遗物。

有些人相信，只有使这条运河现代化，它才有可能重新担负

其主要任务。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将第三套船闸的发展计划加以扩大；将船闸型运河加以对称的改造，使其两端各建一套三级制的升降船闸和终端湖泊；开凿成海平式运河，将升降船闸完全拆除。第二个方案是美国海军迈尔斯·杜瓦尔舰长的智力成果，而约瑟夫·梅哈菲总督则支持海平式航道，其主要论据是这种航道对核攻击具有超出一般的承受能力。1947 年夏季，支持海平式方案的总督报告及其论据经海军总部多数通过而得到支持。

然而，海平式计划失败了，其部分原因是 1947 年 12 月巴拿马拒绝在该国租借基地用于长距离的运河防务。1945 年末以后，关于在巴拿马战时基地的前途，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它与巴拿马要求美国在日本投降一年后即 1946 年 9 月撤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运河区总司令最初坚持，即使不把俄国可能渗透的问题考虑在内，也必须把战时的全部防御网络保留到 1957 年。他后来作了让步，认为，如果开凿海平式运河的话，则可以接受安排规模较小的军事设施，因为海平式运河本身具有守势防御的内在属性。尽管巴拿马政府终于接受了这些打了折扣的要求，但遭到巴拿马国民议会一致投票否决，于是美国军队撤退到运河区内。五角大楼尽管公开地表示遗憾，但内部却对基地协议的失败感到庆幸，认为可能因祸得福。一度被认为头等重要的保护运河问题，此时已在美国的轻重缓急问题中地位大大下降，而在 1953 年和 1954 年与巴拿马签订新条约的谈判中，防务问题已经靠边站了。当然，这条运河在任何危机中都是宝贵的后勤补给干线——正如朝鲜战争所证明了的——但它已不能再被看成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症结问题。

在本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中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对巴拿马政治的卷入始终保持在最低限度。1931 年 1 月，当共同行动协会运动推翻弗洛伦西奥·阿罗塞梅纳总统时，运河区当局稳坐不动。1934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废除普拉特修正案后，1903 年专约规定的对巴拿马的正式保护地位就立即站不住脚了。

1936年按照睦邻政策签订的新条约结束了这种保护地位，罗斯福放弃了他的本家[①]关于充当西半球警察的主张而代之以一个基于伙伴感和相互信任的美洲洲际体系。然而，美国陆军关于在巴拿马地峡保持政治稳定何为上策却另有想法。陆军方面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总司令的失策大为震惊，他们拟订了自己的一项对巴拿马实行军事占领的秘密计划。[②]这被保留下来以备将来之用，它是一种持久不变否定睦邻关系及其任何措施的观点，时不时地花样翻新。

陆军所拟议中的那种紧急措施始于1940年10月民族主义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就职之时，前者不断蔑视美国的意愿，1940—1941年德军取得轰动一时的进展后，竟指望轴心国胜利。1941年10月出谋划策推翻他的这场政变，华盛顿当然有所觉察。没有证据说明美国支持这次袭击，但运河区情报头头利奥·麦金太尔上尉显然自始至终与密谋者保持密切接触，而且肯定是告诫过阿里亚斯不要试图重返。此后，直到大战结束前，美国得到了里卡多·阿道弗·德拉瓜迪亚驯服结盟的保证。巴拿马警方现在是该国的决定性力量，自此以后保持了指挥者的地位并相当符合华盛顿的要求。此后，每当危机爆发时，美国即保持严格的不干涉主义。例如，1948年当巴拿马政府为了确保阿努尔福·阿里亚斯落选而操纵选举，美国即故意保持中立。1949年11月，当警察头头何塞·雷蒙先把丹尼尔·查尼斯总统赶下台然后使阿里亚斯上台时，美国也缩在后头。18个月以后，当阿里亚斯废除宪法然后在大罢工和总统宫被包围的情况下辞职时，美国则袖手旁观。有一种公诸于众的美国一贯政策，叫做典型的自我克制，实际上它就等于愿意同任何巴拿马领导人共处而已——甚至包括像阿努尔

---

① 这里指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前者的远房堂侄又是其侄女婿。——译者

② 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局，分类卷宗407，军务处登记文件309F，《巴拿马计划》，1947年7月7日版。

福·阿里亚斯那种讨厌鬼在内——只要他们不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对共产主义任何迹象能采取严厉措施就行。当1951年在反共方面毫无问题的阿里亚斯下台之后，美国驻巴使馆在后继政府的成员中间发现有亲共分子，并敏感地把他们与当时改良主义者哈科沃·阿本斯当选的危地马拉的情况相提并论。因此，当雷蒙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约翰·威利大使馆敦促一项200万美元援助计划来支持他所预期的选举方案。雷蒙虽然并不是因此而在1952年当选总统的，但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已准备好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来息灭民族主义烈火。此举不仅可以防止巴拿马走上危地马拉的道路，而且可避免走上没收外国石油公司的伊朗道路，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切勿走上埃及的道路，该国的革命政府看来正开始向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挑战。

从巴拿马的观点来看，最理想的援助方式是准许参与运河创收的商业利益机会。这一直是自巴拿马开国以来的主要目的，而且是这一期间始终保持的中心。鉴于华盛顿一向认为能让巴拿马胃口缩小的无非是政治利益，因此，总还有余地进行讨价还价。

在193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第一次朝这个方向迈出重大的一步是在1933年10月，当时，阿莫迪奥·阿里亚斯总统力求重新缔结一项新条约，在白宫访问了罗斯福，这是因1926年达成的协议遭到巴拿马否决而告失败后重开的谈判。文件的商业条款终于在1936年3月签订，实质上反映了1926年协议的相应条款。然而，这些让步尽管在10年前已被运河统治集团所接受，但还必须冲过他们死灰复燃的反对这一险关。照总督看来，条约的这项基本内容还是标志着投降：把1903年专约第3条规定的、华盛顿享有不必经巴拿马同意即可向任何人出售任何物品的主权拱手交出。

从运河区当局的观点看来，此后的情况更糟。虽然巴拿马人提出的分享通行税岁入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但也做了若干额外的让步。年租金提高到43万美元以补偿1934年美元贬值的损失，

运河区提出兼并新克里斯托瓦尔城的要求则被否决。为了安抚巴拿马人关于废除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要求，运河区保证向巴拿马饮料商购买所需的全部低度酒和啤酒。把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其慷慨的程度远超过1926年条约，而巴拿马则把它大大归功于罗斯福本人。

但是，条约并没有使运河区的商业殖民主义告终。日用物资供销店的批发店和陆军邮包交换在实践上对条约规定置之不顾，甚至在1939—1943年战时繁荣期开始退潮之前都是如此，它们再度成为巴拿马人抗议的目标。反之，美国观察家们则指责巴拿马既不敢以降低关税方式同运河竞争，又缺乏政治勇气明明白白地另改税源，征收所得税，因为它不敢得罪那些自开国以来一直统治该国的富人，生怕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战后，地峡问题的评论家们指出，该国过分依赖服务行业而不愿实行多样化，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更多的收益。雷蒙确实为走向多样化开了一个头。但是，巴拿马人把运河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执著性仍旧根深蒂固，而在1952年雷蒙政府也像历届政府一样，把解救经济的办法主要放在尽量开辟这项财源上面，只要能够说服美国肯花钱就行。

因此，在1953年秋季第三个条约的谈判中，巴拿马政府把所有要求都同运河联系在一起：增加和改善就业机会；将1936年的商业特许权扩大；分享通行税岁入；而且提高年租金。华盛顿几乎对每一项都进行抵制。陆军的反对是毫不含糊地唯物主义的。南方司令部（其总部即设在运河区内）以其"南方的安逸"不是白送的观点而知名，拒绝放弃它所享有五花八门的特权利益中的任何一项来讨好巴拿马。结果，条约在此基础上与巴拿马达成妥协，但是该条约的规定是否比1936年条约得到更严格地实施却令人十分怀疑。

反对巴拿马在通行税中提成和提高年租金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埃及在苏伊士运河通行税总收入中分得7%，尽管如此，巴拿马分享通行税收益却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这会造成巴拿马将

在运河管理方面取得一席发言权的局面。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准备把年租金增加150万美元，但要求此举与巴拿马默认这项新协议并不赋予巴拿马享有修改现行条约的任何权利联系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在1955年1月条约签订时并未加上这类声明，因为美国在运河区基本地位没有改变这一点，是得到谅解的。

巴拿马人关于将就业问题列入条约的要求，反映了他们认为劳工问题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前20年。在30年代大萧条的10年中，就业十分困难，北美人和巴拿马人都十分渴望争得7000多名西印度群岛人所占的白银级雇员名额，以取而代之。运河当局抵制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尽管向西印度群岛人提供了援助，让他们返回到本乡本土的岛屿，但没有多少人接受，他们继续成为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劳动力后备大军，许多人蒙受着丧失白银级雇员资格之苦。作为1936年条约附件的一项备忘录，对巴拿马做了安抚，其中承诺将在建设时期对已有的就业人员坚持同工同酬，然而，这是以运河未来的需要为条件的，此项条款所载的诺言对实际目的毫无意义。

1936年条约生效后仅几周，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运河区的劳资关系成为争论的一大中心问题。纠纷的根源并非起自西印度群岛人。初期组织工会的企图不久就流产了，1940年的一次罢工也是唯一的一次罢工以罢工工人被驱逐出境而告终，数千名劳工被输入从事战时营建工作，他们在大战结束时均被遣返。列入黄金级雇员名册的美国人也同样受到了约束。向运河立法机构递交的有关他们的年度修正草案，要求完全由具有资历的美国人担任技术性和半技术性职务，但草案遇到了总统程序性暂缓执行令而中止。然而，鉴于罗斯福把这次战争称之为保卫人权之战，因此当1944年巴拿马就黄金级、白银级的歧视性问题向世界劳工局提出控告时，运河区就立即处于被告的地位。于是，尽管事实上总督拒绝废除黄金级、白银级名册，不想用废除这个名册当做平息骚乱的秘方妙药，尽管罗斯福也把他装模作样的自由

主义那一手牌抛弃了以支持总督，但这个问题在巴拿马的议程上仍高居重要位置。

战后10年里，改革运动随着西印度群岛人按1946年宪法取得巴拿马公民资格而加快了步伐。运河区管理部门如今面对着的是一个白银级加勒比裔和西班牙裔巴拿马工人的联合阵线，它是美国公共工程工人工会（UPWA）组织的，隶属于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简称"产联"）。虽然该工会的当地分会在院外活动方面不如黄金级人员的金属业公会那么有效，但它竭力推进就业改革的实际行动，甚至在1950年初当美国公共工程工人工会被"产联"开除并更迭了较温和的继任人以后，还在追求原来的大部分目标。况且，他们的事业还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1947年，巴拿马人被允许参加文职人员考试，同时，政府还通告强调运河区手中的劳工政策大权将被取消，交由常驻首都的一个部际委员会掌握。这是废除选派黄金级和白银级职务的第一个步骤。然后，运河区内的隔离主义将逐渐被消除，直至它成为自由的橱窗为止，而这种自由正是美国在美苏之间出现的冷战中声称要为之而斗争的。这一点，对于一个坚持保守观点、至今只对总统一人负责并为行之有效的后卫行动而奋斗的运河领导人来说，是一件极其讨厌的事。有争议的黄金级和白银级名称被废除了，而以不引人注目的"美国标准"和"本地标准"作为替代，实际上都是换汤不换药。然而，1951年旧的管理机构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接替，对于联邦政府的设想作出的反应则大大超过以前。成立该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平整运河的开支，要它停止支付给美国雇员25%的差别待遇并尽可能地代之以巴拿马雇员。第一项建议并未照办，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将造成大量解职并使运河完全停顿。第二项虽是可行的，但在运河区人员中仍然很不得人心。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巴拿马在1953年开始的条约谈判中提出实行基于美国标准的单一工资等级。这种工资等级将按1936年规定的外汇平价付酬。接受这一项毁灭性工资帐单将导致公司破产。

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将现行的两种等级首尾相衔接，形成一种外表上看来像是单一的工资等级。某一项具体工作采用何种标准，美国人与巴拿马人享受同等待遇，与其国籍无关。这既保留了美国人继续控制技术性职务（实际上原封未动），但也承认了同工同酬原则。鉴于过去 50 年一贯的不公正，这就华盛顿方面来说已是一个显著的让步。

1951 年运河管理机构的改组是时代正在开始变化的明显标志。源动力来自号称白宫财政看门狗的预算局。1947 年春季，两位预算局官员对运河区作了巡视调查返回后所作的报告说，它是其最高领导班子惰性和因循守旧而墨守陈规造成的“一座古代管理机构的博物馆”。以后，有一位国务院观察家说：“就这些绅士们的大多数人而言，早在 1908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社会进化已经停止了。”[①] 当总督未能自行整顿时，杜鲁门接受了预算局关于改组的蓝皮书。运河的管理现在分成两类，一半归巴拿马运河公司，负责航道的运营；另一半则是称为运河区政府的机构，负责市政管理职能。虽然仍设一名总督，但如今他只不过是从属于陆军部长的下级，当总督询问新秩序如何安排时，助理部长卡尔·本德森就明确无误地予以说明。

改组的关键是把运河放在企业根基之上，并且结束把取自通行税收益的大量经费用于对职工额外补贴的这种状态。1952 年初，会计总局要求普遍上调物价，使政府雇员多分担一些成本费用的百分比，以避免通行税上涨。此举触怒了总督。但其任期已届满，后继总督已经任命，并对他将大刀阔斧解决问题寄予厚望。约翰·西博尔德总督果然不负众望。随着许多服务行业采用商业价格和大大砍掉了为西印度群岛工人盖高价住房方案的费用，严重的分歧扩大了。这次创伤以后接踵而至的是在 1955 年 1 月的新条约中作出让步。运河区经历过一些激进的改革，但是，即使做

① 美国国家档案局，分类卷宗 59.8 I F. 43/9－1751。

梦也没有人会想到在本世纪第三个 25 年时将会丧失运河区。

第三代（1955—1979 年）

在与巴拿马缔结的 1955 年条约中，美国着重地重申了它对运河区拥有永久的主权。在 1977 年的条约（条约于 1979 年生效）中，它同意在 1999 年立即取消运河区并将运河本身移交给巴拿马。美国的运河政策中的这场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毫无疑问，这是 1956 年 7 月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首先开始的。巴拿马企图利用这次危机要求在运河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但被拒之门外。然而，埃及占有苏伊士的最后胜利，有助于掀起一场民族主义抗议运动，这是巴拿马过去从未有过的战斗性最强烈的抗议运动。1958 年 5 月，巴拿马学生把国旗竖立在运河区领土上以维护国家应有的主权。1959 年 11 月第二次入侵导致了与美国部队的愤怒的对抗，并爆发了骚乱。艾森豪威尔倾向于和解平息。1958 年其兄弟米尔顿劝他允许巴拿马国旗在运河区内飘扬，并向巴拿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1960 年 4 月援助方案得以实现，同年 9 月下达命令，允许一面巴拿马国旗在运河区内升起。

这两件事遭到国会强烈反对。众议员丹尼尔·弗勒德预言说，巴拿马国旗正式升起之日将标志着美国对运河统治权结束的开始。国会的这种偏激情绪无疑是对 1961—1963 年期间肯尼迪政府向巴拿马采取坚定态度的关键性影响。巴拿马现在想捞到的正是归还运河区，使之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并对与美国的一切现行条约作彻底的修改。据报导，国务院赞成妥协，但肯尼迪坚持要拖延，直到他得到一份使用热核手段开凿一条海平式运河的可行性报告为止。当 1963 年 8 月美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用氢弹炸开一条地峡航道的做法几乎完全被排除了，巴拿马人感到上了当。而禁试条约对海平式方案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并未向他们澄清，他们与华盛顿的关系立即恶化。

1964 年 1 月美国与巴拿马之间又爆发了最恶劣的危机，新条

约的进展从而停顿下来。这次事件是巴尔沃亚中学美国学生引发的。他们蔑视官方的指示，擅自在校外升起星条旗。几小时后，运河区边境和终端城市陷入一片骚乱，至少有 22 人死亡，其中有美国人三名，这一事件被视为运河史上的分水岭。

巴拿马政府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形势，要求对条约进行彻底修改，但林登·约翰逊总统因正在选举年，如果作出任何这类让步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杀。没有几个美国人想去听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劝告，他要求美国破除那种视 1903 年专约还有“某些道义上神圣不侵犯”的神话。也没有多少人接受陆军法律顾问约瑟夫·卡利法诺的意见，他认为，这次骚乱的根源在于运河人员富裕偏狭的生活方式与巴拿马突出的贫困形成的对比。紧张局势只有华盛顿准备作出某种基本的调整才能缓解，但华盛顿方面也只能等到约翰逊在 11 月竞选总统稳操胜券之后，才能公开表示愿意在某个确定的时间接受一项新条约。这项条约将承认巴拿马对运河区享有主权，并在条约期满时将该区域归还巴拿马。然而，放弃运河区的先决条件是完成海平式运河计划，此举则又为华盛顿在未来谈判中享有特殊的讨价还价力量恢复了活力。

巴拿马却又被华盛顿“三谈或不谈”的谈判策略进一步削弱了活力，这三谈是：坚持现行运河、海平式运河和美国基地是不可分割的三项协议，要么统统接受，要么统统否决。即使是这样，条约在 1967 年 6 月还是草签了。运河的运营和运河区的管辖权在 1999 年以前由双方共享，直到将移交巴拿马单方管理时为止．巴拿马还将从通行税中提取最高额达 2500 万美元的年租金。防务将大部由美国负责，但这一问题同样也有在某种程度上由双方负责的明文规定。美国对一条航道的选择权将保留 100 年。但是，这立即遭到了国会反对，其中突出的是来自保守派头子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于是卷宗被束之高阁直到 1968 年两国的大选以后。但在 1968 年年终时，奥马尔·托里霍斯军政府统治了巴拿马，并在 1970 年 9 月否决了就条约达成的协议。托里霍斯说，它过分

地拘泥于维持旧的现状，它在物质和法律方面给予巴拿马的条件都太差了。

如果托里霍斯相信他能够从理查德·尼克松那里捞得更多的话，他就想错了。1964 年尼克松曾说过，华盛顿可以在“令人不愉快的细小问题”上讨价还价，但是在美国控制的重大问题上是不能还价的。这里 1971 年 6 月重开谈判时他的发言人罗伯特·安德森所遵循的路线，这条路线在 6 个月前安德森制订的一份关于海平式方案的研究报告中已有预兆。条约的期限延长到 50 年，而且在一些地区由美国单独管辖直到期满为止。美国为了运河的目的还将继续拥有整个运河区 2/3 的地段，而巴拿马在运河管理和防务方面任何有意义的部分都被砍掉了。面对这种从 1967 年谈妥的条件令人吃惊地大步后退，托里霍斯于 1972 年 12 月中止了谈判是理所当然的。

华盛顿显然仍把巴拿马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1927 年一位巴拿马外交官曾以宿命论的观点对共和国的困境作过阐述：“当你以卵击石时，卵碎。换言之，当你以石击卵时，卵碎。美国，石也。巴拿马，卵也。不论何种情况，卵皆碎矣”。① 然而，到 70 年代初，巴拿马领导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了。1971 年 10 月，托里霍斯宣布说，如果巴拿马不能在谈判桌上达到它的目的，那么，“为了下一代人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生活，这一代人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托里霍斯心中的模式无疑就是北越，当时它正在为要求国家统一而把美国打得精疲力竭。但是，托里霍斯肯定知道，巴拿马并非北越，于是他转向了另一种选择来弥补它内在的虚弱。这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使之国际化。1973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城开会，就巴拿马要求缔结“一项正当和公平的条约”的解决办法而进行辩论，以满足巴拿马的合法愿望。当美国否决这项决议时，它处于只有一票的少数地位，而

---

① 《纽约时报》，1927 年 10 月 2 日。

巴拿马则赢得了世界大多数的舆论支持。

美国的反应则是放弃了它的极端的姿态而怒气冲冲地回到1967年草案制订的路线上来。这意味着国务院恢复了活力，它曾在第二阶段的讨论中被拒之门外；这也意味着五角大楼相应失势，它在第二个回合中所提出的不妥协要求曾产生过明显的影响。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是，1973年夏季由老练的外交家埃尔斯沃思·邦克接替安德森。邦克不仅接受了巴拿马外交部长胡安·安东尼奥·塔克拟订的谈判原则，而且从巴拿马的观点对它们作了补充、完善。巴拿马，正如1967年时谈妥的那样，在运河管理和防卫方面被赋予积极的任务。与此同时，海平式计划（一位前美国驻外大使认为这是军方主要用来制造混乱而加进谈判过程中的）则终于被抛弃。当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在1974年2月批准了邦克的工作后，通往缔结一项条约之路看来已经敞开。

但谈判都是在美国国内极右派愤怒的吵闹声中向前推进的。1975年春季当南越陷落后，据报道，五角大楼认为，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巴拿马问题上"如果经过考验并挺得住才能站起来"。瑟蒙德在参议院可以凑足35票通过一项决议，确认"美国对运河区拥有完整的主权"，以超过一票的多数而足以否决一项条约。1976年，雄心勃勃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被提名者罗纳德·里根（不过，当时还尚未被提名）以其简单的口号"我们买下了它，我们付了钱，它是我们的！"博得了热烈的喝采。必须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保住一份国家资产，而这份资产的价值只是象征性的，它远远超过了它目前的真实价值。在1972—1973财政年度，运河的一系列经营性亏损开始出现，总督承认，其产值不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据说，1974年运河诞生60周年之际，它已呈现出"技术老化"的症状。1957年，《纽约时报》国防问题记者汉森·鲍德温写道，它"在本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日子里所占有的同等重要的永久性战略地位，也许再也不具备了"。与军事机构更加有关的无疑就是如何保住在南方军区大量的

既得利益，但是，正如几位评论家（其中包括托里霍斯在内）指出的，那种细致的结构问题与运河的安全没有多少关系，因此不能以此来为 1903 年专约作辩护。

1973 年以后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所采取的路线，是以运河的负债越来越大为其前提的，而且，由于认识到如果与巴拿马交战，防御是极端困难的，从而加强了采取这一路线的决心。1977 年执政的卡特政府对这种防御上的脆弱性也有同感。吉米·卡特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曾目睹了 1964 年骚乱的反响，并相信“巴拿马迟早将采取重大暴力手段，甚至破坏运河也在所不惜”。陆军参谋长乔治·布朗将军说过，在全体居民敌对的情况下，即使派 10 万人驻守，也不能保证运河的安全；而且，当记者汤姆·威克谈到可能引起“连绵不断和无法取胜的游击战争”时，人们担心出现第二个越南的恐惧油然而生。这些情况也许是用以促进人们支持条约的有利战术措施，而托里霍斯当然并没有自动提出再保证，但是，华盛顿设想最坏的情况决不会发生，而会取得进展则是又过分乐观了。

卡特赶快抓紧同巴拿马达成协议，1977 年 9 月在华盛顿签订了两项条约。运河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巴拿马立即对运河区拥有完整的主权，巴拿马将逐步参加新的运营机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直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届时航道将交由巴拿马单独管理。在过渡期间，巴拿马每年将从通行税中获得约 5300 万美元，并获得 1000 万美元作为使用费和连同运河收入允许时另加 1000 万美元的一笔年金。运河抵御“武装袭击和其他军事行动”的防务将共同承担，由美国保持其主要责任，直到 1999 年为止。中立条约的条款规定，1999 年以后，只有巴拿马的部队将驻扎在该共和国境内的军事基地上，但美国仍将在未来无限期地对保持运河中立负有责任。此项保证适用于该国全境，据说其意图在于防止这一通道成为其他国家之间进行任何武装冲突的军事目标。

美国在中立条约中承担的任务几乎破坏了批准的机会。在签

约的仪式上（1977年9月7日——译者），托里霍斯警告说，该条约“如果未来的几代人不能审慎地实施，可能变成永久干涉的一种手段”。为了消除巴拿马的疑虑，卡特与托里霍斯共同在一项公开声明中宣布，美国的行动“决不针对巴拿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1978年初，当参议院就该条约进行辩论达到高潮之际，这项声明由参议院领袖罗伯特·伯德和霍华德·贝克建议作为一项实质性修正案予以通过。

然而，华盛顿仍然有人认为不干涉是否定美国权力的一种冒犯。当国会议员访问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有人提问，如果1999年以后，巴拿马说为了“维修”而关闭运河时，该怎么办？布热津斯基回答说，美国将“进去把巴拿马政府关闭进行维修”。为了拼命争取赢得参院2/3的多数票，卡特迎合了这种沙文主义的情况。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提议，该条约赋予美国采取它所选择的——甚至反对巴拿马——任何措施的权利，以便保持运河开放。虽然这种情况对于伯德—贝克修正案并没有约束力，但在巴拿马却被人看成是给了一张让美国充当永久性检查官的特许状。然而，这样总算拉到了德孔西尼的这一票，1978年3月16日，中立条约以令人战战兢兢的68票比32票勉强地被批准了，比2/3多数所需的票数只多了一票。运河条约在一个月后也以同样微弱的多数票勉强得到批准，与此同时按照伯德—贝克附文再次保证领导保留办法。

条约得到批准一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卡特政敌们的指责，说他是在卖国。当他1978年去巴拿马同托里霍斯互换条约批准书时，还遭到了几位美国同胞们的冷遇。这些失败者们甚至在1979年制订有关实施的立法时仍在某种程度上反扑得手。政府的提案在众议院被否决，卡特被迫接受一项巴拿马运河法，这大部分是由长期反对与巴拿马进行任何妥协的众议员约翰·墨菲亲自起草的。运河的运营机构并不是卡特原先想要的半官方公司法人，而是向五角大楼负责的并依靠国会拨款的一个委员会。在按条约向

巴拿马付款的管理方面则被加上了严格控制的种种条件，此外，又再一次向托里霍斯挑战，即授权总统与巴拿马谈判1999年以后美军继续留在运河区的事宜。1979年9月27日，当卡特签署巴拿马运河法时，他感到必须作出声明：他和他的继任人都不得以此作出违反条约条文及条约精神的任何事情。

四天后，即1979年10月1日，条约开始生效，运河区不复存在。当巴拿马收回曾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自己领地的这块领土时，美国社会陷入了沉重的失落感。"夕日已一去不返"，这是一位得不到安慰的运河人员的痛惜之辞。"特迪·罗斯福[①]被埋葬了"。[②]

1904年1月，就是这位特迪·罗斯福告诉国会："如果一个政府能够称得上受文明世界的付托，为了人类利益的需要去完成一项任务的话，就洋际运河而言，美国正处于这种地位。"1912年，受到罗斯福崇拜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上将曾经写道："巴拿马地峡，由于它可以开凿洋际运河的条件，过去是、现在仍是世界所关心的……尽管美国是一个强国，如果美国不能给予良好的管理和保护，它将会听到来自全世界的意见。"

然而，华盛顿占有运河75年的历史却正说明了这种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多么虚伪。美国对运河的政策是扎根在这条航道是与其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信念之上的，它尽可能地用一切手段排除外来干涉使之与世隔绝。对马汉及其追随者而言，美国单独控制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即门罗主义以及禁止亚洲移民，都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后期，当缔结一项多边协议以确保运河中立的主意出现时，马汉直截了当地拒绝考虑。在他看来，要求其他国家保证中立，就是"把我们自己置于一种保护国的地位"。罗斯福也以类似态度拒绝将运河防御问题提交海牙常

---

① 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是"西奥多"的昵称。——译者

② 《纽约时报》，1979年10月1日。

设仲裁法庭的建议。

一个特别能说明华盛顿对航道持民族主义态度的迹象可见1912年《巴拿马运河法》。该法规定，凡美国沿海航运业船舶均可豁免通行税。塔夫脱声称，美国享有“对运河绝对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其中包括以它认为合适的条件允许本国商业使用运河的权利”。

在1901年英美运河条约中，华盛顿曾经认可了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针对国际使用苏伊士运河而制定的规则，其第1条规则规定，对所有国家的船舶一律平等对待。华盛顿却对此置之不理，虽然前述豁免权在英国强烈抗议下已予以废除，但1914年7月正式通过的运河条例中仍然坚持通行是一项特许而不是权利。

英国既已达到目的，准备在取得帝国主义兄弟成员之一的美国承认英国对苏伊士拥有最高权力的默契下，接受美国对巴拿马的垄断。从而，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双方肩并肩地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对两条运河实行国际化的建议，而美国则对巴拿马欧赛维奥·莫拉莱斯提出的由国际联盟经营巴拿马运河和保证巴拿马独立的要求置之不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巴拿马寻求国际筹码以消除美国通过主宰运河对这个小国施加的强大影响所作的每一次努力，华盛顿一贯置若罔闻。1921年国务院认为国际联盟没有资格调解巴拿马与哥斯达黎加之间的边界纠纷，然后接着又阻止巴拿马将当时关于1903年专约规定美国主权范围的争论交付仲裁。1932年，参议院对一项美洲仲裁条约的重要内容作了删除，因为担心它可能使人对美国在运河区的主权产生怀疑。在1936年最终签订新约的谈判期间，巴拿马曾抱怨在几项关键性条款中没有仲裁的规定。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则答复说，诸如运河之类有关美国重大利益的问题，是不允许交付仲裁的。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过，就运河而言，美国是“受到全世界的委托的”。然而，对于富兰克林或者西奥多来说，其言论掩盖了某种十分不

同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在决定性地摆脱了过去孤立主义的情况下接受国际主义的。但就巴拿马运河而言，这种国际主义显然是极其有限的。韦尔斯 1942 年在参加商定战后计划的一个委员会上，敦促英国把新加坡的基地交由国际管理，但巴拿马运河区则不在此列。当国际劳工组织受理运河区就业歧视政策一案时，运河区总督对“审问超级大国”顽固地进行了抵制。当联合国把运河区作为一个属地向它询问情况时，运河区在国务院的盟友们与巴拿马共同要求联合国保证今后绝不重开此例。

然而，运河不可能同外界的发展相隔离，特别是战后英国与埃及之间在决定苏伊士运河命运发生冲突的影响，是避免不了的。当纳赛尔的革命政府于 1956 年 7 月将运河收归国有时，巴拿马在这两个事例之间作出的对比，使华盛顿十分尴尬。华盛顿借口它们之间在法律上的不同之点，为摆脱这一狼狈的困境找到了一条出路。杜勒斯国务卿宣称，苏伊士可以实行国际化，因为苏伊士是根据多边的君士坦丁堡公约管理的，而巴拿马的地位则是根据 1901 年和 1903 年的双边条约确定的。很久以前，在与英国就通行税问题争论时，年轻的杜勒斯曾辩解说，巴拿马航道“受到了国际使用的影响”。1956 年采取哪种方针，将在美国享有特权的问题上，使巴拿马很容易遭到正面的攻击。年老的杜勒斯并不打算那么做。固守了海·约翰和比诺—瓦里拉建立的堡垒。

苏伊士事件 5 年之后，肯尼迪政府甚至放空气说打算把未来的海平式运河交由美洲共管，毫无疑问，其先决条件仍然是在美国牢牢地监督之下。然而，在随后的 1964 年年初巴拿马危机爆发时，华盛顿又故态复萌，即尽量减少美洲国家组织卷入并完全排除联合国的干预。但是，巴拿马不可能停止把联合国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做法。当 1973 年安全理事会在巴拿马城举行会议时，以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票支持巴拿马的主张。此后美国愿意就达成一项比较和解的协议进行谈判的态度，也许至少是部分地出自于决心

将任何更进一步的国际干涉尽早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世界各国都提出了要遵循运河条约纳入仲裁条款和订立中立条约的意见。拉丁美洲各国首脑都被邀请亲临签字仪式。但1977年达成的协议仍严格地由当事双方之间商定，都是美国与巴拿马之间事前一致同意的。其核心是，美国在撤退以后长期监视地峡的规定，巴拿马自由的代价，依旧像1903年以后一样，是以永远效忠于美国为条件的。虽然在80年代后期曼努埃尔·诺列加将军对美国控制巴拿马事件的能力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毫无疑问，统治的决心仍然像过去一样的强烈（这在1989年12月最后推翻诺列加的行动上已经表明）。他们最热情的同党之一曾经写道，1977年的条约表明："我们想要放弃对西半球的家长制统治和霸权，使之成为历史遗迹的愿望是真诚的。"[①] 未来的世纪将在巴拿马和整个美洲，对此作出考验。

① 盖尔·麦吉：《巴拿马之后：运河条约辩论以后的某些教训和机会》，《南大西洋季刊》78（1979）：7。

书目评论

1. 墨西哥（约 1930—1940 年）

这个时期墨西哥历史最好指导丛书是由多位作者撰写的、墨西哥学院出版的多卷集《墨西哥革命史》，共 10 卷，时间跨度为 1928—1952 年这一段时期。头两卷由洛伦索·梅耶尔、拉斐尔·塞戈维亚和亚历杭德拉·拉霍斯三人合著，题为《体制化的开始》（墨西哥城，1979）和《最高首领统治时期的社会与政府的冲突》（墨西哥城，1978）；它们分别涉及到卡列斯最高首领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史。后继的四卷覆盖了卡德纳斯总统的执政时期，先后有：路易斯·冈萨雷斯著《卡德纳斯主义的创造者》（墨西哥城，1979），配置了背景情况；同一作者的《卡德纳斯总统时代》（墨西哥城，1979），巧妙地抓住了关键的历史事件和总统的性格这两个方面；阿莉西亚·埃尔南德斯·查韦斯著《卡德纳斯主义者的作用》（墨西哥城，1979），提供了准确的分析和独创性的研究；维多利亚·莱内尔著《社会主义的教育》（墨西哥城，1979），涉及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育政策。关于 40 年代的历史研究——一个极为困难而又相当缺少研究的 10 年——有路易斯·梅迪纳的开拓性著作《从卡德纳斯主义到阿维拉·卡马乔主义》（墨西哥城，1978）；布兰卡·托雷斯·拉米雷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墨西哥》（墨西哥城，1979）；路易斯·梅迪纳的《独裁主义的文官制与现代化》（墨西哥城，1979）；以及布兰卡·托雷斯·拉米雷斯的《走向工业化的理想主义》（墨西哥城，1984）。

然而，墨西哥学院丛书并没有提出关于卡德纳斯主义广泛的

说明。这些解释从以下著作中可能找到：费尔南多·贝尼特斯著《拉萨罗·卡德纳斯和墨西哥革命》第3卷《卡德纳斯主义》（墨西哥城，1978），本书的同情感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特斯维·梅丁著《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墨西哥城，1972），本书是一本扎实和匀称的分析著作；阿纳托利·舒利戈夫斯基著《墨西哥在其历史上的十字路口》是苏联编纂的一本不同寻常的好历史作品；以及诺拉·汉密尔顿著《国家自治的限度：革命后的墨西哥》（普林斯顿，1982），则把卡德纳斯主义置于一个容易理解的理论性位置上。对卡德纳斯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作不同解释的有：奥克塔维奥·兰尼著《卡德纳斯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墨西哥城，1977）；阿纳尔多·科尔多瓦著《卡德纳斯主义的群众政策》（墨西哥城，1974）；罗马纳·法尔孔著《卡德纳斯主义者土地改革的平均主义——对民众主义论点的一种修正》，载《墨西哥历史》27，第3期（1978）：第333—386页；利萨·诺思和戴维·雷比合著《革命与反革命的动力：在卡德纳斯统治下的墨西哥，1934—1940年》，载《拉丁美洲研究小组研究文集》（多伦多）2，第1期（1977年10月）。讨论关于卡德纳斯主义在广泛革命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的，有以下著作：唐纳德·霍奇斯和罗斯·甘迪合著《1910—1982年的墨西哥：改革或革命》（伦敦，1983）；胡安·费利佩·莱亚尔著《墨西哥国家，1915—1973年：对历史的诠释》，载《拉丁美洲展望》2，第2期（1975）第48—63页；以及艾伦·奈特著《墨西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只是一次"大叛乱"?》，载《拉丁美洲研究公报》4，第2期（1985）：第1—37页。

持更多的个人至上论观点的著作，有纳撒尼尔和西尔维亚·韦尔合著的《墨西哥的再征服：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年代》（伦敦，1939）和威廉·卡梅伦·汤森著《拉萨罗·卡德纳斯，墨西哥的民主主义者》（密执安州，安阿伯，1952），以上两本书是多少有些偶像化的传记；它们与维多利亚诺·安吉亚诺·埃基瓦所著批

判性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及其分封和国家政策》（墨西哥城，1951），恰成对照，它对后来的恩里克·克劳塞所著《传教士将军，拉萨罗·卡德纳斯》（墨西哥城，1987）有所影响。同这些分析性和判断性资料成为对比的著作，有约翰·W·F·杜勒斯著《墨西哥的昨天：革命编年史，1919—1936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1），此书为本世纪30年代早期提供了坦率而又详细的叙述。

关于土地问题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有艾尔·B·辛普森所著《村社：墨西哥的出路》（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37），这是一本最优秀的著作，简明扼要，但其分析截至1934年前后；内森·L·惠滕著《墨西哥农村》（芝加哥，1948）则包括整个时期。许多最杰出的地方性研究在土地改革方面（以及关于地方政治、权贵政治，和州与联邦的关系等方面）放出了光辉：达德利·安克森著《土地军阀，萨图尼诺·塞迪略和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墨西哥革命》（伊利诺斯州，迪卡尔布，1984）；雷蒙德·布维著《特拉斯卡拉的州长们和农民的动员》，载D·A·布雷丁编《墨西哥革命中的考迪罗和农民》（剑桥，1980）；安·L·克雷格著《第一批平均地权论者：墨西哥土地改革运动口述史》（伯克利，1983），本书叙述了上哈利斯科的情况；罗马纳·法尔孔著《革命与权贵政治，1910—1938年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墨西哥城，1984）；罗马纳·法尔孔和索莱达·加西亚·莫拉莱斯合著《在犁沟中的种子，在韦拉克鲁斯的阿达尔韦托·特赫达与激进主义》（墨西哥城，1986），希瑟·福勒·萨拉米尼著《1920—1938年在韦拉克鲁斯的平均地权激进主义》（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1）也抓住了这个主题；保罗·弗里德里克著《纳兰哈的王族：一篇人类学历史方法论文》（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6），它加深和丰富了作者早期对纳兰哈激进的米却肯村社的研究，即《在墨西哥一个村庄的农民叛乱》（芝加哥，1970）。路易斯·冈萨雷斯著《不安定的村镇：圣何塞德格拉西亚简史》（墨西哥城，1968；英译本，1974）的研究主题是地理上接近、但政治上远离的圣何塞德格拉西亚，这

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它对一个米却肯村社从征服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长期持续存留进行了研究。托马斯·马丁内斯·萨尔达纳和莱蒂西亚·甘达拉·门多萨合著的《墨西哥的政治与社会：哈利斯科高地专题研究》（墨西哥城，1976），其时间跨度从革命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析较多而比较枯燥。戴维·罗恩费尔特著《阿滕辛戈：一个墨西哥村社土地斗争的政治状况》（斯坦福，1973）描述了在同一时期普埃布拉土地方面的积极行动和政治活动；弗兰斯·J·施耶尔著《皮萨弗洛雷斯的牧场主：20世纪墨西哥的农民资产阶级史》（多伦多，1980），是一本对伊达尔戈高地很有见解的研究著作；阿图罗·沃曼著《……和矛盾的根源：莫雷洛斯的农民和该州》（墨西哥城，1976；英译本，1980），及吉列尔莫·德拉·培尼亚著《许诺的遗产：墨西哥莫雷洛斯高地的农业、政治和礼仪》（曼彻斯特，1982），分析革命后萨帕塔莫洛雷斯同乡们的经历。

对重大的拉古纳冲突和土地征用作了分析的有：克拉伦斯·西尼尔著《土地改革与民主》（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58）；乔·C·阿什比著《拉萨罗·卡德纳斯统治时期组织起来的劳工和墨西哥革命》（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63）；伊万·雷斯特雷波和萨洛蒙·埃克斯坦合著《墨西哥的农业集体化：拉古纳的经验》（墨西哥城，1975）；以及巴里·卡尔著《1920—1940年墨西哥共产党和拉古纳的农民动员：一种工人—农民联盟》，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62，第3期（1987）：第371—404页。费尔南多·贝尼特斯详述了拉古纳以外的集体村社的兴衰，书名为《基：一个村镇和一个工厂的戏剧性变化》（墨西哥城，1962），其中涉及了尤卡坦；谈论米却肯的有苏姗·洛兰茨著《新意大利的集体村社》（墨西哥城，1974）；以及罗恩费尔特著《阿滕辛戈》。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全国农民联合会：墨西哥土地改革中的一组压力》（墨西哥城，1968），谈到了正式的农民运动。

关于劳工运动的研究著作有：阿什比著《组织起来的劳工》；阿图罗·安吉亚诺著《国家与卡德纳斯主义的劳工政策》（墨西哥城，1975），这是一本对卡德纳斯主义的极左的评论；维克托·曼努埃尔·杜兰德著《国家的破裂：从1938年至1952年的墨西哥工人运动史》（墨西哥城，1986）；以及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编的很有价值的丛书《墨西哥历史中的工人阶级》，其中有关的各卷有：阿纳尔多·科尔多瓦著《一个危机的时代（1928—1934年）》（墨西哥城，1980）；萨穆埃尔·莱昂和伊格纳西奥·马万合著《卡德纳斯主义（1934—1940年）》（墨西哥城，1985）；以及豪尔赫·巴苏尔托著《阿维拉·卡马乔主义和阿莱曼主义（1940—1952年）》（墨西哥城，1984）。

洛伦索·梅耶尔著《墨西哥与美国的石油冲突（1917—1942年）》（墨西哥城，1968）最好地概括了石油工人运动和1938年的土地征用。E·戴维·克罗农著《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在墨西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60），分析了美国大使的重要作用，大使本人的回忆录名为《不拘礼节的外交官》（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47）。霍华德·克莱因著《美国与墨西哥》（纽约，1963）和卡尔·M·施米特著《1921—1973年的墨西哥与美国：冲突与共存》（纽约，1974）两本书提供了对美墨关系总的看法；而墨西哥的经济民族主义——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美墨几次争论的核心——则在艾伦·奈特著作中进行了讨论，其著作题为《1900—1940年革命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学》，载克里斯托弗·埃布尔和科林·M·刘易斯合编《拉丁美洲：经济帝国主义和国家》（伦敦，1985）。

关于在这个时期的左翼政治，见曼努埃尔·马克斯·富恩特斯和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阿劳霍合著《墨西哥共产党（1919—1943年共产国际期间）》（墨西哥城，1973）；卡尔·M·施米特著《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对其政治失败的研究》（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5）；以及阿图罗·安吉亚诺、瓜达卢佩·帕切科

和罗赫略·比斯凯诺合著《卡德纳斯与墨西哥的左派》(墨西哥城，1975)。罗伯特·保罗·米利翁著《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66)描述了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这位关键人物。关于官方党派的发展，首先是国民革命党而后是墨西哥革命党，见路易斯·哈维尔·加里多的详细研究著作《体制化革命的党：墨西哥新国家的形成(1928—1945年)》(墨西哥城，1986)。彼得·H·史密斯著《权力的纠纷：20世纪墨西哥的政治新手》(普林斯顿，1979)对政治精英们的资料进行了分析。

对教育也作了很好的研究，有：莱内尔著《社会主义的教育》；约翰·A·布里顿著《墨西哥的教育与激进主义》两卷集(墨西哥城，1976)；何塞菲娜·巴斯克斯·德·克瑙特著《3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载《墨西哥历史》杂志18卷第3期(1969，1—3)，第408—423页，以及戴维·L·雷比著《1921—1940年墨西哥的教育与社会革命》(墨西哥城，1974)。

关于反教权主义，见琼·梅耶尔著《基督徒，I，反对取缔教会派的斗争》(墨西哥城，1973)的最后一部分；并见卡洛斯·马丁内斯·阿萨德著《革命的实验室：加里多派的塔瓦斯科》(墨西哥城，1979)这一篇重要的专题研究著作。琼·梅耶尔著《辛纳基主义，墨西哥的法西斯主义?》(墨西哥城，1979)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复活的天主教极右派；在此以前，还有更具敌对性的分析，见惠滕著《农村墨西哥》第20章及马里奥·希尔著《辛纳基主义：其根源，其实质及其使命》(墨西哥城，1976)。休·G·坎贝尔著(1929—1949年墨西哥的极右派)(墨西哥城，1976)，既分析了天主教徒，又分析了世俗的极右派。T·G·鲍威尔著《墨西哥与西班牙内战》(阿尔伯克基，1981)论述了对外政策有争执的问题，而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政治问题方面。何塞·阿列尔·孔特雷拉斯著《墨西哥1940年：工业化与政治危机》(墨西哥城，1977)，以及艾伯特·L·迈克尔斯著《卡德纳斯主义的危机》，载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2（1970 年 5 月），第 51—79 页；以上一书和一文对进入有争议的 1940 年总统选举的这几股思潮作了论述。

詹姆斯·W·威尔基著《墨西哥革命：自 1910 年以来联邦政府的支出和社会变革》（伯克利，1970）一书以图表的形式说明了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期间政府政策和预算安排的广泛模式。关于对经济形势的进一步理解可见克拉克·W·雷诺兹著《墨西哥的经济：20 世纪的结构与增长》（纽黑文，1970）及莱奥波尔多·索利斯著《墨西哥的经济现实：回顾和前景》（墨西哥城，1970）。蒂莫西·金著《墨西哥：自 1940 年以来的工业化和贸易政策》（伦敦，1970）论述了贸易；论述采矿业的有马文·D·伯恩斯坦著《1890—1950 年墨西哥的采矿业》（纽约，1964）；论述农业的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著《1940—1970 年墨西哥的农业现代化》（墨西哥城，1978）和史蒂文·E·桑德森著《主张平均地权的民众主义与墨西哥国家：索诺拉的夺地斗争》（伯克利，1981），这两本书以专题研究与全面相结合分析了索诺拉州的情况；关于萧条时期刺激进口替代的进程，见恩里克·卡德纳斯著《大萧条与工业化：墨西哥实例》，载罗斯玛丽·索普主编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世界危机中外围的任务》（伦敦，1984），第 222—241 页。桑福德·A·莫斯克著《墨西哥的工业革命》（伯克利，1954）集中论述关于战争时期的工业化。

最后，从外国目击者的角度说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情况的，有格雷厄姆·格林著《违法的道路》（伦敦，1939），这是一本反对反教权的短论；弗兰克·L·克拉克洪著《墨西哥的挑战》（纽约，1939），这是一位新闻评论家针对卡德纳斯主义政策的作品；R·H·K·马雷特著《墨西哥见闻》（伦敦，1939），以及弗吉尼亚·普雷韦特著《关于墨西哥的新闻报道》（纽约，1941），这两本书的立场比较中立；此外，贝蒂·柯克著《遍及墨西哥战线》（俄克拉何马州，诺曼，1942），则强调了轴心国的威胁。诸如此类党派观念强的人士，往往并不可靠，他们至少也介

入了流行的政治和社会争论问题。反之，本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的目击者记事，却又往往是些平淡无味的旅行报告：说明墨西哥不再被视为讨厌的匪窟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巢穴，而更像是旅游者和畅饮龙舌兰酒的安乐窝。

2. 1946 年以来的墨西哥

尚没有一部有关 1946 年至今这一时期墨西哥广博的历史编纂学文献，其原因是，距离当今时间太近，而且也缺乏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并且也没有政治方面的或公开的回忆录等长年累月的传流，不过，这也许是目前正处于一个开始阶段的缘故。关于总况，见迈史尔·C·迈耶和威廉·L·舍曼合著《墨西哥历史进程》第 3 版（纽约，1987）。关于墨西哥政治方面诠释性的研究著作有：丹尼尔·利维和加布里埃尔·塞克利合著《墨西哥：稳定与变革的疑题》（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3；1987 再版）；G·罗伯托·纽厄尔和路易斯·鲁维奥·F·合著《墨西哥进退两难的困境：经济危机的政治根源》（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4）；以及罗德里克·A·坎普编《墨西哥的政治稳定性：以后 5 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6）；朱迪思·金特尔曼编《过渡时期的墨西哥政治》（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7）。较早的分析著述有何塞·路易斯·雷纳和理查德·S·韦纳特合编《墨西哥的独裁主义》（费城，1977），以及米格尔·巴萨内斯著《1968—1980 年墨西哥领导权的斗争》（墨西哥城，1981）。

关于墨西哥政治制度方面的范本，北美的有：罗伯特·E·斯科特著《过渡时期的墨西哥政府》（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58；第 2 版，1964）；弗兰克·R·勃兰登堡著《现代墨西哥的形成》（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4）；L·文森特·帕吉特著《墨西哥的政治制度》（波士顿，1966；修订版，1976）；以及肯尼思·F·约翰逊著《墨西哥的民主：评论》（波士顿，1971；第 3 版修订本，1984）。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有：雷蒙德·弗农著《墨

西哥发展的困境：私营和公营部门的作用》(剑桥，1963)，以及罗杰·D·汉森著《墨西哥发展的政策》(巴尔的摩，1971)。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著《墨西哥的民主》(纽约，1970)是一本有关诠释墨西哥政权的典范著作。关于政治精英的构成，见彼得·H·史密斯著《权力的纠纷：20世纪墨西哥的政治新手》(普林斯顿，1979)，以及罗德里克·A·坎普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墨西哥的领袖们：他们的教育和新手》(塔克森，1980)。戴维·罗恩费尔特著《现代墨西哥的军队：重新评价》(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4)，其中有我们知道得不多的关于当代军队的情况。罗德里克·A·坎普编《1935—1975年墨西哥政治传记》(塔克森，1976)，以及共和国总统府编《墨西哥政府传记辞典》(墨西哥城，1984)，为我们提供了基础研究的工具书。

关于总统继任的推测和分析，见罗德里克·A·坎普著《墨西哥总统候选人：未来的变化和预兆》，载《国体》杂志，16卷，第4期(1984)，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著《总统继承人》(墨西哥城，1975)，和弗朗西斯科·何塞·保利著《总统的更迭》(墨西哥城，1981)。关于选举，见阿图罗·阿尔瓦拉多编《墨西哥的选举模式和前景》(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7)，以及凯文·J·米德尔布鲁克、胡安·莫利纳尔·奥卡西塔斯和韦恩·A·科尼利厄斯合写的论文，载保罗·W·德雷克和爱德华多·席尔瓦合编《1980—1985年，拉丁美洲的选举与民主》(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6)。关于政治力量及其前景的广泛分析，见韦恩·A·科尼利厄斯、朱迪思·金特尔曼和彼得·H·史密斯合编《墨西哥未来的政治抉择》(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9)。

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0年这一时期的开拓性著作，在一套题为《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丛书中可以见到，这是由墨西哥学院的一个班子完成的。其中，1940—1952年，有路易斯·梅迪纳著《独裁的文官政府与现代化》(墨西哥城，1979)，1952—1960年，有奥尔加·佩利塞尔和何塞·路易斯·雷纳合著《政治

稳定性的加强》（墨西哥城，1978），以及奥尔加·佩利塞尔·德·布罗迪和埃斯特万·L·曼西利亚合著《同美国和睦与稳定发展的萌芽》（墨西哥城，1978）。有关这个时期的其他论述还有詹姆斯·W·威尔斯著《墨西哥革命：自1910年以来联邦政府的支出和社会变革》（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关于自洛佩斯·马特奥斯时代以来的诠释性专题研究，可见苏珊·考夫曼·珀塞尔著《墨西哥利润分成制决议：一个独裁政权的政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关于洛佩斯·波蒂略的6年，见加布利埃尔·塞克利著《1976—1982年墨西哥的石油经济政策》（墨西哥城，1983），和卡洛斯·特略著《银行国有化》（墨西哥城，1984）。关于德拉马德里任总统期间的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是总统编年史统一年刊，共和国总统府编《六年编年史。真理与实践：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政府》。约瑟夫·克拉夫特著《对墨西哥的救援》（纽约，1984）是一本论述1982年危机的令人信服的著作；宏观前景，见威廉·R·克莱因编《国际债务与世界经济稳定》（华盛顿特区，1983）。罗萨里奥·格林著《1973年至1988年墨西哥的外债：借贷的富裕与贫困》（墨西哥城，1989）是新近问世的一本重要论著。

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研究著作，有克拉克·W·雷诺兹著《墨西哥经济：20世纪的结构与增长》（纽黑文，1970）和他有名的诠释性文章《为什么墨西哥的"稳定发展"实际上却是不稳定（兼对未来作某些推论）》，载《世界发展》第6卷，第7—8期（1978年7—8月）；并参见莱奥波尔多·索利斯著《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专题研究》（纽约，1981）。关于外国投资，见贝尔纳多·塞普尔韦达和安东尼奥·丘马塞罗合著《在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墨西哥城，1973）；加里·格雷菲著《第三世界的制药业与依附性》（普林斯顿，1983）；道格拉斯·C·贝内特和肯尼思·E·夏普合著《跨国公司对国家：墨西哥汽车工业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1985）；以及哈利·谢肯和斯蒂芬·赫尔岑伯格合著《汽车和全球生产：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发动机

生产》(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7)。对墨西哥农业的概述，见古斯塔沃·埃斯特瓦著《墨西哥农村的斗争》(墨西哥城，1980)，保罗·拉马丁—耶茨著《墨西哥农业的困境》(塔克森，1981)，和苏珊·W·桑德森著《墨西哥的土地改革：1910—1980》(佛罗里达州，奥兰多，1984)。梅里李·塞里尔·格林德尔著《墨西哥的官僚、政客和农民：政府政策专题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77)，为埃切维里亚的"一体化"发展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关于洛佩斯·波蒂略政府的政策方面，见卡西奥·路易塞利·费尔南德斯著《墨西哥食品自给自足的路线：与美国食品制度的相互影响》(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5)和乔纳森·福克斯著《改革的政治动力：关于墨西哥食品制度的专题，1980—1982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1986)。关于官办的农民运动，见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全国农民联合会：墨西哥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压力集团》(墨西哥城，1968)。关于乡村中的政治倾向，见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著《政治参与、公共投资和对于制度的支持：对墨西哥农村社区的比较研究》(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2)。

以居住在贫民窟的移民政治面貌和经济状况作为专题的著作，有韦恩·A·科尼利厄斯著《墨西哥城的政治与移民贫困户》(斯坦福，1975)和苏珊·埃克斯坦著《贫穷的革命：墨西哥国家和城市贫民》(普林斯顿，1977)。有关组织起来的劳工方面的著作非常少，其中有凯文·杰伊·米德尔布鲁克著《墨西哥有组织劳工的政治经济学，1940—1978》(哈佛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2)，以及塞萨尔·萨苏埃塔和里卡多·德拉·培尼亚合著《劳工代表大会的结构。墨西哥的国家、劳工与资本：一个即将来临的主题》(墨西哥城，1984)。此外，在这个领域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作品作为补充，即伊恩·罗克斯伯勒著《墨西哥的工会与政治：关于汽车工业的专题》(剑桥，1984)。

唐纳德·J·马布里为大学校园政治提供了一篇概括性的历

史说明：《墨西哥大学与国家：学生冲突，1910—1971 年》（得克萨斯州，科利奇站，1982）。丹尼尔·C·利维在他所著《墨西哥的大学与政府：独裁制度下的自治权》（纽约，1980）一书中分析了当代的事件。关于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和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事件的令人信服的资料，见拉蒙·拉米雷斯著《墨西哥的学生运动：1968 年 7 月—12 月》，两卷集，（墨西哥城，1969），以及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著《特拉特洛尔科之夜》（墨西哥城，1971）。

论述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典范资料是马里奥·奥赫达的杰作《墨西哥对外政策的有效范围与局限性》（墨西哥城，1976）和《墨西哥：现行对外政策的涌现》（墨西哥城，1986）。关于同美国的关系，见何塞菲娜·佐拉伊达·巴斯克斯和洛伦索·迈耶合著《美国与墨西哥》（芝加哥，1986）；卡洛斯·巴斯克斯和曼努埃尔·加西亚—格里戈合编《墨西哥—美国关系：冲突与聚合》（洛杉矶，1983）；克拉克·雷诺兹和卡洛斯·特略合编《美国—墨西哥关系：社会与经济方面》（斯坦福，1983）；乔治·W·格雷森著《美国与墨西哥：势力的格局》（纽约，1984）。紧接着。在 1988 年总统继承时期前后出现的一股书籍热潮中，有罗伯特·A·帕斯特和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合著《友谊的限度：美国与墨西哥》（纽约，1988）；乔治·W·格雷森编《墨西哥的前景》（华盛顿特区，1988）；苏珊·考夫曼·珀塞尔编《墨西哥在过渡中：美国政策的含意》（纽约，1988）；以及双边委员会关于美国—墨西哥未来关系的报告《独立的挑战：墨西哥和美国》（马里兰州，拉纳姆，1988），并也作出努力，使罗萨里奥·格林和彼得·H·史密斯合编的《美国—墨西哥关系面面观》5 卷集（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1989）得以出版问世。

3. 1930 年以来的中美洲

1930 年以来，有着丰富的关于中美洲的文献。见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和马里亚·欧亨尼娅·加利亚多合著《中美洲

须知：书目概览》（圣何塞，1985），和肯尼思·格里布著《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美洲：书目注释》（波士顿，1988）。然而，对过去25年中所撰写的著作作一分析，关于中美洲总的情况或者自1979年以来就具体国家所撰写的著作而言，可以看出，有80%是西班牙语的作品。同样，就用英语撰写的著作而言，大体上来说，是一个文献上的“危机”。不过，不论在1979年以前或以后，所出版的重要著作都是了解中美洲历史的主要著作。

把中美洲地区做为一个整体并同时着眼于各国特点和地方特色来论述的著作不多。富兰克林·帕克著《中美洲各共和国》（伦敦，1964）中，有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体制方面的有用资料以及有关的分析，时间包括1960年以前这一时期。更全面和强调地区的同一性的，是拉尔夫·L·伍德沃德著《中美洲：被分割的国家》（第2版，纽约，1985），其中还包括了详尽的关于中美洲文学的精选作品指南。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撰写的两卷文集《中美洲：不发达与依附》（墨西哥城，1972）其重要性在于内有大量的资料。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对中美洲社会发展的说明》（圣何塞，1971），是对该地区作一个整体来论述的第一批著作之一；以及埃克托尔·佩雷斯·布里尼奥利著《中美洲简史》（马德里，1986），它们之所以也很重要是因为书中对整个地区作了解释性的建议。20世纪中美洲的最详细和全面的政治史是詹姆斯·邓克利著《地峡的权力：现代中美洲政治史》（伦敦，1988）。

其他的几本著作也有把中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的，但却集中于特殊的方面或特定的时期。鲁道夫·塞尔达斯·克鲁斯著《镰刀与砍刀》（圣何塞，1986）探讨了中美洲在第三国际的任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紧接着的余波，见托马斯·M·伦纳德著《1944—1949年的美国与中美洲》（亚拉巴马州，大学城，1984）；安德烈斯·奥帕索著《中美洲的土地结构、人口激增与资本主义发展》（圣何塞，1978）详细分析了农业和人口的变化。在

《叛乱的宗教根源：中美洲革命中的基督徒》（纽约，1984）一书中，菲利普·贝里曼解释了教会经历的变化和教士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有许多著作写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发展的政治危机问题，其中有三本特别明确地对此提出了分析性的主张：唐纳德·E·舒尔茨和道格拉斯·H·格雷厄姆合编的《中美洲与加勒比的革命与反革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4），是一本历史和理论文集；沃尔特·拉夫伯著《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纽约，1984），检验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莫里斯·布莱克曼等合著《面对革命：在中美洲以外交而求安全》（纽约，1986），是一本论述在中美洲危机中国际关系的论文集。

关于中美洲的经济，有几本书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是 SIECA（中美洲经济一体化秘书处）完成的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的成果，也就是以该计划为首的经济学家姓氏命名的所谓罗森塔尔报告：《本年代中美洲的一体化发展：关于共同市场改进和改组的基础与建议》（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这一报告共 13 卷，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有关该地区经济最全面的评论。由北美洲经济学家撰写的关于该地区前景的两本近著是，约翰·威克斯著《中美洲的经济》（纽约，1985），是一本集中于自 1950 年以来的总况论述；以及罗伯特·C·威廉斯著《中美洲的农业出口与危机》（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6），是一本有卓越见地和有扎实文件依据的著作，它论述了该地区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经济“繁荣”时所受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方面及生态方面由于中美洲采用棉花和牲畜的出口生产而受到的影响。W·A·德拉姆著《中美洲的匮乏与生存：足球战争的生态根源》（斯坦福，1979），是一本对萨尔瓦多人口问题的精确的定量分析和对所谓的 1969 年“无效的战争”的解释。理查德·法根编《过渡与发展：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纽约，1986），也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它集中了关于革命的尼加拉瓜经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分析，并从理论上讨论了关于在中美洲这个“外围”的社会主义变化的生存能力。

最后，应该提到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自1920年以来的中美洲政治经济学》（剑桥，1987），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迄今为止出版的论述中美洲的最好著作。它不仅概括了最近60年的经济史，而且是一本对该地区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精辟分析的书。

4. 1930年以来的危地马拉

理查德·N·亚当斯著《权力引起的折磨：关于危地马拉社会结构的论文集，1944—1966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0）一书，尽管内容有点陈旧且着眼点限于历史发展，但在20世纪论危地马拉的文献中仍占有中心地位。较新的一本论述该共和国历史的书籍是吉姆·汉迪著《魔鬼的礼物：危地马拉史》（多伦多，1984），文体通俗但富有学术性注释。切斯特·劳埃德·谅斯著《危地马拉的过去和现在》（明尼阿波利斯，1940）是一本引人人胜的研究著作，包括了截至30年代中期的历史时期。写以后20年的有马里奥·蒙特福特·托莱多著《危地马拉：社会学专论》（墨西哥城，1959），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统计资料，但论文则较为逊色，而卡洛斯·古斯曼—伯克勒和琼--洛普·赫伯特合著《危地马拉：社会历史说明》（墨西哥，1970）则几乎完全是客观的分析。阿方索·鲍尔·派斯著《在中美洲的美国佬资本是如何运转的：危地马拉专题》（墨西哥城，1956）和托马斯与马乔里·梅尔维尔合著《危地马拉：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纽约，1971）这两本书在体裁上和次要研究问题方面都是带有争论性的，但在20世纪社会和经济的这两大重要方面，其观点是确实具有说服力的。

世界银行编的《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51）和莱曼·B·弗莱彻等人著作《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农业的作用》（衣阿华州，艾姆斯，1970）对战后时期总的经济发展的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在许多著作中都论述了自耕农农业的复杂性，其中最有参考价值的，当维莱斯特·施密德著《危地马拉经济发展中移动劳工的作用》，威斯康星大学土地所有权中心研究论文（麦

迪逊，1967)；曼努埃尔·戈拉斯著《在一个二元经济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工和经济效率：危地马拉专题》，载《发展研究杂志》第8卷第4期（1972)；伊冯·勒博著《危地马拉西部高原的土地拥有状况》，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13期（1976)；托马斯·J·马洛尼著《危地马拉北方横断地带关于玛雅—凯克奇人发展的社会影响简介》，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29期（1981)，以及卡罗尔·A·史密斯著《从全球范围论地方史：危地马拉西部社会与经济的变化》，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26卷第2期（1984)。史密斯论城市部分的长篇文章《城市优先的发展》，载《中美洲》第8期（1984)，是继布赖恩·罗伯茨在这个领域的开拓性著作《正在组织起来的异乡人》(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3）之后的极少数研究著作之一，它更多地是从结构和历史的角度来论述。

从事人类学这一领域的广泛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把它放在历史方面，但在此学科内有些著作含有非常深邃的历史知识，并说明了当代社会—政治的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著《震撼地球的儿女们》(芝加哥，1959)；鲁思·邦泽尔著《奇奇卡斯特南戈。一个危地马拉乡村》(西雅图，1952)；里卡多·法利亚著《反抗的基切人》(危地马拉城，1979)；约翰·D·厄尔利著《1954—1969年在危地马拉人口中的马雅族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的变化比例》，载《美洲人种学家》季刊第2卷，第2期（1975)；保罗·迪尼尔著《圣安东尼的泪：危地马拉东部的宗教祭礼与革命》，载《拉丁美洲透视》第5卷，第3期（1978)；罗伯特·M·卡马克著《在危地马拉高地的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关系，1800—1944年》，载默多·J·麦克劳德和罗伯特·沃塞斯特罗姆合编《中美洲东南部的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种族关系史文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83)；《在危地马拉的死亡与骚乱》，载《文化生存季刊》第7卷，第1期特刊（1983)；以及《潘索斯：证据》（危地马拉城，1979)。一本有权威的但又很有争议的有关“印第安人问题”的历史概论收入塞韦罗·马丁内斯·佩莱斯撰写的《克里奥尔人的家

乡》(危地马拉城，1973)，另一本生动而又有权威的与此相称的自传式历史也许在伊丽莎白·布尔戈斯·德布雷编《我……里戈韦塔·门丘》(伦敦，1983)可以找到。这两本著作都被收入一部总的当代文集中，即卡罗尔·A·史密斯的《危地马拉革命前的印第安人阶级与阶级觉悟》，列为伍德罗·威尔逊拉丁美洲计划中心工作文件，第162期(华盛顿特区，1984)。经过整理、研究，正面论述全国权力、政治集团发展的著作就更加稀少了。除了那些把当代人物偶像化的传记以外，则有肯尼思·J·格里布著《危地马拉的考迪罗：豪尔赫·乌维科的政权》(俄亥俄州，阿森斯，1979)，它是论述20世纪30年代期间关于政治方面的唯一著作，并且仍然是有关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整理过的资料。戴维·麦克里里著《危地马拉农村的债役制，1876—1936年》，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第63卷，第4期(1983)，其最后一节对乌维科在一个重要地区所施政策的影响，提供了某些比较严谨的看法。汉迪著《魔鬼的礼品》中的有关章节，是对非常缺乏的、关于1944年到1954年期间改革方面综合评论的一个最好的补充。然而，在这段时期的某些方面可以作为补充的，还有罗纳德·M·施奈德著《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1944—1954年》(纽约，1958)；利奥·A·萨斯洛著《危地马拉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1944—1949年》(纽约，1950)；尼尔·皮尔逊著《危地马拉：1944—1954年的农民联盟运动》，载亨利·A·兰兹伯格编《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纽约州，伊萨卡，1969)；以及罗伯特·沃塞斯特罗姆著《危地马拉的革命：在阿本斯政府统治下的农民与政治，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17卷，第4期(1975年)；路易斯·卡多萨—阿拉贡著《危地马拉的革命》(危地马拉城，1955)；曼努埃尔·加利奇著《为危地马拉而斗争。阿雷瓦洛与阿本斯。反对帝国主义的两个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关于1954年的外部干涉和反革命事件受到人们高度的关注，但是，论述那次危机事件的第一流的研究著作却十分重视其各种程度不断变化着的本国国内背景：见

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尔合著《苦果：美国在危地马拉策动政变的没有透露过的历史》(纽约，1982)；理查德·H·伊梅尔曼著《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进行干涉的对外政策》(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2)；何塞·M·艾瓦尔·德索托著《依附与干涉：1954年危地马拉专题研究》(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78)。胡利奥·阿道弗·雷伊著《革命与解放：关于危地马拉形势的最新文献的评论》，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第38卷，第2期(1958年)，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到了有关干涉及其背景的危地马拉和美国的文献。

从1954年起，危地马拉政府大多听命于军方，而且抵制详细的专题性论述。关于选举进程的不同观点，可见肯尼思·F·约翰逊著《1966年3月16日的危地马拉总统选举：分析》(华盛顿特区，比较政治研究所，1967)和约翰·W·斯隆著《选举骗局和社会变革：危地马拉例证》，载《科学与社会》第34卷，第3期(1970)。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危地马拉：被占领的国家》(纽约，1969)一书持有争议的、亲游击队的看法，而里卡多·拉米雷斯著《危地马拉前线来信》(巴黎，1970)以及奥尔兰多·费尔南德斯著《图西奥斯·利马》(哈瓦那，1968)则提供了来自游击队内部的观点，但戴维A·克雷恩著《危地马拉的革命者们及1966—1968年哈瓦那的思想攻势》(载《美洲研究季刊》第17卷，第2期，1975年)一书中的分析却未采取同情他们的态度。马里奥·帕耶拉斯著《在丛林里的日子：一个危地马拉游击队员的证词，1972—1976年》(纽约，1983)是一本知道内情的人的记事，描绘了第二代起义者崭露头角抵抗军方的许多详细情况，而迈克尔·麦克林托克著《美国的联系：危地马拉的国家恐怖与民众抵抗》(伦敦，1958)一书中则极少寄予同情。乔治·布莱克著《危地马拉的卫戍部队》(伦敦，1984)这本关于当代政治争论性问题的研究著作对双方都有论述，此书较新，但作者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够严肃也不太感兴趣，在这方面不如罗杰·普兰特著

《危地马拉：非自然的灾难》（伦敦，1978），而乔纳森·弗里德等人编的《在反叛中的危地马拉：未完结的历史》（纽约，1983）一书则提供了更广泛的各种资料，后者与前两本书都有激进的论调。

5. 1930年以来的萨尔瓦多

1980年以来虽然增加了相当多的研究著作——大部分还是第二手的性质，但关于20世纪萨尔瓦多的学术性文献仍然很少。有两本论述总况的英文版书籍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它们是在因政治发展而促进了书籍出版的“新浪潮”以前撰写的，这两本书是：戴维·布朗宁著《萨尔瓦多：景观与社会》（牛津，1971）和阿拉斯泰尔·怀特著《萨尔瓦多》（伦敦，1973），前者采取从叙述主要地理特征入手的途径论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后者则以更多的篇幅致力于历史和政治方面。马里奥·弗洛雷斯·马卡尔著《萨尔瓦多统治方式的起源、发展与危机》（圣何塞，1983）和拉斐尔·吉多斯·贝哈尔著《萨尔瓦多军国主义的增强》（圣何塞，1982）对政治史提出了总的看法，而拉斐尔·门希瓦尔的下列著作则把政治更紧密地联系到政治经济的发展上：《发展主义的危机：萨尔瓦多专题研究》（圣何塞，1977）；《萨尔瓦多：更小的环节》（圣何塞，1981）；以及《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斗争》（圣何塞，1982）。门希瓦尔还为《今日中美洲》（墨西哥城，1976）撰写了一章，该书是把有关国家置于一个地区结构内的一部重要的比较论文集。W·H·德拉姆著《中美洲的匮乏与生存：足球战争的生态学根源》（斯坦福，1979）也采用一种比较的观点，把该国农村的生存经济与洪都拉斯的相对比；爱德华多·科林德雷斯著《萨尔瓦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圣何塞，1977）是一种对比，为作者的许多关于地主阶级和现代咖啡和棉花部门方向问题的文章提供了基本资料。其他有用的经济概览有：T·J·唐宁著《萨尔瓦多农业的现代化》（剑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不定期论文，1978），以及赫克托·达达著《萨尔瓦多的经济与社会一体

化，1954—1960 年》（圣何塞，1983）。

塞贡多·蒙特斯著《干亲关系：萨尔瓦多的权力结构》（圣萨尔瓦多，1979）和卡洛斯·卡瓦鲁斯著《革命的起因》（墨西哥城，1983），是关于社会结构的珍贵著述，它首先集中论述了印第安人社会方面，其次又集中论述了该国北方和当代农民叛乱的根源。从农民的角度透视 1932 年起义的研究著作仍然是不够充足的，但有关总的根源和起义的政治进程在托马斯·P·安德森的著作中却有较详细的论述，见《马坦萨：1932 年萨尔瓦多共产党人的起义》（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71）。罗克·多尔顿著《米格尔·马莫尔》（纽约，1987）是一本杰出的阐述 20 世纪头 40 年激进分子的传记著作。豪尔赫·阿里亚斯·戈麦斯著《法拉本多·马蒂》（圣何塞，1972）是一本记述 1932 年起义的共产党领袖很有分寸的传记，但为马丁内斯将军写的传记尚缺。不过，有关马丁内斯政府方面的著述有：肯尼思·J·格里布著《美国与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的发迹》，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第 3 卷，第 2 期（1970）；埃弗雷特·威尔逊著《萨尔瓦多国家一体化的危机，1919—1935 年》（斯坦福，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0）和罗伯特·E·伊拉姆著《诉诸武力：萨尔瓦多的军队与政治，1931—1964 年》（新墨西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68），后者仍是现代军事史最好的资料。从概括的角度叙述 1969 年同洪都拉斯战争的，有托马斯·P·安德森著《被剥夺者的战争：1969 年的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81），以及放在社会—经济结构框架内来论述的有：马科·卡里亚斯和丹尼尔·斯卢茨基合编《无益的战争》（圣何塞，1971）和文森特·凯布尔著《“足球战争”与中美洲共同市场》，载《国际事务》第 45 期（1969）。关于现代政党的资料很少，仅有的专论是斯蒂芬·韦伯撰写的《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与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1960—1978 年》（巴吞鲁日，1979），该书写于杜阿尔特任总统以前，但在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治生活方面是珍贵的材料。反

映这个10年期间某些民主进步前程的一篇优秀的、正统派政治学的范文是罗纳德·H·麦克唐纳著《萨尔瓦多的选举行为与政治发展》，该文载《政治学杂志》第31卷，第2期（1969）。

尽管当代许多书籍通常都持有一种论战的语气，但论述关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题材的资料却更加范围广泛并往往包括了以前时期有用的和原始的资料。拉丁美洲局编《在罗梅罗将军统治下的萨尔瓦多》(伦敦，1979)，包含了对1977年到1979年军人政权的详细分析；詹姆斯·布罗克曼著《遗言：奥斯卡·罗梅罗的一生》(纽约，1982）为这位在总统官里反对他的同姓氏总统的大主教撰写传记也提供了该国基督教会生活的有趣的概况。詹妮·皮尔斯著《想望的土地：在萨尔瓦多查拉特南戈的农民叛乱》(伦敦，1985）发展了卡瓦鲁斯文章的一些主题，而且也是一本包含着口述证言的正在扩大的政策讨论会的书籍之一。迈克尔·麦克林托克著《美国的联系：萨尔瓦多的国家恐怖与民众抵抗》(伦敦，1985）仍然不同情美国的政策，但提供了关于军事和准军事性兵力方面相当详细的情报，而莫顿·霍尔珀林编《关于萨尔瓦多人权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82）则是详细列举其活动成效的新作品中最明白的例证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关于政治发展总况的研究著作有：恩里克·巴洛伊拉著《过渡中的萨尔瓦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2)；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和珍妮特·申克合著《萨尔瓦多：革命的局面》（伦敦，1982)；詹姆斯·邓克利著《长期战争：萨尔瓦多的独裁与革命》第2版(伦敦，1985)；汤米·休·蒙哥马利著《萨尔瓦多的革命：起源与发展》（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2)。托马斯·格拉编《流血的十月》(圣何塞，1980）和德莫特·基奥著《自由党人政变的神话：美国与萨尔瓦多1979年10月15日的政变》(载《太平盛世》第13卷，第2期，1984)，集中论述了1979年重要的最后几个月。马里奥·梅嫩德斯著《萨尔瓦多：对内战的真实写照》(圣何塞，1980）是一篇党派性极浓，但生动描绘游击战的论

著。阿道弗·吉利著《萨尔瓦多的战争与政治》（墨西哥城，1981)是从左的方面阐述冲突第一阶段富有启示性的政治文集。另外，雷蒙德·邦纳著《虚弱与欺骗：美国政策与萨尔瓦多》(纽约，1985）是从一位记者的角度观察以后几年的详细论述，也是一本强烈抨击美国政策的论著。

6. 1930年以来的洪都拉斯

1930年以来的这个时期，缺乏优秀的论述洪都拉斯总况的著作和专论，反映了洪都拉斯社会和经济的落后。只是最近洪都拉斯才成为国际上的注意点，它的地位开始起了变化，虽然近期关于洪都拉斯的几本著作还称不上是学术性的著述。

比较令人满意的有关洪都拉斯总况的研究著作之一，是马里奥·波萨斯和拉斐尔·德尔·钖德合著《1870—1979年洪都拉斯政府部门与国家的结构》（特古西加尔巴，1981)，该书内容范围比其命题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其时间跨度直到1972年为止，而且特别在说明方面则更加着力。论述洪都拉斯的英文版的范本是威廉·S·斯托克斯著《洪都拉斯：一篇关于政府的地区研究》(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50)，该书对洪都拉斯直到卡里亚斯执政结束时都有非常详细的描绘，但经济资料偏弱。詹姆斯·莫里斯著《洪都拉斯：考迪罗政治与军人统治》(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4)，试图拾起斯托克斯遗漏的情节，但洞察力不及斯托克斯，而且偏于记述性。霍华德·布卢特斯坦等人编《洪都拉斯地区手册》（华盛顿特区，1970)，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就事论事的情报资料，但不失为一本介绍洪都拉斯的扎实的书，仍很有价值。

20世纪任何有关洪都拉斯的历史书籍都不能忽视果品公司。论述更早期的一本有丰富资料的书籍是查尔斯·凯普纳和杰伊·苏西尔合著《香蕉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专题研研究》（纽约，1935)。一位有资历的传记作者托马斯·卡恩斯所著《热带企业》（巴吞鲁日，1978）论述了标准果品和轮船公司，但关于联合果品

公司尚无一本令人满意的专著；斯泰西·梅和加洛·普拉索合著《在拉丁美洲的联合果品公司》（纽约，1958）是一本歌功颂德的著述。然而，有一篇关于洪都拉斯香蕉业从其起源即开始论述的优秀研究作品：V·

奥·冈萨雷斯著《1932年萨尔瓦多的起义与1954年洪都拉斯的大罢工》，载《墨西哥社会学评论》（1978年4月）。关于洪都拉斯劳工运动的其他有价值的著作有维克托·梅萨著《洪都拉斯工人运动史》（特古西加尔巴，1980）和马里奥·波萨斯著《洪都拉斯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工会组织》（特古西加尔巴，1980）。还有一本关于20世纪70年代有趣的选集是维克托·梅萨的《洪都拉斯工人运动史选集》（特古西加尔巴，1980）。

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总统执政时开始的社会改革在一些著作中都有论述。有一本比列达·莫拉莱斯的优秀的传记，其中详细论述了他的社会计划，该书由斯特法尼亚·纳塔利尼·德卡斯特罗、马里亚·德·洛斯·安赫莱斯·门多萨·萨沃里奥和华金·帕甘·索洛萨诺合著:《拉蒙·比列达·莫拉莱斯博士政府的知名史》（特古西加尔巴，1985）。R·罗夫莱达著《大庄园、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载《政治经济》（1982年1月），其中对土地改革作了有益的论述。这本杂志是由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出版的，它从多方面促进了有关20世纪洪都拉斯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写作。最近的一篇有关土地改革的研究著述，将土改史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查尔斯·布罗克特著《洪都拉斯的国家政策、农民与农村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1（1987）。

托马斯·安德森著《被剥夺者的战争》（内布拉斯加州，林肯，1981）一书全面论述了1969年与萨尔瓦多的战争。另一本研究著作是詹姆斯·罗尔斯著《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冲突》（圣何塞，1980），它则更多地集中于这一争端的国际法方面。然而，最令人满意的仍是威廉·德拉姆关于战争的生态学根源的著述:《中美洲的匮乏与生存》（斯坦福，1979）。这是恰当地把注意力放在洪都拉斯由于地理状况和人口压力而造成的缺乏土地问题上的第一本著作。它终于排除了洪都拉斯是一个土地过剩国家的这种概念。还有一本令人感兴趣的论文集是马科·卡里亚斯和丹尼尔·斯卢茨

基合编《无益的战争：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冲突的社会经济分析》(圣何塞，1971)。

有几本关于洪都拉斯近10年经济发展的著作。《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未来》(危地马拉城，1983) 一书对洪都拉斯脱离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原因作了启发性的论述。丹尼尔·斯卢茨基著《洪都拉斯的肉食业农工综合企业》，载《政治经济》(1977年7月)，是一篇详细研究牛肉业兴起的好文章。关于洪都拉斯的工业化，见拉菲尔·德尔·钖德著《洪都拉斯：工业化、就业与劳动力开发》，载《政治经济》第13期 (1977)。本杰明·比利亚努埃瓦著《体制革新与经济发展，洪都拉斯：专题研究》(威斯康星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68) 是一本论述洪都拉斯经济总的看法的著作。奇怪的是，至今尚无一本主要论述洪都拉斯咖啡方面的著作。

关于洪都拉斯的军队体制没有几本杰出的著作。较早的杰作是史蒂夫·罗普著《洪都拉斯国家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洪都拉斯军队》，载《美洲月刊》30 (1974年4月)。罗普与詹姆斯·莫里斯力图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式来解释洪都拉斯的发展，但结果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合作主义与依附性发展：洪都拉斯专题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2 (1977年夏)。关于洪都拉斯教会体制的著述也不多，不过有几本描述关于教会内部人士政治卷入日益增长的书。例如，见詹姆斯·瓜达卢佩·卡内神文著《做一个革命者》(旧金山，1987)，作者系天主教教士，被害于洪都拉斯东部，该书是他死后出版的一本自传。

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洪都拉斯日益增长的政治卷入和洪都拉斯所受的地区性危机影响的书大量出版，但良莠不齐。较好的著作之一是马克·罗森堡和菲利普·谢波德合编《洪都拉斯正视它的未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6)，该书是由一些第一流的洪都拉斯学者撰写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集。对最近时期作出具有洞察力的论述见吉列尔莫·莫利纳·乔卡诺著《洪都拉斯：近年来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和唐纳多·卡

斯蒂略·里瓦斯著《中美洲——危机最大的地方》(墨西哥城，1983)。最后，值得注意的一本书是洪都拉斯一位记者高塔马·丰塞卡撰写的反映关于洪都拉斯政治制度的一些文章:《关于洪都拉斯政治现实的四篇论文》(特古西加尔巴，1982)。

7. 1930年以来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的编史工作不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是极不平衡的。尽管对独立以来的历史尚无令人满意的综合性论著，但尼加拉瓜历史上某些事件极大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特别值得提出的有：19世纪的开凿洋际运河的建议；20世纪前30多年里美国的占领；桑地诺事件；以及最近的桑地诺主义革命。

自1979年索摩查王朝崩溃以来，国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尼加拉瓜，于是产生对全面历史编纂工作的要求，这是一个过去被人疏忽的地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卷集的《尼加拉瓜全国书目提要，1800—1978年》，由拉丁美洲书志学基金会编(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兰兹，1986—1987)，收有20多万个条目。一部规模较小但有用的书目提要是克利奥出版社系列：小拉尔夫·李·伍德沃德编《尼加拉瓜》(牛津和圣巴巴拉，1983)。1979年以后的时期，每年的出版物迅速增加，以致任何书目都竟相迅速出版以免过时。然而，汉斯·阿尔博格为革命的头5年编纂了一本有用的著作：《尼加拉瓜发展进程》(哥本哈根，发展研究中心，1984)。

关于美国占领尼加拉瓜(1933年占领结束)的一些好的著作中，最好的是威廉·坎曼著《寻求稳定：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外交，1925—1933年》(印第安纳州，诺特丹，1968)，尽管本书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1926年海军陆战队返回尼加拉瓜以后这段期间。罗斯科·希尔著《对尼加拉瓜的财政干涉》(纽约，1933)是一本涉及美国干涉的非军事方面的杰出著作。虽枯燥但很全面的关于干涉年代的论述，见国务院编《美国与尼加拉瓜：从1909年到

1932年的关系概况》(华盛顿特区，1932)。美国记者哈罗德·丹尼撰写的《美元代替枪弹：美国在尼加拉瓜的统治史》(纽约，1929)是一本较有兴趣的论著。1980年这本书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再版是理所当然的。

桑地诺事件产生了两次出版浪潮。第一次是同时代的人撰写的，最后是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出版的《真正的桑地诺，关于塞哥维亚的耶稣遇难处》(马那瓜，1936)。第二次浪潮从尼加拉瓜革命开始，并以马那瓜桑地诺主义研究所为先锋。在这两个时期，关于桑地诺和桑地诺主义的作品，苦于缺少学术上的超脱性。有幸的是，有少数关于桑地诺的著作是在两次浪潮之间创作的，是从这些事件引起重视到详细研究的典范；这些著述有尼尔·麦考利著《桑地诺事件》(芝加哥，1967)和格雷戈里奥·塞尔塞著《桑地诺：自由人的将军》两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尽管后者有时多少是不加批判的。还应该提到的是唐纳德·霍奇斯著《尼加拉瓜革命的知识分子基础》(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6)，虽然，霍奇斯想在创造桑地诺作为一个坚定的和独创性的政治思想家这一点上，并没有实现他的野心，但他确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在桑地诺事件的展开影响知识分子思潮方面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另一本最杰出的书把注意力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方面，即鲁道夫·塞尔达斯·克鲁斯著《镰刀与砍刀》(圣何塞，1986)，本书一方面把焦点放在共产国际在桑地诺事件对整个中美洲所起的作用方面，同时又对当时的尼加拉瓜进行了大量研究。

有许多有关索摩查王朝时代尼加拉瓜历史的综合著述，其中包括理查德·米利特著《王朝统治的保卫者》(纽约，1977)，本书主要论述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形成的国民警卫队，但附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尼加拉瓜社会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伯纳德·迪德里希著《索摩查》(伦敦，1982)和爱德华多·克劳利著《独裁者们从未死亡》(伦敦，1979)，这两本书主要集中论述索摩查家

族，但对于总的政治背景也作了有益的论述。克拉丽贝尔·阿莱格里亚·和D·J·弗拉科尔合著《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革命：1955—1979年政治编年史》(墨西哥城，1982)，是一篇论述桑地诺1934年遭暗杀以后桑地诺主义运动再起的好著作；然而，尽管篇名如此，但关于桑地诺死以前时期的情况几乎没有谈到。另一本集中论述桑地诺主义复活的有益的书，是乌戈·坎西诺·特龙科索著《桑地诺主义者运动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尼加拉瓜国家与人民革命的背景，1927—1979年》(欧登塞大学出版社，1984)。最后，温贝托·奥尔特加的《桑地诺主义者斗争的50年》(载1976年出版的《尼加拉瓜的某些地方》)，介绍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论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桑地诺主义者的斗争是如何与最早期的桑地诺事件相联系的，应予以关注。

自海梅·惠洛克有影响的《帝国主义与独裁制度：社会构成的危机》(墨西哥城，1975)一书出版以来，尼加拉瓜经济史引起人们兴趣的程度与日俱增。海梅·比德曼著《阶级结构，国家与尼加拉瓜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2)，是一部侧重论述20世纪40年代以后棉花业兴起的杰出研究著作。可以提供的早期著作仍然很多，其中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华盛顿特区，1953)；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纽约，1966)；以及路易斯·坎塔雷罗著《尼加拉瓜的经济发展，1920—1947年》(衣阿华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48)。

在索摩查王朝统治时期的劳工运动被疏忽了多年，近来得到了一些重视。论述20世纪40年代这方面的一篇好的研究作品，是杰弗里·古尔德著《“为了组织起来的尼加拉瓜”：索摩查和劳工运动，1944—1948年》，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卷第2期(1987)。卡洛斯·佩雷斯·贝穆德斯和奥诺弗雷·格瓦拉合著《尼加拉瓜的工人运动》(马那瓜，1985)，是一本较为综合性的著作。这本有争议的著作设法为在索摩查统治时期的尼加拉瓜社会

主义党的作用进行辩护，但在劳工运动史的许多方面不失为一本独一无二的情报资料。

导致索摩查垮台的尼加拉瓜革命，使许多书籍和文章随之产生，其中最好的有：约翰·布思著《终与始：尼加拉瓜革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2）和乔治·布莱克著《人民的胜利：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革命》（伦敦，1981）。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自己对导致其垮台的事件的看法《尼加拉瓜的被出卖》（波士顿，1980）对他与卡特政府的关系作了很局限、但生动的描述。同一问题在罗伯特·帕斯特著《应受谴责的重蹈覆辙：美国与尼加拉瓜》（普林斯顿，1987）一书中得到了论述，作者以他在卡特总统任期内担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专家这一次要角色在处理两国关系上所犯错误，勇敢地作了探索。

自革命以来的时期，写尼加拉瓜的著作激增。这些书大部分是倾向于同情革命的，但达不到学术上的最高标准；例如：托马斯·沃克编《尼加拉瓜：第一个5年》（纽约，1985）；卡洛斯·维拉斯著《桑地诺主义革命》（纽约，1986）；以及理查德·哈里斯和卡洛斯·维拉斯合编《尼加拉瓜：在包围之中的革命》（伦敦，1985）。戴维·克洛斯著《尼加拉瓜：政治、经济与社会》（伦敦，1988）是一本很少表明自己观点、但对革命时期仍抱同情感的论述。对革命时期持批判态度的著作是由那些没有门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逃亡者或外国人撰写的，其中较好的范本是哈维尔·萨瓦拉等著《尼加拉瓜》（圣何塞，1985）。

在桑地诺主义政权统治下经济的发展，包括土地改革在内，已开始受到关注。这一领域里许多最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编写了一本好的样本，即罗斯·斯波尔丁编《革命尼加拉瓜的政治经济学》（波士顿，1987）。关于农业的专著有福里斯特·科尔伯恩著《革命后的尼加拉瓜：国家阶级与农业政策的困境》（伯克利，1986），不过，这本研究著作的论点随后因尼加拉瓜土地改革的变化而被推翻了。关于土地改革，有许多文章作了研究，其中有I·

卢西亚克著《国家的统一与人民的霸权：桑地诺主义者的土地改革辩证法，1979—1986年》，载《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1987）；以及卡门·黛安娜·迪尔、彼得·马凯蒂和诺拉·莱因哈特合著《农民与桑地诺主义者土地政策的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20（1985）。

关于桑地诺主义派的对外政策和美国—尼加拉瓜冲突的大量资料，在玛丽·范德兰著《尼加拉瓜的革命与对外政策》（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6）一书中有所论述。由于教会统治集团与桑地诺主义派政府之间的冲突和“人民”教会的发展，尼加拉瓜的天主教会近年来受到人们很大的重视。反映这两个方面问题的一部全面的研究著述是劳拉·奥肖内西和路易斯·塞拉合著《尼加拉瓜的教会与革命》（俄亥俄州，阿森斯，1986）。与其类似的另一本著作是罗萨·马里亚·波切特和阿韦利诺·马丁内斯合著《教会：诡计还是预言?》（圣何塞，1987）。

关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克雷格·多齐尔著《尼加拉瓜的莫斯基托海岸：英国和美国所经历的年代》（亚拉巴马州，伯明翰，1986），尽管对最近时期仅仅提供了一个梗概，但对19世纪该海岸的情况却作了极好的论述。然而，人们将寄予希望的是，新的大西洋沿岸研究与文献中心已开始承担收集尼加拉瓜有关文件资料的艰巨任务，它将激发对该地区的研究。尼加拉瓜《战斗》杂志的一本特刊，1985年曾致力于大西洋沿岸的论述，涉及了过去与现在的情况，见《大西洋沿岸：过去与现在》，载《战斗》（1985年4—9月）。

8. 1930年以来的哥斯达黎加

一本关于哥斯达黎加的开创性综合论著是塞缪尔·斯通著《征服者的朝代》（圣何塞，1975），它从各个角度研究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采用同样宽广的途径作了杰出研究的，还有由卡罗琳·霍尔撰写的《咖啡与哥斯达黎加历史—地理的发展》（圣何塞，

1976）和《哥斯达黎加：从历史角度对地理问题的说明》（圣何塞，1984）。其他综合解释性的概览有：何塞·J·维加著《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权力与民主》（圣何塞，1982）和《秩序与进步：哥斯达黎加民族国家的形成》（圣何塞，1975）；卡洛斯·梅伦德斯较旧的著作《哥斯达黎加：该国与众不同的各种问题的演变》（圣何塞，1953）；威尔伯格·希门尼斯著《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形成，1821—1981年》（圣何塞，1986），该书集中论述了政府的问题；以及切斯特·塞拉亚编《当代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79）这本引起争论的论文集。民族解放党的观点反映在以下书籍中：卡洛斯·蒙赫著《哥斯达黎加史》（圣何塞，1962）；欧亨尼奥·罗德里格斯著《哥斯达黎加社会学札记》（圣何塞，1953）和乌戈·纳瓦罗著《48年的一代：关于哥斯达黎加民主的历史性衡量》（墨西哥城，1957）等。雷纳尔多·卡坎奥洛著《哥斯达黎加资本主义的发展》（圣何塞，1981）是一本按照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著述。

关于社会集团和劳动力发展的研究著作有：洛厄尔·古德芒德森著《政治性和不富足的庄园主：瓜纳卡斯特式的畜牧业和庄园制，1800年—1950年》（圣何塞，1983）；米切尔·塞利森著《哥斯达黎加的农民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0）；罗杰·丘尔恩赛德著《哥斯达黎加劳动力的形成（圣何塞，1985）。雷蒙多·桑托斯和莉莉亚娜·埃雷拉合著《手工业工人式的制造业工人》（圣何塞，1979）一书，持强烈的工团主义者的观点，但内含有益的资料。其他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有维克托·H·阿库尼亚著《哥斯达黎加中、小咖啡生产者的思想》和阿方索·冈萨雷斯著《关于中、小咖啡园主的官方论述（1920—1940年，1951—1961年）》，载《历史评论》（埃雷迪亚，国立大学，第16期[1987]）；以及曼努埃尔·罗哈斯著《哥斯达黎加的工人运动》，载P·冈萨雷斯·卡萨诺瓦编《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史》（墨西哥城，1984）。由奥斯卡·阿里亚斯撰写的两卷集《哥斯达黎加

的压力集团》（圣何塞，1971）和《哥斯达黎加的政府是谁?》（圣何塞，1977）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论述了该国 有关社会和政治权力性质的辩论。有许多研究著作从不同的经济部门分析了精英们的作用。关于养牛业牧场主，见伊雷内·阿吉拉尔和曼努埃尔·索利斯合著《哥斯达黎加的牧场主精英》（圣何塞，1988)。关于制糖业，见迈拉·阿奇奥和安娜·C·埃斯卡兰特合著《哥斯达黎加的糖与政治》（圣何塞，1985)。关于香蕉业，见切斯特·劳埃德·琼斯著《哥斯达黎加与加勒比的文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35)，本书的背景材料仍然是有益的；弗兰克·埃利斯著《中美洲的香蕉跨国公司》（圣何塞，1983）一书包括了比较近期的情况，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论述的；以及杰弗里·凯西·加斯帕尔著《利蒙：1880—1941。哥斯达黎加香蕉业研究》（圣何塞，1979)，为读者提供了一篇杰出的专题研究。

土地占有问题，在战后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有其论著：《哥斯达黎加：土地使用和分配的特征》（圣何塞，1972)；这方面的论述还有马里奥·费尔南德斯著《哥斯达黎加资本的动力、土地占有结构的发展和农村的地形》（载《中美洲研究评论》第36期，1983）和埃德尔韦托·托雷斯·里瓦斯著《哥斯达黎加土地结构特征的种种因素》（载《研究发展》，哥斯达黎加大学社会研究学院，圣何塞，1978)。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危机的开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任务成为与日俱增的辩论主题。鲁道夫·塞尔达斯提供了一部早期的稿件：《受国家干预的国营企业家。对哥斯达黎加的研究笔记》，载《中美洲研究年鉴》第5卷（1979)，和《国家政治危机：根源与前景》，阿曼多·巴尔加斯编《哥斯达黎加的民主危机》（圣何塞，1981)。以国家政治经济的现代发展为主题的其他著作有：安娜·索霍著《国营企业家与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斗争》（圣何塞，1984)；迈莱纳·维加著《1974年至1978年的哥斯达黎加国家状况。自治工会联合会与工业界》（圣何塞，1982)；埃利奥·法利亚斯著《哥斯达

黎加的经济危机》(圣何塞，1980)；以及胡安·M·比利亚苏索编《生产部门：危机与前景》(圣何塞，1984)。对于这个主题持自由派观点的代表作有：维克托·H·塞斯佩德斯、阿尔韦托·迪马雷和罗努尔弗·希门尼斯合著《哥斯达黎加：复苏缺乏活力》(圣何塞，1985)，以及中美洲学院的出版物，诸如《80年代，10年中的经济问题》(圣何塞，1982)和《哥斯达黎加：没有增长的稳定》(圣何塞，1984)。

关于政治思想演变的总况概览有两本书特别突出，即康斯坦丁诺·拉斯卡里斯著《哥斯达黎加哲学思想的发展》(圣何塞，1983)和路易斯·巴拉奥纳著《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思想》(圣何塞，1977)。那些对1948年内战后统治国家政治的"48年一代人"的哲学影响特别感兴趣的人还应该参考罗伯托·布雷内斯著《政治》(圣何塞，1942)一书。

关于现代历史的文献极其不平衡，它们集中在某几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后期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然而，有几本有价值的研究著作认为，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对其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庄严堂皇"时代的一位主要政治人物作出评价的，有一本杰出的著作，即欧亨尼奥·罗德里克斯著《里卡多·希门尼斯·奥雷亚穆诺：他的思想》(圣何塞，1980)，华金·巴尔加斯·科托著《唐里卡多时代和他一生的编年史》(圣何塞，1986)对前一本书作了有益的补充。玛里娜·博略著《豪尔赫·博略与改革党》(圣何塞，1972)和米格尔·阿库尼亚著《豪尔赫·博略，民众的演说家》(圣何塞，1972)对20世纪20年代主要反对党人物的事业和思想(其影响在随后的几十年仍然十分显著)作了充分的论述。论述这段时期的综合性较强的概况有克莱托·冈萨雷斯著《与哥斯达黎加选举制度有关的历史和立法》(圣何塞，1978)和托马斯·索利著《哥斯达黎加经济史》(圣何塞，1949)。理查德·索尔兹伯里著《哥斯达黎加与地峡，1900—1934年》(圣何塞，1984)是一本论述国际关系的著作。

弗拉基米尔·德拉克鲁斯著《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斗争(1870—1930年)》(圣何塞,1983)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具有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劳工运动发展作了论述。

安娜·马里亚·博泰伊和鲁道夫·西斯内罗斯合著《1929年的危机与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的建立》(圣何塞,1984),把共产党的诞生放在该党社会—经济所处的条件下论述其来龙去脉,而鲁道夫·塞尔达斯著《镰刀与砍刀。在拉丁美洲的共产国际与中美洲的革命》(圣何塞,1986)则从外部影响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该党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活动为了解该党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来源,见希尔韦托·卡尔沃和弗朗西斯科·苏尼加合编《曼努埃尔·莫拉:谈话(1934—1979年)》(圣何塞,1980);阿诺尔多·费雷托著《党员的活动》(圣何塞,1984);以及马里洛斯·阿吉拉尔著《卡洛斯·路易斯·法利亚斯:他的时代及其斗争》(圣何塞,1983)。

关于莱昂·科尔特斯政府(1936—1940年)的研究著述很少,其中之一是特奥多雷·A·克里德曼著《莱昂·科尔特斯及其时代》,载《哥斯达黎加地理与历史学会年鉴(1967—1969)》。卡洛斯·卡尔沃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哥斯达黎加(1939—1945年)》(圣何塞,1985)提供了一本有关战争年代广博的著述,以及哈科沃·希夫特尔著《冲突的联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美国与哥斯达黎加的关系》(圣何塞,1986)一书对冷战前与美国的关系作了某些详细论述。后者的另一本著作《哥斯达黎加内战的隐蔽阶段》(圣何塞,1981)提供了1948年内战期间该国国内的发展状况。

内战及其根源是广泛的文献主题。奥斯卡·阿吉拉尔著《哥斯达黎加及其1948年的政治事实:10年的问题》(圣何塞,1969)一书中包括了一些很有用的文件和访问记,吉列尔莫·比列加斯著《1948年的证明材料》(圣何塞,1977)也是如此。同一作者的《另一个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圣何塞,1985)提供了关

于战败的军队领导人的重要内幕，其另一篇文章《卡尔德隆派》（圣何塞，1986）研究了紧接战争余殃的一起重要事件。阿尔韦托·卡尼亚斯著《八年间》（圣何塞，1955）是从胜利的反叛者们的观点来论述的。他们的领导人何塞·菲格雷斯著《48年的精神》（圣何塞，1987）仍是一篇经典著作。罗伯托·费尔南德斯著《怠工》（圣何塞，1953）对冲突前夕的政治气氛作了很好的描绘。人民先锋党的《哥斯达黎加的民主是如何与为什么丧失的》（危地马拉城，1948）论述了共产党的看法，以及曼努埃尔·莫拉著《捍卫人民先锋党的两篇论文》（圣何塞，1959）也是如此。以后，曼努埃尔·罗哈斯著《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斗争与内战》（圣何塞，1980）和赫拉尔多·孔特雷拉斯与何塞·曼努埃尔·塞尔达斯合著《40个年头：一个政治联盟的历史》（圣何塞，1988）用同样的政治观点作了较为老练的说明。恩里克·吉那著《赦免特奥多罗·皮卡多与比森特·乌尔库约先生的辩护词》（圣何塞，1950）如皮卡多本人著《墨西哥大使馆协约及其毁约》（马那瓜，日期不详）都为皮卡多政权的失败记录而辩护。罗森多·阿奎略著《他们同我们一样背叛》（墨西哥城，1954）一书对菲格雷斯没有用自己的信誉担保加勒比军团作了另一次抨击。约翰·帕特里克·贝尔著《哥斯达黎加的危机：1948年的革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1）仍旧是关于内战及其直接背景情况的最好资料。

对在20世纪40年代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维克托·萨纳夫里亚大主教的研究著作有：里卡多·布兰科著《萨纳夫里亚阁下》（圣何塞，1962）；圣地亚哥·阿列塔著《萨纳夫里亚阁下的社会—政治思想》（圣何塞，1977）；以及詹姆斯·贝克著《哥斯达黎加的教会与工团主义》（圣何塞，1978）。除了前述的比列加斯以外，以拉斐尔·卡尔德隆·瓜尔迪亚为主题的研究著作还有不少。最有用的有：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著《卡尔德隆·瓜尔迪亚：领袖与考迪罗》（圣何塞，1939）；由马里奥·伊达尔戈汇编的《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博士：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改革家》

(圣何塞，1983)；以及豪尔赫·M·萨拉萨尔著《卡尔德隆·瓜尔迪亚》(圣何塞，1985)。关于菲格雷斯的文献比较广泛，并且不乏歌功颂德或不加批判的作品，诸如乌戈·纳瓦罗著《在哥斯达黎加发展中的何塞·菲格雷斯》(墨西哥城，1953)；阿图罗·卡斯特罗著《何塞·菲格雷斯：其人其事。人物传记文》(圣何塞，1955)；以及查尔斯·阿梅林格尔著《花花公子先生：哥斯达黎加政治人物菲格雷斯传记》(阿尔伯克基，1978)。一本有用的书志是亨利·坎特编《何塞·菲格雷斯书目提要》(亚利桑那州，坦佩，1972)；同一作者的《1953年的哥斯达黎加选举：专题研究》(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58)对研究菲格雷斯在国家政策上所起作用的学者们也是有价值的。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观点描述1949年国民议会的有鲁尔·埃尔南德斯著《立法自此始：1949年宪法的辩论》(圣何塞，1975)，对宪法本身作出分析的一本杰出的著作是奥斯卡·阿吉拉尔著《1949年的政治宪法：前因与影响》(圣何塞，1975)。对宪法问题更广泛的研究，见埃尔南·G·佩拉尔塔著《哥斯达黎加的宪法》(马德里，1962)和豪尔赫·萨恩斯著《哥斯达黎加鼓舞人心的宪法》(圣何塞，1985)。关于在这段期间实行银行国有化内容最充分的概览是鲁菲诺·希尔著《银行国有化》(圣何塞，1962)，同一作者的《哥斯达黎加150年的银行史》(圣何塞，1974)还为此作了补充。关于内战后奥蒂略·乌拉特政府的，有何塞·路易斯·托雷斯著《奥蒂略·乌拉特：其政党及其斗争》(圣何塞，1986)，本书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乌拉特本人的著作，被收集在《政治道德的一盏明灯》(圣何塞，1976)中，是有用的补充。关于这段期间更进一步的资料可能从两本综合著作的有关章节搜集到：华金·加罗著《20年简史：哥斯达黎加历史注释》(圣何塞，1967)；以及豪尔赫·罗维拉著《哥斯达黎加的国家与政治经济学，1948—1970年》(圣何塞，1983)。

关于马里奥·埃昌迪总统任期内的情况仍有待历史评说。然

而，某些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从马里亚·甘博亚编《埃昌迪总统的否决：其理由及辩解：1958—1962 年》（圣何塞，1962）和马克·罗森堡著《为哥斯达黎加的社会安定而斗争》（圣何塞，1980）中可以得到。关于特雷霍斯·费尔南德斯政府的文献也同样稀少，但在何塞·J·特雷霍斯的《哥斯达黎加政治的 8 个年头》（圣何塞，1973）中可以找到重要的文件，而且，从奥斯卡·阿吉拉尔著《哥斯达黎加的民主与政党（1950—1960 年）》（圣何塞，1977）和豪尔赫·罗梅罗著《政党、权力与法律》（圣何塞，1968）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用的内幕情况。

与此相比，民族解放党的历史资料在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该党的背景，见卡洛斯·阿拉亚著《哥斯达黎加政党史：民族解放》（圣何塞，1968），尽管作者持有党派性的立场，但本书提供了最有用的分析。《哥斯达黎加人的思想：一项全国性民意测验结果》（圣何塞，1943）是早期年代的一项关键的纲领性声明，随后发展的重要文件编人了下列两本选集：阿方索·卡罗编《社会民主思想。选集》（圣何塞，1986）和卡洛斯·何塞·古铁雷斯编《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思想：社会民主》（圣何塞，1986），后一本书的内容更为广泛和系统。民族解放党的领导者们自己也撰写了不少重要的著作。丹尼尔·奥达伯著《民族解放党的创始：历史发展注释》（圣何塞，1985），对了解该党的起源是非常有用的，而菲格雷斯的文章则为民族解放党的思想和前景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致一位公民的信》（圣何塞，1956）；《我注定要做的事》（圣何塞，1957）；《最近 10 年》（圣何塞，1958）；《国家的贫困》（圣何塞，1973），以上几本书大体上是这位前总统的代表作，但应指出的是，他的见解在党内并不总是得到一致同意的。此外，要了解后来形成民族解放党的思潮在早期所持的观点，不能不参考罗德里戈·法西奥的著作，特别是他所著《哥斯达黎加经济研究》（圣何塞，1942），《社会保障中心》（圣何塞，1943）和《哥斯达黎加的货币与中央银行》（墨西哥城，1947）。对该党持独立

见解的论述，见伯特·H·英格利希著《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自由：在一个过渡社会中一个政党的发展》(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71)和詹姆斯·L·布西著《论哥斯达黎加民主的笔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2)。苏姗·约纳斯·博登海梅尔著《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民主思想》(圣何塞，1984)是一篇批判性的分析论文。关于选举的分析是论述哥斯达黎加政治的文献的重要特点。又有资料又有说明的最好的著作有爱德华多·奥科尼特里略著《哥斯达黎加一个世纪的政治》(圣何塞，1981)和威尔伯格·希门尼斯著《对一次民主选举的分析》(圣何塞，1971)。这个领域的其他著作有奥尔达·M·阿库尼亚和卡洛斯·F·登顿合著《总统选举：哥斯达黎加 1982》(圣何塞，1984)；马里奥·桑切斯著《哥斯达黎加选举的社会基础(1974—1978年)》(圣何塞，1985)；以及C·格拉纳多斯和A·乌尔松合著《区域组织与哥斯达黎加的选举结果，1953—1982年》，载《中美洲社会研究》第36期(1983)。

介绍战后经济概况的有卡洛斯·阿拉亚著《哥斯达黎加经济史、1950—1970年》(圣何塞，1975)，对此，最近期间豪尔赫·罗维拉著《80年代的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987)一书作了补充。对战后时期工业化的特点作出研究的，有莱昂纳多·加尼耶和费尔南多·埃雷罗著《哥斯达黎加工业的发展》(埃雷迪亚，1982)，以及加尼耶著《哥斯达黎加的工业、国家与发展：前景与建议》，载《中美洲研究杂志》第37期(1984)。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专科学校对于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重要的经济发展出版了若干论著，其总的题目是：《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发展：哥斯达黎加经济的对外部分的研究》(圣何塞，1958)；《工业部分的研究》(1959)，和《公营部分的研究》(圣何塞，1962)。从一个北美人的角度来分析该国紧接着战后的那段期间的经济状况，参见斯泰西·梅编《哥斯达黎加。经济发展研究》(纽约，1952)。关于现代对发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可以从鲁道夫·塞尔达

斯著《哥斯达黎加自由民主的危机》（圣何塞，1972）和塞尔希奥·鲁本著《哥斯达黎加的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圣何塞，1982）前后两书中分别找到。

9. 古巴　约1930—1959年

关于古巴从马查多时期到革命的这段期间里有价值的篇章在以下这些综合研究著作中可以找到：休·托马斯著《古巴，对自由的追求》（纽约，1971）；海梅·苏奇里基著《古巴：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纽约，1974）；豪尔赫·多明格斯著《古巴：秩序与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8）；小路易斯·A·佩雷斯著《古巴：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纽约，1988）。并参见拉蒙·路易斯著《古巴：一场革命的形成》（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1968）。最近期间在古巴出版的较好的综合性历史概览有：胡利奥·E大师著《古巴史》（哈瓦那，1973）；革命武装部队部编纂的《古巴军事史》（哈瓦那，无日期）。由拉米罗·格拉—桑切斯主编、多人合著的《古巴民族史》（哈瓦那，1952），是一部完整的古巴历史。埃梅特里奥·S·桑托韦尼亚和劳尔·谢尔顿合著的三卷集《古巴及其历史》第3版（迈阿密，1966）和何塞·杜阿尔特·奥罗佩萨著的五卷集《古巴历史学》（1969—1970，出版地点不详）也都有用。哈瓦那大学的古巴研究组主持出版的两卷集《新殖民地的共和国》（哈瓦那，1975—1979）涉及到各个不同专业主题，其中包括劳工、经济史、军队以及ABC〔古巴的革命运动组织〕。怀亚特·麦加菲和克利福德·R·巴尼特合著《20世纪的古巴》（纽约，1965）是一本非常宝贵的参考著作，包括无数关于该岛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资料。美利坚大学国外地区研究中心按卷出版的《古巴，国家研究》第2版（华盛顿特区，1985）也采用了与前者类似的格局。另一本有用的参考书，特别是以它丰富的统计资料见长，是何塞·阿尔瓦雷斯·迪亚斯等著《关于古巴的研究》（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1965）。可以

得到的最有用的统计汇编是苏珊·施罗德著《古巴：历史统计手册》(波士顿，1982)。

路易斯·E·阿吉拉尔著《1933年古巴：革命的序幕》(纽约州，伊萨卡，1972)，是对马查多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暴动保持了最有条理和态度谨慎的描述之一；此类描述见小路易斯·A·佩雷斯著《隶属于普拉特修正案的古巴，1902—1934年》(匹兹堡，1986)。关于1933年事变的最完整的著作，其中还包括对20世纪20年代的广泛论述，是利昂内尔·索托的《33年的革命》(哈瓦那，1977)。把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视为黯然无光的杰出著述是何塞·A·塔瓦雷斯·德尔·雷亚尔著《30年的革命：其最后的两年》第3版(哈瓦那，1975)。仍然相当有价值的是对1933年事变某些较老的论述：理卡多·亚当—席尔瓦著《大谎言：1933年9月4日》(哈瓦那，1947)；M·佛朗哥·巴罗纳著《9月4日的革命》(哈瓦那，1934)；以及阿尔韦托·拉马尔·施韦尔著《马查多总统是怎么回事》(马德里，1941)。拉蒙德·莱斯利·比尔等著《新古巴的问题》(纽约，1935)实质上涉及到古巴全国、各省和市政生活的各个领域，仍是古巴30年代期间一本划时代的研究著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古巴报告》(巴尔的摩，1951)在观点和范畴方面与该研究著作也相类似。这两本书是这一时期作为参考而不可缺少的研究著作。朱尔斯·R·本杰明著《美国与古巴：霸权主义与依附性发展，1880—1930年》(匹兹堡，1977)是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作出总结性研究的一本杰出的专著。塞缪尔·法伯著《古巴的革命与反革命，1933—1960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1976)是一本论述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这段时期的杰出研究著作。恩里克·维涅和吉列尔莫·阿隆索合著《古巴腐败的政治与政府，1944—1952年》(哈瓦那，1952)是真正党执政时代的一部有文献根据的历史著作。关于这个时期也有一本有用的传记，即路易斯·孔特·阿圭罗著《爱德华多·奇瓦斯：古巴的首领》(墨西哥城，1955)。然而，总

的来说，20 世纪 40 年 代这 10 年的大部分情况都被疏忽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关于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斗争的文献却是大量的。绝大部分的专题文献专门论述武装斗争的政治—军事方面。有一些用英语撰写的比较好的论著，其中包括：拉蒙·博纳切亚和玛尔塔·圣马丁合著《古巴的暴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74）；赫伯特·L·马修斯著《古巴的革命》（纽约，1975）；罗伯特·泰伯著《七·二六运动，一场革命的历史》（纽约，1961）；以及C·弗雷德·贾德森著《古巴叛军的政治教育，1953—1963 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4）。鲁比·哈特·菲利普斯著《古巴：矛盾的岛屿》（纽约，1959）是一位新闻记者论述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之间情况的一本好书。约翰·多施纳和罗伯托·法夫里西奥合著《十二月的风暴》（纽约，1980）是对革命斗争最后一个月作了最详尽和最生动地集中论述的著作之一。罗兰多·E·博纳切亚和内尔松·P·巴尔德斯合著《革命斗争，1947—1958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2）一书中提供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何塞·巴尔韦托著《现实与群众化：关于古巴革命的思考》（加拉加斯，1964）是论述 20 世纪 50 年代的比较全面的著作之一。何塞·苏亚雷斯·努涅斯著《重大的过错》（加拉加斯，1963）以及何塞·A·塔瓦雷斯·德尔·雷亚尔著《对古巴革命诠译的论文》（拉巴斯，1960）也都是有用的。

针对关键的这几十年时期，最近的许多学术著作集中在古巴史的专题方面。也许没有比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外交史方面的文献更为丰富的了。欧文·格尔曼著《巴蒂斯塔与罗斯福：古巴的睦邻外交，1933—1945》（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73）考察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其观点以美国的观点为主，并主要以美国档案资料为基础。罗伯特·F·史密斯著《美国与古巴：商业与外交，1917—1960 年》（纽黑文，1960）是一篇以美古关系经济方面为主要焦点的有条不紊和具有思想性的研究著作。较近期的研究著作

有莫里斯·H·莫利著《帝国与革命：美国与古巴，1952—1986》(剑桥，1986)。

其他方面的专著有劳里·纳尔逊著《农村古巴》(明尼阿波利斯，1950)，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研究著作，其观点摆脱了所有论古巴农村生活的研究结果。安特罗·雷加拉多·法尔孔著《古巴的农民斗争》(哈瓦那，1973)是一本论农民的有用的研究著作。小路易斯·A·佩雷斯著《古巴的军队政治，1898—1958》(匹兹堡，1975)论述了古巴政治中军队的出现。有关古巴经济史的最有用的著作中有胡利奥·E大师著《共和国：依附与革命》(哈瓦那，1966)和《古巴经济史》(哈瓦那，1971)。有用的还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著《古巴：资本主义依附与不发达(1510—1959年)》(哈瓦那，1972)，以及奥斯卡·皮诺·桑托斯的两本著作《古巴向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进攻》(哈瓦那，1973)和《古巴经济中的北美帝国主义》(哈瓦那，1973)。海梅·苏奇利克基著《古巴的大学生与革命，1920—1968年》(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1969)研究了在国家政治中学生的作用，涅尔卡·佩雷斯·罗哈斯著《1934年至1940年的大学生运动》(哈瓦那，1975)也是如此。一本涉及到20世纪30年代学生激进派更专的著作是拉迪斯劳·冈萨雷斯·卡瓦哈尔著《左翼学生及其时代》(哈瓦那，1974)。琼·斯塔布斯著《外围的烟草》(伦敦，1985)是一本关于烟草业及其工人的著作。

10. 1959年以来的古巴

对1959年以后古巴的研究有一些不利因素，这是因为国内的学者都集中研究1959年以前的情况，而1959年以后的时期外来者前去实地研究的人很少并且困难重重。第二手的文献则严重地依靠三种资料来源：古巴政府出版的出版物，在系统观察和研究上水平各不相同的前去古巴进行学术性和其他访问的访问者的印象，以及对古巴流亡者的研究。然而，就三者的最后一种方式而

言，焦点大多放在流亡者如何归附美国上面而不是放在了解古巴本身的系统的情况资料上面。研究当代古巴的主要学术性杂志是自1970年以来由匹兹堡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卡梅洛·梅萨—拉戈主编的《古巴研究》。该杂志在1985年以前每年出版两期，以后每年1期，它主要刊载由社会科学学者撰写的以论1959年以后的古巴为主题的学术性文章，不过，也不仅只限于此。每期还刊载古巴国内外出版的有关古巴各个领域的、最好的和最全面的研究古巴的书志。1970年以前出版的书志，见内尔松·P·巴尔德斯和埃德温·利厄文合著《古巴革命：调查——研究指南（1959—1969年）》（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71）。最好的制图集是由古巴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出版的《古巴国家地图》（哈瓦那，1970）。

政府、党、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办了许多杂志。《社会主义古巴》发表过有深度的政治主题文章，是古巴共产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20世纪60年代末停刊，1981年12月复刊。《经济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由哈瓦那大学经济系出版，发表古巴国内外论经济主题的文章，包括理论性和经验性的文章。《思想评论》20世纪60年代出版，1970年停刊，发表哲学和政治主题的文章。《人种学与民俗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短期出版过，内容包括社会学和社会人种学的主题。

当代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由政府的古巴国内需求调查与方针研究所进行的，其领导人是欧亨尼奥·罗德里格斯·巴拉里。其不定期刊物以广泛的系统和抽样调查为基础，对古巴的生活有极高的洞察力。

隶属于党中央领导班子的研究机构对国际事务工作的兴趣日益增长，其中有两个机构对有关古巴的事务进行工作。美洲研究中心（CEA）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版不定期出版物；其中最佳出版物之一是两卷集《当代北美洲的帝国主义》。1983年它开始出版《我们的美洲杂志》，每年两期，特别有助于了解古巴对

美古关系和美国的古美团体的看法。1981年，世界经济调查中心（CIEM）开始出版《世界经济问题》，该杂志是关于古巴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关于古巴与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关系的很好资料来源。有一些相当杰出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杂志，都被称为古巴杂志，各个领域都有，其中包括外科、医学、热带医学、儿科、卫生与流行病学和卫生管理学。

古巴全国发行的日报有《格拉玛报》（早晨发行）和《起义青年报》（午后发行）。《格拉玛报》创办于1965年末，由七·二六运动机关报（《革命报》）和人民社会党机关报（《今日报》）合并而成。《格拉玛报》及其前身都是对当代古巴初步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通常都全文刊载，并且也同样刊载其他主要人物的重要讲话。古巴还出版《格拉玛报》英、法文每周文摘版，有时还从大众刊物上摘取文章。文摘周刊有助于对古巴国际关系的研究，但是它不能满足对古巴国内事务的研究。翻译水平还不错，但有时偶尔也出现严重的错误。最好的大众刊物资料来源当推长期出版的新闻杂志《流浪者》，其中有内容广泛面颇具深度的问题。其他广泛发行的、用于专业性研究的刊物有：《橄榄绿》周刊（军队）；《全国小农协会》（ANAP）月刊（农民）；《妇女》月刊（妇女）；《劳动》（工人）；《舆论》（大众消费）；以及《保持高度警惕》月刊（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等。

古巴政府最重要的统计出版物是《古巴统计年鉴》，它通常推迟两年出版，其前身是《公报》，内容较简略，20世纪60年代不定期地出版过。在使用该《年鉴》时，最容易犯的共同错误是，忘记了其经济统计数字是以比索的现行价格计算的，而且也忘记了古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该《年鉴》从未公布过价格指数。应该记住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育统计数字仅仅是指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就学统计数字在早期大量增长只是单纯地由将私立学校“社会主义化”所造成的结果。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公共卫生统计数字的概念性定义已经因过时而

改变了，而且经营不善的部门往往在随后年代的产量统计数字中被删除了，因此，该《年鉴》令人感到对增长颇有夸大的印象。该《年鉴》很少出错，但往往是不充分的。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古巴统计的全面讨论，见卡梅洛·梅萨—拉戈著《社会主义古巴统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一文，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季刊，第 4 季度第 2 期（1969）。梅萨—拉戈在《古巴研究》上定期地发表对该《年鉴》审查和评价的意见。苏珊·施罗德著《古巴：历史统计手册》（波士顿，1982）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有三本次要的著作，内容广泛。休·托马斯著《古巴：对自由的追求》（纽约，1971）把历史的发展一直写到 1962 年导弹危机，并对 60 年代期间的事件接着作了较简略的探讨。卡梅洛·梅萨—拉戈著《社会主义古巴的经济：对 20 年的一个评价》（阿尔伯克基，1981）论述了经济政策和成就、分配、就业、社会福利以及国际经济因素。豪尔赫·多明格斯著《古巴的秩序与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8）一书以政治与政府为中心进行论述。多明格斯编《古巴：国内与国际事务》（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1982）一书中有较为近期的内容。桑多尔·哈列布斯基和约翰·M·柯克合编《古巴：革命的 25 年：1959—1984》（纽约，1985）一书中对许多主题作了有益的、简短的概括性小结。

论述经济的其他值得称道的书还有：阿奇博尔德·里特著《革命古巴的经济发展：策略与成就》（纽约，1974）是概括 20 世纪 60 年代的佳作；克拉厄斯·布隆德尼乌斯著《革命的古巴：实现公平经济增长的挑战》（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4）和阿尔韦托·雷卡特著《古巴：经济与权力（1959—1980 年）》（马德里，1980）都包括了 70 年代的内容。把古巴经济放在较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令人感兴趣的论述的有：詹姆斯·奥康纳著《古巴社会主义的根源》（纽约州，伊萨卡，1970），此书是早期年代的；阿瑟·麦克尤恩著《古巴的革命与经济发展》（纽约，1981），该书则是后一个时期的。古巴在学术方面第

一流的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的大多数著作都是通过世界经济调查中心（CIEM）出版的。从书志学和技术方面的角度来估计古巴经济增长率中的问题的一个总的看法，可见卡梅洛·梅萨—拉戈和豪尔赫·佩雷斯·洛佩斯合著《关于古巴物质生产体系及其对国情统计体系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增长率的估计产生变化的研究》，载《世界银行总部工作文件》第770号（华盛顿特区，1985）。关于这个主题，梅萨—拉戈和佩雷斯—洛佩斯为一方与克拉厄斯·布隆德尼乌斯和安德鲁·津巴利斯特为另一方之间的辩论颇为激烈，但有时很有启发性，可见1985年和1986年的《比较经济研究》杂志，并可参见豪尔赫·F·佩雷斯—洛佩斯著《衡量古巴的经济成就》（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7）。

1969—1970年，根据由奥斯卡·刘易斯领导的在古巴进行的研究项目出版了4本书，这是仅有的一次由外来的学者在革命的古巴进行的重要实地研究。当古巴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许多录音带和记录本并迫使刘易斯小组离开后，该项目即告终止。他们的书提供了普通古巴人生活状况的许多情报资料。奥斯卡·刘易斯、鲁思·M·刘易斯和苏珊·M·里格登负责撰写《四个男人》（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77）；《四个妇女》（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77）；以及《邻居们》（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78）。而道格拉斯·巴特沃思则负责撰写《好运的人们：革命后的古巴对贫民窟居民的重新安置》（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78）。

有几本书抓住了20世纪60年代古巴政治和政府政策的重要方面。一本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作用和风格最好的论述是爱德华·冈萨雷斯著《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领袖气质的限度》（波士顿，1974）。李·洛克伍德出版了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详细报道（并附有最好的照片）：《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纽约，1969）。一本全面论述革命初期统治的宗派政治的书是安德烈斯·苏亚雷斯著《古巴：卡斯特罗主义和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两本论述20世纪60年代

激进派政治的书是K·S·卡罗尔著《游击队当权》（纽约，1970）和雷内·杜蒙特著《古巴：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巴黎，1970)。这两本书都颇有批判性；对该政权的目标更富有同情观点的是理查德·法根著《古巴政治文化的转变》(斯坦福，1969)。有一些有价值的文集，其中大部分涉及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各种不同的论题，有罗兰多·博纳切亚和内尔松·P·巴尔德斯合编《革命的古巴》(纽约州，加登城，1972)；海梅·苏奇里基编《卡斯特罗，古巴和革命》(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1972)；和卡梅洛·梅萨—拉戈编《古巴的革命变革》(匹兹堡，1971)。

令人奇怪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古巴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其他著作并不很多。应该予以特别重视的，是苏珊·埃克斯坦、威廉·利奥格兰德和内尔松·P·巴尔德斯的研究著作，有些作品刊载在《古巴研究》上。欧文·L·霍罗威茨著《古巴的共产主义》第七版（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89）是一本关于20世纪80年代优秀的综合性文集。关于人权和国内安全方面的情况，见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关于古巴问题的七次报告（华盛顿特区）有关的各年，最近期的是1983年；并参见路易斯·萨拉斯著《古巴的社会控制与偏离正道》（纽约，1979)。关于古巴军队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有用的手册是美国国防部情报研究局国防情报处的《古巴武装力量手册》(华盛顿特区，1979)，本书并不保密。

关于古巴革命的国际关系的出版物有所增加。有四本编辑成册的文集汇集了许多好的作品。它们是：卡梅洛·梅萨—拉戈和科尔·布莱齐尔合编《古巴在世界上》(匹兹堡，1979)；马丁·温斯坦编《在世界舞台上的革命古巴》(费城，1929)；卡梅洛·梅萨—拉戈和琼·贝尔金斯合编《古巴在非洲》(匹兹堡，1982)；以及巴里·莱文编《新古巴出现在加勒比》(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3)。并参见：卡拉·A·罗宾斯著《古巴的威胁》（纽约，1983)；林恩·D·本德著《古巴对美国：敌对政治》修订第二版

（圣胡安，1981）；W·雷蒙德·邓肯著《苏联与古巴》（纽约，1985）；帕梅拉·福尔克著《古巴的对外政策：加勒比的动乱》（马萨诸塞州，列克里敦，1985）；H·迈克尔·埃里斯曼著《古巴的国际关系：对民族主义对外政策的剖析》（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5）；韦恩·E·史密斯著《敌人的密室》（纽约，1987）；以及彼得·希尔曼著《苏联与古巴》（伦敦，1987）。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新的一本美古关系著作是莫里斯·H·莫利著《帝国与革命：美国与古巴，1952—1986年》（剑桥，1988）。

通过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美洲事务小组委员会出版的听证会记录，对追溯过去的美古关系并寻求大量情报资料用于这个主题的初步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资料来源。中央情报局、全国对外评价中心不定期出版的系列文件（标题为：《共产党对自由世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提供了古巴在海外存在的清单，尽管有时材料有所争议也并不完全，但还是有用的。这个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版了两种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名叫《古巴共和国官员人名录》和不同年代的《编年史》。所有这些都不是保密的。

在某些特定的专题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资料。西摩·门顿著《古巴革命的散文小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75）论述了文学及其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关于劳工方面，见莫里斯·蔡特林的《革命政治与古巴工人阶级》（纽约，1970）和卡梅洛·梅萨—拉戈的《古巴的劳工部门和社会主义的分配》（纽约，1968）。胡安和韦雷纳·马丁内斯·阿列尔合著的《古巴：经济与社会》（巴黎，1972），特别有助于了解土地问题早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性别和肤色问题。

11. 1930年以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对于多米尼加共和国，过去60年来发生变革的学术研究几乎没有，而总的说来，对政治进程的注意力多于对经济和社会的注

意力。

关于特鲁希略时代的前身和特鲁希略时代的起源，有两本重要的政治史书籍：路易斯·费利佩·梅希亚著《多米尼加共和国当代史》（加拉加斯，1944），和维克托·梅迪纳·贝内特著《承担责任的人》（圣多明各，1976）。这两本杰出的专著部分地以作者有文件依据的回忆录为其基础，他们目击了奥拉西奥·巴斯克斯总统垮台和特鲁希略上台并阴谋篡权和建立他的独裁政权。关于特鲁希略政权的突出的书籍，是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著《特鲁希略时代。对一个西班牙语美洲独裁制度诡辩术的研究》（智利，圣地亚哥，1956），本书最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具有充分和准确的文件作为依据，其中大部分是官方出版物和报纸。格雷戈里奥·布斯塔曼特著《加勒比的一个总督》（墨西哥城，1950）。布斯塔曼特是何塞·阿尔莫伊纳的笔名，他早先曾是特鲁希略的秘书。加林德斯和阿尔莫伊纳两人都是从内战中逃亡出来的西班牙流亡者，而且都是由于撰写这些书而遭到特鲁希略指使的人所暗杀的。论述这位独裁者如何使用他的机制去建立其经济王国的一本有用的论著是杰曼·E·奥尔内斯的《特鲁希略：加勒比的小凯撒》（纽约，1958）。胡安·博希著《特鲁希略：史无前例的暴君之缘起》（加拉加斯，1959）一书的心理分析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两位作者都以艾伯特·希克斯著《街上的血迹：特鲁希略统治下的生活》（纽约，1946）为部分依据，后者是一篇重要的、但以记者所采用的耸人听闻的手法写成的文章，似乎是以C·A·汤普森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制度》（载《外交政策报告》12，1936年4月15日）这篇文章为基础的，这才是有关特鲁希略如何操纵商业和财政并建立其垄断的第一篇研究作品。罗伯特·D·克拉斯韦勒著《特鲁希略：一个加勒比独裁者的生活与时代》（纽约，1966）是一本对其政权持批判态度的传记和历史，是至今出版的最好的书。霍华德·维亚尔达著《独裁制度与发展：特鲁希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控制方法》（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

1968）是一本激动人心的读物，其提供的文件也是无懈可击的，以采访记和报纸为资料来源，其内容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两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特鲁希略时代的书是罗伯托·卡萨著《资本主义与独裁制》（圣多明各，1982）和路易斯·戈麦斯著《1875—197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圣多明各，1977），其中既有理论性的夸张又带有意识形态的推理。多米尼加政府每年出版的统计系列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统计年鉴》（特鲁希略城，1936—1956年），戈麦斯试图解释这些统计数字，但遭到惨败；卡萨则运气较好，作了某些牵强附会的结论。

亲特鲁希略的书目特别丰富，这从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德莫里齐著《特鲁希略书目评论》（特鲁希略城，1955）一书中能够得以证明，该书包罗了有关在独裁者执政前25年间出版的赞扬他及其政绩的文章、书籍和小册子的5千多条条目。在堆积如山的出版物中，没有多少学术性著作是站得住脚的。最像学术性研究的是华金·巴拉格尔著《多米尼加的现实：一个国家及其政权简介》（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尽管这是一本对多米尼加历史持悲观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解释的著作，其中实际上为特鲁希略作了倾向性的辩护。这本书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把1937年屠杀海地人的事说成是正当行动，并为边界多米尼加化作辩解。该书大部分评论特鲁希略政权的思想体系，浓缩了官方对20世纪40年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如果巴拉格尔不以新的名称《不幸的岛屿》（圣多明各，1985）重新编排出版的话，可能已将它遗忘了。巴拉格尔关于特鲁希略的另一本著作是《上枷锁的言论》（墨西哥城，1975），它的重要性在于对特鲁希略作了心理上的生动描述，尽管它有倾向性，内容上有伪造和自我辩解的成分。拉蒙·马雷罗·阿里斯蒂的第三卷《多米尼加共和国：美洲最古老的基督子民的缘起与命运》（特鲁希略城，1958），是对该国官方历史的结论，略述了这个独裁者的思想体系，并把特鲁希略说成是多米尼加民族的“拯救者”。特鲁希略自己则试图在

《一个政权的理论基础和政策》（特鲁希略城，1959）一书中为他的政权提出一篇系统的意识形态辩护词。

特鲁希略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在波普·阿特金斯和拉曼·威尔逊合著《美国与特鲁希略政权》（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72）一书中有所描绘，不过，两位作者可能从他们于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掌握的大量文件资料中得益匪浅，这套文件资料就是贝尔纳多·维加编《美国与特鲁希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武装部队文件集》（圣多明各，1982—1986），这套资料企图收集1930年到1961年之间多米尼加—美国外交文件，并着手按卷出版。阿图罗·埃斯派利亚特著《特鲁希略：最后的凯撒》（芝加哥，1964）是一位特鲁希略分子和持反美态度者阐述独裁统治终结时两国关系的书。马林·D·克劳斯奈著《多米尼加共和国：解决，未解决，重新解决（费城，1973）也讲到特鲁希略之前和之后的多—美关系，特别侧重于教育和农业的发展。何塞·伊斯雷尔·奎略的《1937年多米尼加—海地冲突的文件》（圣多明各，1985）公布了对外关系部就1937年海地大屠杀罪行提出的多米尼加政府的外交和机密函件，就此也可参见胡安·曼努埃尔·加西亚著《海地大屠杀：1937年特鲁希略的种族灭绝罪行》（圣多明各，1983）。

霍华德·维亚尔达著《独裁制、发展与分裂：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三卷集（密执安州，安阿伯，1975）一书，对从独裁制转向一个比较民主的新的政治秩序作了严格而又详尽的研究。维亚尔达的另一本著作《多米尼加共和国：转变中的国家》（纽约，1969）记录了1961年特鲁希略死后建立民主秩序所作的努力。论述独裁统治结束以来的25年多的许多书籍主要涉及政治变革和党派之间的斗争，或者文官与军方的关系。有些书籍以1965年内战作为它们的主要背景。其中重要的有：约翰·巴特劳·马丁著《被事件所压倒：从特鲁希略垮台到内战的多米尼加危机》（纽约州，加登城，1966），这是美国派驻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位特使的回忆录；胡安·博希著《未完成的实验：多米尼加共

和国的民主》(纽约，1964)；亚伯拉罕·F·洛温撒尔著《对多米尼加的干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1）详细论述了美国的决策；杰罗姆·斯莱特著《干涉与谈判》(纽约，1970)；皮耶罗·格莱杰塞斯著《多米尼加危机：1965年立宪主义者叛乱和美国的干涉》(巴尔的摩，1978)，该书对其他作者没有谈到的内战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杰出的说明和特别大量的详细内容。格莱杰塞斯对军事干涉的观点是激进的,接近于多米尼加民族主义者的立场。爱德华多·拉托雷著《当代多米尼加的政治》(圣多明各，1975)一书作了民族主义的说明，倾向于把多米尼加的政治进程实质上视为考迪罗主义的传统力量与以自由派及民主大众主义之间较量的结果。另一本有用的著作代表了反特鲁希略流亡者的见解，这就是尼古拉斯·西尔法著《战争，叛变和流亡》(巴塞罗纳，1980，1981)。何塞·A·莫雷诺著《武装的村镇》(匹兹堡，1970）描绘了内战期间立宪派力量内部的冲突和社会组织。

论述1965年内战后接着发生的事件的，有几本书值得推荐：何塞·伊斯雷尔·奎略著《改革主义的七年》(圣多明各，1973)一书是反对华金·巴拉格尔政权的；波普·阿特金斯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队和政治》(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1）是一本论述1966年至1978年巴拉格尔总统与军方之间关系的启示性研究，以原始的和非公开的资料为基础；罗伯托·卡萨著《十二年》(圣多明各，1986）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巴拉格尔的书，有理论性解释的明显倾向；伊恩·贝尔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1）是一本英国驻多米尼加前大使所著的综合性历史论著；霍华德·维亚尔达和迈克尔·克里扎奈克合著《多米尼加共和国：加勒比的熔炉》(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2）向读者介绍了当代党派政治状况。

关于1961年以后多米尼加的经济，胡利奥·塞萨尔·埃斯特雷利亚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货币、银行与金融》(圣多明各，1971）仍是一本突出的综合性的货币史，但不够有条理。爱德华

多·特赫拉著《1963—1973年多米尼加经济发展的十年》(圣多明各，1975)是论述巴拉格尔政权早期的研究著作，尽管带有辩护性，但仍是一本有用的书。米格尔·塞亚拉著《1968—1983年多米尼加经济的结构和变化趋势》(圣多明各，1985)一书对近期经济决策的影响作了解释，也是一本同样有用的书，该书持结构主义的倾向。维尔弗雷多·洛萨诺著《依附性改良主义》(圣多明各，1985)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提供了来自"依附性"学派的观点，其中包含大量夹有某些统计资料的空洞理论。国家计划局、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央银行以及国家统计局出的系列性出版物也很重要。多米尼加共和国科学院经济委员会把上述资料整理补齐成三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了《多米尼加经济》(圣多明各，1975，1976和1977)。1982年到1988年期间出版了由弗兰克·莫约·庞斯主编的当代社会一经济和政治问题研究丛书共30卷，其中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外部门的问题》(圣多明各，1982)；《多米尼加经济的鼓励制度》(圣多明各，1983)；《多米尼加汇兑形势》(圣多明各，1984)；《多米尼加经济危机的根源和解决方法》(圣多明各，1986)。它们对于多米尼加的经济危机、外债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以及巴拉格尔、古斯曼和豪尔赫·布兰科政府的经济政策等都有最新的研究和探讨。

其他论述特鲁希略以后有关结构性社会一经济和政治变化的近期研究著作有：伊西斯·杜阿尔特著《圣多明各的资本主义与人口过多》(圣多明各，1980)，本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人口问题对不发达、城市化和迁移的影响；何塞·路易斯·阿莱曼著《关于多米尼加经济与社会的27篇论文》(圣地亚哥一德洛斯卡瓦耶罗斯，1982)；弗兰克·莫亚·庞斯著《多米尼加的过去》(圣多明各，1986)，本书论述了20世纪多米尼加共和国现代化的若干历史问题；以及罗萨里奥·埃斯皮纳尔著《多米尼加的独裁主义与民主》(圣何塞，1987)，本书从政党能动性的角度来论述1930年到1986年之间多米尼加政治制度的演变。

值得提到的还有若干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古斯塔沃·塞贡多·博尔马著《1950年至196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涉外部门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1）；霍华德·维亚尔达著《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余殃：多米尼加共和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佛罗里达大学，1965）；罗萨里奥·埃斯皮纳尔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阶级、权力和政治变化》（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1985）；拉斐尔·弗朗西斯科·德·莫亚·庞斯著《1880—1983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工业鼓励措施》（哥伦比亚大学，1987）。书志学著作有：霍华德·维亚尔达著《1930—1966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关政治和政体的研究材料》（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耶罗斯，1966）；德博拉·希特和拉尔曼·威尔逊合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精选书目提要：恢复独立后的一个世纪》（华盛顿特区，1968）；以及沃尔夫·格拉本多夫著《多米尼加共和国政治和社会经济书目提要：1961—1971年研究著作》（慕尼黑，1973）。近期的一本很有用的经济书目提要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央银行出版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经济书目提要》（圣多明各，1984）。弗兰克·莫亚·庞斯编的《多米尼加全国书目提要》（即将出版）约有1.6万多个条目，几乎包括了截至1985年为止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已出版的所有书籍和小册子。

12.1930年以来的海地

1973年稻草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马克斯·比萨安特编的《海地书志词典》的附录（华盛顿特区，1951）；词典和附录合在一起至今仍是由海地人编的关于海地书志学的最佳之作。克劳斯国际出版社近期出版了由米歇尔·拉盖尔主编的《1900—1980年海地全书》（纽约，1982）。值得一提的还有：马克斯·马尼加著《1971—1975年的海地》（魁北克，拉萨勒，1980），以及法国商会编纂的《世界书志丛书》第39卷：《海地》（牛津，1983）。此外，还有一本用英文和克里奥尔语编写的关于海地的有用的书目提要，即罗

伯特·劳利斯编《关于海地的书目提要》，是佛罗里达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出版的不定期工作文件第6号（盖恩斯维尔，1985）。

从1930年到现在这段期间的综合性著作有：戴维·尼科尔斯著《从德萨林纳到杜瓦利埃：海地的种族、肤色和民族独立》（剑桥，1979），尤其是该书的最后四章，其中特别着眼于这段期间的社会和政治思潮方面；莱昂内尔·帕坎著《海地人：政治上的等级和肤色》（纽约，1983）一书主要是有关1930年以后的这段期间。罗伯特·罗特伯格著《海地：贫困的政治》（波士顿，1971）是一本通俗和新闻式的论述海地过去的作品。罗伯特·德布斯·海纳尔（在杜瓦利埃执政时期早期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海地的负责人）与南希·海纳尔合著《用血写成的：海地人民的历史》（波士顿，1978）是一本带有强烈种族优越感和轶闻逸事的历史著作。

雷福德·洛根著《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伦敦，1968）是一本有用的著作，特别见长于海地与美国的关系方面。侧重于海地对外关系的其他著作还有莱斯利·F·马尼加著《60年代的海地：国际关注的目标》（华盛顿特区，1964）和罗伯特·托马塞克著《1963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争端与美洲国家组织》，后者载《奥尔比斯》第12期（1968）。

专门论述这段期间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著述有J·迈克尔·达什著《1915—1961年海地的文学和意识形态》（伦敦，1981）及《海地与美国：民族的模式和文学的想象力》（纽约，1988）。并可参见乌尔里希·弗莱施曼著《海地的文学思想与现实》（伯林，1969）；〔海地〕克里奥尔语翻译版《海地的文学思想与现实》（日内瓦，1981）。勒内·德佩斯特著《向黑种人的性格问好与告别》（巴黎，1980）和拉埃内克·于邦著《海地的文化与独裁》（巴黎，1979），从历史观点研究了海地的文化。弗雷尔·拉斐尔·贝鲁和普拉代尔·蓬皮吕将他们编的《海地文学史》（太子港，1975）修订并进行了增补扩充，本书虽是不加批判且有些说教，但仍不失

为一部有用的作品。莱昂·弗朗索瓦·霍夫曼著《黑人的浪漫主义派》（巴黎，1973）、较近期的《海地的传奇故事》（普林斯顿，1982）以及在《加勒比评论》或别处发表的不少文章，对这段期间海地文学的论述大大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和鉴赏力。近几年出现了论述丁·S·亚历克西的两本短的专论：迈克尔·达什著《雅克·斯特凡·亚历克西》（多伦多，1975）和马克西米利安·拉罗什著《星星诗集》（巴黎，1978）。克洛德·苏夫朗在他所著《一位黑人社会主义者》（巴黎，1978）一书中谈到雅克·鲁曼和J·S·亚历克西与美国诗人兰斯顿·修斯在一起的情况。

罗伯特·斯佩克特著《驻海地的W·卡梅伦·福布斯和胡佛委员会（1930）》（马里兰州，拉纳姆，1985）一书有一些有用的情报资料，但缺乏深入的分析。关于美国占领情况的论述，最好的一本书仍是汉斯·施密特著《1915—1934美国对海地的占领》（新泽西州，不伦瑞奇，1971），这是一本极好的对美国对海地的政策进行批判的研究著作，然而，关于海地人对占领的反应施密特只是偶而谈到，尚感不足。克恩·德林塞著《海地的军队与政治》（巴黎，1979），也有有用的历史资料。

关于杜瓦利埃时期的著作有各式各样，从伯纳德·迪德里希和奥尔·伯特合著《老大夫：海地及其独裁者》（伦敦，1970）触目惊心的论述，直到查尔斯·福斯特和艾伯特·瓦尔德曼合编《海地——今日与明日》（马里兰州，拉纳姆，1984）较枯燥的文集。更近期的是拉丁美洲局出版的《海地：家族的事业》（伦敦，1985）。并可参见詹姆斯·弗格森著《老大夫，小大夫》（伦敦，1987），以上两本书都为杜瓦利埃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有用的论述。分析得较好的当推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著《杜瓦利埃国家的历史根源》（太子港，1986）。戴维·尼科尔斯著《地处加勒比的海地》（伦敦，1985）一书中有几章也涉及现阶段情况。

罗歇·多桑维尔著《倒退》（魁北克，乌特勒蒙，1986）采取了对老知识分子进行采访的形式，将他们对1930年以后年代的回

忆和评论整理成书。帕特里克·贝勒加德—史密斯对他的祖父当泰斯·贝勒加德——这一时期海地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进行了研究，其作品是《在权力的庇荫下：海地社会思潮中的当泰斯·贝勒加德》(新泽西州，阿特兰蒂克海兰茨，1985)。其他的传记性研究有卡洛·A·德西诺著《双重职业》(太子港，1987）和《达尼埃尔》(太子港，1986)，这两本书是论述民众领袖达尼埃尔·菲尼奥勒的。

尽管至今尚无一本关于海地经济史的好书，但许多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海地的经济。其中包括马茨·伦达尔著《农民与贫困：对海地的研究》(伦敦，1979）和《海地经济：人、土地和市场》(伦敦，1983）这两本书，以及克里斯蒂昂·吉罗著《海地的咖啡业：居民、投机商和出口商》(巴黎，1981)。小规模的工会运动在让—雅克·杜布和于尔里克·若利合著《海地工会运动发展笔记》(出版处不详，1974）中作了概括。

近期出现了几本关于海地移民的著作。莫里斯·勒穆瓦纳在其所著《辛酸的糖：今天在加勒比的奴隶》(巴黎，1981；英语译本，伦敦，1985)，拉蒙·安东尼奥·贝拉斯著《移民，海地人，奴隶制度》(圣多明各，1983）也是这个主题。特鲁希略对海地人犯下灭绝种族的罪行是胡安·曼努埃尔·加西亚著《对海地人的大屠杀：1937年特鲁希略的种族灭绝罪行》(圣多明各，1984）的主题；何塞·I·奎略则编了《1937年多米尼加—海地冲突文件集》(圣多明各，1984)。另一处的移民在唐·马歇尔著《海地的问题：向巴哈马群岛非法移民》(牙买加，金斯敦，1979)。关于海地向北美移民的文章很多；这些文章曾经罗伯特·劳利斯评论过，见《海地移民和海裔美国人：从无形到聚光灯下》，载《民族研究杂志》14卷第2期（1986)。

13. 1940年以来的波多黎各

1940年以来波多黎各历史的许多原始资料被联邦政府各种

机构收集的统计数字湮没了。波多黎各也许是拉丁美洲最“准确的”社会之一。如果说大量资料不总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话，那么它的统计数字一般都是靠得住的。每年提交总督的经济报告由计划局出版，是经济方面基本情报的一项有用的来源，而每月的就业和失业报告则由劳工和人力资源部公布。计划局社会计划处出版许多专门报告和研究著作；其 1974 年的研究著作《人力生计通报：波多黎各移民，社会—经济研究》即是一例。政府重要部门的年度报告，诸如公共教育部、商务部、农业部、人力资源部以及燃料和电力委员会等，其报告的材料都有用，尽管是未经精选的材料。《美国—波多黎各委员会关于波多黎各现状的报告》(1966 年 8 月)连同它所附的背景文件，是波多黎各情报的主要来源，也是其重要文件本身的主要来源。

戈登·K·刘易斯著《波多黎各：加勒比的自由与权力》(纽约，1963)是论述现代波多黎各的一个范本。对该书最新的补充是作者所著的《关于波多黎各革命的笔记》(纽约，1975)。从一位“中立”的欧洲人的观点综合论述波多黎各一本近期的重要著作是雷蒙德·卡尔著《波多黎各：殖民地的经历》(纽约，1984)。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新政在波多黎各的历史与政治事件以编年史的形式被纳入托马斯·马修斯著《波多黎各政治和新政》(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1960)。关于人民民主党的起源及其意识形态方向与其早期历史，参见罗伯特·W·安德森著《波多黎各的党派政治》(斯坦福，1965)。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1940—1945 年)，R·G·特格韦尔著《受折磨的土地》(纽约，1947)是必需的读物。论述特格韦尔总督政府的一本佳作是查尔斯·古德塞尔著《一个革命的政府：波多黎各在特格韦尔总督执政时期的行政改革(1941—1946 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特格韦尔执政时期工业鼓励政策的历史在戴维·罗斯著《登山的长道》(圣胡安，1976)一书中得到了详述。关于导致 1948 年波多黎各通过授权直接选举总督的法律的过程，

见苏伦达·巴纳著《美国与波多黎各地位问题的发展，1936—1948年》（堪萨斯州，劳伦斯，1975)。关于战后时期立宪和经济发展总的情况，参见亨利·韦尔斯著《波多黎各的现代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9)。

关于当代经济和发展政策方面，令人感兴趣和富于批判性的一种观点，见理查德·韦斯科夫著《工厂与食品标记：波多黎各发展模式》(巴尔的摩，1985)。关于党派政治，肯尼思·法尔著《个人至上论和党派政治：波多黎各人民民主党的体制化》(哈托，雷伊，1973）一书中有重要的记述材料。博利瓦尔·帕甘著《波多黎各政党史》(圣胡安，1972）一书中有1940年以后的一些情报资料，但大多是逸事性的，而且很不系统。安赫尔·金特罗·里韦拉著《波多黎各政治研究中的地方领导人》(里奥彼德拉斯，1970）和拉斐尔·拉米雷斯著《郊区和政治》（里奥彼德拉斯，1977）两本书中有地方党结构方面的见解。并可参见安赫尔·金特罗·里韦拉著《波多黎各的工人阶级与政治进程》，该文载《社会科学杂志》20期（1976)：3—18页。关于该联邦地位发展历史的主要资料是议会主要领导人、前常驻专员安东尼奥·费尔诺斯·伊塞恩著《波多黎各自由联邦：其前因、创造和直到当今时代的发展》(里奥彼德拉斯，1974)。拉斐尔·加尔萨罗著《波多黎各：一个寻求建立国家的民族》(萨拉曼卡，1974）一书对联邦是持批判态度的，至少也有一些墨守成规的见解。

关于该岛当代问题的一本很有用的论文集是豪尔赫·埃内编《决策之时：美国与波多黎各》(马里兰州，拉纳姆，1983)。还有豪尔赫·埃内和胡安·曼努埃尔·加西亚·帕萨拉夸合著介绍波多黎各当前政治困境的一本优秀而简短的小册子：《波多黎各问题》，载《对外政策协会摘要丛刊》第266期（1983年11—12月)。有一套从批判角度并大部分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杰出论文，刊登在《拉丁美洲展望》杂志特刊上，见第2卷第3期（1976年夏)，其标题是《波多黎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特别令人

感兴趣的是弗兰克·博尼利亚和里卡多·坎波斯合著《工业化和移民：对波多黎各工人阶级的某些影响》，载该刊第66—108页。

何塞·埃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著《回到波多黎各的移民》(伯克利，1967)是论述波多黎各移民返回问题的不多见的严肃研究著作之一，这类著作急需扩大和更新。曼努埃尔·马尔多纳多·丹尼斯著《波多黎各与联邦：移民与殖民主义》(墨西哥城，1978)一书对移民现象总的看法是颇有争议的。何塞·L·巴斯克斯·卡尔萨达著《波多黎各的居民及其历史的轨迹》(圣胡安，1978)是一本有用的人口学历史著作。

纽约市立大学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的出版物特别值得注意，尤其是在阶级分析和移民问题方面。其令关心当代波多黎各文化方面的人感兴趣的另一本有用的出版物是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化工作室。波多黎各人及其文化；评论与辩论。编史学会议》(英、西文对照)(纽约，1974年4月)。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著《波多黎各：四层楼的地区》(圣胡安，1980)就是关于鉴别波多黎各文化同一性有争议的文献的一个极好例子。

14. 1903年以来的巴拿马

卡洛斯·曼努埃尔·加斯特亚索罗、塞莱斯蒂诺·安德烈斯·阿劳斯和阿曼多·穆尼奥斯·平松合编《巴拿马历史的版本》(巴拿马城，1980)，2：331—448页，本书是最完整的巴拿马附有注释的书目提要，其最后的1/3是有关20世纪的书籍。埃莉诺·兰斯塔夫著的《巴拿马》(牛津，1982)较为简略，但也是一本有用的编目。

有几本定期刊物刊载关于巴拿马自独立以来的文章和文件。《巴拿马历史学会公报》(1933年——)的重点集中于殖民地时期和19世纪，但有时也出一期刊载关于独立时期的人物或事件的文章。《彩票杂志》季刊(1941年——)是巴拿马政府出版的，着重于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和文件汇编。《工作》杂志(1960年——)

是巴拿马第一流的社会主义作家里考尔特·索莱尔创办的，刊载由左派作家撰写的文章，也发表不定期的论文。《全国文化杂志》的主题多为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有时也有历史方面的。

关于巴拿马独立以来的历史综合性著作很少，至多也不过是几本薄薄的编年史著作。《独立 50 周年》（巴拿马城，1953）是为庆祝独立 50 周年而出版的，内有大量历史资料。《巴拿马历史的版本》一书中提供了编者们撰写的介绍文章，编者们都在该国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列。

巴拿马的本国史，有许多必须同专著资料结合起来。G·A·梅兰德著《在巴拿马政治中的美国》（伊利诺斯州，丹维尔，1971）一书的覆盖年份是从独立起到 1908 年，其中包含了来自巴拿马和美国的大量情报资料。威廉·麦凯恩著《美国与巴拿马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37），从国务院的角度叙述了从独立起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这段期间巴拿马的事件。劳伦斯·伊利著《在世界事务中的巴拿马，1903—1950 年》（菲城，1951），集中论述了巴拿马加入国际联盟。美洲国家体系和联合国的活动。主要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有拉里·皮平著《雷蒙时代》（斯坦福，1964），本书主要以报纸和其他当代刊物为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条约谈判使注意力更集中于巴拿马，而许多材料可从书目提要第 15 篇援引的著作中查到。

传记是了解巴拿马建国时期的另一个角度。阅读豪尔赫·孔特—波拉斯著《巴拿马传记词典》（巴拿马城，1975）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曼努埃尔·奥克塔维奥·西斯内特著《贝利萨里奥·波拉斯，或民族的使命》（巴拿马城，1959）；卡洛斯·曼努埃尔·加斯特亚索罗著《里卡多·J·阿尔法罗的思想》（巴拿马城，1981）；巴尔塔萨·伊萨萨·卡尔德隆著《卡洛斯·A·门多萨及其一代人》（巴拿马城，1982）；以及希尔·布拉斯·特黑拉著《里卡多·阿道弗·德拉瓜迪亚传》（巴拿马城，1971）都在最佳的传记著作之列。贝·马里奥·阿罗塞梅纳著《弗洛伦西奥·阿

莫迪奥·阿罗塞梅纳，1872—1945年》（巴拿马城，1982），这本传略也是有用的。

阿里亚斯·马德里兄弟是许多传记著作关注的对象。最好的一本是J·孔特·波拉斯著《阿努尔福·阿里亚斯·马德里》（巴拿马城，1980），这是一本认真的研究著作，其附录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资料。费利佩·J·埃斯科瓦尔著《阿努尔福·阿里亚斯这位信仰巴拿马主义者：巴拿马人的政治精神心理学的文章》（巴拿马城，1946）是一位亲身参加者—观察者所写的突出的文章。梅利达·鲁特·塞普尔韦达著《阿莫迪奥·阿里亚斯·马德里：其人、政治家和记者》（巴拿马城，1983）是以采访家族成员和查阅个人信件为基础的。一本对阿里亚斯兄弟政府评论性的回忆录就是德梅特里奥·波拉斯著《20年斗争与经验》（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

阐明巴拿马社会历史的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著作有：约翰和马维斯·比桑斯合著的杰作《巴拿马的人民》（纽约，1955）；丹尼尔·戈德里奇著《创业的后代》（芝加哥，1966）；以及奥马尔·哈埃恩·苏亚雷斯著《16世纪至20世纪巴拿马地峡的居民》（巴拿马城，1978）。迈克尔·康尼夫著《在一条白人运河上的黑人劳工：巴拿马，1904—1981年》（匹兹堡，1985）一书详述了西印度群岛移民群体及其后裔。一本对社会一体化颇有见解的评价著作，是阿尔弗雷多·卡斯蒂列罗·卡尔沃著《巴拿马人的社会：其形成与一体化的历史》（巴拿马城，1970）。詹姆斯·豪著《土著人叛乱与美国在中美洲的干涉：米斯基托的库纳人专题研究的启示》（载《文化遗迹季刊》第10卷第1期，1986：第59—65页）一文中谈到库纳人的叛乱历史。唐纳德·李·德威特著《巴拿马共和国发展中的社会和教育思想，1903—1946年》（亚利桑那大学未公开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1972）一文是提供巴拿马知识分子历史的一篇佳作。最后，内斯托尔·波塞尔著《关于当代巴拿马人和其他论文》（巴拿马城，1986）一文中也有概况性的研究。

托里霍斯时代是许多分析著作的对象。罗慕洛·埃斯科瓦尔·贝当古著《托里霍斯：对殖民地美洲说不!》(波哥大，1981) 一书是以大量第一手情报资料为基础的，但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当推史蒂夫·C·罗普著《巴拿马的政治：从警卫国民到国民警卫队》(纽约，1982)。雷纳托·佩雷拉著《巴拿马：武装力量与政治》(巴拿马城，1979) 一书是以作者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其中有许多情报资料和新鲜解释。关于托里霍斯统治时期破坏人权的问题，参见美洲人权委员会报告《关于巴拿马人权状况的通报》(华盛顿特区，1978)。乔治·普里斯特利著《巴拿马的军政府与人民的参政：托里霍斯政权，1968—1975 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6) 一书试图建立一种军人民众主义的理论。

关于考査巴拿马近期经济状况的文献可见世界银行的《巴拿马：结构改革与增长前景》(华盛顿特区，1985) 以及罗伯特·E·卢尼著《巴拿马的经济发展》(纽约，1976)。关于香蕉业的历史材料可见《彩票杂志》第 242 期 (1976) 和温贝托·E·里科德等人著《巴拿马与水果业》(巴拿马城，1974)。奥马尔·哈埃恩·苏亚雷斯著《巴拿马地理》(巴拿马城，1985) 一书中也有大量有关的经济情报资料。

试图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危机的第一批著作可见约翰·威克斯著《巴拿马：当前政治不稳定的根源》(载《第三世界季刊》第 9 期，1987，第 763—787 页) 以及约翰·威克斯和安德鲁·津巴利斯特合著《对巴拿巴干涉的失败：在后院丢了面子》(载《第三世界季刊》第 11 期，1989，第 1—27 页)。

15. 巴拿马运河区，1904—1979 年

关于这一主题现有的最好的书目提要是韦恩·布雷著《美国与巴拿马之间关于运河新条约的争议：美国、巴拿马、哥伦比亚、法国和国际组织资料的精选诠释书目提要》(华盛顿特区，1976)。另一套极其有用的参考书是马乔里·怀特曼主编的三卷集《国际

法文摘》(华盛顿特区，1964)。文件资料收集最全面的是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处编的《有关巴拿马运河的背景文件》(华盛顿特区，1977)。一套必不可少的主要资料是国务院编的自1861年以来连续编辑至今的系列材料，题为《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和《美国对外关系》。并参见巴拿马地峡委员会主席1904—1914年各卷《年鉴》、巴拿马运河总督1914—1951年各卷《年鉴》以及巴拿马运河公司总裁1951—1979年各卷《年鉴》(华盛顿特区，1904—1979)。

综合性的次要著作有：艾尔弗雷德·理查德著《美国国民意识中的巴拿马运河，1870—1922年》(波士顿大学未公开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1969)；威廉·麦凯恩著《美国与巴拿马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37)，该书虽然过时了一点，但仍有价值；沃尔特·拉夫伯著《巴拿马运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危机》(纽约，1978)和戴维·法恩斯沃思与詹姆斯·麦肯尼合著《美国—巴拿马关系，1903—1978年：对连锁政治的研究》(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83)，这两本书比较新。并参见赫伯特·纳普与玛丽·纳普合著《红、白、蓝的天堂：在巴拿马的美国运河区》(圣迭戈，1985)。罗纳德·兰达著《1903年至今美国的对巴拿马政策。关于承认和外交关系及美国干涉事例的问题：按表格编排的小结》，(载《国务院公报》第70期，1974年4月22日)提供了简明的摘要。巴拿马的观点可以从两本书中取样：里卡多·阿尔法罗著《半个世纪的巴拿马与美国的关系》(巴拿马城，1959)和埃内斯托·卡斯蒂列罗·皮门特尔著《巴拿马与美国(巴拿马城，1953)。关于运河本身，参见理查德·巴克斯特著《关于洋际运河国际航道的专门法律》(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4)以及诺曼·帕德尔福德著《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巴拿运河》(纽约，1942)。关于运河区的法律地位，马莎·谢伊著《巴拿马运河区：寻求法理性的认同》(载《纽约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杂志》第9期，1976，第15—60页)一文作了很好的研究；埃德

温·霍伊特著《国家政策与国际法：美国运河政策专题研究》(科罗拉多州，丹佛，1967)。关于工程技术问题，参见迈尔斯·杜瓦尔著《巴拿马运河政策——作一次评价》(载《美国海军学院学报》，第81期，1955，第263—275页)。

关于运河区与巴拿马共和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三个出版物特别值得注意：约翰和马维斯·比桑斯合著《巴拿马的人民》(纽约，1955)；迈克尔·康尼夫著《在一条白人运河上的黑人劳工：巴拿马，1904—1981年》(匹兹堡，1985)；以及拉蒙·卡里略和理查德·博伊德合著《巴拿马地峡在拉丁美洲与英裔美洲之间社会关系方面造成的某些局面》，载《巴拿马美洲大学学报》第2期(1945)：第703—784页。

关于1903年以前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参见科尔比·切斯特著《军官们的外交》(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8期(1914)：443—476页)一文中所记载的对地峡干涉的历史。迈尔斯·杜瓦尔著《从卡迪斯到卡塞：为巴拿马运河而奋斗的长期外交史》(斯坦福，1947)和格斯尔·麦克著《被分割的土地：巴拿马运河及其他巴拿马运河计划方案的历史》(纽约，1944)这两本书都有其价值。另一本图解式论述19世纪运河发展情况可见戴维·麦卡洛著《海洋之间的通道：巴拿马运河的创立(1870—1914年)》(纽约，1977)，更为专门的是德怀特·迈纳著《为巴拿马通道而奋斗：斯普纳法与海—埃兰条约的历史》(纽约，1940)。洞察西奥多·罗斯福内心状态的最佳材料可见埃尔廷·莫里森编九卷集《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1—1954)的第1卷；并可参见弗雷德里克·马克斯著《西奥多·罗斯福外交中的驱动轮是道德观》，载《外交史》第2期(1978)：第43—62页。爱德华多·莱迈特雷著《巴拿马及其同哥伦比亚的分离》(波哥大，1971)一书中广泛地研究了哥伦比亚的观点。

关于1903年11月的巴拿马革命和因此而产生的与华盛顿的运河条约的研究有下列著作：伯纳德·韦斯伯格著《拿下巴拿马

运河区的奇怪事件》(载《美洲遗产》第27期，1976年10月，第6—11页、68—77页)，该文是一篇优秀的通俗论述文；理查德·特克著《美国海军与“拿下”巴拿马，1901—1903年》(载《军事事务》第38期，1974第92—98页)和约翰·尼科尔与弗朗西斯·泽维尔·霍尔布鲁克合著《1903年巴拿马革命中的海军行动》(载《美洲海王星》第37期1977，第253—261页)这两篇文章都考察了美国海军的任务。并可参见理查德·莱尔著《蛮横无理的外交：美国对哥伦比亚的政策，1903—1922年》(特拉华州，威尔明顿，1987)。菲利普·布诺—瓦里亚著《巴拿马：建设、破坏与复兴》(伦敦，1973)是一本冗长的自我辩解，必须去掉大量水份，正如西奥多·罗斯福著《美国是如何获得开凿巴拿马运河权的》一文一样，后者载《展望》第99期(1911年9—12月)，第314—318页。并可参见伊莱休·鲁特所作的最伪善的演讲：《巴拿马问题的伦理道德》，载《关于国际性主题的演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16)。比较平衡的观点见查尔斯·阿梅林格著《菲利普·布诺—瓦里亚：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新眼光》(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第46期，1966，第28—52页)和约翰·梅杰著《海—布诺—瓦里亚条约是谁执笔的?》(载《外交史》第8期，1984，第115—123页)。关于美国公众的舆论，见特伦斯·格雷厄姆著《“文明的利益”? 美国反对“夺取”巴拿马运河区的反应，1903—1904年》(瑞典，隆德，1983)。

关于1904年至1929年美国占有期间的第一代人的情况，材料并不均匀。最广泛的论述是建造时期保存下来的，这些可见前述马克著《分离的土地》和麦卡洛著《海洋之间的通道》所援引的著作。就运河建设历史方面而言，迈尔斯·杜瓦尔著《山将移：巴拿马运河建设的历史》(斯坦福，1947)也很重要。还可参见杰罗姆·拉瓦尔著《巴拿马和运河的建设：取自拱顶石—桅杆拍摄的立体照片集的照片》(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1978)。

关于运河在美国的战略地位，见威廉·亚当斯著《战略、外

交和巴拿马运河的安全，1890—1917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未公开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1974)；理查德·查利纳著《海军将官、将军和美国对外政策，1898—1914年》(普林斯顿，1973)；以及罗伯特·西格著《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其人及其书信》(安纳波利斯，1977)。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著《巴拿马运河区的政府》(普林斯顿，1915)和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西奥多·罗斯福与巴拿马运河：对管理的研究》(载埃尔廷·莫里森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6卷，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2，)第1547—1557页，论述了运河管理问题，作了坦率的辩护。关于美国卷入巴拿马政治的问题，有拉尔夫·明格著《威廉·霍华德·塔夫特与美国对外政策：见习的年代，1900—1908年》(伊利诺斯州，厄巴纳，1975)和古斯塔沃·梅兰德著《巴拿马政治中的美国；与阴谋有关的形成年代》(伊利诺斯州，丹维尔，1971)。

从1914年到1929年的材料至今还没有多少，但是，下列文章和书是有用的：乔治·贝克著《威尔逊政府与巴拿马，1913—1921年》，载《美洲研究杂志》第8期(1966)，第279—293页；托马斯·伦纳德著《美国与巴拿马：关于流产的1926年条约的谈判》，载《中美洲》第61期(1979)，第189—203页；以及休·戈登·米勒著《地峡航道：加勒比问题评论》(纽约，1929)。

从1930年到1955年期间，最好的研究作品之一是未公开出版的阿尔蒙·R·赖特著《美国与巴拿马，1933—1949年》，国务院公共事务局研究项目499号(1952年8月)。1936年条约的问题及其以后的余波在莱斯特·兰利著《美国与巴拿马，1933—1941年：对战略和外交的研究》(未公开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坎萨斯大学，1965)一文中有充分的论述，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见约翰·梅杰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巴拿马》，载《历史杂志》第28期(1985)，第357—377页。关于军事事务，见斯特森·康恩和拜伦·费尔柴尔德合著《为美国及其前哨基地而守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西半球)》(华盛顿特区，

1964）和两本未公开出版的著作：美国陆军加勒比防卫司令部历史处的《巴拿马运河军区的历史》四卷集（巴拿马运河区，夸里海茨，1947），以及凯思琳·威廉斯著《巴拿马运河的防空，1937年1月1日至1941年12月7日》，载陆军航空部队《历史研究》第42期（华盛顿特区，1946）。并见阿尔蒙·赖特同类的主题《美国与巴拿马之间关于防卫基地的谈判》，载《国务院公报》第27期（1952年8月11日），第212—2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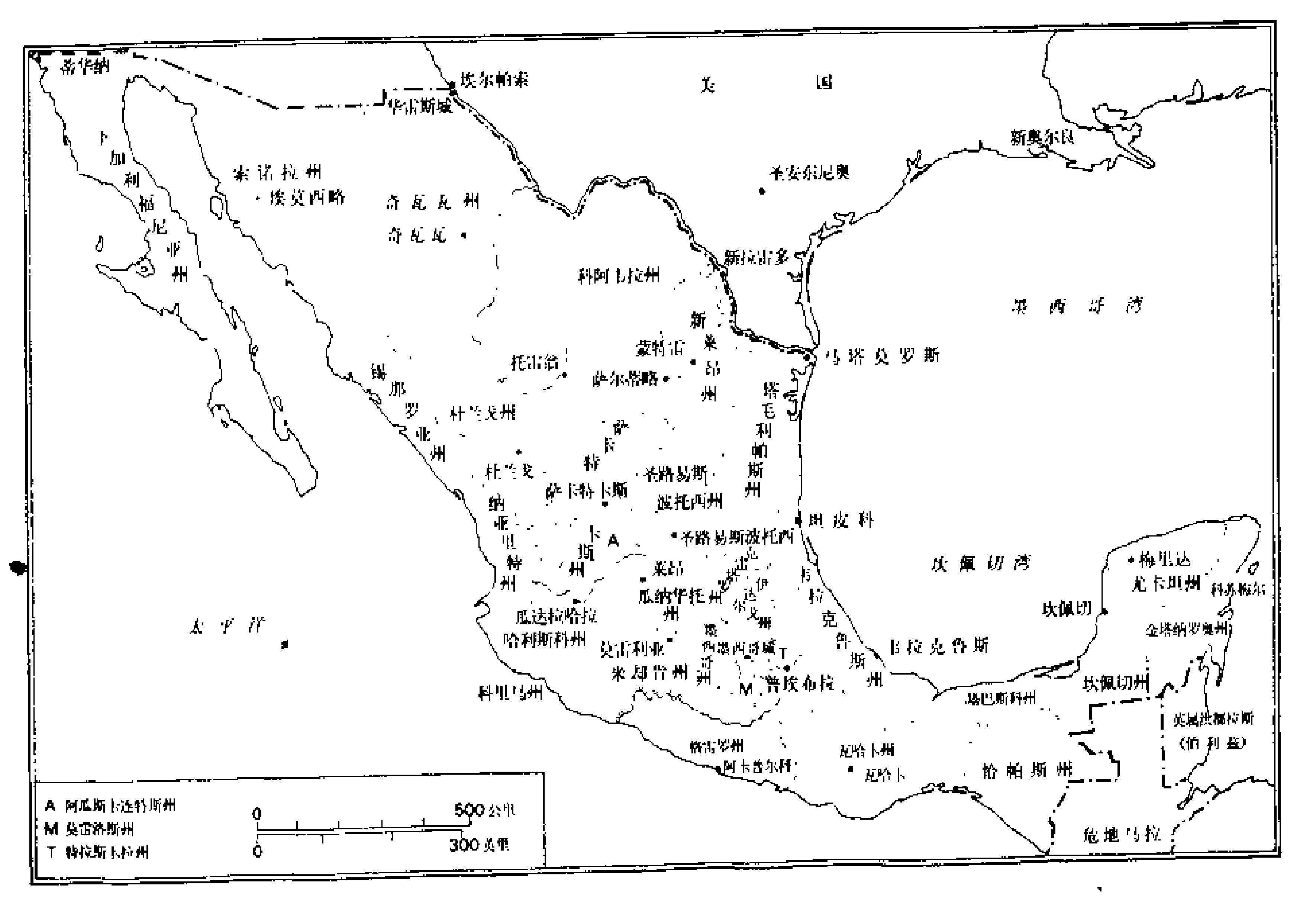
就战后的年代而言，下列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约翰·梅杰著《消耗性资产：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重新评价，1945—1949》（载《战略研究杂志》第3期，1980，第123—146页）和《"为了有利于全世界"？作为国际问题的巴拿马运河，1943—1948年》（载《国际研究评论》第9期，1983，第17—34页）；以及查尔斯·芬威克著《美国与巴拿马之间的1955年条约》（载《美国国际法杂志》第49期，1955，第543—547页）。

关于运河区的最后几年见玛格丽特·斯克兰顿著《变化中的美国对外政策：正在谈判的巴拿马运河新条约，1958—1978年》（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匹兹堡大学，1980），本文很有价值。在1964年暴乱事件以后紧接着就出版的两个令人感兴趣的学术座谈会文件是：莱曼·汤德尔编《巴拿马运河。第6届哈马舍尔德讨论会背景文件和会议记录》（纽约州，多布斯费里，1965）和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巴拿马运河：问题和条约谈判》（华盛顿特区，1967）。最先直接论述70年代条约发展进程的见威廉·乔登著《巴拿马的漫长历程》（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84）。关于美国国内对条约问题的辩论，近期出了两本详述的研究著作：乔治·莫菲特著《胜利的局限性：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批准，1977—1978年》（纽约州，伊萨卡，1985）和J·迈克尔·霍根著《美国政治中的巴拿马运河：国内的主张与政策的演变》（伊利诺斯州，卡尔邦代尔，1986）。并参见威廉·弗朗和玛格丽特·斯克兰顿合著《对外决策的动力：总统、国会和1977年运河条约》（科罗拉

多州·博尔德，1984)，以及G·哈维·萨姆和汤姆·凯利合编《睦邻：美国、巴拿马和1977年运河条约》(俄亥俄州，阿森斯，1988)。也许关于反对条约方面最有条理的专题研究是保罗·瑞安著《巴拿马运河的争议：美国外交与国防利益》(斯坦福，1977)，关于卡特政府，最好的辩护则是赛勒斯·万斯著《困难的抉择：处理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四年》(纽约，1983)。还可参见索尔·利诺维茨著《成为一个公职人员：回忆录》(波士顿，1985)。条约的文本由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宣传处出版单行本：《关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全文》〔精选文件6A〕(华盛顿特区，1977)。参议院的辩论和该条约的各种修正案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权力分散小组委员会收藏的下列三卷集中查到：《巴拿马运河条约(美国参议院辩论集)1977—1978年》(华盛顿特区，1978)。1979年巴拿马运河法全文可在下列美国法规大全中查到：《1979年9月27日公法96—70：1979年巴拿马运河法〔法规93，452〕》(华盛顿特区，1979)。该法的立法历史可在下列美国法典第二卷中查到：《国会和行政新闻：96届国会第1届常会，1979年》(华盛顿特区，1980)。

索　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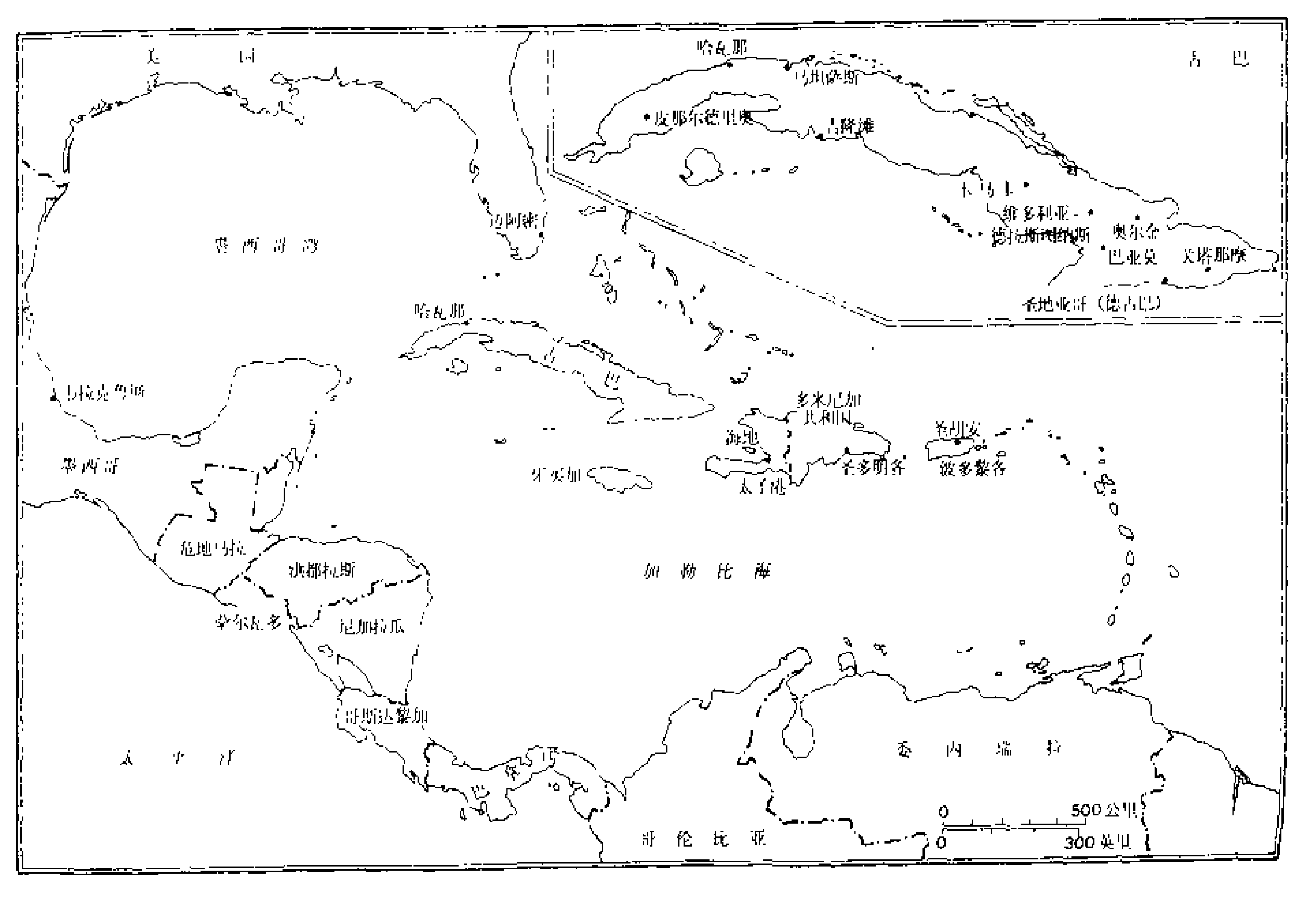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蒂华纳
埃尔帕索
华雷斯城
美国
新奥尔良
圣安东尼奥
下加利福尼亚州
索诺拉州
埃莫西略
奇瓦瓦州
奇瓦瓦
新拉雷多
科阿韦拉州
墨西哥湾
新莱昂州
蒙特雷
马塔莫罗斯
托雷翁
萨尔蒂略
锡那罗亚州
杜兰戈州
塔毛利帕斯州
萨卡特卡斯
杜兰戈
圣路易斯
波托西州
萨卡特卡斯
纳亚里特州
坦皮科
A
圣路易斯波托西
坎佩切湾
梅里达
尤卡坦州
科苏梅尔
阿瓜斯卡连特斯州
莱昂
瓜纳华托州
伊达尔戈州
韦拉克鲁斯州
坎佩切
金塔纳罗奥州
太平洋
瓜达拉哈拉
哈利斯科州
莫雷利亚
墨西哥城
T
米却肯州
M
普埃布拉
韦拉克鲁斯
坎佩切州
塔巴斯科州
英属洪都拉斯
(伯利兹)
科利马州
格雷罗州
阿卡普尔科
瓦哈卡州
瓦哈卡
恰帕斯州
危地马拉
A 阿瓜斯卡连特斯州
M 莫雷洛斯州
T 特拉斯卡拉州
0
500公里
0
300英里

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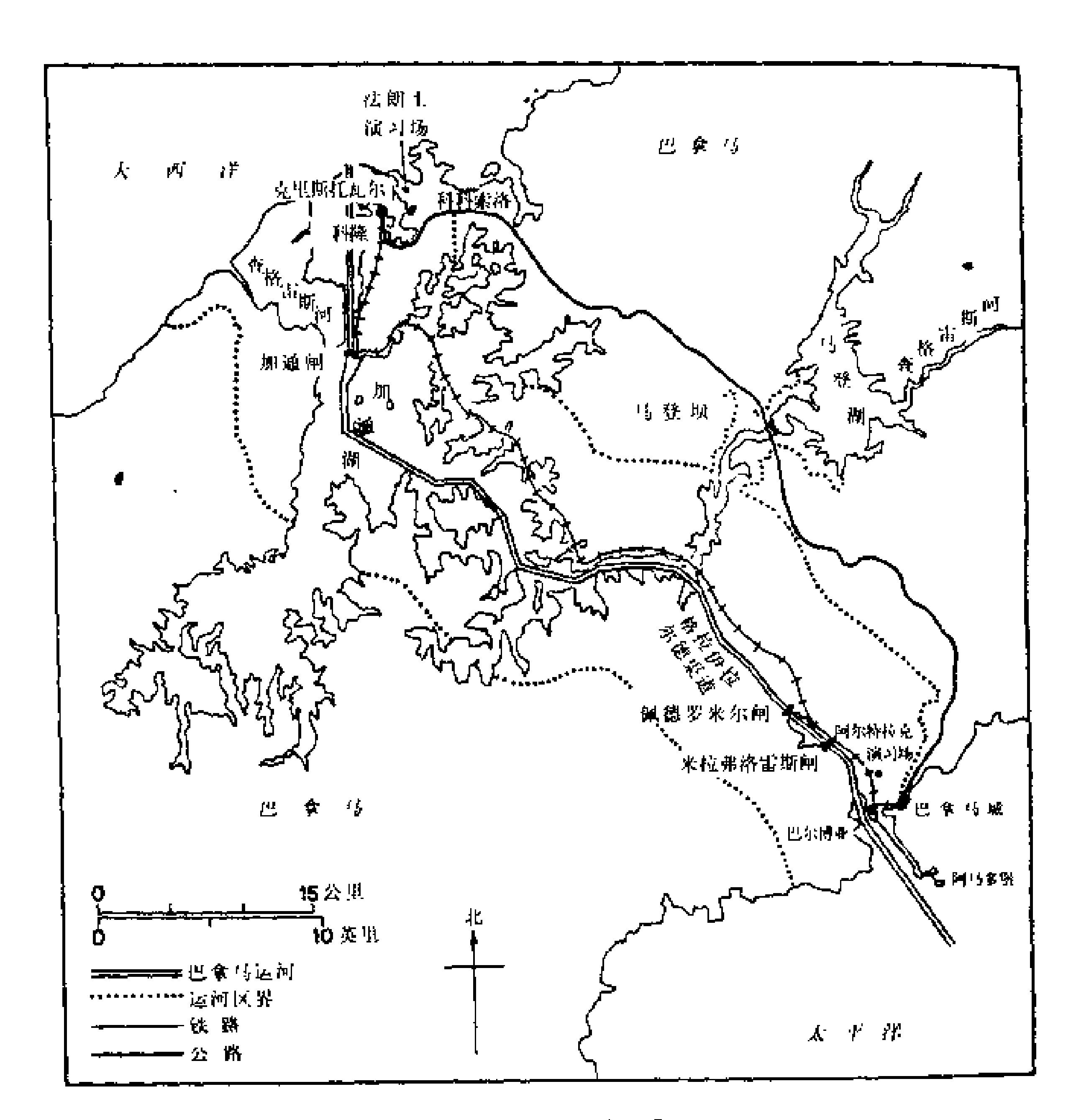
墨西哥
伯利兹城
伯利兹
加勒比海
科尔特斯港
巴里奥斯港
圣佩德罗苏拉
危地马拉
克萨尔特南戈
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城
圣安娜
特古西加尔巴
卡贝萨斯港
圣萨尔瓦多
圣米格尔
萨尔瓦多
希诺特加
马塔加尔帕
丰塞卡湾
科林托
莱昂
尼加拉瓜
马那瓜
格拉纳达
布卢菲尔兹
墨西哥湾
哥斯达黎加
蓬塔雷纳斯
圣何塞
利蒙港
卡塔戈
科隆
巴拿马城
巴
哥伦比亚
0　300公里
0　200英里

中美洲



美国
古巴
哈瓦那
墨西哥湾
牙买加
圣胡安
波多黎各
太子港
圣多明各
加勒比海
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500公里
300英里

加勒比


大西洋
巴拿马
克里斯托瓦尔
科隆
科科索洛
查格雷斯河
加通闸
加通湖
马登坝
马登湖
查格雷斯河
佩德罗米尔闸
米拉弗洛雷斯闸
阿尔布鲁克演习场
巴拿马城
巴尔博亚
阿马多
巴拿马
太平洋
北
0 15 公里
0 10 英里
巴拿马运河
运河区界
铁路
公路

巴拿马运河区